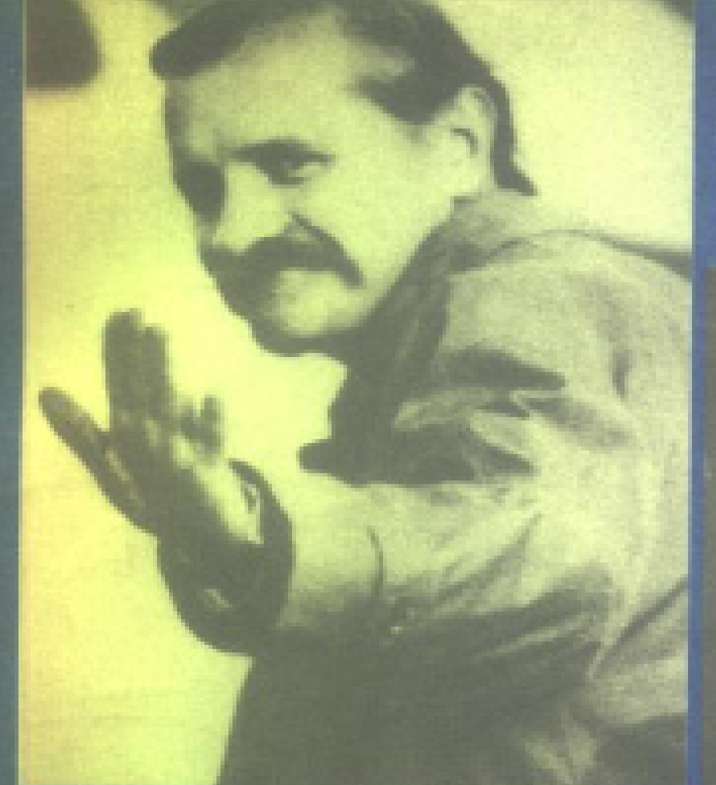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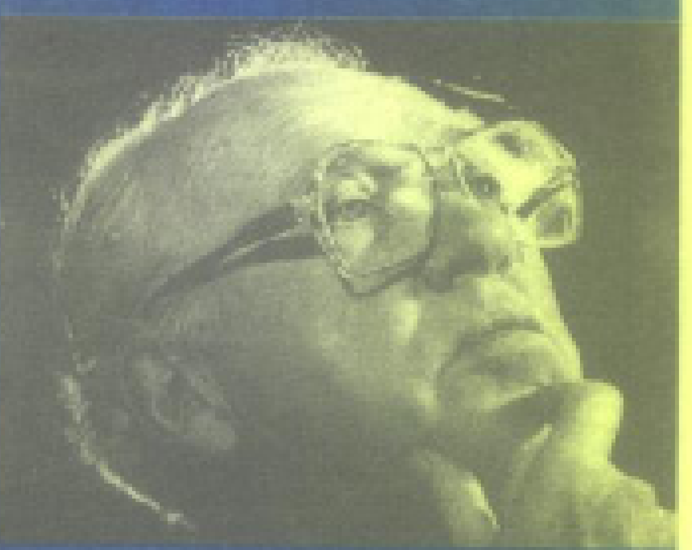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董力争 曹殿波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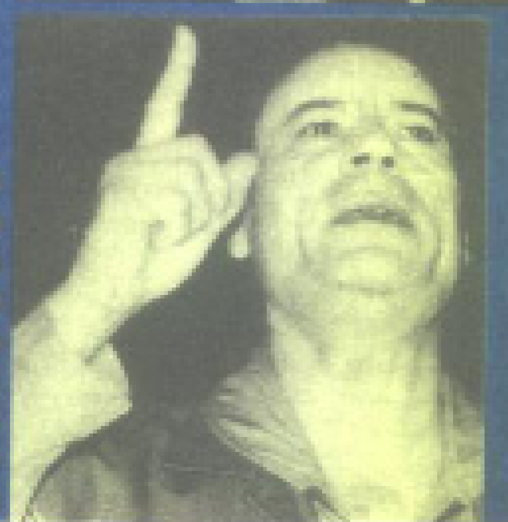


谍海魁首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内幕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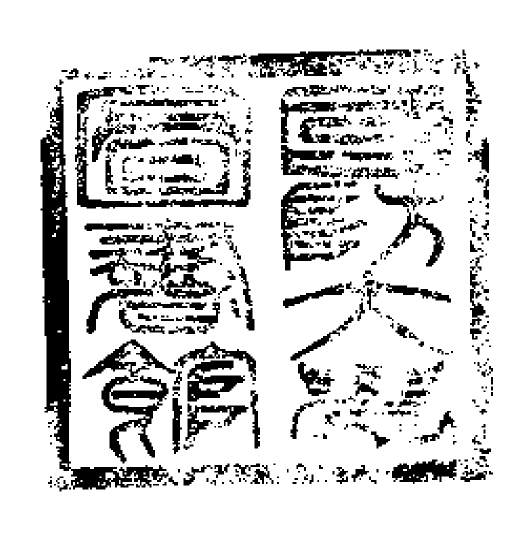


美国最佳畅销书

谍 海 魁 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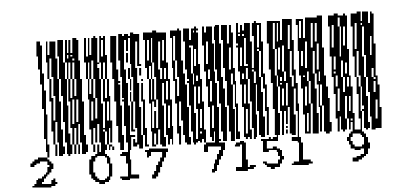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内幕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董力争　曹殿波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097号



谍海魁首
——中央情报局秘密战内幕
〔美〕鲍勃·伍德沃德　著
董力争　曹殿波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66）
北京经伟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　18.25印张　448(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11.40元
ISBN　7-5043-1907-4/G·707

内容提要

本书为1988年美国最佳畅销书。书中以大量翔实的史料描述了1981年至1987年中央情报局在全球所进行的诸多秘密战争，揭露了“伊朗门事件”、突袭利比亚、中东人质危机、中美洲之战及美国和前苏联间谍战的内幕，突出了“里根主义”在情报界的深刻影响，刻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等美国情报界的显赫人物，涉及了许多国家首脑的从政及私生活的内幕，揭示了美国政坛三方鼎立的运作机制，及相互间错综复杂的权力之争。本书是一部20世纪80年代栩栩如生的间谍战实录，它融纪实文学的准确性和通俗文学的欣赏性为一体，披露了高度机密的高层决策及间谍战内幕。

作者是美国著名记者，擅长撰写政论性文章，1973年曾因揭露“水门事件”而名噪一时。本书是他的又一部力作。

致 读 者

本书中的资料是通过采访有关的250多人，直接收集或引用情报资料而来。我多次采访了100多人，其中约15个重要情报来源受到采访达6次以上。我本人很想把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告诉读者，但由于主题的机密性，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是私下的，这意味着我曾经保证不会公开他们的身分。事实上人们不会在没有这种保证下讨论情报及安全问题。许多情报提供人也给我提供机会接触文件、备忘录、记录、索引、其他资料、信件、文件副本及日记等。直接引用的文件都已在书中注明。我发现，与职位适当的提供消息者的讨论一般比阅读成摞的文件更有启发性。

对“伊朗门事件”的大量调查，包括参议特别情报委员会，最高检查委员会，国会特别联合委员会及独立的顾问劳伦斯·华尔士，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及文件，特别是关于1985年—1986年的。

书中引用的会见或交谈时的对话至少来自参加者之一的书面回忆或当时的记录。当描述某人曾“认为……”或“相信……”时，这种看法或出自本人自述或出自某位情报提供人在与其谈话中直接得知其结论。我已努力尽可能保留主要人物和情报提供人的原话，即使不能直接引用时也尽量用他们惯用的语言，尽我最大的可能来反映他们自己的语言特点及其观点。在那些情报提供人的回忆或文件所述不十分清楚时则不予引用。

肖·奥莱塔在他最近的书中写到：“没有记者能百分之百地再现一段时间以前的事件。回忆常欺骗参加者们，特别是当结局变得十分清楚时。一个记者常常通过查对许多情报提供人来消除不

准确因素，但对读者及作家来说，由于新闻的局限性而使他们变得谦卑些还是有用的。”我非常信服这一重要论断。

这部书的写作始于1984年晚些时候。起初我的目标仅包括里根和凯西领导中央情报局的头四年，但在采访及写作过程中，我仍作为《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兼记者而工作着。不久，通过尼加拉瓜、利比亚及伊朗事件，很清楚此书应包括1985、1986及1987年。由于此书是描写上述方面的首批书之一，我清楚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是真谛甚至并未接近它。相应地，这部书更接近于新闻而不是历史，特别是有关“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及大量调查正在进行中。

在书中有许多关于国家安全方面的事，《邮报》主编和我一直在研究其是否出版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我成了我自己的情报来源，我并不情愿地叙述，尽可能准确地表达所发生的事，此外，我也描述了与威廉·凯西的几次会面。

我努力从三个主要方面说明有关情报的内情：(1) 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2) 白宫。(3) 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

从1983至1989年，我与凯西共进行了四五十次的谈话或实质性讨论。我们在他家中、办公室、飞行场或电话里进行交谈，有时他说话很随便能阐明他的观点，有时他拒绝回答。但总起来说，我得到了他对这部书中所涉及的主要的情报主题的观点。他曾说：“每一个人都说得比应说的要多。”他知道另一些人及他本人都接受这一箴言。他很少愿意公开其姓名或成为我的报纸的一个消息来源，他知道我在收集有关这部描写他的中央情报局的资料，而且他多次规定所提供资料不能登在当日报纸而只能写在书里。在其它许多方面，凯西自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公平地说，如果他活着写自己的事，他决不会这样写。他将与我激烈争执，正如他在世时常做的那样。然而，我肯定他最终会认可书中大部分或全部资料，与我争执的原因，或许是他的防御战术或描述故事的方

法，或是出于好奇。因而可以说，本书决不是有关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几年经写作雕饰的版本，因为他本人就是本书的参与者之一。

情报的最主要使用者是白宫及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根总统的数十位助手曾帮助过我，但我未与总统直接会面。

1971 年，中央情报局的强有力支持者，参议员约翰·斯登尼斯在议院议员席上说："间谍活动就是要采用间谍手段……你必须下定决心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并尽可能保护它，对将要发生的还要闭上眼睛加以接受。"当 20 世纪 70 年代情报丑闻披露后，国会中最瞩目的情报活动监督者可能是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了，它想监视并控制情报活动。根据法律，它与众议院的相应机构是国会监督的保证。在里根任期内，立法对情报的监督遇到障碍并最终失败了，有许多国会特别情报委员会成员及其助手帮我记下了那些往事。

为了保密而产生了相应的词汇，一方面很容易对密级采取崇拜的态度并认为凡冠以"机密"或"高度机密"的文件是极为机密的，必须保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对密级怀疑态度，认为密级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块用来掩盖错误的政策或尴尬境地的遮盖布罢了。在我那些最好的提供情报者的指导下，我试着采取了中间路线。但有关此类题目的书如完全保密就失去了相应的价值，幸好这部书绝非如此。

人 物 表

中央情报局局长

威廉·凯西　1981年1月28日—1987年1月29日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博比·英曼　1981年2月12日—1982年6月10日

（国家安全局局长1977—1981）

约翰·麦克马洪　1982年6月10日—1986年3月29日

（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1978—1981）

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

马克斯·哈格尔　1981年5月11日—1981年7月14日

约翰·斯坦因　1981年7月—1984年6月

克莱尔·乔治　1981年6月—

中央情报局总顾问

斯坦利·斯波金　1966年6月30日—1973年2月2日

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们

理查德·海尔姆斯　1966年6月30日—1973年2月2日

詹姆斯·施莱辛格　1973年2月2日—1973年7月2日

威廉·考尔比　1973年9月4日—1976年1月30日

乔治·布什　1976年1月30日—1977年1月20日

（副总统1981年1月20日—）

斯坦菲尔德·特纳　1977年3月9日—1981年1月20日

美国总统

罗纳德·里根　1981年1月20日—

国家安全助理

理查德·艾伦　1981年1月21日—1982年1月4日

威廉·克拉克　1982年1月4日—1983年10月17日

罗伯特·麦克法兰　1983年10月17日—1985年12月4日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

1985年12月4日—1986年11月25日

弗兰克·卡卢奇　1987年1月2日—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1978—1981）

（国防部副部长　1981—1982）

总统助手

詹姆斯·贝克　白宫办公厅主任

1981年1月21日—1985年2月2日

财政部长1985年1月3日—

埃德温·米斯　总统顾问

1981年1月21日—1985年2月24日

司法部长1985年2月25日—

米歇尔·丹佛　白宫办公厅副主任

1981年1月21日—1985年5月10日

唐纳德·里甘　白宫办公厅主任

1985年2月4日—1987年1月27日

国务卿

亚历山大·黑格　1981年1月22日—1982年6月25日

乔治·舒尔茨　1982年7月16日—

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托马斯·恩德斯　1981年6月23日—1983年6月27日

安东尼·托尼·莫特利

1983年7月12日—1985年7月3日

伊利沃特·伯拉姆斯　1985年7月17日—

国防部长

凯斯帕·温伯格　1981年1月21日—

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

巴里·戈莱沃特主席　1981年—1985年

戴维·杜伦伯格主席　1985年—1986年

丹尼尔·莫尼汉副主席 1981年—1984年

帕特里克·利伊副主席 1985年—1986年

序　幕

清晨七点，闹钟催醒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将军。今天，1980年12月20日，星期四，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第383天，52名被关押在德黑兰的美国人质导致了吉米·卡特总统竞选连任的失败。特纳将在今天向新当选总统罗纳德·里根作情报汇报。

由于今年早些时候，联邦调查局发现一些伊朗人在华盛顿郊外用高强度步枪进行射击练习，所以在特纳住宅一层24小时均有一名卫兵值班。几周后卫兵撤了，现在显得很安静。

特纳今年56岁，是一名退休的四星海军上将，现在正是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时。特纳是一名罗德斯派学者，是系统分析和海军军事专家。他很善于摆脱日常琐事去思考些较重要的问题。但特纳是个易动感情的人，现在正处于过渡时期，他被夹在新旧老板之间，一系列矛盾心理正困扰着他。

首先，他必须决定该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法把真正的秘密通达里根。那些压箱底的、有潜在爆炸性和危险性的行动及间谍技术是作为总统应该知道的。对此新闻媒介一无所知，就连苏联间谍也不知晓。在里根尚未指定谁是他可以信任的人之前，特纳必须直接和总统本人联系。特纳不能在政客们面前泄密，他们曾参加了前两次汇报会，预计今天汇报时他们也可能参加。特纳最

后还将向总统讲一项最机密的情报行动，在此行动中有100多人都冒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

特纳还必须引导总统在间谍及秘密行动的成功机会及危险性之间作出抉择，这是总统必须面对的关键所在。里根已保证要恢复中央情报局的元气。

特纳也想增加自己对里根的了解。他觉得在以往的汇报中，里根表面对他很友好，但最终还是难以接近。在他们会面时，里根总表现出一种精巧和超然的惬意，似乎要用一个笑话，一个好莱坞故事或一条保守派教义去驱走世界上的问题。特纳曾忍受了卡特地狱般的无情的煎熬，而同里根接触越多，他却越怀疑此人的基本思维。他私下里称里根是个“笨蛋”。

特纳不得不考虑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的未来。他想表达出他想继续留任的愿望甚至是渴望。里根及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指责卡特把中央情报局逼入绝境，使它实际上不能进行有效的间谍活动。共和党人也指责特纳作为局长对卡特的人权运动过于负责，说他过分迷恋不招麻烦、相对安全但被动的现代卫星和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愿冒任何风险。他们形容中央情报局是“衰弱”的。特纳想，如果当选总统允许他举行一次听证会，他将驳斥这种看法。他的中央情报局已实施了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将会得到罗纳德·里根的赞赏。

特纳曾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里根不想使中央情报局政治化，他将看到我们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人嘲笑他作出的会继续留任的暗示。他在海军时的老朋友，退役舰长现任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部主任的赫伯·海图也认为特纳需要面对现实。

“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留用你，”海图对他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因为他们在竞选中就抨击了你。”

但特纳仍很乐观，当然有时这是很难的。就在总统竞选后，他召集了15名高级助手在珍珠营举行了管理研究会。珍珠营又称

“农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乡村，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训练学院和基地。他半开玩笑似地，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作了一次秘密假投票。黑板上统计票数犹如一杯冷水浇在脸上：卡特 2 票，里根 13 票。这恰好反映了里根在选举团的胜利：489 票对 44 票。

虽然选举后的那天上午天气特别糟，但可以感觉出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走廊内的欢乐气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会探出窗户欢呼，但许多人把里根的胜利比作巴黎解放日。

淋浴过后，特纳穿好衣服，坐下读几分钟书，他拿起本周的基督教科学派的教义。如果他现在不休息一会，一天里将不会有机会休息了。他倾向于信仰基督教的智能派——即认为思想及灵魂高于一切。

下周日的教义说道：“热情地告诉病人他必须清醒过来，要帮助他从非理性现象的困惑中解脱出来……”要看到事物的本质，教义说道。特纳承认事实确实如此，或许对这位世界上最大和最复杂的情报机构首脑来说，这有点奇怪，但他可以证实这些教义的力量。30 年代，他父亲在股票市场赔本自杀后，他母亲坚强地活了下来。随后，特纳唯一的兄弟又死于车祸，为了摆脱这些无法解释的悲剧和创痛特纳使自己沉浸于宗教中。他曾用红笔对“痛苦是上帝关心的证据”加了标记。

时间快到了，他站起身意识到自己走神忽略了教义。特纳身高 5 英尺 9.5 英寸，长得很结实。他溜下楼去，像只前冲的公羊直奔早餐。当他走动时，带起的微风轻轻吹动着他那浓密的灰发。他暗蓝色的眼睛、淡淡的微笑及那类似“扶轮国际地方分社”人员的举止都说明他只能是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

早餐上，他喝着果汁及热水加柠檬。他信仰基督教智能派，所以戒食兴奋剂，也不喝咖啡。他甚至不喜欢咖啡冰淇淋的味道。

桌上的《华盛顿邮报》标题是《据报道凯西即将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抢过报纸看着，他丝毫未听说这种可能。这个威

廉·凯西今年67岁，是里根竞选班子主席。特纳感到这样的选择是一个倒退，是绝对错误的。理查德·尼克松曾任命他1968年的竞选运动组织者约翰·米歇尔任司法部长，难道中央情报局成了今年政治战的战利品吗？

特纳读到："凯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他认为这毫无联系，就像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些老海军上将们指挥现代舰队一样。在特纳看来，战略情报局不过是一个老兵，是个孩子气的老头们的组织。现在中央情报局内仍留有战略情报局的残余人员及观点，这些都给特纳带来很大的麻烦。这些人是行动者，是机构的核心，是兄弟队。在与白宫或国会摊牌时，兄弟队可能要遭殃，就像70年代中期调查中央情报局活动时所发生的。但这些老资格者都留了下来，因为还需要他们。每位总统，每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需要勇于献身的干"脏"活的秘密行动者。他们组成了一个不开会的俱乐部，热衷于秘密情报计划，是那种能在报酬也是秘密的环境中旺盛生存的人。他们即是中央情报局的优势也是缺陷。现在显而易见是一位"兄弟"从隐居地出山了。《邮报》说凯西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最后6个月负责过向德国后方投放间谍的工作，但那已是35年前了。

特纳曾觉得如果自己被替换也将会给予起码的礼遇，会在告知报社前通知他。他以为这条消息可能是个试探舆论反应的行为或纯属误传。在总统竞选前他甚至没听说过凯西。二周前里根在他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还宣布说凯西将回家从事私人法律业务。

将要离职的前景更使特纳深信是他领导中央情报局走出了70年代中期的黑暗、混乱时期——在越南和水门恶梦后的大动荡。国会调查中央情报局深深触及了它的内幕：暗杀外国领导人的阴谋、给非嫌疑犯服用致幻剂、贮存少量毒药和毒液、偷拆信

件及对反对越战的美国人进行间谍活动等等。他已带领中央情报局走出了莽撞的时代，他反对那种令人着迷的而他认为是被歪曲了的秘密修养。虽然在改革后需向国会情报委员会严格报告其行动甚至于高度机密行动，但他表示中央情报局在国会监督下将继续有效地行动。他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很成功，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特纳相信，一旦他们取得了人们的理解，就会得到里根及美国人民的支持。

大选前一个月，特纳摆脱日常工作花了一周时间写了一份关于他前四年的述职报告及今后四年的计划，日期为 1980 年 10 月 17 日，并标明："仅供中央情报局局长阅"。但这份七页的大纲对最高机密还是做了保密。《目的——推翻注解》讲述了将使当选总统和他的班子吃惊的事情。特纳在控制莽撞者和兄弟们的野性上确实遇到过麻烦，但他最终获得了控制权而且许多老手现已离开了中央情报局。但现在有一个较大的问题，中央情报局的神经过于紧张，行动处常表现出明显的胆怯和抵制行动。但行动处是进行间谍活动的部门，是在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站进行间谍活动及当总统命令对他国事务进行秘密干预时实施秘密行动的唯一的秘密队伍。

特纳曾多次建议进行新的秘密行动，但行动处均加以回避。有一次，特纳未与白宫商量，自己写给负责行动的局长助理一封短信，用以试探他们的反应。在信中他询问能作些什么才能将妨碍美国利益的——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伊朗领导人霍梅尼及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赶下台。局长助理的回答是：毫无可能。因为在这几个国家均没有能生存的政治反对派，或者中央情报局对某个运动、某个政党或某位领导人没有足够的了解，无法对其加以支持。而实际上特纳所寻求的方式是给这些国家内的某些小组或个人以秘密的资金或协助。在 1976 年由福特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已禁止暗杀，卡特再次明令禁止。特纳完全同意这项禁令，但即使

如此，行动者们仍担心特纳会让他们走危险的道路。特纳对他们不愿参与的程度感到吃惊，无论他怎样探讨这一问题，局长助理均毫无反应。他们对严重干预他国事务的前景感到不愉快，尽管那是他们的工作。确实，一些金钱正在输送给伊朗境外的反霍梅尼力量，但那至少在白宫看来，它只是用来惩罚霍梅尼或是为了以可能发生的反对革命的运动建立某种接触。

特纳还向行动处建议搞一个有限度的秘密行动计划，在危地马拉发现和帮助一些中间派政治家，或许甚至可以把一些有希望的危地马拉人列到中央情报局的付酬名单上。危地马拉政治火山四处蔓延。在中美洲这是很典型的，即右派军政府和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游击队互相对峙。在一年中，这个国家已死了几百人。按特纳的观点，在这恰恰是可以对中间派给予秘密政治支持并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好时机。

但局长助理的反应好像是他在上午 9 时的高级助手会议上邀请了克格勃一样。秘密行动者们辩驳说，秘密行动将会使中央情报局面临超越行政策略的巨大危险，而无论怎么说这种政策至今不完全明朗。假如扶植的这个人不成功，假如此人成为无法控制而毁灭我们的人物，或者假如我们扶植了他而后卡特总统或其他总统想走另一条路，那么这些行动太容易出错了。与会者都强烈反对这项建议，特纳甚至未敢在白宫提出这项建议。国家安全助理齐格纽·布热津斯基几乎肯定会支持某些秘密行动，但卡特宁愿停留在犹豫的回旋之中。事实上卡特总统在其任内摇摆于布热津斯基对世界的强硬观点及塞勒斯·万斯的软弱观点之间。特纳有一次私下称卡特为“和事佬”。

在 12 月 14 日，特纳曾将另外一些观点及个人想法写入另一篇备忘录，在《白宫》栏下，他写道：“冲突的根据”。呈送的名单很长，但大部分问题与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有关，他似乎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专为他工作的。一次特纳想插手一项有关军备

控制的情报争端，而布热津斯基却告诉他："你不是最高法院，也不是国家的第四个权力机关，你应明白你为谁工作。"

布热津斯基喜欢原始情报，像国家安全局窃听外国的通讯——常给他提供某些国家领导人谈话的译本，或某些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发回本国首都的已破译密码的政治分析。"你看了那份窃听报告了吗？"布热津斯基常这样问。特纳感到布热津斯基犯了低级分析人员的典型错误，即认为可以通过一次海底电报或一次窃听所得来解释重大事件。因为国家安全局常截获一些吹牛者，一些得到错误的报告而妄自尊大的官员的话或一位大使报告他并不清楚的东西。特纳在《国家安全局》栏下写道："单一来源的情报分析是危险的。"

特纳与布热津斯基之间的争斗不断，后者有时掠夺成性。"你在苏联国内一个重要人物也没有"，布热津斯基曾对特纳说过这样的话。布热津斯基一次与特纳在苏联发展了几名俄国重要人物，尽管只有一人他能肯定是忠诚的，其中两人已失踪，也可能被杀——他无法加以肯定。

自 1977 年始特纳的每周三次向总统汇报情报改为每周一次，其后又改为每两周一次。他将此归咎于布热津斯基。因他曾指出他以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分析比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好。

当 1979 年 10 月伊朗国王赴美治病，即德黑兰人质危机发生两周前，白宫要求中央情报局窃听这位已下台的伊朗统治者的病房，从而知道这位易变的、受癌症折磨的人想做些什么。特纳反驳说国王与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法律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国内收集情报。但布热津斯基却给他下达了书面命令，特纳只好忍气吞声，下令对国王在纽约市一家医院第 18 层的三间病房进行电子侦听，尽管他仍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把情报比作工具，就像用铅锤测量一样。当它未起作用，当"窃听器"不能立即就位，或当中央情报局未能

预计到未来时，它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特纳有时隐隐地，有时明显地感到自己既和自己的手下，也与他所服务的总统相隔离。

为接近当选总统，特纳将他第二份备忘录的复印件送给一位正为政府寻找中央情报局人选的过渡班子成员。在还给特纳时，此人用铅笔在要求立即将中央情报局建为反对俄国人而进行分析和秘密行动的队伍的建议上加了标记。在特纳列举中央情报局一些积极贡献部分，几笔潦草的评语写道："太慷慨了，害怕政治上的争议。"在关于国会特别情报监督委员会及其成员部分，此人写道："应尽可能地让左翼走开。"特纳也在其草案中写道："中央情报局承受不了新的丑闻了。"而此处一纸手写的短笺说道："政治气候已在改变，还将继续改变。如果我们在害怕的基础上行动，将一事无成。"在特纳提到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武装（其最活跃、最富干涉性的队伍）的地方，潦草的评论是："必须重建。"很好，特纳想，这一点上运气不错。

特纳吃完早餐，他的司机布朗已把车开到车道上接他进城向里根汇报。他坐到后排座上，一个夹装着夜间及早晨文电的文件放在那里。政府配发的黑色奥尔德斯牌轿车沿斯基普威斯街开到第123街，汇入了早晨的车流。布朗驾车在其间穿来穿去，迂回前进，他熟练地甩掉慢车，充分利用每一次超车机会。

中央情报局有四个卫兵轮流保护这位海军上将。今天值班的卫兵带着手枪坐在前排座上，眼睛扫视着路面，寻找着可疑的迹象。此刻正值金秋时节，阳光明媚，气候宜人，但车子的防弹玻璃不能旋下，车里的人无法享受这美丽的天气。这部车有全套的高级安全设备，装有装甲和防雷底板。

后座的特纳坐立不安，两脚滑来滑去。他想把精力集中到最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最具想象力和爆发性的任务上去。一个情报界的外行，比如里根，未曾在联邦政府任专职，他可能不知道情报所牵涉的范围。特纳在下个月仍在职，这可能对他留任有所

帮助。

最机密的行动之一是“海军特别控制计划”——简称“海特”。在这项计划中美国潜艇跟踪苏联潜艇并在苏联周围，有时是在领海或码头内进行极危险的侦听和情报收集工作。它的行动包括放置高级电子录音装置或“窃听器”用来对苏联的一些重要海底电缆通讯进行窃听。这可能是最机密的行动了，它们威胁着艇上所有人的生命。潜艇、艇员及派出随艇的国家安全局小组处于危险之中。这是海军的骄傲，它喜欢强壮的男子汉和勇敢的探险。每次行动都必须得到总统批准。一艘核潜艇潜入大海，安放窃听器然后离开该水域，数周后再返回取出安放在海底电缆上录音设备内的磁带，随后把磁带交给国家安全局。这些情报只分发给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及白宫的少数几个人手里。有时特纳感到虽然冒了很大危险但情报仅勉强够格。

但他承认潜艇有时带回了有关苏联军队的大量数据，这使它成为在苏联境外获得大量高质量的确切情报的行动之一。有时这些收获包括苏联军官相互谈话，表现出他们的多变、撒谎和软弱。如同其它成功的情报行动一样，这种机会建立在对方的错误之上。苏联人曾认为其海底电缆不可能被窃听，因而经海底电缆的通讯联系只用不太复杂的密码系统，甚至不用密码。

另一个计划是“靛蓝”计划，是一种正在研制的高度机密的新卫星系统。它可用来对将和苏联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进行监督。它使用的雷达成像系统可穿透云层并可在夜间工作，而照像卫星在夜间就成了瞎子。这对东欧尤为重要，在那里被称为“恶魔云罩”的云层常遮盖数天或数周之久。

在海外某些最出色的搜集情报行动是由特别收集分队完成的。它们由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的精华组成，在许多国家的首都利用最先进的装置进行窃听活动。这些特别收集分队创造了间谍的奇迹。它们提供了欧洲、中东和亚洲等地外国政府高级会

议一字不漏的记录及重要政治人物的电话交谈内容。它补充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驻外使馆掩护下所进行的日常间谍工作。

在他的"仅供中央情报局局长阅"的备忘录中，特纳写道："卡特要求对盟国和朋友进行间谍活动。"特纳认为，对朋友进行间谍活动是令人尴尬的但却是必要的职责。伊朗国王是美国及中央情报局的忠实的朋友，它的情报机构，令人恐惧的萨瓦赫，是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主要情报渠道。特纳逐渐认识到，他及中央情报局错误地把霍梅尼看成是一个善良衰老的教徒，而正是他现在却扣押着美国人质，这是一个多大的错误呀！特纳由此推断出没有人能比朋友更会令人意外了，而对于敌对国家来说中央情报局能较容易地预测未来。

经受了伊朗革命的震惊后，特纳努力增加在外国政府和情报机构内的领酬间谍，包括对盟友和朋友，埃及即是一例。中央情报局在埃及的保卫行动是为了保护埃及总统萨达特并对政变及暗杀阴谋提前预警，其中也使中央情报局能采用电子和人工途径打入埃及政府、社会和领导层内部。据传说萨达特吸毒并有焦虑症，但特纳对这类宫廷流言从不留意。中央情报局确信埃及的演变及萨达特本人不会令它感到吃惊，因为此处的所有通讯都处在监控之下。

特纳从情报报告中得知沙特阿拉伯王储法赫德大量酗酒，这违反了他信奉的伊斯兰教严厉的禁令。特纳也得到了高度机密的有关苏联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健康情况的报告。这对白宫十分有用，特别是在谈判的前夕。军备控制的情报支持尤其出色：国家安全局破译了苏联导弹试验的某些情报。但关于苏联政治局，这个苏联最高权力机构动态的政治情报却无法得到，这正是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最需要的，而特纳却无能为力。

特纳在中央情报局任职期间，从未见过什么情报值得冒生命危险，但他仍竭力争取更多的情报，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四年期

间只有一次他否决了一项海外秘密收集情报的建议。这是重复较早一次的成功的行动，特纳认为再次行动太危险。

后两个月特纳的任务将是向总统介绍这些及更多的事情。里根将会看到情报行动的整个布置图，它们如何溶为一体，以及它们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例如，在一次称为“磨颈”（一个随意而起的代号）行动中，高级电子装置被伪装成树枝状，并用树皮完整包好，准备将其放在东欧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周围的树上，用来收集先进的苏联米格飞机雷达的数据。这个基地与一个公园相邻，公园内常有野餐者，而特工只需在某个星期天爬过一道篱笆，攀上一棵树并将装置钉在树上即可。但“磨颈”行动被推迟了，因为唯一可找的人选不是欧洲人，派他去在星期天野餐者中会很引人注目，太危险。

这种行动普遍认为是危险的，因许多事情必须到位。有关苏联雷达的情报或许比某些政治局的情报更为有用，但中央情报局不可能监视整个世界。

特纳的汽车驶近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公园，转向单向的杰克逊大街，停在了716号门前。这是一幢政府拥有的市区砖砌房屋，里根现在此停留。特纳跨出车门走上六级台阶。

里根的临时寓所是一幢2[illegible]英尺宽四层高，有113年历史的毫无特色的老房子。六年前，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将这幢十分安全的寓所作为他领导的为调查中央情报局可疑国内活动而设立的委员会总部。里根曾是该委员会八名成员之一，尽管他不十分积极，只参加了委员会26次会议中的10次。当发布最后报告时，里根为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辩护。他说：“任何一个人数多达6000的机构中，总会有个别人犯错误，做些不该做的事情。”

在特纳进门不久，里根走下楼来，热情迎接，这位总统未露出任何焦急，不耐烦，只是自然的好意。他的随从人员包括当选副总统乔治·布什，他是特纳的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里根的高

级助手埃德温·米斯，一位和蔼可亲的律师老站在一旁。三位其它助手也出席了，其中包括比尔·凯西。

特纳向他们报告了有关欧洲军事均势及中美洲问题，谈了波兰最新动态，苏联正威胁要入侵波兰镇压团结工会。卫星空中拍摄的照片及从某些地区，如柏林——它被称为世界间谍们的首都，截获的无线电通讯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还有些人工的情报，特纳启发性地补充道。

凯西抬起了头。

特纳很想透露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隐藏很深的间谍，此人是波兰总参谋部的上校，他连续提供了华沙内部有关波兰和苏联人意图的情报。这位上校的秘密报告提供给只有那些登上了“传阅名单”的，绝对需要知道的美国高级官员。只有他们才能相互传阅这些报告。这些报告放在有明显蓝边或带一条蓝色宽带的文件夹中，以表示它来自一位秘密情报员，并由专人递送至每位官员。卡特、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及布热津斯基是白宫仅有的“传阅名单”或“蓝条”固定享有者。这位上校名叫库克林斯基，他从不在报告中出现，只有少数中央情报局官员知道他。

当特纳引导他们游历世界热点时，他不时地瞥凯西一眼。凯西有些方面不那么令人欣赏，他发音含糊不清，讲话像短波广播一样，忽强忽弱；他秃顶周围的几缕白色硬发顽固地自然生长着，这更加重了他那似乎是一位毫无表情的教授的形象。他的耳朵很大，甚至有些飘动，脸上深深的皱纹从鼻两侧经嘴两边直至下颚，他似乎衣冠不整。尽管如此，特纳也感到凯西是在聚精会神地听着。

汇报完后，凯西走过来，他亲自表示了有些夸大但特纳觉得是真诚和蔼的欢迎。他看上去隐约有些驼背，胳膊肘高悬空中，大手伸过来握住了特纳的手。

“你好，斯坦。”凯西笑着大声说。他把特纳拉到一边。

“关于我将接任你的传闻，”凯西低声说，“那不是真的，什么都没决定。”这自然远远算不上是绝对否认传闻。或许凯西察觉了特纳的担心，他补充说：“我不会谋求你的职位。”

特纳离开时毫不担心自己及中央情报局的前途，有些迹象表明他将离职，但不十分肯定。

当天，米斯通过卡特的白宫转给特纳一封信。普遍认为米斯是未来政府高级职位人选的权威发言人，并被认为相当于代理当选总统。米斯希望特纳明白那天他并未透露凯西的传闻，但他给特纳留下了凯西任命并非不可能的印象。

一

尽管凯西并未谋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位，不过他想可能特纳对此并不相信。实际上凯西想当国务卿或国防部长。预测者们都有理由认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将是里根新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工具。但凯西明白他应该满足于更低的职位，甚至无职位。因为他不是当选总统的加利福尼亚知己，而那些加利福尼亚人将占支配地位。他参加里根竞选运动较晚，而且他最后担任的竞选运动主管所为令人兴奋至少在理论上纯属偶然。他为里根本人效力的时间并不长。

一年前，即1979年早期，凯西突然接到总统候选人里根打来的电话，请求他给予帮助。凯西是一位终生奉献的共和党人，他在他那座落于纽约公园大街200号的办公室里为富人提供法律服务。凭着他对股票行情的直觉，他在那一连串十分冒险的投资中交了好运。同时他还写作编辑了数十本有关税收、投资和法律的书。这样他赚了数百万美元。金钱给了他玩弄政治游戏的机会。自40年代至今，他曾担任过共和党竞选工作人员、组织者、演说撰稿人并经常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他曾在尼克松及福特政府内担任过联邦政府高级职务。最高职务是在1973——1974年任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主席。

“现在参加您的竞选运动还为时过早。”凯西在回答里根的请求时说道。他解释说不应该认为他不愿现在签约参加是缺乏同情

心，实际上恰恰相反。

他拿过支票簿，如同他对其他有希望的共和党候选人一样，迅速填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这是个人赠款的最高限额。他潦草地在支票下边签上名。在他的签名中“威廉”的“W”较大，拙劣地模仿他30年前在公立第13和第89小学时学的书法。那时他在纽约艾尔姆赫斯特，住在中下阶层居住的皇后街。在签名中“凯西”结尾的“Y”是一个有力的书面体，竖划很长，几乎笔直，优美而高雅，让人觉得他似乎自信但不妄自尊大。

在第89公立小学六年级的下半学年，他的成绩单上划了九次迟到，品行是“C”，这是他小学唯一低于“B”的成绩。他的中学成绩全部是“A”，同学们称他为“火山”。从1924年起，他的佳话成了不断追求美好前程的长征。他通过当背球棒的球童学打高尔夫球，现在则是一个俱乐部较知名的成员。在1934至1935年，他进入天主教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学习，这里大部分学生是清教徒，修女没有强烈宗教信仰者。他的学习成绩单下边有人潦草写道：“很好。”但凯西认为社会工作是女人学的，他离开了此地转入法学院学习。仅在1958年中他就通过他在当年建立的一个基金会向慈善事业捐款了21970美元，这相当于一个社会工作者一年的收入。他是一个普通人，却有着不寻常的财富。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同时拥有权力和金钱的，有影响的人物。他学会了在两条路前进的艺术：首先是个人经商致富；第二条路是在政府、商业部门、国会专门委员会任职并参与政治。他体会到，所有这些都取得了收获，但也付出了丧失部分名誉的代价。许多人把他看做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商人，一个靠一连串冒险投资及无数商业侵略而迅速发迹的爆发户，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人们认为是他操纵并曾一度控制了股票市场。虽然表面上他对批评漠然处之，并对法律纠纷习以为常，但内心里他还是渴望能被接受并受人尊敬，就其信仰、教派，对共和党体制的拥护及有价证券业务来说，他的

想法是可变的，但对他人来说并非如此。他对朋友们都绝对忠诚，只不过凯西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面目罢了。

里根再次请求凯西出山，他需要的远不是仅 1000 美元。他正在东去长岛，到凯西住的地方进行筹资活动。“我们可否会面？”他问道。凯西同意了。他们在凯西家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梅克诺尔的大庄园共进早餐。

两人轻松地就共和党竞选前景交谈了一个半小时，凯西听说里根知识浅薄，但他发现里根对经济及国家安全事务有充分的了解。里根钻研不深，但他对这些事务的直觉很好，与凯西有关自由市场、强大国防及积极反共的思想一致。里根仅比凯西大两岁，两人有着同代人的相同观点，儿童时代都很穷。凯西深为里根一生的不同经历所吸引——体育播音员、演员、工会官员、州长和精力充沛的保守派发言人。而凯西自己的一生也有着律师、作家、战略情报局的间谍头子、业余历史学家（他正在写一部有关战略情报局的书）及正式的政府官员这样的经历。他们都经历过大萧条及四次战争，都对彼此动听的故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付之以会心的愉快的一笑。而且两人都认为卡特是个软弱、犹豫不决、身体衰弱和焦虑不安的人，他们都看不起他。这点是很重要的。

凯西很快应邀请去加利福尼亚，参加了里根竞选班子中主管印刷宣传品的执行委员会工作。他知道这并无油水，但这毕竟是参与。他来去匆匆，审阅宣传品，会见米斯及里根的最亲密朋友，矮小而文雅的米歇尔·丹佛。

不久凯西开始劝说富有的共和党朋友们：“我希望你进城与里根和南希共进午餐。”以借此邀请他们集资。若他们不想去，他就会补充说：“听着，你不想被甩在圈外，是吗？这个家伙将会胜利，他将成为总统。”凯西知道如何叫纽约的共和党人掏腰包，他用电话不停地工作。在 1975 年后期里根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西尔斯被解雇后，这位候选人便要凯西接任此职。

这是凯西为之终生奋斗的目标，政治是他的第一爱好。

在 1952 年共和党大会上，年仅 39 岁的凯西失望地看到保守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击败。其后不久，凯西对 26 岁的威廉·伯克雷谈了自己的看法。当伯克雷这个保守的青年对凯西所写的书《那鲁的人与神》感到惊奇时，凯西早已开始了他那走钢丝般的表演了。凯西与伯克雷同是一个反共反自由主义的兄弟会的成员。这是个很小的俱乐部，大概有 50 人，相互间有秘密的握手礼，伯克雷常对此开玩笑。凯西对伯克雷说："若我组织那次竞选活动，塔夫脱可能已赢得了提名。"伯克雷许多年来都记得这句话，因此在 1980 年，当里根给老朋友伯克雷打电话告诉他"已经解雇了约翰·西尔斯，并任命比尔·凯西接任。"时，他非常高兴。就伯克雷所知，凯西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只犯过一个可原谅的小偏差。那是 1966 年，即巴里·戈德华特竞选总统惨败两年后，凯西参加了他生平第一次，感谢上帝，也是唯一的一次竞选公职活动。在党内纳尔逊·洛克菲勒一雅各布·杰维茨派的支持下争夺他所在选区的共和党会议员提名。但结果史蒂文·德朗尼安，一个戈德华特派人物，赢得了这一共和党提名。凯西又回到了幕后，回到了伯克雷及许多纽约共和党人认为他应去的地方。

作为里根竞选运动的新负责人，凯西不得不估价里根周围的权力中心。从人们的眼神、讲话的声调及小心微妙恭敬都说明了南希的重要。演员詹姆斯·斯蒂沃特曾说："如果里根第一次婚姻是与南希结合的话，那么她可能会为里根争来奥斯卡奖。"凯西可以看出，南希·里根是理解他丈夫兴趣所在的最忠诚的学生。

但凯西有时对竞选运动的右翼强硬分子感到不快。"我们周围有一些疯子，而我是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他对一位竞选运动的助手说。他并未说出他开始曾被该委员会拒之门外，只是当他

在 1973 年成为副国务卿时才被邀请加入，他对这点非常恼火。凯西曾想过把这份邀请书扔到厕所里，并叫他们滚蛋，但后来他镇定地接受了邀请，这是矫饰自己的有用凭证。

某些竞选运动成员及记者们形容凯西是个“怪人”。他在华盛顿和洛杉矶从不洗衣服，有时旅行时也不带衣箱，需要时就买新衣服。有一次，丹佛在一次会议上与他座位相邻通过他身上的气味丹佛说凯西没时间买东西。但第二天凯西收拾得特别干净，很明显他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丹佛知道凯西正在完成一项不容许任何东西阻碍的任务。他夜间、周末均在工作，这种一心一意为工作的精神值得尊敬。

大选一个月前，凯西预计里根将获胜，便不引人注目地组织了一个外交政策顾问班子，挑选了 17 名高级专家参加，包括前总统福特及其它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高级人物。他主持这个班子，分派研究及论述工作。于是有些人认为他在置身于未来国务卿的位置上了。在 1973 至 1974 年短期担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他被当时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赶了出去，他留下的影响很小。在基辛格的两册长达 2395 页的回忆录中，凯西只出现在一条例行的参考中，但他却选择了基辛格参加里根的顾问班子。

这个班子确认：在中美洲小国家里的共产党暴动是对未来政府的一个重要和紧迫的挑战。然而凯西却认为萨尔瓦多才是当今世界象征性的最重要地区。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自己后院的威胁那将危及到里根在世界其它地区的威信。凯西在得知中央情报局为节约经费于 1973 年关闭了在萨尔瓦多的情报站，直至 1978 年才重新工作时不禁哑然失声。怎么能这样做？中央情报局在干什么？情报被认为是第一条防线，若情报部门不进行情报收集工作，那么它在防御式进攻中就毫无作用可言。

11 月 21 日也就是特纳汇报一天后，里根乘飞机回到了加利

福尼亚。在里根等待上任期间，他未来政府的核心人物们正准备着夺取权利。除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及外地的保守派朋友们外，无人知晓这点。他们安排里根接待了一位重要国外来访者——亚历山大·麦伦哲斯上校，法国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的海外情报及反谍局的首脑。麦伦哲斯是欧洲著名的保守派人士，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留着短发的贵族，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已领导海外情报及反谍局达 10 年之久。海外情报及反谍局的绰号是“游泳池”，那是因为它的总部靠近巴黎郊区的特里勒斯游泳池。它对法国的国内政治有较大的影响。麦伦哲斯的办公室有一幅世界地图，上面用红色显示共产主义的蔓延。他将此图的小号版送给那些官方的访问者。几年前在一次美法双方情报首脑的正式联络会议上，他曾送了一幅这样的地图给特纳。

在此次加利福尼亚之行中，他又带了许多幅地图。对法国官员们来说，间谍是最严肃的职业，是承担巨大危险的职业，也是有希望得到巨额报酬职业。他很蔑视中央情报局的习惯作法，即将其特工人员以外交官身份作伪装隐藏于美驻外使馆中。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及高级官员们——常常是所有官员——很快被识破。这无疑是对他们间谍活动的一种嘲弄。然而伪装为航空公司职员或别的人员虽然困难些，却更有成效。真正的间谍活动需要全身心的投入，需要进行紧张的活动。欧洲情报机构有时用记者身份做间谍活动的伪装，但美国人避免这样，他们认为言论自由高于国家安全。在麦伦哲斯看来，伪装成外交官的间谍是冒牌货。

麦伦哲斯同当选总统谈了共同的保守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的威胁，军事和情报力量削弱的危险。但他只谈了梗概。

“你是否可给我提些建议?”里根问到，“每个人都给我提些建议”。

“我仅能告诉你有关人这方面的问题”。麦伦哲斯用流利的英

语回答说（他英语说得很好，他认为语言是情报官员必须掌握的）。他只能告诉当选总统“哪些人你必须见及哪些人你不应见。”

“哪些人我必须见呢？”里根问。

麦伦哲斯提到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哲尼特辛，他知道苏联恶行的内幕。里根还应会见乔纳斯·萨文比，安哥拉抵抗力量领导人，他正在西南非洲那个重要国家里同共产党政权进行战斗。美国曾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萨文比，但在国会于1976年通过的所谓《克拉克修正案》禁止在安哥拉的秘密活动后，这种支持就停止了。

“当你要了解地狱时，你就要同曾在那里呆过的人交谈。”这位法国情报首脑断言道。

“哪些人我不应该见呢？”里根问道。

“有许多人”，麦伦哲斯说，“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他可以代表所有人——阿曼德·哈默。”哈默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苏联领导人的老朋友，是缓和的象征。

“太有趣了，”里根说，“我经常见他，我每次去理发他总在那儿。”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麦伦哲斯说。

最近，当里根在位于贝弗利山的德鲁克理发馆理发时，哈默总会出现在里根相邻的座位上。*

麦伦哲斯还有另外的看法：“不要信任中央情报局，那不是些严肃的人。”这位法国情报首脑并不是说中央情报局有鼹鼠、安全松弛或向报纸泄密，他是指它缺乏意志。

里根向乔治·布什，这位1976至1977年间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重复了麦伦哲斯的警告：“不要信任中央情报局。”布什认为此

---

* 德鲁克坚持两人是正常的顾客，而他否认哈默有意安排好坐在里根旁边。（原注）

话很无聊，但很明显，它给里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什从前曾对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位朋友说，纵使里根实行松散管理方式及对情报事务不熟悉，但有一位他充分信任，特别是信任其意志坚强，关系亲近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听了麦伦哲斯的警告后，这变得尤为重要。

凯西有些沮丧地看着里根在进行着组阁，每个内阁职位有三名竞争者，他排在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的名单上，但没有一个总协调者。相反，如同竞选活动中一样，有许多权力集团，但没有一个有绝对权威。有米斯及加利福尼亚厨房内阁，有雄心勃勃的有希望的竞争者们，还有里根本人，他现在已回到帕里思德斯的家中。事情很快被搅得一团糟，里根最后决定由乔治·舒尔茨，这位尼克松和福特的内阁成员（劳工部长，预算和管理局局长，财政部长）为国务卿第一人选。里根认为基础工作明显已经完成，便打电话给舒尔茨。但麻烦的是，舒尔茨已被告知他被列在财政部长的候选人名单上了。

“我很高兴邀请你参加我的内阁。”当选总统出于无意，含糊地告诉舒尔茨。

而舒尔茨却认为里根是请他任财政部长，便拒绝出任。

当里根打电话时，丹佛也在屋里，直至数月后他才知道来龙去脉。舒尔茨本来会接受国务卿这一职位的。

里根的第二候选者，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成了国务卿的头号候选人，而且南希很喜欢他。她认为黑格有出众的才能——他很帅，体格健壮，有军队经历，可爱且待人热情，是个出色的男主角。很清楚里根在外交政策背景上的缺陷不可能由凯西的外交政策顾问班子所弥补，而黑格却完全可以。他是一位四星上将，曾指挥过欧洲的北约部队，并曾在白宫任职，如担任基辛格的副手及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等。

“我不会竞争国务卿”，凯西对一位朋友说，“我们都应支持黑格，我们需要他的威望。”

而凯斯帕尔·温伯格，一个里根在加利福尼亚的老朋友，出任了国防部长。

凯西很生气地回到了纽约的家中，打算安度余生。他对在华盛顿及加利福尼亚的选择剩余内阁成员的工作相比之下不那么感到兴奋了，但他与米斯保持着接触。他想使人知道他想在内阁工作，位置不多了，正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是内阁成员。米斯知道凯西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就告诉他中央情报局局长很容易被给予内阁成员头衔，并为此事进行了很多讨论。

米斯告诉丹佛：“比尔·凯西想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我觉得这是个错误，”丹佛回答说，“我认为我们不能把那种工作交给一个政客。”

米斯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交易将会成功，凯西是一个优秀人物，他懂情报学，如果愿意的话他有资格担任更高一级的职务。丹佛没再说话。米斯找里根建议凯西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并使之成为内阁成员。

“这对我来说非常好。”里根说。他仅参与至此，而没有打电话邀请凯西入阁。

凯西的反应很冷淡，他告诉当选总统他想仔细考虑一下并征求妻子索菲娅的意见。

“好的。”里根耐心地说。但他后来对此深感意外，这是怎么回事？他曾想一切已安排妥当，凯西到底想不想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在华盛顿市中心的K大街一个四层楼上的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一位面目清秀，保养很好的男人。此刻他正独自一个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里根的胜利，他一直保持着某种高贵和优雅的气

质。他眯起的眼睛，说明正在思考。他是个勤于思考的人。他身着一套洗熨平整的西服，带着相配的手帕，一双用老式吊袜带吊住的袜子，皮鞋擦得较亮但并不惹人注目。一头灰发向后梳着，用前些年用的发油抹得很亮，但所用发油不多以防头发卷曲到衣领上。

门上的牌子写着“塞菲尔公司”。它是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塞菲尔”是法西语中“大使”的意思。他本人曾在1973至1976年担任美国驻伊朗大使。对某些不熟悉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有些神经质，但熟人们会把这种所谓的神经质看做是聚精会神。在他打电话时，在与老朋友们长时间共进午餐时，在考虑新问题及阅读报纸包括其中那些零散小事时（例如关于希腊新任国防部长的一段文章，挪威议会的一次投票，日本的贸易顺差等），他都全神贯注。如果不是现在因职位关系的话，他完全具备一个情报官的素质——一个迷恋于审核情报的情报官。

他就是理查德·海尔姆斯，是中央情报局中能忍耐及有着传奇般故事的有争议的象征人物之一。几年前他移交了其主管情报分析的权力。海尔姆斯的联系、感情、信仰及过去都属于中央情报局。1947年中央情报局刚成立他就加入了；他曾在“猪湾事件”后担任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那时行动处长官称为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他曾在越战期间的1966至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那既不是战争的开始阶段，也不是结束阶段，而是中间最困苦的阶段。海尔姆斯的任期也包括“水门事件”的初期，不过在“水门事件”收尾前尼克松总统已调他出任驻伊朗大使了。

现在，1980年，中央情报局肯定将再次度过难关，被新任总统所争取、拯救或再遭贬低。海尔姆斯心目中的候选人是凯西，他能保护传统的东西。海尔姆斯认识他已有35年了，那时两人都在伦敦为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年，海尔姆斯抵达伦敦之初，被派去协助凯西工作，但他没有住处。“嗨，同我们一起住吧。”凯西

说。他邀请海尔姆斯一起住在格鲁斯温诺大街的一幢公寓里。事实上，“嗨，同我们一起住吧”。这句话已使海尔姆斯总结出了凯西的待人方式：迅速直接解决问题；热情、友好、和蔼；不拘泥于形式，打破常规，讲求实效。海尔姆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很少见到凯西，因为彼此都很忙。他认为凯西在战略情报局的底子足以使他对情报工作有基本的了解。他们都受英国人的训练，都因袭英国的传统，既是秘密的也是默默无闻的工作。正如海尔姆斯常说，“我们是默默无闻的工作者，并因此保持沉默。”凯西理解海尔姆斯及其部属由于在最近的一系列调查使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暴露而感到的震惊和有被出卖了的感觉，这一系列调查包括国会欧文委员会及国会以外的洛克菲勒专门委员会。海尔姆斯认为没必要要求作证，因为那些文件都已送到了国会。一段时间来中央情报局内没有人想到过要写书，但最近10年间已有了许多本有关中央情报局的书，这对他这个信奉沉默的老情报工作者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央情报局，每个人都准备着承担有危险的情报工作，但没人能想到这种危险性来自于自己的政府，想不到自己的政府会攻击他们。海尔姆斯说，当他乘飞机从伊朗回国接受讯问时，他陷入了绝境，审查最终完全吞掉了他。三年前，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调查尼克松任期内中央情报局在智利的秘密行动时，他因作证“不完全和不圆满”而受到轻罪指控，案号为美国刑事案77—650，对此他曾进行了无罪辩护。最后的判决是2000美元罚款及缓期宣判的二年徒刑。法官还对他大加训斥，指责海尔姆斯在开庭期间“羞辱法庭”。海尔姆斯的律师告诉新闻界，他的当事人将视此宣判为荣誉的标志，如同一面奖旗。在海尔姆斯受审后，有些有头脑的人士认为此项判决不公正。海尔姆斯是想保守秘密，以免总统下令的秘密行动传到不必要的耳朵中去。秘密情报只能发放给那些出于工作需要而必须知道的人，这种原则必须是不可缺

少的。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们常常不需要知道事情真相的细节，提供情报者的名字及具体的技术等等，因而避开有关智利的具体问题是简单的常识。

当回忆无罪抗辩时，他仍感到刺痛，尽管他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那仍是个污点（后来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肯沃特乡村俱乐部，他受到了400名退休情报官员的起立欢呼，两个废纸篓装满了捐献的现金及支票以支付2000美元罚款）。结果有些不令人满意，在保守机密的誓言与国会干涉试图寻求机密之间发生了冲突。新的规则应是什么？这些新规则是否会危及重要机密？

凯西是一个机警顽强的纽约人。在海尔姆斯看来，纽约是一个充满自私、令人寂寞的城市。在那里你或是生存或是垮台，而凯西生存的最久。凯西不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若谨小慎微就无法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而生存下去。海尔姆斯早在"猪湾事件"中就从肯尼迪那里领教了这一点。肯尼迪要求看到结果，他们希望杀死卡斯特罗，虽然他们从未说过此话。若海尔姆斯，当时秘密行动的指挥者，说这件事做不到，就会被一脚踢掉。

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间谍行业已发生了变化，凯西要学的很多。正如海尔姆斯曾评价过的那样，侦察卫星意味着"我们正在从事的间谍活动不是从屁眼向上看，而是从头顶向下看。"

就海尔姆斯对他的老同屋凯西所知，足以使他直接说出许多凯西的幕后所为。他有可以扼杀掉凯西的许多机会而不是帮助这些机会。但他做了多年来他一直做得很好的事，继续保持沉默。

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共和党执拗的支持者，几乎为里根的胜利而高兴得大声呐喊。戈德华特觉得与里根有着特殊的关系。里根的政治生涯始于1964年，当时他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半小时全国电视讲演。在讲演中他猛烈抨击了现政府并支持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戈德华特认为，1980年总统大选是表明一个人的正确的

最愉快证明，就像是他的一个兄弟闯入了白宫。而且随着里根的压倒性胜利，共和党最终控制了参议院，使戈德华特在政治舞台上更加惬意。

作为卡特--特纳时代的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年 71 岁的戈德华特即将成为该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是 70 年代对中央情报局调查后产生的有权的新机构。作为在 1975 至 1976 年间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欧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戈德华特断然拒绝在最后文件上签字，因他认为那些自以为是，充满说教的腔调令人难以忍受。他觉得中央情报局前进的障碍太多了。他觉得这样作是绝对正确的绝不妥协的一刻。

戈德华特皮肤晒得黝黑，但修饰甚好，有着大将风度，精力充沛。尽管他的臀部有点小毛病，但活动时有一股崭新的活力，讲话时声音宏亮有力。

他最后找出解决的办法：选一位国会完全信任的人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让他保守机密并使国会停止惹恼那该死的中央情报局。

戈德华特作为新的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第一步措施之一是让他最好的朋友，威廉・奎恩进入该委员会，担任委员会的义务顾问。作为西点军校 1933 级的学生，二次世界大战的情报官及国防情报局第一副局长，奎恩是位快活、乐于助人而做事坚决的人。他既是戈德华特家的朋友也是他的酒友。而戈的妻子讨厌华盛顿这个地方，她常不在戈的身边。戈德华特大约每周两次与奎恩及其妻子贝蒂饮鸡尾酒并共进晚餐，还定期在他们位于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农场一起度周末。

奎恩曾担任过美国情报界一个重要但不知名的角色。战后，奎恩中校负责战略情报分队，它的任务是执行战略情报局的行动。他在 1946 年到国会要求召集一次五分钟的议员委员会秘密会议讨论他那过少的预算，并最终骗得了 800 万元需担保的资金付给秘

密情报员。戈德华特很欣赏他的办事方法。奎恩知道立法者们喜欢听秘密，便向委员会提供了一些秘密情报员们的线索。第一位是柏林的苏军指挥部的女仆，她从废纸篓中拣出重要的情报；第二位是某国驻美大使馆的密码员，他使美国人看到了所有从该国家发来的文电；第三位在另一个国家驻美大使馆工作，美国人付出了1万美元得到了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作战计划。这次秘密会议持续了20分钟，其后奎恩用这800万美元为后一年即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保留了核心力量，既包括特工人员也包括情报员。

尽管凯西将要出任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报道已见诸报端，但戈德华特不同意这项选择。他有自己的候选人。他告诉奎恩："博比，这个职位应是博比的。"

博比是指海军上将博比·英曼，他已在卡特任内领导国家安全局达四年之久。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庞大，最机密的情报机构，其预算是中央情报局的好几倍。它位于马里兰州边缘的乔治·米德堡垒，总部占地面很大，控制着世界范围的陆地及轨道卫星窃听站。它既破译敌人的也破译朋友的密码，始终站在新技术的最前沿。国家安全局没有间谍人员，并在对中央情报局调查期间，相对来说逃避了调查。

戈德华特认为英曼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一个懂得科学、政治及人本性的天才，他也对同国会搞好关系很内行。

在28年之久的海军生涯中，英曼的军衔升到了三星海军上将，在1972至1973年担任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的行政助理及高级助手，成为担任此职的唯一的情报专家。因为这个职位通常留给那些当过舰长的军官们。在1974至1976年他成为海军情报处长并于1976至1977年成为五角大楼的国防情报局的二号人物，其后擢升为国家安全局局长。英曼清楚情报业务是冷酷的，他拥有实施情报计划的各种东西，从最新式的间谍卫星到官僚花招都有，

他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

英曼长着一个大大的脑袋，脸上露出孩子气的露齿微笑，戴着深度近视镜，看上去就像一位长大后的神童。他是情报界中少有的能同记者谈话并使他们推迟发表泄漏情报的故事的几位情报官员之一。他在国会中培育了所有的重要关系。戈德华特记得从未有英曼忘了回电话或偶尔不知道答案而不刨根问底的事发生。

戈德华特与奎恩均为英曼担忧。戈德华特希望自己能保证英曼获得此职。“我有个主意，”他说，“国家安全必须超越政治，博比正在位，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别，是个终生奉献的海军人员，是担负此工作的最好人选。

奎恩喜欢戈德华特，而且当戈德华特犯大错时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他，但此时他也赞同英曼担任此职。“为此事我将尽快见头头。”戈德华特对他说。

对戈德华特来说，迅速见到当选总统是很容易的。他向里根解释了他对英曼的满腔热忱。他说英曼是在情报领域中最有能力的人，是适合此职位的唯一人选。里根听着但似乎不为所动。戈德华特更起劲地摇鼓助威，明确指出如果英曼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国会将不干预新任政府的情报事务。

里根回答说他更想找一个局外人，他将是比尔·凯西。

或许，戈德华特指出，这是欠我的一个职位。

为了避免对抗，里根愉快地推开了此事，“你会了解凯西的。”

戈德华特回去找朋友奎恩。

“巴里，”奎恩说，“不要瞧不起凯西，他涉世很深。”

戈德华特曾经历过许多政治上的不如意，这只是件小事，但他看不出这样选择的理由，因而很恼怒。

奎恩对他说，凯西一直是情报界的支持者，提倡通讯线路持续开放，以便随时接纳情报员，并经常打电话来。在60年代早期国防情报局成立的日子里支持了它。1964年，他帮助奎恩获得了

以战略情报局的创始人和美国情报之父命名的威廉·多诺万奖。

戈德华特仍感到不愉快。

奎恩接着说凯西很了解间谍艺术，知道事实与情报的力量，情报人员所期望的使用与贡献。凯西对阴谋诡计很着迷。奎恩说："他喜欢神秘感，喜欢伪装，还喜欢匕首一类东西。"

戈德华特说："算了吧，别罗嗦了。"

此刻英曼正在世界的另一边注视着接班战的初始阶段，他正在位于新西兰的一个国家安全局监听站里。他遐想着成为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可能性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有戈德华特这样强有力的保护人。英曼是一个外表冷静而温和，内心非常热情的人。他刻意进取、雄心勃勃。

除星期天外，英曼每日 4 时起床。清晨这段时间里，他不间断地仔细阅读和思考。出色的情报工作的本质在于预测，你无法描绘出所有事物，但仍应不懈地工作并未雨绸缪，即使是在新西兰也应如此。

国家安全局如同一个孤岛一样，尽管它基本上是一军事机构并为国防部的一部分，但它也向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因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工作包括协调情报界的预算、重点及目标。由于国家安全局有点像后娘养的，英曼觉得他必须成为它联系外界的纽带，因此他像一个说客一样做白宫、国会、五角大楼及新闻界的工作。他开辟通路的同时也给别人以接近国家安全局的途径。

英曼通过与卡特政府内有权势人物的结盟将特纳排斥于国家安全局的事务之外。他保证让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得到他非常渴望的原始通讯侦听材料，同时他又强烈感到必须使国家安全局继续保留在国防部里以便使它的注意力放在防止战争的关键问题上。

在新西兰，英曼接到威廉·米顿道夫的电话，他正在领导中

央情报局向里根政府的交接工作。米顿道夫曾在英曼任海军情报首脑时担任海军部长。

看起来凯西好像更有可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米顿道夫说。它还未宣布，米顿道夫语气中还有些不肯定。但他受邀来询问英曼是否有兴趣任中央情报局的第二号人物——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即局长的副手及情报界相应的第二号人物。

英曼说他毫无兴趣，他准备今年夏季从军队退休，而且，作为一名情报专家，依照惯例他的军衔通常不可能超过三星海军上将。

拒绝此职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副局长远远不够。他认为里根政府是卡特政府的必要的平衡力量，卡特或许对苏联存在太多的幻想，而里根又太少了，两者均无英曼所欣赏的那种平衡感。

几天后，当英曼返回华盛顿后，米顿道夫又重提此事，英曼很客气地再次加以推辞。他马上要 50 多了，在那个年龄他仍有机会开拓新职业，或许经商赚些钱。

海尔姆斯听了大量有关英曼的谈话后，决定亲自见他一面。他并不十分熟悉英曼，他在 1973 年离开中央情报局，而一年后英曼才成为海军情报首脑。海尔姆斯请杰克·莫利，前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专家，帮助安排一次午餐。莫利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令人振奋，惹人喜爱而又富有男子汉气概的老家伙。他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 28 年之久，其最后六年恰在调查中央情报局前作为海尔姆斯与国会打交道的联络官。

英曼感到有人正在引诱自己加入一个所谓精华俱乐部，它由一些秘密行动者所组成，与这些人在一起英曼感到很不自在。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和，它们之间是人工行动对机器，勇敢的行动对系统方法，詹姆斯·邦德对戴着金属框眼镜的译电员。但他们，那些秘密行动者们似乎正在有意

识地来征求他的意见。

在吃午餐时，英曼和海尔姆斯清楚地表明了彼此对情报机构的任务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看法。当然情报机构也犯了些错误（一些是在海尔姆斯任内的），由于未能警告总统或国会某些动乱正在策划之中。他们同意早期预警，防止突变是情报机构最重要的事情。（“它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有一次海尔姆斯摇晃着纤细的手指以优美的语调坚定地说）。如果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能早期预警，即使有些事情搞糟了总统和国会也会与它们共同进行到底。

午餐结束后，海尔姆斯深感英曼聪明、机敏，可为里根的情报队伍增添优秀的新鲜血液。

英曼看到了更多糟糕的迹象。理查德·艾伦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那是过去布热津斯基及基辛格的位置。艾伦是个非常多疑的右翼人士，他曾私下指责国家安全局及英曼在交接权力阶段窃听他的电话谈话并向卡特的白宫汇报。英曼很清楚这是个错误而蛮横的指控，他可以肯定国家安全局并未在美国国内收集情报，而且当它在窃听美国公民的海外通话时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那些规定意味着除非有理由确信通话内容包含有间谍或犯罪行为，否则不允许进行窃听或将记录传阅。英曼觉得他只能对艾伦的指控置之不理，他不想与新的国家安全顾问发生冲突，但艾伦的偏执狂使英曼大吃一惊。艾伦与中央情报局过渡班子的某些成员很熟悉，这些人正在散布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胡说，即由欧文委员会调查所产生而在卡特任期内生效的那些法规，使得情报机构无法追踪间谍及收集情报。

当选副总统乔治·布什曾向英曼传递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警告，即里根正在持续受到极端分子的影响，最令人不安的是法国情报首脑的拜访。此人对当选总统说中央情报局不可信任，这给当选总统造成了“强烈的毒害”。

英曼感到自己处于交叉火力之中。国防部长——尚未上任的卡斯帕尔·温伯格邀他来家并提出擢升他为四星上将，由他来领导五角大楼的情报机构，成为某种形式的国家安全局和国防情报局的总头目。英曼怀疑这将是份无所事事的工作，只不过是位于最高职位和实权职位之间的一个摆设罢了。很快这种建议变成了要求，要他从海军退休，担任五角大楼主管情报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同样的工作施以不同的名义罢了。英曼再次拒绝了。

凯西仍在仔细考虑里根提供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职务。他在纽约的大街上走着，再次欣赏着真正的城市生活。秋风凉爽，但重返旧地他并不感到满意。正常情况下凯西从不为做决定而发愁，但这次他将花了几天时间思考此事。在1975年，当他做为进出口银行的董事长，一个可使他参加中央银行董事长俱乐部的职位辞职后，他从未想过或计划过重返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他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些年，即1971至1975年，是丑闻连爆的年代。

他感到他仅有的在尼克松政府的任职，就使他陷入了调查的旋涡之中。由于对他在1972年即大选年担任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的主任时，有人对他处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文件产生了质疑，因而对他进行了伪证罪的调查。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伪证罪调查的重点是威廉·凯西”，但它从未公开过。国会传票中说，凯西曾安排用船将34箱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文件及13箱政治上敏感的政府办公室之间的备忘录及信件运到司法部。司法部副部长宣誓说这是凯西的主意，凯西否认这一点，作证说司法部索要这些文件。检察官的备忘录中补充说，“凯西此处的陈述完全是欺骗性的，既包括涉及司法部也包括涉及迪恩时”。迪恩是指当时尼克松的白宫顾问约翰·迪恩。凯西从未被控告，他只是条小鱼。备忘录在反复描述凯西的证词含糊其词的同时，断定对凯西定罪后“成功的机会很小，因而不应该提出控

告”。凯西觉得这份备忘录很无聊，但它也使他变得谨慎了。

另外还有些为调查而进行的小接触。尼克松的司法部长米切尔及尼克松竞选运动的主要筹资者莫里斯·斯坦斯因接受国际诈骗犯罗伯特·维斯科的2万元赠款而受到控告。维斯科正试图对凯西的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的一项业务施加影响，但不久两人即宣告无罪。凯西向朋友们保证他并未受到影响，他只是检察当局的证人。当他站在证人席上作证明时还向被告米切尔挥手致意。他是清白的，但在“水门事件”那些日子里并不令人愉快。凯西和索菲娅回到了纽约，而凯西最喜欢的一首二行诗变成了“你知道华盛顿啥最好吗？那就是它去纽约只需一小时。”

两年后，他们把在华盛顿使馆街区马萨诸塞路2501号的寓所以55万美元卖给了孟加拉共和国。如果他们重返华盛顿的话，索菲娅，他那小巧玲珑，即忠诚又一直强烈支持着他的40岁的娇妻，永远不会原谅他卖掉了华盛顿的那处寓所。

现在他们在纽约主要生活在其位于长岛北岸维多利亚时代的水边界标美克诺尔的院子周围。他常在书中或科里克高尔夫球场的快打中消磨时间，尤其是周末。凯西是个两倍于标准分数的高尔夫球手，每孔的击球打数约比标准打数多二打；若他某日用100打完成18孔将是惊人的一天，但他喜欢在球场和户外走路。他有许多老朋友，唯一的孩子伯纳戴特现已30多岁了，仍与父母很亲近。三年前他们花了35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西帕尔海滩买了一幢别墅供过冬用。他对他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

在凯西加入里根竞选运动前的几年里，他正动笔写一本书，一本他认为是自己最满意的书。书暂定名为《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600页原稿描述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情报局的间谍活动并描写了二个主要人物，第一个是凯西，第二个是凯西的良师和义父威廉·多诺万将军。凯西描绘了这位战略情报局创始人的慈爱形象，一个有着柔和的蓝眼睛、矮胖、充满好奇心和不懈的努

力的人。当多诺万与30岁的中校（初级）凯西1943年在华盛顿相遇时，他是凯西年龄的两倍。但他打破了代沟、军衔、教育程度及社会背景的差别。多诺万是通过事实来衡量一个人能干什么的。多诺万常说："完美无瑕是好人的敌人。"他使得凯西可为其赴汤蹈火。多诺万总是亲临行动现场视察，几乎每次同盟国进攻时他都参加了，似乎那是在百老汇，像戏公演第一夜那么诱人。

多诺万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让凯西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凯西曾在一份回忆录中写道："战略情报局必须准备逐渐增加在德国国内安插特工人员。"多诺万希望迅速在德国境内建立间谍网，他任命凯西为欧洲战区秘密情报主任。凯西记得多诺万的命令无异于"派些人打入德国"。回忆中缺少的细节在官方的材料中得到了补充。凯西当年是一个31岁的正式中校，他可以指挥上校们并以对等身份与英国及美国的将军们打交道。接到穿便装的命令后，上司便派他去伦敦塞尔福里大街买了一套灰色西服以模糊他的军衔，如果不是掩盖的话。

凯西亲自参与制订间谍活动的每一个细节。选择可靠的间谍很困难，美国人甚至无法打入位于柏林市中心的盖世太保总部。为此选择了约40名反纳粹的德国战俘——这违背了日内瓦公约，但凯西不顾这些，需要第一。

制造伪装也是门艺术。伦敦一个古雅的档案馆提供的有关德国内部动态的剪报使间谍们知道最新消息。他们的证件是伪造的。衣服钉上搞来的德国商标。凯西要求提供飞机以空投特工人员。没有一个可靠的通讯系统间谍们将无法发出情报，因此发明了一种低功率的被称为"琼·埃利诺"的发射器，并用它可以向低空中盘旋的飞机发报。凯西亲自检查空投时间、地点甚至于月光的强度。他建立了情报收集处，确定需要间谍们搞哪些情报。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在同盟国高级指挥官们需要什么（他们可能想要希特勒总参谋部晨会的会议记录）及间谍们能搞到

什么之间作出平衡。首先要知道的是德军在主要铁路中心的调动情况，这是了解希特勒的作战计划和出乱子的最佳地点。其次是潜在的轰炸目标。凯西总是亲自为特工人员们送行。

至 1945 年 2 月为止战略情报局在柏林只有二个间谍，一个月后凯西已将其增加至 30 个小组。“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棋赛”，他在书的原稿中写道。又过了一个月，在德国境内凯西已拥有 58 个小组，其中一个代号为“司机”的小组，用妓女作为间谍。战争只得如此。

现在当他面临着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职位时，他想总结一下自己情报方面的经验。他称情报工作是“一种制造镶嵌工艺品的复杂过程，一点点一片片构成了情报之谜”。有时事情的结果出乎你的预料。如果你有许多线索就可以进行推论，但如仅有几点线索而加以推论就犯了错误。德国解放后他曾驱车从慕尼黑横贯德国西南部到达皮尔森，所到之处看到的遍地是白旗，这使他非常震惊。这里一张床单，那里一条毛巾，还有衬衫。没人要求德国人作这种卑鄙的表演，这对那种曾自认为是个统治别人的种族是个嘲弄。他曾坐在伦敦某总部中想象德国人可能已建立了间谍网，但实际上它并不存在。

他在其最近的一本书中写道：“情报仍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易碎的和复杂的商品。”他写道情报工作除收集情报，鉴定其准确性，研究它如何与其它情报相吻合共成“镶嵌品”并确定其意义外，还包括吸引有权者的注意，随后由他们作出决定。情报人员不是被动的。凯西认为，那种限制情报的作用或情报人员活动的作法是极大的失算。获得、分析及传阅情报仅仅是开始。

“因此你必须让他去行动。”他写道。

他无法抑制自己而写了一些对卡特政府不客气的话：“正当我们画那些并不对我们构成威胁的国家改善人权的时候，却在公众面前藏匿了从西伯利亚的集中营摄到的照片。”对情报来说有着难

以逃避的道德标准，凯西认为，对生活来说同样有着无法逃避的道德尺寸。他曾在1945年4月达朝解放后几天去该地，他永远不能忘记那成堆的鞋、骨和腐烂的尸体。人类对人类能这样做吗？这令人难以理解。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恶魔，世上有许多不同的道路，每个人必须加以选择。

当他回忆这些时，凯西逐渐明白他需要重返情报工作。里根的大扫除必须进行下去不能后退——这意味着汹涌向前冲破不可避免的对抗。接受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将给他一个了解秘密世界的机会。特纳上将是一个外来者而凯西将以一个兄弟身份进入中央情报局。他与索菲娅的谈话仅进行了十分钟，她称这一职位对他是一个“爱情故事”般的工作。随后他告诉里根同意出任此职。

二

凯西在他正式宣布任命前几个星期搬到了杰佛逊宾馆的一个套间里，这将是进行幕后活动及静心地做其“作业”的重要的几星期。他对中央情报局了解些什么？总的来说知道较多，但对细节就是指具体的每一件事缺乏了解，他对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所知甚为有限。在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他为军备控制及裁军事务局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凯西在按要求签署一项文件宣誓保密后，被准予接触由高度机密的核查军备控制的侦察卫星计划所获得的高度机密情报。他知道这种卫星是新的奇迹之一，他希望尽可能多学一些。几年前，他曾在总统国外情报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是由白宫需请教的一些老家伙所组成的很有权势的非党集团。它被告以一些秘密，反过来又要求它为美国总统审核美国情报机构的政绩。

顺便来看看杰佛逊宾馆的主人。埃德沃德·伯乃特·威廉是本城最著名的刑事诉讼律师之一，曾为海尔姆斯辩护过。凯西喜欢他的表示亲切的吹捧及唠叨，他是一位凶猛的民主党人而凯西本人则是一位凶猛的共和党人。威廉曾与凯西一起在总统国外情报委员会任职，如同凯西遇到的其他每个人一样，他强烈地支持凯西任新职。在华盛顿，威廉是位有权势的人物。从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吉米·赫佛到《华盛顿邮报》都是他的同盟。

威廉强烈地向凯西辩论说中央情报局已被削弱成了瓦砾，这

不仅归因于卡特，也源自较早的福特总统。他用大拳头在空中猛挥了几下，用“摧毁”这个词形容此事，这恰是1980年共和党竞选宣言中所用的描述用语。在福特任内，苏联对华盛顿地区多处进行电话窃听，美国情报机构已看到了某些苏联从电话中所窃听到的东西，包括一些送回莫斯科的东西。但福特的司法部颁布一项法规禁止联邦调查局及国家安全局继续此类行动，从而保护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威廉认为这很荒唐——苏联人可窃听电话而美国情报机构却不能。

“他们在行窃，而我们却不能查看口袋看一下丢了什么。”威廉说。

凯西点头赞同。

情报，即知道对方的计划和能力，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保证，威廉说。“你必须知道，”他以主教练的口吻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无法发挥作用。”

至于中央情报局，威廉用夸张的语言说道：“中央情报局像一只被卡车撞伤的好狗一样。你只能说他在被卡车撞伤之前是一只好狗。”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凯西，似乎要说：“好好干吧，伙计。”

凯西肯定威廉所谓的好狗将会恢复元气。

凯西随后给他在战略情报局时的老同屋理查德·海尔姆斯打电话，告诉他这是官方的邀请。

很好，海尔姆斯想到。太好了，他们商定在12月1日星期一共进午餐。

海尔姆斯在任驻伊朗大使后几年间一直在思考他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尤其是任局长阶段。他常常与以前的同事相聚，追忆抚惜，并以自己为主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一年前，托马斯·鲍尔所著的《掌握秘密的人：理查德·海尔姆斯与中央情报局》出版后受到欢迎，一些书评家们说这部书描写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真实情况。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知道这些，即使当他的妻子，辛西娅及三位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者伯克莱、威廉·萨法勒及乔治·威尔等告诉他，这本书写的很出色，海尔姆斯仍无法使自己接受它。他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完成这一工作，现正在用心地写一部有关自己的直至最近的回忆录，在不断修正之后在那部书里他坦述自己的一生。揭掉遮幕要知道的东西很多——回忆的片断、白宫会议谈话的节录及其中隐喻的含义。他无法回忆得很完整，在文件中也找不到答案，因记录和文稿也会撒谎。

海尔姆斯判断自己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所出的问题出自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自己与所服务的总统没有真正的私人关系。他对轻罪指控的无罪抗辩就是此点的一个例证。

海尔姆斯对1970年9月15日与尼克松会面作了记录，在这次会面中总统直接命令了对智利的秘密行动。尼克松很坚决，要求必须阻止马克思主义者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获取政权。有多少人看见过美国总统发火？这简直如风暴一般。除了执行总统的命令外海尔姆斯毫无选择。海尔姆斯的记录引用了尼克松的原话："或许已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但要拯救智利！……可得到1000万美元，需要时可再增加……钱上不必担心。"

海尔姆斯知道记录上缺的东西：他没写下自己说了什么。他回忆了自己的回答："你给了我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是个毫无希望的秘密行动计划——规模太小、时间太晚、准备不充分。

后来海尔姆斯的好朋友基辛格对他说，尼克松的许多话不能照字面意思理解，更别说命令了。尼克松经常是仅仅表示自己的失望——"做点什么，亨利！"基辛格说尼克松所说的并不总是其原意。对于亨利来说这已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是他从实践中得出的。不幸的是海尔姆斯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来说，尼克松并不是可通过重要的私人渠道来接近的。他不信

任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是由常春藤派成员及东方自由派人士所组成，并不知道它的首脑很有能力或不理解他。海尔姆斯在 1970 年的那一天带着任务离开了总统办公室，正如他后来作证时说的"如果我曾有过把总司令的指挥棒放在军用挎包里带出总统办公室的话，这就是那一天"。但他将后悔其选择的用词。

海尔姆斯当然知道得更多。这一命令的关键在于尼克松与百事可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多纳德·肯代尔之间的关系。百事可乐公司在智利有一工厂生产百事可乐瓶，而当尼克松在纽约搞法律事务之初时肯代尔曾将公司的往来帐目交给尼克松处理。反阿连德行动纯属商业性的决定；肯代尔及其它美国公司不希望在智利出现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中央情报局及海尔姆斯被滥用了，他在参议院会议上的沉默部分是出自对中央情报局、总统及本人的窘迫感。他未能阻止自"猪湾事件"以来的最糟糕的秘密行动，他破坏了自己的律条："秘密行动像一种好药，它有功效，但如吃的太多也会杀死你的。"艾伦·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任内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曾说如果你想要一个小规模的中央情报局，一个位于肮脏的偏僻角落里的机构，就不要搞秘密行动。总统们总喜欢以隐蔽的方式做事，这就是中央情报局与白宫的纽带所在。

海尔姆斯是支持总统的——支持所有总统。尽管与尼克松辩解像他曾说过的尤如"与风暴谈话一样"，他还是要照做。当尼克松对他说"我再不想让该死的中央情报局来制订政策了"时，他同意了这一机构就是为制订对外和军事政策的总统服务的。海尔姆斯那代人，包括凯西明白命令是必须服从的。

"或许我们接受了总统过多的命令，"海尔姆斯有一次说，并自豪地补充道："但我们都服从了。"

如果那意味着情报界要接受这烫手的活，那它只能这么做；如果这意味着情报官员们必须忍受煎熬，而且只能如此时，他们也只能这样做。做这些事没有其它选择，因此海尔姆斯只能接受这

烫手的活，这是他的职责。它不过是一张带有奖状的违章停车罚款单，不是吗？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曾贬低埃德·威廉的“荣誉的标志”，称这一辩解为“一种双重创伤”。

海尔姆斯判断凯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将会有所防护。凯西深知“公司”的历史并与总统较熟。海尔姆斯对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指手划脚深恶痛绝，因而在他们的午餐上自己也不必提及这些。他发誓自己决不这样做，即使是提前。因此在海尔姆斯准备与凯西共进午餐时他决心决不做任何形同讲座之类的事。他不想教凯西如何吮蛋，绝对不想过多地干涉，少说为妙。

但是有一件事海尔姆斯觉得他可以帮忙，而不会显得像保护人一样。那是一个人，他的儿子丹尼斯，在学院学习期间曾在中央情报局呆了一个夏季。一天晚上，丹尼斯告诉爸爸他非常幸运能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为什么？”海尔姆斯问到。他永远忘不了儿子的回答：“因为那儿的人非常文明。”回答即是如此。局内有一种正派的感觉，这是粗野、欺骗的世界舞台上所不允许的表演。在局内彼此间他们又都成了凯撒的妻子——不说谎话、交往正直。

12 月 1 日，星期一的午餐时间，海尔姆斯来到了杰佛逊大街凯西的小寓所的门前。他们热烈握手，凯西仍沉浸在竞选胜利的喜悦之中。他很高兴自己能驾驭历史的浪潮，成为里根革新的工具。

“比尔，你是任此职的天才人选，这太好了。”海尔姆斯笑着说道。他微笑或大笑时几乎闭上了眼睛，似乎是发现了某种开玩笑似的冷嘲。

侍者记下了他们点的菜。不必海尔姆斯提醒，凯西知道中央情报局曾在一个年代有过艰难的岁月——“水门事件”，诸多的调查及特纳上将的领导。海尔姆斯认为，其结果导致中央情报局无人愿意再冒险，更别说牺牲生命了。但如他们所知，伟大的情报

行动既包含冒险也包含牺牲。

凯西完全同意海尔姆斯的看法。由于局内高级职位的人选非常重要，他问海尔姆斯是否认为英曼是合适的副手人选。

“国会这条路不太好走、”海尔姆斯说，“现已与调查前大不相同了，必须进行某些合作。”海尔姆斯说数周前他与英曼会过面，英曼看上去忠实可靠，可能与他配合的很好；再加上他和戈德华特的老关系；在国家安全局的基础；技术内行而凯西对此所知不多这些条件。英曼还懂军事情报学，这是很重要的。五角大楼常常永久性地与各个情报机构联系。选择英曼任副手是非常合理的。

凯西说他还不能肯定，他还要想一想。

海尔姆斯觉得自己不能再说了，对他来说大力推荐一位仅见过一面的人出任那样一个要职似乎不太合理。

海尔姆斯接着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些你可以讨教而又能帮助你的人呢？不同的派系可能会争夺你的注意力。如接受了错误的建议很容易失策。你应任用一位好向导，因为当你过后就会逐渐知道，过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已决定了你的进程。”

凯西似乎表示赞同。

“应找某位具有历史性眼光的人。”海尔姆斯说道。

“是的，很对。”凯西答道。

而海尔姆斯手中有合适的人选，一个优秀的人材。凯西在战争期间认识此人，他忠实可靠，不会给凯西捅漏子。他就是约翰·布鲁斯。

凯西的眼睛变亮了，理想的人选。凯西在战略情报局的日子里已与布鲁斯相识。在他刚完成的《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的手稿中他形容布鲁斯是一位天才，一个文雅的小伙子，是跳伞、破坏和徒手格斗的专家。

海尔姆斯推荐布鲁斯是因为他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20年，曾任行动处的科长、审计师，在情报界从事过管理工作，有节制，

不乱吹并是位律师。同样重要的是布鲁斯既不是右翼也不是左翼，海尔姆斯曾仔细地推敲过。此事对中央情报局的威胁既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或许左翼在70年代的所为及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给他们自己带来了麻烦，但右翼也可能损害自己。海尔姆斯还有一点担心，他来讲这一点因为他不想讲演，而且凯西未问他这一问题。1966年当他靠个人奋斗而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林顿·约翰逊指示海尔姆斯打碎一些坛坛罐罐，改组机构，踢掉一些蠢货。海尔姆斯后来发现这并无必要，对此方案寄予的期望过多了。1966年的改组也将成为废话。布鲁斯将会看到这一点，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住在波特麦克河沿岸，距中央情报局几英里，比较富裕，无需为生计操劳。

凯西在餐巾纸上草草记下布鲁斯的名字，说将立即与他联系。

他们并未真正涉及敏感的事情，但午餐结束了。

海尔姆斯感到凯西内心混乱而矛盾，他发现凯西并未对任新职感到兴奋。出于某些原因海尔姆斯无法明确证实，但他有一种印象，即凯西实际想出任的是国务卿。

在中央情报局安全部门的要求下凯西不久搬离了杰佛逊宾馆。苏联大使馆距16号大街仅半个街区，他们拥有用抛物面天线对准电子感应器以对凯西的通话进行窃听的技术。

威廉认为这一警告很可笑，他在凯西面前开玩笑说："没有什么办法能增加苏联人的运气从而使之能译解我的咕哝声。"

布鲁斯在波特麦克岸边那幢杂乱无章的旧房子里接到了凯西的电话。凯西证实他将出任里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并邀请布鲁斯参加中央情报局的过渡班子，在今后几个月给他以协助。布鲁斯已69岁，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为该局服务了。他立即接受了邀请。这一任务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新政府总有

些新思想，其中有些可能是危险性的。

布鲁斯是个乐天派，他是老家伙们所组成的情报监督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俱乐部是由男士们组成的有权势的俱乐部，一直非官方地介入局内事务，可能时负责中央情报局的“健康”状况。他还参加了非官方的外交政策咨询机构的工作，并经常参加讨论会、大会及私人午餐。

在布鲁斯看来，凯西是一位可靠的人选。他自 1943 年就认识凯西，两人一直保持联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布鲁斯曾邀一些在外交政策上有影响的要人与凯西多次共进晚餐，席间一位对苏联持强硬态度的有名人物把布鲁斯拉到一边评论凯西说：“那个人真正明白我所说的含义。”第二天，另一位客人，一个温和派人物告诉布鲁斯，他很高兴凯西能理解他的辩论。凯西不是个狂热的人，布鲁斯可以信赖这一点，尽管他知道可能会派自己去冒生命危险。作为哈佛大学 1933 级学生、法学院 1936 级的研究生，布鲁斯信奉东部人的法学思想，而凯西是一位好斗的爱尔兰人，两人之间的纽带是多诺万，他们敬爱的老局长。布鲁斯可以看出凯西在模仿多诺万，多诺万的性格就是忠诚和热情的私人关系。布鲁斯决定使自己完全投向凯西，并且他确信凯西会开怀相拥，这是多诺万的方式：委任要职并加以培养。

布鲁斯四处转了转，对过渡班子进行了考察。他发现过渡班子首领米顿道夫是个无用的人。三个共和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助手包括一位极端保守的雅号“火焰喷射器”的安吉洛·科德维拉被派到过渡班子里，并正在起草一份富有攻击性的文件。他们的计划要求将中央情报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由顽强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秘密行动部门，它将能发动秘密战以挫败苏联人，并大量增加间谍数量使间谍们不再以使馆为掩护，而是以非官方的面目出现——如商业及咨询公司等。第二部分是第一流的分析部门，将使小组及科室间相互竞争以保证实事求是。第三部

分由米顿道夫所支持，是一个新的高级机构，将联邦调查局及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功能溶为一体。布鲁斯觉得最后一部分尤其是灾难性的，它将中央情报局拖入了国内情报工作。

布鲁斯认为，过渡班子的右翼助手们当反对党时间太久了，不习惯于步入正轨。他们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其计划将毁掉中央情报局的完整性。布鲁斯作为一个老情报工作者，深受50年代观点的感染，即冷战是长期的反复战斗，他也知道自己的观点并不受欢迎。班子策划赢得这场冷战的方案，而不顾有走的太远的危险。这没有平衡感，布鲁斯对凯西的大部分指导工作将是必须保证这位新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不被右翼俘获。

其后凯西与威廉·考尔比进行了接触。考尔比曾在1973至1975年中央情报局最骚动的30个月里任局长。这期间包括“水门事件”的尾声、尼克松下台及整个调查过程。考尔比被认为是许多情报小圈子里的被遗弃的人。在那些圈子里，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唯一的政治自由派人士。他曾指挥将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及秘密呈交国会。或许他的选择很有限，但人们认为他违背了保持沉默的规则，并犯了一个主要错误，即出卖了一个同事。面对官方调查及他认为几乎是歇斯底里式的公众及舆论压力，考尔比向司法部提供了情报，从而引发了对海尔姆斯伪证罪的调查。那些“老兄弟”们认为这毫无必要，这就像是罗马教皇背叛了他的前任。

凯西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见过考尔比，但他们通过战略情报局老战士组织相认，而且这些战略情报局老战士之间并不是偶然相遇的关系，因为他们过去曾一起在战略情报局战斗过。考尔比曾作为一支杰德伯突击队的成员之一被空投至敌后，其任务是在德国的战线后方组织法国抵抗力量。（杰德伯是苏格兰的一个小镇，因其边界战争而著名，而杰德伯法官意味着“先吊起来，然

后审讯。")

凯西告诉考尔比他将接受这一职位并想同他聊聊。考尔比同意去M大街里根过渡班子办公室。他打算显得迟钝些，自从他因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中央情报局与"调查"发生冲突及泄露机密而被福特总统撤职后，他已离开中央情报局五年了。考尔比很有礼貌，他总是回电话，给人开门，走动时面带微笑，对所有人表示尊敬。瘦小而戴着一副普通军用眼镜，考尔比怎么看也不像个中央情报局人员，更别说是局长了。如给他穿上一件工作罩衣，拿起一把梳子及一把剪刀，他倒像诺曼·洛克韦尔普林所画的小镇理发师。他很聪明，是美国大学优秀生联谊会的会员，斯顿大学40届毕业生，1947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当他取下眼镜时，他变了样，眼睛里透出了坚韧、强硬、冷静的，几乎是冷酷的目光。此人还有类似杰德伯法官的一面。

对于某些未经相应安全审查或无必要知道的人提出的涉及中央情报局秘密的问题，考尔比的脸看上去会变小，似乎要消失掉，眼睛躲在眼镜后深陷入眼窝，手掌伸出，双肩上耸，回答将是他不记得了，他说不出来或他未曾留意。这是通用的不承认方式，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不要向前走了，别想溜过去。对于那些问得比较有艺术性的问题，他的推托方法更妙。当姿势或面部表情可能提供线索时，考尔比会迅速变得沉默。感情是中央情报局行动人员的天敌。在1978年出版的名为《光荣的人们》的自传中，他把自己归为中央情报局的"老手"一类。这是些很少顾及自己但能靠自己的精明和勇气完成任务的人们。

在同所有情报机构进行的调查打交道时，考尔比特别注意通过大幅度缩小对国家安全局工作的调查来保护它。国家安全局所破译的密码及所截获的通讯远比外界人们所想象的要多，如考尔比所形容的情报机构的工作中所说，国家安全局已成为情报机构生产的核心。如果在他打开东西时有什么戏法的话，保护国家安

全局就是其花招。保护国家安全局并未写在调查报告中，但考尔比乐于如此处理。国家安全局遵守严格的法规而行动，但他对世界隐私权侵犯的程度并未得到完全的理解。考尔比认为凯西或许有在中央情报局成功的最好机会，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受信任，这意味着他是真正的“圈内人物”。凯西是一个很好的多面手，他是个历史学家。考尔比曾阅读过凯西那不知名的有关美国国内革命战争的书《战争进行的地域及演变》。他又是一个律师（考尔比有一本凯西所著的《律师职业指南》）也是一个很明显有着广博外交知识的人，一个为事业甘冒危险的人。考尔比自从离开中央情报局后曾不断地进行反思，他逐渐感到自己或许未承担足够的危险。而凯西会这样做的，更为重要的是凯西与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和私人关系，这意味着有接近总统的机会。

在里根的过渡办公室，一间破旧的房子里，考尔比热情洋溢地迎接凯西，握手的刹那间智慧在交流着。

“你是这一工作的天才，”考尔比说，“你与总统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他的声音中含有些怀旧，“这是项伟大的工作。”

凯西似乎很想听听考尔比的错误是什么，他的估价和他的建议。

“请看，”考尔比开始说，“你可以按自己的愿望来组织，它完全取决于你。”整个工作是向总统提出建议，“你将出席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并全靠你自己。你应知道将发生的事——你必须提供对热点的即刻判断。”危机中好的建议犹如棒球赛一样诱人，紧要关头的分析是最重要的。

凯西似乎有点吃惊，但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考尔比身上。

“你是总统的情报官。”考尔比说。这就是你的工作。做好那一点，其它就容易办了。所有的官僚资料都可能被别人所掌握，情报界不应在白宫讨论政策时纹丝不动。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制定政策时不是主要角色，但重要的是如有一条清晰、吸引人的道路就

应大胆提出。

“你需要一个能提出正确问题的分析中心。”考尔比说道。但现在那个系统的组织从学科上说是完全错误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核战略的问题都搞，活像一所大学。

“我不准备告诉你如何走路。”考尔比说。但如他再次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将按照地理新组建分析系统，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能对某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整个局势进行估价和分析的专家。有一次他曾与16位中央情报局的专家在室内开会，每个人都有着特定的领域或学科，他是唯一的纵观全局的人。这种组织法毫无意义，它限制了那些聪明的人们以卓越的思维漫游其狭隘的领域以外的广阔天地。

考尔比说，对总统建议的质量取决于好的分析，许多需要的材料在公开的新闻媒介上。将其与情报相结合，可以推断出许多结论。这些推断必须是最好的，这需要最有才智的头脑，并且越多越好，如果情报界做了它应做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它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良好的情报及准确的预测可使政策制定者们采取措施避免麻烦和灾难。有人说人们不能预测未来，但它是中央情报局的日常工作。

考尔比说：“职员们真是棒极了，天分很高。他们忠诚并为你服务，但不要糊涂，你可能会使他们过度劳累。”

考尔比说在局内存在着分裂——分析、行动及技术部门的头目各行其是，相互不配合。他曾采取行动纠正这些，但远远不够。

尤其是行动处，他从那里出来，并曾管理过一段时间。考尔比说：“行动处是一个封闭的团体，非常内向。”对团体的忠诚被看的很重要，但中央情报局的力量来自于行动处所管理的海外情报站。常常是一些30多岁的年轻人被派往国外担任站长，他们必须负责所有的管理、安全、秘密行动及偶尔的外交活动，并承担危险。这些负责人不像国务院的驻外官员们，那些外交官们只监

督他们秘书的工作，而且每一步都通过国务院的海底电报予以指示。

考尔比说，秘密行动是必要的并可能是有益的。对一个温和的斗争领导人提供宣传的、秘密的政治上的支持常常很有意义。一项与公开宣扬的政府政策基本一致的秘密计划能起作用，如果此类计划泄露，它不会太令人吃惊，批评也将是微乎其微的。但在进行秘密行动的国家中必须存在进行支持的自然政治基础——一支真正的抵抗力量或政治反对派，中央情报局不能创造这种自然政治基础。

但他并不是秘密行动的极力推崇者，在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期间，秘密行动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在50年代，秘密行动占中央情报局预算的50%，在他离任后，它降至仅占4%。凯西及考尔比均有相同的印象，那就是即将离任的卡特政府在最近一两年内对秘密行动变得较为积极了。

考尔比将话题转向国会，他对国会逐渐变得非常熟悉，因在他任内的最后一年里有一半时间是泡在国会里。他认为新的情报委员会很好，其安排是切实可行的。现在重要的是国会通过那些委员会理解了情报工作的特点，这只能通过与国会共享机密才能做到。这说明通过校准行动进程来减少危险并仍旧获得相应的理解是可能的。

一个议题仍旧是最重要的——苏联，情报界的困难目标。考尔比说苏联不可能使其国家及社会同过去一样封闭，令人遗憾的是莫斯科没有与《航空周刊》相应的杂志，而美国的《航空周刊》则登出一些重要的技术和军事机密，但苏联内部正在出现一些机会。

“不要忘了，”考尔比说，“尽管你有完美的技术手段，但在苏联要进行真正的渗透仍是棘手的。”应设法打入苏联最高领导层，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你可能会做到。考尔比诱导凯西说：“例

如对你所知的一个著名人物如需冒经济及事业的危险时亦应一试，遭受点损失也值得。”

凯西看上去明白其含义。

考尔比说：“中央情报局对苏联的任何渗透都可能造就出双重间谍。”他建议说：“如果你某次得到一名低劣的间谍，你同时可能会得到五名优秀的间谍，虽一时被火烧，但仍能生存下去。”这类情报行动是至关重要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凯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其人其时都很合适。

凯西点点头，端坐着，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考尔比，似乎两人在进行某种治疗。

考尔比说：“不要担心7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他觉得他已摆脱了过去，或许他们都已为过去付出了代价，过去的阴霾都已被驱除。“好好工作吧。”他说。

凯西回答说，将来他有时可能还要向考尔比请教。凯西友好而可爱，两人之间毫无隔阂，只是凯西说话很少。

考尔比走时有一种较强的甚至是强烈的友好的感觉，凯西是一个好的精神科医生。

凯西觉得他应给特纳打个电话。

“斯坦，”凯西说，“关于我将接替你的传闻几周前还不是真的，但现在是事实，它即将到来——我将任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

“好的。”特纳说。他未给予任何祝贺，因特纳的一名助手在办公室里，他想对凯西的消息保密，并希望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亲自告诉手下人。

凯西对这冷冰冰的回答有些扫兴，但两人同意尽快会晤。凯西觉得特纳是一个怪人，在移交期间最好尽可能地避开他。

12月9日，凯西来到老行政办公楼四层特纳的办公室。他似乎缺乏信心，步履缓慢，好像有人在他鞋里放了沙子而脚痛似的，

但他的情绪很高昂。

开始凯西说："里根可能想在 69 岁任总统，但我却肯定不想在 67 岁任国务卿，因为那就必须进行旅行和外交活动。"他挥了下手，手在空中颤抖着，这是一个老人笨拙的手势，这表现出他比特纳衰老的远不止实际上的 10 年。

特纳回答道："不过，你会发现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你将不得不会见许多人，所有旅行途中路过该城的情报头子们都想同你交谈。"

凯西不清楚将会有多少人必须会见。

"以法国为例，"特纳说，"它没有情报界的总首领。麦伦哲斯做为法国海外情报及反谍局的头头，是最接近此角色的，但没有与中央情报局局长相应的角色，没有一位总协调者。因此间谍机构的头头想见你，法国相当于联邦调查局的头头也想见你，并且他们都认为自己与你地位相当。"

凯西未带笔记本，也未列举问题清单，因而特纳希望由他来指导议事日程。凯西似乎仅有些兴趣，但不时地从眼镜后投来敏锐的一瞥。

"你看得出对我进入内阁有何阻碍吗?"凯西直截了当地问道。升入内阁是他接受此职的一个条件，尽管他并未向特纳提及此点。

特纳说："尽管现在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是内阁成员，但里根能很容易使其进入内阁。不过工资可能会比内阁部长们低一级，大约不到 1 万美元，除非国会增加该职位工资。"

无论如何凯西不希望自己的职位低于内阁成员，但很清楚这 1 万美元的工资并不影响职位。

当他们交谈时，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打来了电话。特纳不想当凯西的面谈论卡特政府的家丑，因此他表示歉意后到外面接电话。

凯西觉得这很奇怪，特纳与布热津斯基之间关系明显不和，但

这位上将与强硬的国家安全助理之间本应存在一种天然的同盟关系。凯西是通过某些已经进行的简况汇报中拼凑出这一印象的。

特纳曾预测苏联将在军事演习的幌子下入侵波兰，他有些很好的卫星照片表明苏军正在边境集结进入波兰国内，他还有些高度机密的情报来源。每个人都高度警惕。布热津斯基发起一场公开运动向全世界发出警报并试图吓跑苏联人。他通过非官方渠道、通过法国及印度的秘密外交渠道向苏联发出警告。但他需要得到更多的情报，特纳正加以抵制，因为每当布热津斯基泄露细节或看上去很肯定，某些情报来源或收集情报的手段就处在危险之中。但布热津斯基坚持认为言出必有根据，并且总统不会允许对此事仅采取被动姿态。必须使苏联人丧失秘密性和突然性。(《华盛顿邮报》前天上午的头号标题是《对苏联计划入侵波兰的担忧增加了》)。

布热津斯基曾安排用电话对在华沙的团结工会领导人们发出警报，作为工会成员而出现的波兰国内抵抗力量已开始关闭工厂，切断通讯线路、淹没矿井。

凯西在特纳的办公室里等了很长时间，当特纳最后回来时两人都感到很尴尬，他们相互之间都不很坦率。

特纳说，你可使自己确实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英雄。把里根的过渡班子赶出这个机构，他们在谈论对这支文职人员队伍进行清除。而这，特纳说道，正如你所知是非常可怕的。

凯西不能接受这一点，他清楚地表明他懂得很多情报学知识——从他在战略情报局的工作背景中得来，从他在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工作时得来。

特纳暗自发笑，他对于凯西丝毫不研究人生哲学而感到吃惊，特纳曾在其回忆录中详细地讲述了这些事。难道凯西想知道秘密行动会遭到行动队伍的抵制吗？

凯西问了有关日常工作和工作机制的问题，1小时20分钟后

他站起身离开了此地。由于特纳的举止看上去非常恼火、焦急而灰心丧气，凯西缩短了逗留时间。

二天后，12 月 11 日，星期四，特纳去向里根和凯西做另一次情报简况汇报。里根已搬至总统的宾馆布莱尔公寓，在宾夕法尼亚大街白宫的斜对面。特纳被指引开往一个大的地下室，在日程表上有苏美战略均衡，这当然是今天的主题，它包含对苏联战争能力的长期、细致的调查。米斯叫特纳就整个题目进行汇报。这是个政治上的热土豆，因为里根在其竞选运动中自始至终宣称苏联已有核优势或处在获取核优势的边缘上，特纳同意里根的上述看法，但现在重演竞选运动将无济于事。

因而，第一个问题是苏联的经济。特纳说苏联的经济正遇到麻烦，苏联人存在人口问题，新工人数量不足；他们并未战胜低效率；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从 5%左右降至 2%，这是惊人的衰退。其次，由于他阅读了大量有关苏联和中国的文件，他仍渴望讲演一下苏美战略均衡。这太重要了，不能遗漏，而且他深深投入起草有关苏联动向的本年度高度机密的有关苏联动机和能力的国家情报估价，称为国家安全估价，编号是 11－3—8。自从里根和凯西聆听时起，特纳决心一丝不差地使议题回到原定的日程上。

特纳告诉当选总统，战略均衡中的决定因素不是苏联导弹、原子弹的数量，或其爆炸力。关键不在于武器的数量，而在于它们能干什么。那意味着不仅要计数——不仅是数量，而且进一步对核战争将会发生什么进行预测。一般认为，如果苏联首先发动核袭击，然后我们加以报复，双方剩余的力量将大致相同。双方将会打成平局。

事实上，他用一种认真的口吻说，在苏联首先袭击后美国将有足够的战略武器摧毁苏联所有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城市。

这意味着苏联并没有真正的优势，这一判断的唯一缺陷可能

在于过低估计了苏联第一次核袭击的摧毁力。但特纳感到这一判断大致是正确的，由此得到这样一条启示：应担忧的是战略核力量的脆弱性，而不是其数量。

对里根来说这无异于是异端邪说。里根曾在竞选运动中告诉公众，美国已危险地落后于苏联，因而提出增加军费开支和增添新式武器系统是必需的。特纳讲完此点后，里根、米斯及艾伦沉默不语。

凯西保持沉默。他想军备控制中削减一半数量的核武器完全是废话，这无碍大局。剩余的核武器仍足以摧毁整个世界。

特纳又提到了民防问题，这是里根爱讲的话题。里根在竞选运动中曾建议像苏联那样掩蔽居民以对付核战争。

当特纳提出这一题目时，里根说道："是的，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民防工作。"

"不，先生，"特纳说，"我不同意。"中央情报局最近总结出苏联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被掩蔽起来，而且所说的苏联疏散人口的计划并未经受检验，想象一下要在俄国的冬天里让800万人离开莫斯科是多么的艰难。

汇报结束后，里根起身离开并向楼梯走去，特纳紧随其后。

"我能与你单独谈谈吗，先生?"特纳说。

"可以。"里根微笑着在楼梯上停下来，他总是乐于倾听别人意见。其他人，包括凯西自然遵从特纳的愿望，都逐渐退下了。

"先生，"特纳站在楼梯上开始说，"有些我们在做的事极端秘密。"他停下来加以强调并注意着里根的目光。事实上每个当选总统肯定应想到会存在这些事，他们是秘箱之底。

里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似乎半是料到半是担忧。

"卡特总统将这些事的可知范围严格限制在白宫的二至三人之内，"特纳的话勾画出了此事的严肃性，"例如，汉密尔顿·约旦就不知道这些事。"约旦是卡特的最高政治战略家，并任白宫办

公厅主任。"先生目前我还未谈及他们，我想将来向你和副总统布什——仅限我们三人参加，汇报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八件最机密的事情。"特纳接着说。

"好的。"里根答道。

特纳说这些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它们是最机密的并将因泄露而遭受极大的损害。"此外，"特纳继续说，"将由您决定白宫助手及内阁中谁有权接触这些材料。"

里根表示同意，特纳随后离开了。

凯西走向特纳说："将要宣布对我的提名。"

"什么时间？"

"三小时后。"

"三小时？"

凯西说他忘了给特纳早点传话。

特纳迅速走进他的"奥尔德斯"车开回中央情报局。他对他们仅提前几小时通知他非常恼火。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藐视，他认为他的下属从他这里得到消息是很重要的。一回到局里，他就召集了通常每周三次参加上午 9 时会议的 14 位高级副手及助手们，他们集中在他办公室对面狭小的会议室里，特纳并不喜欢那间会议室。那么多的不愉快的往事，不愉快的时刻，无数次的下属让他在重要事情上作出困难的决定，或要求做某事。很少有人能对该问题认识充分，并有较深的知识来回答他的问题。

特纳走进会议室宣布了此事，他感到忧郁而难过。

那天下午，凯西走上华盛顿市中心五月花宾馆舞厅的舞台，他和其他七位里根政府内阁及被提名者一起站在蓝幕前。詹姆斯·布雷迪，和蔼可亲的里根过渡班子发言人，替当选总统宣布了提名。

当晚，《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尼姆为向里

根表示敬意，在乔治市她的家中举行晚宴。比尔和索菲娅·凯西是出席宴会的70位客人中的一对。凯西一边坐着玛丽·格雷尼姆,《邮报》出版商多纳德·格雷尼姆的妻子，另一边坐着南希·基辛格，前国务卿的妻子。他兴高采烈，有些微醉，大谈了一通竞选活动。

三

凯西去拜访国家安全局局长博比·英曼。国家安全局是秘密圈子的内圈，它的任务是拦截通讯及破译密码。凯西从汇报中显然知道国家安全局经常传送“货物”，他也清楚在经历四年之久的筑垒保护地盘并赶走特纳后，英曼的腰有点粗。

和博比一见面，凯西就说，我知道你已快要成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但你拒绝了，“我很抱歉”，凯西说。

英曼消除了疑虑，他说在选举后的几周里他在个人及职业上特别不愉快，因为戈德华特及其他人正在推举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而凯西被里根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凯西嗯了一声。

英曼赞扬了国家安全局，他说这一机构有 4 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监听站及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总部里。一个重要部门是在米德堡总部的行动处及其所属的 1000 人的苏联组，他们大部分是文职人员，苏联组人员大多会说或会读俄语。截获通讯提供了某些有关苏联的最好的情报，它比人们希望的要少，但总起来说，国家安全局是能够判断出苏联是否在计划一次大规模军事调动。另一个小组负责截获亚洲国家的通讯，第三个小组负责截获所有其它国家的通讯。这张“其它”国家的名单在增多，每一任国务卿及每一任国家安全助理都想要更多的情报，他们坚持要知道另一个家伙在干什么。

英曼最关心的是是否有必要对国家安全局进行大规模调查。世界许多地区是未覆盖的，国家安全局正面临着苏联及其它国家所使用的新的、复杂的密码方式，那里的信号也增多了。英曼说他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及时”上，尽可能地获取、整理、破译所截获的通讯并将情报送到用户手里。位于轨道卫星上的窃听装置常能立即发回所截获的通讯，问题仍然是处理过程所需的时间太长了。

凯西表示同意。

英曼说在紧急关头情报可能仍在磁带里或计算机里，或在等待翻译。例如在世界各地无数的房内或办公室内窃听装置中，无论何地国家安全局均可能出现某一时刻无即时窃听。某地一个人一直戴着耳机听着，以便传送截获的紧急情报，人力不足，同时这样工作又易令人注意力不集中，因此必须应用计算机，使用挑选关键词或名字的程序对大量涌来的窃听材料进行筛选从而找到真正的情报。

凯西问了许多问题，英曼发现凯西尽管外貌平平，但很精明而不是稀里糊涂。他的问题不像英曼从特纳处所听到的那样，从中央情报局的角度出发或受中央情报局的影响。

凯西离开时深为英曼所认为将会发生另一次类似珍珠港情报上的失败而担扰，当时破译的日军情报未能送至合适的人。

12 月 18 日，凯西来到 F 大街，那里是特纳管理情报界的办公室所在地。特纳曾指出他还有些特别重要的问题要同凯西讨论，尽管凯西认为特纳似乎还在为他自己已失去的阵地进行战争，但他觉得还是听他说说为妙。

特纳说他想谈一谈密码问题。他说那种将最机密的情报由各独立部门使用各自密码代号的处理系统一团糟，这种系统本来也是用来对秘密情报加以控制的。对行动及潜在能力来说有几十种

密码代号系统，国家安全局、海军甚至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处都使用各自的密码代号系统。特纳解释说，有一个重要的卫星系统，大约有5万人被准许接触该系统的密码代号。他是自己计算后得出此结论的。其中包括：制造该系统的人，其中有10位这一系统的承包人；所有从事通讯工作的人；甚至包括总统的私人秘书，这5万人中还不包括那些曾被准许接触该系统密码代号其后又离开者。

特纳兴奋地解释说他有一个办法将所有的绝密情报减少到用五个密码代号来进行分类。他将该系统命名为“顶点”。这五个密码代号是：“菲特英特”，代表所有卫星及间谍飞机空中拍摄的照片；“康英特”，代表所有窃听的通讯；“休姆英特”代表所有人工情报来源；“泰克英特”，代表所有技术事宜；最后是“皇家”，一个新号码，代表特殊技术或特别机密的行动——这类文件将被限制在近百名最高层人士范围之内。

凯西很礼貌地点点头。他很怀疑这是否能减少接触机密情报的机会。这种分类方法是否会使专与某一国间谍打交道的人被给予接触所有国家的所有间谍的机会呢？他没有问。特纳非常激动，好像发明了“顶点”系统就如同发现了基督教《十戒》一般。

特纳说国家安全局正在对此加以抵制，并攻击他说“顶点”系统将会使中央情报局局长能控制窃听通讯。

凯西觉得特纳是一个自讨苦吃的人。特纳流露出失败的情绪并显得不安，这表明事实上他从未控制过国家安全局的事务并且至今他仍在与国家安全局相互殴斗。这似乎是一个标签与地盘之争。凯西恰恰不愿多扯“标签”，虽然他并不想这样说，因为“标签”不是情报事务。如果说他与特纳有区别的话，凯西认为他将需要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密码代号，因为那是保密的主要手段。特纳的表演几乎令人窘迫，凯西笑得很勉强。

这位海军上将继续说着。有关情报界的经济问题，他希望能

予以公开。他在情报界有两个助手并领导着200多名职员。他说两个助手是一个好主意——一个负责预算，另一个负责确定优先顺序（一个筹款，一个分派）。

凯西听够了，好吧，你觉得谁当我的副手比较合适？凯西的名单上有三个人，其中一位是弗雷德·艾克尔，一位思想家及军备控制专家。

特纳说不认识他。

那么汉克·诺克？

他不具备从事此工作的能力，特纳回答道。诺克曾短暂地任过特纳副手，他曾告诉局里的人说特纳本意良好但结果常常不好，并说他们将使特纳变到他们的思想方法上来。

英曼呢？

特纳说："他很有能力，但很明显有两点不利因素。其一：英曼坚决抵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将给你添麻烦；其二：由于国家安全局与中央情报局相互敌对，中央情报局将对英曼报有怀疑。"

凯西向特纳致谢后离开了。

特纳改变了他对凯西的看法，他认为凯西是个很好的听众。

凯西仍对副手的人选拿不定主意。特纳的论点集中在英曼身上，形容他是国家安全局的抵抗派局长。但是如果英曼能到中央情报局来的话，那些假定的不利因素很容易转变为有利条件。一个相竞争的俱乐部的明星运动员交换后可能为你的俱乐部赢得冠军，特别当交换是在他赞成的前提下所进行时。凯西决定抽时间与特纳的副手，弗兰克·卡卢奇谈谈，他是一位不说废话的政坛老手，一直幸存至今。他先后担任过外交官，卫生、教育及福利署副署长，预算管理局副局长和美国驻葡萄牙大使。

"你看应由谁当副局长？"凯西问道，他知道卡卢奇不参加此

角逐，因他将去五角大楼任温伯格部长的副手。

卡卢奇说，只有一个人可胜任此职，那就是博比·英曼。如果你不选择他，温伯格部长和我将把所有与国防有关的情报机构——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军种情报机构，集中到一起，由他总负责。这句话的含义是说凯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应当愿意将英曼任为副手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不是让他不受控制置身于国防部内。

圣诞节前夕，凯西到兰利中央情报局总部再次拜访特纳。

特纳递给凯西一本中央情报局有关60年代虐待苏联克格勃叛逃者伊利·诺森科的报告。在特纳看来这是中央情报局所犯的重罪之一。诺森科被局内某些偏执狂怀疑是双重间谍，认为他是被派来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以证明克格勃与约翰·肯尼迪的行刺者素·哈维·奥斯瓦尔德毫无关系。诺森科被囚在一间八英尺见方的牢房里关了1270天，达三年多，这是那些中央情报局内反间谍专家们所下的来讨好上司的棋赛的一部分，其间苏联的叛逃者成了牺牲品。特纳说，重要的是你要读一读这份报告并知道发生了什么，哪些可能发生错误。特纳不能肯定它将来不会发生。

凯西收下了这份报告，但觉得特纳停留于20年前的事有些不可思议。

特纳还有些事要交待给凯西。他说他建了个笔记本，上面列举了20或25件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工作，每项工作谁曾负责过，多长时间及他对人选的推荐——每项工作的第一、第二及第三人选，尤其是行动处。

凯西也接受了下来，尽管他看得出特纳并不明白他刚刚损害了75人的职业前途；对旧秩序的认可肯定是一种糊涂的赞同。

特纳说他将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作最后一次国外旅行，他将去中国商定一项高度机密的交易来建立二个苏联导弹监测站，以

取代在伊朗所丧失的监测站。旅途中他将用化名，并使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伪装包括小胡子。

凯西继续与中央情报局过渡班子伯会面，文件在迅速传递着。尽管他有创新和冒险的倾向，但他从其以前在政府的工作经历中得知新官上任必须慢慢行动，必须有十分把握方可行动。这一点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已使他牢记在心。这位朋友就是他长期以来的法律界伙伴伦纳德·霍尔。霍尔曾在艾森豪威尔任内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并在1957年组织了艾克心脏病发作后重新当选的竞选活动。霍尔去年逝世，15年来凯西一直每星期六定期在长岛洛克斯特山谷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加米那利餐馆共进午餐。霍尔和蔼可亲，曾教导凯西要走出家门，广泛接触人——工人们及秘书们，可能的话接触每一个人。但凯西会说，真正的经验是“谨慎”。

凯西本身能够成为“勇敢的比尔·多诺万”。但随着霍尔的去世，谁来劝他使他谨慎从事呢？他抓住了约翰·布鲁斯，布鲁斯正论证说过渡班子的建议臭透了。对在国外的秘密行动者来说，非官方身份的伪装将使他们降为一群到处旅行的飞机零件推销员，他们在国外官员的眼中将毫无可信性，间谍及秘密行动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职位上进行。必须运用美国政府的声望，而这只能在间谍们有外交官身份后才能进行。若没有大使馆的掩护身份，一个间谍如何能保证与华盛顿的通讯安全？秘密文件如何隐藏？难道在市中心宾馆的房间里能进行这些工作吗？布鲁斯辩论说，过渡班子的那些疯子正试图卖给凯西一些间谍小说里的货色以及辉煌的间谍史中一些罗曼蒂克式的概念。然而这些东西从未出现过，今后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一些有关詹姆斯·邦德的小说中的诺博士不是我们的敌人，这不是那种摧毁诺博士的首脑机关之类的事情。俄国人到处都是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场微妙的、长期

的游戏。

凯西反驳了他的观点，他看到了布鲁斯论点的长处，但他的勇气告诉他必须对中央情报局重新组合。

“唔，听我说，比尔，”布鲁斯说，“肯定能够找到一种不那么具有破坏性的解决方案。”

凯西听到了“谨慎”的劝诫。

12月22日，过渡报告最终完成。圣诞节时，凯西告诉布鲁斯过渡班子这个争辩不休的团体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凯西说：“他们那里总给我添麻烦。”已到了制定他自己的日程的时间了。

布鲁斯松了一口气，目前部分坏女巫已死了。

新年后，凯西与布鲁斯在国际俱乐部专为俱乐部成员而设的烤肉餐厅共进午餐，这一俱乐部是华盛顿市中心最高级的俱乐部。

凯西说，我最优先考虑的事是分析预测，即有关未来的书面估价。不仅预测本身需要改进，而且所有的事都需改进，所有的情报必须适应预测的要求，进行预测将会帮助我们看出情报来源及自己工作人员的弱点，预测也是连接总统及制订政策的纽带。

布鲁斯表示同意。

凯西说，曾有人一年付60万美元让我写税收一览及指南（这夸大了他的年收入）。拿来许多现成信息并根据需要加以煮沸及蒸馏是我的拿手好戏。

啊，布鲁斯对凯西的吹牛感到吃惊，但他认为把预测作为最优先考虑的事是正确的。

凯西说把注意力集中在预测上将会使他与政府、军队、国家安全局及联邦调查局的情报首脑们建立私人联系。此外，“斯坦与每个首脑都长期不和，”他略带嘲笑地补充说。

他其次要优先考虑的事是寻求总统的一项行政命令以放松对情报收集工作的限制。第三，他想为情报界争取更多的财力和人

力。他说最紧迫的问题是人。他问布鲁斯对重要职位的人选看法如何。

“英曼，”布鲁斯说，“他应该任副局长。比尔，你需要这位既有才干又有路子的人，他将能在与国防部的争论中坚守住，把争论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在国务院他将以一个受教育的温和的军人形象而享有名望。他有戈德华特作后台，在国会山他以宠儿的身份倍受欢迎。”

凯西点头赞同，但很明显，他仍有点犹豫。

“为什么不选择他呢？”布鲁斯问道。

“因为他不想要这个职位。”

“博比是个军人并将会做任何指示他做的事，”布鲁斯说，“或许擢升至四星上将会中他的意。”

凯西咕哝了一句。谈话转向其他人选。“给你设一位高级助理怎么样？”布鲁斯问凯西。

“或许这将是你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布鲁斯说，“你将需要某位懂得工作方法，熟悉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真正的权力中心及文件传送并与国防部及国务院关系密切的人。”

凯西请布鲁斯放开眼界找出合适的人选。“我一直在翻阅成堆的个人档案，寻找各个职位的候选人，这十分重要。”凯西强调说。他没咕哝，但其胳膊却在这安静的餐厅中用力向空中挥着。

布鲁斯现在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凯西患了布鲁斯所称的“我将通过带进我的人使此地焕然一新”的职业病。这完全是多诺万的作法。多诺万曾晋升了一些有趣的人，一些不循规蹈距的怪人。布鲁斯明白在一个有某些古怪功能的大机构里，容易出现某些古怪的个性，也容易出现一些能完成任务的怪人。这些开锁者大多不是出自什么名牌学校。

“我们需要一些有广泛的职业经验的人，”凯西说，“我们需要引进一些局外人。”

“当然。”布鲁斯说道。

“我想做的事情之一是为胡——戈尔找一个职位。”凯西说，他将麦克斯·胡戈尔的名字破开来念。

“胡——戈尔？”布鲁斯问到，“他是谁？”

“胡——戈尔。”凯西回答道。

布鲁斯仍想不出这是谁。

凯西决心为胡戈尔在中央情报局选一个职位。胡戈尔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并曾在里根竞选运动中与凯西密切合作，胡戈尔还曾从少数民族工人及特殊利益投票集团中征募了一名骨干。

“有许许多多的职位可干。”布鲁斯最后说。

他们商定在就职仪式后布鲁斯搬到凯西办公室外的一张办公桌上，在那里布鲁斯可以观察事情发展并协助凯西确定理想的高级助理人选。

凯西回到兰利总部，作为新的首脑听一些特纳的重要助手向他作简要汇报。

“秘密行动怎么样了？”凯西询问道，“在卡特任内有何进展？行动处是不是已经锈得转不动了呢？”他需要细节。

汇报者们说，四年来秘密行动主要有三个阶段。秘密行动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不具有入侵性的阶段，是宣传运动，它构成了卡特—特纳时代受到限制的秘密行动的第一个方面。布热津斯基对向共产党国家输送书籍特别感兴趣。这项所谓的“输书计划”包括向“铁幕”后偷运数以千计的书籍及其它材料。凯西被告知，这不能改变多少，更别说推动历史的进程了。但有人觉得必须使民主的福音成为可得到的东西。他们解释说，特纳曾称“输书计划”为“秘密行动的玩具”、“布热津斯基的免费传单”及“不可靠的行动”。

凯西对特纳的冷言冷语深为吃惊，他心里暗暗记住一定要大

力扩展这些宣传运动。他相信语言是会产生影响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思想，而思想是有作用的。

“还有什么?”凯西不耐烦地问到。

第二个阶段包括执行一些秘密任务，主要目的在于巩固与友好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英国及沙特的关系。这些联合行动在卡特任内晚期为了表明卡特的新的强硬立场主要的行动是一项有限度的准军事援助计划，用以推翻苏联支持的南也门马克思主义政权。行动是秘密的，几队也门人被训练来进行诸如炸毁桥梁之类的事。特纳曾指责该行动“轻率”，并将其交给副手，弗兰克·卡卢奇来监督这项秘密计划。

“为什么?”凯西问到。

特纳觉得白宫过分热心于取悦英国，而英国在南也门行动中却落在后面，并且他担心中央情报局让易泄密的英国军事情报三处（英国的国外情报机构）分享了过多的秘密情报。特纳觉得英国实际上对美国进行了情报限制，而从美国所获得情报太多了。

凯西说他喜欢英国人。还有什么?

汇报者们告诉凯西，面对 1979 年 12 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进入了秘密行动计划的第三个阶段，发起了最重要的一次大规模准军事援助行动。这次仍是布热津斯基推动此事最卖力，他认为苏联的扩张已超过了他们能承受的范围，阿富汗就是苏联的越南。布热津斯基希望能大胆和无情地利用阿富汗的局势。他曾说过：“让苏联人流血。”

特纳的态度呢?

汇报者们说，局长曾长时间地强烈怀疑是否允许用其它国家人民的生命来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武器将第一次用来杀死苏联正规军。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大约有 9 万人。特纳曾担心美国的政策是战斗到最后一名阿富汗人，但他最终还是支持了这项行动。埃及、巴基斯坦及中国也在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

美国援助总额约达 1 亿美元。

批准凯西任命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定在里根就职仪式前一周，1981 年 1 月 13 日，星期三进行，凯西着手做准备工作。这是他经历过的第五次批准任命听证会。他已学会在这种场合既不要在罗列观点或回顾既往工作经历，也不要手无寸铁，毫无准备。10 年前，在他被提名为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主席的批准听证会上，他曾发表即兴表演，其后在有人以剽窃罪对他起诉，使他不得不撤回听证会上的证词，这差点毁了他的任命。1971 年的记忆是不愉快的。

所以这次凯西仔细地加以准备。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主要职位之一，肯定要有较高的可见度，因而他自己起草了 40 页的开场白，对之加以构思以避免麻烦。这意味着以不知道情况和不确定为理由少表态，并使参议员们确信许多事情尚未决定。凯西觉得少说为妙，因为参议员都乐于听到自己的声音。

那天上午，凯西身着一套黑色宽条的银行家式制服准时赶到会场。上午 10 时戈德华特宣布听证会开始。他要情报委员会副主席，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一个纽约州民主党人来介绍凯西。莫尼汉曾在尼克松政府内任职，是一位急躁、生气勃勃和擅长辞令的学者，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而流畅，并带有东部高原的言调。现在莫尼汉将陈述些诸如凯西忠实于祖国，出生纽约，是一个成功的人等狭隘的地区观念。

“这是一位有着卓越才能的人，”莫尼汉说，“从弗兰克林·罗斯福时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加入美国海军起，他曾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为历届总统服务过。他的经历尽人皆知，不需要我一一列举，但我要作一个不那么十全十美的结语，即法国人所说的结束语，比尔·凯西肯定会作为战略情报局的最后一名成员来领导中央情报局。”

凯西不自在地坐在证人席上，他眼睛被动地眨着，手动来动去，寻求一些活动。

戈德华特讲话了。“有些事情是错误的，”他说，“情报远远不足，也不够好。国会的调查，国会的情绪等等已抑制了世界各地情报人员去发展有希望的对象……许多情报人员为应付未来对他们行动的调查或批评正在花费无数的时间撰写辩护的备忘录。”

在另外三位参议院开场白之后，凯西把头伸向麦克风。他发言的中心思想是：“重建、行动和安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情报局患了习惯性自我怀疑症，”他说，“它的许多最优秀的官员们已退休或将要退休，局内许多人士气低落，许多人做为情报官员的自我荣誉感减退了。”

在过去的几周里，凯西见到的这种情绪太多了。他说，这主要表现在踌躇不前，这是自我保护的间接反应。他谈到了该症的药方——自信、忠诚、荣誉感。

“这次不是对中央情报局机构进行另一次重建。”他有力地申明这一点。他认为近年来所谓的情报界的失败，其情况是得到了有关事实但却进行了错误的分析或错误地引导了政策。他允诺向总统提供所有有关的情报和观点。他再次保证与国会密切合作。

凯西给每个人都带了些东西——给右翼以“重建中央情报局”，给左翼以“尊重公民自由权”。莫尼汉及其他民主党人清楚，里根的压倒性胜利给民主党人带来了麻烦，他们不得不小心从事。再不能允许有控制中央情报局心脏的企图了，再不能出现弗兰克·丘奇之类的对中央情报局的指责的人了。丘奇曾指责中央情报局是“一头正在横冲直撞的凶猛而离群的大象”。莫尼汉本来就不赞同那种对待中央情报局的方法，一个有力的中央情报局是国家安全的前提。莫尼汉觉得自己对苏联人丝毫不存在有幻想，他们可以做出非常肮脏的事。

莫尼汉对中央情报局提供有用情报的能力也不抱有太多的幻

想。当他在1973—1975年任美国驻印度大使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就经常奔进他的房间，印度政府的秘密文件装在特制文件夹里以表明其重要性，但其后印度领导层常做一些文件里并未提及的事。他认为很明显中央情报局漏掉了许多东西。

轮到要他提问凯西时，莫尼汉提到了最近失效的法律，他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不断向两院情报委员会完整地通报目前所有情报活动……包括任何可以明显地预测到的情报行动。莫尼汉指出在所有情况下总统可以指明只向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及副主席通报。这只适合于那种“事关美国极其重要利益的非常情况下……因而必须对高度机密的事件保守机密”。

“不过，还有一个模糊的地方。”莫尼汉说。他身体前倾，声音升高就像是参加一场无拘束的即席演唱会，一般情况下每当他觉得自己掌握了主要的问题时常常会这样。他指出这一法律的序言中说所有条款必须与宪法中的总统职责相一致，必须与行政部门防止未经准许而泄露秘密情报、情报来源及情报方法的责任感相符合。

“因此我们说它必须有了这些‘相一致’才能实行，我们承认可能有某些时候不相一致。”莫尼汉说道。虽然承认了这一点，但是该法律又说，有些事情事后必须在某种程度上通知国会。“从这一点上说所有事情毫无例外要向我们通报。”他问凯西：“你对这个模棱两可的限度看法如何？……由于如你所知的原因，在你长期而卓越的经历中曾发生过一次你不愿提供国会所要的材料的事。”

“那就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文件，”莫尼汉指出，“正如你所预料我们会做的那样，我们在听证会前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我得到特许与斯坦利·斯波金进行了接触……从任何人的标准看来他都是个出色的公仆。”莫尼汉从斯波金那里收到了一封信，斯波金是证券及外汇管理局执法机构的传奇般的首领，多年来该执法

机构一直自封为特别业务检察队。

莫尼汉指望从斯波金这位非商人的民主党英雄那里得到些凯西的丑事，但相反他收到了斯波金为凯西任职而“起立欢呼”的回信，因为斯波金与凯西在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共同工作经历。斯波金曾谈到，“凯西那富有洞察力和创见性的分析”及“当某件事出现问题时，他那富有想象力和英明的决断”。

凯西摆脱了困境。莫尼汉甚至对过去一个问题都没问，他又谈到了未来：“你觉得应如何告诉情报委员会那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还是你仅愿意让世界上不超过两人知道这些事？”

“参议员先生，”凯西回答说，“我将完全遵守法律的条文及精神……现在我想不出什么情况能使我不能向情报委员会提供它所要的情报。”

“好的，谢谢你，先生。”莫尼汉说，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完全的保证。“我听到你说你想不出任何理由能使你不能与情报委员会共享情报。”

凯西温和地重复自己的话，“我是说现在我想不出。”

莫尼汉笑了，“你说是现在想不出，你在福特哈姆法学院真是没白学。”

现在轮到凯西笑了。他曾去福特哈姆读大学，不过却在圣·约翰法学院读的法律，但他没有纠正这一位参议员的话。

凯西轻而易举地回答了其余的问题，他努力使回答成为一个字或一句话。在有人问到一句当时流行的短句“现在是解开中央情报局的锁链的时候了”时，凯西回答：“我没有用过那个短句。”关于一项可能的新行政命令，回答是“我还没有完全决定”。关于他在竞选后都干些什么，他回答说：“我大部分时间是用来把法律业务拿起来，并估计在竞选运动中我所蒙受的财政损失。”关于中央情报局过渡班子，回答是“一个像变形虫一样的家伙。”关于管理问题，凯西答道：“我在管理方面总的风格是设立目标并准许人

们去追求目标，让他们自己行动，并且不对细节进行管理。如果他们不行动的话，就让别人来干。”

当特拉华州民主党人参议员约瑟夫·比登暗示他们听不清，凯西应把麦克风拉近些时，凯西这样做了，并加了一句：“现在它在我的怀里了。”

戈德华特提了些问题，“你想过副手的人选吗？”

“是的，想了很多。”凯西冰冷冷地说，意识到鼓吹即将开始了。

“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罗伯特·英曼海军上将在我们委员会里深受尊敬……”戈德华特毫无表情地说，“而且，我想我再代表情报委员会说句话，我们不想看到被派来充当你的助手的只是些政界人物……我认为英曼海军上将将极大地增强中央情报局的力量。”

“我希望他能设法到局里来。”凯西说，暗示如果英曼想当副手，那么该职位就是他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一份报告中看到在考虑其他许多人来充当你的副手，但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戈德华特说。他又重复道：“而我们都很熟悉博比·英曼。”

“我从未见过那份名单，”凯西将诱饵扔还给戈德华特，“我应该看到那份名单，”他又嘲笑似地补充说，“或许其中某些人很优秀。”

“不过，我不会告诉你是在何处看到这个报告的。”戈德华特回答说。

比登讲话强调了责任感，凯西毫不犹豫对这位年轻参议员进行了反驳：“我想有时僵硬的过细的责任会损害任务的完成，而且我认为应该承认这一点。”比登又问到有关报刊上的短评问题，凯西推开了这一问题，他说：“我还没有一个经过考虑的个人观点，因而也不想表达一个未经考虑的个人观点。”“没有讲过？”比登问。

“没有”，凯西答道，“我将加以观察。”

随后比登又看风驶舵地谈到英曼，“绝对最优秀的，毫无疑问他绝对是在此委员会作证过的情报界最优秀的人物”。他又摇起了胡萝卜，说如果英曼得到副局长的职位的话，那么“当你有麻烦时……你派英曼来好了，他熟悉绕过我们的途径。”

这个启示对凯西起作用，只要他想通过委员会而成为头面人物，他就必须接受英曼。英曼不仅在委员会面前完成了他的工作，而且某种程度上已决定性地培养、完善了自己的形象。

在里根任职前的几天里，凯西浏览了情报资料，尤其是有关伊朗人质危机的资料。他看到国家安全局的重要性，国家安全局正在窃听及破译伊朗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通讯，后者以调解人的身份参加了会谈。使伊朗和阿尔及利亚接到有关美国立场的确切无疑的信号并避免误解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窃听具有双重检验的功能，确认阿尔及利亚人及伊朗人已听到并清楚美国的立场。通过窃听多次得知美国的立场被调解人歪曲了，从而使美国的谈判者们能迅速予以纠正。凯西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白宫所需要的情报协助。他注意到国家安全局局长经常与总统及白宫其他官员接触。

凯西同情报界的其他人一样，在注视着波兰的局势，预测的苏联入侵并没出现。像通常的类似情况一样，这一预测是根据部分情报所得出的。中央情报局有苏军调动计划的详细情报，包括一张冗长的单子，上面写有哪支部队有可能入侵波兰。这些情报中的一部分出自列于中央情报局的“大人物准阅单”上的间谍之一，那位波兰总参谋部的上校。入侵需要有恰当的时机及大量人力、物力的配合，调动需要从俄国西部调来大量重型卡车用以运输。而卫星照片显示这些卡车甚至没有被调到波兰边界上。或许军队在苏联边界的集结只是种讹诈，其目的是为了使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的政策变得强硬起来？或许布热津斯基的公开抗议及通

过外交途径的警告把俄国人吓跑了？凯西吃惊地发现，即使有了卫星照片，有波兰总参谋部上校，还有其它情报，许多事情仍是个谜。

凯西还惊奇地注意到特纳上将在其任内最后一段时间里仍妥善完成了最后的重要情报任务，这项任务就是高度机密的有关美苏战略均衡的判断。那就是国家情报判断—11－3－8，它论述了苏联的能力及意图。经最后的斟酌，特纳完成该文件并将其复印件送给所有的重要国家安全及情报官员们，包括总统。此类判断是由情报界首脑起草的，他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过各情报机构可添加自己的异议。由于情报界首脑同时兼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习惯上中央情报局的立场就是他的立场，中央情报局从未与情报界首脑有过异议。然而这一次中央情报局内对特纳的观点有大量的异议，他第一次允许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已发行的情报判断上表达不同意见。凯西发现特纳有关美苏战略均衡的观点在书面上同早些时候向总统口头汇报此问题时同样缺乏说服力。他还发现特纳的辩论中有一个谬论：尽管在苏联第一次核袭击后美国可能有足够的核武器进行报复，尽管这种核威胁似乎有效，但苏联人的反应可能是非逻辑性的，战争毕竟是非逻辑性的。

凯西觉得特纳的分析未考虑美国的优势。论文及“推理”不能取代军事优势。任何此类判断对制定政策的影响将有赖于其意见一致—— 一份各情报机构及情报界首脑意见一致的文件。

凯西不得不忍受与即将离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最后一次相遇。1 月 15 日，星期四，离宣誓就职仪式还有五天，特纳将最后一次向里根、布什及凯西汇报机密事宜。里根并未要求进行此次会议，是特纳坚持要求进行的。

这是个寒冷的早晨，布什、凯西同里根一起在布莱尔公寓的一个私人房间里听取了最后一次情况简报，新政府成员期待得有些焦虑不安。

特纳告诉他们，最重要的秘密行动是对阿富汗抵抗力量的秘密支持。中央情报局还有些人在伊朗并针对霍梅尼被赶下台或美国在德黑兰的 52 名人质开始遭杀害时制订了相应的一些行动计划。

不过，特纳解释说，真正冒险的行动不是秘密行动，而是敏感的收集情报行动，某些行动非常机密和重要，以至于不暴露而平稳度过即是取得了当天的胜利。

首先，那些情报员一旦暴露不仅会失去自由而且会被杀害。他举了些例子，包括一位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此人将苏联供应印度的武器情报送给中央情报局，其专业是空防。

一个在莫斯科航空研究院工作的重要情报员，名叫托尔卡契夫，提供了"硬件文件副本"——正在使用的苏联武器系统及正在研究的新武器系统的计划、说明书及实验数据。他的情报是玉中珍品，他向人们提供了一览苏联武器世界的机会，而这在别处是无法得到的——包括大量有关战斗机、炸弹及导弹的情报。这些获得的情报包括有关战争能力的报告，最重要的是某些重要的苏联武器的弱点。但他仍向未来打开了一面窗口——研究、发展新一代武器，特别是新式的躲避雷达的隐形技术。他的情报预算将达数十亿美元。

特纳说里根将能决定，除副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外，哪些人应该知道，即使这包括某个情报员的情况。很明显这取决于总统，他补充说。

其次的秘密收集情报计划包括对朋友及盟友搞间谍活动，这是个一直存在的棘手的问题。他希望新政府能采纳他的宗旨，即此类行动是必须的，如果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应该扩大范围。许多情报行动是采用被动的技术手段来完成的——卫星照片、截获通讯、置于有利位置上的录音设备。暴露的危险多数来自泄密或

美国情报机构中的苏联间谍。特别情报收集分队，一般由二至三名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人员组成，隐藏于数十个大使馆中，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情报。世界上普遍认为美国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一个窃听装置或电讯截获设备暴露后紧接而来的是常规的驱逐外交官或外交照会，这种游戏尽人皆知并已规范化了。但上帝保佑，如果美国对友好国家进行间谍活动的程度及具体目标一旦泄露或暴露，将会爆发两国关系及外交上的严重问题。特纳举了些例子。凯西曾做过些研究并吃惊地发现在这些秘密收集情报的行动中使用录音设备或情报员是如此之少——他算过仅有三打左右。

特纳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他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是如何将埃及政府完全置于电子监控之下并从上至下安插"眼线"的。实际上美国政府及中央情报局对安沃尔·萨达特了如指掌。与几个友好政府的情报交谈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收集情报的机会。

搜集情报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特别行动，它们使用了一些情报员及先进技术，一旦失败将会极大地损害国家安全。特纳详细介绍了海军特别控制计划中用潜艇在海底电缆上方窃听，使潜艇一次就在该地停留数周并增加了危险的情况。现在海军特别控制计划有了高技术舱，可将它们置于海底电缆上方，录下数周或数月的通讯内容后再取回。这项工作使用一种密封的隔离舱，它不必直接接触电缆中的通讯线路。这样的话，如果苏联人将海底电缆提出进行检查或维修也不会发现它被窃听的迹象。每次行动，尤其是在苏联领海内的行动，必须得到总统的批准。

没有任何情报行动能置如此之多的生命于危险之中。曾发生过一些冲突，至少一次与苏联潜艇相冲突，还有些其它事故。如果一艘潜艇被俘获，其影响将相当于一架U－2间谍飞机及一艘普未布洛号间谍船的影响相加甚至还要糟糕。

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发现通过窃听陆地通讯线路——将

其置于电话线上或地下电缆上，可以在非水下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

还有些搜集情报的潜能及固定的设备未被启用，它们是所拥有的应付紧急情况及战争的储备力量。它们包括一些现有技术手段的替代办法，也有些潜能及情报员仅仅用来应付紧急情况或战争。但情报机构并无足够的战争储备，因为很难从预算中得到资金来维持现在不用的昂贵设备及情报员。没有人愿意为未来付钱。

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也是个秘密的领域。然而，特纳说道，在 20 个主要国家中，国家安全局只能破译部分时间的部分密码。还有其它数十个国家不是重要的目标，但国家安全局却能破译其密码。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特别是苏联，想不到美国能窃听其海底电缆或国内通讯线路，他们在这些通讯线路上常常不用高级的密码系统，甚至根本不用密码。有些情况下，国家安全局仅通过注意通讯的增加或新线路的启用，甚至不用破译密码，就可获得“告诫”，就是说，即将进行一次导弹试验，这就使得美国的收集情报装置，例如 RC－135 侦察卫星的空中窃听装置就位以获得更多的数据。

还有些能自动传送的窃听装置可将其安放或投至不同的国家，它们将送回所截获的通讯资料。有时，国家安全局甚至发现了微波通讯线路的“漏洞”，可以进行窃听。

特纳总结说，有无数的机会去收集情报——许多已被应用，许多甚至还未想到。

凯西离开时感到收集情报工作做得远远不够。为什么？是什么使得这个庞大的情报机器处于停滞状态？

四

1月20日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第444天，伊朗在最后一刻推迟了将人质直接交还给即将离任的卡特总统，英曼严密注视着有关情报。最后，中午12时30分，里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半小时，两架满载人质的飞机离开了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

第二天，凯西安排总统约见英曼。收到邀请后，英曼想到会是一次照本宣读式的训话。但里根的语调柔和而轻松，几乎半开玩笑式的。他解释说凯西及情报界的其他所有人都希望英曼能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然后他抛出了杀手锏，“我需要你，”这位总司令带着娴熟的热诚说。

为政府服务有报酬，在军队服役有前程和礼仪，但应总统的请求，为总统服务却有一种奇异的神秘气氛。英曼发现自己回答的是：“我很荣幸。”他补充说，他仅希望该职18个月至2年就够了。

同一天，1981年1月21日，里根政府的第一个完整的工作日，凯西选出了又一件重要的个人事务。如果英曼是个内行的话，凯西需要另一外行的人。组织建设需要不同类型的人参加。凯西看准了一个人，他与英曼恰为相对的两极，他就是“胡——戈尔”，凯西在几周前向约翰·布鲁斯提过此事。

马克斯·胡戈尔，是一位56岁的商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比凯西矮半英寸多，但却与凯西同样精力充沛。他是那类能言善

辩、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的集中体现，凯西特别喜欢他。同凯西一样，他说话很快，语法不当或发音有误。胡戈尔并不太顺利，但他通过努力工作超过别人，并赚了数百万美元。凯西任命胡戈尔为中央情报局他的私人特别助理。

在1980年竞选运动中，他们两人共住在迪尔·雷码头旅馆的一个两人房间里，这里是单身汉和驾驶游艇爱好者的天堂。他们在清晨5点起床，以便接东海岸打来的电话，在那里是早上8时。凯西和胡戈尔一直工作到深夜。胡戈尔几乎是拼凑成了一支实际上是义务的支持里根的队伍，他们来自30个主要利益集团——宗教的、职业的及少数民族的等等，甚至包括接近退休年龄的公民。

凯西和胡戈尔是临时搭档，起初两人都不知该如何着手工作。凯西发现胡戈尔坚定而忠诚，使人很感动甚至感到很可爱。胡戈尔知道凯西喜欢吃香蕉后，每次去商店买东西时总是带回几串给凯西。有一次，一阵风吹掉了凯西的帽子，胡戈尔马上去追，这时又一阵风把胡戈尔的假发吹跑了，并在空中飘荡——这为胡戈尔回首大选提供了难忘的回味。

胡戈尔在二次大战后曾在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过。他会讲日语，并在一家名叫"兄弟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作了20年国际间生意。

胡戈尔很快填写了一大堆为接触最高机密和密码所需的背景及安全审查表格，他公开了自己的经历及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接受审查。但要获得批准还需通过一次测谎器测验。

几天后，胡戈尔带上感受器坐在测谎器前，提问者开始提出一系列仔细排列过的问题。

你曾偷过钱吗？负责测验的人问道。

没有，胡戈尔说，他清楚自己必须将答案局限于是或不是。

曾进行过任何同性恋活动吗？

没有。

曾用过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或可卡因吗？

没有，胡戈尔说。他从未用过，但他觉得自己似乎在撒谎，测谎器上那支描绘其未来命运的小针可能会使他偏离既定的航线。

曾被绑架过吗？

没有。

还有些问题，胡戈尔觉得似乎这次严峻的考验持续了几个小时，问题涉及面很广。它们范围虽广但只需要单纯的答案——是或不是。胡戈尔知道这种测验的有效性尚有疑问，法庭也不会接受其作为任何形式的证据。但很多事都依靠它，因为一个人怎么会记住从未发生、从未说过或从未做过的事呢？

负责测验的人最后告诉他通过了——大获全胜，胡戈尔补充说。

在英曼接受——或许更恰当的词是默认其新职后，凯西可以开始他对美国整个情报王国的统治了。在新政府内出现了几件使他的地位更加诱人的事情。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必须通过埃德·米斯，新任白宫顾问向里根汇报。这是前所未有的对国家安全助理权力的削减，但这增强了凯西的地位。另一个好消息是，詹姆斯·贝克，一个温和的得克萨斯州的律师，曾在竞选运动中任凯西的副手，现在在凯西的坚决支持下，被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

贝克曾管理过乔治·布什的竞选活动，是一位能力强、效率高的管理者。与米斯恰恰相反，米斯的文件包或文件箱底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丢失。凯西经过竞选运动与麦克·丹佛也很熟。米斯，贝克及丹佛是将要管理白宫的三驾马车。凯西确信自己与三人关系均很好，同时他们也都希望能与他保持关系。更重要的是，凯西认为自己能直接与总统通电话或约见总统。

凯西与黑格和温伯格的关系似乎很好，他对这两位高级内阁

成员采取一种非竞争姿态。黑格有“外交手段”，温伯格有“战争手段”。如果这些均不足以完成对外政策的目标，即积极消灭共产主义的话，那可能要通过“情报”来完成了。

他安排一次与英曼的会面来讨论他的计划纲要，待人不真诚就会一事无成。

我想直接控制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处来改进情报报告和评估，凯西说。他还想控制行动处，秘密行动及秘密收集情报行动需要并将得到加强。

英曼很吃惊，这两个处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部分。

中央情报局的科学技术部门如英曼想要的话将归他分工管理，凯西说。另外行政人事处，凯西对其业务不感兴趣，也将归英曼管。

通常情况下，中央情报局局长会置身于中央情报局之外而充当美国政府的总情报协调者，作“局外先生”。而凯西将其职务描述为“局内先生”，他想插手所有的情报报告及秘密行动。英曼发现凯西有着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专横品质。凯西的信念很强，大而笨的躯体摇动着，双臂开始了行动。只听不做的模式已经结束，事情要发生变化了。

他将工作并统治其自己的机构——中央情报局。除了与白宫打交道以外，其他的各局间及政府机构间的事务将由英曼负责，凯西将亲自与白宫打交道。他称自己是总统的情报官，一个提供最新最热门的情报并确保总统知道的人。

英曼有些不高兴。

1 月 26 日，新政府上任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白宫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尽管凯西及英曼均未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但他们还是参加了。凯西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而英曼代表国家安全局，会议的议题是恐怖主义。

国务卿黑格，这位易激动的前基辛格门徒，北约部队总司令，自诩为新的强硬外交政策的代表，激动了起来，慷慨激昂地述说了一队恐怖分子或狂热分子能做些什么，伊朗就是例证。黑格肯定他们正进入一个不稳定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新政府将经受考验，必须表明我们的意志和决心。他带来了国务院的恐怖主义专家，安东尼·奎顿，由他来讲述有关恐怖主义问题。

奎顿说，恐怖分子小组有可能直接在美国国内袭击美国，美国是易受攻击的。

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新内阁成员们注意到伊朗让步后，美国大使馆人质获释回国，但恐怖主义的问题依然存在。

米斯提出了一些仍然新鲜的竞选运动的论点：卡特和特纳由于对情报机构进行了过多的限制，从而使情报机构对恐怖主义或国外间谍的有效调查受到了限制。

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说他不同意上述观点。他是纯美国血统，有一张孩子气的脸，是个令人愉快、与人无争的前美国联邦法官。韦伯斯特强调重要的是应仔细了解为抓间谍或制止恐怖分子活动在美国国内都做了些什么？他柔和地说。他的机构，负责美国国内的反间谍及反恐怖活动，它有着所需要的基本工具。它可在现有的规定及法律下进行活动，他说道。这熄灭了米斯的竞选运动之火。

英曼支持韦伯斯特，他说情报员也成问题，没有足够的人从事此项工作，困难在于使情报能及时送达需要者手中。

凯西没有太多可说的了。韦伯斯特和英曼肯定不是只会空谈的温和激进派，他必须对恐怖主义进行细查，这当然是一个情报界主要任务。

会议结束时，一致同意凯西对卡特的有关情报的命令，即对那些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进行审查。若意见很大需更改时，里根将签署一项修正命令。

第二天在参议院，凯西毫无争议地被批准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投票结果为95票对0票。一天后他宣誓就职。但那天的新闻出自于黑格，在国务院新闻官员们为其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他作为国务卿迅速走上讲台指责苏联“训练、资助及装备”国际恐怖分子。他在挖苦讽刺了卡特政府后补充说：“国际恐怖主义将会取代人权问题……我认为在人权方面最大的问题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

他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苏联人“现在正在卷入一些有意识地策略和计划，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这些策略和计划是来促进、支持和扩大这类恐怖主义活动。”

这顿重炮是一个重大新闻，使黑格的某些高级助手气急败坏，难以相信这是真的。罗纳德·斯皮尔斯，国务院情报机构的头目，私下告诉这位新任国务卿说他的讲话与最近的情报报告不符。

等等看，黑格说，他曾读过一本描写苏联在恐怖主义活动中所起作用的书的稿样，这本书名为《恐怖网》并即将出版，作者是克莱尔·斯德林，一个驻意大利的美国记者。斯德林已确切地指出了苏联人的作用。

可能有些新情况，斯皮尔斯承认说，而且肯定此事很重要、足以立即加以注意。斯皮尔斯向凯西呈送了一份正式请求，要求作出一份国家特别情报判断以便根据美国所有情报机构所知情报及政策制订者们所需情报作出综合性的最佳判断。

凯西欢迎这一请求。这些判断是糖和土豆，是他使中央情报局恢复元气努力的主要中心所在。完成后的“判断”将送给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及重要内阁成员，这些预报将是情报界的早期预警系统。他将使它们变得更好，并亲自指导这一工作过程，而恐怖主义将恰如其分地成为首要议题。

进入办公室第三天，凯西收到了一份长达12页的机密的《国家情报特别报告》。它恰在他宣誓就职前完成。标题为《利比亚：目的和弱点》，这是份有关卡扎菲在未来几个月的行动的简要预测。卡扎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他现在成了凯西的问题。这份文件作了这样的说明“警告：不得泄漏情报来源及方法。”

“这一报告由中央情报局局长签署，”凯西读到，“除文中注明外，均已经国家海外情报委员会同意。”国家海外情报委员会是所有美国情报机构的首脑组成的委员会，凯西现任主席。

《特别报告》总结了以下结论：

首先，“卡扎菲在乍得的胜利使他更确信其侵略政策将会对美国和西方构成更大的挑战。”几个月前，卡扎菲派遣了数千名军队进入与利比亚南部紧邻的乍得。乍得在1960年前是法国的殖民地，是许多其政权及忠诚供人竞购的非洲新兴国家之一。判断认为卡扎菲这一问题并未消失，其前景更富有冒险性。

其次，“国内外对统治的反对力量组织差并且作用小。”这意味着秘密行动不仅需要提供金钱和武器，而且必须解决组织和士气问题。

再次，“卡扎菲的反西方政策正在为苏联的目标服务……苏联人通过向利比亚大量出售武器获得了大量的硬通货。”判断认为这笔硬通货为每年10亿美元。尽管他不是苏联的爪牙，但卡扎菲与苏联的关系非常亲密。

近来，《报告》继续写道，卡扎菲“进行了政治阴谋，外交活动，恐怖主义活动，暗杀及现在的军事占领”。

情报机构聘请了心理及精神病专家，他们在获得由地面收集的原始情报数据后将其转变为心理测验图，一种间谍职业使用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在分析了卡扎菲的个性后，《报告》说：“由于其儿童时期的特殊环境，卡扎菲过分吸收了贝督因人的朴素理想主义、宗教狂热主义、强烈的自豪感、苦行主义、排外主义

及对细微的敏感。”

卡扎菲是一个游牧的牧羊人的儿子。“当他作为一名贝督因人在利比亚那些受城市化的利比亚人及外国人控制的城市里上学时，早期倍受歧视，结果卡扎菲对既定的高贵者们产生了强烈的憎恨，这使他更加坚持其贝督因方式以被压制者自居”。

结果之一，《报告》说，是“他自己反抗当局并对全世界的反抗事业进行不加区别的支持”。

在进行了空想心理分析后，《报告》说：“为了从心理上保护自己，卡扎菲产生了一种夸大的甚至自以为是的自我重要性的感觉。卡扎菲认为利比亚应恢复他假想在阿拉伯历史早期曾存在过的那种纯洁与朴素。”

《报告》也提到了卡扎菲正在进行地下工作的其它国家。“利比亚参与了整个黑非洲的秘密行动”，包括“贿赂与利比亚有着200英里共同边界的突尼斯领导人”，《报告》说，“最近的秘密报告”（情报术语，表示人工或技术手段得到）“提示利比亚加快了征募及训练突尼斯持不同政见者”。

卡扎菲近年来声称其领海应大于国际公认的12海里限额，坚持说位于其800英里的地中海沿岸北部的海岸凹入处所形成的275英里宽的锡德拉湾全属于利比亚。“当有人问道卡扎菲是否担心美国的报复时”，《报告》继续说，“他说他的军队接到长期命令袭击任何侵入该线的美国舰船或飞机”。情报机构总结说：“在利比亚以外发生牵扯到美国的事变的可能性较大。”

《报告》说，美国进口的石油中大约有1/10来自利比亚，“它是难以取代的轻质低焦油的主要供应者”。如《报告》所说，切断或禁止利比亚石油进口将导致“美国东海岸的严重汽油短缺”。

《报告》估计总的来说卡扎菲的政权并不是那么牢固，报告同时补充道：“我们已有证据表明去年5月曾发生一起政变企图，而在8月发生了另一起更严重的政变企图。”为了保护自己，卡扎菲

建立了“一个情报系统”，但组织起来的流亡者们得到了国外的支持。“很明显埃及、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及某些流亡者们“在利比亚国内有支持者”。然而，《报告》说，“除被暗杀外，他仍能维持政权多年”。

在《报告》第51段，提到了乍得前国防部长哈布雷。哈布雷是典型的沙漠勇士，曾在乍得与卡扎菲军队作战。(中央情报局文件显示苏丹领导人贾法尔·尼迈里曾在数月前秘密敦促中央情报局帮助哈布雷，尼迈里担心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将是卡扎菲菜单上的下一道菜。)《报告》说：“摩洛哥、埃及、苏丹及法国正在向哈布雷的抵抗力量增加秘密援助。”

尽管并不明显，凯西还是看到了文件中含糊其词的东西：卡扎菲可以被赶下台，因有政变的证据，或者可以绕过他。文件中充满了“可以、或许、可能”。在凯西看来这份文件是由含糊其词的人写给含糊其词的人看的。但他对它如何讲述与卡扎菲战斗的危险很感兴趣。

“实际上西方的公开威胁会给卡扎菲带来好处，使他从一个被社会所排斥者成为一个穆斯林英雄。到那时那个不反对美国的反利比亚行动，尤其是军事行动的阿拉伯政权就会受到本国人民的威胁——当美国威胁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他们会更加害怕。”

《报告》最后一段说阿拉伯国家“在其国内及阿拉伯世界”可能会反对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诡辩。卡扎菲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了麻烦——给西方，给美国，给阿拉伯国家，给朋友和敌人，甚至给自己。这份文件将情报机构仍置于官僚政治的安全宝座上，无论发生什么事，它都能推卸责任，并说，“看，我们告诉你了。我们说那可能会发生的。”凯西觉得面面俱到等于没说。

不过上一段最后一句作了某些补偿。在提到阿拉伯国家时，它说：“他们的阴险表现在某些卡扎菲的区域性仇敌，包括埃及总统

萨达特，还在谨慎地运用其力量，悄悄地在卡扎菲最薄弱的部分——他在乍得的过分扩张及由此而导致的国内危险局面捅上一刀使其流血。”

最后一句话说得很成功。如果你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句的话，这份判断可被看做是一份很有艺术性的文件，它以精巧的方式提出了要求行动的意见。并指出了危险最小的行动方法，建议精巧地、谨慎地、悄悄地使利比亚的卡扎菲上校流血。这一信息表明在乍得的冒险是卡扎菲唯一致命的弱点，而扩大在乍得的行动以挫败卡扎菲符合凯西的战略意识，凯西不会让中央情报局坐失这一良机。

很快，黑格的新国务院及凯西的新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向哈布雷提供秘密援助的建议。为了区别于正常情况下或称为“第一轨道”的公开的普通外交手段及援助，将这一秘密援助称为“第二轨道”。黑格说明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打得卡扎菲的鼻子流血并增加运回利比亚的骨灰盒。凯西大力支持这一政策，乍得、苏丹及埃及在利比亚的东部和南部，它们组成了一条重要的防护墙，这条防护墙需要得到加强。

政府各部间举行了一些会议，最后在白宫同总统一起开会讨论，在主要内阁成员之间巩固了基本意见上的一致。这种一致不仅在于要求重振秘密行动，而且要求恢复美国的国际声誉。总统很快签署了一项正式情报命令，这种命令称为“总统令”，决定向哈布雷提供数百万美元的秘密援助。凯西的第一项秘密行动开始进行。

在最初几个星期，凯西发现了他预料的情况——整个中央情报局变得缩手缩脚，他不得不哄他们出山。这些人除非有理由否则不会出山，他们当然不会为卡特和斯坦·特纳出山，但勇敢的种子已深埋在他们心里。要使他手下人出山，凯西必须改变中央情报局的指导思想，而有关利比亚的判断即是一例。如果说特纳

的指导思想是减少风险，那么凯西将表明愿意承担风险。要打破僵局，他必须证明政府、总统及他本人愿意承担风险。

空军中将尤金·泰于1981年2月2日，星期一上午11时与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会面，他保证自己准时到达了凯西办公室。以前他见过凯西一次，那是在一次晚会上。泰从36年的情报生涯中知道了政治与情报似同室之人。泰是一位如慈爱的爷爷般的人，他戴着眼镜，常常在大笑后长时间留下善意、热情的微笑。他曾目睹了政府换届，国防部长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走来换去，及情报工作形式及气氛的变化。但他发现真正的争吵常发生在没有足够情报时，当美国情报机构有了大量有用的数据，很少发生争吵。

泰曾在卡特任内任国防情报局局长近四年，他将留任此职。国防情报局综合陆军、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的情报，泰也可以接触国家安全局窃听的电讯情报，国家侦察办公室——它是最机密的机构，甚至在五角大楼电话簿上无号码——及中央情报局的卫星照片。他的首要责任是提供苏军调动的早期预警。中央情报局每日都要推行革命，搞政治颠覆及政治变革，这意味着它的产品每日都要摆在白宫的办公桌上，因为总是有热点或危机发生。而泰则与战争有关，这意味着国防情报局的产品很少受检查，至于苏联人它可能永远不会发动大战。他也希望不会发生大战。在情报圈子内，白宫、国务院、国防部，智囊班子中及新闻界，常有战争游戏及辩论，但它们是抽象的。这使他感到担忧，他决心使国防情报局保持警觉。

泰并不是个战争狂。他的哲学很简单：你知道的越多，发生战争的机会越小。情报界的任务是使美国能采取和平的行动。泰清楚在情报机构中国防情报局被认为是属后排座的、不受重视的机构并缺乏理智判断，然而他仍然意识到国防情报局及4500多名为他工作的雇员这副重担。约95%的美国军事情报出自国防情报

局，不仅对装备、威胁及军事动机进行分析，而且制订苏联境内的目标方案，为一体化综合行动计划，即与苏联进行核大战的计划提供决定性的情报。

他认为国防情报局是国防情报的主线。当约翰·肯尼迪总统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任时，发现与苏联人的导弹无甚差距，正如肯尼迪在1960年总统竞选中所大声疾呼的一样。因而他们成立了国防情报局以保证军事情报能受到加以适当的审核并不被忽视。他们需要一个五角大楼最高情报机构，使它能于其各部门的竞争者之外独立提供答案。

这类启示必须很简单：阿拉伯人将会袭击或不会袭击；俄国人在进攻或不会进攻；或者中国人，或者其他任何人。

本周一上午的会议是国家对外情报委员会凯西任主席以来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包括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各军种的情报机构、国务院情报部门，即情报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及财政部的情报部门的首脑。总之，约有一打机构的首脑或代表在房间里等候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泰一直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应像他那样是一个专业人员，但自经历了海尔姆斯及考尔比两任局长后，他得出结论认为或许再不应从军官中选择中央情报局局长了。

凯西蹒跚地走进房间坐下，看上去老气横秋，这与特纳的年轻及军人姿态形成了惊人的对照。

凯西开始了一个简短而乐观的讲话。他说将听取各种意见；情报委员会将花费必要的时间进行工作；情报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他说他知道情报工作，理解其重要性；他将尽其所能及时听取报告。

泰觉得这是个好的迹象。凯西做了足够的工作了解了特纳任委员会主席时所遇到的阻力，特纳只给委员会会议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并保证按时散会。他或许会听到各种意见，但很少有人能有时间将其要旨讲清楚。有时他们不得不去吃饭而特纳也必

须走了。由于特纳是第一号人物，他可以自作主张。特纳很刻板并常常令人烦恼。

当凯西继续说时，泰略带吃惊地发现他很熟悉情报界的特殊语言。这位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令人惬意，他说他想亲自去看望各位情报首脑。

凯西也提到房间里的许多人，或许很多人，他们想找到某种方法使那些不必要知道的人无法接触某些秘密材料。他保证将做到这一点，他重复说安全是他优先要做的主要事情之一。

几天后凯西给泰打电话。“去你家共进午餐如何？”凯西问到。当泰说他没有私人餐厅时，凯西说他们可在泰的办公室进餐。几天后凯西来到泰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3E258 房间。

两人都要了虾仁色拉，凯西立刻开始问起泰以前所担任的情报职务的细节。但他真正的问题只有两个：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吗？泰很快被“发射”作环球旅行。

“先从南太平洋讲起，”泰说，“那里的情报力量太薄弱了。苏联人正从新西兰人手里买羊毛，这是典型的苏联手腕，其目的是利用经济联系而伸进一只脚。在北太平洋地区，朝鲜的局势很糟糕，情报来源减少了而北朝鲜的军队日益增多。苏联人正准备在美国已放弃的地区增加其影响，特别是在东南亚，如越南。”

凯西从口袋里取出一些笔记卡片开始记录，鼓励泰说下去。朝鲜，越南——老问题，旧战争——或许并未结束。

尼克松—基辛格已打开大门但并未解决中国问题，泰说。中国的政策可能会在一夜之间 180 度转弯。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潜艇，轨道卫星，及其洲际弹道导弹使其成为一支世界力量。我们过去对中国的看法有严重错误，我们仅将中国视为第三世界的一个大国，将其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巨大威胁。但中国人允许美国在其境内建立窃听站一事是一种友好的象征，尽管并不是友好的保证。

莫斯科是关心的重点，泰说。在其农村有动乱；地区警察，而不是莫斯科的中央政府，控制着某些区域。在首都，非常贫困以致于可能出现另一位霍梅尼式的领导人。中美洲如不稳定的大海，是左派分子产生的土壤。古巴正在得到更多更好的飞机，以便使其能在其更大领域内实施霸权。

中东在其变好之前事情还会变得更糟。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并未发生国内战争，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在中东的介入似乎总是给我们带来麻烦。

他接着说，印度很重要，但其权力由甘地政府与其在苏联控制下的国防部长平分。这两位一体的政府将给美国出难题。他解释说，因为常常不知道谁说话管用。

“还有一个警惕性问题，”泰说，“白宫常常不听。坦率的说，几乎无法使卡特总统相信有关情报结论，即苏联人正准备入侵阿富汗。苏联人入侵的三个月以前，一位惯于扩大军事影响的苏军将领到达阿富汗，他曾在越南进行过活动。”泰没法亲自给卡特的白宫打电话并提出警告，好像没有人在家，当然也没有人听电话。卫星照片及文电情报使苏联人的动机更加明显。但白宫被伊朗事件所困扰，似乎不希望出现又一个问题。“现在，已一年多了，”泰说，“苏联人在阿富汗的局势仍很严峻。”

“好的，”凯西说着，浏览了一遍他的卡片，“如果你有事相告，直接找我。我们将进行研究。”他强调说。

在苏联国内，泰说道，军队支配的程度很少有人意识到。情报分析，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不愿提出苏联军队相应权力的证据。苏联将军们十年来一直在发号施令。他们的手段是改革。军队在更现代化的同时，也变得更有权力了。情报报告表明，苏联军队的很大部分反对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假如存在这种反对力量的话，泰说，他相信苏联人将会进行欺骗。

凯西同意他的看法，苏联人是骗子，不能信任他们。

更为糟糕的是，泰说，他认为苏联领导层正变得愈来愈顽固。俄国正在变成一个等级社会。大约3000个家庭构成了一个贵族阶层，他们想继续当贵族。他们的夏季别墅及财产正传给他们的孩子，这表明他们不会放弃所拥有的一切。

苏联人丝毫不信任东欧军队，泰说。可能除保加利亚外，整个东欧都恨苏联人，东欧的领导人也对苏联迫使他们不得不购买旧的军事破烂而感到厌烦，但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力量日益增长，这非常具有威胁性。

泰说他刚去过土耳其，那里有人在策划动乱。

1978年12月，赶走伊朗国王的革命前六周，泰访问了德黑兰，他回忆了那一段经历。那里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站长要求派更多的讲法西语的特工。他并未得到这些人，几乎没有人能看出将发生什么。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泰避开警卫自己换上便装从使馆窗户爬了出去。他在外面转了三个小时。上午11时，所有商店都开了门，至中午当100万示威者拥上街头时又关了门，这些示威者煽起了反美狂热。这是一场漂亮的表演，它表明了真实的感情或良好的组织，或两者皆有。很清楚一股巨大势力在起作用，飓风即将到来。

随后，在美国大使馆，萨瓦克即伊朗的秘密警察首脑纳赛尔·默哈达姆准将将泰领到一间密室中谈了3个小时，要求给予防暴装备。伊朗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通讯线路怎么了？很明显这些线路已被破坏了，两国都已瘫痪。伊朗是情报界的一次可怕的失败，它值得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即使是现在。

凯西再次点头赞同。他不久离开此地，步下五角大楼E角的楼梯，走出大楼坐上等候着的汽车。

上帝呀，有许多事要做。朝鲜、中国、墨西哥、中美洲其他国家、中东、印度，当然包括苏联，还有伊朗。

国防情报局局长爬出德黑兰美国使馆窗户的形象很有感染

力，甚至很值得赞赏。凯西确定只有一种方法方能开展工作：他将主要国家列一名单并进行了一次调查旅行，视察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亲自考察他们做了些什么及他们知道些什么。

凯西和约翰·布鲁斯已查阅了一些个人档案，为凯西寻找一位主要看门人，即一个进行文件分类、协助其办公的行政助理。最后他们选中了罗伯特·盖茨，他刚担任负责苏联方面的国家情报官，并可直接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汇报。负责苏联方面的国家情报官是最重要情报领域的高级分析职务，但对凯西更有价值的是盖茨在白宫的工作经历。自 1974 年春季至 1979 年 12 月，盖茨曾被派往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参谋，他曾目睹了尼克松、福特及卡特年代的使用直至滥用情报界的情形。盖茨 37 岁，个不高，有着灰色的头发及愉快坦率的微笑，又有 14 年的中央情报局工作经验，正是凯西所需要的那类人。

在卡特年代，盖茨曾为布热津斯基的副手，戴维·艾伦工作。盖茨称艾伦为“斯特拉斯堡呆头鹅”，因为几乎必须将他的双脚钉在地板上才能使他集中注意力工作。每天下午上课时盖茨必须向艾伦灌输最近的情报并引出必需的决定以完成一天的工作，他把这称为“斯特拉斯堡课”。如果别人无条理或无头绪，盖茨是愿意协助的。

凯西做了一些调查。当盖茨在 1966 年参加中央情报局的职业训练活动时，他曾悲叹中央情报局充满了二次世界大战及战略情报局时的优秀人才，但他们却没有机会晋升至上层，除非你与政治有关联。但他却找到了机会。在向一个中央情报局的同伴约翰·史密斯诉苦后，史密斯向其父亲，杰拉德·史密斯——尼克松的军备控制主要谈判代表，介绍了盖茨。不久他被任命为军备控制代表团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

更为重要的是，凯西觉得盖茨有一些非正统想法很吸引人。尽

管是一个苏联历史博士，但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太学术性以致于缺乏争论。他说："如果没有人发现情报分析专家的大话或谎话，就不会有争议，也不会有压力。"争议和压力使情报分析专家更接近政策制定者。情报界人士必须知道政策制定者的忧虑所在，这并不是说要将判断写得迎合白宫的口味，而是要能早期发现障碍并提出警告。盖茨说情报界最大的失误是未能教育政策制定者们懂得情报的局限性。总统可能会想既然已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收集情报，就不应有未知数，但实际上未知数是存在的。

尽管盖茨是一位分析专家，但他曾有一次行动的经历，那次行动表明他遵守规定的意愿，其方式正是凯西所喜欢的。卡特的白宫想与古巴开辟关系，并派戴维·艾伦与卡斯特罗的两名高级情报官员在纽约会面。由于喧闹是最好的伪装，在盖茨陪同下，他们选择了市中心第五大街一家高级法国餐馆与古巴人会面。盖茨同意穿一件联邦调查局送的装有线式收录机的衬衣。当艾伦及古巴人争论古巴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驻军时，盖茨穿着联邦调查局的衬衣，如同一个人工话筒，笔直地坐着。

凯西与特纳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约翰·麦克马洪进行了一些讨论，助理局长是很重要，是转变的工具。麦克马洪是一个高大、开朗的爱尔兰人（1951 年被授予大十字勋章），留有 60 年代的长长的鬓角。尽管他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近 30 年，他并不是受过训练的秘密行动者。特纳任命麦克马洪任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以控制他不信任的行动处。凯西在阅读麦克马洪的个人档案时发现中央情报局的个人档案资料丰富。在 1951 年以总参谋部五处密码职员的身份加入中央情报局后，麦克马洪曾担任过行政及文件处理的官员。他曾任 U－2 飞行员的指挥官，并绕过了 70 年代的麻烦。当这一机构的声誉垮掉时，麦克马洪得到了提升。他曾任电子情报室的主任。电子情报是隐匿的来自雷达和其它非通讯设

备发射的重要情报形式。在他担任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以前，他一直为特纳物色情报界人选并考虑退休。

麦克马洪享有“警觉者”的美称。几年前，当中央情报局将众所周知的支持和资助几十个反中央情报局团体及试图披露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及行动者的出版物如《秘密行动信息简报》的那些人及情况加以整理后，麦克马洪大发脾气。“这些龟儿子，”他在一次高级助手会议上叫着，“对美国人自己搞间谍活动。任何人看到这些……你们会有什么感想呢？”

不过凯西喜欢麦克马洪的个性。他性情开朗，易于合作，并且看上去愿意服从命令。

使用更多的非官方掩护身份如何？凯西问他。派些人以商人、顾问等等身份去国外而不是呆在大使馆里如何？

麦克马洪列举了反对的理由：安全，管理，及中央情报局官员需要外交官身份去开展工作。

阿富汗行动如何？

这是个大规模的合作冒险行动，用船将武器先通过埃及运到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阿富汗抵抗力量的通道，沙特阿拉伯正在提供比中央情报局更多的资金。

凯西说这是个重要行动，或许是卡特遗留下的最重要的行动。里根总统将继续进行这一行动，或许会扩大我们的援助。这是与苏联交战的一个主要地点。

好的，麦克马洪冷冰冰地说，苏联的入侵是错了，是他们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但是他不知道美国政策的目的何在。它是否需要重新考虑？苏联军队似乎不会允许自己被打败，美国的每一行动都会引起苏联的对抗行动，使战争逐步升级。美国使苏联“流血”的政策会奏效吗？这种政策能维持住吗？我们是否对苏联已施加了足够的外交压力以使其撤出阿富汗哪？

凯西让他的竞选运动中的伙伴胡戈尔在局内转转做实地调查工作，听取汇报并尽可能多知道些。三周后，凯西问他，“好了，你想开展什么工作呢？”

“我想把工作交还给你。”他回答说。

“好了，这些是我要你做的工作。”凯西说。已确立负责行政的助理局长是最高层的三个助理局长之一，他说，其职位与负责行动及负责情报分析的助理局长相同。

2月13日，胡戈尔的新职位公布，出任负责行政的助理局长。他很快意识到这是项事务性的工作，负责所有的辅助工作包括中央情报局总部和世界各地的工作站的安全、通讯及后勤保障。这个职务很重要，但它不接触他所服务的中央情报局的真正情报工作及秘密。

2月下旬，凯西出席了老朋友雷蒙德·迪克的追悼礼拜仪式，迪克是华盛顿的一个律师，是共和党长期坚定支持者。仪式后，他回到中央情报局专车里派警卫叫哀悼者之一，斯坦利·斯波金同行。

斯波金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看上去像肥胖的维加斯赌场老板，他溜过来打开车门。

“斯坦，”凯西说，“谢谢你在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信上签名保证。你为什么不同我一起回去呢？”

斯波金进到车里，车开了。

“看，以前你两次拒绝我的邀请。”凯西说。他是指当凯西1974至1975年任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时斯波金两次拒绝任职邀请。“我希望你能来中央情报局工作，当总法律顾问。”凯西说，将会有许多棘手的法律问题。

斯波金说他对此有兴趣。在证券及管理委员会工作19年后他对那儿感到厌烦，那里没有真正的执法行动。

“情报行动与之不同，”凯西说，“他们是无情的和残酷的。”

“你为什么要干这些?”斯波金问。

“这正是我想干的,”凯西说,“我不想再赚百万美元了。”他补充说如果斯波金对该职感兴趣,他最好听取一下有关这一机构工作的全面汇报。如果你发现有些事情令你讨厌并使你无法按照自己的原则工作和生活,那就不要干。我们必须将祸水挡回去,我们应该慢慢、小心地做这一工作。

轿车驰进中央情报局总部。凯西下车后它又载着斯波金开回教堂。

凯西喜欢斯波金,他是那些少有的锲而不舍的政府官员中的一个。作为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凯西曾问过斯波金一个简单的问题:“斯坦,你开展工作需要什么?”为这一问,斯波金已等了多年。他需要有决定继续或停止进行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调查的权力,而凯西赋予了他这一权力。有了这一权力后,斯波金强有力地揭露了可疑的商业活动及海外贿赂活动。

斯波金表情严肃,与他相比,一队富有的公园街的律师们仅相当于一个资历很浅的律师。凯西很欣赏斯波金在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时所采取的方式。他会躺在椅子里,甚至闭上眼睛。但当发现不能容忍的行为时,他就会向前倾斜,睁开双目,从椅上跃起,在屋里走来走去,拳头在空中挥舞着并高声提出警告。他有时会双手扶在太阳穴上,大声叫着:“难以置信!”有时又会用敏锐的、深深的凝视或突然一笑来表示赞同。随后他会回到其哥伦布侦探方式——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似乎显得困惑。凯西清楚这完全是表演,但它常常使谈判的对手失去武装。

凯西上任的第一周很顺利,他被当做战略情报局的老手重返领导岗位。他想当国务卿的消息并未泄露,在局内普遍认为作为里根竞选运动的负责人他可以挑选任何职位,而他选择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或许没有任何部门的首脑能受到如中央情报局局长的

下属的敬重，几乎局内的每个人都使用尊称如“局长”、“凯西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或“先生”，这是局里的传统。尽管凯西每天只能看送出的几百份文件中的几十份，但每份离开兰利总部的文电开始都写着“局长圈阅”，随后是电报序号（如果是电文的话）、请求或命令并加盖最高首长印章。从海外工作站发往总部的文电都致局长。人们在走廊里碰到他时给他让路，凝目注视，近似于敬礼。

他的办公桌上每天都有一叠新材料。兰利行动中心的早报着重描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它装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另一个文件夹装着按照规定需他审阅的从大使馆及海外工作站发来的报告。他还会收到一份清新的印制精美的《总统日报》的副本，包括 10 页最重要的情报，它在每天早上送给里根、黑格及温伯格。另有一份比《总统日报》密级稍低但无疑也是最机密的代号文件称为《国家情报日报》的文件，送给政府中数百名高级官员——包括凯西。用蓝边文件夹装着的情报员的临时报告随时专人专送。还送些红色的大文件夹，标明“高度机密的天赋内情”——空中侦察的密码代号，里面包括卫生及其它侦察照像装置的报告。大部分的情报是综合性的，就是说有人将窃听、卫星、人工及其它报告和摘要加以汇总。有时，凯西会要全篇窃听记录或由下属自动呈上。每当他想看更多材料时，他要作的只是标明一下，随后就会提供相应的文件、总结或汇报。有时他不得不控制自己作为读者和业余历史学家的本能。录音常常很有趣，它们讲了很多事。

然而所有此类报告都奇怪地毫不关联。凯西发现自己常变得越来越迷惑了。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里”是指海外工作站。送回的报告显示有些工作站提供了东道国政府及所在国苏联大使馆的大量情报，但许多工作站送回些毫无意义的情报，常常是胡说八道。他希望能尽早开始他对海外工作站的视察。

在 3 月初，凯西飞向远东。那里他视察的工作站已开展行动，

建立了完整的系统对苏联在所在国的日益增加的存在加以系统的监视。在当地警察、东道国情报机关及移民和海关部门的协助下，这些工作站很好地掌握苏联人的出入境。他们通常会收到护照照片的复印件；一个带有相机及录像机的侦察小组会跟踪并监视特定目标；观察及拍照点会提供苏联重要人物出入的情报；特别搜集分队会进行电话及室内窃听。在特定情况下邮件检查也是可能的。情报站还有些"内线人物"，他们熟悉苏联目标并提供目标个人方面的情报。有几个情报站在东道国政府内有高层提供情报者，但缺乏真正有用的政治情报。

凯西发现行动官员们的能力自胜任到出色参差不齐，但似乎没有人想进行重大行动，这里的气氛毫无创造性。没有人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想妙的主意，列出真正目标并尽最大努力去招募人员或安放重要的窃听装置。情报站在等待机会，而不是主动出击寻找机会，还存在着犹豫和迟疑。

他所到之处，都伴随着自己的一队人马——情报站站长、他的警卫人员及通讯系统。凯西想树立自己的形象，他以前作为里根竞选运动负责人的形象已含蓄表明他在某些外交和国防政策上是里根的代表。

凯西回来后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美国的盟国和朋友希望美国重新担负起领导责任，他的海外情报站对他寄予厚望。

五

自从卡特和特纳在伊朗受挫以来，凯西读了在局内所能找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材料。他同许多人一样感到困惑不解。中央情报局干什么去了！美国情报界真的败到了如泰所说的地步吗？中央情报局怎么会忽略伊朗国王立场的不稳定、身体状况不佳及性格软弱这些情况呢？凯西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不再发生这种情况——在伊朗或其它任何地方。

中央情报局曾调查了1980年春季失败的营救人质行动，当时直升飞机的故障迫使取消了行动，那幅伊朗沙漠里飞机残骸的照片成了卡特软弱无能的象征。这次行动曾被想象为当时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约翰·麦克马洪的辉煌时刻，因为他在伊朗境内安插了约半打特工人员予以协助。凯西认为这太少了。人质被扣已6个月之久，中央情报局应该在伊朗境内安插多得多的特工人员。凯西向里根呈送了一份高度机密的有关营救行动的事后报告。它强调了这些特工人员数量的不足。

另一份以前为特纳准备的高度机密的研究报告《伊朗事后分析》详述了在整个伊朗悲剧中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标以“诺迪斯——仅特纳及少数高级副手和助手阅览”，它长达100页，分析了中央情报局如何忽略了伊朗革命及其原因。

这份研究报告由罗伯特·杰维斯完成，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被中央情报局请来作长驻学者。他作为研究决策失误的

专家，被允许接触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所能接触的所有东西——情报员的报告、所有国务院的往来电报、“仅供阅读”的文电及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记录等。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研究了两个文件柜的此类材料，并会晤了四位从事几乎所有送到白宫、国务院及其地方的情报分析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

《伊朗事后分析》以温和的语调开始：伊朗是一个很难治好的病人，即是一个优秀的人也可能治坏；一个像伊朗国王那样拥有大量军队和保安力量的领导人被非武装的暴乱者推翻几乎是史无前例的。随后这一研究分别分析了中央情报局对伊朗事件的处置情况。

情报界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没有作好走在突发事变前面的充分准备，分析专家们陷入日常琐碎事务上——总结电文或电文要旨以提供给《国家情报日报》或《总统日报汇报》。

・中央情报局伊朗问题高级分析专家欧内斯特・奥内说他得到上司们四五种暗示表示他们喜欢他的报告，但没有人真正问过他，没有人坐下来解决疑难问题；甚至没有人指出有问题需要解决。情报被降为非智力活动——获取许多事实并将它们抛给人们；如果情报要回答“明天”的问题，就必须作假设，而假设是一种推测，推测被认为是有害的。

・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电文内容只比报纸和电视报道多很少的事实。但类似于法国中左翼日报《勤蒙德》及英国中右翼《经济学家》日报的出版物却倾向于更具推测性和批判性，它们在出版一周后按正常邮件被送给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它们被认为是过时的消息，不屑一读。很少有外界刺激因素刺激分析专家的思维，很少有人提出他们可能错了，没有能力上的反馈活动。

・在德黑兰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内部对伊朗事件的变化意见不一致，但其成员间的意见不一并未反映在电文和报告里。

·德黑兰情报站的正式优先工作次序将苏联摆在首位，伊朗要获取核武器的努力摆在第二位，而其国内政治形势却被摆在几乎最后的位置上。在伊朗暴乱发生几个月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站方开始改变优先次序，但它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一场政治斗争即将进行。

·在伊朗国王的办公室或其电话里没有电子窃听装置，在伊朗国内没有任何重要情报来自于高技术设备。国家安全局曾建议在美国大使馆内建一个最先进的电子监听站，它可以窃听伊朗政府1/3的通讯，但它被美国大使威廉·苏利万拒绝了。苏利万认为通过他与伊朗国王的直接关系及由于"萨瓦克掌握在我们手里"，他可获得充足的很好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在伊朗国王身边没有雇佣人员，因为很明显那太危险了。中央情报局错误地选择了反对派组织并收集其情报。它在温和的中产阶级反对派组织全国阵线中安插有情报员，但并未意识到中产阶级的力量是多么的小。如果注意到中产阶级力量有多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会使工作站的注意力转向教士们，真正强有力的反对派组织。

·在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或军事情报机构内部进行很多内部通讯联系，但在这些机构间却很少有通讯联系，例如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之间即是如此。

·没有一种对数据仔细并考虑其它解释的程序，没有迫使分析专家们仔细整理支持其它结论的证据，没有对重要事情进行仔细分析，没有鼓励推测的制度。

·情报站人员似乎认为在现在一个宗教反对派是不会变成一个政治反对派的。中央情报局及大使馆并未意识到或考虑到伊朗民族主义可能会转向反对美国，尽管这一答案很容易从教士们那里学到，这些教士们认为伊朗国王是百分之百的美国造，是华盛顿和中央情报局控制的工具。

·循环论证是最常见的分析特征。它基于这样的事实即伊朗

国王有保安和军事力量，如果必要国王会使用它。由于伊朗国王未使用武力，继续分析就是，反对派没有构成明显的威胁。这是个无法打破的圈子。但未问的问题是，是什么妨碍了伊朗国王应用武力保住政权呢？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中央情报局不知道伊朗国王患有癌症正在接受治疗，这可能导致了他的优柔寡断。

·报告中所用的词汇及词组在不同的人看来有不同的含义，例如“伊朗国王将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在很多人看来是他将用武力平息任何群众叛乱，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他将改革并收敛其暴虐统治。

·中央情报局一份1978年8月的报告中说：“伊朗并不处于革命或革命前的状况。”在1978年11月22日，一份报告明确断言：伊朗国王“并未丧失能力和优柔寡断”，而且总起来说“他准确地把握着现实”。由于伊朗局势的演变，使那一年的《国家情报判断》未能完成，但在其早期的草稿上特纳的唯一评述是：“如果苏联入侵伊朗会发生什么？”

伊朗悲剧证实了凯西长期坚持的观点之一：情报不能坐等；必须尽最大努力使政策制定者得以采取行动。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希望伊朗国王使用武力镇压街头的暴力者，而国务卿万斯反对使用武力，总统难以决定。然而症结在于除非美国总统告诉伊朗国王做什么，否则伊朗国王是不会行动的。卡特的犹豫不决，伊朗国王的迟疑，导致了革命得以兴旺并最终取得胜利。

凯西决定需要对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进行大改组。一些领导需要予以重击甚至赶走。凯西还必须更换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约翰·麦克马洪，他对行动所采取的谨慎态度不应传给白宫。

在一次麦克马洪与艾伦及其副手海军退役少将巴德·南斯的会议上，南斯曾建议中央情报局发动一次秘密行动破坏位于埃塞俄比亚海上的浮动干船坞，因卫星照片显示苏联总是有一艘驱逐

船或护卫船在干船坞上。

"决不能，"麦克马洪说，"我们不应卷入那些，"那将是战争行为。

会后，艾伦对南斯说："凶猛的大象现在变成了一只鸡。"

凯西决定让麦克马洪担任分析部门的首脑。

霍梅尼成了白宫会议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有一种情绪认为如果有可能应将其除掉。在与总统进行讨论后，总统似乎较通常更加关心，他要求凯西研究一下可否采取秘密行动推翻霍梅尼并由利兹·巴列维，已故伊朗国王的小儿子取代。当凯西在兰利向大家提出这一想法时，所有的面孔都变得灰白。伊朗是一个脏孩子，巴列维家族更脏。行动处无人愿意搞此类行动，国务院也拒绝作此事。但凯西理解总统的用意，觉得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他所能提供的最好不过是一项秘密行动指令，授权中央情报局与伊朗境外的不同反霍梅尼团体进行试探性谈判，以确定如果有的话，哪一支会成为有威胁的反对派力量。凯西首先向白宫呈交了必要的总统指令，随后总统签署了这一指令。

当凯西细阅当前情报及旧文件时——他喜欢阅读旧文件，他的注意力始终被那个穷困的农业小国萨尔瓦多所吸引着。

萨尔瓦多——"耶稣基督"，西班牙征服者所起的名子，有约450万人口，是中美洲领土最小的共和国，其面积及形状与马萨诸塞州相似。它卧临太平洋海岸，似乎安睡于中美洲之腹，除经巴拿马运河外，与古巴没有直接海上通路。但萨尔瓦多国内共产党叛乱力量日益增大。如果美国后院失守——或如果里根所称的"前院"，将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凯西需要知道谁在支持萨尔瓦多的左翼叛乱分子？军事援助从何而来？政治援助呢？其通讯线路如何？这怎么在美国人的眼

睛底下发生的？如何制止？

里根命令将美国军事顾问的数量从 20 名渐增加至 50 名以上以帮助萨尔瓦多政府。新闻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人数上，似乎这是支测量新政府好战温度的体温计。人数是新闻媒介的绊网，如果美国准备踏入另一个越南时，将发出警报。

对凯西来说问题决非如此。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显示成飞机的武器已通过萨尔瓦多邻国尼加拉瓜运到萨尔瓦多叛乱者手里。他看到了卡特任内的报告中绝对可靠的证据。在卡特离任前两天，有一份要他签署的备忘录，上面说美国不应对尼加拉瓜提供援助，因为“有可信和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尼加拉瓜正在支持萨尔瓦多的叛乱者。这些证据来自意外地获得萨尔瓦多共产党总书记沙菲克·汉德尔的日记及文稿，他们详述了去苏联、东欧、其它苏联卫星国及古巴的旅程，并达成协议用船通过古巴及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运送武器及药品。从萨尔瓦多叛乱者手里缴获了美制 M－16 步枪，其号码表明它们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丢在越南的。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例证，它勾画出了共产党的全球阴谋，与凯西的预言相符。苏联、古巴、北越、东欧及尼加拉瓜都直接插手卷入了指向萨尔瓦多的武器供应渠道，整件事绷得如鼓一般紧。

卡特未签署这一备忘录，于是这件事被留给了里根。在卡特政府任内最后一年，他曾艰难地奋斗并赢得了国会批准对尼加拉瓜的 7500 万美元的援助，但国会要求在援助进行前总统必须证明尼加拉瓜不再支持中美洲任何地方的叛乱，卡特已接近要实施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援助。

中美洲真正的问题在于尼加拉瓜及其诞生 18 个月的马克思主义政府。尼加拉瓜领导人是桑地诺运动成员，这一运动以牺牲的游击队领袖奥古斯特·桑地诺而命名，桑地诺于 1934 年被索摩查家庭的第一个统治者杀死。尼加拉瓜的土地面积七倍于萨尔瓦多，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东临加勒比海，西靠太平洋，战略地位

十分重要。

凯西有趣地发现在桑地诺掌权后的头六个月内，卡特总统曾签署高度机密的总统指令，授权中央情报局向桑地诺政权的反对者提供政治支持——提供资金及支持以鼓励政治反对派，提供新闻纸及资金以使报纸《拉·普伦萨》继续存在。这一行动的动机是反对一党统治，它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行动计划，用以支援桑地诺分子的民主对抗力量——发展与那些被认为接近苏联及其路线的政党和个人相对抗的力量。

这一秘密行动目的在于建立中央情报局与政治中心的联系，使反对派存活下去并保证中央情报局能在新领导人或新政府中有朋友并保持接触。目前为止这一行动已花费了数十万美元，但对凯西来说它的重要性更是有象征性意义，表明上届政府起码已看到了桑地诺政权的危险性，已悄悄地采取了反对他们的立场，并使非左翼人士相信美国站在他们一边。

凯西现在发现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在桑地诺运动内没有成功的情报渗透，也无优秀的情报员。右翼独裁者阿那斯塔西奥·索摩查的情报机构曾进行了成功的渗透，但当他逃离这个国家时，情报界的文件被丢下了并落入桑地诺运动手中。桑地诺运动随即清除了索摩查的“合作者”，他们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情报来源，这使凯西想起了中央情报局在伊朗依赖“萨瓦克”的境遇。凯西发现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在整个第三世界过多地供养了东道国情报机构或那些与统治者利益相一致的情报人员。他需要“单系”的人才——那些完全由中央情报局付酬和控制的情报员，而不受那些东道国掌权者的想法及财富的支配，这一点在那些不稳定地区如拉丁美洲及非洲尤为重要。

有情报显示古巴已深深地渗透进了尼加拉瓜政府，约500名古巴人已牢牢地盘据在尼加拉瓜军队、情报机关及重要通讯设施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尼加拉瓜很活跃，其主席雅西尔·阿拉

法特已访问了该国。另外，凯西发现整个共产党世界在那里都有积极的活动——苏联，北朝鲜及东欧集团国家。

尼加拉瓜已成了萨尔瓦多叛乱者的安全区——一个在游击战争中可做任何事情的地方，它可用来休整军队，寻求庇护，进退自如，而通常对游击战争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胜利两个月后，桑地诺领导者们秘密开了三天的马拉松式的会议以提出他们的目标。其国内报告翻译成了17页，被称为“72小时文件”。它充满了诸如“阶级斗争”、“党是先锋队组织”、“卖国的资产阶级”及“革命的国际主义”，桑地诺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的疯狂的敌人，人民的斗争将一定取得胜利”。

它包含了一个坚决的声明，即桑地诺运动要支持中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凯西相信他们有其信念、哲学及方法去实施这个看法。

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劳伦斯·佩祖卢认为尼加拉瓜问题至少是可控制的，甚至于或许通过外交手段可以解决。佩祖卢是一位55岁的职业外交官，他认为桑地诺分子是一群甚至不能胜任经营街头小店的孩子。而事实上大多数桑地诺运动领导人在参加反对索摩查的斗争时年仅十几岁，他们有勇气有毅力，并取得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反对索摩查的胜利，在毫无管理国家蓝图的情况下取得了政权。佩祖卢是一个研究拉丁美洲的专家，承认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知识界倾向马克思主义。但这些人很容易打交道，对于一个外交官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过分认真地对待他们的主张。他知道，有时不得不原谅美国的某些言辞，特别是从新国务卿口里说出来的。佩祖卢将桑地诺运动看成一个可解决的问题，用外交术语，或佩祖卢的术语来说，意味着用胡萝卜加大棒。他曾努力促进美国在1980年对尼加拉瓜的

7500 万美元的援助。这给了他胡萝卜。他紧密注视着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毫无疑问桑地诺分子正在，用他的话说，“传播花粉”——帮助其它国家的叛乱者，如萨尔瓦多的叛乱者。他在 1980 年向桑地诺运动领导人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吉默·维劳克，尼加拉瓜农业发展部长及桑地诺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告诉佩祖卢，“这不关你的事”。

“很坦率地说，”佩祖卢回答说，拿出了大棒，“我曾花了 10 个月努力争取这倒霉的钱（7500 万美元），如果你采取这个态度的话，滚你妈的。”

维劳克辩解说尼加拉瓜有实行自已外交政策的权力，美国援助不应用来讹诈。

佩祖卢认为尽管维劳克比其他领导人权力小，但他是桑地诺运动领导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及最聪明的。但他可以带回佩祖卢的信息，在佩祖卢看来，他是最有礼貌的。

“你们有自己的主权做你们想做的事，”佩祖卢说，“而我们有我们的主权做我们想做的事，那就是不出力也不给钱。”

佩祖卢觉得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正在进行争辩，既同他也同兰利总部争辩。他们认为看上去及走起来都像鸭子的东西就是鸭子。因而如果一个桑地诺分子是共产党员，那他或她必然受古巴及苏联的控制。在 1980 年有关桑地诺运动跨越边界输出革命的最初情报质量不佳——是一些未经明确证实的第三者的情报来源，没有照片，没有文件。在里根竞选胜利后，当萨尔瓦多共产党领导人汉德尔泄露机密的文稿落到中央情报局手中后，佩祖卢直接找托马斯·波杰这位很有权力的内政部长，问他谁在帮助萨尔瓦多叛乱者。

“你知道，佩祖卢，”波杰回答说，“你在作无用功。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朋友？你们这些蠢货！"佩祖卢叫了起来。随后开始了10次精疲力尽的对话和会谈。在这些场合佩祖卢想首先使桑地诺运动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政府参与了援助萨尔瓦多叛乱者，然后让他们看到这一行动的后果。对里根新政府来说，他们的参与将是道德上的罪恶，是一条准线将桑地诺运动无可挽回地划入了俄国—古巴阵营。

二月中旬，国务卿黑格召佩祖卢回华盛顿进行磋商。对尼加拉瓜援助剩余的1500万美元已中止但并未取消。佩祖卢觉得应该这样做。这是桑地诺运动的唯一经济力量，并且他相信他的激昂演说及叫嚷至少引起了桑地诺领导人的注意。

当佩祖卢抵达华盛顿时，他读了一份为黑格准备的秘密的供选择行动方案的文件。有三个可选择的方案，所有方案都要求永久性地取消对尼加拉瓜的援助。佩祖卢告诉黑格，这些选择方案实际目标都相同。必须有另一个方案，佩祖卢称之为"零点方案"，意思是说不再改变。这就是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使之保持凶猛的势头，已有许多可靠迹象表明经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的武器已经减少。经过长时间讨论后，黑格说，"我将采用零点方案"。

国务卿将大使带到白宫，在那里佩祖卢对里根说仍有可能同桑地诺运动打交道，外交手段正在起作用。里根提出美国的过分卷入将使问题复杂化时，佩祖卢感到很受鼓舞。里根引用了一位未指明的墨西哥朋友的话："不要犯使中美洲问题美国化的错误。"

后来，佩祖卢告诉黑格他们不应对某些基本事实自我哄骗：桑地诺运动与萨尔瓦多叛乱者关系密切，这不会改变因桑地诺与革命的密切关系，更不会为1500万美元而出卖这种关系。但美国可以改变它的某些行为，进行工作以阻止向萨尔瓦多叛乱者输送武器援助。黑格说他能理解。

"否则你要花费巨大精力将这些家伙赶走。"佩祖卢补充说，暗

指未讲的方案——一次秘密准军事行动以推翻桑地诺政权。"并且要完成它你不得不进攻一支较强的军队，他们很勇敢——你不得不发动一场很大的攻击行动来推翻他们，你知道我不希望它发生而且我认为我们不能那样做。"佩祖卢补充说，新政府的保守及反共立场可能会使桑地诺运动认识到美国是认真的和不屈不挠的。

"噢，不，我们能处理好这些。"黑格回答说。

黑格受基辛格及尼克松的训练，知道如何玩弄输赢的游戏。他曾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目睹了美国在朝鲜及随后在越南的失败，他认为美国败于意志不坚定。建议或情报可能是错误的，但真正的问题是意志的崩溃。现在他是这位未受过外交事务教育的新总统的讲解官，必须向总统灌输这些问题。

黑格正在注意尼加拉瓜以外的东西。他激昂地辩论说必须采取措施阻止古巴向外输送武器，他要求进行封锁，"封锁武器的源头"，他在白宫的会议上请求说，并作了一个"标记"。

"这是你能获胜的一次行动。"他对总统说。

如同政府高层中的其他人一样，凯西表示反对。米斯、贝克及丹佛担心黑格会引起战争升级并使公众认为里根将使美国在军事上卷入中美洲而感到恐慌。他们希望总统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经济改革及允诺的税收改革。一场国际危机或一次军事对抗，尤其是与古巴间危机或对抗，会带来如同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的副作用，从而延缓国内的进程。

是走中间道路的时候了，凯西喜欢作些介乎于军事行动如从海上封锁古巴及毫无作为之间的事情，秘密行动恰适合于这种目的——缓慢的、持续的、有目的性的、秘密的行动。他拟就一份总统指令，他并不将目标指向动乱之源，古巴或其工具尼加拉瓜，而是指向受到威胁的国家萨尔瓦多。这项总统指令要求进行宣传上、政治上的支持——承认其合法权力并对萨尔瓦多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及军官们给予财政援助。

3月4日，总统签署了这份高度机密的总统指令。

美国援助的受益者之一是55岁的民间工程师，曾在美国诺特利·丹姆大学受教育的约瑟·拿破伦·杜瓦特。他在文件中被列为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并有一个密码代号。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包括从非正式情报员，即他本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向中央情报局输送情报，到成熟的"受控情报员"，即由中央情报局付酬并指挥的情报员。两种情报员之间有着明显的空白，而杜瓦特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好情报来源，但他是一个自立的人决不愿受人控制，可能并不知道他正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凯西欣赏这种方式，一个强硬的领导人不会在中央情报局的棋盘上挪动，想做到这一点也是不现实的。现在，杜瓦特正领导的美国支持的文人—军人政府，正统治着萨尔瓦多。

回到兰利总部后，博比·英曼上将被安排在七层楼上紧邻局长的庞大的副局长办公室里。两个办公室都俯瞰葱翠的弗吉尼亚农村。所能看到的只是树顶，给人一种中央情报局隐于一个大森林中的印象。

3月10日，星期二，《纽约时报》头版标题是《情报组织正在寻求能对美国公民收集情报的权力》，这使英曼深为担忧。

这篇报道报告了有关一份新行动命令的建议，它将解除对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进行间谍及反间谍活动的某些限制。有人已得到了一份由中央情报局起草的长达16页的修改行动命令的建议，英曼前一天刚刚看到。他曾认为这份草案表达中央情报局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将会招灾惹祸。

在新政府上任伊始，凯西就让中央情报局的法律工作者拟出一份新的行政命令。它就是已提到的那份草案，它建议废除由福特和卡特加于中央情报局之上的种种限制。这份草案取消了司法部对秘密行动进行复审的权力，它还含蓄地表明将授权中央情报局

在美国国内进行秘密行动，并解除对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进行电子窃听及秘密记载的禁令。英曼马上意识到已难以挽回形势了，民权活动分子将发动一场进攻，而这将给政府内部强硬派更多的理由来守卫其阵地。

英曼看到隔壁凯西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堆了一摞摞的文件，现在，使他苦恼的是，他发现凯西将其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标记于这一行政命令草案上，以表示他已看过并表示同意。英曼怀疑凯西并未读过草案或至少未深入思考。凯西局长曾对旧行政命令应用贬义形容词如"暗中的"等等表示不满，他需要一些褒义性的词汇。英曼决定表现得好像认为该草案过分似的，他也明白如果一旦类似文件得到批准，他将不得不辞职。

只有公开地、惹人注目地表明中央情报局的立场方能将该草案扼杀于摇篮中。凯西正在远东，英曼任代理局长，因此，他未与任何人商量便邀请新闻界到兰利总部参加一次中央情报局历史上少见的新闻发布会。

英曼身着军装，他将该草案列为"最初草案"，只不过是一些想法及初步意图，"据我所知，"他说，"我们并未打算沿该方向继续进行。"

在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大为恼火。但米斯在听取艾伦汇报后，多少有点赞同英曼的做法。他说政府不会让中央情报局参与国内间谍事务。英曼断定米斯是自己更重要的同盟者。

凯西回来后，他责备英曼不就新闻发布会的事向他请示。他觉得英曼夸张了新闻界引起的公众对中央情报局将对美国人搞间谍活动的担忧。但是，他补充说，他并不希望进行此类间谍活动，对外国人的间谍活动尚且远远不够。

3 月 17 日凯西在纽约圣·帕特里克纪念日仪式发表名为《关于爱尔兰人、上帝、受难及爱国主义》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宣称："有些事是对的，有些是错误，有些永远正确，有些永远错误。"

约翰·布鲁斯，现在仍在帮助凯西工作，他误解了凯西上述话的含义。人们有时表达理智，有时表达感情，人们很少同时表达两者。布鲁斯意识到那是凯西对两者的表达。这个坚韧、冷酷甚至强硬的爱尔兰人确信自己正区分正确与错误。

几天后，凯西邀请再度回华盛顿的佩祖卢到办公室商谈有关桑地诺运动的问题。佩祖卢刚被告知美国对桑地诺的援助将完全停止，他感到很不愉快。他这次在国务院争辩说美国将失去手中的牌，关上邻居的大门将是灾难性的，停止对话也是灾难性的。但凯西需要他的估价，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桑地诺分子或拉丁美洲了。

当佩祖卢抵达中央情报局总部时，受到了仍是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及美国驻马那瓜大使馆的高级拉丁美洲问题专家及外交官奈斯特·桑切斯的迎接，桑切斯也是在佩祖卢手下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

桑切斯警告佩祖卢，凯西局长的此类汇报会很少超过15分钟，因此你要简单陈述一下你的事，否则他会不耐烦。如果你说得更长的话，他就会示意让你走。

"你能与桑地诺分子打交道吗?"凯西问，"他们怎么样?"

"是的，他们对我们的压力有反应，"佩祖卢说，"但他们很狡猾。桑地诺的领导层不稳定，许多其国内的阴谋可供利用。"

"如果你是卡斯特罗，你将在统治集团中支持谁?"

"奥尔特加兄弟。"佩祖卢回答说。这是指丹尼尔·奥尔特加和他兄弟，胡伯特·奥尔特加，国防部长。在佩祖卢看来，古巴人或许会依赖鲍奇，一个腐化及不稳定的人。佩祖卢补充说，"卡斯特罗正在努力干着，他所到之处均不会松手。"古巴人在尼加拉瓜到处都有，他们是些讨厌的家伙而且很笨拙。鲍奇最近向佩祖卢抱怨古巴人并讲他们的笑话，他在与访问途中经过马那瓜的一位苏共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愤怒地抗议说他们像唯命是从的党徒一样被古巴

人指挥着。

“桑地诺分子们想要什么?”凯西问到。

“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之一是与美国建立的正常关系。这已从他们对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所采取的措施得到了证实。”

“输送武器已停止了,是不是?”凯西问到。

“确实是的,”佩祖卢说,“现在没有任何武器通过尼加拉瓜运向萨尔瓦多,因为已关闭了输送武器所使用的主要机场。大使解释说,飞机已退役,哥斯达黎加飞行员所组成的运输网已遣散。”

麦克马洪、桑切斯及情报站站长表示同意。许多背叛者均证实这一点,一个飞机坠毁的哥斯达黎加飞行员谈了援助网的许多许多情况。萨尔瓦多援助网的古巴协调人已离开,唯一保留的是一个无线电联络网,它似乎正在工作,而且总有可能已开辟了其它途径输送武器而未被发现。

这一说明惹恼了佩祖卢,他说他们只应该涉及已知的东西,现在实际上中央情报局的全部情报,都未表明有从空中、海上或陆地输送武器的行动。

包括凯西在内的每个人都赞同他的看法。

“然而,”佩祖卢说,“我也不想哄骗你们,桑地诺分子将永远对萨尔瓦多叛乱者怀有感情及表示同情。他们将与他们站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安全地带,照顾他们的伤病员,允许他们通过尼加拉瓜去古巴或去其它地方。但如果我们继续表明其代价,可能会使他们继续停止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

凯西说:“但这个国家正在成为苏联、古巴等国的一个贼窝。”这是他的忧虑所在。

“我们应保持冷静,”佩祖卢辩论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受我们或他们的花言巧语所驱使。”

“桑地诺运动的控制有多强?”凯西问道。

“它对该国的控制正被削弱。”佩祖卢说。他又小心地补充说,

"其削弱并不是由于革命，而是由于其领导人名声及威望的降低而致。如果你认为革命不受欢迎，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革命很受欢迎并且这些家伙都打着革命的幌子。你越攻击革命，你就越增强他们的力量。"索摩查王朝使我们蒙受了耻辱，对革命的批评——尤其是美国——被认为是支持旧王朝，支持索摩查。桑地诺分子要防御任何反革命的行动，因而他们成了偏执狂。他们是战士，他们曾被解除武装达数年之久，因此他们喜欢坦克和大炮，它们使他们感到安全。他们要搞中央集权，古巴人使他们确信这是必由之路，是保住革命果实的方法。

"我们是否应该将这些家伙赶下台？"凯西问到。实际是问佩祖卢是否拥护采取秘密行动推翻桑地诺政权。

"如果你想走那条路，"佩祖卢重复对黑格所说的，"你将不得不付出比你想象的要多的代价。桑地诺分子是中美洲的最优秀的战士。"

经过近一小时的谈话，凯西暗示他听的已足够多了。

佩祖卢与行动官员们一起离开了凯西的办公室。麦克马洪表示了自己的喜悦，他很高兴凯西对这次谈话如此感兴趣，他本人不赞成任何形式的秘密行动，佩祖卢的某些话正是他一直想说的。

佩祖卢认为凯西是一个很好的听众，非常有理性。但他知道原始情报资料可能会产生假情况，由于其看上去写在纸上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很明显凯西很关心古巴在尼加拉瓜的存在，这自然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军事情报机构已正式指示或"下达任务"，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此类的情报。情报任务常引导分析专家们描述错误的情况。500名古巴人被看成是庞大的，在伊朗事变后，没有人想再忽略下一次灾难。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其战斗力。在佩祖卢看来，古巴的存在由于尼加拉瓜领导人态度而大为削弱，波杰甚至嘲笑过古巴人。但嘲笑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情报的论题，尽管有时佩祖卢觉得它应该是。

佩祖卢返回马那瓜，国务院在华盛顿已宣布暂时中止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尽管国务院对尼加拉瓜停止向萨尔瓦多叛乱者提供武器表示欢迎并说在过去几周没有证据表明有武器通过尼加拉瓜运往萨尔瓦多，但美国援助的中止激起了强烈的反美情绪。桑地诺运动的报刊称这一决定是“美国人的经济侵略”，其电视说，“这些战争贩子的最终目标是推翻我国的人民政权”。

佩祖卢确信美国政府已撤回了它所拥有的影响，使他的说服工作几乎变得毫无价值。现在大使已毫无作用了。

任职 2 个月 10 天后，里根总统遇刺，约翰·欣克利将子弹射入距里根心脏仅一英寸的地方，子弹经外科手术取出。“亲爱的，”他对南希说，“我忘记闪避了”。他对医生开玩笑说：“请告诉我你是共和党人。”他所表现出的勇气及乐观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当里根两周后于 4 月 11 日出院时，允许镜头靠近拍照，记录下这位 70 岁总统的奇迹般的康复。他身着一件红色羊毛衫，尽管脸略变瘦，但精神令人振奋。他与南希手挽手，另两只胳膊在空中挥舞着，如同 9 月前在一个高台上，里根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的情景。那著名的微笑依然完美无损，如同总统权威一样。

里根的亲密助手们很快知道这是演戏。第二天上午总统从其楼上的卧室走向相邻的办公室时，他表现得完全是一个老人，步履蹒跚，面色苍白，身体很弱。看到的人吓了一跳。里根走进黄色椭圆形办公室里，蹒跚走到椅子前，瘫倒在椅子里。

他焦燥地低语了几句，随后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他看上去身体很弱，这一暂停仍不够，他的手抓向人工呼吸机，他那受伤的肺依赖呼吸机。随后几天，他每天只能工作或保持注意力一小时左右。

米斯、贝克、丹佛及其他能接触总统的几个人非常担忧。这本是里根总统任期的开始阶段，但现在似乎到了他们所熟悉的里根

的结束阶段。他那亲切、充满信心的声音受到了永久的损害，他的嗓音沙哑，缺乏自信，有时他为疼痛所征服，一直感到不适。他的助手们开始考虑他作为一名残疾总统的可能性，那意味着里根在其任期一开始，就成为类似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期之末时的情况，一个看守总统，而他们将降为——或升为——威尔逊夫人的工作班子。

所有的高级助手都决定保守这一惊人的秘密并不流露对自己未来的疑问，至少等到遂后明确时。那些担负情报或法律职务的助手如凯西，想到了总统的易受攻击性，世界局势明显地不稳定，有必要采取任何特别安全措施来保护这一国家及其机构。这些人想到的远比总统受伤要多的多。

在 1981 年 5 月 30 日，总统遇刺当天，许多事变得乱七八糟，表明人及体制都有缺陷。当有人问“谁在指挥政府工作”时，发言人莱利·斯皮克斯嘀说什么“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一问题”。黑格在“紧急指挥室”里看到这一拙劣的表演后，跑到镜头前，读错了宪法而将自己的总统继任顺序摆在副总统之后(因副总统不在华盛顿)。他说：“因此现在，我在这里，在白宫指挥。”

在医院里，里根的军事侍从，那位执行紧急战争命令并携带用于总统发射核武器密码和命令的军官与联邦调查局发生了一场未能取胜的冲突。联邦调查局要获取里根的衣物以作为可能的证据，他们拿走了里根放于钱包里的个人密码卡。这个卡含有密码，用于紧急情况下总统向部队发出口头命令的通讯难以保证时使核袭击的命令生效。官员们坚持认为美国核力量的指挥不应出现空缺，但这一混乱状态表明了核武器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一个缺陷。

现在总统的状态增加了行政混乱的感觉。慢慢地里根的嗓音恢复了，经一段时期治疗表明他正在恢复。在白宫的 10 天休息对其恢复很有帮助，在 4 月 21 日，他发表电视讲话说明其削减开支及税率方案，第二天他会见了各大通讯社的高级记者，看上去恢复

良好。但他不能坚持太久，助手们仍很担忧。

4月25日，星期六，总统去马里兰州的戴维营度周末。在山间的春天气息中休息几天后似乎创造了奇迹。总统返回华盛顿时他很快恢复了，危机消除了。但每个曾看过或知道当时情况的人都曾焦虑过。

从里根政府内部来说，各部门的观点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但其危机感，即任何人或任何国家都可能袭击美国——恐怖主义分子、苏联人的突然袭击及其他敌人——已成为政府政策中一个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准则。

对这一点最坚信、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中央情报局局长了。

凯西很快意识到他的预警职责的一部分是保护总统。每当有情报报告有关针对里根的阴谋——不论其如何希奇古怪或不太可能，凯西定要追查。行动人员及分析专家常反映上述报告不必认真对待，通常不过是坦桑尼亚一个酒吧里两个家伙说他们想刺杀里根。

“派一队人去调查一下。”凯西在每份类似报告上都命令道。

凯西在中央情报局为约翰·欣克利建了一套完整的文件。他知道在肯尼迪暗杀案20年后，仍对李·哈维·奥斯瓦尔特与克格勃的关系存在疑问，这次他想对约翰·欣克利彻底查明，未发现线索，他进行了复查，除亲自录音外他尽其所能，仍无特殊发现。但这次暗杀企图使凯西更加关心正在写的《有关苏联和恐怖分子的特别报告》工作。这次他想能保证中央情报局对这方面的调查不留尾巴。

凯西对发表在3月1日《纽约时报》封面的一篇报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题目是《恐怖主义：跟踪其国际网》，作者是克莱尔·斯特琳。它是从一本名为《恐怖网》的书中改编而来，那本书给黑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开始用大字摘用黑格所宣称的苏联参与

了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话。

斯特琳悲叹地指出即使是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也告诉记者黑格的指责“不过是一个冷战老兵抑制不住的情感”及“没有这方面的铁证”。凯西对斯特琳的结论感到很吃惊：“有大量证据表明苏联人及其代理人在过去10年为旨在扰乱西方民主国家的国际恐怖网提供了武器、训练及庇护所。”她断定由古巴、克格勃教员，巴勒斯坦人及红色旅组成的“国际游击队”正在密谋之中，在不同的恐怖训练营地举行会议。

凯西在这篇文章的复印件上作了标记。并带着它回到办公室。他请约翰·布鲁斯来共商此事。他说看上去似乎斯特琳肯定有那些计划实施暗杀和爆炸的人名、行动时间及其位置。他的三份恐怖主义报道是有关土耳其恐怖主义、北爱尔兰共和军及意大利“红色旅”，每篇报道都说明他们与克格勃直接有关。

“她的文章显示新闻界已走在了中央情报局的前头。”凯西说。他要求在总部的专家作出解释。主要的分析专家及行动专家被召集到一起进行研究。

文件在房间里传来传去，兰利总部的专家们在斯特琳这篇九页的文件里对各部分进行标记，试图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文件与斯特琳的文章进行对照，看两者有无关系。斯特琳曾写到，在南也门，“有一个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研究院之类的营地”，去该学校的外国人包括不同恐怖组织的成员，其中有“红色旅”成员。由于南也门“是由克格勃严密控制下的一个苏联卫星国”，因而其含义非常明显：“红色旅”是苏联的代理人。

翻遍所有的中央情报局文件，专家们只发现一个例证，一篇报告指出“红色旅”的一个成员曾访问过南也门的一个营地。但斯特琳文中的语气和含义断定“红色旅”与克格勃有某种联系。何时？何处？如何联系的？当然一个“红色旅”成员的访问可能具有提示性，但没有更多的发现。如果要求作出认真的情报结论的话，其结果等

于零，与两个歹徒彼此在街上或在酒吧里相遇没有区别。疑问仍然存在，他们做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什么计划？

秘密行动者们指出斯特琳的分析方法是十分荒谬的。她的判断来自于有缺陷的推理——一种类似于麦卡锡主义"循环推理"。在她对土耳其、北爱尔兰及意大利的分析中，经过一些逻辑跳跃，它们成了苏联的"靶子国家"。每个部分都提到一次克格勃。

同时，负责苏联的国家情报官——美国情报机构中研究苏联的高级职位，在对现有的有关苏联卷入恐怖活动的情报进行分析后完成了相应的《特别报告》的草案，草案强烈反对斯特琳的观点。凯西感到吃惊，完全排除苏联卷入了恐怖主义活动，说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苏联鼓励恐怖主义活动。

"读一下克莱尔·斯特琳的书，"凯西说，"忘掉这些废话。"他又尖刻地补充说，"我花了13美元9角5分买了这本书，它告诉我的远比你们这些我一年付5万美元的家伙要多得多。"他又说，苏联的插手不会直接表现出可以成为法律依据的迹象。他觉得，基于苏联人的意图，当理解到恐怖主义将会扰乱西方时，苏联愿意与恐怖分子合作并促进恐怖活动，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他说："认为证据将用盘子奉上是妄想，你们必须作出判断。"

英曼表示同意，他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草案离了谱，他说："它读起来像是被告的辩护状。"

凯西也收到国防情报局局长泰将军的一封措词激烈的信，对这一草案表示不满。泰认为，即使无法加以证实，几乎可以保证，苏联人卷入了恐怖主义活动。苏联人大声叫嚷他们未卷入，对泰来说这足以证实恰恰相反的一面。其次，泰说，有一个严重的反间谍问题：为什么相信那些说苏联未卷入的情报？这些情报员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他们要背叛苏联人？

凯西喜欢泰的强硬立场。这不是在法庭上，毫无理由假设苏联

人是无辜的。凯西请泰将军让国防情报局准备自己的草案。泰对有这一机会很高兴，让一位持强硬路线的分析专家进行这一工作。可以预料，国防情报局将会写出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判断草案。

凯西得到了一个和局，两个草案相互对立——中央情报局的草案认为苏联人基本未卷入恐怖主义活动，而国防情报局则认定苏联人有罪。

几周后，凯西收到林肯·戈登的一份备忘录。林肯·戈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前校长，是中央情报局高级复审班子三名成员之一，他们主要负责用非情报职业的学术的眼光对正式判断加以证实。

戈登写道，中央情报局的草案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惊人的狭隘，它只涉及了那些"纯粹的"恐怖主义分子如德国的贝德尔一门霍夫匪帮、意大利的"红色旅"及日本的"赤军"。这些组织只是为暴力而进行暴力行为，他们是些虚无主义者。他说，试图仅靠其动机来定义恐怖主义是不够的。实际上，恐怖主义应根据其行为加以定义。若在巴黎夜总会一枚炸弹爆炸，情报界需要搞清它是由虚无主义者干的还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内部斗争，它是出于宣传目的还是为了政治目的。另一方面，戈登说，国防情报局的草案认为任何针对合法政权的暴力行为都是某种形式的恐怖活动，这将使乔治·华盛顿及罗伯特·李都成了恐怖分子。

凯西告诉戈登写出他自己的有关苏联与恐怖主义关系的判断草案。戈登收集了所有的原始情报资料并进行了研究。国家安全局提供的大量情报包括对公开通讯、不安全的无线电联系及电话线的窃听记录及破译密码后的情报。由密码电文得出的情报被标以代号"黑影"，是属于最机密的一类。技术性的情报，包括卫星照片，用处不大。更为重要的是，戈登发现人工情报很少且很难判定情报员的可靠性，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付酬的。他提出了一条规定：除非有第二个情报来源，最好有第三个情报来源加以证实，否则不

应加以相信。有许多情况只有一个情报员或一个情报来源报告某事而无任何其它支持。

5 月 13 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罗马圣·彼得广场遇刺受伤。凯西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对居然有人试图夺取罗马教皇的生命感到十分憎恶。自 1978 年波兰的卡罗尔·沃吉特拉红衣主教被选为教皇以来，没有一位教皇像这位来自铁幕之后的教皇那样成为右翼反共的象征。约翰·保罗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撒下了 1980 年 8 月导致团结工会形成的种子。

5 月 14 日，第二天上午，凯西召集国家海外情报委员会在位于华盛顿市中心 F 大街靠近白宫的委员会总部开会，讨论的议题是悬而未决的有关苏联与恐怖主义关系的判断，他需要一个答案。在六周之内发生的分别对总统及教皇的暗杀行动已增强了对恐怖主义及领导人易受攻击性的认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证据表明两次事件有联系，或苏联参与了两次事件。但有些事是可疑的，他认为情报界充满了可能性，每条线索或其可能的联系都进行了调查，他要求有情况迅速报告。

凯西想知道苏联人是否在搞名堂。如果是的话，位于白宫的另一张桌子的决策者们，包括凯西，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林肯·戈登的约 20 页的新草案的复印件已经传阅，戈登被邀请来向委员会作一简短的说明。

戈登说他的《国家特别情报报告》的草案有关"苏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的判断介于中央情报局及国防情报局两个极端之间。问题的一部分是对恐怖主义概念的混淆。很明显，苏联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顽固的独裁政权或另外一些倾向西方的政权的解放战争。苏联人愿意为他们提供资金来购买装备、进行训练并提供其它帮助——换句话说，是鼓励解放——这意味着将会产生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肯定，如果苏联超级大国不输出革命的话，将减

少恐怖主义活动。但并无情报提供证据表明苏联在恐怖主义活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有几次他们曾阻止过恐怖主义。俄国人曾预先警告美国驻尼泊尔大使有四名阿拉伯人阴谋绑架他，1978年保加利亚人让西德警察逮捕了贝德尔·门霍夫匪帮的一名成员。有时，苏联人似乎确定挫败恐怖主义有助于达到目的，又有时他们觉得恐怖主义促进了目标的实现。他们的支援，尤其是通过其卫星国东德和保加利亚等国对一些极端组织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援，明显地至少是间接的导致了恐怖主义的增长。

戈登说，不过总起来说，苏联人并未用恐怖主义作为扰乱第三世界及西方国家的首要工具。

戈登认为，这明确地驳斥了黑格的公开指责及斯特琳的文章，现在毫无此方面的证据。

泰感到不满，他带来了一叠电文，他说这些电文说明苏联人与10至12次恐怖主义行动有关，这些电文难倒了戈登，其中有些是最近的。

戈登觉得自己受到了忽略证据的指责。该小组在整理这些零碎情报的含义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影响结论，”凯西最后说，“但请将此稿退回。”戈登的判断草案未获批准，将不发行而退回重写。

四天后，5月18日，戈登召集各个情报机构的工作小组开会并对国防情报局所挖掘出的参考报告进行了艰苦的分析。只有二至三篇曾审阅过并由于没有第二个来源的证实而被剔除了。经过一段时间后，对草案中的某些文字作了改动但结论未变。

5月27日，这一秘密报告被呈送白宫和国务院，报告中说，苏联人没有背后插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报告最后提出了将来对情报界的一些要求——这正是报告本身目的所在。其结论是：必须加强人工情报工作，应设法渗入恐怖组织以获取他们计划进行行动的及时情报。

戈登觉得凯西在这件事上很虚心，并不让自己的思想意识来左右结论。同时很清楚如果他们发现苏联人在恐怖主义世界中有更多的踪迹，凯西也会感到高兴的。

但戈登发现一个极大的嘲弄。斯特琳的文章中一部分情报被证明摘自意大利有关“红色旅”的新闻报道，而这一报道是中央情报局一次老式的小规模秘密宣传行动的一部分。很明显斯特琳在其论述中摘录了它的一部分。在美国国内重新引用，这些情报被称为“反弹球”，它既是中央情报局的也是记者们的恶梦，特别是当它受到广泛的关注或产生争论时。

戈登发现这一系列结果特别说明问题：从中央情报局的宣传到斯特琳的书的校样，从黑格读了这些校样至黑格的新闻发布会，随后是《纽约时报》报道黑格的讲话，最后斯特琳又在书中摘录了黑格的讲话。尽管如此，戈登觉得中央情报局最终审阅了所有这些文件后还是得出了有理性的结论。这篇报告是高度机密的，它及其结论都不会公开。对于美国公众来说，他们仍将如他们的国务卿所公开标明的那样认为苏联人是恐怖主义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记载将永远不会纠正。

戈登想知道苏联人对这些有何看法，这对两国关系会造成哪些进一步的损害？他们对美国的其它公开宣称将采取什么姿态？两个超级大国间的舌战有何意义吗？相互信任如果有代价的话，应付出多少呢？

六

凯西离开华盛顿前往视察中东的情报站。他要求沙特阿拉伯的情报站站长安排他参加当地复活节的天主教弥撒，由沙特阿拉伯的情报机构提供警卫。这是一个愿意做任何事的情报机构，为获取情报和行动不惜花费大笔金钱。在以色列，凯西对摩萨德留下深刻的印象，它的人工情报渗透进行得非常成功。整个地区他都看到对人工情报来源的依赖，一个可靠的情报员是极大的优势，他是一天 24 小时值班的报警器，可早期发出警报。有着此类情报来源的情报机构不必在特定时间调至特定频率或特定通讯渠道来进行窃听，或依赖特定位置的空中卫星侦察。一个情报员可提供相同的情报。

返回华盛顿后，凯西决定集中精力选择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指挥间谍的人。他发现行动处的人员有点过分圆滑，太多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风格。服装过分考究，行为方式过分拘谨，另一方面讲话则不够规范，且社会经验不足。他们肯定是优秀的并具有献身精神，但他们常常图省事，激情不高。

看上去没有人具有凯西那一代人的广泛的处世经历及对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年代及自己职业的透彻理解。

凯西还没有提出该职位的候选人。但此刻马克斯·胡戈尔告诉凯西他想更多的从事行动而不是当负责行政事务的助理局长，只能说说而已。他甚至进一步对凯西说，有人建议他当负责行动

处的助理局长，但他未指明是谁。胡戈尔说他认为他担任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对凯西很有帮助。

凯西说他将很快作出决定，他也向约翰·布鲁斯提到胡戈尔可能任此职。

布鲁斯坚决反对，他曾在行动处工作过。他对凯西说："相信我，这是从事秘密工作，外行不可能懂得行动处的工作，更别说领导它了。"

布鲁斯希望凯西能听听迪克·海尔姆斯的看法。海尔姆斯答应来，他想向凯西私下表明他的观点。凯西告诉海尔姆斯他觉得只有胡戈尔适合担任此职，胡戈尔曾学过日语并在日本经营一个大公司，研究日本文化并进口日本打字机和缝纫机。

"先让他在班子里锻炼一下，"海尔姆斯说，"负责行政的助理局长职位很重要，为什么不让他在那里干两年然后再晋升他为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呢？为什么要这么急呢？"海尔姆斯提醒凯西过去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或是从行动处挑选或是如麦克马洪在中央情报局工作 30 年那样，曾长期在中央情报局内工作。海尔姆斯说："你应考虑保密问题，这不是说胡戈尔不值得信任，而是他毫无秘密工作的经历。保密沉默是一个老行动人员的第二本性，是第一条戒律，那些秘密交给一个新手会怎样呢？"

5 月 11 日上午，凯西告诉约翰·布鲁斯他仍强烈认为胡戈尔适合此职。布鲁斯仍表示反对，但他感觉出这件事上凯西听不进他的意见。施加更多的压力将是对凯西权威的挑战，凯西已表明他有权决定。

当天晚些时候，在与其高级助手和职员举行的会议上，凯西捻了一下手指，将讨论议题搁至一旁，宣布马克斯·胡戈尔被任命为新的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

约有 14 人挤在房间里，通常在类似的公开会议上，无论怎样都无法觉察这些人的内心世界，但这次却沉默得令人窒息，似乎

都听得到胃的蠕动。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刚刚适应了胡戈尔任负责行政处的助理局长。

无人讲话。还说什么呢？凯西并未听取意见，片刻后他回到讨论的下一个问题。

已在流传的一个笑话是，胡戈尔每天上午向凯西汇报什么？“老板，老板——飞机，飞机”。正如惹人喜爱的白衣侏儒塔图在电视剧《幻岛》中所演的向里卡多·蒙特尔班通报一批新的参观者那样。

这次会议后，一句话传遍了兰利总部：凯西让一个打字机和缝纫机推销员当上了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

在任职后第二天，胡戈尔召集行动处的高级助手开会。他已写出了自己的工作要点，他保证为行动处努力工作，建设它、支持它。他对他们说他们的报酬过低，应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并提到因为不能负担其子女进入昂贵学院的费用，他们的许多同事已离开了行动处。

有经验的老手们都明白这是一个无效的许诺。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已由国会定死，对此可做的文章很少，特别是对一个局的副手来说。

胡戈尔说应任人为贤，应给年轻人提供机会。要对他们进行更多的语言训练，以便获取更好的情报，更为有效地进行反间谍活动。

当他讲完时，毫无反应——完全没有。胡戈尔环视着整个房间，所有这些人都训练得善于隐瞒自己的目的和感情，脸上都毫无表情。胡戈尔感到迷惑不解，难道我说错了什么？不过这些人视不流露真情为一门艺术。

胡戈尔遇到了更多工作的挑战。给他起了一个代号，配发了一部保密电话，一部汽车及一名司机，还在家中安放一个保险箱

以储藏机密文件。当他浏览秘密情报员的报告及某些秘密行动的概貌时，很清楚许多秘密情报出自背叛了其祖国的人，他感到很不安。这些人为什么出卖其祖国？他们的情报可靠吗？

胡戈尔对戈德华特参议员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这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是需控制的主要基地。当胡戈尔进来时，很明显戈德华特对他一点不熟悉。戈德华特坐着，没问任何问题，几乎没说话。

胡戈尔走时感到了冷冰冰的气氛。中央情报局在与国会联络中从未提前进行过准备活动，胡戈尔的方法并未奏效。

5 月 15 日，任职四天后胡戈尔拿起一份《华盛顿星报》，上面有科德·梅厄所写的一篇普通专栏文章。科德·梅厄曾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 26 年，他激烈地反共产主义而倾向中央情报局，是约翰·布鲁斯的朋友。梅厄毕业于耶鲁大学，在上次世界大战的一次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他是保守的冷战专家的化身，才华出众，风度翩翩，关系广泛。他在 1977 年离开中央情报局时已晋升至行动处第二号人物。作为《华盛顿星报》的专栏作者他反映了老一代人的想法，并通过每日与那些似乎永远不离开城市的退休者们的电话交谈及共进午餐而迅速将其想法写到他的专栏文章上。

胡戈尔吃惊地读到梅厄专栏文章的标题《凯西选择业余选手担负中央情报局最秘密的工作》。其中写道："凯西拒绝了情报界老人们的一致建议。"胡戈尔读到他被任命为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这一政府工作被专栏作家斯蒂沃特·奥尔索普略带夸张地形容为"其难度和危险性仅次于总统的工作"。

文章接着说："艾伦·杜勒斯、理查德·海尔姆斯及威廉·考尔比在当中央情报局局长前都曾任过此职，但他们都是进行情报工作多年后得到提升的。

"莫斯科的克格勃头子将觉得这难以置信……。"

梅厄指出唯一的例外由中央情报局局长从情报界以外任命的

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是理查德·比塞尔，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出任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是“猪湾事件的不幸产物。”他写道，对胡戈尔的任命是“一次惊险的赌博，如果凯西判断失误，我国将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胡戈尔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梅厄并未打电话征得他的同意。

第二天，胡戈尔看到了《华盛顿邮报》第一版文章，标题为《对中央情报局新间谍头子的抨击》，那些情报老手们纷纷出台，其中摘录了乔治·卡弗，另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央情报局老手的讲话。他说：“这就像让一个从未见过大海的家伙当海军作战部部长一样……就像让一个非医学博士当大医院的心血管病区主任一般。”

文中还摘录了凯西为胡戈尔辩护的讲话，他说这些批评出自于“一群认为只有在中央情报局呆上25年才会了解这一职业的家伙”。

《纽约时报》在其巧妙的标题《凯西先生的公司》下以社论的形式攻击对胡戈尔任命。凯西与胡戈尔就这些进行了讨论并一致认为事情正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他们正在向现状挑战，而现状并不喜欢这一挑战。凯西匆忙给《纽约时报》写了封信并在5月24日发表，信中称赞胡戈尔“头脑清晰、富有魄力及出色的行政才能……既有能力又有经验”。

斯坦·特纳作为一名作家开始了其新的职业，他在家中读了这篇文章，意识到情报老手们又在进攻了，这勾起他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很明显凯西正遭受着猛烈的抨击，特纳与凯西同病相怜。作为一种支持的姿态，他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信，登载于5月25日，信中写道：

“凯西先生对行动处的行为最后负责，他有权选择自己的班子，应从其结果对其班子作出判断而不是从任命本身。

“我在1977年对行动处进行变革和裁减时也遭受过类似的批

评，这些措施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让我们给凯西局长以机会而不要过早地批评和增加负担。”

在白宫，米斯、贝克和丹佛都对集中在凯西手下胡戈尔身上的关注深为不安，秘密情报工作是地下的，如果胡戈尔是一个老做错事的人将给里根带来麻烦。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很强。他们一直对凯西和胡戈尔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所做工作的价值表示怀疑。现在管理中央情报局的是否是些乡巴佬？

凯西给总统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辩解说胡戈尔具有宝贵的职业技巧，暗指胡戈尔在组织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少数民族移民集团中取得的成就与秘密工作并无本质区别。

里根的助手们觉得现在既无理由又无办法对这一任命加以干涉。

尽管此人身高6英尺8英寸，但凯西首先注意到了那冷峻的目光。

“总统先生，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正处于守势。”此人用洪亮、自信的语调说。他接着读了有关萨尔瓦多局势的一段精辟的陈述。难以继续保护美国支持的军政府，尽管杜瓦特已做了最大的努力，侵犯人权的事仍非常频繁，随处可见。美国政府必须重新加以干预，而不仅仅提供军事和外交援助，里根政府应努力争取在萨尔瓦多实现自由选举。尽管本月刚出的由凯西局长签发的六月号《国家特别情报报告》中断定在萨尔瓦多军政府和叛乱者之间将有一段军事僵持局面，而军政府要等两年以后方能占上风，但民主必须是奋斗的目标。

凯西看到里根在椅子里活跃起来，这番话正中下怀，这个想法很简单，但实现它要经过漫长的历程。

“让我们就这么干吧。”总统说。

凯西对托马斯·恩德斯的上述陈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恩德

斯是国务院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很有眼光和魄力，负责政府对拉丁美洲的外交和政策。他早就意识到由于国务院、国防部、凯西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为争夺控制权而进行情报暗斗。按照惯例，他主持由这些争斗机构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他称这些代表为“核心小组”。有几周他们每天开会，甚至每天开两次会。恩德斯知道他需要意见一致，因而他开动脑筋要完成一项连贯的计划。凯西从他在证券及外汇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时期就认识恩德斯。没有比恩德斯更纯的东海岸人了：其双亲，奥斯特罗姆·恩德斯和艾丽斯·杜德雷·泰尔考特都是康涅狄格州人；他本人是耶鲁大学1953届毕业生，在班里成绩第一名。当他被任命为助理国务卿时，他不懂西班牙语。但他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在几个月内就学会了西班牙语。他脾气急躁，当他试图掩饰时常露出娇揉造作的举止。左翼和右翼都不信任他：左翼不信任是由于越南战争期间他在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任职时，促成了应对方请求的合法的行政程序从而对柬埔寨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大轰炸；右翼不信任他是因为他曾是基辛格的门徒。

凯西随后决定与恩德斯一起坐坐并听取他的意见。

“白宫没有一个作出决定的机构。”恩德斯痛惜道。他的老板黑格曾试图先发制人地予以完全控制，已失败了，“但无人成功”。

凯西作了记录。

“不过我能使这一多机构的核心小组对之产生影响。”恩德斯说。

凯西保证中央情报局将给予合作——他决不参与抢地盘的争斗。但他怀疑恩德斯的想法是否足够开阔。这些概念——自由选举及民主——在萨尔瓦多仅仅是一个开端，美国政府需要制定整个拉丁美洲的计划，事实上，需要一个整个世界的计划。

恩德斯表示赞同。外交政策权威机构的分裂将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所有的人都大喊报警但毫无计划”。

凯西更多地浏览了中央情报局储存的资料——文件，摘要等。他向某些中央情报局重要人员作了调查，并经常在索引卡上草草记上几笔。过去六年的世界历史被一个明显的趋势所支配：苏联人已在九个国家获得了影响，有时是具有支配地位的影响。这九个国家是：

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

中东和南亚的南也门和阿富汗。

还有尼加拉瓜。

这些是怎样进行的？对凯西来说，很明显苏联人利用了美国从越南撤退的后果，用代理人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是否可能对共产主义依法炮制呢？不要仅仅零打碎敲，诸如抓住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向抵抗组织提供援助，或同意沙特阿拉伯的请求秘密支持南也门反对派，或在萨尔瓦多促进民主，从而建立起抵御左翼叛乱者的火墙等等。

在这六年间苏联人同时也失去了在六个国家的相当大的影响力——孟加拉国、几内亚、印度、索马里、伊拉克及刚果。但这对凯西来说没有明确的意义。他想从苏联人手里夺回一个——取得一个明确的、显著的胜利。

“我们在哪里能击退他们？”黑格曾问到。

“我想从他们手里赢得一个国家，”总统曾说。

凯西意识到这意味着游击战。五年前的1976年为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他出版了自己研究美国独立战争的专著《战争进行的地球和方式》，全书共334页，是凯西研究方式的体现——广泛阅读和实地调查。五年前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增强了自己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他专心研究有关独立战争的主要书籍。他

浏览了道格拉斯·索塞尔·福里曼所著的第七卷《乔治·华盛顿》中的重要章节，凯西发现第三卷和第六卷是他所必需的。他是一位快速的读者，一分钟之内浏览多页，抓住概念和观点，在需要的部分细读，在不感兴趣的部分一掠而过。朋友们认为他是个书贼，只知借书很少记得还书。这些书在梅克诺尔凯西家中成了不稳的书堆。有关独立战争期间情报活动，欺骗行动及政治斗争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包括彭尼派克所著的《华盛顿将军的间谍们》、福特所著的《美国独立战争秘史》。

在其研究期间他真正的快乐莫过于同索菲娅和伯纳戴特一起野外旅游共度周末了。凯西喜欢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旅行，这是一个轻松自在的三人小组。某一个星期四他们乘飞机飞往缅因州，四天里他们沿河边独立战争期间本尼迪克特·阿若德将军所走过的路线到达魁北克，然后沿圣·劳伦斯山抵达蒙特利尔，随后沿理彻留河到达查普林湖。另外一次三天周末他们沿华盛顿将军的路线，从福吉山谷出发穿过迪勒威尔河到达新泽西旧战场。他们曾去过波士顿、费城、纽约、卡罗琳纳乔治亚等等。他们还乘船沿切斯皮克湾从安那不勒斯直抵约克城。凯西带着笔记本、书、有关地图的影印件及博特纳所著的《美国独立战争演变图》。他登上山顶，循着足迹仔细察看遗迹，索菲娅·伯纳戴特紧随其后。

他写道："我产生一种最生动、最直接的置身其中的感觉，实地觉察到阿诺德将军所走的路线的战术和战略意图……"他想去当年独立战争时期的每一处确切地点看看，以阐明独立战争时期的地理，但现在这些地点常常被现代城市和道路所掩盖。

无论是在远足还是在涉猎群书时，凯西总是在问一个中心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会打赢？如何打赢的？这么一群乌合之众怎么能战胜当时第一世界强国——英国呢？"他最后写道，这些革命者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使用"非正规的游击队进行游击战"的结果。他们与越共、阿富汗抵抗力量同属一类，士气、技术及战

术掌握在游击队手里。他说，你不得不意识到本国抵抗力量的重要价值，这是终将胜利的方面。凯西觉得这是18世纪与20世纪之间相连续的一点，现在他仍可以应用这一点。如果本国抵抗力量不像阿富汗人那样登门求援，那么中央情报局就应该走出去找到他们。

为进一步消除惊异，凯西开始寻找另一位外行。他需要一位有知识的人。他能像地雷绊线那样对逼近的国外危机提出警告，或许是一位分析领域的专家，他能将其知识与中央情报局内行们相融。现在模糊的分析太多了。他邀请了康斯坦丁·门杰斯博士到他办公室。门杰斯现年41岁，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一副学者风度，他是赫德杰研究所的保守主义者，曾在里根竞选班子工作过。门杰斯有着电台播音员般的语音，讲起话来永远是那么自信。当凯西问他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时，门杰斯递给他几篇他为《纽约时报》写的短特写。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里，门杰斯指出伊朗、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的事件标志着“温和力量和激进力量之间控制石油、中东和中美洲的无形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在另一篇《拉丁美洲的民主》里，他要求通过增进民主和增强中间派力量在拉丁美洲击败苏联人；他说，仍联系并支持右翼独裁政权是不起作用的。在又一篇《墨西哥：下一个伊朗》里，门杰斯预测这个南面的邻国将出乱子。

凯西看着这些文章，文章显示出门杰斯的战略眼光，他将发生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事件相互联系，并乐于提出自己的观点。门杰斯发明了一种对共产主义扩张进行推理演算的方法。他拿了一份两页的报纸，在上面他描写了共产主义者是如何与其他组织联合组成了他称为“动乱联盟”的。

文中有一张包括三个战略地区的表格。

反对美国在三个战略地区利益的政治——准军事战争

靶子国家	动乱联盟
拉丁美洲	
哥伦比亚	古巴
危地马拉	当地共产党及游击队
中美洲	
巴拿马	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及利比亚
洪都拉斯	
墨西哥*	
中东	
以色列	苏联
埃及	亲苏国家（南也门、叙利亚）
伊朗（霍梅尼后）	古巴
阿曼	巴勒斯坦游击队
北也门	利比亚
波斯湾国家	
沙特阿拉伯	
非洲	
扎伊尔	苏联
摩洛哥	古巴
苏丹	利比亚
纳米比亚	亲苏国家（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莫桑比克）
南非**	

* 表示主要战略目标

** 当地游击队及共产主义组织（西南非洲解放组织）

这些是总的战略目标及其方法，但门杰斯说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时间表，他们很有耐心。

凯西后来细读了这些文章，并再次邀请门杰斯会面，会面时凯西请他直言相告。门杰斯说他为整个中央情报局的能力而担忧，担心它像其它政府机构一样，回避义务和责任。在1970年，当卡卢奇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时他曾任负责教育的副部长助理为卡卢奇工作。当卡卢奇在1978年调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时，门杰斯曾提醒他注意伊朗的动乱，但无人听得进。在1979年桑地诺革命前，他曾预测在尼加拉瓜的左翼叛乱，他再次找卡卢奇和中央情报局，但他的意见未受重视。这些并不是事后的认识，他曾写过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包括一篇题为《古巴对尼加拉瓜的影响》，写于桑地诺运动推翻索摩查政权的1979年6月。它预测桑地诺运动将以温和派面目出现并在暴露其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面目前实行联合政府。

"上述成功，"文章又说，"将会产生在80年代初开展在墨西哥革命战争的政治基础和契机。"门杰斯告诉凯西使他苦恼的不在于如何对待他的看法而在于中央情报局自满而招致了预测和防止危机的失败。

凯西让门杰斯担任他的负责拉丁美洲的国家情报官。有关那一地区他将代表中央情报局局长参加会议，监督《国家情报报告》的写作，主持每月一次的针对潜在危机的"预警"会议，并就美国的对策提出建议。

门杰斯不愿意加入中央情报局，他说那会影响他的学术工作。

"看，"凯西说，"你如此关心这些事，你就伊朗和尼加拉瓜一直警告了卡特政府三年，现在我请你来此工作……你还等什么呢？"

门杰斯接受了这一请求。

凯西吃惊地发现中央情报局向负责海外报道的记者们定期举行背景情况新闻发布会。他告诉赫伯·海图让仍在中央情报局的特纳的公共关系负责人立即停止所有此类新闻发布会。海图觉得这些新闻发布会建立了与新闻界的重要联系想进行争辩，“但是——”

“我没有要求进行讨论或辩论，”凯西说，“照我说的做。”

七月初的一个晚上，中央情报局顾问斯波金在家里接到一个声音陌生而低沉的电话，对方最后讲明是“马克斯”，并请求在“此地”紧急会面。斯波金知道这是胡戈尔，他想在兰利总部与他会面。在两人一小时的会谈中，胡戈尔说他需要帮助。从纽约来的两个以前的生意合伙人，证券交易人托马斯·麦克奈尔和其兄弟塞缪尔·麦克奈尔正对他提出某些控告，他们秘密地将六或七年前胡戈尔向外界透露其公司兄弟国际公司内部情报作了录音。

7月10日，星期五，斯波金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另一位记者，帕特里克·泰勒和我在上个月收到了复制的16盘胡戈尔讲话录音磁带，我们正在追踪以写成报道。斯波金说他想听一听这些磁带。我们说这为时尚早。斯波金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并补充说如果中央情报局的任何人做了错事，他和凯西应该知道。最后，我们同意如果斯波金能带我们想采访的胡戈尔一起来，他就可以来听磁带。斯波金坚持当天下午就来，因为凯西想尽快了解情况。

几小时后，十几个人集中在《华盛顿邮报》大楼八层会议室的桌子旁，他们包括：斯波金、胡戈尔及几个他的私人律师，包括朱达·贝斯特，曾担任过副总统斯内罗·阿格纽约的法律代表；本杰明·布雷德利，《邮报》总编辑；泰勒和我及两位《邮报》律师，他们是证券专家；还有四位其他《邮报》编辑。

胡戈尔身高5英尺5英寸，穿着一套旧巧克力棕色细条西服，一件带淡色小点的衬衣，配一条普通领带，带着热情的微笑。

“我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斯波金说道，并补充说他只代表中央情报局，并不代表胡戈尔个人。然后他没精打采地坐到椅子里，显得很厌烦。

我们问了一些一般的问题。胡戈尔曾向麦克尔提供过公司内部情报吗？他曾威胁过要杀死麦克尔的一名律师吗？他是否知道他贷给麦克奈尔兄弟之一的款项被有意拨入麦克奈尔兄弟的证券公司，而该公司当时正在推销胡戈尔公司的股票？

尽管胡戈尔的律师间断提出抗议，他们还是要胡戈尔在放磁带前回答问题。胡戈尔说，说我知道贷款将流入证券公司“是假的，完全的百分之百是假的”。他否认一切。“回答是绝对、明确的，不——绝对不——永远不。”他紧张地搓着两只厚厚的大手，他声音悦耳地提出恳求并叫着屋里人的名字。是的，他希望他的股票上涨，他当然想让他的股票上涨。“但如果一个家伙在电话的另一端窃听你，”他说，看着桌子对面的人是否理解，“我并不知道他在暗提什么问题或他在偷说什么。如果你不知道你在被窃听，”他又抬头看了一下，“任何人都可以使你倒霉。”

“这是不公平的。”胡戈尔补充说。

斯波金插话说：“我不在乎我是否要整晚呆在此地，不过如果你的磁带上有资料我必须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将呆在此地直到听完磁带，我只想听一下而已。我不得不提出建议。”

“那些是非常严重的指控，”斯波金说，“我是指其中那些指控，我认为从我在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经历来看，坦率地说，其中某些不过是一时胡说而已。但当你谈到操纵股票市场时，其中某些成了，”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严重的指控。如果你有证据证实这一点的话，很明显我必须看到证据。”

泰勒放了 1974 年 12 月 13 日在麦克奈尔的律师威胁要对胡戈尔起诉后的一次谈话录音。胡戈尔的声音听起来又清晰又响亮：“那样他就可以放纵、大胆地用那该死的荒谬的起诉来威胁我，而

我——对我来说它是如此令我厌恶我已准备豁出去了……这讨厌的家伙是个他妈的什么样的人？……让这个该死的告我好了……那是废话、萨姆，如果遇到那个讨厌的家伙，我要把那个杂种投入监狱……我要杀掉那个杂种。”

泰勒关掉了录音机。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胡戈尔驯顺地说，“情况即是如此。”

“那是你的声音吗？你回忆起了那次对话吗？”

“是的。”他说。

“但刚才你指出……”

“很明显我忘了，”胡戈尔生硬地说，勇敢地面对自相矛盾的说法，他痛苦地再一次说，“磁带所录的都是真的。”他要求听下一盘。

我们又放了胡戈尔与汤姆·麦克奈尔谈话的录音，在谈话里胡戈尔提供了预计销售全额。

“那是否是内部情报？”

“我无法回答此问题，我不会回答……”

胡戈尔支吾着。随后放了更多的磁带，有关内部情报有何看法？

“你知道，你让我回到了1974年，那时我作此事的唯一可能的理由就是像所有有进取心的商人一样，向他的公司致意并说明你的公司的进展，而且你为你所做的感到自豪，这是唯一可能的理由。我是个非常热情奔放的人，我可能会……”

“但如果你对你正做的事非常自豪，你会想到要保密吗？”

“我说要保密，你知道，那是磁带里说的……天哪，那是一种……上帝呀，这是……这人为什么要录我的谈话呢？”胡戈尔对这一点几乎是极度沮丧。“为什么？”他问道，环视全屋，“这是怎么回事？目的何在？”

斯波金仍然享有全国第一流的执法专家的盛誉，他说，这些

资料中所缺乏的是胡戈尔从其泄露情报中得到好处的证据，这是定罪所必需的要素。

“我向你们保证，”斯波金说，“在座各位没有未打过电话谈论某些事情的，如果它被窃听了，我们会感到不愉快的。”所有人都点头称是。

斯波金请胡戈尔和他的私人律师离开房间。他们离开后斯波金悄声说，“这对我来说，很难作出决定……不过现在我可以很容易作出一次决定，也就是说有一项决定我很容易作出。”

“休息一下。”布雷德利说。

“是的。”斯波金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对，”他想听完所有的磁带并向凯西提出此事的评价。

“帮你作决定不是我们的事，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布雷德利说，但对胡戈尔当然会在事情捅到报纸上之前给他提供作出任何答复的机会。

斯波金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确凿的证据。”

胡戈尔又回到房间里，说他作为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正推迟一次重要行动的海外视察。

“这是件很严重的事，朋友们，”他说，“我个人的名誉处于危险之中，我要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7 月 12 日，星期天，凯西结束了三天国外旅行回到总部。下午 4 时他在兰利总部召集英曼、斯波金和鲍伯·盖茨开会。斯波金告诉大家，目前为止有关胡戈尔的资料仍是不完全的，现在还不清楚是否可能有违法行为或采用不正当手段操纵股票市场。

英曼告诉凯西，当类似问题出现时，有两件事应优先考虑。首先，不应采用任何掩盖手法或有掩盖的表现。其次，潜在的麻烦必须加以隔离，就是说胡戈尔应停职。如果查明没什么问题，他可以再回来，如果真有问题，他就完全离开中央情报局。

斯波金说他反对停职。什么事能改变现在的僵局？谁来决定没有问题？这类事可以拖上几个月甚至更久。

凯西也不太同意停职，那或许是极不公平的。这类事常常到最后毫无问题——新闻界的指控经调查后一无所得，而同时某些人的前程和名声却受到了玷污。凯西想知道整个事件最糟糕的方面是什么。

斯波金说是那些磁带——上面有预先提供情报的交谈和电话录音。

凯西觉得公司的行政首脑可以打电话给其股票经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给他们打电话。

斯波金说但如果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说的一些很脏的话被录在磁带上，那就成问题了。例如在一盘磁带上，胡戈尔告诉他的股票经纪人说，"我要切下你的睾丸……我要让我的朝鲜帮跟踪你，当你被用睾丸吊起来时，无论如何你也不会显得那么高兴了"。

斯波金觉得他有责任对胡戈尔坦诚相告——在私下里。"马克斯，"斯波金后来在两人单独一起时说，"诉讼时效已过，因此无人能对你起诉。但你必须离开中央情报局。"

"为什么？"胡戈尔问道。

"辞职，"斯波金说，"如果你去国会作证，他们将活吃了你。"斯波金解释说，问题在于伪证罪，当然不是有意的。你去后可能会否认，但你无法与磁带录音争辩。国会不是像报纸那样你可以说任何事否认任何事的地方。当这些磁带报道后你想见报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有关你辞职的报道。——随后国会将把你搁在一边，你将成为历史。这是我的建议，你要我作为一个律师和朋友提出建议，我的建议即是如此。这符合中央情报局和你的利益，因此我可以说劝你辞职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局长。

当晚胡戈尔邀请凯西和斯波金到他家共进晚餐。胡戈尔深深

感到对凯西的感恩之情，在面对内部如此之多的反对意见，凯西仍选择他任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他很清楚他的任命所引起的麻烦，这三位围坐于桌子旁的中央情报局新官中，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不到一年。他说那些指控是该死的谎言。

由于凯西在场，斯波金持一种中立的立场。

凯西提到英曼建议胡戈尔停职，无限期停职直至此事澄清为止。

“比尔，”胡戈尔说，“我决不去华盛顿让自己脸上天天挨打。”作为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这样显眼的官员，他的手被束缚着，无法使自己打赢这场战斗并澄清名誉恢复工作。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我无法打赢这场战斗，只有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才能打赢它。

斯波金说他肯定报纸即将报道此事。

胡戈尔对凯西说，“如果这篇文章对中央情报局，对你产生损害的话，我将辞职。”

凯西拿不定主意。停职不是好办法，但它看起来总比辞职强。

“如果他们登出的文章有损害性，”胡戈尔说，“我不想损害中央情报局，我不想伤害你，我也肯定不想伤害总统。我将辞职。”

“马克斯，”凯西说，“现在该你发号施令了。”

第二天上午，胡戈尔的律师朱达·贝斯特拜访了《华盛顿邮报》，说他们希望再次会面。贝斯特带去了16份胡戈尔的业务文件及一封信。他说他们需要时间收集更多的资料，现在报道将是“鲁莽的”。

当天下午原班人马聚集在《华盛顿邮报》五层的新会议室里。胡戈尔显得驯服甚至更为紧张。当他单调地否认某些行为时，我们说我们想避免重复星期五的会谈，即他先知否认某些行为，随后又面临与磁带内容自相矛盾的窘境。

胡戈尔表示抗议。

斯波金对他说，“听一下他们的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说不知道呢，那样不会对你有帮助的。如果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我们说我们计划第二天发一则报道，它将包括胡戈尔的任何讲话。

“我想提一个请求，”斯波金急切地说，“不管这是否合理，我仍想听一下那些磁带。”

又放了些磁带。胡戈尔又一次借口去洗手间。最后他请求发言。

他说：“我想对我在星期五回答你们的问题时未经深入思索就迅速回答表示歉意……我的答复本应更好些，我并不是说想作一些欺骗性的陈述。”他绞着双手身体前倾。他说他从未从股票转移中获利。他本应是一个幼稚的新手，但他却空手起家建立了公司，并在他离开时使该公司年业务额达 1 亿美元，他个人纯财产达 700 万美元。

胡戈尔停顿了一下。他说在 1957 年有一本名为《成功的经营》的书，书中有一章全部写他及兄弟国际公司在经营上的成功，“我曾上过杂志《王冠》的封面，我们将复印并送给你们……因此我过去为我所做的而自豪，现在依然如此。”

他列举了他的学历，熟练的日语，丰富的国际经验，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出色才能。

“我接受这一工作是因为我想为我的祖国服务，我作此工作经济损失很大，现在我的整个生活和名誉危若累卵，”他说着，眼里充满了泪水。“它将对我和我的家庭造成极大的损害……我们都是无辜的，不应这样对待我们。”他说着并提高了声音，“有关我的录音磁带，对于一个是为了能来报效祖国而自愿放弃许多可能赚钱的机会的人，一个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人却被这种人用几乎过了七或八年的资料宣告有罪，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胡戈尔说,"将来让人们来华盛顿接受工作将是非常困难的。"
"我对你们说的都是真心话。"

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凯西对未听到斯波金的消息愈来愈感到焦急。他觉得他最好通知一下国会两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凯西打电话找到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埃德沃德·鲍兰德,但无法打通戈德华特 。

后来胡戈尔的律师起草了一份三段的声明,强烈否认作过任何违法之事,并说他对明天将报道此事感到"非常不满"。胡戈尔补充说:"只要国家需要我服务我将继续为之工作,而且在这些来自过去的咒骂消失后我仍将工作很长时间。"

当胡戈尔被斯波金的电话叫醒时他想那可能是凌晨三点左右。斯波金说:"报道已出来了。"他读了标题《中央情报局间谍头子被指控从事不正当的证券交易》,并继续读到:"马克斯·胡戈尔,作为中央情报局秘密机构的首脑而从事着里根政府内最机密的工作人,参与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或非法的证券市场交易活动……"

"这真令人厌恶。"胡戈尔说。

斯波金继续读着,概要说明了要点,说上面有大量从录音磁带上摘录的原话。

"好了,"胡戈尔说。"到此为止,不必再读给我听了,我要辞职。"

日出不久,胡戈尔给凯西打电话:"我完了,"他情绪激动地说,"我正在写,我要辞职。"

凯西说这不公平——完全是不公平的。

胡戈尔表示赞同,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凯西并未试图改变胡戈尔的想法。

直至上午 9 时 40 分,凯西才打通戈德华特的电话,他告诉戈

德华特这事，而参议员已在报纸上读过了。戈德华特很生气，为什么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么晚才通报消息？几天前他曾听到一个可靠的传闻说即将登载这一报道。

在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和顾问弗雷德·费尔丁很忧虑。他们希望立即限制其损害。费尔丁认为应奋力争取胡戈尔立刻辞职并将此点意见直接告诉凯西。贝克给凯西打电话。

"马克斯正要辞职。"凯西说。

贝克对事情进行得如此之快感到吃惊，同时也感到宽慰。当贝克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向总统报告此事时，里根也感到很吃惊，说他不清楚胡戈尔到底做错了什么。

胡戈尔在家中读了这篇文章。头版上有他的一张照片。上帝啊，胡戈尔想，这是幅很糟糕的照片，而他有那么多的好照片啊。

文中有许多从录音磁带中誊写下来的专栏，都用的原话，只隐去了些不适合《华盛顿邮报》身份的脏字而以其第一个大写字母代替。但未漏任何东西。胡戈尔觉得所有的话都很精巧，也很粗、很脏。

他穿好衣服，司机送他到达中央情报局总部。当他在走廊里走向自己办公室时感到很痛苦，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有的人看上去似乎要哭，有的人走近他说这如何的不幸和不公平，有的人不露声色。胡戈尔清楚有的人得意洋洋，外行终于赶走了。另一些人脸上冰冷冷了，带有一种职业的冷淡。

他写给"亲爱的比尔"一封信，走到凯西的办公室里交给他。胡戈尔和凯西都动了感情，这是一次很难过的分手。

凯西写信接受辞职并表示"深深的遗憾"。

胡戈尔走回自己的办公室，拿起公文包走了出去。

目前为止，凯西对行动处系统的冲击已够多了，因而他立刻任命 48 岁的约翰·斯坦为新的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约翰·斯坦毕业于耶鲁大学，已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 20 年，包括在 70 年

代曾分别担任过中央情报局驻柬埔寨及利比亚的情报站站长。斯坦声音低沉，工作努力，不好兴风作浪。

凯西觉得到了安定行动处的时候了。实际上，他更愿意自己当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

凯西决定自己应树一个榜样。一段时间以来，他在中东的一个情报站一直在讨论在东道国的一位高级官员的办公室里安一个窃听装置，这位官员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讲话将提供确切的重要情报。在该站里，这一危险的任务推来推去，行动处的官员们在争论如何进入该办公室时也流露出犹豫和错乱，他们以较艺术的方式表达了犹豫不决。凯西说："我自己来干这件事，该死的。"尽管对这样一次行动即使让一位行动处官员冒险也是违反职业常规的，但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坚持自己干，他在对这位官员的一次礼节性访问期间安了一个窃听器——又一次违反了职业常规。访问期间，第一次他将一枚装有微型话筒和发射装置的细长的大针插入到沙发座垫里。另一次他采用"特洛伊木马"的方法，将窃听装置安在书的封皮里，并将书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官员。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坚持说这个故事是谣传，但另一些官员们说它是真实的，在一些行动处官员中它被当成了信条。几年后当我问到此事时凯西只是微笑，但当我提到那个国家和那个官员的名字时，他明显地激动起来并且对我说永远不要再重复它或是公开登载。

七

在《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胡戈尔的辞职下面有一个小标题：《法官宣称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在1968年错误地引导购买股票者》。这则报道说，两个月前，一位联邦法官裁决凯西有意地错误引导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农业综合企业的投资者们，该企业称为马尔蒂庞尼克斯有限公司。它是在凯西帮助下于1968年建立的。法官裁决马尔蒂庞尼克斯公司及其董事们——包括凯西——未能向潜在投资者们透露该公司已成为其发起人债务抵押品，包括凯西的债务。凯西的股份为30.1万美元，他公开宣布的税款损失达14.5万美元。在出售股票过程中，据说还有一些其它误述。法官把责任归罪于董事会及凯西，法官说："他忽略和误述了事实。"

巴利·戈德华特在凯西任期六个月后对他已不抱幻想了，他觉得自己被排挤在中央情报局事务以外。他一直不理解对胡戈尔的任命。"你看，"戈德华特对朋友奎恩说，"如果凯西一心想招募这种人，总统应该打他的屁股。"很明显中央情报局对胡戈尔进行的安全和背景检查毫无价值，戈德华特说，或者凯西知道而为胡戈尔掩盖或者其安全复审毫无价值，总之凯西不称职而应下台。

这位参议员对凯西的语无伦次愈来愈恼火，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话既不清楚又不热情，使戈德华特产生他正在掩盖事实的印象。他有时问另一位参议员或工作人员："你明白他在胡说些什么吗？"他称凯西为"鸭嘴"，认为凯西并未在讲话上作出努力。这

该死的凯西，既无礼貌又无政治头脑，甚至在胡戈尔的事报道前未预先通知国会。这件事他是在报道前的周末从《华盛顿邮报》总编辑布雷德利那里听说的，为什么要戈德华特从报社人士那里得知这些？

奎恩给凯西打电话："比尔，不要再使他吃惊了。给他打个电话，这非常重要。其次，我建议你对他真诚相告，以消除误会，他会理解的。"

7月17日，星期五，胡戈尔辞职三天后，戈德华特召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会议，在两小时的秘密会议期间与会者一致同意对胡戈尔的事件及凯西自己经营生意中可能潜在的问题进行一次例行检查——而不是调查。对委员会某些成员来说，胡戈尔因七年前的经营来往而导致辞职，而对凯西的问题甚至不要求其予以解释是自相矛盾的。比登参议员说，如果凯西对马尔蒂庞尼克斯公司之事作不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话，就"必须要求凯西先生作对国家和中央情报局最有益的事，那就是辞职"。但戈德华特对记者们说除非有更多的问题，否则他认为没有理由让凯西辞职。

7月21日，星期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例行的公开听证会，听取中央情报局关于免除其受《通讯自由法令》制约的请求。一直在领导工作人员对凯西进行调查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莫尼汉，抓住了这一时机，他已进行了充分的调查。

"在过去两天里，我们急切地想查明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否参与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非法活动，"莫尼汉说着，愤慨地提高了声音，"我们给白宫反复打电话，我曾给司法部长打电话但毫无回音。可能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或许是他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认为这无关紧要。"

但是，这是非常要紧的……他们最好帮我们确定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否应辞职。如果他们想掩盖的话，他们自己将更快地失去其中央情报局局长。

其后不到一小时莫尼汉离开会场接了两个紧急电话——一个来自司法部长威廉·费伦茨·史密斯，另一个来自白宫顾问弗雷德·费尔丁。

戈德华特也认为委员会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凯西又要不受控制了，他明显地轻视国会，英曼又一次代人受过。戈德华特曾私下抱怨说，全盘考虑，只要凯西辞职，一切都会变好。

星期四晚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报道说，戈德华特已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凯西。“这是该死的谎言。”戈德华特说。他很恼火，他的支持者们在给他找麻烦，他晚上喝了点酒。开始他告诫自己不必再说什么了，但他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因而在参议院广播电视大厅召集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想在这一报道流行之前公开否认。

有人问到他对凯西的个人感情，戈德华特觉得说谎很不舒服，甚至半真半假的话也是如此，因为半真半假的话应用到重要事情上去，这不是件重要的事，或许公开的责骂他会给凯西传递信息。

戈德华特强硬地发起了猛攻：“他任命一位没有经验的人担任我国实际上的头号间谍非常错误。作为一个长期参与情报事务的人来说我不得不说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并且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此人是负责秘密行动的人，这本身构成了凯西所做的最差的事……在我看来，由于胡戈尔的任命而对中央情报局士气的损害足以导致或者凯西先生自己退休或者总统决定要求他退休。”

现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其他新闻机构获得了新的更惹人注目的报道。这些未私下传递的信息成了头条新闻。里根总统党内重要人士说胡戈尔是“危险的”，凯西应辞职。

还有些另外的东西，戈德华特说凯西有一些生意来往记录失踪了，这很值得怀疑，而且还有其它不相符的方面包括一份报告中说凯西从马尔蒂庞尼克斯公司的交易中赚了75万美元，而不是

他所说的损失 14.5 万美元。

戈德华特当晚去奎恩位于康那狄克路的住所共进晚餐。

“巴利，”奎恩说，“你不应说那些话。”

贝蒂·奎恩表示赞同：“你不应该那样落井下石。”

“不过，我做了，”戈德华特说，“时间久了它也会过去的。这一周对我来说又长又难熬，我一直处于常识与对党忠诚的冲突之中。”

当晚间新闻提到戈德华特讲话时，凯西正在家里睡觉。电话铃响了，是斯波金打来的。

“比尔，”斯波金说，“你听到那个狗娘养的刚才说的是什么吗？”

“没有。”凯西说。于是斯波金解释了发生的事。

“不要担心。”凯西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要担心’？”斯波金叫了起来。

“我要睡觉。”凯西说着，挂上了电话。

约凌晨三点，凯西醒了，他穿上睡衣走下楼去，他每星期像这样在半夜里起来要有两三次。这是非常宁静的时刻，他常常只在床上看书，但他知道床头灯影响索菲娅睡觉，她更高兴他能去另一个房间读书。

今天凌晨，凯西没有读书。他打电话叫醒了斯波金。“斯坦，戈德华特到底说了些什么？”

斯波金重复了一遍。他看到在晚间新闻上，戈德华特站在记者们面前——那是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竭力要求凯西辞职。“我敢肯定戈德华特并不是想那样，”斯波金说，“不要担心。”

“我这就要求提升你。”凯西回答说。他要了戈德华特家中的电话号码，并拨了电话。

“我难以相信你会那么说。”凯西叫醒了这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并说道。他的讲话含有被出卖了的语气，毫不含糊。

“不过，比尔，”戈德华特予以了反驳，他睡意未消地发脾气说，“你最好相信它，因为我是那么说的。”

凯西坐了几个小时，想读点什么却感到很郁闷。早上六点左右他又躺到床上——即使是这一天，早饭前也是最佳睡眠时间。

几个小时内——当天是星期五——凯西开始与重要参议员们逐个会谈。在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哈佛·贝克 20 分钟会谈中，凯西要求举行一次公正的听证会。他流露出极为紧张的表情。他说他从未在马尔蒂庞尼克斯公司赚 75 万美元，他能够证明这一点并将这样做，这是一次政治迫害。

贝克说他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他必须支持他手下的委员会主席。贝克又说凯西和白宫最好在 24 小时之内提出点什么。

但是无法阻止其它共和党参议员的行动，他们从戈德华特那得到暗示。如果巴利都出面了的话，局势必定非常危急。在与记者们共进午餐时，很少偏离共和党权益的参议院共和党副主席，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说他调查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意见。“凯西先生应聪明地接受戈德华特先生的建议，”史蒂文斯说，“我认为巴利并不是轻易地提出建议，他心中想的是中央情报局的利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八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特拉华州参议员威廉·罗恩进一步说：“这些指控对凯西先生在情报委员会的信誉损害如此严重，我认为凯西先生已不可能继续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了。他应该辞职——现在就辞。”

白宫对来自凯西天然盟友的共和党内的攻击感到吃惊，它以总统名义发表了一份声明：“我并未改变我对比尔·凯西的看法。”这似乎有点不冷不热。凯西对那些尾随他在参议院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的记者们说：“我觉得当真相大白时，将清楚地表明我有资格也有能力领导中央情报局。”这一声明似乎无意中承认尽管他已任职六个月，但他并未开始真正领导中央情报局。

星期五晚上，哈佛·贝克征得戈德华特的同意后，决定派一

名特别顾问负责凯西的调查工作。他们选择了弗雷德·汤姆森，他在贝克 1973 至 1974 年任“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副主席时曾任贝克的办公室主任。

贝克告诉汤姆森他想使每个人都平静下来。但很明显，人们不大喜欢凯西，除非凯西能很快扭转局势，否则他只能离开，每个人都想尽快完成调查。汤姆森开始调查记录、文件和有关财务的揭发材料。不久很清楚凯西的财务情况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同样的复杂。“我喜欢凯西，”汤姆森带着田纳西的语调慢吞吞地说，“但我更喜欢我的副主席。”因此，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在纽约帕克大街 90 号大楼的 23 层上，石油富翁约翰·沙汉，一个战略情报局时的老兵和凯西 25 年的朋友，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些新闻报道。对沙汉来说，如同凯西一样，共和党如同其宗教信仰一般，而现在戈德华特，一位共和党人要搞掉凯西是毫无道理的。这几乎要将美国情报界自敬爱的多诺万到凯西的领导方式置于危险之中。在 50 年代，沙汉和凯西这些老手同多诺万关系密切，如同他的干儿子。如果他们离开他太久，他就会叫他们。以后多诺万发病住进了位于华盛顿瓦尔特里德的一家医院。

1959 年 2 月 8 日，当多诺万去世时，沙汉和凯西飞回华盛顿。天色阴沉，气候很糟。尽管这不是公开葬礼，凯西还是想尽早去。整整一天凯西很少动，说话也很少。他麻木了，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走路时头颈僵硬，湿润的双眼凝视前方。在阿灵顿公墓举行葬礼时，他痛苦得心如刀绞，好像失去父亲一般。沙汉说：“多诺万是他身心的一部分。”

凯西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曾受到多诺万的弟子们的欢呼，在他们一生中没有人找到能继续其战争经历的地方，凯西掌管中央情报局能使许多重要事业保持旺盛，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

并没有结束。

沙汉给在华盛顿的凯西打电话。

凯西说这是卑鄙的一枪，整个事情是不公平的，是的，他对之不满。每个人都想找他的碴儿，还没有人成功过。这就是政治。

但凯西和戈德华特本应是一致的呀，沙汉说，在纽约人看来，这很不妙。

“大惊小怪。”凯西说。

“听着，”沙汉说，这是一个朋友的忠告，“如果你不赶紧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出某种和平姿态的话，你可能不得不被迫辞职。”

沙汉打电话给杰弗里·琼斯，战略情报局老战士协会主席。琼斯（普林斯顿大学 42 届毕业生）是战略情报局的中心人物之一。他高高的个子，干净利落，和蔼可亲，待人友好，穿着一套考究的西服配一件毕挺的衬衫，一副英国绅士风度。他把艾尔·摩洛哥夜总会变成一个私人俱乐部，经营了五年之久，战略情报局老战士协会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定期出一本厚厚的新闻信札，实际上报道的是诸如两个战略情报局老战士会面重聚，通信地址变化并保持与会员的联系及其对情报局的忠诚。

沙汉和琼斯一致认为凯西需要帮助。一个同志陷入了敌营，而这个敌营就是美国国会。

第一步是发起一场瞩目的公众支持运动。发出了约 400 封电报请求为这位战略情报局老战士出力，很快组织了大型的“支持凯西”的午餐会，乔治·舒尔茨和威廉·西蒙两位前共和党内阁的财政部长在会上讲了话——巧妙地进行了财务上的辩解。

在斯波金上任的头几个月里，似乎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及其调查人员的幽灵仍笼罩着中央情报局总部大楼，每个人都感到害怕，寻找理由不干工作。斯波金称这现象为“拒绝综合症”。他要

对某些秘密行动或秘密情报收集行动提供法律保护，但在到达凯西办公桌上之前，它就可能在逐级上报途中被否决，为此斯波金建立了一个预先通知凯西的系统。他们一致认为这只中央情报局大象不凶猛，它在睡觉。如果凯西现在被解职，斯波金分析没有人能使这个情报机构再动起来。因而这次如果凯西不出面行动，他就要出面行动、凯西过去所有的经营骨干人员都很好，他们出面要进行公开算帐。第二天，7 月 25 日，星期六，斯波金和凯西两个最著名的朋友在华盛顿市中心的五月花宾馆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斯波金不仅愿意为凯西在法律方面进行辩护，而且作为一名律师的不寻常措施，他竟然愿意为凯西的名声提供担保。斯波金说对这个国家来说失去这个人的才华将是个悲剧。“对证券诈骗我一看就知道，但这一事件中我并未见到有证券诈骗的迹象。”他以一位前证券和交易管理委员会的官员身份这样说。

内华达州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拉克萨尔特，是里根总统和南希的亲密朋友，他也为凯西说话。他将挽救里根踌躇的 1980 年竞选运动归功于凯西，在一份不完美的政治呼吁中，他说：“我认为如果没有比尔·凯西，罗纳德·里根现在不会是总统。”

琼斯断定现在是出场的时候了。他飞到华盛顿，在曼德森宾馆建立了总部，并召集了由两名战略情报局老战士组成的两人小组执行另一项行动。这两个人是：詹姆斯·凯利斯博士，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英雄，曾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多次行动，成为战略情报局传奇故事的一部分。另一位是前众议员约翰·布莱特尼克，一位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曾当过 28 年的众议员，曾在 1970 年至 1974 年任众议院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

他们行动的第一站是参议员丹尼尔·艾诺依，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七位民主党参议员之一。他曾在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

员会工作过，并在丘奇调查之后于1976至1977年就任首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右臂。凯利斯向他说明了凯西在战略情报局的出色表现、无限忠诚及为该局成长所作的真诚努力及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的，凯西在国会中形象不好，但他们应理解凯西那爱尔兰人的执拗。

艾诺依认真地听着，他最后说："既然布莱特尼克信任凯西，那我也信任他。"

这个凯利斯—布莱特尼克小组接触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12个成员及许多工作人员，但并不总是成功。他们却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他们只是那些喜欢和支持凯西力量的微小反映。

星期日下午两点左右，凯西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选交了两英尺厚的10册文件，表示他希望回答所提出的长达四页的问题。他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20名成员每人一个盒子，各装有一份复印件，在致戈德华特的信中凯西说他将乐于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上作证。星期一，凯西向数百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作了一次乐观的形势报告及鼓励性的讲话，他说仅在一周之内出现如此之多的指责使他很吃惊，但他要求他们耐心等待，因为他相信自己未做错事，将继续担任局长。

新闻界报道了这几百名下属对凯西报以长时间的鼓掌欢呼。

凯西去拜访英曼，并说他个人请他帮个忙，能不能公开发表对凯西有利的讲话？

英曼看得出对凯西来说这是最难出口的请求了。他立刻答应了。当晚他应邀与特德·考伯尔一起出现在ABC电视台的《夜间热线》节目里。英曼个人认为凯西—戈德华特失和可追溯至1966年，当时凯西与戈德华特支持的德罗尼安争夺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提名。英曼感到这些人即使在15年之后的现在，也很难忘记这些争执。

凯西随后对参议员们进行了又一轮拜访。他说他比其他任何

人都更清楚他的许多经营和投资事务，但他无法也不会回答他们所期望的每一件事的细节问题，甚至于每一角银币的来历。他作为一名投机资本家并不感到羞耻，因为投机就意味着要冒险。冒险常导致失败、沮丧和诉讼，但他并未被指控过有非法行为。就马尔蒂庞尼克斯公司一事来说，是的，他曾任董事，但他曾担任过许多公司的董事，但他与出售股票的计划及法律审查毫无关系。上帝啊，董事们总是受到控告，但他们不应对经营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假如公司出了差错，就应该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但整个事件却被新闻界所造成的道德败坏或违法犯罪的预感所笼罩了。任何对经商感兴趣的人都会理解，这是非常荒谬的。

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德克萨斯州富有的民主党人，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他完全理解凯西的陈述，本特森清楚在商业世界的道路上有许多拦路磐石。在与凯西会面以后，本特森说："他们并未能对他进行打击……目前为止我既未听到也未看到使我认为凯西应该辞职的可靠证据。"

当凯西在参议院里从一个到另一个私下会晤时，他的信心逐渐增强了。"桶底已经刮了，"在一个办公室外他对跟随他的一群记者说，"已经很干净了……伙计们，你们也知道，我不担心任何事。我的一生是公开的，我随时准备讨论任何问题。"

英曼有些沮丧地注视着这一切。那个星期一《新闻周刊》说白宫已拟就一个必要时替换凯西的少数几个可能人选的名单。惹人注目的是上面没有英曼。白宫明确显示如果戈德华特搞掉凯西，也不会叫他的亲信出任此职。

在《夜间热线》节目里，英曼说："比尔·凯西是继续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

战略情报局老战士协会让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考尔比在大众广播电台的《麦克奈尔·莱里尔报道》中为凯西辩护，考尔比说："我认为现在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凯西先生辞职了，因

为它预示着你只要报道一点无中生有的小事，就会使中央情报局局长自动或被迫辞职。”他总结说，凯西的问题在于“许多大袋鼠议会或委员会主席匆忙地作出结论”，——采用类似于英国议会由议会或委员会主席决定是否辩论的议事规则。

7 月 29 日，星期三，胡戈尔辞职后 15 天，凯西参加了在国会山 14 层安全室里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他显得逍遥自在，在登上电梯前长时间挥手致意。他说："它将是一次步态竞赛* ……我以前就通过了。”凯西现在觉得更有信心了，委员会里的民主党参议员都站在他一边，胡戈尔已辞职，所有的财务问题只是与 1971 年以前的投机资本投资有关。

宣誓后，凯西回答了所有下述问题：受到指责的有关中东情报工作不力的问题，有关最近的分析报告中的“政治”暗示的问题。他承认胡戈尔后来看来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在严厉盘问下，他最后认输了——是的，对胡戈尔的任命是一个错误。

凯西灵巧地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他说他喜欢英曼，他想要的是不受政治影响的情报，而且，肯定的说，中央情报局不必要介入国内间谍活动，他将协助委员会执行其监督功能。他现在的外表表现的很卑微。一个又一个参议员对感兴趣的题目或新闻报道提出问题，述说真正的或想象出的不满。比登参议员可不会让凯西占上风，他一个又一个地数落凯西过去财务上的问题。

最后，凯西予以了反驳，他说他是个商人，以美国的惯例，他要承担经营风险。在风险投资中有些事业不成功，因而导致了商业纠纷，这并不是非法的，仅是民事诉讼，是私人争端。如果参议员们不喜欢这一点，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他的。

在听证会接近尾声时，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本特森

---

* 一种黑人的娱乐。（译者）

建议委员会表达他对凯西的"完全信任"并挽回过去一些日子对凯西所造成的损害。但他们未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来签署一项彻底的保证。

经过一些辩论，参议员们一致同意发表一份公开声明："目前并未发现决定凯西先生不适合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证据。"

这项表示认可的保证，转弯抹角，充满暗讽，凯西非常恼火，当他结束五小时的调查离开国会时，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在白宫，里根总统正在背诵一段祝贺他的减税法案的主要部分刚刚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的讲话。这是里根担任总统以来最大的胜利。几个月来他一直是白宫关注的中心，这是表明里根将能控制国家政治目标的重要标志。一个助手表示祝贺。"好的，我知道了。"里根说着扫过几个字、双臂前伸仔细证实后，喜气洋洋，好似看到柳岸花明一般。他说："不过你看到那份有关比尔·凯西的报告了吗？一致通过。"

在兰利总部，凯西发现乍得的秘密行动进展缓慢。这项行动计划支持乍得前国防部长哈布雷的全国阵线过渡政府并使乍得免受卡扎菲的控制，它包括全面的援助——资金、武器、政治支持和技术协助。这本应是很容易的，那就是将资金通过法国所用的渠道输送过去。法国人为维持它这个前殖民地的稳定多年来已花费 1 亿美元。凯西看得出兰利总部这部机器油上得不好，行动处表现出对国防武器市场了解不够——最好的步枪、最优的价格、某些运输路线、"洗钱"的银行协议等等。行动处优柔寡断，过分注意行动的消极面，坚持要哈布雷保证这些"致命性"的援助不被用来反对其政治反对派。这种对人权的挑剔在国会的监督机构看来是一个大问题。

该死的，凯西感到奇怪，难道他们要哈布雷的母亲写条子加

以保证吗？哈布雷是一个深谋远虑残酷无情的幸存者。他们读过相应的报告吗？为什么不现实点呢？

这一行动也引起了一系列新闻报道，有些使得中央情报局看上去愚蠢至极。

有关乍得行动的拨款法案，已由负责行动处的前助理局长胡戈尔在其辞职前送交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许多委员会成员非常担心法案中的某些措词模糊，足使被用来证明美国在直接追杀卡扎菲。

有些众议员怀疑哈布雷是否是接受秘密助理的理想人选。左翼人士对他过去参与大屠杀提出质询，而右翼人士中有人回忆他曾表示崇拜毛泽东、卡斯特罗和胡志明。他曾号召在整个非洲进行“革命暴动”。除此之外，哈布雷在几年前与卡扎菲关系密切，并从卡扎菲那里得到过武器。中央情报局有没有最佳的反卡扎菲的另外人选？

凯西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上面简要说明了所提供武器的具体型号、相互间的联络、预计所需要的费用及时间。然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们却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绝密的信，反对这一行动。这封信的消息泄露了，新闻报道说众议院已经拒绝了在一个未知的非洲国家的某项行动。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克莱门特·扎布洛奇众议员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审查了乍得法案及致里根的信。这位69岁的立法人向《新闻周刊》透露说给里根信中所提到的尚未命名的非洲行动是一项推翻卡扎菲的计划。《新闻周刊》那简短但耸人听闻的报道，标以《推翻卡扎菲的一项计划》，指出中央情报局有“一项发动一场代价昂贵的大规模、多方面的行动计划推翻卡扎菲政权……对那些审查该计划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们来说，那……似乎暗指暗杀卡扎菲”。

凯西对这一报道非常恼火。中央情报局已进行了一项微妙的

援助行动，而法国和埃及已经深深地卷入了那里，这次行动极有希望成功。现在当中央情报局通过秘密途径采取行动时，卡扎菲的妄想狂将充满对虚构的正面进攻计划的害怕，这对我们的秘密计划极为不利，必须公开加以否认。因此白宫发表一份罕见的声明公开否认《新闻周刊》的报道。不过他证实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给总统一封信反对某项行动。

有人开始寻找这个未知国家。几位白宫官员决定最好透露真正的目标国，使证据显得可靠、并使对利比亚计划的否认更可信。

约在同一个时间里根总统签署了另一份绝密秘密法案。这一法案是应国务院的请求，将向毛里求斯的亲西方领导人提供政治援助资金。毛里求斯是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海岸外一个小岛国，靠近对美国生死攸关的石油运输线。其领导人，80 岁的首相拉姆古勒姆是一位内科医生，已在位 13 年，正面临与马克思主义分子组成的战斗运动的一场激烈的战争，如果得不到帮助的话，他将肯定失败。从其战略位置来看，这一岛国如失手将可能成为苏联的一个海军基地。这种秘密行动提供温和的政治支持和资金，将使一个友好的领导人保住政权。其危险和代价都很小，而潜在的益处却很多，因而国会对这类低姿态的政治支持毫无反对意见。这是典型的国务院的计划，给一个小国的友好领导人送点钱，那里一点美元就可赢得胜利或收买选举。

但白宫的助手们由于对世界形势不熟而搞混了。他们透露目标国的名字是毛里塔尼亚，与毛里求斯前五个字母相同。

毛里塔尼亚是北非的一个大国，第二天被作为中央情报局的目标国登在报纸上，这言外之意是美国想推翻该国政府。

凯西既怀疑白宫有诡计也怀疑是粗心。这从表面看就是荒谬的，略加研究就会发现美国与毛里塔尼亚的穆斯林军人政府关系很友好。更加说明该事的荒谬之处在于，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表明利比亚参与了一月初毛里塔尼亚的一次流产了的政变企图。

但它摆在那儿，毛里塔尼亚人非常生气，提出抗议。在试图纠正《新闻周刊》有关利比亚的不准确报道招致了更大的麻烦后，白宫官员们开始告诉毛里塔尼亚人他们不可能与新闻媒介讨论想象上的秘密行动。如果那是假的话，那么对利比亚的秘密行动可能是真的，为什么白宫发言人不说他们对利比亚进行了秘密行动？官方公开的沉默就意味着证实了这一报道，最后国务院想说服毛里塔尼亚人相信新闻报道是错误的，但如果相信这一否认，就要重新寻找真正的目标国。

最后悄悄泄露了真正的目标国毛里求斯并否认了毛里塔尼亚行动，对此进行了报道。最重要的一点是毛里求斯的秘密行动是支持现政府，而不是去推翻它。

凯西很蔑视记者们不论什么最新说法都仓促发表，有人认真思考过吗？但更为重要的是，白宫政治官员们需要进行有关秘密外交政策的教育；不能像指挥一场政治运动那样用演讲、泄露内幕和澄清来指挥秘密行动。这真是个难题——国会、白宫、国务院和新闻界都压在他的行动之上。在白宫最近一次与总统的会面中，凯西对泄露内幕提出了抗议，说如果让他指挥秘密行动，所有的细节必须无情地加以限制。最近的新闻报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央情报局正在漫不经心地在整个非洲进行代价昂贵的多处秘密行动——毛里求斯、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是否有人了解到有关某一国家秘密行动的报道给当地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带来什么后果呢？他知道那样的话，情报收集与所在国情报机构的关系可能会被一笔勾销。

《新闻周刊》的记者在利比亚计划被否认后，到众议院找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扎布洛克。扎布洛克走向众议院工作人员，提示他就是《新闻周刊》上述消息的来源。他被证实是泄露消息者，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埃德华·博兰德决定不采取行动惩罚扎布洛克，因为泄露太多了。

1981年7月7日，星期天，英曼得到消息说以色列用美国提供的战斗机，刚刚轰炸并摧毁了伊拉克位于巴格达郊外10公里处的核反应堆。他检查后发现，在由凯西批准的与以色列共享情报协议的指导下，以色列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接触美国卫星照片，并把它用于策划袭击行动。凯西让步太多，政府在以色列—阿拉伯冲突中，正在走钢丝。如果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情报对整个中东进行轰炸，英曼认为美国将无法保持政策的平衡。他很快制定了一套新规定，它规定以色列只能得到用于防御的照片和其它秘密情报。以色列的权利被限制在只能接触那些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或与以色列相邻国家的卫星照片。巴格达距以色列500英里，不在此列。

凯西表示赞同，但他对以色列解决了这一问题感到高兴，他很欣赏他们的冒险精神。当白宫表示吃惊并对以色列进行制裁，停止交付几架F—16战斗机时，凯西认为这或许是必要的外交和政治姿态，但私下里他称这为“废话”。回顾至卡特执政时期，以色列就敦促美国向伊拉克施加压力，停止其核武器发展计划。并威胁说如果这样不奏效的话，它要采取行动。摩萨德甚至曾探讨过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但空袭的决定是正确的，无论对以色列或者是伊拉克人来说，它包含的危险性都较小。只有一个伊拉克核工厂的技术员死于此次空袭。

凯西觉得以色列情报机构内部需克服其怀疑主义的障碍。在1974年以前，著名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头子詹姆斯·安格尔顿曾指挥过以色列情报机构，通过其行动人员及分析人员不断从中东获得重要情报。自从安格尔顿被解职后，所有以色列情报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无异于一份摩萨德的新闻稿，用来为以色列的政治目的服务。

事实上，摩萨德在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有一些优秀的情

报员——黎巴嫩、叙利亚和苏联。凯西必须做工作使摩萨德信任他。

在某些重要方面，以色列更多地违反了情报界的职业规则。中央情报局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有秘密情报员，不时提供有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细节。行动处已让凯西相信这些情报不会传给以色列，因为那样的话阿拉伯人遭受损失，情报员就会住口。这是个激烈的游戏，凯西很欣赏以色列人接受规则的方式：情报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他们对这非常有经验，他们知道一个同盟者不会提供一切。

是否有些关系非常重要因而无人知道？凯西说是的。对情报员的保存及其身份的保护与所提供的情报价值有关。如果情报为自己辩护，谁会要知道它呢？对核反应堆的轰炸与以色列情报机构保存长期关系的作法有很大关系。在轰炸一个月后，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首脑伊霍舒·萨吉少将拜访了凯西。萨吉很了解西方，凯西觉得萨吉可以信任，两人一致同意一旦发生某些特殊事件有必要两人直接接触。

凯西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每天老花一些时间用于苏联人，他想最准确地把握住这个头号敌人。他很早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所进行的宣传工作的范围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凯西敦促行动处重视这件事并广泛听取意见。

这方面的第一炮是代号为“苏联的积极措施”的绝密研究。它于七月写成。这一秘密报告由约3000篇新闻报道组成，也有少数情报员提供的情报——它可能是中央情报局最大版的报告了。这一报告描述了“积极措施”——即苏联人采取一切行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步渗透苏联的政策观点”，不仅采用秘密行动或秘密宣传，而且采用“积极措施”。它包括煽动、伪造、军事行动、公开使用“裁军”和“和平”手腕，甚至于许多场合表现出“客观”和

"有理性"。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这些积极措施几乎包含了苏联人所做的一切，它们是"苏联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我们得知苏联领导人物列日涅夫亲自签署了一份有关对某些个人采用积极措施的特别指令……"这一秘密报告写道。

这份长达30页的研究报告的部分例证如下：通过给编辑们送酬金的方法，两名克格勃军官牢牢控制了加纳的两份主要日报；1976年克格勃伪造逝世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最后遗嘱，遗嘱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错误（一个克格勃叛逃者后来说克格勃首脑们评价这一积极措施为"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向尼日利亚一个左翼候选人提供8.5万美元资金；发动了一场支持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宣传运动，它包括一名克格勃特工发表一篇新闻信札，表示支持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煽动宣传活动包括苏联支持萨尔瓦多的左翼叛乱，通过政治前沿组织和工会进行活动（在1981年头六个月西方世界发生了70次罢工）及操纵某些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

其它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它在巴基斯坦的活动，破坏美国一埃及关系的宣传活动及试图在毛里求斯建立亲苏政权（中央情报局正在提供秘密援助以支持这个太平洋岛国的亲华盛顿政府）。

英曼断定凯西在践踏事实，并想利用这次积极措施研究进行一些思想灌输，将苹果和桔子混为一谈。《真理报》、《消息报》、塔斯社及莫斯科广播电台对美国在萨尔瓦多政策的明显错误的指控被作为积极措施的突出表现。实际上，苏联的外交政策本身也被当成是积极措施。不过英曼断定中央情报局根据情报员提供的情报所作的研究大部分是准确的。苏联的宣传运动并不是凯西所虚构出的事物，但有必要对两方面加以区分，一方面是伪造遗嘱和侵略阿富汗，另一方面是《真理报》社论。

这一研究报告发送范围较广，想引起人们注意并建议中央情报局对抗苏联人的努力。但凯西对中央情报局未能算出苏联人为这些措施花费多大感到很不满意。如报告分析苏联发动的旨在动员人们反对美国制造中子弹的宣传运动时，它只是说："苏联行动的规模可以通过类推方法测定。我们计算了如果美国政府要发动一场与苏联反对中子弹'宣传运动'规模相当的宣传运动的话，它的费用将超过1亿美元。"凯西称这些数字是"古怪的"。

然而，8月13日，在中央情报局的上述研究报告发送一个月后，里根总统对记者们说："我们有情报证实，当我们几年前宣布首先研制成功中子弹弹头后，苏联仅在西欧就花费了大约1亿美元来进行宣传活动。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要花多少，但他们已经开始了同样的宣传活动。"

这段话以后从未予以更正。英曼觉得让美国总统来传播谣言毫无意义，但凯西对此并不感到特别烦恼。苏联人总是撒谎，中央情报局的判断或许是对的。

八

八月，佩祖卢决定辞去驻尼加拉瓜大使职务。至少有三个月——三月、四月、五月，他使尼加拉瓜停止了萨尔瓦多叛乱者的武器输送，但政府决定取消尼加拉瓜的援助使他丧失了影响。现在，输送武器又开始了，作为最后的努力，他说服了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恩德斯前往尼加拉瓜会见桑地诺领导人。佩祖卢认为恩德斯是个神气十足的讨厌鬼，只不过是一个掌握政府对拉美政策的精明而有权势的神气十足的家伙。

在马那瓜，恩德斯与佩祖卢开诚布公地交谈，两人都知道中央情报局最近报告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叛乱者输送武器的行动正在引起华盛顿的极大关注，国家安全局窃听了30%至70%的由马那瓜发往萨尔瓦多境内叛乱者基地的通讯，他们显示尼加拉瓜深深地卷入了萨尔瓦多内部冲突。桑地诺政权武装力量的增强使尼加拉瓜的邻国感到担忧，尤其是北面的洪都拉斯。恩德斯说，华盛顿的政策将开始向引起美尼冲突的方向发展。

佩祖卢推测那意味着进行秘密行动。

“我想阻止它。”恩德斯说。或许外交努力很能奏效。

因此恩德斯和佩祖卢一起与桑地诺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会谈。桑地诺领导人一直愿意会见和磋商，但他们清楚地表明他们不会受人摆布，他们将保卫自己，战斗至最后一人。

恩德斯抗议说他们在骚扰教会、新闻界和工会。目前为止没

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子被清除出政府，并指出华盛顿的新政府希望在中美洲实现民主。

这些是内部事务，桑地诺领导人说。

有几次恩德斯勃然大怒地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不过是个该死的跳蚤，美国背着双手也能杀死它，别傻了。恩德斯说，我们在谈论生存——你们的生存，我来这里是让你们与美国作一笔交易的。认真地考虑一下吧！

佩祖卢可以看出恩德斯并不把这当成是威胁，但坦率地讲，它实际是个警告。不过迄今为止并未采用外交上的装腔作势，这一警告是非常严厉的。

桑地诺领导人想知道交易的具体内容。

恩德斯说，你们必须对自己军事力量的增长加以限制，并保证不卷入邻国的外部和内部事务。作为回报，美国将保证不支持任何反对桑地诺运动的各种力量及前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已有报告说这些所称的反政府武装正在美国本土接受训练。另外，恩德斯说，美国将与尼加拉瓜签订《双边防御和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不喜欢你们的政权，"恩德斯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不过你们必须离开萨尔瓦多。"

奥尔特加拒绝了："萨尔瓦多革命是我们的盾牌——它使得我们的革命更加安全。"

回到华盛顿后，恩德斯查阅了国内法，它支持任何国家的现政府。美国能发挥作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秘密行动。恩德斯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转移公众对萨尔瓦多的注意，使其注意力离开有关上一周那里发生了多少起侵犯人权事件之类的问题。恩德斯给黑格一份秘密备忘录，总结了他的尼加拉瓜之行，他的结论是：除了发生急剧的变化外，尼加拉瓜的迹象是有希望的，有可能与桑地诺领导人达成某种一致意见。

黑格退回了备忘录并加了几笔潦草的旁注："当我看到它时，

我就会相信的，现在还是让我们不要停止其它计划。”

恩德斯完成了向桑地诺领导人提出有关条约条文建议的任务。这一建议是好战的和侮辱性的，几乎等于要求桑地诺领导人放弃其革命和理想，他们立即予以拒绝。

凯西仍对卡扎菲感到不安。由于《时代周刊》错误地报道说中央情报局正计划推翻或暗杀他，而使局势非常紧张。凯西希望有针对利比亚的更多情报人员及设备。利比亚的外交及情报密码已被破译，卡扎菲常在非保密电话线上通话，给美国提供了他进行日益扩大的颠覆活动的一幅愈来愈清楚的画面。

卡扎菲的工具之一是泛非航空公司。表面上它是一家不定期的客运和货运航空公司，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情报显示它是利比亚军队的空中运输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利比亚情报部的空中运输机构。卡扎菲的情报人员充斥于该公司的管理和行政人员中。

1981 年 8 月末的一份报告指出：卡扎菲命令该航空公司在非洲花费 3000 万美元开设了 18 个新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提供了现成的情报用于进行通讯、雇员和情报及人员运输等多项服务。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已知的利比亚情报人员在证明上被列为“学生”，航空公司班机的事务长们大量贿赂有关人员。该航空公司还被用来向乍得运送地雷、大炮、弹药、吉普车和其它武器，并将利比亚训练的津巴布韦军队空运至索尔兹伯里；一些武器装备被空运到利比亚驻布隆迪大使馆。泛非航空公司还将苏制地对空导弹运至叙利亚。

卡扎菲还加紧其获得核武器的计划。1980 年 12 月，苏联人将 11 公斤高浓缩铀送至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塔米拉的研究中心，尽管这不足以制作一枚原子弹（中央情报局估计他们按现在的速度在 1990 年以前难以制成）。但这 11 公斤超过了中央情报局预计的苏联一次能提供的数量。

其它报告显示铀黄饼正从尼日尔由泛非航空公司的飞机运入利比亚。尼日尔是另一个南邻利比亚的中非国家。1981年7月5日，一份题为《尼日尔：利比亚的下一个目标》的国务院秘密情报备忘录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卡扎菲对尼日尔的野心。

据另一份报告称，一个西德公司曾在利比亚测试了一枚火箭。

一项重要的政府政策审查正在进行之中。凯西知道是情报报告点燃了政策之火。中央情报局投向白宫的情报越多，其激起的要求行动的自然冲动就越多——特别是里根和黑格。凯西完全赞同通过美国海军演习向卡扎菲宣称的锡德拉湾主权进行挑战的决定。这是项有限的非挑衅性的行动，而且国际社会同美国一样嘲笑卡扎菲，他宣称锡德拉湾是利比亚海。

8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时，两架美国海军F—14战斗机在卡扎菲所宣称的领海线内30多海里处进行黎明巡逻时，受到利比亚空军战斗机的袭击。在得到自卫的指示后，美国飞机进行了反击并击落两架卡扎菲的飞机。

当天上午总统用西部片形式表演了这一事件，以向高级助手们表示祝贺。他画了想象的两支六响枪并被炸飞了。

舌战进行着，但未再冲突。三天后，8月22日，卡扎菲在埃塞俄比亚的古老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与该国领导人门格图斯·哈里·马里姆，一个年轻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举行了会谈。

此时在屋里有一位埃塞俄比亚高级官员，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他是如此机密以至其报告只送给最高机密传阅名单上的人。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评价他是“基本可靠”到“非常优秀”。在那次会面中，卡扎菲宣称他要杀掉里根。当这一报告送到华盛顿时，它含有这样的估价：“门格图斯相信卡扎菲的意图是非常严肃的，这一威胁应认真对待。”

不久，国家安全局窃听到卡扎菲在一次讲话中基本上说了相同的事：里根是靶子。两个报告都显著地登在《总统每日简报》上。

凯西认为这是迄今最好的情报——他自己的行动处认为应“认真”对待的一份窃听记录和一份情报员的报告，虽然不是一场军事袭击，但这或许是他可能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对总统生命的威胁。凯西与听取此事的所有人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但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不能去向卡扎菲射击。一周过去了，并未发生企图暗杀总统的行动，所有人都有些平静下来，而凯西却不。他命令所有的情报机构将任何流言或暗示直接向他汇报，不过白宫仍不愿采取直接行动。

但到1981年后期，凯西肯定中央情报局将在中美洲发挥巨大或许是特殊的作用，这意味着有了合适的人选。凯西不喜欢行动处的拉美科科长奈斯特·桑切兹，一位工作了30年的老手。他或许在这一地区呆得太久了，过于轻率以至于看不到拉丁美洲的真貌，并对秘密行动过于不安。桑切兹于8日退休，凯西帮他在国防部谋到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的职位，在那里他将参与在拉丁美洲军事方面的政策。凯西是想把他从拉美科长的位置上换下来。

负责他们“所封”地区的科长们是“贵族”，他们直接控制指挥中央情报局的日常工作。中央情报局局长本人、副局长甚至负责行动的助理局长摊子太大，而“贵族”却可在上司信任的情况下大胆行动，并可能取得成就。

当凯西九月前去巴黎参加西欧情报站站长会议时，有一个人表现出色。他是杜威·克拉里奇，被称为“杜威”的罗马情报站站长。他在巴黎为凯西安排了一次丰盛的晚餐，对每项细节都照顾得周到，甚至于凯西喜欢的具体调味汁。“可以完成”和“没有问题”似乎是克拉里奇的教名，这正是凯西所欣赏的作风。他衣着考究有时穿白鞋，一件白色的衬衫，茄克衫上袋里常放一条带色的手帕。克拉里奇现年49岁，曾在亚洲和欧洲工作过，但凯西却任命他为拉美科科长。克拉里奇恰是中央情报局老传统和新鲜

血液的混和物。

克拉里奇很快与局长建立了“私人渠道”，他不必通过负责行政处的助理局长斯坦或副局长英曼向凯西报告，而可在任何时间与凯西会面或直接通话。如果凯西不在兰利总部，行动中心一周7天，可日夜回答他的电话。文电按规定传递，包括杜威的，而凯西常很快拿起电话问道：“你哪里，有什么事?”

10月6日，凯西收到紧急报告，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阅兵时被枪击。三小时后尽管美国电视新闻报道说这位埃及领导人已经死亡，但开罗情报站的报告仍鹦鹉学舌般复述埃及政府官方报道说萨达特受伤不重。

帮助萨达特保住权力是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重要任务，中央情报局为此向埃及政府提供了秘密安全协助和情报。自1978年，签署戴维营协议，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以来，萨达特在中东受到孤立。他在某些方面已成了美国人民和美国剪报的创作对象，在自己的国家里，他有无与伦比的名望。他的妻子杰汉·萨达特的西式服装、习惯及妇女独立的思想，受到许多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分子的咒骂。

中央情报局送给萨达特的情报包括有关他的易受攻击及反对他的力量集结方面的资料。前一个月，在一次私下汇报中，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有关来自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伊朗对他的威胁的详细情报。

在10月6日首次报告的三小时后，开罗情报站证实萨达特已死，而且在被多发子弹击中后立即死亡的。

凯西感到很羞辱，里根一上午都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等候证实电视报道是错误的。凯西和英曼担忧由萨达特的门徒，副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所领导的新政府将提出强烈的或许是激奋的抗议，因为中央情报局训练过萨达特的卫兵，并且没有预先向他们

报警。但什么事也没发生，甚至连一点抱怨也没有。

最后证实这次暗杀是由埃及国内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干的。中央情报局十分注意对埃及政府进行窃听和渗透，并向萨达特预警外部的威胁，但它却忽视了埃及国内的各种势力。这危险地接近于伊朗灾难的重演，因而凯西大发脾气。中央情报局在埃及需要有更多、更广泛的独立情报渠道。在秘密收集情报的领域不应有任何界限，特别是在具有爆炸性的中东，现在尤其在埃及。他要求有更多的情报渠道——既包括人工来源的也包括电子设备收集的，甚至在新政府的最高层。“派些人到那些该死的街上去，观察是否有人要射杀穆巴拉克。”凯西命令道。

凯西不喜欢大规模的白宫会议，他在这些会议上说话很少。当他讲话时，他明白自己口齿不清，在桌上的某些人会试图向总统翻译他的话时，他们会说：“凯西在说……”或“比尔说……”凯西注意到，有几次吉姆·贝克借机吹捧自己。

他与总统的直接渠道非常有用，当凯西有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时，他就给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系。一个星期五，有位重要的沙特阿拉伯王子要见总统，他便把他接去见里根。当黑格发现这些时他气得脸色发青，但凯西认为这些秘密关系应避开国务院，因为它们在那里会被泄露或破坏。

中央情报局在阿拉伯世界其它地方也有特殊关系，其中包括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在利比亚支持的游击队在1981年10月13日打垮了摩洛哥在撒哈拉沙漠的一个前西班牙要塞后，凯西将国王要求美国援助的请求直接交给总统。“我们要支持他。”凯西对里根说。很快一支由23名五角大楼、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官员组成的队伍被派往摩洛哥，这次黑格和国务院又被晒在一边。

与此同时，在1981年秋季，戈德华特仍在等待对凯西错综复杂的财政情况的调查结果。这一调查已失去了冲劲，正以疲弱的

接近于零的速度导向结论。委员会工作人员必须得找到确凿的证据，否则他将不得不寻求体面的后退。已审查了近 38000 页的文件，讯问了 110 个人。这一调查发现在凯西宣誓过的陈述中有许多遗漏：他未列出九项共计 25 万美元的投资；个人债务及可能的债务近 50 万美元；他卷入的四起民事诉讼以及前五年他曾代表多达 70 位当事人进行过诉讼，包括两个外国政府，北朝鲜和印度尼西亚。

新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顾问爱尔文·纳桑，一位前司法部高级官员，认为凯西的财务行为是邪恶的。尽管纳桑不能索取凯西的财务文件，得不到凯西的纳税申报表，也无权讯问他，但他还是起草了一份约 90 页的机密报告，提出了未回答过的问题并指出了凯西走捷径的方式，并说凯西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因接近犯规线而致双脚沾满了画线的白粉，但纳桑没有确凿的证据。

戈德华特选择了罗伯·西蒙斯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新办公室主任。罗伯·西蒙斯现年 38 岁，瘦长而结实，曾在行动处担任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人员达 10 年之久。从 1975 年至 1978 年他在台湾秘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并曾指挥一次行动阻止了台湾人获得制造核武器的原料。台湾"政府"的原子弹计划和有关文件被盗走，并被迫放弃了购买秘密部件的企图。现在他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第一项任务是总结对凯西的调查。

戈德华特要求他写一份最后报告，他说："我希望它不要超过一页。"

西蒙斯完成了一份五页的最后报告，它重申了情报委员会上一次的裁决，"没有发现证据证明凯西先生不适合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现在全面揭露凯西的努力已再次失败，西蒙斯引用了在部队服役时的术语说"凯西非常注意细节"。

西蒙斯在 11 月末带了一份最后报告的复印件去兰利总部。凯西的办公室位于七层，现在它装饰以法兰西帝国时的家具。这位

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觉得情况有点像一位初级军官将总部的惩戒送给一位将军。不过西蒙斯向凯西解释说这份五页的报告是一份结束的报告，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将很快忘掉它，并将永远忘掉它。“有人想发表一份 80 至 100 页的报告。”

凯西抗议说他是清白的。

西蒙斯告诉他，如果不就此和解而进行斗争的话，将导致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场长期的斗争，而在委员会内部有许多对凯西不满的参议员。西蒙斯暗指这场斗争将是残酷的，将导致长期的不和或许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下台。

“没有人能剥夺我的工作。”凯西尖刻地说，他的腰板硬了起来，“我为总统工作。”

“这是最终的和解，”西蒙斯说。

“好了，”凯西最后说，“我将与它斗争。”

这一报告未作改动，于 12 月发表，那时它已成了过时的消息。没有什么评论，凯西未进行斗争，他对朋友们和索菲娅说：“那些废话已在新闻媒介发表过了，它只损害了我一天的名誉。”

西蒙斯明白凯西不想再向前走了。西蒙斯认为，对于曾在战争中服过役的人，战争是首要的演习，非常危险，与它的危险性相比任何事都相形见绌，因它们确能致人死地。因而强夺点钱算不了什么，它毫不费力，受到批评也算不了什么。那些法官或参议员或记者或漫画家对你进行攻击，那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你曾参加过战争并生存下来了。

凯西仍想制订一项对中美洲的全面行动方案，但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总统需要其主要助手意见一致，当达不到这一点时他不会作出决定。黑格对古巴着迷，温伯格举出了越南战争中过分承担义务和战争逐步升级这对孪生幽灵，他不会让美国人陷入又一

场非正规的丛林战。贝克和白宫的其他高级助手希望里根继续集中搞好国内事务，并确定不应让一个国外的冒险行动导致政府的分裂，尤其是这一冒险行动使黑格愈来愈产生怀疑，甚至警惕。黑格还不适应总统的不拘礼节。这一次他奉承里根，下一次他又会显得傲慢，说里根的外交政策附着在他所驱动的一个特别行动过程上。他常会以推翻自己的建议而结束。

凯西可能是唯一一个与黑格关系融洽的政府高级官员。他们每周四定期共进早餐，助手们也常伴随参加。早餐交替在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进行。凯西认为黑格懂得外交政策，并对世界比较熟悉，而且他赞同凯西的强硬路线。

如果凯西要作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事来挽救萨尔瓦多，他就必须混淆黑格、温伯格和其它白宫政治机构的利益和要求。增进民主的努力是很好的，但仍不够。

黑格和恩德斯一致认为他们应扩大秘密行动。美国若能参与其它一些国家的行动是最理想的，如它在乍得就是骑在法国行动的肩上。

杜威·克拉里奇发现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径，在那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与统治该国的阿根廷将军们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阿根廷军事情报机构G－2，已将反共提高为社会的精神气质并制订了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灌输计划。将军们对反对独裁的蒙特尼罗游击队担心。阿根廷支持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抵抗力量，并在洪都拉斯境内靠近尼加拉瓜北部边界训练了1000名抵抗力量。

克拉里奇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恩德斯和其核心小组。唯一的其它选择是通过智利，那个独裁政权更为糟糕也更显眼。

“以色列人会干吗？”恩德斯问。

“这是不可行的。”克拉里奇说，阿根廷人很合适。

恩德斯向黑格简要说明了可能采取的秘密行动。

这还不够，黑格说。他要求确定一处薄弱点。由于白宫不愿

支持直接袭击古巴，那么不预先警告而袭击一个在埃塞俄比亚的古巴军营怎么样？但黑格甚至在国务院内部也得不到对他建议的支持。他恐怕尼加拉瓜行动会严重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它看上去强硬实际并不太强硬；而且如果它不能奏效的话，美国就得滚蛋。但他也看出这是唯一能获得白宫、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建议。

11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4 时，里根在内阁会议室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恩德斯在核心小组内征得一致同意后作了讲话。

他说，对尼加拉瓜的政治计划必须继续推进民主，必须在那里和中美洲其它地区建立民主制度。“这是使他们和我们获得合法性的唯一途径。”

必须增加政治和军事援助，或许那一地区和加勒比地区需要 3 亿多美元，他说：“我们必须寻找途径恢复与尼加拉瓜的会谈，否则我们不得不派军队。”因为我们准备不充分而且它可能是一项过于巨大的行动，所以如追根到古巴，那它只是个“空匣子”。恩德斯说，战争必须通过秘密行动指向尼加拉瓜，这一支持抵抗力量的行动将不会推翻桑地诺政权。“它将骚扰尼加拉瓜政府，并消耗它。”

黑格是唯一表示不同意见的，他提出了疑问但并不完全反对。总统原则上赞同采取多方面的行动，但推迟了中央情报局一项援助阿根廷的秘密计划。

黑格要在外交上作最后的尝试，六天后他秘密飞到墨西哥城，会见古巴副总统卡洛斯·拉法尔·罗德里格斯，但他未能找到与古巴人达成一致的基础。

12 月 1 日，星期二，黑格和凯西共进定期早餐。当天下午他们与里根及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其他成员在白宫紧急指挥室举行了 40 分钟的会议。国家安全计划小组是非正式的高层会议，负责讨论重要的外交政策事宜；其成员包括总统、副总统、米斯、贝克、

丹佛、黑格、温伯格和凯西。偶尔助手们也参加。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受到指控说他从日本记者那里接受了1000美元并放在白宫一个保险箱里，由于对该指控的调查悬而未决，因而他暂时离职，未能出席会议。

凯西谈了他的秘密行动计划的要点。他需要1900万美元帮助阿根廷建立一支500人的队伍，它将是反桑地诺抵抗力量的核心，将以洪都拉斯境内的营地发起行动。或许将需要更多的钱，他说，这500人肯定要扩大。

白宫三驾马车表示赞同，但黑格仍觉得这是个折中办法，但他表示了赞同。温伯格很高兴这一计划未牵涉五角大楼，布什满意地看到中央情报局有节制地恢复了其准军事能力，基本未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当天里根签署了一项绝密的范围广泛的总统指令，批准进行旨在削弱桑地诺政权对中美洲包括萨尔瓦多的多个叛乱运动支持的政治和准军事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戴维·琼斯将军，一位资历颇深的军人及卡特政府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唯一的留任者，看到尼加拉瓜行动被批准感到沮丧。他读了情报后认为，仍不能肯定中美洲的所有动乱都是古巴或苏联人煽动的。凯西用西方冲突的思想方法来看这些问题，似乎只要共产主义走开，问题也就解决了。但琼斯认为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十分突出，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叛乱的肥沃土壤。他认为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只抓住肢离破碎的情报来判断行动的过程。琼斯对情报方面很熟悉，他清楚情报可被集中并用来强调共产党的作用。

但最糟糕的是选择了阿根廷。琼斯知道阿根廷人是优秀的反共分子，但他们不会起太大作用。尼加拉瓜距阿根廷有2500多英里，他们为什么要对一队蒙特尼罗游击队从一个大陆以外的地方

组织一场反对阿根廷现政权的革命而感到如此的担忧呢？除非可对阿根廷人施加影响并使其做任何美国要求的事，否则选择阿根廷毫无意义。

白宫估计如果就美国承担的角色进行公开辩论的话，政府将得不到公众和国会的支持。

参加那些会议的每一个人都似乎被越南悲剧的类推所萦绕。琼斯和其他参谋长希望在萨尔瓦多的军事顾问超过现有的55名——白宫所能决定的最高数目，但琼斯看到其他每一个人都非常担忧，因为美国军事顾问数目的任何增加都不得不公开，那会导致诸如"我们就是这样卷入越南的"、"这是踏进门里的一脚"、"这是逐步升级的第一步"之类辩论的开始。

英曼也带着怀疑注视着事情的发展和里根批准尼加拉瓜秘密行动。确实对阿根廷准军事行动的秘密援助是一条中间道路，比黑格的某些主意要温和些，但政府不愿作出友好姿态和花费政治资本以使国会通过这样一项政策。因为公开请求国会拨款将引起一场公开辩论。就英曼而言，他担心的是国内政治影响再度驱动了秘密行动，但他可做的很少。凯西已明确表示他将亲自指挥这些行动，指挥路线将从凯西直达行动处。在这一行动中就是直达他的新任拉美科科长杜威·克拉里奇。

英曼发现该行动令人不安的另一方面。秘密行动似乎在白宫和国务院对外交感到沮丧时开始进行的。很明显尼加拉瓜的情况确定如此，外交途径不成功。外交过程包括艰难的谈判、无休止的会议、建议和反建议也实在令人厌烦，而秘密行动提供了一条捷径。它给一个政府，尤其是一个新政府，提供了行动的愉快感受，有一种秘密方式完成任务及有一项秘密外交政策悄悄推动美国利益前进的愉快感受。

英曼也对花费数百万美元支持这些外国人感到不理解。他们

是些什么人？其目标何在？他们与那些美国人一样吗？能控制住他们吗？

如果真正的目标是阻止实际已经停止的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那有些事就搞错了。阻断武器运输正常情况下不需秘密做。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并无共同边界，通过陆地的唯一途径是穿过洪都拉斯，美国完全有合法的权力给予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公开援助来阻止输送武器。做为一项公开的行动伴以公开的边界监视将更为有效。但很显然没有人试图向国会兜售此方案。

从尼加拉瓜到萨尔瓦多的最简捷的水上途径是通过芳塞克湾——一条仅20英里长的水路。美国驻萨尔瓦多的海军武官及其他一些人像鹰一样监视着海湾，未发现任何东西通过。

英曼想在局内寻找某种途径谈一下自己的怀疑。他问凯西负责行政处的助理局长约翰·斯坦是否在给这次行动上给他撑腰，以保证一位富有经验的专家能完全了解每一步骤，以便提出疑问和不同意见。

但凯西很不耐烦，英曼明显感到凯西既不需要也不欢迎他的观点。这位局长只是支吾着："唔，唔。"

根据要求，这一新的秘密总统指令必须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戈德华特作了臀部手术正在恢复之中，因此副主席莫尼汉主持了会议。当提出这一总统指令和支持范围的报告会，莫尼汉简直难以置信。他认为，如果他们要对桑地诺政权施加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目标，但上帝啊，不要用那些阿根廷将军们。阿根廷是右翼独裁政权的一个象征，与他们联在一起意味着美国赞同反革命。在某些方面，索摩查在尼加拉瓜社会中的形象要比一位阿根廷将军好一些。这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它毫无政治技巧。莫尼汉能提出许多问题，他那样做了，但他所能做的并不太多。

法律只要求重大情报行动之前要通知情报委员会，而指导外交、国防和情报政策是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任何总统，尤其是这一位，会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些权力。莫尼汉并不是不同意，因而委员会能起的作用很小，除非它试图否决行动所需要的资金，但总统掌握有情报行动的5000万美元应急资金，因而很难阻止这一行动。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委员会成员们都宣誓保密，它是莫尼汉严肃对待的誓言，他们在委员会以外的沉默等于是暗示默认。一个成员可能会自行公开揭发或私下透露，但他必须肯定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否则他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个人怎么能凭仅从一小时汇报中知道的东西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竞争过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数百小时的计算和讨论所写进文件的东西呢？莫尼汉感到现在政府是在与委员会合作，但委员会只是一瞥，只能表示一下不安。至少能知道这些也比以前要好，何况他和委员会还可以在行动进行时追踪并提出疑问。

在众议院这边，凯西亲自向情报委员会作绝密的汇报。他说这一行动已经开始；阿根廷人已开始行动，美国已经参与这一行动，在洪都拉斯已建立了许多营地。洪都拉斯已允许阿根廷人将其国土作为基地。

干什么？

凯西说，打击在“尼一卡一瓦一瓦”的目标，他发“尼加拉瓜”的音不准确，每当此时，他总要暂停一下，想读对它，但总发出“尼一卡一瓦一瓦”。凯西说，不管怎样，反政府武装将袭击那个国家的特定和指定的目标——古巴援助的那些支持各国叛乱的机构。

如何打击？何时行动？

组织突击队进行跨国境行动，在深夜袭击目标后返回洪都拉斯的基地。

许多众议员似乎要跳起来。他们并未预料到会有一个准军事行动，尤其是一个这样规模的行动，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如果你在洪都拉斯训练被发现会怎么样？如果桑地诺政权的反应是侵入洪都拉斯怎么办？这是否会引起他们两国间的仇视？如果桑地诺政权的反应是向古巴寻求更多的帮助怎么办？

凯西说这些具体问题不可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参议员李·汉密尔顿，一位受人尊重和极为仔细的印地安那州民主党人，怀疑这一行动是否符合国内法和许多地区性条约。美国在采取这样一种姿态即加入对一个与自己有外交关系国家的侵略。这怎么能行呢？

凯西回答说，古巴人和尼加拉瓜人是侵略者，他们正在支持各国的叛乱，但他对日期和数字不太清楚，他讲这是个既成事实。

他的交道打得不好甚至委员会的某些共和党人亦不满。众议员肯尼恩·罗宾逊，一位保守的弗吉尼亚共和党人也是政府的朋友，看着凯西严肃地说："你并未仔细想一下会有何反响。"

凯西正密切注视着波军上校瓦尔蒂斯罗·库克林斯基，中央情报局在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员，发来的情报。这一情报直接来自波兰决策圈，中央情报局已建立了一套非凡的发出信号，准确投递和通讯系统来保证及时收到情报。这位上校传递了一份波兰政府实行戒严和镇压团结工会的行动方案，凯西确保将它直接送交给总统。这是中央情报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草案中所缺少的只是执行的时间，他们都屏息等待。

11 月初，兰利总部收到华沙情报站的紧急请求。库克林斯基发出事先商定的紧急信号，这意味着他肯定自己将暴露。苏联人已在当天一次会议上断言，他们的秘密计划已被泄露给了美国。为了继续伪装，库克林斯基不得不一起表示义愤。他现在就想逃走。

这些是条件：中央情报局曾保证无论何时他发现有必要，中

央情报局将予以庇护。凯西批准一项“滤出”命令，由华沙情报站立即秘密地撤出上校、他的妻子和儿子中的一个。这是一次煞费苦心的、代价昂贵的危险行动，为三个人开辟了一条地下通道。11 月 6 日，三人安全离开波兰，并以新的身份在美国生活。

上校的情报令人痛心地中断了。当波兰特别警察开始于 12 月 13 日凌晨几个小时大规模逮捕了 5000 名团结工会积极分子后，中央情报局感到很突然。共产党国家中的第一个独立工会运动被有效地消灭了。

英曼愈来愈感到不愉快，秘密行动与他认为的情报机构的真正使命相去太远，情报工作就是收集那些英曼所称的“建设性的情报”，即那些对美国决策者有用的其它国家的情报。

英曼集中注意力于对其它国家政府的行动向美国决策者们提出“预先和预警”，这意味着既要加强人工情报工作，也要对卫星和信号传递等情报工作方面进行投资以保证多渠道获取和及时传递情报。还要求制订一项长期规划，向前看五至七年。但他知道没有一届政府愿意关心如此遥远的未来的事，眼前的事已占用了 99%的注意力。英曼发起了一场凯西风格的研究未来宣传运动，组织进行研究，举行讨论会，集中大家的注意力。1981 年 3 月，他说服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由他要求各个部门和机构研究和列出他们预测在 1985 年至 1990 年将遇到的所有国际问题，包括苏联的行动、政治暴动、世界经济、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等。

利用他在海军的关系，英曼也帮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相似的要求，要求全军进行一次未来的研究。

白宫要求凯西协调这一工作，但如英曼所料，凯西很快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他。英曼要求各部门提出对情报工作的要求，由于这从官僚政治方面看毫无威胁，因而没遇到什么阻力。几个月内

英曼得到一份一览表，或者说是期望表，由于没有优先顺序，所有的要求都列于表上。下一步，是艰难的一步，他要求各部门和机构说明在各自领域哪些他们能够做和哪些他们应该做。他还要求各部门和机构说明他们需要其它部门或机构做什么。

当英曼完成了这一工作时，发现缺口很明显。秘密情报员所使用的通讯设备需要升级换代。有几次中央情报局使用了一种所谓的“爆发式发射器”，它可在几秒或更短时间一次以高速发出电文，这降低了被探测到的机会。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但也是昂贵的。小型化是另一个问题。电子装置，包括卫星使用的电子装置，必须小到足以安装在空间站上或藏于铁幕国家里。他们必须能工作数年而不必维修。

英曼确定情报收集工作必须适合艰难的环境——危机或战争。这就要求能在某些地区安全地通讯和传递大量情报，而这些地区并不必在热点名单上。美国情报界还需要更多的支持系统和预备情报来源，需要增加卫星照片和信号情报覆盖的频率，并更加迅速地对情报进行处理。到1981年秋季，英曼完成了一项规划的第一稿，它的标题是《1985至1990年的情报潜能》。凯西仔细阅读了它，问了许多问题主要是预算所增加的数十亿美元是否能成为里根军备重建的一部分或与之分开。英曼确信他能兜售给国防部。国防部副部长卡卢奇认为收集情报工作是防御的第一条防线，这方面改进所花的代价是值得的，它可以在今后长时期内节约数十亿的国防预算。

凯西在征得各部门和机构的一致同意后，才把这本一英寸厚的绝密计划提请里根审阅，在美国政府中没有几个文件比这更机密了，它是情报界未来的蓝图。

里根总统召集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开会研究这一情报界五年规划。国家安全计划小组正成为外交政策的基本讨论班子，它长时间地讨论了这一规划。英曼的规划说在过去的1980年情报预算为

60 亿美元，它预想在五年规划的头一年，1985 年，将情报预算增加至 20 亿美元以上。在以力量要求和平的心理学体系中，第一流的收集情报工作是主要支柱。利用美国在技术空间和电子方面的优势对里根很有吸引力。

经过审查和讨论，总统说："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承担起不这么做的后果。"

九

当有关卡扎菲威胁说要杀掉里根或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情报不断飞向白宫时，白宫对此的担忧再次上升了。对凯西来说这是个典型的“镶嵌图”，由许多小片组成了一幅非常清晰的画面。

这一案卷始建于八月后期。当时一个欧洲的情报来源报告说，一个巴勒斯坦的重要人物与利比亚总参谋部的一名成员举行了会谈，并一致同意发动一场反对里根的联合行动。一个来自另一巴勒斯坦高层人物的报告说地下组织“黑九月”已恢复活动并将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采取行动。还有在埃塞俄比亚的情报员报告的有关卡扎菲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威胁讲话。

九月初，在新德里，一位利比亚外交官的亲戚给美国在新德里的大使馆写信说利比亚计划暗杀里根。这是些肢离破碎的情报，未经证实，也出乎意外。这是否是出自良心的呼唤而应认真对待呢？凯西认为即使是靠不住的情报员也应予以重视，直至其情报被排除为止。

接下来“一位与利比亚高级军官关系很好的临时情报员”送了两份报告。一份说，利比亚正准备袭击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利益；另一份说，在罗马的利比亚人准备绑架或谋杀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马克斯韦尔·拉伯。

9月9日，一个欧洲国家的情报机构报告说意大利已逮捕和

驱逐了一些据信参与了针对拉伯阴谋的利比亚人。一周后，这个情报机构证实一个巴勒斯坦组织已同意帮助利比亚袭击里根和其它美国目标。

9月19日，一份报告说利比亚将对停留在地中海利比亚海岸外的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发动自杀式袭击。

10月9日，另一份来自某欧洲国家情报机构的报告说在卡扎菲去叙利亚访问二个月前，他会见了四个恐怖组织以谋求他们的支持，袭击美国在欧洲的目标。

10月17日，“一个经证实与利比亚高级情报人员有关系的情报员”报告说利比亚人已启程前往欧洲参加对美国在巴黎和罗马的大使馆的袭击。六天后同一个情报员又列举了美在雅典、贝鲁特、突尼斯、伦敦和马德里的大使馆。一周内，一位与利比亚情报官员有关系的中央情报局情报员报告说有五位利比亚人，可能是一个突击队的队员，已到达罗马。10月21日，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拉伯在去米兰途中因为安全原因被要求返回美国，甚至连衣服也没换就乘飞机回国了。

10月30日，意大利情报局告诉中央情报局，突击队已离开罗马去一个未知的目的地。

11月12日，在巴黎一名枪手向美国驻巴黎领事克利斯蒂安·查普曼连发六枪，他勉强躲了过去，据信利比亚应对此负责。

11月16日，一名报信者走进某美国驻外大使馆内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说他刚离开一个卡扎菲的训练营地。他详细描述了他们的训练情况——如何训练，例如去袭击一辆美国大轿车。这位报信者通过了美国的测谎器测验。

这位报信者补充说，如果里根总统被证明是一个过于困难的目标，利比亚人将以副总统布什，国务卿黑格或国防部长温伯格作为“潜在的预备靶子”。

凯西一直在收集更多的秘密情报，它们表明卡扎菲正在行动。

回溯8月19日，在锡德拉湾事件中卡扎非损失了两架飞机，在这之前他已与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签订了合作条约。这是由三个非洲最激进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集团，它以西边的利比亚和东边的埃塞俄比亚来孤立两者之间的美国盟友埃及和苏丹。南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尖端，对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严重的刺激。凯西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继续进行卡特任内已开始的秘密准军事援助。卡扎非已许诺给他的盟友8.5亿多美元的赠款，并已赠送了1.5亿美元，这是使凯西和他的分析专家们极为担忧的一种严重姿态。

中央情报局发现在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也门之间的合作条约还有些秘密军事附录，这三个国家一致同意由利比亚出钱保持一支由5000名利比亚人、5000名南也门人和5000名埃塞俄比亚人组成的后备军，而且2万名埃塞俄比亚人将去利比亚。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还说三国一致同意与位于埃塞俄比亚东南方的索马里国内的叛乱者合作。情报表明古巴在埃塞俄比亚保持有1.1万至1.3万人的军队，在南也门大约有500名古巴军事顾问。

卡扎非在1975至1980年向世界各地许诺给予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已达33亿美元。尽管他只兑现了不到一半，或14亿美元，但他已完成所承诺的70%的军事援助。

已决定起草一份有关该条约的《国家情报特别报告》，它于11月4日完成，这一秘密研究说这三个国家的动机是“挫败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

在这一背景下，凯西认为，必须对卡扎非的冒险、主张和许诺予以反击，对他在美国国内的任何冒险行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立即予以挫败。最要紧的是保护总统。白宫充满了此类情报——在《国家情报》中，在《总统每日简报》及在特别文件里。凯西不会因太多而马虎，太多总比太少好。

里根的白宫助手们命令采取进一步的安全措施，包括在里根

乘无标志的大轿车外出时在华盛顿周围派出作为假目标的大轿车，在白宫旁还部署了地对空导弹。

白宫上层对安全和威胁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丹佛，在整个政府激起了小风浪。没有任何措施被认为是反应过度。凯西提醒政府同事们注意上次险些成功的对里根的暗杀企图，教皇遇刺及萨达特被杀。

12 月 4 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一个利比亚五人突击队已进入美国。三天内又有报道说是一支 10 人突击队。移民和归化局向主要边境口岸和机场的办公室发出七页的“绝密”备忘录，在电视上播映了被指控的五人集体素描图。

在一片恐慌中，里根的高级助手米斯·贝克和丹佛觉得他们也可能成为靶子，因此给他们派了警卫。一辆秘密机构的轿车每日跟随丹佛女儿乘坐的公共汽车去她的私立小学——赫尔顿·阿姆斯小学，并跟随其回家。

黑格把协调对利比亚政策的任务交给了罗伯特·麦克法兰。麦克法兰曾是海军陆战队中校，现任国务院顾问。经过五周的各部门联席会议，麦克法兰向黑格呈送了一份 10 页的“行动/绝密”备忘录。在第九页上，黑格缩写签名批准下述选择：“与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制定对利比亚挑衅的反应。这一反应将包括美国和埃及的军队，进行秘密的、战术性的空袭和突击队行动。不主张动用大规模地面力量行动。”美国并不会入侵利比亚，但黑格希望采取某种不包含入侵利比亚的选择方案。

这份备忘录建议增加 SR—71 和 U—2 高空侦察机的侦察次数，其每次五小时的飞行任务耗资达 20 万美元。

11 月 30 日在一次绝密的国家安全计划会议上，总统要求制订“一旦发生利比亚进一步试图暗杀美国官员或袭击美国设施的事件，美国对利比亚作出军事反应”的计划。11 月 5 日，由黑格、

卡卢奇（代表温伯格）和凯西起草了一份很长的关于“对利比亚的反恐怖主义计划”的绝密备忘录。它包括一切——从怎样与国会和新闻界打交道到对利比亚进行紧急经济制裁，最重要的部分是紧急军事行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一致向总统建议：“应立即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准备力量，一旦利比亚进一步挑衅，即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自卫。”

一份绝密表列举了五个“等级反应”。第一级反应是直接袭击在利比亚的恐怖主义训练基地。卫星和其它情报已识别出16个可能的目标，其中13个在海岸上。这可由海军用舰载轰炸机完成，它的成功概率被认为是“中等”的。此行动自总统下令到袭击的反应时间为4至48小时。B—52轰炸机是另一项选择，但它的成功概率被认为是比较“低”的。五角大楼不愿进行这类行动，因而不愿描绘出一幅成功概率过分乐观的画面。第二级紧急反应是袭击卡扎菲的飞机场；第三级是袭击某海军设施；第四级是袭击其武器装备贮存地；第五级是用海军特别封锁队袭击其港内的海军舰只。最后的一级的成功概率被认为是“中至高”的。但封锁队的反应时间是在一至两周任务准备时间后的48至72小时。这样一种袭击应设法秘密完成，它是唯一的一种被认为是有50%以上成功概率的选择。

1981年12月6日，星期天，卡扎菲出现在ABC电视台的《戴维·布林克雷一周》节目上并接受了现场采访。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极力否认他曾派遣了任何突击队或暗杀队。

“我们拒绝暗杀任何人。”这位利比亚领导人说，他手托下巴梦一般向上凝视着空中一点。“这是美国的所作所为，他们准备谋杀我，在我的食品中投毒，他们试了许多东西来害死我。”他向美国政府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拿出证据。“美国人，”卡扎菲说，“你们是多么傻的人啊……，这些愚蠢的家伙，这个政府及这位总统

都是如此。美国人应摆脱这个政府，并像对尼克松那样推翻它。”

在提问时，卡扎非通过翻译说：“你们将会看到里根是个说谎的人。”而且他的政府对利比亚实行军事、经济、心理上的恐怖主义。“我们时刻准备进行调查并作出裁决，要看一看这些证据，因为我们肯定我们未派任何人去暗杀里根或世界上其他任何人。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大谎言。”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莫尼汉回答说卡扎非才是个撒谎的人，一个疯狂的独裁者。“我们有确凿的证据，美国官员曾是靶子。”当进一步催逼时，莫尼汉推诿说，约有80%的概率表明这一证据是真实的。

第二天，里根公开说：“如果我是你的话，（卡扎非）所说的一个字我也不会相信……我们有证据，他也清楚这一点。”

但政府认为通过新闻媒介的面对面的威慑仍不足，于是给了卡扎非一个直接的威胁。由于美国与利比亚没有外交关系，于是里根总统给卡扎非写了一封“绝密仅供阅览”的信件，通过比利时迅速发送。

“我有详细和经证实的情报，说明利比亚支持的几项在美国国内外暗杀美国政府官员和袭击美国设施的计划和企图。任何利比亚或其代理人指挥的对在国内外的美国官员的暴力行为将被美国政府视为对美国的武装袭击，我们将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卫这个国家。”

《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允许联合国成员国采取行动自卫。有关这一总警告的消息提供给了美国新闻界，但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未予提及。进一步，官员们告诉了记者们有关“最重要的后果”。12月10日，里根总统要求在利比亚的1500名美国人离开利比亚并暂时吊销前往利比亚的旅行护照，但未采取行动中断利比亚卖给美国的价值10亿美元的石油。

这些警告似乎起了作用。其后一周，一名利比亚高级情报官

员作为一名特使来到美国，说卡扎菲“极度渴望”开辟与美国的联系渠道以保证不会有恐怖主义或暗杀行动。

12 月 18 日，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有关据称暗杀美国领导人的计划的报告。它指出威胁里根的第一份报告——写于八月第三周卡扎菲与埃塞俄比亚总统会谈期间——是来自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报员”。但这份报告随后又泼了些冷水说：“然而，随后有关实施袭击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真正计划的报告仍来自于那些只有间接渠道的情报员，他们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有可能由于情报员知道我们正在寻找此类情报，便制造出此类报告。”

其后一篇国务院情报机构的秘密分析报告说：“中央情报局的记录表明，报告利比亚要袭击第六舰队的情报员之一曾在过去与一名苏联外交官保持接触。”另一些有关袭击美国高级官员计划的报告“大部分后来被排除”。这份分析报告还指出：“在认为存在美国利益的地区出现报告繁殖的可能性。”总起来说，这一备忘录提示所有有关突击队的报告都存在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提供假情报的可能性。

许多后来的情报经追查来自一个与伊朗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幕后人物——曼纽彻尔·戈尔巴尼法尔，一个富有的伊朗军火商。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他看到有关突击队的最初报告，认为这是给利比亚制造麻烦的机会。于是就一手导致这一问题达数月之久。不久中央情报局官方地和秘密地宣称戈尔巴尼法尔是一个“谣言捏造者”。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广播员丹·拉特尔问里根总统是否有关突击队的报告是假的。

“不，”里根回答说，“我们从许许多多的渠道获得了很多此类情报，而且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直接得到的事实，我们努力压制他们，我们努力使事情完全平息下来……但我们的情报是真实的。”

38 岁的众议员米歇尔·巴恩斯，一位看上去很认真的马里兰州民主党人，在 1981 至 1982 年间的冬季听到流言说美国正在制订对中美洲的秘密行动计划。巴恩斯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分会的主席，其负责地区包括中美洲，但由于他不是众议员情报委员会的成员，因而他无法知道在进行着什么。巴恩斯在国务院有影响力，尤其是对该地区助理国务卿汤姆·恩德斯。他确信如果他不知道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行动的话，就别指望他来领导西半球分会的工作。

巴恩斯在一次电话中对恩德斯说："我有些事想同你谈谈，而且我不希望在电话里谈。"他们商定在海一阿达姆斯宾馆共进早餐，那是家市中心的豪华宾馆，那里的桌子都距离很远以便私人谈话。

在吃完早餐后，巴恩斯说："我有份报告说中央情报局在招募雇佣兵去炸毁尼加拉瓜的桥梁。"

"你需要去情报委员会问一下。"恩德斯毫无表情地答到。两人都清楚这是纪律。恩德斯并未否认此事更使巴恩斯相信他的情报接近目标。

巴恩斯找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埃德沃德·勃兰德，70 岁的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他是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奈尔过去的同室好友。勃兰德不赞同年轻一代怀疑情报行动的观点，但他觉得巴恩斯应该知道自己负责地区所发生的事。因而勃兰德向巴恩斯解释了中央情报局计划让阿根廷训练 500 名反政府武装来阻断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

巴恩斯大吃一惊，他熟悉那些拉丁美洲的人物，没有人，包括中央情报局，能控制那些以残忍而闻名的阿根廷人，中央情报局本应选择智利强人奥古斯特·皮诺切特。

勃兰德说，不会有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会烧农场和其它设施。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将加以限制，它看上去不像是一宗特别

大的买卖。

巴恩斯要求恩德斯再次会面，这一次是在国际俱乐部共进午餐。当他们会面时，巴恩斯立场强硬起来：它听起来是个愚蠢的计划，许多人将被杀死。

恩德斯懂得如何恰到好处地安慰巴恩斯并使其消除疑虑。他说他仅仅同意那些绝对必要的秘密行动，巴恩斯也必然如此。这次秘密行动将不会有任何暗杀，整个行动受到严密的控制，不会发生任何侵犯人权行为。

巴恩斯表示反对。他说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将给桑地诺政权一个恰当的理由来加紧压制新闻界，工会运动和政治反对派，也将使他们有理由请进更多的古巴人。

恩德斯的回答是："相信我。"作为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直接参与了此事，这件事做的是对的。

巴恩斯觉得他的手受到了束缚。参议院由于有权批准条约和批准行政方面的任命而在外交上享有真正的权力，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最好不过是一个进行辩论的团体。在不知道秘密行动的情况下，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甚至连那点作用都没有。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公开听证会上，黑格拒绝排除一项反尼加拉瓜秘密行动的可能性，他补充说："但那无论如何不应被那些有害的调查者们理解为是表达了我们的政策。"巴恩斯回答说："根据你的回答，如果我是尼加拉瓜人的话，我将建立自己的防空洞。"

康奈狄克州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即使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也觉得被置于中美洲辩论之外。多德是一位37岁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曾作为一名志愿和平队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小村庄里度过了两年，并说得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听到了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流言，但他无法知道正在发生的事。

多德觉得，这个中央情报局在耍弄大棒，另一个世纪的美帝干涉主义。美国与奴隶主在穿一条裤子。多德估计，如果作一些工作的话，他能知道中央情报局计划的概貌。但那就会使他陷入"官方的"沉默，不能公开谈论此事。这是自相矛盾的，他或者对秘密行动继续一无所知并被人听起来像个妄想狂，或者一旦他知道这些事，便被封住了嘴。

多德参加了12月10日举行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秘密汇报会，由中央情报局负责拉美地区的情报官康斯坦丁·门杰斯汇报。他知道门杰斯是凯西的人，如果不提供有关行动的话，他也会提供一个线索，至少是一个姿态。这一汇报会最后变成了反对哈瓦那的政治演讲，它听起来象是罗纳德·里根的政治演说——谴责共产党并将中美洲的灾难归罪于莫斯科和马克思主义。多德于两个同事一起给凯西写了一封信，抗议门杰斯的作法。尽管多德不能证实但事件正在向何方发展是很明显的。但即使他能证实，他也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当凯西看到2月14日《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的中央情报局的耗资达1900万美元的尼加拉瓜计划时，他欣慰地读到："目前还无法知道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建议是否已被批准和执行。"

第二天下午，从2点30分到3点45分，凯西在紧急指挥室向里根总统作了一次绝密的特别汇报。他报告说杜威·克拉里奇已成功地在洪都拉斯组织了一些反桑地诺政权抵抗战士，跨越边界进入尼加拉瓜的行动即将开始。这一切行动预计将减少尼加拉瓜输出动乱和革命的行动。

二月晚些时候，一位了解政府所收到的情报及已采取的行动的政府官员同意与我在华盛顿郊外一次远足中进行交谈。他说现在所关注的是有报告说苏联人正在训练尼加拉瓜人使用先进的米格飞机。这被认为是"极为严重的警告"，因为这些飞机可能是尼

加拉瓜将开始一项将其解放战争扩大到其他中美洲国家特别是萨尔瓦多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黑格、凯西和其他人对此进行许多广泛的战略分析，按他们的推算，这些米格飞机可能使尼加拉瓜人拥有对加勒比海及靠近巴拿马运河的海上航线的潜在影响力——这是美国不会容许的状态。

这位官员说："尼加拉瓜政府正处在苏联人操纵之下，正如在越南战争期间我们操纵南越政府一样。"他又补充说："这一地区的重点是尼加拉瓜而不是萨尔瓦多——对萨尔瓦多的关注太多。"他断定这像正在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会迅速进入墨西哥。

这位官员说，如果这些新式米格飞机进入尼加拉瓜，里根将采取某种秘密行动将它们赶走。总统不会派军队去中美洲，他解释说，但里根不愿公开那么讲。另外，里根也不会派数以千计的军事顾问。

秘密行动现在进行得怎么样？如果其危险性只有他说的一半大，那么进行一次有节制的秘密行动肯定是符合逻辑的，尤其是总统竞选运动中已宣称支持中央情报局和支持秘密行动。

他拒绝回答。

1982 年 3 月 4 日，桑地诺统治集团的吉姆·惠洛克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在这篇讲话中他指控说一项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3 月 8 日，星期一，布雷德利请我在上午 9 时与他共进早餐。我们通过三个渠道肯定尼加拉瓜行动已得到总统批准。他说他想走慢一点，并耐心地提醒我说现在的政治气候已与 70 年代大不相同了。现在是里根执政，他说，那种认为发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自然好的推论已不复存在，它可能是很糟糕的。"发表该报道的理由是什么？"布雷德利问到，"我需要听一下理由，告诉我明确的理由。"

这样一种行动或这样一项战争行动会奏效吗？我问道。这能继续保密吗？它应该继续保密吗？

布雷德利说："我不知道上述任何问题的答案。中央情报局在失去控制吗？"

我说我不这样认为，里根已签署了这一指令。

布雷德利说，那么必须要有发表的理由。里根政府已明确表明它将采取措施保护事关国家安全的机密，那意味着可能是法律行动或者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结果。"情况来源想泄露它吗？"他问，"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我说他们不能肯定那是正确的步骤。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向前走，在录音机前说这些话并说出自己的名字？布雷德利问。那肯定会使这件事变得容易些。

我回答说，他们不能肯定自己会愿意这样做，他们想让布雷德利作出发表的决定。

"废话。"布雷德利说。

随后，他与戈德华特进行了接触，在新的国会监督法的规定下，戈德华特必定知道此事。戈德华特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一臆想的行动，一个字也没有说过。布雷德利说他从道德上肯定戈德华特不会撒谎。

几分钟后布雷德利接到另一个电话。

他说："戈德华特刚给我打电话，很长时间来他作了些调查，现在猜一猜发生了什么？"戈德华特说此刻"凯西正在我外面的办公室里等着。一定出了什么事，绝对肯定"。

布雷德利将与凯西本人会谈，而戈德华特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暗示戈德华特现在知道一些事或者将要知道一些事。

凯西肯定是急匆匆去戈德华特的办公室说明正在进行的事。但为什么戈德华特不知道？戈德华特因臀部手术已离开数月，或许他错过了重要的汇报会。

第二天，3 月 9 日，星期二，凯西和布雷德利在中央情报局共进早餐。布雷德利在下午约 2 时 30 分回来了，恰在《华盛顿邮报》的每日新闻会议时。报道已准备就序，但布雷德利未发出指令，他举棋不定。凯西的一切都不清楚，布雷德利说，他的讲话不清晰，当他吃午餐时，失真就更多了，他说话既含糊又回避。

《邮报》编辑们问，他是肯定还是否认这件事？

布雷德利说，当你回到这一问题时，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不过凯西谈到一支 500 人的军队，似乎它存在着或将要产生。有一次他说这支队伍还要扩大。但仍不清楚这支力量是阿根廷的还是中央情报局的。凯西说中央情报局将采取一切手段来阻止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凯西说这支军队并不是如我们消息来源所说的要摧毁某些如发电厂和大桥之类的设施。

凯西还提醒说无论中央情报局作什么，都已在三四个月以前也就是 11 月得到了批准。

有什么能加以证实吗？

布雷德利说，既有又没有。他很不愉快地看着办公室窗外，在脑海里重映午餐时的谈话。他又说，有些事不清楚，或者是他们想阻拦我们而不是吓唬我们。不过，他又补充说："凯西并未说'不要发表这一报道'。那可能会吓住我——我很高兴我不必闯那个红灯。"

凯西说这事关国家安全吗？

没有，布雷德利说。

报道草稿已准备好了，你将发表它吗？

"我不知道。"布雷德利说。

当天即 5 月 9 日同一时间，在国务院礼堂，英曼召集新闻界进行一次不寻常的展览和解说。

"我是鲍勃·英曼，"他严厉地说，"今天下午我来到这里是因

为我既很担忧也很生气。”他担忧的是尼加拉瓜军事力量的增长。“我愤怒是因为在过去几周里，我看到公仆们在保护极为重要的情报员和情报方法的同时，努力与向公众传递情报的困难作斗争，但他们发现他们总是很标准地遇到这句话‘除非你们给我看详细的证据，否则怎么能让我们相信呢？’”怀疑主义已经走得太远了，他说，他希望进一步中立，更多的信任。

约翰·休斯，国防情报局副局长，曾在20年前古巴导弹危机时提供了照片证据。他走上前，拿了一支3英尺长的教鞭指向一幅幅空中拍摄后放大到墙壁大小的尼加拉瓜的照片（由U—2和SR—71侦察机拍摄，没有绝密的卫星照片）。休斯说，它们显示桑地诺政权在二年内已建立了36个新的军事基地。在1979年革命时，桑地诺运动有5000名游击队员，现在他们有7万人在服兵役。休斯用教鞭打着这些奇异的表面呈粒状的照片，认别出那些苏联装备，包括坦克和小型野战炮，称为榴弹炮。这不是一支防御力量，他说，到处是古巴人的痕迹，卫戍区城楼设计的是苏联模式，直至障碍物的建造。

展览完后，英曼回答了提问，有人问到有关以前的一篇报道（那篇二月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所说的中央情报局耗资1900万美元的秘密行政计划。英曼实际上否认了所有关于它已被批准的看法。“我想告诉大家，”英曼诚恳地说，“这些日子1900万或2900万不会给你买来太多东西，可以肯定这也不足以反对一支那样规模的军队。”

这次汇报会成了大新闻，凯西希望再来一次古巴导弹危机——该水平的爆炸性宣传。广泛认为英曼否认了任何1900万美元的秘密行动计划已被批准。

这很令人烦恼。英曼不太可能会公开对已被总统批准的计划肆意抨击，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语调是支持总统，凯西和这些“公仆”在努力解释中美洲的危险。但我们肯定自己的报道是对的，

英曼不知情似乎令人不可理解。

《华盛顿邮报》的国内编辑比尔·格雷德将我们报道的内容提要中所用的“有限的秘密战争”改为“秘密行动”。帕特·泰勒争辩说这冲淡了文章的中心论点。他辩论说任何类型的准军事行动都是战争，他已小心地使用了“有限的秘密战”这个委婉用语。

目前还不清楚布雷德利是否会同意任何形式的报道，他正在其玻璃墙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弄得许多硬币在口袋里叮当乱响。

布雷德利会见编辑们及其他人，并听取建议。格雷德，或许在他认为是最热烈的，却也是最冷漠的。他说他不能接受秘密政府，秘密计划，秘密战争。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就应发表我们所知道的，在这一事件中并无令人吃惊之处。里根竞选胜利和其政府的允诺中包含有反共秘密行动，这正是选民们选他的目的之一，没有人比里根更清楚这一点。格雷德说白宫或许会对这一报道的发表而感到高兴。他指出我们过分注意了中央情报局的方面，秘密的方面，大战略方面，我们忽视了向桑地诺政府宣布秘密战争的政治意义。在里根本人所非常关心的政治论坛上，一项反桑地诺宣传运动将受到欢迎，里根的赞助者将喜欢这场运动。不过，他补充说，不存在什么保证，唯一能保证的是我们报纸的任务，我们应发表。

格雷德提醒每个人回忆一下1980年共和党竞选纲领。纲领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运动夺取了尼加拉瓜感到痛惜……我们将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建立自由，独立政府的努力。”这一纲领还许诺建立一个敢作敢为的中央情报局，这一行动是两方面密切的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不过报道了里根所发出的在宣传运动上的许诺，凯西并未要求阻止这一报道的发表。“这个混蛋，”格雷德说，“他或许希望它发表，如果我们不发表的话他或许会确保让它泄露出去。”

有一点仍很含蓄，里根执政一年多了，但政府与新闻媒介的

关系仍不明确。总起来说，报道不是那么具有进攻性。里根实现了其一生的抱负近一年了，仍度着延长了的蜜月。同时，政府并没有对新闻界采取任何一致性的攻击。对新闻媒介也有通常的批评，但从未接近以前政府的水平和敌意，例如尼克松时代。很明显没有人，包括布雷德利，愿意先打第一枪从而引发一轮新闻运动。

下午6点左右，格雷德说布雷德利已决定第二天发表该报道。他说这是最后的决定。从没有人能使他担忧而比别人更加优柔寡断。但总起来说，在这件事上他曾犹豫过。

“我看到你已接近不准备报道这件事。”我对布雷德利说。

“是的，”他说，“可能是那么回事。”

“那么你为什么又决定报道了呢？”

“凯西的拒绝是温和的。”

这一报道在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头版，第一行小标题写着《美国批准在尼加拉瓜的秘密行动》，它被置于右上部，其上面是有关英曼所举行的显示尼加拉瓜扩充军备的新闻发布令的简要报道。任何感兴趣者都可以看到这一秘密报道。但它本不属于那种炫耀，以表明《华盛顿邮报》认为它发现了宇宙产生之谜或某些“肮脏的”秘密行动的暗杀等。

第二天上午7时，新闻网将这一有关秘密计划的报道作为首要新闻。到此为止，还没有来自政府的反应。其后整整一天，政府对此保持沉默，黑格反说：“谈论机密行为是不合适的——不论它存在与否。”温伯格说：“我不会加以评论——我永远不会。它们是高度机密的，整个议题都是。”凯西什么也没有做。

当晚三家主要电视网作了简要报道，证实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很清楚白宫在采取表明里根对待尼加拉瓜强硬的立场，而且里根本人希望这个广为人知，他认为这对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加

分。格雷德是对的。

3 月 15 日，《纽约时报》引用戈德华特的话语说："《华盛顿邮报》报道的一切都是对的。他们不知道一切，但他们所掌握的一切都是对的。"

同一个星期六，凯西在华盛顿的总统研究中心发表讲话。凯西信奉公开演讲，他对演讲很用功，常常整篇都是自己动手。它们几乎完美地反应了他对自己在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日常工作和任务的看法。但当时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些演讲是对内幕的一瞥。

凯西开始引用了华盛顿将军要求情报行动要保持秘密的讲话："大多数北美事业的成功有赖于保密，如果缺乏这一点，无论计划及前景多么得好，它们总是要失败的……"凯西随后登上了世界舞台，他说："这个世界正在被颠覆、正在被一个女巫所策划动乱，恐怖主义和暴动所烦扰，所围困着……"这主要是"在苏联的武器，古巴的人员和利比亚的金钱的支持下进行的……"

他讲述了这一段历史，作为越南战争的后果，"苏联人从 1974 年至 1975 年开始在第三世界推行了一项新的更具有进攻性的战略……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气候了如指掌"。通过使用代理人，例如古巴人进行一些毫无风险的行动，苏联人到处挑起动乱。凯西说，70 年代为苏联的代理人战略已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柬埔寨和尼加拉瓜获得了成功……"

"支持一项暴乱要比我们及朋友们对抗它要容易和便宜得多。在一个小国家里相对而言只要几个人和很少的援助就可以打破该国的国内安宁和经济稳定。"

十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佛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特里克·利伊发现暴露在委员会汇报会上的秘密太少，他常常对此很不满意。它们正如魔术师手中的一副牌一样，无法说明是否应相信听到或看到的。委员会成员所拿到的或是一份总的看法的摘要；或是间谍业目录中的一个系统名称及其描述；或是一份逐条列举的预算报表；有时是有关某一国家首脑的一点点内幕情报。

利伊是水门事件的产物，在尼克松辞职后，34岁的他当选为参议员，成为佛蒙特州历史上唯一的民主党参议员。他习惯于从外表观察事物。出于对秘密集中权力的怀疑——尤其在里根执政时，利伊想知道如果所有的情报记录都展现在他面前，他会发现点什么。在他任奇坦登县检查官时，他亲自处理所有重大案件。把你的手和眼睛置于证据之上是发现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唯一途径。

情报委员会的每一位参议员都配备一位助手，称为“指导者”，来指导他走出那复杂、充满多种专门术语的情报迷宫。利伊从一位前参议员那里接来特德·拉尔斯顿作为他的“指导者”，拉尔斯顿告诉他如果他想了解情报界，他就必须知道国家安全局及其窃听。有一个称为“漩涡”的卫星指向世界的特定地区并具有与在不同国家美国大使馆的窃听站相同的窃听能力。国家安全局具有最多、最好的情报来源。对窃听信号的译释需许多小时的艰苦工作，包括听取、查明类型、频率、新的方法和通讯关系、确

定其途径并译释其含义。

拉尔斯顿说这些就是其行为所在。情报收集工作已具有惊人的技术：你必须懂得它能做什么和怎么做，并了解未来几年会如何变化。拉尔斯顿建议利伊参观一下国家安全局在海外的设施，于是制订了一项欧洲之行的计划。

在英曼 1977 至 1978 年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期间，拉尔斯顿和英曼关系密切。他当时负责参议院对武器控制的监督工作，是与国家安全局非常熟悉的三名工作人员之一。拉尔斯顿在英曼被凯西晋升为四星海军上将并担任凯西的副手后给英曼买了一套四个将星，而通常新将星总是由新晋升海军将军的家里赠给他。

在几年时间里英曼指导拉尔斯顿走出了技术性情报收集工作的迷宫，而拉尔斯顿则使英曼能随时知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干什么，因此当英曼在与参议员们交谈或参加汇报会时，他知道每个参议员所关心的是什么。

像两位老事务官员一样，他们相互间配合很好，每人都有理由也需要知道对方的事。在许多或甚至所有场合下，英曼都能满足所有参议员们的期望，尽管这有时看来不可思议，那样的话就会使他们各自的工作更容易些。如果英曼给参议员们留下一个强硬而消极的印象，即包括共和党也包括民主党参议员，那么这会有利于情报委员会和其监督过程。尽管有几位工作人员认为他们的职业联系变成了对个人的效忠，但没有人抱怨。尽管如此，英曼毕竟应该为凯西工作，而拉尔斯顿为利伊工作。

利伊参议员和拉尔斯顿参观了伦敦以北 200 多英里，约克郡荒野上位于哈罗盖特的国家安全局设施。

利伊问了些有关截获通讯能力的实际问题，苏联人正在靠近波兰边界一带集结坦克，利伊想知道格罗盖特情报站是否能截获单个坦克的通讯。

这一奇异的分系统的功率是多少兆瓦？拉尔斯顿在哈罗盖特

工作人员还未来得及回答利伊的问题前抢问到。在这次陪同大人物的参观中，拉尔斯顿伸长脖子好奇的看着，听着，并问了些技术问题，以炫耀自己的知识。利伊希望能在助手之上使自己的疑问得到解答，但拉尔斯顿似乎在这个“间谍玩具店”里已不能控制自己了，他对上方的系统大声提问，哦，好的，它们与国家安全局在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松峡的国家安全局设施如何联系呢？

“住嘴吧！”利伊刻薄地说：“让我问几个问题！”

在他们继续前往西德途中，利伊幻想着把拉尔斯顿扔出飞机。在土耳其，拉尔斯顿从美国大使那保持一定温度的雪茄烟盒中抓了一把雪茄烟。利伊对自己的行政助理说：“我不知道该对那个杂种怎么办。”

在他们返回美国后，利伊想出了解决办法，他解雇了拉尔斯顿。

拉尔斯顿向市中心F大街的情报联合办公室申请工作。这是凯西让英曼分管的领域。作为一名参议员助手，拉尔斯顿不必参加测谎器测验，但情报联合办公室的申请程序之一是测谎器测验。因此对他进行了常规测验，就有关拉尔斯顿管理机密材料提了几个基本问题。他曾将机密文件带回家吗？

对很忙的政府职员来说把文件带回家并不是不常见的，这就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种行为很普遍，因而这是判断某些人是否诚实的绝妙测验。其目的不是发现无关痛痒的违犯纪律现象，而是为了找出严重的安全缺陷、泄露机密者或偶尔情况下，一个间谍。但这一问题真正使人陷入困境，它使许多人对测谎器测验非常厌恶的原因之一。回答必须是“是”、“有”或“没有”。大小问题混为一谈，其选择或是承认或是否认并冒通不过的危险。

拉尔斯顿未通过，他曾将一份他写的有关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情报机构在伊朗行动的报告的复印件带回家中。拉尔斯顿在测

谎器测验中的失败对他和英曼都是场灾难。在情报联合办公室将不会有他的职位，更糟的是，新上任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罗伯·西蒙斯决定对拉尔斯顿进行调查。拉尔斯顿还有更多的问题，他曾将约500份秘密文件带回家，其中有些是绝密的。他曾将其中一些文件还给委员会保密室主任，一些直接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在有关伊朗的研究报告中一些秘密情报员可能被鉴别出来，虽未提及他们的名字，但有人可从文件中推断出他们的身份。

西蒙斯把拉尔斯顿曾带回家的文件列成名单，把它交给了中央情报局，并要求中央情报局进行一次例行的损害估价。

其后不久，西蒙斯收到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它说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文件被实际泄露过，尽管它们被不合适地储存在拉尔斯顿家中，没有证据表明其他任何人曾看过或拿过它们，因此没有泄露，也没有造成损害。

西蒙斯简直不能相信这一推断，损害估价通常是考虑可能存在的最坏情况，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储存这类文件自然意味着可能泄露，但还有些事更糟糕。西蒙斯沿着中央情报局的这份备忘录及其结论追踪到了拉尔斯顿的朋友和教父，博比·英曼。西蒙斯认为英曼可能在保护拉尔斯顿，因此他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内部调查。

这是一项冗长乏味的工作。经过重新检查过去的文件，西蒙斯发现过去几年几乎每份进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秘密文件或报告上都经过拉尔斯顿的签名或填表借走。如果他已全部读过，那么拉尔斯顿就是一部美国情报潜在能力和行动的百科全书。

西蒙斯断定，实际上拉尔斯顿是英曼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间谍。刺探有关委员会的行动及计划。西蒙斯清楚，这是一种最非正式的间谍关系，而且或许间谍这个词太严厉。它没有违法，没有不合适，对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来说，对拉尔斯顿和英曼来说是有点不体面。从在中央情报局担任10年行动官员的经历

中，西蒙斯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间谍有些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陷入了圈套，确信他们在为自己人收集情报。最优秀的间谍是狡猾的，他们潜藏于日常交往之中，因此任何人都可能会说："只做本职工作。"在日常的、不留意、不加思考的交流行为中，在读、谈、问中，大量的情报可能被传播到错误的地方。拉尔斯顿事件或许不过是两个相互依赖的人的疏忽。

西蒙斯向戈德华特简要汇报了这一问题。这位当选主席最后决定不将此事移交司法部起诉。这有以下几个理由：很明显拉尔斯顿无意造成损害；无法证实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和泄露了情报；如果它公布于众，将会导致可怕的混乱，将严重损害监督过程和委员会的可信性。最后，由于有英曼这一隐蔽的个人动机，戈德华特不忍看到英曼曝光并易受曲解。西蒙斯收回了拉尔斯顿的安全许可证。

"好的。"戈德华特说，明显认为那是正确的惩罚。拉尔斯顿想获得一份与一项重要国防合约有关的工作，但无法获得一份新的安全许可证。

有些委员会工作人员仍与拉 尔斯顿共同午餐，因此西蒙斯召集全体工作人员，说明拉尔斯顿是不受欢迎的，他们最好在其生活中离开拉尔斯顿。

当拉尔斯顿请求利伊参议员为他写一份品行证明时，利伊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在其最后报告中，西蒙斯作结论说它可能是国会最大的机密材料泄露事件，当然也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大的。他命令对委员会的一切资料包括数以千计的文件作一次安全审查。经安全官员们对每个文件柜和委员会角落的调查，发现有40份文件无法解释地失踪。其中多数已丢失数年之久（许多已被一位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签字借走），西蒙斯判定那件事可采取的行动不多，但得到了许多重要教训。

其后，当凯西指责说据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泄露机密时，西蒙斯为自己的安全记录进行了辩护。“那么那个家伙拿走那些文件是怎么回事?”凯西问道，但他没再多说，也没采取行动。

对英曼来说，暗示拉尔斯顿是他的间谍是荒谬的。从定义上来说间谍和其主人——假设是英曼在这一编造的电影剧本中所担任的角色——的行动是违背他们应服务对象的利益的。然而，英曼只是为美国情报界的利益服务，拉尔斯顿也是如此。不错，拉尔斯顿是犯了错误，但并未产生损害。那些认为这是间谍活动的人犯了严重的官僚病，它反映出一个盛行的观点，就是敌人，应作为一个怀有敌意的情报机构来对待。这种观点在中央情报局和国会监督委员会内部都很盛行。

凯西对国会监督委员会的看法很简单，当涉及重大机密时，他的指示是：“要限制接触途径，不要去汇报。”

在拉尔斯顿被赶走，而戈德华特又在医院住了近三个月时，英曼觉得自己像被隔绝了一样。除此之外，《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对英曼在报刊上进行了多次猛烈抨击，称英曼是一个“钟表制动机那样的人”。控制戈德华特并反对秘密行动。最近萨菲尔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指控英曼正在“对记者们编造一则假报道，说以色列正在大力宣传利比亚暗杀队（突击队），以便其对利比亚核反应设施实施空袭……”

英曼觉得这是对人身的攻击，他并没有编造任何事，很明显这是一个亲以色列的人士透露给萨菲尔的，该人士痛恨英曼坚持以色列不应得到任何可用于进攻性袭击的卫星照片，如它在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中的类似情况。英曼觉得以色列会做出反对卡扎菲和利比亚的任何事。实际上，他认为如果以色列认为暗杀卡扎菲会在与美国关系中赢得足够点数它就会那么做。

但英曼对萨菲尔的攻击有一种模糊的怀疑，或许这些批评是

直接或间接支持凯西。英曼知道凯西与萨菲尔之间有秘密途径联系。这得追溯到大约15年前，当时萨菲尔曾组织了凯西在1966年未成功的竞选众议员活动，甚至送凯西去一个演讲辅导班。但凯西未能纠正其讲话含糊的毛病。他还掌握有凯西和萨菲尔最近接触的详细证据，它是一位情报官存在资料库中的一次零碎情报。当时一位《纽约时报》的编辑给英曼打电话提出紧急请求，其报刊出版商阿瑟·奥克斯·索尔兹伯格想要凯西家中私人电话号码给他打电话，因电话无登记而不知道号码。这个号码正确吗？该编辑问道并读了一个号码。这是凯西给了少数几个人的一个号码，包括英曼。英曼对《纽约时报》编辑知道这个号码感到很吃惊。

于是，该编辑说，那么说比尔·萨菲尔的号码是对的。

是的，英曼说。

英曼无法肯定凯西在萨菲尔的抨击中做了手脚，但他无法减轻对凯西的预感和警惕。

新年后的第一天下午三点，里根总统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米拉杰大农场的沃尔特·艾恩伯格庄园会见了丹佛和比尔·克拉克。在二个半小时中三人讨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宜。艾伦即将辞职，里根决定克拉克从国务院调任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在所记录的这些谈话的备忘录中说，将赋予克拉克与总统直接联系的权利并使其成为白宫有关外交事务的唯一发言人。

凯西很高兴听到这一点。克拉克在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曾任里根的办公室主任，他是里根的密友而且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

在任命宣布后，克拉克找到英曼，听取如何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打交道，尤其是与负责情报方面的职员肯尼斯·格拉芬里德打交道的建议。克拉克仔细听着，并且自己避免表态，英曼明白了，克拉克已向格拉芬里德宣战了。

格拉芬里德的日常工作是反间谍，他将其注意力转向一个新流行的称之为“伪装、隐蔽和欺骗”的假说之中，它强调了苏联进行欺骗的努力。格拉芬里德想查一下是否有可能美国所获得的一些情报是苏联人设下的大骗局的一部分——尤其是卫星照片及所截获的通讯。他认为，苏联人进行了欺骗行动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美国从未真正发现过一个骗局，因此，查一下是否存在苏联人正在进行而我们却忽视了的一些更大的成功骗局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

英曼信奉国家安全局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只是相对纯净。怀疑主义是必要的，偶尔会有欺骗行为，但极端的怀疑主义就成了偏执狂。即使苏联人能建立起电子技术和影像上的“波特姆肯”村，他们即没钱，也没时间建那么多。英曼的结论是，由于大量的情报取自苏联，而且其形式连续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因此说格拉芬里德的推理是不可能的。

英曼对格拉芬里德这样一位年仅 41 岁的前海军飞行员，仅靠在国会当一年调查员及在国家情报局工作一年就具有这么多的影响感到不快。但英曼也知道在许多方面为总统服务而设立的情报机构，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一个有职有权又很有见解的职员可以驱动情报的重点和资源——甚至于政策。

格拉芬里德采用了英曼的一项管理方法。他大多按照英曼所成功地推行的“1985 至 1990 情报潜能研究”的方式发起了一场综合性的反间谍研究。格拉芬里德说，应打破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军事情报机构间的官僚壁垒，如有必要应建立集中的反间谍权威机构和集中的记录。美国按边界划分的反间谍功能（中央情报局负责国外，联邦调查局负责国内）完全是人为的，民权主义者担忧两者的结合完全是无端的恐惧。克格勃并没有奉行这种划分方式。

克拉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是格拉芬里德的一个机会。格拉芬里德将一份拟议的要求进行广泛的反间谍研究的《国家安全决定指导》送给克拉克交总统签署。克拉克对此很热心。

又有人传话给英曼说格拉芬里德将仍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它是由克拉克的新副手巴德·麦克法兰传过来的。麦克法兰跟着克拉克从国务院转至国家安全委员会，他告诉英曼说，格拉芬里德得到了重要的支持。

英曼很快收到了里根签署的上述《国家安全决定指导》，设立了负责情报工作的具有潜在权力的两个高级跨机构小组——一个由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领导，另一个由国防部副部长卡卢奇领导。

英曼在一场重要的官僚战中失败了，很明显格拉芬里德不仅留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找到了一个有影响的职位。

凯西对新的《国家安全决定指导》把反间谍政策由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来控制感到不愉快，但他不认为这是宗大生意，肯定它不是块值得担忧的地盘。有些人虽已长期在政府工作但仍对这类斗争看得非常认真，凯西对他们的能力感到吃惊。英曼断定，或许凯西也有份。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一年后，英曼逐渐把凯西看作是一个“怪人”，这是凯西常对他们中间的乖戾的人说的话。凯西是一个即硬又软的人。最近有一份有关中东的《国家安全特别报告》，有四种观点比较有力：一个是中央情报局专家们的，一个是国防情报局的，一个是英曼的，还有一个是凯西本人的。凯西是否运用了自己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力完全可以排除其他人的而将自己的观点作为主要结论？没有。他简单地，英曼觉得也是很有勇气地将四种观点全部呈交总统。

但在行动和秘密行动方面，英曼觉得愈来愈烦恼。因为凯西

让中央情报局与世界上某些声名狼藉的人物结盟。

凯西曾接待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埃尔·沙龙。沙龙是一个强壮、好战的前将军，有着极端的鹰派观点。以色列正向黎巴嫩的主要基督教民兵组织——极右翼的法伦党提供秘密准军事援助。该党领导人巴希尔·杰马耶勒是一个长一副娃娃脸的残恶的军阀。现年 34 岁的杰马耶勒已发展成为黎巴嫩最重要、最具魅力的领导人，并铸成了自己在未来成为黎巴嫩无可匹敌的、最有权力的角色。以色列的冒险计划正在奏效，沙龙希望中央情报局能给杰马耶勒以 1000 万美元的秘密准军事援助。

英曼表示反对。在 1978 年，巴希尔的军队对基督教对立派系的政治继承人托尼·弗兰吉的避暑别墅进行了闪电袭击，屠杀了他本人、其妻子及他们两岁的女儿、卫兵们甚至仆人。1980 年，巴希尔的民兵几乎完全消灭了黎巴嫩前任总统考米勒·查蒙领导的对立派基督教民兵。

巴希尔是一个野蛮的杀人犯。

但还有更多的类似事例——有些隐蔽于情报文件中。

回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黎巴嫩学完政治、科学和法律后，巴希尔前往美国为华盛顿一家法律公司工作并被中央情报局招募。作为皮埃尔·杰马耶勒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无疑他注定成为这一有权势的家族中较不引人注目的一位。长子将继承法伦党的领导权，该党创建于 1936 年，当时是一个年轻人的体育和军事运动。尽管巴希尔定期领取中央情报局报酬并有一个“代号”——一个特殊的密码名称，但他不是受中央情报局控制的特工，因此他的报告可能传阅范围虽广但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他的情报员身份。报酬起初是象征性的几千美元——一项现金与情报的直接交换。

但在 1976 年，当巴希尔无视黎巴嫩人的惯例取代其长兄担任该民兵组织领袖后，他的报酬和重要性都增长了。贝鲁特是中东

的十字路口及最西方化的阿拉伯首都，到处都充满着阴谋，中央情报局在此保持较大的力量。当有权和富有的黎巴嫩人旅行经过这一地区时，可向他们提供有关不好接近的阿拉伯国家的珍贵情报，巴希尔的作用及其情报范围都增大了，情报质量也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很快认为他具有“地区影响力”，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同时，在黎巴嫩，他变成了一位具有广泛感染力的领导人，一个谈及建设一个“新黎巴嫩”的爱国空想家。

英曼认为巴希尔是一个杀人犯，中央情报局不该与这个恶魔有任何关系，并不应向他的民兵组织提供那1000万美元的秘密援助。以色列人和沙龙正在编造一些东西，他们在黎巴嫩影响太大了，正寻求更多的影响。沙龙与他的朋友，前将军黑格关系密切，他通过上层人物将这一压力全部传到里根政府那里，很快他的压力通过黑格向政府传递着。

凯西考虑着从各情报站发来的报告。奇怪他在贝鲁特的情报站是反巴希尔的，它同意英曼的观点认为他是个残暴的及玩世不恭的操纵者，在耍弄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并向可利用的人企求同情、哭诉痛楚以寻求支持和装备。泰尔·艾维夫情报站反映了与以色列——沙龙相同的观点，坚持认为巴希尔正迅速上升，像是一个将稳定黎巴嫩的人物。它并未对他表示赞赏但建议适应现实。凯西很欣赏它能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事，有时中央情报局不得不与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一道工作。巴希尔强烈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而凯西认为巴解组织是以色列的真正威胁。

英曼在这次辩论中又失败了。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绝密指令，批准向巴希尔的民兵组织提供1000万美元的秘密援助。

至1982年3月中旬，英曼对自己作了又一次估价。再过二周他将55岁了，他在海军中已升到了可能范围内最高军衔，他可追逐的唯一更高职务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而那是不可能得到的。他

已接近一生中毫无退路的年龄，如果他想开始第二个职业，他必须现在开始。他不能容忍退役后担任某些无用工作的前景，这些工作可能是顾问或军火推销商，或在马里兰州东海岸非法经营房地产，或当退役将军们的保管人。他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托马斯和威廉将很快上大学了。简单的事实是他无法负担送他们去昂贵的私立大学的费用。在海军服役近30年，他只有三笔财产——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抵押的四卧室住宅（每年8%，共22年，属阿灵顿信托公司），在海军联邦存款互助会的几千美元及几千美元美国储蓄债券。（凯西可能会嘲笑居然有人将钱存入这样一种得利甚少的投资企业；凯西在储蓄债券的记录是零。）

英曼也意识到自己对情报的兴趣在衰退。他曾好几年对如何获取情报非常着迷，几年后明白了情报的含义。但凯西带他与黑格或温伯格所共进的那些次早餐点燃了他对如何使用情报的兴趣，那就是政策，而且他现在知道了政策的内容是什么。他干了一份错误的工作。

当年三月，公开暴露尼加拉瓜行动带来了几个问题引起了注意。凯西和杜威·克拉里奇正在实施这一计划，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约翰·斯坦向英曼抱怨说他正受到排挤。尽管英曼了解总的行动，但它试图绕过他。他不得不撬进去才能发现细节，而且他不喜欢所发现的东西。秘密援助将给埃登·帕斯托拉，一个前桑地诺分子，著名的零号司令，在革命胜利后他与桑地诺运动绝交。英曼说，帕斯托拉是一个“梭子鱼”，中美洲与黎巴嫩的杰马耶勒相对应的人物。帕斯托拉从位于尼加拉瓜南部的哥斯达黎加出发行动，而萨尔瓦多位于尼加拉瓜以北，有些人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帕斯托拉在离可能的向萨尔瓦多武器运输线300里以外地区行动。这一简单的事实使所宣称的尼加拉瓜行动的目的是阻断武器运输成了谎言。英曼清楚给帕斯托拉的援助目的在于推翻并取代桑地诺政权。凯西对桑地诺政权的不妥协甚至是咆哮的

详述告诉了英曼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当英曼进一步看文件时，他的怀疑增多了。他问了些问题，看了更多的文件，他开始对尼加拉瓜计划保密的隐晦的理由表示怀疑。他断定政府不敢公开该计划，因为那样他们不得不对国内政治付出代价。英曼现在绝对相信其保密是为了避免一场公开辩论。行动公布后，似乎没有人关心它。这个信息清楚地表明，即使秘密行动被公开，里根与凯西仍可以侥幸完成这些行动。国务院、白宫和凯西都会要求更多的秘密行动。外交是一个长时间的、拖长的过程，非常令人灰心丧气。而秘密行动，首先有些害羞，又便宜而且肯定不那么令人沮丧，这显示出了它的朴素。这种迅速而秘密的惩罚简直是奇妙的发明。

英曼从来不喜欢行动处的那些人，这始于1965年他在斯德哥尔摩任海军助理武官时。当时他有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向他提供其它国家的重要军事情报。当地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小而傲慢，试图偷走他这个情报员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毁掉这个情报员，就向瑞典当局暗示他们有一个泄露机密的间谍。英曼永远忘不了这件事。

何时行动处的秘密准军事援助起过作用？在英曼看来从来没有过。即使他曾起过作用，一个美国支撑的政府可能很容易地变得比其所取代的政府还要糟糕，或无法进行统治，保住政权。

或许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发动秘密行动是很正确的，或当苏联应用古巴代理人的军队时亦是如此，因为这可以增加苏联人的代价。秘密行动可以有效地对抗苏联人的宣传运动，但只是普通情况下如此。

英曼对秘密思维模式主导情报收集工作甚感忧虑。中央情报局正在扩展那些秘密收集行动——国外的电话窃听、室内窃听及其它设备的秘密收集情报活动。这些秘密的技术性收集具有其吸引力而且可能获得大成功——例如一位首相的完整对话，并因之

而获得白宫的赞赏。英曼曾对采用色情行为的行动之多感到吃惊。但在他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四年间，他了解了秘密收集行动的缺点。尽管不被认真考虑，但它们仍存在暴露的危险。另外，这些行动其生命期有限，约为18个月至2年，因窃听器可能被发现，电池会耗尽，或者会出现故障；一个重要的目标可能会转向其它工作；或对方会有意采取一些对抗措施；或出现意外事故。

非秘密的行动——卫星拍照、收集无线电和其它信号、破译电文等——不需要秘密安置一个室内或电话窃听装置，因而它更为可靠，也不那么脆弱。这一有条理、有技巧的方法不符合秘密思维模式或凯西的急躁情绪。凯西希望引起白宫的轰动。

前一个圣诞节，英曼的大儿子就爸爸极度紧张的时间和紧张的心理问了英曼一个问题："这么做生活的质量何在?"这个问题至今仍回响在他的耳畔。

英曼前往夏威夷休假，休假本应为两周，但10天后他就返回了兰利总部并有意识地干涉凯西和克拉里奇。他们正在组建一支军队，英曼对此有些疑问：这些反政府武装要去哪里？中央情报局要干什么？政府呢？有计划吗？与帕斯托拉联手是否已明确表明这不是一次阻断武器运输的行动？我们知道反政府武装是些什么人吗？这是一项推翻政府的行动，是不是？这就给那样批准这一计划的指令带来了麻烦。中央情报局已接近于或已经超越了指令的授权范围，是不是？

凯西和克拉里奇没有回答，他们不喜欢这些问题。这是政府的政策，得到所有部门直至总统的赞许——或许未表现在指令之中，但它正是罗纳德·里根所希望的行动。凯西肯定自己有稳固的基础。

半小时后，英曼强硬起来，不安地感到心里在燃烧，自己接近发怒。他不时为自己所感到的完全是对该行动惊恐的吃惊。但凯西和克拉里奇毫不在意，陶醉于其自信之中，根本听不进去。英

曼觉得自己成了个局外人，一个障碍。

最后他站了起来，疾步走了出去。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英曼以前从未干过这种事。他在海军情报系统的晋升也来自于他那能使人息怒、避免对抗的能力。他与凯西的关系跨进了新的门槛，对他本人也是如此。

凯西发现英曼才华横溢但又很脆弱——一个金童子却担心自己的形象，不愿意使他蒙受危险，或者对中央情报局来说，不愿意完成棘手的任务，过分担忧秘密行动不能被他的自由派、民主党的和新闻界的朋友们所接受。英曼的离开将会造成与国会的麻烦，但那能够设法解决。英曼受两党欢迎无疑可在国会起缓冲作用，但凯西现在全面了解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该怎样干，而且一个不那么关心自己形象的副手可能会更有用。

英曼相信剩下的只是辞职的手续了。3月22日他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信，向总统提出："我去年很犹豫地接受了您的请求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同样的，我将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辞呈。"

在赞扬了总统倡导的"重建"中央情报局之后，英曼说："我衷心祝福您及凯西局长继续获得成功。"在将此信交给凯西前，他将其复印件送给布什、温伯格和克拉克，并使他们确信这是他的最后决定。凯西很恼火，担心这会泄露消息，不过当他开始寻找继任人时，这一辞职仍未暴露。

1982年4月21日，星期三，在《华盛顿邮报》报道尼加拉瓜秘密行动后六周，我去拜访戈德华特，想看一下是否中央情报局已向他全盘通报了这次行动。参议员的办公室布置得如同赛车在中途修理站受到人们的精心修理一样。有些纪念品和奖品挂在墙上或放在桌子上，这都是地位和政党的标志。在戈德华特的办公室，一切都井井有条，唯一不同的是放在他书桌后面一张桌子上

的一堆业余无线电发报设备。

戈德华特说："当本（指布雷德利）给我打电话说中美洲的事时，只听了一点我就清楚他知道整件事。因此我只是说'哦！唔，唔，我记不得了。你为什么不给比尔·凯西打电话'，我对本装聋作哑。"

他曾错误地引导了我们，但并未说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很微妙。

"我认为美国人民应知道那些事，"戈德华特补充说，"实际上它能公布于众我高兴极了。"出于这种理由他在《邮报》的电话录音中证实了这一行动。

他解释说，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应进行"公开性秘密行动"——即公开又秘密，这样做很好，不会使人吃惊，也不会在执行过程中遇到情有可原的强烈抗议。一项秘密行动是两害之间的小害，因为它避免了直接派遣美国军队。他说："许多此类资料应公布于众，美国人民应该知道正在进行的事——至少我们在情报汇报会上所听到的 75%应公布于众。"

"我们并未做推翻外国政府的事，我们可能给他们的经济造成点麻烦，给予反政府武装一点宣传上和其它的援助，但我们决不会推翻其政府"。他坚定地强调说。这不像是一个道德观点，而更像是一项政治上和客观实践上的声明。

对苏联的情报工作做的好吗？

戈德华特说："我们在苏联眼线不多，大约 12 年前我知道我们只有五组眼线在那里为我们工作。"

随后，他又自信地说："我们现在比任何国家的电子情报设备都要好，但这种优势或许不会持续太久。"

卫星怎么样？

他说："我曾努力让他们公布些（卫星照片），因为它们在杂志里看上去很漂亮，但他们说'不，不，不'，因为他们认为苏联

人可以辨别出来。”他指出，“苏联人可通过那些照片推断出我们的能力，而那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

“不过，”戈德华特向后靠着，压低了声音说，“照片现在已不那么重要了，我们有一种新的——”他刚开始说又突然中断了，“那我一点都不能谈，但那有些不可思议。我希望某一晚上我们可以散步交谈，你会发现那是非常惊人的。”通过某种红外线或磁波甚至更先进的雷达技术，很明显美国人已拥有某种比照片还要好的东西。

戈德华特移开了讨论的话题。

凯西这个人怎么样？

“一个好人。”戈德华特说，“很诚实，在战略情报局时他是个真正的间谍，一个真正的——”戈德华特举起手向下一挥，似乎是拿了想象的刀刺向书桌，“带匕首的家伙。”他笑了。

“不过，”他摇了摇头，继续说，“我们认为这是两回事，而且他不是个职业专家。”

“我称他是‘鸭嘴’，”参议员做了个嘴前伸双唇皱起的动作并突然用力吹气，使双唇微启向空中喷出一股气流，“呸！”

凯西的不直率也是个问题，戈德华特说：“因此当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找英曼，当我一拿起电话我就可以从第一句话判断出他（英曼）是否要告诉我一些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你知道我们将失去英曼吗？”

这件事甚至连流言都没有。英曼要走是最后的决定吗？

“是的，是最后的决定，”戈德华特回答说，他指出他曾想阻止这件事，“而且我们在选择继任者时将遇到麻烦。”

戈德华特的一位助手给白宫传话说戈德华特已透露了英曼的事。当天晚些时候白宫宣布了英曼辞职的消息并发出了一封刚从打字机打出的英曼的辞呈。

二天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保守的印地安纳州共和党

参议员理查德·卢加宣称他想就英曼的继任者问题公开向白宫“传递些信号”。由于卢加曾与英曼在50年代后期一起任初级情报官员，因而他是英曼的好朋友。他说由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认为英曼是“我们的人”，因而如果没有一位专业人员做为继任者，委员会将会被隔绝。“凯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曾做出过许多好的决策，”卢加说，然后对他进行了公平的抨击，“但有些事很复杂或许需要比他在世的年月要长的时间人们才会真正理解他。”

“我们投票是赞成凯西和英曼作为一个整体——赞成凯西是因为他与总统有关系，赞成英曼是因为他可以知道中央情报局在干什么。”

凯西清楚地知道中央情报局局长是公开的代人受罪者，而且他估计到自己会受到民主党人和对情报界持怀疑态度的自由派人士的抨击。但卢加是一个共和党伙计，而且一般讲话较温和。凯西怀疑是英曼在背后搞鬼。

在记者采访时，英曼回避了引起他与凯西及政府分歧的问题。他认为他是对的，但这些政策应由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决定。他不会进行公开指责，也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更没有背叛谁。他简单地说他失去了对官场争斗的兴趣，他与凯西的关系是好的，但不密切。

在告别时，凯西问他为什么说他们关系不密切，为什么英曼要对新闻界说这些。

英曼指出他在公开声明中对凯西说的那些赞美之辞。

但凯西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冷酷，”他最后迸出了这两个字。

对英曼来说，这是简单的事实。他们关系一直不密切，许多意见不一致，如对情报、对世界的看法。

英曼担任了一个研究集团的首脑，该集团是建于德克萨斯的“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它是由10家大型高技术公司建立的，目的是研究能接近于进行思考、数据综合和结合、破译各种

密码的超级计算机。

在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公司的几百名雇员之一就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前职员特德·拉尔斯顿。凯西和英曼再未讲过话。

白宫要凯西 48 小时内找到一位能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接受的副手。唯一的选择是约翰·麦克马洪，特纳任内的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从法律上说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三号人物。仅有努力奋斗或专心致志是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一个有力的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的，麦克马洪已找到了独立性与保持忠诚之间的一条路线。他可能会大吵大闹但他知道如何执行命令，并不带有怨恨。他不像胡戈尔那样是个走狗，也不像英曼那样被当成外人。他怀疑秘密行动但并不贬低它。

正如他所提出的那样，他相信除了内部的技术性情报工作和内部的情报员活动之外，中央情报局应得到他所称的基本支持。那意味着不仅要为铁幕后的死目标服务，而且要打入铁幕后的教堂和领救济的人群中。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特工，写了一部间谍小说，他写道中央情报局或许是一个组织中所聚集的卓越人才最多的地方，这些人了解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除了自己的国家。麦克马洪知道很容易失去与国内各方面的联系。

要获得一定的基本支持没有比在国会做工作更好的办法了。由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任命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因而麦克马洪拜访了许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他发现主要的话题总是凯西。到处都充满着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从某些参议员要求麦克马洪保证随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到那些如帕特·利伊之类的参议员要求麦克马洪绝对保证将来成为他们的早期预警系统，这种不信任什么表现都有。

当麦克马洪作出了正确的许诺时，他对有如此之多的参议员

坚持反对凯西而感到吃惊。麦克马洪认为凯西很精明，不会对参议员们胡说，但很明显他们认为他过去就是那么做的。其后当他与凯西坐下交谈时，他认为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应冠以“诚实”这一评价。麦克马洪报告说，15位参议员中，一半以上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比尔，”麦克马洪说，“你应对国会做一些安抚工作。”

“哦，好的！”凯西表示同意。

当年春天，在阿根廷侵入并占领了英国直属殖民地福克兰群岛后，这使凯西又添了一个关注的热点。里根政府在试图保持中立后，最后支持老盟友。有新闻报道说英国得到了美国卫星照片的帮助，凯西并未纠正这一错误的消息。事实上，南大西洋这一边远地区并无卫星覆盖，其后不久，美国发射了一颗卫星覆盖该地区，苏联人接着发射两颗卫星。

真正的情报突破来自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执政的军人政府有关系的优秀情报人员。阿根廷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的宣称当了真，哄骗自己美国将保持中立。因此阿根廷的军官和政府官员们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及美国使馆武官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情报，后者又将情报发回兰利总部、国务院及白宫。然后只是一个谁能尽快开辟途径将情报送给英国的问题。

凯西虽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泄露的“快嘴”，但他做为一个有书面证明（爱尔兰裔）的亲英派人士，他确保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事情报六处之间的渠道保持畅通。收集的情报是为了应用，总统已确定向英国倾斜的政策，因此将一批秘密情报传递给一个正在进行战争的盟国，更别说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撒切尔首相能否继续任职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是非常应该的。这是不能公布的情报成功之一。

美国在福克兰群岛之争中倾向英国将最终导致阿根廷人退出尼加拉瓜行动，结果其做为中央情报局计划“遮羞布”的角色，使这真正成为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但这也有好处，凯西认为这将使克拉里奇更加不受约束地建立起他的反政府武装。自从克拉里奇从事这一工作以来，凯西更欣赏他了。在克拉里奇眼里，任何细节都不会小到令人忽视，任何障碍都不会大到无法逾越。

1982年5月26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麦克马洪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批准其任命的秘密听证会。

他在证词中说很高兴国会情报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委员会进行监督；他们的审查可使中央情报局受到纪律的约束，他不希望中央情报局成为政治过程之外的某种黑匣子。在其以少见的坦率所作的估价中，他要求委员会保护他：“我作为一位必须在委员会面前作证的人，非常愉快地了解到我将与他们，美国人民的代表们一起共享我们的计划及我们要做的工作……当知道国会是这些计划的合伙人时，这对我个人和这些机构却是一种保护。”

莫尼汉想明确表明委员会也需要保护：“应能使我们相信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你们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独立的情报来源，我们必须知道——”他停顿了一下又说：“如果你一旦得知正在给委员会一些错误的情报——委员会受到错误地报告或错误地引导——你是否会从个人荣誉感和职业责任感出发告诉委员会所发生的事？”

“会的，先生，”麦克马洪回答说，“我无法想象在情报界的任何一位负责人会试图给予国会错误的引导、曲解事实或事件。”

“我只想提一个决定性的看法，”莫尼汉盯着麦克马洪说，“……想象没发生糟糕的事不是你的工作而且永远不应是你的工作。”

“我错了，参议员。”麦克马洪回答。

其他参议员更直接问到了凯西的忠诚问题，他们在要麦克马洪背弃老板，承认凯西可能会错误引导他们。麦克马洪说："我无法想象在我之上的任何人会那么做。"

莫尼汉抨击说："还是缺乏想象力。"他打断麦克马洪，坚持说麦克马洪必须对付可能发生的糟糕的事。

"我将纠正那一记录，参议员。"麦克马洪说。

第二天，麦克马洪在委员会公开露面。

莫尼汉说："如果有人想知道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位职业情报官来说那意味着什么，他们最好去读一下麦克马洪先生的财务申报表，它完全是30页空白纸。"

房间里爆发出一片笑声。

"不过在最后有一个马口铁杯子。"麦克马洪说着，手指向桌子上的一个杯子。

笑得更厉害了。

麦克马洪的纯财产很少。他在1981年的工资为52749美元，其它收入是其存于中央情报局存款互助会的1万美元的利息共为658美元，他在郊区的住宅，估价为17万美元，是由他岳父家减少了3万美元抵押给他的。

参议员马尔克姆·沃勒普，怀厄明州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深信中央情报局的专业人员如麦克马洪所关心的首先是保护中央情报局的声誉，而不是执行里根的训令。他认为这类人将吸掉更为强硬的保守派人物如凯西的政治目的和精力。沃勒普相信凯西正在受到中央情报局本身的制约，甚至在凯西所擅长的秘密行动方面，他也未获得足够的战果。许多人不愿意将这个国家的资金、人员和声誉系于只是可能会发生影响的事情上。没有给予在国外的特工人员他们所需要的电子设备和相应的权力。廉价的、相对危险性较小的小型室内和电话线窃听器到处可安置，但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站长们必须先征得总部的批准然后方能行动，其结果是

很有告诫性的。情报界进行了一些迷惑自己的行动——沃勒普称之为“瞎子摸象”——常常花费数百万美元却只获得些毫无价值的有关某些国家领导人的私生活、健康或体育运动的一些无聊的闲话，或是某些人面部或汽车的高分辨率照片。

沃勒普说，中央情报局与那些提出一些假定的问题的新闻媒介和个人合作得不好。为借此机会表示不满，他痛斥麦克马洪，激烈抨击这是“职业化”、“小官僚叛逆”及“情报政策无错论”。

麦克马洪坐着未动，接受了这一切，但很明显他是一个即不偏右也不偏左的候选人。

戈德华特对意外已感到厌倦了，于是他叫四个高级职员读了所有的麦克马洪本人的安全方面的文件。这6英寸厚的文件表明麦克马洪是清白的；他从未接近过70年代揭露的暗杀阴谋、药物试验及国内间谍活动。安全方面只有一次违反规定：有一次在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个保险柜未锁。但这次违反规定充分说明了麦克马洪这个人。其实这本是一个秘书的错误，如果再违反一次规定将得不到定期的晋升工资的资格。麦克马洪这个“不诚实”的管理者便承担了责任。

因此戈德华特称颂了麦克马洪几句，随后比登赞扬了英曼并将话题转向凯西：“至少我们当中有些人认为，凯西先生的发音不是那么——好，我们无法在他讲话时就很快听懂它们，也不能以它们来领会整件事情。”比登接着讲话，要麦克马洪成为情报委员会安在中央情报局的监视器。

戈德华特说当凯西出现偏离时英曼常给他们发信号，“我觉得如果新任副局长在计划某些事时能发扬海军上将的习惯给凯西‘鼓点劲’的话……”。

全体哄堂大笑。

“或者是，”比登补充说，“悄悄退出来。英曼常常只是退出来，

就像这一次。”

“如果让我发表看法的话，”麦克马洪说，“主席先生及比登参议员，我认为当局长听到或读到你们的这些感觉时，他肯定会来减轻你们的不安，并设法改变它们，而且我认为在今后任何的证词中他本人都会这样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一致同意麦克马洪的提名，参议院随后也同意了。

1982年后期，秘密行动武装确已衰退的印象活生生地印在了凯西脑海里。它起因于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出资支持的13名也门人组成一支队伍在前往位于阿拉伯半岛苏联控制的南也门进行颠覆活动时被抓获。这一行动是与沙特阿拉伯的情报机构联合进行的，是卡特政府批准的少数准军事支持行动之一。这被俘的也门人遭受严刑拷打后供认他们是受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凯西感到疑惑，中央情报局的不可否认的根据何在？行动的安全措施何在？在实行这一秘密行动的书面计划中，这些也门人应该只与中间人或中央情报局外围组织打交道，因而他们不会知道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一行动。但对也门新兵来说，只有表明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才会使他们觉得这一行动具有可信。

第二队也门人已渗入南也门，不得不将他们撤回，行动就此停止。几星期后，南也门检查官宣布所有第一队的13名成员都承认偷运炸药阴谋炸毁加油站和其它重要目标并认罪。他们还交待他们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一队的三名成员被处以15年徒刑，其他人被处决。

与此相反，凯西的首次秘密准军事行动——支持乍得的哈布雷，取得了成果。1982年7月7日，约2000名哈布雷的部队控制了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并建立了临时政府。此时，正如黑格和凯西所期望的卡扎菲在乍得的影响被削弱了，他的鼻子“流了血”。

现在利比亚领导人在其南部沿 600 英里长的边界上有了一个敌对的法国—美国支持的政府。

现在的气氛很好，最后中央情报局赢得了白宫的支持，进行一项有限的秘密支持活跃的柬埔寨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动。对安哥拉的援助被法律所禁止；而尼加拉瓜和阿富汗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

仅仅提及在东南亚的秘密行动，就会使中央情报局全局上下毛骨悚然，这一地区是最大的"焦油娃娃"。但凯西坚持说他们目光不应停留在过去。政府政策应具有连续性；努力帮助任何反共势力应是普遍性的。苏联人支持全世界的颠覆活动，美国不应做得比他们少。问题在于反对越南的傀儡即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的主要力量是红色高棉，它也是共产党，而且被认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残酷的组织。红色高棉在其统治柬埔寨的 1975 至 1979 年期间杀害了 100 万，可能多达 300 万的柬埔寨人。

但还有两个非共产党的柬埔寨抵抗组织，凯西辩论说应将资金输送给他们。中央情报局在泰国武装部队中有单方的重要人物，可通过他们确保资金不会落入红色高棉之手。

许多国务院官员不同意这样做，他们说红色高棉与两个非共产党抵抗组织共处于一个松散的联盟中，而且它占支配地位，帮助非共产党抵抗组织就等于是帮助红色高棉。

凯西决定提供非杀伤性援助，在 1982 年秋季，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指令批准向非共产党抵抗组织提供 500 万美元的援助。尽管这笔款项不能用于购买武器，但它将能替出其它款项来购买武器。

当年春天，凯西会见了正在华盛顿访问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黎巴嫩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大本营萦绕在沙龙脑海里，他谈了对抗行动——如果黎巴嫩这么做，那么以色列就那么做；如

果巴解组织袭击这里，以色列将袭击那里。“黎巴嫩，”沙龙说着，流露出嘲讽的语调，似乎这个国家是一个地理学的假设，“不要吃惊，我们摊牌吧，如果你们不采取行动，我们将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容忍它了。”

凯西知道黎巴嫩正是以色列想扩大其影响的阿拉伯国家，他断定沙龙想找出证据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辩护。沙龙说，有些事将在黎巴嫩发生而且别无选择。很清楚沙龙已使以色列总理梅纳奇姆·贝京对其计划入迷，沙龙在操纵着一切。

凯西很欣赏沙龙的风格，认为他既是个行动主义分子也是个思想家，一个既意识到自己国家的脆弱也感受到国家命运的人。

1982 年 7 月 6 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宣称其目的是将巴解组织恐怖分子赶出黎巴嫩南部。它引用三天前对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在伦敦的暗杀企图作为正当的理由，并称这次入侵是“为了以色列加勒里山地区的和平的行动”。

以色列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及其后英国人都清楚这一宣称的理由是伪造的。对以色列大使的暗杀者来自阿布·尼达尔集团，它是从巴解组织分裂出来的并与在黎巴嫩驻扎的巴解组织主体处于交战状态。以色列在袭击冤枉的巴勒斯坦人，但在沙龙看来这没有什么区别。几天内他的以色列国防军推进到贝鲁特边缘地带。

中央情报局分析部门描绘了一幅既有很大机遇也有很大危险的图画。

凯西在其办公室主持了一次会议。一个问题是以色列是否在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并且许多与会者担心美国会被视为以色列的同谋而国会将提出疑问。

凯西说：“对那我才不管哩，局势是易变的，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如何使其符合我国的利益？这是我要求回答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的人，法伦党民兵首领巴希尔·杰马耶勒正在黎巴嫩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而且多年来巴希尔发展了与沙龙和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密切关系。中央情报局曾充当了媒人，使基督教人士与以色列进行了接触，使巴希尔成了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共有的情报员。

中央情报局倾向于与黎巴嫩的基督教人士站在一边而不是与穆斯林人士站在一起。但中央情报局曾在黎巴嫩工作过的老手们知道基督教人士，特别是巴希尔和他的法伦党，如同其他人一样残恶，与其建立关系是极其危险的。

“这种关系是有价值的，不是吗?”凯西问道，以安慰那些为此事而不安的人们。

有迹象表明巴希尔正争取总统职位。他在基督教派中已清除了竞争者,他与入侵的以色列之间的良好关系给了他一个工具。黎巴嫩国内的亲以色列集团视巴希尔为其新曙光，仅以色列的集团(穆斯林和瓦里德·琼卜拉特领导的左翼德鲁兹民兵)认为巴希尔是唯一能使以色列撤军的人。巴希尔成了集合点。

凯西同意中央情报局的一项计划，即中断其与巴希尔的正式关系，因为很明显巴希尔现在有比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更重要的事要做。1977 年公开泄露了约旦国王侯赛因曾是中央情报局的领酬特工人员长达 20 年之久,从那以后中央情报局不大愿意将国家首脑列于其付酬单上。由于巴希尔正越来越引人注目，因而暴露其身份如果不是传来其生命的话也将结束其前程。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是高度保密的秘密之一。已做了一切来保护这一秘密，但从来不会有绝对的保证。

8 月 23 日,以色列入侵二个半月后,巴希尔当选黎巴嫩总统,内定一个月后就任。少数几个知道最近中断了他与中央情报局关系的人只感到又高兴又厌恶。黎巴嫩是一个没有永恒的朋友、永恒的敌人的国家，恰恰是使他成为象征性国家首脑的那些事给他树了许多仇敌。伊朗领袖霍梅尼为崛起增强了穆斯林教徒的信心和力量；尽管巴解组织的 11000 名战士正在开始撤离贝鲁特，包

括其主席阿拉法特，但巴解组织在黎巴嫩仍有一定势力。

一个在巴希尔领导下并与以色列和美国结成战略联盟的黎巴嫩将打破该地区的权力均衡。其西北部强大邻国叙利亚自 1976 年已占领了黎巴嫩和贝卡谷地，而且事实上，它认为整个黎巴嫩是大叙利亚的一部分。叙利亚的苏联盟友也对黎巴嫩现状不满。

面对这大量的国内外敌人，巴希尔给中央情报局传递了信息，请求中央情报局为他提供秘密的安全和情报援助。

凯西觉得中央情报局有义务帮助巴希尔，这不能公开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秘密行动是必需的。为了更有效地行动，中央情报局应更密切地参与黎巴嫩情报机构的工作，必须共同使用复杂的武器及电子侦察和通讯设备。里根总统批准了一项秘密支持行动的指令，它要求最初开支为 60 万美元。计划提出它将很快增加至每年超过 200 万美元，或超过 400 万美元。

1982 年 9 月 14 日下午，巴希尔·杰马耶勒就任第九天，他在东贝鲁特，他的法伦党地区办公室发表讲话。根据安排，五点钟他将会见一组来贝鲁特的以色列情报官员。但在下午 4 时 10 分一枚炸弹爆炸，炸毁了该建筑物并将他炸死。

中央情报局还未来得及实行其秘密援助计划，没有迹象表明中央情报局与巴希尔的关系已经暴露。不过，一个前重要情报员被暗杀对中央情报局仍是个重大灾难。为安全行动所拨的数百万美元款项被保留并存于总统应急基金中。

这一暗杀导致了一连串不幸事件。以色列军队允许法伦党部队进入贝鲁特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了一系列报复，其中两个难民营的名字，萨布拉和沙特拉将成为大屠杀历史的一部分。以色列情报部门估计约有 700 到 800 名受害者，他们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一大屠杀的数字震惊了文明世界——带尿布的婴儿、老人的尸体成堆。甚至连马、狗、猫也不能幸免。乳房和阴茎被割

了下来；一个基督十字架被插进某些受害者肉体里。孕妇的子宫被剖开。

两周内，美国海军陆战队占据了一处战略要点——靠近机场的一处军营。作为一支维持和平部队，他们的目的仅在于帮助黎巴嫩并监督外国军队最终撤出黎巴嫩。

摩萨德和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都开始调查是谁杀害了巴希尔。炸弹被追踪至哈比德·查特尼。他现年28岁，其家庭为叙利亚人民党成员，是法伦党的对手。在向黎巴嫩人通报情报时，以色列人证实查特尼曾为这枚炸弹安置了一套远距离电子引爆装置。

查特尼的“操纵者”，或者说指挥官，是叙利亚情报部门的一位上尉，名叫纳西福，他使年轻的查特尼相信这枚炸弹只是要吓唬巴希尔，并不是要杀掉他。在分析这些情报后，包括摩萨德在叙利亚的最好特工人员的情报、侦察报告及电子窃听，以色列人证实纳西福直接向负责叙利亚在黎巴嫩情报行动的默罕默德·加南中校报告。叙利亚军队及空军情报部门都知道点这一爆炸计划，叙利亚总统哈弗兹·阿萨德的兄弟，负责国家秘密警察的里法特·阿萨德也知道这项计划。

以色列人相信，对该国有着铁腕统治的阿萨德总统必定会知道正在进行该项计划。但并无这方面的证据，而且情报报告表明叙利亚情报官员的同谋关系极为保密。

凯西看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所提供的这些报告，他们很有说服力。但重要的是，有必要思考一下谁从巴希尔之死中获利最多？谁想要一个脆弱的黎巴嫩？谁最怕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强有力的联系？答案明显是叙利亚。然而最后，凯西不得不接受白宫和国务院不愿公布叙利亚所起的作用的意见。

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首脑萨格伊少将清楚任何试图让美国发布有关叙利亚卷入暗杀巴希尔的消息都不会奏效。萨格伊长时间

以来一直对他的国家与杰马耶勒的法伦党人之间的关系持怀疑态度，而且他理解美国现在在黎巴嫩负担很重，美国政府希望与叙利亚作交易以在黎巴嫩获得某种形式的象征性解决。控告将使宣传部门满意，但会妨碍与叙利亚的合作。

凯西手头上又添了一个情报上的失败。中央情报局与巴希尔的关系，随后又中断关系，再则巴希尔请求保护，接下来又是遭到暗杀，这些简直是一团糟，不过它是绝密的一团糟。迄今为止它仍是个秘密。

十一

在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8个月后，凯西在技术方面学到许多知识，尤其是在绝密的空间系统即卫星照像及收集信号情报方面。他懂得了电子计算机等正在发展中的科学技术的工艺水平。他奋力争取最好的技术，即使这非常昂贵。尽管他不认为技术情报是最重要的，但他已逐步认识到它们是情报这一镶嵌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卫星照片，他的手下人可以数清苏联坦克的数目。经过图像增强——对原始照片的第二或第三步开发或精制——他们可以确定一辆坦克是否处于工作状态。早期预警系统通常可发现苏联军队的任何调动，或一项新的重要武器计划。卫星所遗漏的仅是苏联境内那些严格控制的研究或发展项目，那里远离人口中心或军事基地，只有几个人在秘密工作。

凯西面临着对美国情报界最机密、最重要的一个空间系统研究和发展项目的重大决策。它被列为80年代最大的技术性侦察发展项目。

它开始代号是“靛蓝”，现称“长曲棍球”，它具有全天候和日夜侦察能力，是装备有最先进的雷达的新空间卫星系统。应用雷达成像即雷达信号增强处理，计算机可产生与照片相同的效果。云层和黑暗不再成为障碍，而且将来可能成为具有穿透建筑物的侦察系统。

但“长曲棍球”最终将耗资达10亿美元，即使它有效也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在其研制阶段已遇到了巨额成本超支和其它许多问题。主要承包者是马丁·麦理塔公司，而电子综合公司则负责地面处理，即信号抵达地面站后的处理工作。

1983年约需2亿美元的资金来保持“长曲棍球”项目的继续，马丁·麦理塔公司现在就需要这笔钱，其“最后期限”正在临近：必须提供数亿美元资金否则这一项目就将夭折。凯西称这类昂贵的项目是“一次性的”，因为常常只能同时建设一个。

那些批评他的人如果认为凯西只知道秘密行动的话那就错了。所要的这2亿美元相当于他的全部秘密行动的预算，而且是局长而不是别人能预付得了的这笔有关一个卫星系统预制阶段的费用。凯西相信这笔费用永远不会公开讨论，他觉得由于要保密，公开辩论时人们会感到这一系统的功能与其费用不相称。

尽管苏联人也有雷达成像设备，但有情报表明他们没有相应的计算机或处理系统来制出高质量、高清晰度的照片，因此“长曲棍球”将使美国居明显优势。

凯西曾听取过有关美国卫星系统发展历史的汇报。自1971年第一颗“大鸟”侦察卫星发射以来的12年是非凡的12年。“大鸟”侦察卫星是一种巨大的飞行侦察卫星，它约50英尺宽，能摄取令人惊奇的照片。但这些胶片必须从卫星上弹射出来，由地面收回处理。一些全金罐或金桶被恰当地用来保护“大鸟”的胶片以避免在空间时受各种射线照射而曝光。这些金罐堆满了一个储存舱，这也是卫星项目之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

1976年12月，恰在卡特入主白宫之前，第一颗KH－11型卫星发射成功。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巨大突破，因为KH－11首次具有即日送回地面以高质量的传真照片及电视信号的功能。那些苏联或坦克的照片几乎是即时的，使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能详细了解此时的情况。

当然，这种即时的 KH—11 卫星不弹射胶片，而是将照片用无线电波传回地球。苏联人用监视是否弹射胶片来鉴定摄像卫星，由于 KH—11 也是一个信号情报站，因而苏联人不怀疑飞过的卫星在拍摄照片，也就是在卫星经过时未能隐蔽或伪装各种军事设施和装备，包括导弹发射井。苏联人的疏忽使美国受益匪浅。

有关 KH—11 卫星能力的重大秘密已持续了一年左右。威廉·凯姆皮勒斯，一位中央情报局监视中心的低级职员因心怀不满，向苏联人出卖了绝密的 KH—11 操作手册的复印本，得款 3000 美元。KH—11 经过时苏联人开始关上了导弹发射井的门，此时中央情报局意识到出事了。凯姆皮勒斯被逮捕，以间谍罪判处了 40 年徒刑，但损失已无法挽回了。

“长曲棍球”计划有一个使凯西消极的因素。如果将来签订了一个限制武器条约，那么“长曲棍球”卫星系统及其后续系统将成为监督条约执行情况的工具。凯西并不完全反对限制武器谈判，但他觉得减少核武器数量的重要性仅仅是象征性的。假如再减少 1/3 或一半数量的核武器，剩余的核武器仍能摧毁整个世界。苏联是由于其庞大的军事机器而成为超级大国的，而不是由于其经济、文化或商业的发达。他们的军事力量本身赠给了他们超级大国的形象，因此凯西确信苏联人永远不会真想削减太多给予他们显耀地位的东西。

但那决不是停止“长曲棍球”计划的理由，凯西决定将继续进行“长曲棍球”计划的 2 亿美元列入预算中呈交国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勃兰德反对“长曲棍球”计划。成本超支和系统存在的问题似乎是不可克服的，而且管理这一卫星系统的国家侦察办公室对该系统的成本撒谎，对勃兰德来说这是个道德问题。

这些卫星及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其它情报机构的被称为“黑市”的项目都隐藏在国防预算里。民主党人勃兰德认为国防预算应予削减，而国防部也担心“长曲棍球”计划将花费军队的资金，因此众议院从五角大楼1983年预算的秘密部分中砍掉了这一项目的资金。

戈德华特领导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保留了凯西为“长曲棍球”计划所要求的2亿美元，因此勃兰德和其副主席肯·罗伯逊与戈德华特和莫尼汉举行了磋商。

戈德华特对“长曲棍球”计划非常热心。他发表了一番讲话。他说，间谍飞机——著名的U－2和不太出名的SR－71（SR表示战略侦察）——曾有过成本超支及许多种问题，但应看到它们为情报收集工作增添了多么崭新的一面。谁能算得出至关重要的空间秘密情报战的代价呢？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国会的核心职责。危险不在于做得太多了，而在于落后。总统和凯西需要它。第26战术空军联队正在东、西德边境地带应用雷达成像技术并取得了成就，它可以将即时的图像或传真照片从飞机上传回地面站。“长曲棍球”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总比空口许诺要好。

戈德华特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它。”他停顿了一下，最后补充了一句：“它将有效地防止战争。”

勃兰德仍不退让，但已有些软化。

好的，戈德华特说，由于他们不能弥合分歧，他将让军事委员会来处理它。在参议院中，戈德华特的情报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共同负责情报事务及其预算。在众议院，勃兰德的情报委员会几乎是独立处理的。戈德华特所说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其主席是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托尔，该委员会此刻正在走廊那头开会。他肯定托尔将同意“长曲棍球”计划。于是，戈德华特把椅子向后退了退，站起来拄着拐杖沿走廊向前走，很明显他决心要把这一问题——暗含着某种权力，交到托尔手里。

勃兰德知道自己无法战胜整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行使着很大的权力因为他们在管理着一笔远远超过2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如果该委员会主席想得到一个2亿美元的项目，他就会得到。这仅仅是总预算的千分之一。

当戈德华特开始沿长廊摇晃着慢步前行时，勃兰德有些慌了。他迅速走向他的民主党同事莫尼汉。

“哎呀，”勃兰德说，“我们怎么办？”他不希望民主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很明显走廊须走很久，况且戈德华的臀部受过创伤。同样明显最好是两个情报委员会能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我收回，”勃兰德突然说，同意予“长曲棍球”计划拨款一年，“叫住戈德华特。”

派了一名助手沿走廊路过去并传递消息：“他们投降了。”这一战术策略失败了。戈德华特相信最重大的一项情报计划可以确保进行了。他转过身，笑了，蹒跚着走了回去。他同意如将来再有成本超支，就不再拨款。

当上述消息传到马丁·麦里塔公司时，举行了盛大庆祝仪式。一旦地面处理问题被解决，“长曲棍球”将由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的最新成果，航天飞机，在未来的一次飞行中将其发射至太空。

然而，有一件事勃兰德不会退却：尼加拉瓜秘密行动。他不喜欢这一行动，他的朋友，众议院议长奥奈尔也讨厌它，而且他是持反对意见的传教士。

奥奈尔的姨妈尤妮斯·托兰是一位美国天主教国外传教会的一名修女，前一年在其91岁时去世。美国天主教国外传教会的制度对奥奈尔产生了深深的而且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影响。在他姨妈去世后，另一位在尼加拉瓜的美国天主教国外传教会的传教士佩吉·希莉与奥奈尔保持通信联系。他向奥奈尔描述了尼加拉瓜深受国内战争的痛苦情景。那是一场由中央情报局鼓励、支持和策

划的战争。奥奈尔认为政治是一个忠诚和价值变化莫测的世界，而修女和修士们说的是真话。

在与希莉修女进行二个小时交谈后，奥奈尔对一名助手非常激动地强调说："我相信她说的每一字。"秘密战争激起了对丑恶的美国人及中央情报局的行为的憎恶。奥奈尔回忆起："联合水果公司"，它是一家美国的实业公司，在美洲许多国家进行投资，由此产生了"香蕉国"的名称。对反政府武装进行秘密支持使美国充当了新殖民主义剥削者的老角色。

勃兰德可以接受政府想阻止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出革命的目标。但很明显中央情报局在援助洪都拉斯境内那些军营的反政府武装，他们从军营出发对尼加拉瓜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勃兰德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由奥奈尔和勃兰德精心挑选的九名民主党人和五名共和党人组成，它相当于众议院的战略中心，任何该委员会的行动几乎肯定会得到整个众议院的批准。勃兰德想完全切断尼加拉瓜行动的资金，并得到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支持。戈德华特在寻求位于勃兰德和提供全部资金之间的某种中间选择。在 1982 年 8 月两院联席会议上，一致同意要包含下述内容即禁止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向任何人提供军事装备、训练或支持，那就是"进行旨在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行动"。

这些内容秘密写在批准预算的法案中并获参、众两院批准。

但在 1982 年 11 月 1 日，勃兰德读到《新闻周刊》选编中的新闻采访报道《美国的秘密战争。目标：尼加拉瓜》。文章说秘密行动已扩大成为"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一项重大计划。"然而凯西到勃兰德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这一行动的主要目的还是阻击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他说，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反政府武装已增加到 4000 人，这是一年前所建议的 500 人武装的 8 倍。凯西认为，这一增长产生于对桑地诺政权的普遍痛恨。中美洲不想要共产主义，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情绪。

勃兰德很生气。然而由于其权限已从总统传给兰利总部，又通过凯西的思想意识的折射及政府的支持传给了秘密行动官员和中央情报局在美洲的情报站，最后传到了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和其战士手里，因此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勃兰德决定公开反对。在 1982 年 12 月 8 日，他在众议院会议宣读了他的禁止将资金用于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措词，它很快被称为《勃兰德修正案》。最不机密的秘密行动现在正式公开了。它作为《情报核准法案》的一个修正案，其内容在众议院一致通过，411 票对 0 票。

莫尼汉也变得愈来愈烦恼，杜威・克拉里奇越来越成问题。他曾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秘密报告，并拿出一张尼加拉瓜的地图展示给参议员们。他解释了一项将尼加拉瓜一分为二的计划：一半是东部，一半是西部，像纽约那样；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像贝鲁特那样。据克拉里奇说，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将占据东部，而桑地诺政权将剩下首都马那瓜及西部。莫尼汉认为这简直疯了。中央情报局只有 50 人在指挥这一行动，而把这一国家分裂，将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

莫尼汉可以想象得出漫画家对这一景象的描绘：在关紧的门后面，雄心勃勃的克拉里奇在提出自己的幻想，或许在用剪刀剪地图，表明这一划分将非常容易地实现——而所有这一切表演都面对着一群口叼雪茄、昏昏欲睡的愚蠢的立法者。

戈德华特向莫尼汉倾过身去，并嘲笑说：“听起来这像是战争！”

莫尼汉点了点头。他们又能怎么样呢？这都是绝密的。

其后几周里，莫尼汉没再听到有关此事的消息，很明显克拉里奇的计划已被取消，但莫尼汉对他们全部不再信任了。克拉里奇反映了凯西，而凯西反映了政府。这一行动正成为祸根。

12 月 9 日，勃兰德的建议在众议院一致通过后的第一天，凯西来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他辩论说阻断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

送武器仍是首要目标，不过中央情报局也希望能“扰乱”尼加拉瓜政府并向其施加压力使其变得“更民主些”，而且或许会接纳某些温和派人士进入政府。

莫尼汉认为这存在一个政治修养问题。他对凯西说：“如果你说的这些人，这些桑地诺分子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而且我也准备相信你的话，那么他们是不会变得更民主的……你是能或者推翻他们或者由他们去，但你无法作两者之间的事。”莫尼汉感到疑问，现在你能在扰乱和推翻他们之间画出准确的界限吗？对桑地诺分子来说或许它看来是一回事——最不友好的行动。

凯西说，他的目标是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并使尼加拉瓜政府为其选择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解释说，中央情报局想使尼加拉瓜政府处于“失平衡”状态。

他的话没往下讲。

莫尼汉明白政府正在寻求某种方式使其冒险计划看上去比严厉的外交辞令只严重点。但反政府武装自身如何？莫尼汉问道。他们在为推翻政府并自己夺取政权而战斗。他们不可能仅为阻断武器运输而战，没有人会这样做。

他的问题未得到回答。凯西只是简单地重复说中央情报局必须与可得到的人打交道：中央情报局只是在支持反政府武装，他并没有创建他们。

莫尼汉现在很不愉快政府和国会在支持一项不会失效而且会走向灾难的行动。他给凯西写信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支持《勃兰德修正案》。出于对凯西的闪避法律能力的熟悉，莫尼汉说他希望中央情报局既与修正案的文字内容也与其精神实质保持一致。莫尼汉将《勃兰德修正案》介绍给参议院，它通过了。

凯西的反应很简单：新的修正案未禁止任何已开始的行动。它是一个律师的诡计，该修正案推测“目的”，而目的必须要与思想状态有关，这是一种可闪避的东西，带有不可避免的或有用的模

糊性。他告诉白宫，不会有什么麻烦，因而1982年12月21日，里根签署了《勃兰德修正案》使之成了法律。

凯西的中央情报局顾问斯坦·斯波金立即在兰利总部召集局内最好的律师们开会。尽管几乎已到了圣诞假期，斯波金说他们必须马上讨论某些事。

他说，"这个东西又想回来咬我们的屁股，就像你们从来未见过的那样。"国会将全面监督中央情报局对《勃兰德修正案》的执行情况。他又说，它可能是一只"特洛伊木马"，中央情报局恰恰缺乏相应的对策。斯波金解释说，"他们将监督寻找违反该法律的情况。"他需要如何依从的主意。

其它律师们表示抵制，他们说这条法律想对尼加拉瓜行动加以否定，中央情报局只要保证未做任何"目的在于"推翻桑地诺政权的事。中央情报局一位律师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可做为了所有其它目标的事。"

"我们不能装腔作势"。斯波金说。他又说他们必须对他们的任务有更广泛的见解。他指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对白宫和他们的局长都很重要，律师们也都有义务。商讨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它们作出反应，而且是如何防止麻烦。它提醒每个人行动不是要"推翻"而且对任何正常的手段如进行政变——尤其是暗杀——都不能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支持或采用。暗杀已被行政命令所禁止，但斯波金觉得再重复一遍也没有坏处。

"斯坦，你不知道该如何写吗。"凯西说。他重新对语言作了加工，使它更牢靠些。他们可以靠它生存下去。

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约翰·斯坦认为这份有关禁止事项和指导方针一览表是保护他们的绝妙主意，而且凯西批准将该表用电文发给正在洪都拉斯监督该行动和反政府武装营地的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情报站。这份长达数页的单行打字的电文如实地逐字逐句地传送了《勃兰德修正案》：不允许从事任何"专门"用于以

推翻尼加拉瓜政府为“目的”的下述活动——装备、训练、支持、会见、谈话。反政府武装的领导人或战士谈到采用中央情报局援助达到上述“目的”的应断绝与其联系。

为了强调政府对阻断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的严肃态度，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专门对危地马拉的总统指令。危地马拉与萨尔瓦多有近 400 英里的共同边界，这一指令允许沿边界收集情报并对向萨尔瓦多的武器运输采取行动。有报告说武器正由本该运水果的卡车运进萨尔瓦多，这些卡车是付款保证的因而无法在边境检查站进行检查。已建立了一些先进的探测站，当载有高比重的武器类金属经过时，它们就会报警，还盖了一幢楼并训练了近 60 人进行监视。探测站阻止了几次武器运输，但有关探测站的消息走漏了出去，它再未发现多少，一个探测站价值超过 100 万美元。

国家安全局所截获的通讯并没有得到凯西所需要的表明尼加拉瓜在支持向萨尔瓦多叛乱者输送武器的证据。凯西判断左翼叛乱者使用无线电很灵巧，他们除非确实需要一般不用无线电通讯，在使用无线电通讯时用一次性密码串，而且时间很短，在其它时间则严守职业规则保持无线电沉默。其余时间里叛乱者全都不采用电波通讯，仅用地面的电话线，那必须要窃听方能截获其通讯，或者有时他们用信使或传令兵通讯。叛乱者的通讯保密工作比萨尔瓦多政府军要好，古巴、或许甚至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在作其后盾，这样就使得凯西缺乏能获得国会和公众支持这一行动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世界上最难证明的莫过于不需证明的事。”他曾多次这样说。但他没有证据，而且他的中央情报局内许多人也不能肯定是否存在这类证据，起码应达到能证明尼加拉瓜秘密行动是正确的水平。

利伊参议员决定访问中美洲进行实地考察。对于他这样敢作

敢为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议员来说，整个世界就像是一个洗手盆，利伊非常渴望能单方面或多或少地插手凯西的中美洲之战。为了避免党派间的交叉火力，利伊邀请戈德华特的办公室主任罗伯·西蒙斯同行。西蒙斯与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进行了一次特别会谈，并清楚地表明这次旅行不是公费旅游。他们要向中央情报局在四个重要国家的情报站站长详细了解情况。这四个国家是：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政府武装的主要行动在那里进行；萨尔瓦多，左翼的叛乱者正在威胁着那里；危地马拉，根据一项专门总统指令中央情报局正在那里试图阻止向萨尔瓦多的武器运输；还有巴拿马，中央情报局在那里有一个绝密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训练营地。

利伊、西蒙斯和其他三名参议院职员，加上一名警卫军官及一名兰利总部派来的立法联络官一起组成了这个考察团。凯西要求中央情报局派一个人参加访问考察团，并挑选了认识巴拿马情报站站长的富有经验的官员伯顿·哈金斯参加该考察团，团里其他人嘲笑哈金斯是“兰利的耳目”。

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汇报和许诺，利伊对即将看到的有这样一种印象：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仍是小股部队；反政府武装不会攻占尼加拉瓜领土；他们已保证防止残暴的行为；前索摩查王朝的战争罪犯们被排除在领导层以外。中央情报局将不会参加任何实际战斗。

在对危地马拉境内的武器运输阻断点作常规考察后，他们一行七人乘飞机飞往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并住在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的豪华公寓里。利伊开始喜欢上中央情报局洪都拉斯情报站站长，他显得认真而且见多识广。

中央情报局已在特古西加尔巴的一幢安全的房子里建立了独立基地来管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一计划。基地负责人是前陆军特种部队中校雷·道迪，他与中央情报局总部有直接通讯联

系——用通讯术语说是“一个专用点一点环路”，并有一个绝密密码保密器。尽管道迪属于在洪都拉斯首都的情报站站长领导，但这一基地属于参加秘密行动的行动部队掌握。道迪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组织过中央情报局在老挝进行秘密战的准军事训练。

道迪已近50岁，在汇报中他说在洪都拉斯的训练营地是他迄今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他说明在七个反政府战斗分队中，已有五个跨越边境进入了尼加拉瓜。他拿出一份尼加拉瓜地图，上面显示这一国家的许多地区正逐渐画成阴影，预示着战斗分队正向南运动。这些战斗分队将与那些通过哥斯达黎加由南而来的战斗分队会合。

“停一下，停一下。”利伊打断了他。这一会合路线长达200英里，横贯尼加拉瓜东半部。这与克拉里奇将该国一分为二的计划有些相似。“看上去好像你在计划推翻桑地诺政权。”利伊说道。

“不，”道迪回答说，“绝对不是。”他知道国会已禁止将资金“用于”颠覆桑地诺政权。凯西的电文就在这里，贴在公告栏里。

“既然如此，那么你觉得如果进行下去你的计划到底要干什么？”利伊问到。

道迪说：“它将切断东部与靠近西海岸的马那瓜之间的陆上通道。”东海岸面临加勒比海，通过海上从苏联和古巴那里接受物资。陆上通道受到威胁后，古巴人和苏联人将不得不通过巴拿马运河到太平洋，或者说尼加拉瓜西部。这样武器运输就被切断了。

“再停一下。”利伊说。这在桑地诺政权看来意味着什么，将它们的国家一分为二——在中间劈开——而美国却说我们不想推翻他们的政府？

道迪报告说由于萨尔瓦多并不面临加勒比海，而且在西南方面面临太平洋，因而这一行动将直接切断武器运输——切断从古巴到尼加拉瓜到萨尔瓦多的武器运输。

利伊明白技术上道迪可能是对的，但他不能接受。中央情报

局能对这些反政府武装战斗分队施加什么控制呢？利伊和职员们问道。

道迪说，“由于中央情报局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了通讯设备，因而中央情报局有其频率并窃听以看一下反政府武装是否按照指定的计划行动。”

如果反政府武装不进行无线电通讯呢？

道迪说，“我们还另外招募了在反政府武装中的人当我们的间谍，他们会向我们报告的。”

你们招募了多少人？

“我们只有很少人，”道迪说，“但我们仅仅刚开始。”

这些间谍如何报告呢？

道迪解释说，是面谈。

他们将冒生命危险走进你安全的房子里，因而你将见他们，比方说，一年两次？

“嗨，”道迪说，“我们会计划好的。”

利伊觉得这有点象60年代早期的西贡情况，用良好的意愿、庞大的计划和小规模的战争作资金来收买官员们。

在特古西尔巴的美国大使馆，官员们告诉利伊和其他人，大使馆还在把前途押在某种谈判上。他们表达了对在他们周围进行的小规模战争的担忧。

然后利伊与负责该行动洪都拉斯方面的洪都拉斯武装力量总司令盖斯塔罗·阿尔瓦利兹将军举行了私下会谈。

阿尔瓦利兹对利伊说：“这帮混蛋，我们的士兵将在圣诞节前占领马那瓜。”

“喂，等一下。”利伊说，“美国政策特别指明不是去推翻尼加拉瓜政府。”

“哦，是的，”阿尔瓦利兹说，“不过无论怎样能做到那一点不是很伟大吗？”

这一行人乘飞机前往巴拿马，杜威·克拉里奇恰在前一天离开此地。他化名为"杜威·马洛尼"，正在该地区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观察。他将带去雪茄烟和白兰地酒，这相当于是中央情报局的拥抱，使情报站站长们能够坚持在夜间审查工作，处理职业和个人事务，并叙述"老战争"和"新战争"的事。

利伊听取驻巴拿马情报站站长的汇报定在第二天，但第二天该站长仅来作为一种礼节向他表示问候并自我介绍。参议员说他要听取有关尼加拉瓜计划的详细情况，特别是它的范围——时间、金钱和参加人数。

"科长已指示我不予回答。"这位站长回答说。科长是指克拉里奇。

利伊和西蒙斯感到震惊，并立即设法与麦克马洪取得联系。

第二天情报站站长重复了他的指示。

"我将得到答案，并将一直呆下去直到得到回答。"利伊说。

情报站不让利伊或西蒙斯给凯西或麦克马洪发电文。利伊威胁要用普通电话机给麦克马洪打电话，那将违反保密规定，尤其是一旦利伊在一条不安全的线路上发文更糟。

上午 11 时，利伊发出了一份保密电文。

7 小时后，早上 6 点，有人在敲他旅馆房间的门，那是克拉里奇，他穿着利伊认为只能被形容为意大利猎装式的一套定做的银色茄克和灯笼裤。并无任何打趣的话，打开了旅馆的收音机，以挫败可能的窃听阴谋。

"这是谁呀？"利伊嘲讽地问道。"补锅匠、裁缝、士兵……水手。"似乎像儿歌，而未提及里卡罗小说中的"间谍"。

"你是认识我的，"克拉里奇说，"参议员，你有些问题要问，对吗？"

利伊一本正经地说："作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的监督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华盛顿……当我考察这些情报站时我希

望得到答案，这一点我已得到了麦克马洪的保证。”利伊解释说他们已向新闻界公开宣布了这一访问，因而巴拿马之行不会被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联系起来。

克拉里奇坐在床上。他不太情愿地解释说，巴拿马强人曼纽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将军，这位前巴拿马军事情报机构首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和便利。但诺列加与两边都打交道并与古巴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中央情报局既有利又不利，因为诺列加有时提供一些古巴人的好情报。当然，并不知道他向古巴人提供些什么了。总起来说，这是个玩命的游戏。不过，诺列加允许中央情报局在这里建一个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训练营地，这一设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密。如果它泄露了，诺列加就有理由取消并拒绝这项训练计划。

“为什么要在萨尔瓦多以南隔三个国家的巴拿马训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对阻断武器运输有什么作用？”

克拉里奇回答说，准备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通过哥斯达黎加袭击尼加拉瓜南部地区。

利伊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地图，“哥斯达黎加距萨尔瓦多约 300 英里，很明显这并不是在阻断武器运输。”

这个考察团的下一站也就是最后一站是萨尔瓦多，但国家安全局向巴拿马传送了一份电文，报告说有些萨尔瓦多右翼军人正计划击落一架美国国会的飞机。克里斯托弗·多德参议员正准备在同一时间飞往萨尔瓦多，很明显目标是他。西蒙斯建议在他们的飞机上贴一条标语，上面写：“不要打，右翼参议员的助手在上面。”

返回华盛顿后，利伊和职员们写出了一份绝密的长篇报告。它包括每次会谈时对话的备忘录，结论是必然的：这一行动在几乎每个方面都比所描述的规模要大。不仅仅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人数——现在已达 5500 人，而且它的一切都是庞大的。美国军

队已承担了耗资达数百万美元的相应的情报收集任务；整个中美洲都在进行支持、训练或阻断武器运输的行动。所有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甚至巴拿马——都被联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反尼加拉瓜联盟。

在上述基础上，按这一计划，将从北面通过洪都拉斯和从南面通过哥斯达黎加向尼加拉瓜发起进攻，并在夏季时将这一国家分为东西两半，到圣诞节时占领马那瓜。无论从哪一点上说这都是战争，这一行动实际上与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所汇报的完全不一样。很明显，秘密政策经常超越或践踏已宣布的或暗指的美国外交政策。那里即将爆发一场局部战争，而其计划的许多部分都未讲而且是阴险的。

在其后一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会议上，利伊要求给予15分钟作一个综述。

"喂，别扯了，"戈德华特悄声说，"那个家伙说得太多了。"

恩德斯试图将尼加拉瓜行动埋入中美洲大战略中，如果说不是隐藏的话。他想使这一秘密行动不再在公众、国会甚至政府内部显得太突出。在他看来，凯西不是个愚钝的冷战家，而且他们曾一起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民主、经济援助、秘密行动。恩德斯曾精心地设计了这一混淆计划，以避免触发"越南恶梦"。按照此方式，政府的政策在国会很畅销。但这一前景却被白宫改变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上任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

"太小了，太晚了。"克拉克说。他感到政府的政策太缩手缩脚。

恩德斯争辩说国会有决定性作用。在国会中完全反对秘密行动的只占少数；然而完全支持秘密行动的也是如此。要掌握国会，就必须说服持中间观点的10%至15%的议员。恩德斯说："唯一的办法是表明政府的政策是通向和平解决问题之路，不能放弃谈

判。”现实已表明政府的政策应适应国会。

克拉克说，如果中间道路人士和民主党人面临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他们就不会继续反对了。他将乐于发动这样一场辩论，他想约束国会，提醒它总统可以直接与选民们谈话，可以动员公众发表意见。

恩德斯嗅到了将会有麻烦，他把自己的这一想法搁在一边，敦促继续实行地区性“双轨”战略。在尼加拉瓜，这意味着一方面继续秘密支持反政府武装试图迫使桑地诺和反政府派谈判；在萨尔瓦多这意味着继续支持其政府和杜瓦特，同时迫使政府与左翼游击队谈判。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实现一项范围广泛的和解方案并将苏联、古巴和美国的势力驱除出该地区。

克拉克获得了一份恩德斯备忘录的副本，他感到很恼火。克拉克觉得，恩德斯想牺牲美国政策的连续性来使自己的生涯取得某种突破，获得职业性的胜利。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撤出中美洲并放弃自己的朋友的。对克拉克来说，这可能是在重复卡特的错误——说的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他将恩德斯的报告送给总统，并评论说它表明恩德斯并未在坚持政府的政策。

1983年2月10日，恩德斯的备忘录被泄露给了新闻媒介，在白宫内部他被指责为早期失败主义。克拉克明确表示他本人不仅讨厌谈判，而且他无法肯定白宫是否希望得到国会中间派的支持，或许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对总统最为有利。

凯西告诉恩德斯他仍对谈判战略持怀疑态度，但他不反对这一尝试并认为它在国会情报委员会中给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很好的掩蔽物。

“汤姆，”凯西说，“我知道你遇到了困难，但除了比尔·拉克以外，还有个家伙在攻击你，他就是麦克·丹佛。”

“谢谢你的消息，兄弟。”恩德斯回答说。他明白那意味着南希·里根反对他。

凯西曾听到丹佛称恩德斯是“废物”及“过分注重形式的人”，这是致命的。

凯西看到白宫准备走上中美洲的前台很高兴，事实上，比尔·克拉克似乎很好地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方向。

凯西通往白宫的主要渠道之一是里根的演讲撰稿人安东尼·多兰，1978年因其调查报道而获普利策新闻奖。多兰是保守事业的忠实追随者，是威廉·勃克雷的门徒，他将1980年总统的竞选看作是西方文明世界比赛的决赛。他已进入了总统演讲撰稿人的办公室。尽管总是受制吉姆·贝克的束缚，多兰还是充当了里根攻击人的角色。中央情报局局长与多兰之间接连不断地传递着短笺、想法和电话。

多兰很欣赏凯西忠实信奉保守事业的理性姿态，他欣赏凯西接受批评的方式，多兰觉得这种批评可与格兰特将军在追击罗伯特·李将军时带着伤员相类比。有时不得不射出子弹并承受政治上的痛苦。凯西已不细想他的形象，他太忙了。值得高兴的，他是一个认为发现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世界，思想以及挑战比发现自身更有兴趣的人。

凯西将多兰的才能介绍给克拉克。多兰被分派撰写一篇较为普通的演讲稿，这是总统将在全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牧师大会上的讲话。在重新加工后，多兰相信自己已深入总统的潜意识之中。

1983年3月8日，下午3时04分，总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希尔顿双塔宾馆的柠檬花冠会议厅举行的基督教福言派全国联合会上发表讲话。他引用了《独立宣言》及刘易斯、惠特克·钱伯斯及汤姆·佩因的话，并称苏联是“罪恶的帝国”。

这引起了一些轰动。当日晚些时候，总统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或称“星球大战计划”，通过在太空部署武器来防御苏联导弹的袭击。苏联人污蔑里根是“疯子”。

在这片热烈的反共气氛中，凯西可以生存下去甚至兴旺起来，而恩德斯却不能。战场就是尼加拉瓜，里根、克拉克和凯西都持强硬路线，怀疑任何想继续对话的人的爱国心。恩德斯认为正确的政策是将苏联和古巴人逐出尼加拉瓜，但美国现在的政策很明显也是赶走桑地诺分子。

恩德斯被免去原职，派往西班牙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他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才离开华盛顿，其间举行了多次大型告别宴会，凯西全都出席了。似乎他仅仅出席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在一次宴会上他站起来发表了祝酒词。他对恩德斯的工作大加赞扬，强调了他杰出的经历，突出表明了他与恩德斯长期合作的感受，他们一起完成的工作。他表达得并不特别清晰，但他是倾注了感情的，听起来令人温暖，他清楚地表明他和恩德斯将永远是朋友。

1983年春季，约翰·麦克马洪自己对凯西、中央情报局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运动的忧虑增加了。一天资历颇高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众议员肯·罗宾逊问起麦克马洪有关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人数增加情况。罗宾逊是政府和中央情报局的忠实支持者，但他几乎严厉地问道，为什么从500增加成了5500人？麦克马洪答道我们对情报委员会的汇报是充分的。他解释说，情报委员会成员们之所以失去线索是因为在两次听证会之间常常已过去数月之久。而最近的最新数字是上一周的，因而这种增加是很容易想象的。在两次听证会相隔的几个月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可能已袭击了某个村庄并有100多人报名参军，或者在下一个村庄有100多名，他们不可能赶走新参军者，这是对他们普遍支持的一种表示。考虑到会产生怀疑，麦克马洪承认中央情报局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积极招募年轻新战士的计划，因此人数肯定会增加。但罗宾逊仍不高兴，麦克马洪估计他的恼火意味着尼加拉瓜行动计划将遇到进一步的麻烦。

麦克马洪还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诽谤——既对每个数字，也对计划的广泛意图和目的产生怀疑甚至敌意。

利伊对麦克马洪猛烈抨击："你们这些家伙是准备倒台了。"这一行动正失去控制可能难以为继。利伊说："没有人会为此指责白宫、国务院或五角大楼。"当这一行动完全失败后，中央情报局将遭受指责，因为这是他们的战争，而不是里根，或是凯西的，而是中央情报局的战争。里根、凯西、麦克马洪某一天会离开现在的职位，但中央情报局仍在那里。情报委员会有义务去保护美国进行情报收集的这一机构。"你也有这一义务。"利伊说。

"是的，"麦克马洪说，他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正在给中央情报局带来麻烦，也给国会带来了麻烦。"说到这里，麦克马洪涨红了脸并挥了挥手以示强调。在70年代时他就在中央情报局，那时中央情报局恰好被驱入了公众舆论、新闻界和国会的陷阱。他说，"每当中央情报局被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暴露于众时，它的整个使命就陷于危险之中。"

麦克马洪继续倾诉着对中央情报局深厚的感情。他说，这种暴露不仅会伤害他在局里的弟兄们，或者他对他们应如何收集情报和进行行动所作的特别打算，而且将毁灭中央情报局所作的一切工作的价值。中央情报局的声誉处于危险之中，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同时他们还不得不服从总统和局长的命令。他们指挥和支持这一行动的每一步骤，因此他们的任务在于找出某种能使他们免入陷阱的途径——既保护中央情报局又服从命令。而他们这些国会监督委员会的参议员们，应理解他很清楚那些利害关系。他最后说，他需要他们的帮助。

当麦克马洪讲完时，听证会房间里陷入沉默之中。

在尼加拉瓜的秘密战扩大后，中央情报局给尼加拉瓜反政府

武装的资金已耗尽，凯西决定再从总统秘密应急基金中拨些资金。这一“有进有出”的约5000万美元资金在紧急情况下或国会休会时总可以得到。在紧急情况过后或当国会再度开会时，这笔资金应得到批准并对基金予以补足。为巴希尔·杰马耶勒提供安全及情报协助而批准的数百万美元因行动未进行而保留在总统应急基金中，这笔钱又被拨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但在其书面材料到达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并通知其已转移款项之前，约有起码3周或许是6周的耽搁时间，长短取决于如何进行计算。

由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对这一行动的敏感度不断增加，因而这种由于以普通的方式通知而造成的耽搁使情报委员会有一种新的感觉，即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对它的监督者以诚相待。于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安排了一次秘密听证会，让中央情报局的审计员丹尼尔·蔡尔德出席作证。蔡尔德以前是艾诺伊参议员的助手，他说几百万美元只是件小事，他脑子里装的是更大的事。艾诺伊，这位温和的民主党人，非常愤怒。

有些民主党参议员认为这是吊死凯西的一个机会。

但参议员马尔科姆·沃勒普发现了另一个方面。记录显示当支出此款时凯西不在总部，是麦克马洪没有迅速办理。这太好了，沃勒普非常高兴。麦克马洪，一位优秀的行政官员，竟未将这一文件放到自己的桌子上，这是最严重的行政犯罪行为。沃勒普的同事们原准备猎取凯西为战利品，现已转向了麦克马洪。麦克马洪不得不向每位重要的参议员解释他疏忽的原因。在这件事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胜任迅速处理与尼加拉瓜行动有关问题，因他不了解凯西和克拉里奇贯穿整个中美洲的行动的具体情况。他是副局长但他被绕过去了，这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状况是无法忍受的。

他去找凯西说，如果他不在圈内他无法行使副局长的职能。不能再重复英曼的经历了，他们两个人都不希望那样。凯西凝视着

他并表示赞同，将建立新的程序，那些文件将经过麦克马洪。

看得多只能增加麦克马洪的不安。用他最佳的“我对你忠诚”的方式，他敦促他们设法寻找另一条途径；或许现在行动公开了，它应属于国防部范围。不管怎么说，它确实像一场战争。

凯西不喜欢这一主意。如果中央情报局不解决棘手问题，如果它将其推给军队，那么他曾发誓要恢复的准军事能力将成为一个笑话，这些行动是强硬的信号。另外，军队对这样一个行动不会有胃口，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不可能对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如尼加拉瓜之流采用正面武装袭击。

麦克马洪激昂辩论着，坚持说他是站在凯西一边。他说 70 年代他在中央情报局，在调查过程中，士气低落，意志衰退，残缺不全，是凯西改变了这一切。

凯西建议他们两人一起向其他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说明看法。他们将这一行动移交国防部的主意呈送给了温伯格、比尔·克拉克及乔治·舒尔茨。舒尔茨在去年接替了黑格任国务卿。

国务卿说他发现在外交战线上秘密途径是易驾驭的，而如果五角大楼接过去这就不可能了。

克拉克同意该行动最好在中央情报局手里掌握。他表扬了凯西的努力，克拉里奇在创造奇迹。克拉克已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总统的态度溢于言表。“比尔和中央情报局作的很正确。”里根说道。

戈德华特指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律师们，研究一下这一行动是否能从国防部直接和公开获得资金。律师们发现大约有一打法律障碍，戈德华特自己被难住了。一次国防部的军事行动将是一场战争，它需要国会的宣战。谁会想对尼加拉瓜宣战？秘密行动具有这一优点，既使其秘密不过是虚构的，是皇帝的新衣，它都有这一优点。尽管秘密行动不被国际法或国际公约所承认，但

无论如何许多国家都将采取秘密行动。不过没有哪个国家会公开邀请美国进入该国。

在众议院，勃兰德众议员不知道是否可以在洪都拉斯建起某种篱笆之类的东西来阻止从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武器。勃兰德的主意——私下绰号称为"勃兰德线"——经估算其耗资达 3 亿至 5 亿美元。它很快被放弃了。

凯西向麦克马洪传达了总统对中央情报局的赞扬，麦克马洪默认尼加拉瓜行动应由中央情报局继续进行。毕竟，凯西让他自己作出了选择。现在，按照处处保持忠诚的规定，这一情况下要求麦克马洪支持凯西。

现在，麦克马洪不同秘密行动碰头了。南美洲北海岸巴西北边的小邻国前丹麦殖民地苏里南的一些流亡者们向中央情报局请求支持。这些丹麦裔的流亡者们就是要求推翻由陆军中校德西·鲍特斯领导的政府。鲍特斯有亲共倾向并残忍地处决了 15 个人，包括他的主要政治反对派、一些记者和工会领袖。

凯西完全赞同这一看法：鲍特斯确实是左翼动乱者，这些丹麦裔的流亡者似乎是可信的。但凯西和麦克马洪一致同意他们需要获得独立的估价。行动处起草了一份"可能性探讨总统指令"，它授权中央情报局进行一次有限的秘密行动，研究一下中央情报局支持流亡者是否有意义，流亡者们是否有可能推翻鲍特斯。试图推翻或向流亡者提供直接的致命支持需要一份单独的、正规的总统指令。里根总统签署了这项"可能性探讨总统指令"，并拨款几十万美元，派一个中央情报局别动队前往苏里南收集情报并作政变可行性研究。

麦克马洪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汇报了这件事。他遇到齐声责问："你们是在开玩笑吧！"几个参议员问道，里根政府为什么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政变无关紧要？苏里南人民是纯朴而温和的，如

同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的人。其人口约35万，地域相当于亚利桑那州的塔克逊。戈德华特尤为愤怒，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愚蠢的糟主意。"

麦克马洪回答说鲍特斯政府正在与古巴人和由左翼政府领导的加勒比小岛国格林纳达进行会谈，中央情报局有一些流亡者来进行这一工作。

美国支持的诸如此类的政变何时发挥过作用？

麦克马洪不得不追溯到1954年，从中央情报局支持并取得成功的危地马拉政变中寻找答案。他清楚地表明这份"可能性探讨总统指令"意味着政府仅仅探讨一下可能性，进一步行动需要另一份总统指令并将通知情报委员会。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觉得这还远远不够，他们一致同意给里根总统写信表示抗议，告诉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反对在苏里南的秘密行动。

戈德华特给里根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事实上"你真需要这一秘密行动吗？"

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也一致反对该行动。当中央情报局别动队返回时，他们手头情报很少并报告说政变可能是难以实现的。

这一计划被放弃了，但麦克马洪在这件事上受到震惊，他决心重新献身于使中央情报局避免此类喜剧性行动的事业之中。

十二

如果凯西要使他的尼加拉瓜行动在民主党人占多数的众议院被接受，他必须要掌握住来自南部和西部的保守的民主党人，其中之一是戴维·麦克迪。麦克迪现年33岁，是俄克拉荷马州民主党众议员，在当年一月进入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为一名政府的朋友和国防的狂热支持者，麦克迪被想象为完全支持里根的整个外交政策和国防计划。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凯西告诉麦克迪，中央情报局将“采取一切行动”来对桑地诺政权施加影响。麦克迪在与凯西的讨论中有一种言辞含糊的感觉。

在一次听证会上，麦克迪问凯西，桑地诺政权在本国的学校、道路、医院上花费了多少钱？

“我不知道。”凯西急促地说，其间带有一种不耐烦的语调透过委员会开会的安全室，在国会大楼的屋顶回荡着。这是个小房间，众议员们被安排在一张固定的马蹄形桌子周围。凯西有些紧张不安，他明显表示出他认为这一听证会冗长乏味而麦克迪的问题既愚蠢又离题。

麦克迪问这是不是凯西本人不知道，或是中央情报局没有这方面的情报。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众议员先生？”凯西问道。

“我生长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村，”麦克迪说，“你应该理解为什么在俄克拉荷马州农村我们是民主党人。”麦克迪接着谈到了罗

斯福总统的新政方针和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将俄克拉荷马州农民带入了 20 世纪。他说问题在于，是否桑地诺政权在走这条路，他们是否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凯西明白了他的意思，变得有些易于接近了。他说，天主教在反对桑地诺政权，如果在尼加拉瓜举行自由选举的话，桑地诺政权不会获胜。

那么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呢？麦克迪想知道这一点。他们在这一场争取当地人的战争中在农村散布的是什么信息呢？他们炸毁桥梁，袭击了一个粮仓和一个大牧场，另外还袭击了一个发电厂。中央情报局说这个发电厂是军事目标，但结果它只有 10%的电力是提供给军队的，其余电力是给平民用的。这与美国农村电气化管理局恰恰相反。这不是建设而是破坏。

1983 年 4 月 5 日，复活节休假后第一天，莫尼汉和利伊赶到参议院大会上，表明对尼加拉瓜行动的担忧。莫尼汉提到国会与情报机构之间的"信任危机"。莫尼汉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国家，这类军事及出于各种目的的恐怖主义的压力恰恰是一些不会获得更多民主的行为。桑地诺政权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已中止了公民自决权，新闻界受到严格的检查，一个初级的警察国家机制已形成。

一周后，星期二上午 11 时，戈德华特请凯西、麦克马洪和斯波金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参加一次秘密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尼加拉瓜秘密行动是合法的并经过批准的：它得到了总统、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专家们的支持。随后，戈德华特在发言中陈述了这一观点，并充满激情地为中央情报局做了辩护，他说："我认为我们得到了完全和及时的通报。"

戈德华特把矛头直指莫尼汉，他说："那种信任危机的说法是 70 年代浮夸的返祖现象，当时丘奇和派克的委员会站在情报机构的反面对其大肆攻击和训斥。"他指出桑地诺政权已建立起一支中

美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包括后备人员在内共约4万人。"难道我的同事中真有人相信几千名自由战士会使这样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机器屈服吗?"戈德华特说，秘密行动是危险的，而那些呼吁完成这一行动的人却背上了包袱。"这是绝对不公平的。这些胆小鬼使我简直要发疯了。"戈德华特接着概述了参议院的职责及它对这些行动完全知情的情况，他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正视我们的责任——自己参与——并且不要在厨房热了的时候跑出去，这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参议院不喜欢正在进行的事，那它有自己的办法——管钱包的 权力。"如果资金被花在我们不支持的行动上，那么让我们砍掉这笔资金好了。"

当年冬天，凯西为黎巴嫩而大伤脑筋。自从巴希尔·杰马耶勒被暗杀后，中央情报局已在黎巴嫩失去了影响和情报。巴希尔的兄弟阿明被选为总统并已执政。阿明·杰马耶勒正在疏远与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试图与黎巴嫩和阿拉伯建立关系。但阿明在寻求美国的保护伞。为了保持美国对黎巴嫩的影响，白宫提出了一名候选人担任黎巴嫩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阿明同意并任命了42岁的黎巴嫩人瓦迪·哈达德任此职。哈达德曾在世界银行工作过，他身材短小、匀称，做事精明并富有理智，由于他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被认为是"美国人"。

凯西曾在1983年初与哈达德会过面，两人都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影响及阿明本人表示忧虑。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被叙利亚人出卖了，那只能说你对他们了解的还不够。"

凯西表示赞同，并想知道有关阿明的个性及其实力情况，因为有许多关于这位新总统的否定性报告。最近的传闻说他在巴黎疯狂购物，单在克里斯蒂安·迪厄商场就购买了24套新服装和新衣料。军队也不喜欢他，并认为他软弱。凯西问道，阿明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吗?

是的，哈达德说。但又补充说，他的回答只是希望是这样，换句话说，是不支持。凯西判定，这位黎巴嫩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黎巴嫩新总统之间的关系明显紧张，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会持续下去。

在哈达德看来，他确信，如果他想给里根总统传递信息的话，凯西就是该途径。

凯西对中东政策施加影响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罗伯特·阿麦斯。他是中央情报局该地区首席分析专家，一位传奇式的中央情报局的最重要的官员之一。阿麦斯常常衣着随便，戴一副浅色飞行镜，脚蹬一双牛仔靴。他是个很有主意的人，脑子里充满了新的甚至非常规的思维方法。作为一名行动处官员，他为中央情报局招募特工和情报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早期在贝鲁特执行任务期间，阿麦斯第一个使中央情报局真正渗透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其组织内发展了两个重要的情报员。

阿麦斯招募的情报员阿里·哈桑·萨勒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安全和情报处长。萨勒姆被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代号为"红王子"，于1979年在一次可能由以色列搞的汽车炸弹爆炸中遇害。阿麦斯当年在贝鲁特是所称的"秘密机构之战"中的主角。当时的贝鲁特间谍和情报机构满天飞，几乎每一次枪战、炸弹爆炸或外交行动都继发情报卷入。在那个世界里，生存有时简直就意味着寻找平衡而后两面下注。

阿麦斯觉得以色列是一场一方得益必然引起另一方损失的比赛。对以色列人来说，任何其他国家或个人在与美国关系上的得益最终必然使以色列人付出代价。

凯西很高兴看到阿麦斯充当了舒尔茨的非官方中东顾问的角色。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告诉舒尔茨说有一个办法了解中东："听一听鲍勃·阿麦斯的。"卡卢奇又说："请听他的吧！他很可靠，因为他不偏不倚并不带有个

人感情。”几个月后，舒尔茨把卡卢奇拉到一边说：“你给我最好的建设之一是听鲍勃·阿麦斯的。”

阿麦斯的著名的冷静和理性吸引了舒尔茨，他很快就能够阅读情报并实际上成了国务卿的中东事务的管理者。由于两个占领国叙利亚和以色列的矛盾而使黎巴嫩的局势变得更加严重了，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但像中东的其他事情一样，他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像中东一切事情一样，它或许甚至不可能。

1983 年 4 月阿麦斯前往中东进行实地考察。4 月 18 日他正在贝鲁特海岸的美国大使馆内时，一辆满载炸药的小吨位货车冲到底层并爆炸了，这一幢七层的橙红色楼房中间部分倒塌了。据统计有 63 人死亡，其中有 17 名美国人，他们当中有阿麦斯，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副站长和另外 6 名中央情报局官员。

当凯西收到第一份报告时，他简直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他所领导的机构从未发生过这样具有破坏性的事件。中央情报局曾开会讨论过恐怖主义，难道那件事被恐怖主义分子知道了吗？

国家安全局已破译并阅读了伊朗外交部与其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大使馆往返的密码电文。在爆炸后，专家们分析审查了所有能得到的爆炸前截获的通讯和窃听记录。这些电文很明显提示正在策划某种针对美国社会的行动。一份海底电报显示有 25000 美元被批准付给了某项未具体说明的行动。这些破译的海底电报及其它情报已在爆炸前传给了美国大使。不过，它没有具体日期，没有具体目标，也未清楚表明美国大使馆是一个目标。

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报告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截获伊朗的通讯。凯西对这些泄露表示怀疑。尽管这些新闻报道在美国未受到太多注意，但很明显伊朗人读到了这些。以后不再有任何电文了。这太令人痛心了，因为凯西曾希望如果国家安全局继续监听伊朗通讯，它或许会使我们知道谁进行这次爆炸。将来的电文或许仍会提供针对美国的行动或

计划的线索，但现在什么都没得到。一个主要的情报来源被漫不经心地丢掉了。

凯西对此进行了调查，以查出谁泄露了消息，但这些截获的电文已较广泛地在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传阅过。爆炸二天后的《国家情报日报》登有对所截获的通讯的一篇摘要。有几百个人，包括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会阅读了《国家情报日报》。

这份“绝密密码级”的情报日报的150份副件按规定应在当天交回，但只有50份回来，这意味着约有100份副件被适当地滞留在政府里。按照规定禁止复印《国家情报日报》，但经常在送回的副件上发现手写的复印指示。有一次在一个办公室发现有75份复印件。

凯西并不知道杰克·安德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报道截获通讯的消息，这肯定是他决定关闭新闻媒介与中央情报局的接触途径，或许那是个错误。凯西觉得他也许本可以说服安德森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那么准确地说出获得情报的确切来源和方法。他没有美国新闻媒介系统内的早期预警系统，他开始想，他需要有一个新闻官员。

紧挨白宫的那幢灰色大建筑物是行政办公大楼，里面是总统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沿一条大而宽的白花纹大理石的走廊到头是351房间。1983年的春季，在那间房子里，有一个身材矮胖、留着络腮胡子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他正在认真查阅送到他办公室里的成堆的文件和情报。这个人和办公室是里根政府有关中东问题的神经中枢。在书桌上，杰弗里·凯姆普正在辛勤地研究着细节，他是国家安全局有关中东和南亚事务的主要专家，他正在仔细研究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可以肯定，伊朗参与了使馆爆炸事件。但关键的问题是叙利亚。这一爆炸事件有叙利亚人的特征。但美国情报界没有一个答

案或至少某种可用于外交的较明确的答案。美国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偶然的威胁之上。可以肯定叙利亚情报机构已知道将要发生的爆炸事件，但叙利亚人及其领导人在何时何种程度上进行了亲自的控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叙利亚有许多独立的统治集团，阿萨特总统这位中东最持久、最狡猾的领导人，熟悉和控制着其中大部分集团。

叙利亚是个棘手的难题，如同陷入了情报沼泽地里。当凯姆普看到这些材料时他发现情报与政策愈来愈不相关联了，这一点不仅仅在叙利亚，而是在中东各地。凯姆普发现原始情报势如潮涌，每天都有着数百份电文、窃听记录、情报员报告、摘要等，但无法弄懂它的意义。那种称为加工后的情报——《国家情报日报》，或国务院的每日上午的情报摘要，或特别报告，或考察报告等——似乎都是适合自身的口味。图表或许是很好的，但当他查阅过后，凯姆普无法使自己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没有一套加以组织的原则。如果他要研究在黎巴嫩下一步该怎么办，埃及当天的情报或许更好、更有关。

凯姆普需要的是准确、严密、严格地了解那些国家及其领导人真正的动机、目标或行为，达到这一点需要许多人。鲍勃·阿麦斯之死留下了一个空白，它使得乔治·舒尔茨无法进行深入的了解，把舒尔茨撇在了一边。凯姆普的老板比尔·克拉克经验不足，并实际上将中东割让给了舒尔茨。

使馆爆炸事件四天后，里根总统宣布将派国务卿前往中东。

1983 年 5 月 17 日，黎巴嫩和以色列就有关以色列军队撤出和保证以色列北部边界安全签署了一项协议。在与舒尔茨和其他外交官交谈中，阿明·杰马耶勒总统多次提到了叙利亚，舒尔茨确信叙利亚不会对一项解决方案投反对票，并相信美国对叙利亚的影响力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大。

杰马耶勒有一条宗旨：如果他不得不向叙利亚人屈服，他想在他强大时这样做，与以色列的协议将联合黎巴嫩国内各派力量。他还需要美国的保证。

因此在黎巴嫩与以色列签署协议那天，里根总统给杰马耶勒总统一封秘密信件。这是种保证书，信中保证美国将不会容忍黎巴嫩因与以色列签订协议而遭受袭击或蒙受损害。如同巴希尔·杰马耶勒曾被中央情报局保证予以支持和保证一样，现在他的兄弟也受到美国总统秘密保证的支持——外交及军事保护伞，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驻扎在贝鲁特。

但中央情报局不认为这项方案是解决问题的开端，一份又一份的报告说叙利亚不会附合的。国务院的情报调查局同意这一看法，这些报告提出了三个基本观点。第一，黎巴嫩国内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即使伴有军队，美国也不可能用外交手段解决这些问题，除非愿意投入 5 万美军。第二，阿明·杰马耶勒是个天生的软弱领导人。第三，美国在黎巴嫩的维持和平部队最终将以这一派或另一派的名义开始杀害阿拉伯人，而这将不会被其他派系所接受。

分析报告总结说，另外尽管美国某些政策制订者倾向于认为叙利亚是苏联的代理人，但叙利亚有其自己的议事日程，而且阿萨德总统是坚强而可怕的统治者和战略家，这与阿明·杰马耶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凯姆普觉得情报界最大失误之一是不能完美地刻划出这些领导人的心理、个性和政治轮廓。阿萨德、杰马耶勒和贝京的个性是问题的关键，但美国情报界对其描写的不准确，因此美国高层领导人并没有得到最本质的东西。例如，去年由中央情报局政治心理科科长杰罗尔德·波斯特所写的一份有关卡扎菲的心理特征报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陈词滥调。报告中说："尽管普遍认为卡扎菲未患精神病，并在很大程度上能联系现

实……但以断定卡扎非患某种严重的心理不平衡——一种‘界线性个性紊乱’。”

这种“界线性个性紊乱”——精神病学的一个热门话题——不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紊乱而只意味着此人行为在疯狂与非疯狂之间转换着。凯姆普怀疑这是否会对制订政策的人有所帮助？有关卡扎菲的报告还补充说：“在严重的压力之下，当他的判断出现偏差时，他易于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行为。”其后一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将卡扎菲的某些行为归咎于接近于或实际上已经陷入中年危机。对凯姆普来说，这是非常愚蠢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愚蠢。凯姆普建议说，从某一方面来说，白宫本应请几位小说家来协助研究这些报告。

由于里根很少读小说而爱看电影，因此中央情报局开始将一些领导人的简介制成能在白宫或戴维营给总统放映的资料。其中之一是关于埃及新总统的。屏幕上打出“绝密”字样，解说员开始解说：“这是霍斯尼·穆巴拉克。”其后伴随音乐放映了一个小村庄的一些画面，那是穆巴拉克的出生地——加弗拉·艾尔米斯拉，座落于尼罗河三角洲北部的一个省里。

一个领导人越远离常规情报或甚至于美国电视采访，这一简介的价值就越小，因为它可以将他描写成任何类型的人。但对于一个具有很明确国际形象和声誉的领导人来说，中央情报局的简介就变得很惹人注目并十分有效。其中最好的例子之一是有关以色列总理贝京的简介。简介一开始出现了推土机清除的镜头，工作人员都戴着面罩，在一个纳粹集中营里推出了成堆的尸体，这时响起了贝京的声音：“永远不再发生，永远不再发生！”这一简介似乎深入了贝京的思想里，因而很有说服力，但贝京的思想已世人皆知了。

里根对这些简介录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凯姆普认为它们对教育几乎不懂外交事务的米斯、贝克和丹佛也很有用。丹佛

很喜欢这些简介，他给中央情报局传话说里根看了这些简介很高兴。不久，中央情报局开始提供里根计划访问的国家和首都的秘密的旅行漫谈或“预知内幕”。

按照5月17日的协议，并未要求黎巴嫩与以色列接触。但杰马耶勒允许其黎巴嫩情报机构与以色列的摩萨德保持秘密关系，并向以色列人传递有关巴勒斯坦人行踪的情报。以色列人已命令不必最高层批准即可对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对巴勒斯坦人的空袭次数增加了。

舒尔茨这位前海军陆战队人员，极力主张1600名海军陆战队维持和平部队留在黎巴嫩，凯西表示同意。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竭力反对。但总统不希望表现出退却，因此海军陆战队仍留在那里。

凯姆普相信美国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毫无收获。在政府内部没有进行政策辩论的体系，而那样的话会迫使人们面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果这些部队陷入困境怎么办？如果他们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得不到解决怎么办？

现在斯坦·特纳正在其弗吉尼亚的城市寓所的底层办公室里写文章——他退休第一年已发表了16篇文章——并在写他在中央情报局期间的回忆录。他坐在他的拉迪沃·沙克牌电子计算机前，打出其对尼加拉瓜的看法并加以推敲。

如同每一位中央情报局雇员一样，他也毫无例外地签署了一份退休合同，同意将其任何作品送交审查。

中央情报局的审查官员们对特纳特别严格，说作为一名知情者，他不能说出诸如中央情报局正在秘密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之类的事。中央情报局以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曾有一次较小的政治支持秘密行动为理由，认为这一审查是合理的。特纳认

为他们的拒绝是荒谬的。里根政府的准军事秘密行动与那完全不同，除此之外，众议院对《勃兰德修正案》已进行过公开辩论。但中央情报局仍不松动，特纳认为这是要阻止他公开声明反对尼加拉瓜行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特纳可提到新闻报道及国会辩论，但不提出自己的主张，他的所有讨论和批评前要冠以限制词“如果”。

特纳经批准的最后文稿开始时这样写道：“如果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情报局正在源源地参与向尼加拉瓜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那么它就犯了个大错误。”

特纳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83年4月24日，星期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其标题为《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首脑的观点：停止尼加拉瓜秘密行动》。凯西愿意听取批评，甚至于特纳的批评，但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过是重渲“英曼主义”，而且特纳使它更落后了。如果中央情报局和政府不做必需要做的事，公众的幻想就会破灭。反对派永远会存在，这如同日出一样是自然存在的。但凯西比以往更加坚定，决心不被反对派所操纵或驱使。中美洲不能拱手送给共产主义者，他已了解了罗纳德·里根的思想。

在白宫，凯西解释说尼加拉瓜行动正处于危险之中，他需要帮助。总统同意出马以保证国会不会砍掉相应的资金。在达拉斯，舒尔茨指责说尼加拉瓜已成为一个新式的独裁的基地，并将其目标指向“整个中美洲”。里根请几位国会重要人物到白宫作私下交谈，并给其他许多议员打了电话。

4月26日晚黄金时间，里根向国会全体议员作了34分钟的演讲并向全国电视直播，这是他就任以来第一次就一项外交政策问题出现在国会全体议员面前。他呼吁国会批准他的请求，即公开拨款6亿美元援助中美洲。他遵守了协议未指出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秘密援助，但当总统说：“我们不应该，我们不会保护尼加拉瓜政府不被其本国人民所愤恨”时，没有人未领会到其

未讲明的含义。

在参议员多德代表民主党做回答时，他采用了典型的里根战术，一幅独特、鲜明、生动的画面。他选择了萨尔瓦多："我曾到过那个国家，我知道殡葬业者们每天早晨走到大街上去为那些前一天晚上被萨尔瓦多秘密警察即刻处死的人收尸。——这是黑社会的作风——受害者们跪着，大拇指被铁丝绑在背后，一颗子弹穿过脑袋。由于我们与罪犯的联合，将使我们得到同一景象的报应。"

几分钟内，爆发了一场重要的外交政策辩论——不仅对总统或其演讲，而且对多德和其讲话。民主党人开始向多德猛攻——他是否走得太远了？他是否侮辱了总统及美国人民？

几个月前当多德访问尼加拉瓜时，国家安全局曾截获了一份通讯。在这份电文中，桑地诺政权讨论了如何操纵多德，如何形容他是个好人，使其如果不同情他们的话也能理解他们。如同有关一个参议员的任何事暴露后所做的一样，国家安全局将截获电文的一份副本送给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多德认为这是故意诽谤，并向白宫表示不满。他有国务院电文来往的副件，表明他在与桑地诺政权会谈时是强硬的。

凯西无法对这一系列的事件感到高兴。现在，问题主要是多德参议员，他的"铁丝绑大拇指"的讲话及他在马那瓜而不是中央情报局所受到的"好人般"的接待。

5 月 3 日，凯西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说委员会按党派界限以 9 票对 5 票，砍掉了尼加拉瓜秘密行动资金。

5 月 6 日，凯西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了。他让讨论渐渐趋向 1981 年签署的总统指令的技术性问题。参议员们认为，很明显其目标已超出了阻断武器运输。凯西很恭敬，是的，这一指令应重新加工。

戈德华特建议起草一份新的总统指令，其中应提出一个新目

的——施加压力，民主化进程及采取措施迫使桑地诺政权谈判。

凯西加以调和。他说政府将研究这一计划并使目标表达得更加清楚、有力。这是重大的让步，总统指令是行动分支积极维护的特权——总统决定秘密行动，仅通知国会情报委员会。

莫尼汉、利伊和其他共和党参议员们认为他们有明显多数可立即砍掉这笔基金。

但戈德华特曾事先与里根和凯西协商过，他建议采取一项妥协方案——既不完全继续，也不完全终止。

凯西知道这一妥协方案对立法者们很有吸引力。称其为妥协方案，再加上戈德华特的名义，它不会失败的。戈德华特妥协方案内容是：再继续为这一行动提供五个月的资金，并依一项新的写明该计划目标的总统指令批准下一财政年度用于该行动的另一笔 1900 万美元拨款。但它也说明下一年度的 1900 万美元"决定于委员会的多数票"。

莫尼汉和利伊指出，这是情报委员会对秘密行动享有权威的一项新的、重要的体现，因为他给予了情报委员会投票通过或否决秘密行动的权力。莫尼汉说："总统指令将不得不得到委员会多数票的赞成。"

这一妥协案以 13 票对 2 票通过，共和党参议员沃勒普和约翰·查菲投了反对票。

凯西很高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被推动了，他既不会让委员会来批准总统指令，也不会让他们写总统指令。国会暂时得到承诺，而中央情报局得到了资金。

新闻媒介总爱泄露。凯西肯定他在国会的反对者们已开始用恐吓公众来维护旧制度。二天后，《华盛顿邮报》有一个头号标题，上面写的是：《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已增加到 7000 人》。这篇报道对"中央情报局向情报委员会成员汇报的坦率程度"提出了疑问，其间充满了隐晦的暗示。一篇《纽约时报》的

报道引用一位未透露姓名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话说:"无论如何，中央情报局对我们撒了谎。"几天后，《纽约时报》又登出了冠以《中央情报局预言要推翻桑地诺政权》标题的重要报道，这是不真实的，凯西迫使《纽约时报》在第二天的头版做了有效的更正。

当晚凯西同500名客人一起出席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大会议厅举行向迪克·海尔姆斯授予多诺万奖的仪式及正式晚宴。在凯西看来，它是铲除70年代垃圾的最后一铲，是反美年代的结束。晚宴对于一个复原了的人来说别有风味，凯西称赞了海尔姆斯，布什也这样做了，里根总统写来一封信，对海尔姆斯"献身于良心的呼唤"表示敬意。

海尔姆斯受到了如同战场归来的战斗英雄般的欢迎。他站在乐队指挥台上，身后是张大至十英尺，表面呈细粒状的一张旧的多诺万的照片。海尔姆斯身着一件翻领衬衫，领子上缀着将星，显得潇洒而有智慧。他喜气洋洋地说:"我很感动也感到光荣，其中的原因对在坐的任何人都不是秘密。"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白宫"危机指挥室"里举行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时与凯西相邻。在某种程度上，柯克帕特里克喜欢这些她所称的"计划小组成员"，这是肉和土豆的聚会，是外交政策的内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推出全球性公开和秘密性政策。参加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给这位前政治学教授一个难得的机会——参与制订外交政策。凯西来时，带着他的"家庭作业"，一份打印的简报，上面常常被他用铅笔大加修改。他咕哝着完成其陈述，他肯定不是一位能用其表达清晰的辩论或感情转变潮流的人，但他可以回答问题并有一身的远远深于其摘要的知识。柯克帕特里克悲哀的发现，在这一点上他几乎无人能比。

有一次当一位政府的中级思想家建议他们提出些长期的国家

外交目标和战略时，柯克帕特里克回答说："它将是毫无用处的训练，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它——唯有凯西例外。"

柯克帕特里克以其1980年发表于《评论》杂志的一篇文章而引起里根的注意并最终得到了其在联合国的职位，她文章的题目是《独裁及其双重标准》。她在文章中写道："伊朗国王和索摩查不仅是反共分子，而且他们对美国非常友好，"她痛斥卡特没有看到那些右翼政权比阿亚图拉和桑地诺政权要重要些。

在其进入政府的头两年里，她多次惊奇地发现里根、凯西、比尔、克拉克和她本人所持的保守观点未能完全控制政策，官僚和实用主义者获胜太多，总起来说唯一例外的是凯西的情报行动，而这些行动却成了一套连贯的战略。

在那两年间，她和凯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相互尊重。他们一致赞同柯克帕特里克私下提到的里根政府的真正"丑闻"是高级政策制订者对外交事务的无知，包括这方面最明显的是总统。但总统对不知道的事非常有教养，因而所有人包括柯克帕特里克和凯西都倾向于不以这一点来反对他。他们承认，结果是外交政策并未得到很好的重视，做得不够。

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陷入了为确立所有辩论的基调而进行的一场持久的官僚战之中。温伯格决心保护国防部的团体健康，并坚持避免军事卷入。舒尔茨是个精明的人，但实际上他的手受到束缚而且与苏联的外交主动性减少了，因为那意味着必须在谈判中放弃某些东西——对右翼政权原有的极大恐惧。舒尔茨—温伯格的相互抵销留下了一处真空，必须有人予以填充。里根既无这方面知识也不倾向于逐个碰头，决定谁来填充。副总统布什没有与这方面相接近的权力，比尔·克拉克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既无背景又无毅力来懂得其本质。

实际上这一真空被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和总统助手理查德·达尔曼所填充。他们与丹佛一起控制了总统的日程安排

和文件传送。他们安排总统作什么事，会见什么人，读什么材料。在需要总统做出决定前，贝克和达尔曼要进行一次多方面考察，寻找能被舒尔茨和温伯格接受的选择方案，与国会领导人和其他人协商。一份意见一致的建议稿将呈交总统批准。

柯克帕特里克和凯西都认为作出决策的机制如此弥散常常压制了总统的真实动机。他们私下抱怨说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着同样想法的最小公分母。

柯克帕特里克逐渐变得真诚地崇拜凯西。他过着平衡的生活——既玩命工作又拚命玩。他总是有计划的喝一壶。她认为他审美能力很强，从音乐到地毯都很会欣赏。他非常老练、富有，知识广泛并很文明。在她作学术工作的那些年里，她已习惯于见到很杰出的人常常会在嚼饭时发出很大的声响，并不懂或不关心如何打好一个领结，她从很早以前就得知那些事无关紧要。在她看来，他对政策极为认真并热情关心，在那些国家安全计划小组成员中是无人能比得上的。每当他们在某些社交聚会上相遇时，他们会很快单独躲在角落里，谈论政策。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他们意见不一致。

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如果没有广泛支持和国会辩论，里根政府的秘密行动将无法有效地进行下去。

凯西说那是麦克马洪的路线。他辩论说，这一届政府不选择外交和军事干预。总统既不想坐视苏联人扩张又不想与之战斗。秘密行动是在国外既包含或限制美国卷入同时又达到目的的一种途径。而且他想尽可能予以保密。

尽管两人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致，但柯克帕特里克和凯西仍是最亲密的朋友。她觉得他能够听取其它观点，这一点就很值得赞赏。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他让麦克马洪继续留在身边的缘故，凯西不怕让自己的判断接受检验。

另外，柯克帕特里克很高兴凯西不属于任何只向总统甜言蜜

语的阴谋小集团。他说苏联人正在扩张，当凯西用辩论说明苏联人扩张的程度和持续性时，可以感到他引起的冲击是最强烈的。政府内部重要人物们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在他们的选择方案、问题和犹豫之中，最坚定的是凯西的秘密行动。现在他已赢得了尼加拉瓜行动继续进行的资金，至少可支撑五个月，现在到了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在恩德斯离开后，凯西和柯克帕特里克想晋升康斯坦丁·门杰斯代替他。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自动主持尼加拉瓜秘密行动的多机构小组，但舒尔茨不想要一个狂热的右翼人士。

作为妥协方案选择了美国驻巴西大使安东尼·莫特利。他是一位无忧无虑不信教的人，现年44岁，曾在阿拉斯加当房地产承包商并是共和党的集资人。他生在巴西，讲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里根和丹佛在早些时候对巴西访问时对他砍掉官样文章的作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凯西认为他有证据了。当年春季中央情报局得到报告说，几架利比亚飞机按日程将在前往尼加拉瓜的途中在巴西停留，机上所载的不是利比亚所声明的药品而是武器。莫特利给凯西打电话说："我要采取行动找外交部长，对这些飞机进行检查并扣留，不过我必须事先肯定这不是某些人猜测的产物。"但凯西手头有在利比亚的一个情报员提供真正货单的副本，于是这些飞机被扣留，发现了70吨的武器和炸药，这在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宣传上获得了双重胜利。

凯西也对莫特利在巴西的收集情报工作印象颇深。他定期与巴西总统一起吃牛排、喝啤酒，而且他写出了出色的报告，令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报告和国家安全局的窃听相形见绌。

最为重要的是莫特利愿意干点棘手和出力不讨好的活。在中央情报局计划推翻苏里南领导人的计划被证明是难以实现的以

后，巴西情报机构进行了它的第一次秘密行动。巴西和苏里南有约 100 英里的共同边界，在莫特利的怂恿和中央情报局的轻意帮助下，巴西情报机构派遣情报人员以教师身份进入苏里南，让苏里南政府断绝与古巴人的关系。苏里南领导人鲍特斯中校后来断绝了与古巴的关系，巴西情报机构通知莫特利所有有关这一秘密行动的记录都已被销毁。

莫特利被召回华盛顿，在那里舒尔茨通知他，他已被晋升为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让我们使尼加拉瓜秘密行动不要成为一个竞选的问题，”舒尔茨指示说，“同时，不要让桑地诺分子得势。”

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吉姆·贝克也给了莫特利同样的指示。贝克说，总统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给尼加拉瓜行动加温同时又避免国内的公开意见冲突。

凯西意识到这代表了丹佛的看法。丹佛负责总统的名望，这在白宫是驱动一切的力量。尼加拉瓜被认为是负分；尽管总统作了说服工作并反复向公众解释，但白宫始终未能就这一点在公众观点上占上风。

另一方面，比尔·克拉克坚持亲尼反政府武装，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政策。他曾受过耶稣会的训练，相信自上帝向下有一条垂直的指令链，而总统就是外交政策的上帝，也包括克拉克和他的助手。但目前，丹佛和公众观点占上风，其结果使克拉克和丹佛之间关系日益紧张。

凯西未能将门杰斯推销给舒尔茨后，他仍不得不将门杰斯弄出中央情报局，因为门杰斯已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避雷针。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一致认为苏联共产主义者对世界形成了威胁而他们的任务是确定程度和地点。但门杰斯却假想为统统是恶魔，到处都有。许多人批评他是“永恒的危险”。他正使凯西和麦克马洪之间产生摩擦，对门杰斯的任命是麦克马洪所反对的凯西的重大

个人决定之一。麦克马洪不能容忍门杰斯意识形态的狂热，而凯西觉得门杰斯通过提请人们注意那些普遍事件中潜在具有破坏性的因素，这对凯西的目标有所帮助。门杰斯常说："这些情报界官僚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凯西喜欢这句话。他喜欢有一些重要助手支持他，使他的立场似乎更为合理。但门杰斯在中央情报局的寿命已完结，比尔·克拉克请门杰斯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凯西告诉门杰斯他在那里可发挥更大的影响，而且克拉克很重要，他深得总统的信任并与总统对苏联有着共同的观点。

许多分析专家及斯坦手下一些不信任门杰斯的行动处官员对他，这样一位中央情报局的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人，能为白宫所接受而感到吃惊。在国务院，莫特利对凯西出租麻烦的能力而感到吃惊，甚至与右翼强硬派脱离一点而没给自己带来麻烦。凯西已将其奈斯特·桑切斯的麻烦送给了国防部。他不仅知道如何摆脱麻烦，而且知道把他们放在哪里会继续发挥作用。莫特利称凯西"奴隶贩子"。

选择门杰斯的继任者将是非常重要的。凯西已提高了国家情报官的地位和声望——他们从事类似通讯联络和情报交换工作，几乎成了凯西个人的自由流动的工作人员。第一，国家情报官必须与其他分析专家成功地打交道并赢得他们的尊敬。第二，最优秀的国家情报官必须与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有良好的关系，必须完全熟悉所有行动，知道美国政策的方向和总统及凯西希望完成的工作。第三，国家情报官是中央情报局与其它情报机构的重要联系途径，尤其是与国家安全局及五角大楼。第四，作为他所负责地区特别报告的监督人，国家情报官对政策有影响。一份条理清晰、论证有力的特别报告可以像好的情报一样帮助制订政策，现在没有哪一份特别报告能比有关中美洲的特别报告更为重要的了。

凯西想找一个优秀的老手，一个曾在他参加的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服役过的人。困难在于大部分老手已走了，或退休或去世了，已过了一代人。凯西曾从退休人员中回聘了一些行动处官员，现在他决定再干一次。

约翰·霍尔顿似乎较理想，他是富有经验的行动人员之一，在中央情报局工作 26 年后于八年前退休，霍尔顿有着理想的简历：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位海军军官，后来在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站工作，1965 年至 1968 年任乌拉圭情报站站长，后来在 70 年代初任墨西哥情报站站长，在行动处先后任拉美科副科长，苏联科科长。霍尔顿不是什么理论家，他事实上是登记的民主党人。更为重要的是，老手们提到霍尔顿时非常尊敬，甚至很有感情。他既有苏联方面也有拉美方面的经验，将会很有帮助。如果说有人能描出苏联人在拉美的踪迹的话，那就是他这个人了。

霍尔顿现年 62 岁，住在附近马里兰州的农村，并种植葡萄。他对凯西的邀请很高兴，对有机会回去工作欣然接受。很明显凯西在重建中央情报局，而且拉丁美洲是关键。在经过一系列审查后，他去见凯西。

凯西发现他有点生硬和拘谨，但很聪明，表达力强。他熟悉情报任务并知道如何系统地提出答案直指问题的核心。两人的对话亲切而彬彬有礼，凯西很快招聘了他。

霍尔顿于 1983 年 5 月接任负责拉美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并立刻与其在行动处相对应的克拉里奇进行了交谈。克拉里奇向霍尔顿明确表示他知道他们在为谁工作——总统和比尔·凯西，他们想进行一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而克拉里奇正在将它献给他们，在此之间的任何人都无关紧要。当他们驾车前往国务院参加由托尼·莫特利组织的多机构联席会议途中，克拉里奇想说明自从国会及新闻界对中央情报局进行公开调查及霍尔顿离开后所发生的事。

“现在事情已不一样了，”他说，“凯西当了局长而且他很有影

响，因此在国务院现在他们听你们的。”凯西代表了真正的里根、白宫和政府的声音。“在国务院他们采取守势并不做政府所要求的事——那些杂种!”他咆哮着说：“如果中央情报局哪一天变成那样，我们真不值得活下去了。”

克拉里奇说，尼加拉瓜行动的主要绊脚石是“麦克马洪反对它，他从未为这一行动作一点事”。克拉里奇认为麦克马洪犯的主要罪过之一是他在国会有些朋友并相互灌输以踌躇和怀疑。

霍尔顿立刻明白了尼加拉瓜行动是斗争的中心，它是拉丁美洲唯一真正的注意焦点。

当年夏初，凯西计划对中美洲进行两天秘密考察，他决定带麦克马洪去。中央情报局的第一和第二号人物同时离国是非同寻常的，但凯西想让他的副手更密切地参与尼加拉瓜行动。局内传的笑话说凯西想牵连上麦克马洪，让他在秘密战争上按上手印。当然克拉里奇也要同行，而且，为实现向霍尔顿许下的诺言，凯西决定带上他的新任负责拉美事务的情报官。这一考察团的第五位成员是罗伯特·麦吉，他领导着国际行动科，一个行动处下属单位主要负责局外合同工作，是所称的“天才”。

国际行动科从一个秘密行动转向下一个秘密行动，它提供后勤保障，特别是飞机、船舶、海上保障及用于宣传和心理战行动的物资。它的大部分工作是与局外人签订合同。它在兰利总部的第一层办公，是为从一个行动转向另一个行动而转移设备和合同雇员的很有效率的部门。这一周国际行动科可能会集中在尼加拉瓜秘密行动上，下一周可能是阿富汗，再下一周就是加勒比海的一次宣传行动或在中东的一次情报援助行动。

麦吉是一个能驾驭凯西压力的人，后者常要立即行动并不许延搁。

有一次当凯西问到有关一项飞行行动推迟的时候，麦吉说：

“噢，上帝，我不想回答它。”每个人包括凯西都笑了。

麦吉对凯西对斯波金的忠诚有一个理论。他说他们同属一个邋遢食客俱乐部，斯波金是唯一一位午餐时滴到领带上的油渍比凯西多的人。

凯西同这四个人作伴考察觉得很愉快：麦克马洪、克拉里奇、霍尔顿和麦吉都在行动处有着广泛的经历。

麦克马洪和霍尔顿一起驱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里有一架12座的飞机正在等候。一个夏季响雷恰在此时响了，霍尔顿说，他的最初的、总的印象就是如此。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的工作正在受到损害，情报员们并未在监视苏联人，在绝大多数国家对政治组织的渗透几乎没有，比他想象的要少的多。它本应做得更好些，但尼加拉瓜行动吸引了全部注意力。

麦克马洪没有回答。

尼加拉瓜行动在吃掉他们，霍尔顿说。

麦克马洪说：“我从决策树的一边上去又从另一边掉下来。”他摇了摇头，很担忧。他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太公开化、太政治化了。它怎么会奏效呢？他对这一计划非常悲观。它不在走向好的一面，丝毫也不。但它是凯西和里根的基石。

当他们登机时，凯西的警卫人员请他们不要让凯西在飞行中睡小觉。其中一位说：“如果他睡了，他就会整晚谈话或问问题。”

飞机起飞后，凯西进到舱里。他是一位饱经风霜的旅行者，对在空中的颠簸一笑置之，他说：“像是在公路上撞车了。”他在与他的人前去计划战争。

他们在洪都拉斯的特古西加尔巴着陆。凯西带着他的包住在美国大使寓所内，并立即刮起了旋风。他要见每一个人，他计划进行背对背会谈，确保至少短时间地与每一位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行动官员们聊聊。这个考察团坐进汽车并前往雷道迪的安全房，那里正在进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

克拉里奇一直想使讨论指向细节问题：我们有多少武器？能招到足够的人来使用它们吗？武器够吗？弹药怎么样？让我们试试这个，试试那个。

凯西和麦克马洪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阶段。他们想这一行动怎样向国会解释。利伊参议员年内对这一地区的视察已揭露了这一行动的巨大野心，经常的泄露已显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中央情报局内部也有批评意见，认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没有任何政治经验，他们不过是一些徘徊在山里的成群的武装反叛者。凯西说他的目标很广泛。尼反政府武装必须下山，进入城市，散布他们的宗旨，将日益增长的反桑地诺政权的情绪凝聚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

克拉里奇不喜欢这一讲话，他在指挥一支军队，不是一个政党。而且这些看法危险地接近了违犯《勃兰德修正案》。它禁止任何"目的在于推翻"桑地诺政权的企图或行动。一支老练的政治力量可以推翻一个政府，而那肯定是他们的目标；一支不正规的军队并没有明显的或相同的政治目的。

凯西想要一个政治信息，他想让尼反政府武装在尼加拉瓜作为一支政治力量而出现，他相信尼加拉瓜人民将聚集成一股新力量拥护民主和资本主义。人民将会对图像和信息作出反应。

局长说："尽管如此，看一看萨文比。"他提示安哥拉抵抗力量领导人萨文比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为自由而战的典型人物。尽管按照1976年的《克拉克修正案》，中央情报局被禁止向他提供支持，但萨文比已成为武装抵抗的一支持久力量，打死数万名古巴士兵并缴获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

他的几位旅行同伴认为凯西在毫无批判地轻易接受了南非情报机构所描绘的萨文比的美好形象，萨文比是他们的人，而且几年来南非少数白人政府向他提供了数亿美元资金。

这一队人马向南飞了140英里，到萨尔瓦多进行另一轮政治

和情报会议。凯西抓紧时间向当地每一位中央情报局情报站情报官员们及那些可爱的野外工作的男女特工们进行友好的交谈。他与人们在一起有一种政治家的轻松——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一句简短、活跃的话予以鼓励，或问一个指定的问题并停下思路听取答案。行动处的官员们认为他表现出了兴趣和关心。

凯西还想向萨尔瓦多政府军队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就右翼行刑队继续活动发出个人的严厉警告。这些在70年代为同左翼军人战斗而建立的突击队暗杀了一位大主教并谋杀了四名美国修女。人权组织指控说在过去的四年里已有3万多人被杀。它或许有些夸大，但它肯定是一个严重问题，它是多德参议员曾用过的用铁丝将大拇指绑在背后的景象，萨尔瓦多被想象为到处是摧残人的景象。

代总统阿尔瓦·马格那与他们共进晚餐，凯西开门见山地提到这一点。“我们对行刑队非常担忧而且我们不得不对它采取某些行动”，他坚定并很体面地说道：“现在，我们如何帮忙?”

霍尔顿注意到凯西在这个问题上深得萨尔瓦多人的信任，他们知道他是个右翼人士并同他们一样敌视左翼。他的辩论不是说教，而是实际的。凯西说：“行刑队不起作用，而且他们给你造成的麻烦比给左翼——你们所称的共产党——造成的麻烦要多。”不仅美国的数千万美元的援助处于危险之中，而且里根政府的支持也处于危险之中。凯西的强烈要求并不带有呼吁尊重人权的感情色彩。

凯西与所有上层人士举行了私下会谈。其中一位特别有益。它在一个小房间里进行，桌子的另一边坐着陆军上校尼古拉斯·卡伦扎，萨尔瓦多财政警察头子。卡伦扎曾在1979年至198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并与有争议的右翼前陆军少将罗伯特·德奥布森领导的极右翼的共和全国联盟党有密切关系。去年卡伦扎曾是萨尔瓦多总统职位的潜在竞争者之一，现在已不可能了。卡伦扎当中

央情报局付酬的情报员已至少五年了，每年大约得酬5.5万美元。

可能是卡伦扎的财政警察中的情报部门应对大部分侵犯人权事件负责，卡伦扎本人是清白的，但中央情报局认为，暴力地培养的军队和警察已根深蒂固。凯西对他的这位得酬很高的情报员讲话时所具有的权威要多一些，他说，住手吧，整个美国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可能会因右翼的暴行而垮掉。为了使其更个人化，凯西还暗示这样一种关系破裂意味着停止所有情报员的报酬和津贴。

在考察结束时，霍尔顿开玩笑地问凯西为什么考察这么短，他们为什么这么急？

“你到底还想干什么？”凯西笑着回答说，好像他已证明他能比任何人都更快更好地覆盖这一地区。

十三

托尼·莫特利在进入国务院七层他的新办公室后，给克拉里奇打了个电话。“我一天都在忙于尼加拉瓜行动，现在想到你那儿去一下。”莫特利想了解全部情况。

克拉里奇拿出地图、名单、表格及文件等，他是这项行动的活百科全书，详知当地地理情况、山、道路、气候及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每一位领导人的个性。“一群很粗陋的家伙”，克拉里奇谈到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许多领导人时多次这样说。然而也有许多勇猛的斗士，例如“南方的那些猛兽们”，这是指帕斯托拉“零号司令”。克拉里奇偶尔会说其他某位是个“好伙计”。

就某些方面来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中美洲的天使，然而总起来说这一点给莫特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拉里奇创建了一支军队并且自己懂得如何予以控制，这是非常惊人的。莫特利问：“作为一个来自欧洲和中东的人，你怎么会懂这么多与这些粗陋领袖打交道的知识？”

“这些人是拉丁美洲的地中海人，”克拉里奇回答说，“我曾与意大利人、北非人打过交道，我熟悉这种人。他们对你说你爱听的，他们可以用六种方式表示否定，他们对美国有着既爱又恨的关系。”

“那么，”莫特利问，“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克拉里奇说：“该死的凯西要做些产生新闻的事。”他解释说

他们都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们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走出山区。他抱怨说凯西已不满足在山里袭击成队的桑地诺军队，凯西想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在城市里“干点活”。他引用凯西的话说，“拿出点东西来”。这一“新闻”不仅要满足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而且要在尼加拉瓜国内建立起反政府武装的可信性。

对莫特利来说，这听起来有道理。

克拉里奇恼怒地说：“我们他妈的不可能从山里跳到城市里去。它很复杂，这支纯属乌合之众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同那些山里人进城一样都干不好。他们进城要花40天时间，并会引起补充供应的难题。”

“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

克拉里奇笑了笑，“有办法，总有些办法。”他已找到一些一次性行动，一些能引起轰动的行动。战争是混乱的，你不得不即席创作。

凯西决定尽一切可能的努力来保护尼加拉瓜行动，这意味着缓解他与两个潜在的破坏者——国会和新闻界的紧张关系。

凯西意识到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自己选择了错误的人选来处理这些敏感的关系。此人即是威廉·道斯韦尔，中央情报局公共关系部办公室主任。道斯韦尔现年53岁，一直是民主党人，但却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支持里根。他以前毫无情报工作背景，曾当过报纸出版商并成为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最成功的院外活动集团成员。但道斯韦尔对尼加拉瓜行动的热情却比凯西要低，凯西不能容忍一个推销员对自己的产品有任何的怀疑。道斯韦尔认为凯西对国会的轻视和他的对抗性风格是成功的障碍。

道斯韦尔觉得筋疲力尽就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凯西决定全局全力以赴组成两个独立的很有权力的办公室，一个与国会打交道，另一个与新闻界周旋。两个办公室都将由秘密行动人员来领导

——由艺术家自己推销作品。

凯西挑选在行动处已呆了 27 年的克莱尔·埃尔曼伊·乔治担任与国会联系的新负责人。乔治性格开朗，很有幽默感，在中央情报局的业务方面能力很强。在中央情报局内，他是该局最优秀和最值得骄傲的老兵的象征。

在 1975 年，正在丘奇和派克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进行调查期间，中央情报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理查德·威尔奇在其屋外被埋伏的枪手打死。尽管在雅典，情报站站长的寓所已广为人知，它甚至在当地公共汽车线路上予以标出，但这一谋杀还是引起了一阵公众对中央情报局的同情。威尔奇的身份是被卷入当时反中央情报局狂潮的几位心怀不满的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所公开报道的。他成了一名殉难者，他的遗体抵达美国时进行了实况电视报道。福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考尔比参加了他那最高军人荣誉规格的葬礼，载他的遗体的灵柩曾载过被害的约翰·肯尼迪总统的遗体。

尽管雅典情报站很危险，中央情报局还是派了一个人去担此危局，他就是克莱尔·乔治。现在他出面游说国会将有效地令人回忆起他的勇敢。乔治接受了这一职务，去国会向他们保证说将开辟一个全新的合作和相互信任的局面。

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监察主任办公室的第二号人物乔治·劳德，中央情报局内部的警犬，被叫到凯西办公室。

劳德是最早一批秘密行动者之一，当时是 50 年代，正是他青春年少之时，他有一个法律学位并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近 32 年。他高高的个子，穿的衣服皱巴巴的看上去像是大学时代的残余。劳德对中央情报局的使命和成就坚信不移。他显得有些笨拙，说话经常声音过高并常伴有夸张的语调和语言，他不是那种“冷静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位饱经风霜并富有献身精神的间谍。

劳德觉得凯西是中央情报局迫切需要呼吸的新鲜空气，凯西

立即接受了这一地下、幕后的角色——与特纳恰恰相反。当特纳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劳德是拉美科副科长。劳德在牙买加进行过秘密行动并未让局长知道，因为他无法说服特纳相信中央情报局并未偏离轨道。劳德未能说服特纳给协助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外国报纸编辑以每年仅1500美元的雇员报酬。所有这一切都因为国会监督委员会太敏感。凯西已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清除了这种不信任气氛。

当劳德进入凯西办公室时，他知道到了转换工作的时候了，但他不知道凯西想的是什么。

“祝贺你。”凯西对劳德说。

“我已选择你担任我的公共关系部门新主任。”

“我应为此而做些什么呢？”

凯西说中央情报局需要某些人去操纵新闻媒介——停止破坏性的报道。将事情盖得那么严或许是一个错误，因为新闻媒介正通过白宫、国务院及国防部或国会得到中央情报局的情报。

劳德说他一生都在避开新闻媒介——甚至曾对他的一个当报社记者的亲戚掩盖其中央情报局人员的身份。

凯西坚定地说，已选定了你了。

劳德有力地喀嚓一声立正，接受了任命。

一个行动处的官员本能地欣赏这一时刻：最高首长的邀请。在这种服从命令之中有着某种愉快的感觉，几乎令人振奋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劳德多次冒生命危险在野外工作，而新闻发布室将不会有危险。

凯西知道会得到他的同意的，这是他所喜欢这些行政处人员的行为之一，而且根据他的个人档案，劳德是一个坚定的忠诚者。但他也是个讲究现实的人，作为助理监察主任他曾参加了对尼加拉瓜秘密行动的检查，以查明阻断了多少武器。劳德很诚实，以至于说尽管发现了几处贮存武器的地窖，但这一行动并未对武器

运输造成任何冲击。他有一次说:“我们并未发现一只老鼠。”不过劳德仍是这一行动的一个支持者。

首先劳德必须散布这样的流言即凯西现在有了一个活跃的新闻官，随后他将逐渐与记者们搞熟并知道他们是如何行动的。他将使自己易于接近，并与记者们建立关系，努力搞清谁可以信任并至少在某些将带有麻烦的报道即将出笼时告诉凯西。他将不得不收集情报并看一下是否可能——确切地说不是招募这个字眼但很接近。或许操纵记者与他以前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区别。

1983年6月2日上午，麦克马洪在《华盛顿邮报》头版读到一则消息:《凯西大肆进行证券交易》。

“该死”。麦克马洪说。凯西的年度财务申报又一次提供了素材,这一表格显示凯西在一次短短的26天时间里买进约150万美元的证券。麦克马洪在起初几次听到笑话说“中央情报局”真正意思是“凯西又投资了”(这两句话的英文字头缩写相同)时，他都要大笑一番。凯西坚决拒绝将其投资双盲托管，他说他的投资顾问已干了20年，并真正做出决定。只有一次例外，当时麦克马洪逼迫凯西卖掉他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股票，否则就不允许他参与中央情报局有关计算机问题的重大决策。他卖掉后，股票价值翻了一番。凯西觉得这强调了他的诚实。

麦克马洪曾多次耐心要求凯西对财产双盲托管，但凯西拒绝了。在中央情报局内建立了一个愚蠢的预警程序，按这一程序麦克马洪和其他高级官员定期收到一份凯西有股息的几十家公司的名单。但不可能时刻掌握其线索。因而当追踪凯西有价证券的瞬间变换(有一份备忘录说，增加德尔塔航空公司，去掉拉奎那汽车旅馆)的备忘录在传阅时，兰利总部传出了少量笑话。甚至戈德华特也试过，他给凯西写了一封讽刺信，信中指出凯西已够富的了，而且其财产死后也带不走。凯西答复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也有接触敏感情报的类似途径，他们的双盲托管在哪里呢？

麦克马洪意识到预警措施效果不是太好，而且研究表明13家凯西有投资的公司曾在前一年与中央情报局作过生意，金额自12美元到近400万美元不等。

中央情报局需要这样吗？麦克马洪感到怀疑。不，麦克马洪想把他老板作为一名税收代理人那隐藏的斯芬克斯女怪般的冷酷揭露出来。

他去找凯西。他说，公众印象是凯西一天要给他的证券经纪人打半打电话，对华尔街作手脚，并浏览秘密情报以便比其他投资者先行一步。

“这是弥天大谎。”凯西说。

麦克马洪说，确实如此，不过其影响不会消失。凯西处在了难以防止的阵地上，一方面他坚持说他并未利用他的机会参与买卖证券，而是他的投资顾问做的这一些。另一方面，他坚持保留他那未行使的权力。他要同时拥有这两方面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假使你习惯于让你的投资顾问作决定，那么它与双盲托管财产又有什么两样呢？

“不会的。”凯西回答说。

“既然如此，就去干吧。”

凯西毫无表情地盯了他一眼。

7月18日，星期一，凯西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说在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最初二年半时间里，他已经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双盲托管财产，”那既合法又恰当。“然而，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混淆和误解，我计划建立一个正式的双盲托管。”

当年夏季晚些时候，凯西秘密前往非洲和中东视察当地情报站。亲临现场视察几乎已成了他的生理需要。如同肯尼迪总统遇刺的达拉斯广场一样，每当你亲自站在那里时，一切都变得不同

了，意味着更多的东西。情报站站长们仍需要他个人的亲自推动，以在其领域里进行更多的情报收集活动，走出大使馆，扩大与当地人的联系，秘密参加政党会议等等。

在六位助手的陪同下，凯西乘坐着一架空军专机，计划在18天内视察11个国家。穿过大西洋后，他们先在西非的塞内加尔然后是象牙海岸停留。如同他要视察的其它国家一样，凯西在这两个国家里拜会东道国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会见情报首脑或其副手，拜访美国大使，并由情报站站长驾车视察，途中他向他们提出一连串问题。这个宫殿距兵营多远？距大学呢？谁是主要的反对派领袖？克格勃怎么样？

离开西非后，经500英里航程又抵达了尼日利亚。从机场到首都拉各斯的道路成了汽车和小贩的海洋，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方走完。尼日利亚情报局副局长带了一队人试图清理道路，凯西的一名助手说："想象一下麦克马洪试图为他们清理乔治·华盛顿路的情景即是如此。"凯西的车停了一下，一个土著人敲车窗想卖给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一段50英尺长的花园浇水软管，凯西说："这不是从机场出来急于要买的东西。"

在扎伊尔，即以前的刚果，凯西会见了其领导人约瑟福·蒙博托。中央情报局与蒙博托自1960年就有关系，当时中央情报局策划了暗杀刚果民族主义领导人帕特里斯·卢姆巴。1960年8月25日由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发给扎伊尔情报局局长的电文称："清除卢姆巴必须作为紧迫而首要的目标，在目前情况下这应成为我们秘密行动的最优先考虑的。"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计划生效前，蒙博托支持者中的另一个组织暗杀了卢姆巴。凯西与蒙博托有着重要的私人关系，目前他们在交换情报。

凯西局长在一次晚宴上，用法语讲了几句话。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参加了一次由抵抗组织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同现在一样我说的是法语。第二天的报纸说凯西先生说他的母语。我的

理解是那或许意味着他们认为我的法语非常流利以至于像是一个法国人，但也可能意味着我的法语如此差劲以至于他们认为我在说英语。”

房间里迸发出一阵笑声。

这个考察团随后飞往赞比亚，考察完毕后下一站直奔南非。凯西走进飞机座舱指示驾驶员超低空掠过赞比亚河，在经过壮观的维多利亚瀑布时才拉起。经过一次还不够，他向窗外凝视着要求再来一次。在比勒陀尼亚，凯西照例拜访了东道国政府、大使馆，视察了情报站，并与十几位南非实业界巨头一起参加了在乡村举行的烤乳猪午宴。他们中的一位一点不知道凯西的背景，在宴会后说：“这个家伙很机灵，他可在经商上赚大钱。”

凯西很欣赏南非的情报机构并与之保持紧密联系。南非很重视共产主义对他们所在地区的威胁，并向在安哥拉同马克思主义政权战斗的乔纳斯·萨文比领导的抵抗运动提供了大约 2 亿美元。凯西仍希望撤销 1976 年的《克拉克修正案》，那份修正案禁止中央情报局向萨文比提供秘密援助。他向官员们保证中央情报局将尽快参加这场冲突。

在这炎热的天气里凯西的换洗衣服已堆了起来，他几乎将所有的衣服都送到了宾馆洗衣处，那里曾保证 24 小时服务。他们预定第二天清晨 6 时离开，但到了半夜他的衣服还没送来，为了能按时启程，警卫人员不得不破门进入宾馆洗衣房取出他的衣服。下一站津巴布韦完成后，他们又飞往肯尼亚，他们于晚上 10 时抵达。凯西与企业界的熟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在与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共进早餐时，该站长几乎为凯西对这一国家的熟悉而感到惭愧。

经过 2200 英里的航程他们抵达开罗。凯西会见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并与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交谈了数小时。该情报站站长监督着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以外的最大设施之一，援助阿富汗的大部分武器和给养经过埃及。一行人随后前往土耳其。在凯西看

来，土耳其与苏联、黑海、伊拉克和地中海相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但却在战略上被忽视的国家。最后一站是去摩洛哥并拜访了国王哈桑。所有这些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凯西不想让一个悄悄溜掉。中央情报局不仅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安全和情报，而且它对这些国家的恩惠包括向他们的领导人提供最新的药品，政府用的飞机和接触机会，也就是安排他们的国民在美国接受教育。

返回爱德华空军基地后，凯西的助手们非常疲劳几乎不得不回家，而他们的局长却直奔兰利总部。

参议员威廉·科汉是缅因州的共和党人，目前为止他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仅呆了九个月，在一次情报委员会听证会后，他抓住机会同凯西聊了几句。作为一名共和党人，科汉想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支持政府。他知道是戈德华特亲自招收他进入了情报委员会。但他补充说，他觉得凯西和戈德华特很容易失去在委员会内部的一致支持，戈德华特的妥协方案岌岌可危。

凯西说，如果你们砍掉尼加拉瓜行动的资金，国会要对将来发生的事负责。

科汉拿不定主意，凯西或许是对的。总统曾给科汉亲自打电话说："比尔，猜一猜我打电话为什么事？"里根如同一直做的那样很谦恭地恳求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帮助。"科汉回答说他将支持政府，不过他对局势很担忧。

凯西告诉科汉他可以去视察一下中美洲，亲自去看看，并去尼加拉瓜与桑地诺政权谈一谈。他们会同一位美国参议员谈话的。

对科汉这样一位前检察官来说，亲临现场并查问证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总想准确地了解事实，想知道点神秘的信号情报世界的事情。他通读了詹姆斯·贝姆福德 1982 年写成的长达 532 页的《迷宫》，该书描写了国家安全局的某些情况。尼加拉瓜行动的答案不在书里或汇报里，而是在现场。

科汉在政治范围内并不完全属于任何方面，而且他是个诗人——他自己的诗集《儿子们与季节》已在1978年出版。他也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在1974年众议院法律委员会投票弹劾尼克松时他投了关键一票。在尼克松那盘“有确凿证据”的磁带之事被揭露前，科汉在一次全国电视辩论中，曾谈到有关合理作出推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在屋外地上睡觉，醒来时发现地上有刚下的雪，你当然可以很合理地推断出夜里下雪了，即使下雪时你并没有看到。”

科汉在参议院最好的朋友之一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几年来两人一直在秘密写一部间谍小说，这是在一次深夜的参议院会议时萌发的，当时他们谈到自己对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的怀疑。这部小说名为《两面人》，它看上去如果不是为商业性成功的话，至少也可以做为两党合作的新奇事物。其男主人公是一位领导一次对全世界恐怖主义进行调查的参议员。小说中的反面人物之一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内安置了一名女特工，或者说“鼹鼠”，向中央情报局报告情况。

1983年夏季的一个下午，科汉在参议院餐厅碰到了哈特。哈特以前曾在丘奇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工作过，现在他开始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但仍相差很远，只有4%的民主党人赞成提名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科汉责备他说：“你知道你应扩大你的工作范围。”他建议哈特把自己放在一些可深入涉及感情的问题——如中美洲。

从在丘奇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中，哈特断定中央情报局搞坏了秘密行动如尼加拉瓜行动。他曾使自己沉浸于中央情报局50和60年代的长达8000页的暗杀计划中，尤其是那些针对卡斯特罗的可怕的传说：肯尼迪的兄弟，罗伯特和约翰，哈特心目中的英雄和楷模，卷入了这一极为肮脏的权宜之计，并“花言巧语地否认”。这是一个没有相应的计划、批准、完成或最终失败的官方记

录的世界，但有一些零散、令人厌恶的数据片断。

例如，在一项反卡斯特罗计划中，有人交给一位代号为“鞭子”的特工一支装有细皮下注射针头的圆珠笔，针头很细，卡斯特罗不会觉察到注射。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指挥官还建议用一种可购买到的剧毒药黑叶—40注射。这一暗杀装置是在1963年11月22日传递的。1967年一份中央情报局监察长向国会几乎无准备地一下子指出：“它好像正是肯尼迪总统遇刺的那一时刻。”丘奇委员会发现古巴计划与肯尼迪遇刺没有联系，但哈特不相信这种巧合。它几乎像科汉所说的早上看到的地上的雪一样，他没有看到它落下来，但他知道一定发生了一些事。

9月8日，星期二清晨，科汉，哈特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少校警卫军官，乘坐一架空军C－140运输机离开美国，预定于上午9时15分在马那瓜降落。

距尼加拉瓜首都还有一小时航程时，驾驶员被告知奥古斯图·西萨尔·桑地诺机场已关闭。机场发生了一次空袭，一架双翼下各挂一枚500磅炸弹的螺旋桨式双引擎“塞斯纳”型轰炸机被击落后撞到了控制塔和航空终点站。

参议员们乘坐的空军飞机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后飞向洪都拉斯首都。一下飞机，他们即给华盛顿打电话，要搞清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从马那瓜传来消息说机场将为他们开放。

他们最后到达马那瓜机场时已是下午了，哈特对机场遭受的破坏感到吃惊。到处是烟，航空终点站被炸飞了，碎玻璃和油散落一地。被击落的飞机机身被一切两半，驾驶员和副驾驶员都死了。40名候机旅客四散逃命，一个工人被杀死。参议员们预定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贵宾室也受到损害，科汉预测如果他们当日上午提前抵达此地的话，他们可能已经死了。

尼加拉瓜新闻界在那里向他们提问。

一个记者说这一炸弹袭击事件很明显是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一次袭击。

“中央情报局不会那么蠢。”科汉说。

尼加拉瓜官员们从飞机上找出一个文件包，科汉和哈特看了看，里面有一份命令指示驾驶员去哥斯达黎加某一宾馆会见某人，一份迈阿密的装货帐单，以及驾驶员的佛罗里达州驾驶执照，美国社会保险卡及一些美国信用卡等。

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包括一些行动和合同的密码名字。科汉和哈特都认定它们是真正的中央情报局文件。

桑地诺官员们解释说机场通常只有两门高射炮，但当天早晨他们增加到 17 门，他们已预计到这次空袭。当参议员们与更多的官员们谈话后，他们明显觉得桑地诺政权正在得到尼反政府武装的内部情报。他们接着听取了尼加拉瓜军队简介，随后又会见了尼加拉瓜军政府协调人丹尼尔·奥尔特加。奥尔特加当着新闻界的面给两位参议员作了一次强硬的反美演讲。

当科汉问尼加拉瓜的主要报纸《拉普伦萨》报被关闭的有关情况时，记者们关上了镜头。

当天晚上，哈特和科汉与诺拉·阿斯托尔加共进晚餐。阿斯托尔加原是位上流社会女士后来变成为一名桑地诺运动战士。阿斯托尔加现年 34 岁，是一个传奇式人物。1978 年她引诱索摩查手下一个高级将领，令人憎恨的索摩查国民卫队的第二号人物，被称为“狗”的雷达尔多·皮利兹·维加。她把你领到她的卧室，在那里，三名桑地诺突击队员割断了他的喉咙。参议员们还被告知在当时的革命热情之下“狗”的睾丸也被割了下来。阿斯托尔加几个月前被推荐担任尼加拉瓜驻美国大使，里根政府拒绝了她。

晚餐后，科汉和哈特都很疲劳，他们在半夜与中央情报局尼加拉瓜情报站站长会谈。他们说尼反政府武装行动的情报已泄露给桑地诺政权。站长有些迟疑地为炸弹袭击辩护，说它是埃登·帕

斯托拉“新空军”的最初行动。

哈特受到了严重伤害，勃然大怒。他说，这些愚蠢、该死的行动将会害死中央情报局。想一想你们本来可以避免这些事，驾驶员口袋里有一位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科汉说，这是个民用机场，甚至不是个军事目标。他们认为能从此获得什么？如果导致尼加拉瓜人民反对尼反政府武装，那将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错误，而那就是将要发生的。在机场有几十名平民，假如有人想轰炸美国的一个民用机场呢？

情报站站长说它只是想表明尼反政府武装是重要的，它能袭击首都。

哈特问道："你们对这种类似于对东京进行首次原子弹袭击的叫嚷有何看法？"

情报站站长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自由的，情报站无法控制他们，他们自己选择其目标。"

哈特说："在进行秘密空袭时带着装有中央情报局文件的公文包，这是多么蠢的一个傻瓜？"哈特发火了，脸胀得通红，大声叫着说："你们是些傻瓜，无能，这是低劣的政治、外交和行动。"

情报站站长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发了一份紧急电文，报告说两位非常、非常不愉快的参议员返回华盛顿。

同一天，正在洪都拉斯视察的托尼·莫特利，听说了空袭失败之事，他给克拉里奇打电话。

"杜威，"莫特利说，"你简直是疯了！你怎么能在负责该地区的助理国务卿在洪都拉斯时干这事？在我视察期间我不想再有任何此类蠢事。"

克拉里奇回答说："你看，这种事并没有即刻的命令和控制。你无法临时阻止一项行动，不管它将于今天或是明天发生。你只能在几天之前方能加以控制。"凯西需要新闻，某些能引起注意的

东西，克拉里奇补充说，“既然如此，如局长所要求的，反政府武装就走出了山区。”

第二天，科汉和哈特前往萨尔瓦多。他们在那里参观了圣·劳伦祖村。尼加拉瓜叛乱者有一次袭击了这个村子，他们切断了电力，将一所教堂夷为平地并破坏了作为当地收入主要来源的织毛毯的织机。

在萨尔瓦多旅行时，他们乘坐的是一架越南战争期间用过的没有门的老式直升机。科汉戴上了一副耳机因此他可以听到驾驶员的谈话。一次，在首都圣萨尔瓦多上空约1200英尺处直升机骤然下降。

驾驶员叫着说：“上帝啊，水少得这么快，我要他妈的迫降了。”

科汉觉得他们将坠于这个大城市里遇难，而不是被共产党支持的叛乱者开枪打死。如此死去将是多么的不相称：不是被枪打死，也不是被愤怒的子弹打死或作为两个超级大国间大规模的颠覆与对抗的一部分而死去，而是由于直升机水压系统的泄露而死去。

驾驶员猛拉操纵杆，直升机突然上升，上升，一直上升到1万英尺。它带来的远不只恐惧，而且搅得胃里翻江倒海般难过。

科汉决定如果坠落的话，他宁可从1000米而不是从1万米坠落。他自己早期的一首诗《自由落体》涌上了脑海中：“我不害怕飞行/不害怕死，这个过程/不害怕这个行动/（如果只有几秒钟）不害怕。”

但直升机并没有坠毁。

当科汉回到华盛顿后，凯西来到他的办公室。

凯西强调说，中央情报局并没有批准那次轰炸。

科汉说，它很愚蠢，比愚蠢还糟。甚至没有一种先进方法扔出炸弹。

凯西既不赞同也不反对，他看出科汉不高兴。一个接触过死

亡的人对一切都有了不同的感受。他以友好的方式问科汉此行印象如何。

科汉说，你应理解你的行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已被渗透。军事或情报领导人的恶梦已成为现实，机场的高射炮从2门增加到17门。凯西保证要对此进行调查。

科汉后来得知用于空袭的那架飞机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而且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告诉他这一袭击是经中央情报局自下而上很正规地批准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帕斯托拉是幕后策划者。

没有人告诉他这次袭击源于凯西要制造新闻的压力。

然而，科汉觉得他无法就空袭事件加以争论，因为它会显得他只是为了关心自己的安全。他决定只要秘密行动对迫使桑地诺政权谈判有作用，他将继续支持它，不过他永远不会完全接受秘密行动。他也对凯西印象不好，他太狡猾了，很明显他并没有告诉他全部情况。

凯西还邀请哈特去中央情报局喝咖啡。

凯西解释说："我只想使你相信没有人想杀死你。"

哈特说，他所困惑的问题是有人，可能是任何人，中央情报局或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自己，居然会进行一次如此愚蠢的行动。任何此类的对平民的袭击可能会惹起多的难以想象的憎恨。

凯西说："我理解科汉和你曾是多么的心烦意乱。"

哈特回答："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关心那个。我所关心的是那些愚蠢背后的政策、主意和人。怎么会发生那种事？"

凯西说："我们的政策是支持民主力量，同时如果我们不能迫使桑地诺政权有所节制的话，我们希望他们能重新控制该国。"

哈特看不出"重新控制"与被法律所禁止的"推翻"之间有什么区别。

凯西自豪地提到了帕斯托拉。他说："我们在那里有'零号司

令'，应允许他们自己干。"凯西又说，"轰炸的目的是表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不是边境上的小冲突，而是反对桑地诺政权的全国性行动。"

哈特再次试图与局长讨论这类行动本性是有害的。

凯西回答说他认为哈特在防务上有许多好主意，他将乐于同哈特及另一位来自乔治亚州的参议员也是防务专家萨姆·努恩一起讨论一些防务问题。

哈特走时确信中央情报局的方向正在失去控制，将来总会爆炸的。凯西再也没邀请他谈论有关防务或其它问题。

二周后，9 月 20 日，凯西和舒尔茨前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明尼加拉瓜行动的理由。按照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长达四月之久的请求，里根最终签署了一项字面上介于单纯阻断武器运输和推翻桑地诺政权之间的一项新的总统指令。这一秘密文件有五段组成，长达两页，它是迄今为止里根所签署的最长的总统指令。它授权"给予尼加拉瓜抵抗组织提供物资援助和指导。"

其目的是

·诱导桑地诺政权与邻国进行谈判。

·对桑地诺政权和其盟国施加压力，使其停止向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武器、训练、指挥和控制设施及庇护所。

其中暗含的目的是在尼加拉瓜实现民主化，施加压力以实现尊重人权和公民自由权，舆论自由，并允许反对派参加政治进程。凯西认为这将对民主党人和两党温和派很有吸引力。他并不是不知道这正是恩德斯所提出的折衷方案，他当时因此受到批评并被解职。但这一折衷方案是他唯一的希望，因为他所要求的向尼加拉瓜秘密行动项目提供的 8000 万美元资金已被众议院投票砍掉了，众议院经过三天有关尼加拉瓜行动的不寻常公开辩论后，以 228 票比 195 票否决了这一拨款。凯西认为它是滥用自由的不恰当渲泄。

凯西喜欢同舒尔茨一起去，舒尔茨被认为是政府的温和派人士。当他们概述这一总统指令时，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莫尼汉认为越南战争本也是这样开始的。是的，它当然不一样，但其潜在的趋势是相同的。它从表面上看是一步接一步，而且每一步都是合理的，并否认这些行动的真正含义，将它们描绘为温和的，其实并非如此。他认为凯西和舒尔茨或是在欺骗自己或是在欺骗情报委员会。同他一样，任何人读了这份总统指令后，应看到其结果，尽管它们未被说明且隐藏很深。指令中说中央情报局想阻断桑地诺的主要外交目标即输出革命，并想将其内部政策转向选举、人权并最终改变其政府构成。它类似于说你想敲碎某人的脑袋但并不想杀他。莫尼汉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他急切地并努力悄悄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说尽管中央情报局说这一总统指令并不是计划推翻桑地诺政权，但这些行动和目的最后累加的效果很明显政府想达到的就是推翻桑地诺政权。

在共和党右翼中，沃勒普基本同意莫尼汉的分析，但他的解答不同："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出我们的信仰？"

"对我来说它听起来不错。"戈德华特说。

"我们必须推翻他们。"参议员杰克·加恩插话说，他是犹他州保守的共和党人。

不，凯西和舒尔茨说，他们将遵守《勃兰德修正案》的禁令，不得从事任何"目的在于推翻"的活动。莫尼汉的观点在讨论中很快败北了。凯西认为将里根政府的反共原则披上人权的外衣无异于是向民主党人扔了一块多肉的骨头。参议员们是讲究现实的政治家，这份总统指令是他们要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参议员们的要求在新的总统指令中得到了体现，他们是已进行了近两年的尼加拉瓜秘密行动的参与者，而且这一指令完全是描述已发生的事，拒绝它将是否定自己的参与。凯西判断拒绝它是不太可能的。

二天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 12 票对 2 票接受了它，只有利

伊和比登参议员投了反对票。

当年夏季，当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说是凯西向他提供了卡特总统用来准备其1980年总统竞选全国电视公开辩论的辩论要点文件时，里根内圈里出现了第一次公开分歧。国会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就此事进行调查。

凯西谈到辩论要点手册说："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从未收到、听说或以其它方式知道这一手册。"一个星期天他和贝克坐下交谈，看双方能否搞清两人间的事，平息争论，甚至找到解决两人分歧的基础。贝克敦促说："说你见过它，"并保证那将不会给凯西带来麻烦。凯西立场更强硬了。"不，"他说他并没有看到它，也没有把辩论要点手册或文件交给你或任何人。

有关已过去的竞选的备忘录开始公开，其中之一是胡戈尔写的。胡戈尔曾在里根竞选班子中担任凯西的助手。其回忆录中说，里根竞选班子在卡特阵营内有一个"鼹鼠"。这一逗弄人的消息提示胡戈尔为凯西所做的初次间谍工作，可能在两人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

为了查明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竞选间谍活动，我于9月28日去白宫旁边老行政办公大楼凯西的办公室采访凯西。我从未见过他或与他谈过话。凯西的办公室很大，维多利亚时代的华丽装饰很适合搞庆祝活动。他热情、真诚地表示欢迎，尽管他的眼睛并没有在看着我。他比我预想的要壮一些，向前走时昂首阔步但有些摇晃，好像要跌倒似的。他的面部和头看上去不仅老，而且显得憔悴。

这位局长身着一套笔挺的旧蓝西装，衬衫熨得很平，领子很挺而且领带显然很贵。我的眼睛瞥了一眼书桌，上面有几摞文件夹和文件，几乎有一英尺高。封面上有大大的"绝密"红色标记表示是截获的通讯。他走到桌子后坐下，似乎略有不耐烦，好像

在说开始谈你的要点吧。

我迅速总结了一下我所听到的事。

“谣传。”凯西说，几乎是嘘出了这个词。

当我要记笔记时，他急促地说：“这儿不允许记录。”他说我可以第二天摘用，但这次采访仅为了让我理解，而且他想让我知道贝克的指控是多么的荒谬。凯西的语调和举动表明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我将被赶走。每当我提出一件事，他就会拿出一份文件支持他的特别立场。有一次，他拿出了一份六页的备忘录；另一次是一份五英寸厚的蓝色册子的文件，它是胡戈尔为竞选运动而写的。他把它交给我，我开始一翻而过。这一册是标准的锅炉钢板，新闻稿和支持里根的团体和个人名单。不过是铺张词藻。

凯西走过来并几乎是从我手里把胡戈尔的文件抢走的。他说，看，那里并没有秘密。好像怕它从我的大腿消失掉。

我指出我想多看一点，或者说或许是研究一下这个册子。

不行，凯西说。

因此当我们谈到胡戈尔时，我问他所写的备忘录是怎么回事？

凯西说联邦调查局已从1980年竞选的文件储存中拿走了胡戈尔的备忘录。

它说了些什么？

凯西耸了耸肩。他不知道，或不关心，或不想说。

但确实有那么个备忘录？

他点头承认，但没作补充，允许我保持沉默。他那强烈的身体运动几乎命令我们继续进行下去，但他仍笨拙地坐在那里很有节制。

托尼·多兰的备忘录如何？他曾是一位报社记者，凯西将他介绍进里根竞选班子。他现在是白宫演讲撰稿人。

凯西又一次耸了耸肩。他又扎进文件堆里，并给我看了一份多兰写的备忘录。它指出卡特政府有意滥用联邦工作人员，并提

到了一个政府部门的“情报员”。

我可以拿一份副件吗？

凯西有礼貌而有力地从我手里拿回了备忘录，它几乎与抢相似。“不可以拥有副件。”凯西说。

凯西现在很快地分发备忘录了，他又迅速拿出几份，补充说所有这一切都无它用，都是标准的竞选信息。“胡戈尔和多兰各有一份备忘录说有情报来源，但没有任何情报活动而且它什么也解决不了。”

你可以发誓作证吗？

他说，当然，很高兴那样。说着用手轻抚下巴，头仰起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浪费他的时间。“这是一口枯井。”他有一种很有效的方式来听完那些他认为不必回答的问题，他只是坐着，这些问题是一些小问题但其回答，任何回答都可能引他走上一条他不愿意走的，或一条给他带来麻烦、矛盾的路。他避免卷入任何理论游戏，即接受或拒绝可能有用的理论。

我试图重新回到已谈过的某些事。

凯西站起来说：“哟，我得开会去了。”然后他拿起桌上一堆绝密的文件并准备将它们放到文件包里，但那堆文件太高，他一时未拿稳它们散落在桌子上。几秒钟内他装满了文件包并把它关上了。我们一起向外走，他将文件包交给警卫。很明显凯西有一个约会已经晚了，我跟他一起走出门，边走边谈。当我离开他后，他几乎是跑出了大厅。他和警卫一起走进电梯，轻轻关上，他们走了。

联邦调查局和国会从没有对“卡特竞选辩论要点”的事件进行过真正的调查，“辩论门”事件消失了。在参议院戈德华特及凯西的老朋友威廉·奎恩将军看到这一事态未扩大而高兴并暗笑了几次。对他来说这并不是个谜，奎恩这位前情报官感到凯西确实干了那事，但他无法证实它。凯西作得如同任何优秀情报官一样

完全遵守规则。间谍的规则之一是保护好的情报员。常采用精心制作的牵制或假象来保护这类情报员。与情报员所承担的危险相比，撒谎算不了什么，甚至公开或宣誓情况下撒谎也无关紧要。或许没有什么能比情报员看到指挥官处于危险的境地甚至是公开的危险境地能使他更自信，或使他更多地感受到双方在共同承担危险。这一秘密情报员，假如有的话，如知道他的暴露会使其指挥官倒台，而这指挥官有时就是中央情报局长本人时，他会因此而在夜里睡得很香的。

十四

一天早晨托尼·莫特利与凯西一起驱车前往国会，他们将就尼加拉瓜行动作证。“这些混帐”，凯西称参议员们，他们的主意和陈述都是“废话”。莫特利对凯西在情报委员会面前的态度大吃一惊，因为他猜想会有一种对抗和肆无忌惮的气氛。已准备好了防御的每一块盾牌。莫特利看到参议员们的反应，他们离开时抱怨说他们不相信凯西这个杂种。

幸运的是没有任何有关马那瓜机场空袭的事，因此凯西、莫特利和克拉里奇能从容地讲述这场战争。有了新的总统指令，凯西认为到了进行经济战的时候了。在一次会议上，凯西对莫特利和克拉里奇说：“我们要使他们不安，要让这些杂种们不安。”

克拉里奇问道：“什么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什么比较重要？”

“是石油。”克拉里奇制订了一项袭击尼加拉瓜沿海的油库，但不用那些愚蠢的业余的反政府武装实施行动，而是由中央情报局协调和指挥行动。克拉里奇已雇佣了一些“单线控制的拉美人”，他们是专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拉美人，他们会令人更加感到该行动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干的。

凯西知道如何操纵白宫，按照已在国会通过的总统指令，作为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步骤，他将经济战计划呈交给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拉克。

10 月 11 日黎明前，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拉美特工人员乘坐一

队快艇对尼加拉瓜太平洋沿岸的科林多港的油库进行了袭击，估计储有尼加拉瓜大部分石油储备的五个储油库被炸毁，科林多的2万多居民因大火被迫疏散。

凯西非常高兴，这是个大行动，不是那些小规模的跨越边界的行动。他带着空中侦察得来的照片立即找里根，白宫助手们发现他像一个取得了好成绩的学生一样。

中央情报局内开始对行动的范围和强度产生疑问，有人指出这是战争行为。克拉里奇对这一切做了回答："这正是总统所需要的，他知道这些，而且这正是他喜欢的。"

三天后，这支快艇突击队又袭击了普尔托桑地诺，尼加拉瓜另一个主要港口。

莫特利请美国石油公司们估计一下损失。他要确定这一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美国的公司们报告说他们已要求尼加拉瓜在修复工作开始前预付资金。

凯西和克拉里奇非常高兴，尼加拉瓜人是出了名的拖款者，修复工作将会延长。

令人吃惊的是，一家石油公司立刻收到尼加拉瓜政府的10万美元现金支票并要求立即开始修复工作。

凯西和其它人更高兴了，这些袭击打到了痛处。

作为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境内的一条输油管道也遭破坏，而且埃克森公司的一个小组通知尼加拉瓜说它无法继续为尼加拉瓜石油运输提供油轮。

凯西还不满足。一天，负责拉美事务的国家情报官约翰·霍尔顿来到他的办公室，凯西问他："我们能再就经济干点什么会使这些杂种们不安呢？"

霍尔顿说："可干的不多！"

凯西说："虽然如此，我们应该干点什么，该死的，我们应该干点什么。"看中央情报局已避开了什么：全面经济战。下一步应

将桑地诺政权置于死地，他希望把他们赶下台。

霍尔顿提及《勃兰德修正案》。

凯西说，那只不过是国会的诽谤。

他将压力移至莫特利的工作小组上，要求他们提出新主意，并指示他们想一些大的行动。莫特利为了保密已将该小组换了好几个名字并尽可能限制小组人数。最近，它被称为“多机构有限小组”。莫特利、克拉里奇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奥利弗·诺思中校是小组的核心。诺思说白宫将赞同行动，而且如果舒尔茨或某些人好像要表示反对的话，诺思说：“让国务卿滚他妈的。”但是克拉里奇具有行动的经验，而不是诺思。莫特利拒绝了克拉里奇三个主意中的两个，但克拉里奇有无尽的创造力，很难对付，他并不总是很准确，但总是能将新东西加到一起。

在白宫危机指挥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克拉里奇建议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时对1904至1905年的俄日战争的研究中，他了解到水雷的效力。战争中俄国海军司令因其旗舰触雷沉没而死。克拉里奇提出一项野心不大的布雷计划。由于墨西哥和其它国家用船向尼加拉瓜运送石油，因而行动目的将是把他们吓跑，不必沉掉一艘船。伦敦的劳德公司将会取消对进入布雷港口船只的保险或将保险费用增加到足以阻拦船只进入布雷港口。

莫特利说，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水雷以造成危险的印象——“一个响屁”。

这一工作小组批准了一项使用低爆炸力水雷的计划，这种水雷被设计为只发出声音和闪光。莫特利拉着克拉里奇到其国务院六层上的办公室里，一连问了20个问题。“好的，杜威，再告诉我们它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克拉里奇手头有答案。

作为新情报指令常规逻辑的引申意义，凯西能再次将布雷封锁的计划呈交总统和克拉克。里根批准了这一计划。

舒尔茨未参加会议，因而莫特利后来通知了他，这位国务卿说，可以。

他们很快得知美国军火库中的水雷都是高爆炸力，用于炸沉船只的。因而中央情报局在加利福尼亚州选中了一个前马丁·马力塔的工厂，它可以自己制造“焰火式”的水雷，尽管有的水雷含有达300磅重的炸药，但爆炸并不大。中央情报局注册了一艘看上去像拖船的大型商船，其后甲板可停放两架直升飞机，它可以用为快艇和直升飞机的母舰布雷。这艘船将是国际水域中的一个行动的海岛，这将使他们花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凯西眼看着他在白宫最重要的盟友倒台了。比尔·克拉克是一个受攻击者，在白宫陷入激烈的内部斗争之中，常常夜深才回家并感到头痛。他几乎不同丹佛说话，他知道贝克和达尔曼有时是当面，但更主要是背后无休止地对他恶意攻击。

凯西想鼓励克拉克坚持到底，就在白宫坚持斗争。但10月13日总统任命克拉克接替詹姆斯·瓦特担任新的内政部长，瓦特因受到攻击而辞职，里根的这一决定震惊了华盛顿。凯西谈到克拉克时说：“比尔总是想要一个大农场，总统给了他美国最大的农场。”凯西也认为这些加利福尼亚人中有许多人不认真，“他们在周末要嗅一嗅加利福尼亚的空气，他们会无视你的愿望就登上你的直升飞机。”现在凯西与白宫办公厅的唯一渠道是通过米斯与多兰，米斯事务太乱而多兰又离事件中心太远。他开始游说让美驻联合国大使柯克帕特里克接替克拉克，他需要一位保守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如果贝克一丹佛—达尔曼派中一员担任此职，中央情报局将不太可能继续走自己的路。

几天后，当凯西正在参加一次有关中东问题的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时，克拉克开始向凯西传一个纸条，这是很罕见的。凯西看着它似乎它是一个去了引信的手榴弹。当凯西拿到纸条后，他

迷惑不解地打开它，上面说总统已决定利用克拉克的离任，重组白宫办公厅，贝克将担任新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达尔曼将任副助理，而丹佛将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正在准备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后，凯西同克拉克、米斯和温伯格一起要求紧急会见总统。克拉克和米斯说得时间最长，并且口气也是最强硬的，而温伯格和凯西充当支持者的角色，但他们一致告诉总统那些任命将给苏联人错误的信号。贝克是一个温和派，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达尔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尼克松的“总管”伊利尔特·理查杰的门徒。如果这些人担任上述职务，他们将无法与之一起工作。

凯西尤其对贝克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前景感到恐怖，他对总统说他将是“无法容忍的”，他说话时声音几乎在颤抖。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某些方面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向白宫报告的渠道。如果此人担任该职，那么今后两年半时间里通过政府各机构向全世界推行里根外交路线的所有努力都可能变得毫无价值。他再次建议由柯克帕特里克出任此职。

面对着手下四个重要人物已接近要以辞职相威胁的情况，里根总统指出他将过一段时间再作出最后决定。

贝克看到右翼联盟在反对他，他或许可以击败他们，但他们不会善罢干休。如要充当一个更显眼的政策制订者角色如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在每一件事上都将必须通过是否真正信仰“保守主义”的检验。贝克后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对里根建议说请他忘掉这个想法。

总统真诚地表示感谢，他说在即将来临的总统竞选中贝克继续担任办公厅主任或许更好些。

凯西继续为柯克帕特里克竞选，柯克帕特里克患重感冒正在家中休息，凯西到她在百塞斯达路的家中看她。这位联合国大使

正裹着一条毯子边吃感冒药边看《阿历克斯·托克韦勒》。看上去她好像将得到这一职位，如果得不到，凯西建议她在白宫取一职位，或许同米斯一样当一名高级顾问。保守派需要她在那里。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实用主义者将在数量上超过真正的保守派。

柯克帕特里克抱怨不公平的待遇。她与总统没有直接的联系，到处是有关她的流言。有一种流言暗示她将被解除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职务。

凯西告诉她不要理会那些流言，他是白宫流言受害者之首。

同时，两位主角和两派的领袖克拉克和贝克一致同意一位折中的候选人——巴德·麦克法兰，克拉克的副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号人物。总统批准了这一折中方案。

凯西认为已失去了一次在里根外交政策最前线安插一位表达能力很强的女发言人的机会。麦克法兰是属于那种迟钝而无所作为的人。他的履历表明他只能当一位参谋。他曾是海军陆战队中校其后未能再得到晋升。担任过两年基辛格的军事助手，另两年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职员。他的任命会使贝克变得更强，而且贝克愿意修改外交政策以适应国会。

10 月 17 日，里根宣布了对麦克法兰的任命并在其后八小时安抚柯克帕特里克，随后又宣布她将继续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一天前在黎巴嫩第六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被开枪打死，就此一位记者问里根为什么 1200 名海军陆战队维持和平部队仍留在贝鲁特。

里根以强有力的声音说："因为我认为它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极为重要。"

六天后，10 月 23 日，星期天，贝鲁特时间凌晨 6 时 22 分，一辆大型黄色梅塞德斯牌卡车冲进黎巴嫩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楼并爆炸了相当于 1.2 万磅的 TNT 炸药，炸死了 240 名海军陆战队员。

两年多以前，1982 年 7 月 23 日，已有报告警告说，在黎巴嫩

的维持和平部队将遇到“难以对付”的政治和军事麻烦。凯西发现自从上次爆炸事件（美国大使馆）以来的六个月时间里情报机构已发出约100次汽车炸弹的警告。更为糟糕的是，在使馆爆炸后，凯西派了一些中央情报局官员去贝鲁特进行调查，他们查出根子在叙利亚情报机构。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对嫌疑犯使用了电休克装置，以帮助取得供词，其中一名嫌疑犯死掉了。这名中央情报局官员被开除了，使得这一调查变得毫无用处。

如此之多的美国军人的死亡对政府来说既是国内政治上的也是感情上的悲剧。凯西请摩萨德和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进行调查。以色列有关恐怖主义情报的协调部门、秘密的40分部集中负责这一事件。

以色列情报部门多年来极为注意在叙利亚境内发展情报员。这些是最复杂、最危险的任务，用假身份操纵和欺骗别人——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常伪装为从黎巴嫩、其它阿拉伯国家和欧洲，不仅西欧也有东欧国家来的商人。有时以色列人伪装成苏联人。这些特工人员会花大笔的钱来收买情报。通过使用几名特工人员，比如说一名欧洲人，一名阿拉伯人甚至一名苏联人——他们被称为“连锁假身份”，可以创造出一种完整的假象。由于以色列人生存的危险性很大，这一行动和其花费是值得的，情报收获可能是非常显著的。

很快以色列向中央情报局传递了有关情报，他们查出神秘的贝鲁特勇士之死是伊朗和叙利亚干的。情报包括：

·一笔5万美元的款项被付给了神秘的黎巴嫩财务间谍哈桑·哈米兹；这笔款项是从伊朗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大使馆送出的。该大使馆常被称为“伊朗的国外中枢。”

·一位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中校被认为几天前参与了策划这一袭击，而且有一位头戴黑色头巾、身着棕色长袍的老人被跟踪至

大马士革的苏联——巴勒斯坦友好协会，爆炸三天前在该协会讨论了这一袭击，而这位老人是什叶派穆斯林民兵的重要人物锡克·默罕默德·侯赛因·法德勒拉。

总起来说，以色列人认为13个人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被炸有牵连，同一天法国在贝鲁特的军事指挥部也被炸，炸死58名军人。

凯西对这些证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行动处的行动专家们却并非如此，包括近东科科长查尔斯·科甘及迪克·赫尔姆，一位受人尊敬的高级行动官员。他们说，情报员可能是优秀的，但无法加以肯定。即使大量的描述——叙利亚情报机构，在大马士革的伊朗人，法德勒拉，是真的，这一事件仍不足以定论。赫尔姆断言："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指出，据说卷入这一行动的那些重要的叙利亚和伊朗官员们有行动的掩护手段——使用信使及受保护的外交邮袋进行联系。

在白宫，里根批准对黎巴嫩贝卡谷地实施一次报复性空袭，那里是恐怖分子的集结地。在最后一分钟他又撤销了这一行动，将其交给以色列和法国人，他们想轰炸几个可疑的恐怖主义训练设施，包括被称为霍梅尼医院的一个营地。以色列人确信一所清真寺被用来集结汽车炸弹；但他们认为这超出了轰炸范围，因此未轰炸这处圣地。

莫特利负责监督与30多个拉丁美洲国家——有印章和国旗的任何地方的关系，而在过去10天里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加勒比海一个面积只有133平方英里，人口11万；生产着占全世界消费量1/3豆蔻的小岛国。这个岛已变成总统的一个小绊脚石。它的领导人莫里斯·比肖普，一个年轻、有魅力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该岛建一条9000英尺长的跑道，古巴正在帮助建设，而苏联人已获准使用该跑道。

里根曾公开指责："苏联——古巴正在使格林纳达军事化，"并公布了一张机密的空中照片，上面显示了一个古巴军营及简易机场的建设。他的政府害怕在西半球形成一个红三角，古巴在北、尼加拉瓜在西而格林纳达在东离南美大陆仅 90 英里的地方。

当一组美国断定与古巴联系更为密切的极端分子发动政变后，莫特利警觉起来。10 月 19 日，比肖普被处决。新的左翼分子实行了一日 24 小时宵禁，并将整个国家实际上置于不准离家的软禁状态。莫特利召集了国务院危机小组开会，它目前最担心的是在格林纳达的 1000 名美国公民，大部分是住在格林纳达的学生。国务院对他们进行了接触，但没有人称他们代表政府，没有人似乎愿意说他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没有政府就没有外交。莫特利开始与英国和加拿大接触，讨论可能的联合行动以撤离彼此所有的公民。与该岛进行外交接触的进一步努力遭到挫败，中央情报局在该岛也没有真正的情报员。由于美国政府不知道任何情况，官员们开始作最坏的打算。

康斯坦丁·门杰斯花了几个月时间才离开中央情报局并于两周前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拉丁美洲地区的事务，他很不高兴。他曾在克拉克手下任过职，他认为克拉克是一个总统意愿的有见识的贯彻者；现在他又在麦克法兰手下服务，他认为麦克法兰不是里根的信徒，并缺乏精神上的勇气来担任一位真正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他上任最初几天，门杰斯就抓住格林纳达危机，起草了一份保护那里的美国公民的简短计划。麦克法兰带有怀疑地看了这一计划，但他同意予以考虑。

门杰斯与在国防部的一些持强硬路线的朋友共同讨论了这一计划。一位官员告诉他要小心，麦克法兰会以此为借口赶走他。门杰斯给诺思中校看了这一计划，诺思表示怀疑：已有多次犹豫不决，国务院会赞成谈判。门杰斯也向凯西提过该计划，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只是说它听起来很感兴趣。

门杰斯确信苏联人有意使用格林纳达，包括它的深水港口和新的跑道，以作为载有核导弹的苏联潜艇或飞机的前进集结地。

麦克法兰同意召开政府最机密的危机处理会议，即被称为“危机预报计划小组”会议，讨论格林纳达问题。当晚6时30分左右，门杰斯使用保密电话与凯西进行了交谈，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很快将出国视察。门杰斯要说明已向麦克法兰呈交了这一计划，他已同意召开危机预报计划小组会议。就反响来说，门杰斯认为麦克法兰行动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更别说将此计划提交总统了，但门杰斯未向凯西提及此事。

第二天，10月24日，麦克法兰的副手，海军中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主持了危机预报计划小组会议，与会者除波因德克斯特外，还有莫特利、门杰斯、诺思、克拉里奇以及国防部重要官员。为了减少人们的注意，该小组在行政办公大楼的208房间开会，这是应用最新高技术的指挥中心，包括最先进的计算机，视听两用的安全通讯系统。

情报显示古巴的一艘运输船正停泊在该小岛的港内，门杰斯指出卡斯特罗已拥有30万人的军队并可以不引起注意地空运几千人。他建议“进一出营救”。既然有了这一机会，他说应把共产主义永远清除出该岛，并亦永远地恢复民主。他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即干得不够的话将会把该岛留给了共产党人并使之成为一个核武器基地。

下午6时，布什副总统主持召开了特别局势小组会议，这是里根政府最高级的危机处理小组。

由于害怕左翼政府将美国人作为人质导致伊朗幽灵重现，会议既讨论了“武力撤退”，也讨论了“外科手术式的袭击”。

麦克法兰想将原定赴黎巴嫩的海军纵队转道加勒比海，这支小舰队由21艘军舰组成，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这一步骤只是为了一旦需要时可以用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在没有总

统命令的情况下采取上述行动，麦克法兰说那种认为他必须有总统的命令方能使一个航母编队改变方向的想法简直是疯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坚持己见。

麦克法兰起草了一项命令，里根总统签署了这项命令，海军纵队继续前往加勒比海。

维西将军开始反对军事行动，但当美国可能不得不从该岛数处营救其公民已变得明显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夺取全岛是必需的。门杰斯与达尔曼一起说明了全面恢复民主的理由。他希望与吉姆·贝克缓和关系。从其在两年中央情报局的生涯中，门杰斯想好了辩论的理由随时可用：在70年代当卡斯特罗派遣成千的军队前往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及埃塞俄比亚，进行侵略时，未能加以阻止。自从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以来，很明显这个半球成了目标，数以千计的古巴顾问被用来支撑桑地诺政权。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个岛很小，是一次容易操纵的行动。

凯西和舒尔茨也看到了这一机遇。格林纳达没有提供美国与其它加勒比小岛国能够签订双边安全条约的难得的机会。

“嗨”，凯西有一次说，“让它滚开，让我们把这些杂种倒掉。”

舒尔茨开始倾心于一项不那么野心勃勃的计划，但他倾向于准备可能条件下的军事行动。此事得到了里根的其他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们的赞同。

不过，政府需要有更可靠的基础使此次行动更具合法性。9000英尺的跑道，对1000名美国人生命的担忧，如果政府不出面，就难以解释一场全面入侵。总统的顾问们不想被迫承认政府决定违反国际法。

第二天，即10月21日，星期五，解决的方法出台了。加勒比小岛国多米尼加的首相尤吉尼亚·查尔斯带头成立了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当天他们在巴巴多斯召开会议，开会时他们得到美国来的消息说如果他们请求的话，美国对格林纳达采取军事行动的

可能性将增加。东加勒比国家组织决定提出请求，请求美国帮助恢复格林纳达的秩序及民主。口头请求转至白宫，白宫答复要求东加勒比国家组织提出正式的要求干预书面请求。

查尔斯夫人是一位 64 岁的明显亲美的领导人，莫德雷感觉她使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看上去像一只小猫。门吉斯认为她是加勒比的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夫人。1982 年，美国已开始提供资金帮助多米尼加建设一条长 30 英里耗资 1000 万美元的公路。

中央情报局记录里显示某一次给予她的政府 10 万美元用于一次秘密支持行动。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10 万美元起到了辅助作用。一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关键人物认为这是一个代价。查尔斯夫人断然否认任何直接给予她的政府、她的政党或她本人的赠款。她说她之所以决定请求美国出面干预只是基于她及这一组织的其它成员国安提瓜、圣·卢西亚及圣·文森特的领导人的判断。

当晚，门吉斯及诺思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草拟了一份保证国家安全的由总统签署的入侵命令。当这份议案送达里根，舒尔茨及麦克法兰时，他们正在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度周末打高尔夫球。里根当时并未签署。

门吉斯敦促国家安全委员会准备对付苏联人的对抗行动。他说苏联可能会促使利比亚人发动一场恐怖主义的袭击，入侵柏林或朝鲜。在用保密电话与蒙特利通话时他认为这次行动会使苏里南停止向古巴靠拢。

10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 9 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在华盛顿，布什、波因德克斯特、麦克马洪、莫德雷、门吉斯及诺思聚集在 208 房间，通过联接乔治安全话筒，总统舒尔茨及麦克法兰也参加了会议。到 11 点 30 分，意见才完全一致。

第二天，即 1 月 23 日，贝鲁特海军陆战队被炸的当天，查尔斯夫人的首脑会议传递了要求干预的八点书面请求。海军陆战队

官兵之死对里根个人是个打击，他更清醒地意识到作为总司令的作用。自越南战争以来，还未损失过如此多的官兵。他说出了感受即一股邪恶的力量在行动——黎巴嫩的恐怖主义分子，格林纳达的共产党人。同一天他签署了入侵格林纳达的正式命令。

凯西有一位官员，她是行动部仅有的几位女性之一。几周前她在严密保护下前去格林纳达侦察。入侵前她再次前往收集情报。这将是自 1965 年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来两半球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干预。美国四个军种均参战，各担负一部分行动。

命令签署的第二天，查尔斯夫人由一架美国政府飞机秘密运往华盛顿。

诺思害怕贝鲁特爆炸事件会吸引所有的注意力并导致取消这次行动，他当晚在办公室过了一夜。

10 月 25 日清晨，美国武装部队及其他请求干预的加勒比国家的数百名士兵一起开始行动并登陆。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在岛上他们可用的地图与加油站图差不多。情报并未有防空武器。三架美国直升飞机被击落。美军共计 19 人丧生，115 人受伤。

当天上午 7 点 30 分，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里较平常更早地燃着炉火。里根、舒尔茨、麦克法兰及门吉斯吸啜着果汁及咖啡与查尔斯首相会谈了半个小时。总统要求她与他共同出席上午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她同意了。门吉斯带她去会客厅。在那里他解释说美国新闻界可能是敌意性的，不支持及找麻烦。他帮她拟出了对付怀疑观点较理想的回答。

新闻发布会前几分钟，国务院删去了总统声明中作为入侵理由的“恢复民主”几个字。门吉斯辩论说，删去这几个字似乎表明美国政府需要在岛国建立右翼政府。于是，这几个字又被重新补上了。

上午 9 时 07 分，总统出现在新闻室宣布入侵行动。

“今天上午早些时候，六个加勒比民主国家及美国开始了一次

登陆行动。”总统说。他给出这次行动的第一条原因是：“应加勒比国家组织的正式紧急请求。”组织主席是查尔斯夫人。里根介绍了她。坐在里根身边的查尔斯夫人说：“这不是一次侵略，这是为了防止这类东西（马克思主义）播散到这些岛国。”

她在白宫的有说服力的出现及一系列其它采访和讲演使她似乎成了白宫的公共关系官员。后来里根看了他与查尔斯夫人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录像。总统说：“噢，她真伟大！”

门吉斯发现诺思不仅是格林纳达事件的关键人物，而且是所有支持武装抵抗者行动的先锋官，包括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严格，实际上除麦克法兰及波因德克斯特外无人卷入。有关此事件的备忘录及文件分发极少。做为拉美分支的头目，门吉斯亦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诺思令人难以置信地每周工作 85 至 90 小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它官员通常工作的时间为 60 至 75 小时。有一天，门吉斯说，“奥利，你有四个可爱的孩子，现在又不是战争时期，你为何不花些时间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呢？”

诺思答道：“说得对，下周吧。”

10 月 27 日，星期四晚——贝鲁特爆炸第四天即格林纳达行动两天后，凯西同意与我共进晚餐。我曾请他来我家，但他说他更希望我去他家。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室告知我在下午 6 时 30 分到达，并给了我住址，他的住宅也坐落于华盛顿西北部福克斯尔大街由古老的纳尔逊洛克菲勒住宅区分出的漂亮的新开发区内。里根当晚将在电视上向全国发表关于黎巴嫩及格林纳达的讲话。

大约日落时，我抵达凯西的棕褐色砖砌住宅，给我开门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身着黑色服装、毫无表情的年轻警卫。凯西很快来到小门厅，他表示了欢迎，带我走过另一半通道内，他说晚

餐前去喝点酒。我们经过了3间装饰漂亮的卧室，它显得富有又雅致，但并不过分——椅子和沙发上铺着漂亮的编织品，到处是东方地毯和东方艺术品。我们在大约第三或第四间停下来，这是间书房。他调了两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我们房间边上的椅子里坐下。凯西静静地坐着，他的手小心平稳地端着酒杯。

"回想60年代左右杜勒斯任局长，"他说，"迪克·海尔姆斯任副局长、行动部副主任或其它职位，当时都担心人们会因低薪而离开中央情报局。海尔姆斯出面请我来中央情报局。"当时中央情报局正建立一个私人基金会去贷款帮助雇员或职员上学及处理其它事。凯西说到此补充说他为基金会贡献了些力量。"那时有许多人离开，"他解释说，"我问海尔姆斯他为什么不愿离开，他说：'当你坐在这里看到这些，看到俄国人所做的一切，你会感到——'"他停顿一下说，"'你会感到被围攻。因此，你不能离开。'"他把水晶玻璃杯的冰块搅得格格作响。他本不必使用"被围攻"这个词，但感觉是对的。他点了点头。

"对乔治·凯南的观点怎么看？他认为我们不理解俄国人，且有些傻瓜想要战争。将来会证明我们相互误解了吗？"

"噢，是的，"他说，他很了解俄国人。"里根上任前他们已经取得七至八个国家。""格林纳达"，他强调说，"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的唯一失败。"智利的阿连德在1973年被推翻除外。他没有提及埃及。

看，凯西说，格林纳达是我们第一次深入了解一个共产党政权，第一次将其逐出。即使在这统治的早期亦看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设备比预想的要复杂，机密文件都没有陷井，得到之前需先去掉它们的保管。他的眼里闪现出文件保管员们，他们正在收集大量文件，他说，文件将会说明缘由。

起初我们想大约有600名古巴人在岛上，凯西接着说。古巴人说约有700名，但我们现在所得到的部队报告说可能有1000

人。在格林纳达的古巴人是工程人员，但像美国的修建大队成员一样，也是士兵。古巴工人床边有特制的挂钩柱的 AK—47 自动步枪。我们发现了“恐怖分子专用的通讯设备。”

他说，你已能看出来龙去脉了。1000 名古巴人是格林纳达 10 万人口的 1%。相应的美国人口的 1%为 200 多万。我们能容忍一支同样规模的外国军队或即便是工程兵在这里吗？

凯西说，岛上有一处古巴训练设施。三个俄国外交官打着白旗走出他们的大使馆，共 49 名俄国人。另外还有大约 20 名北朝鲜外交官，包括一名高级军官。还有些东德人。他们现都在苏联大使馆。如此之多的人都是苏联应该或想扶持一个代理人或卫星国的标准。岛上还有一些克格勃人员。

苏联正在重演这 1979 年在阿富汗所为，当他们不满意时就干掉他并换人。苏联已派出“暗杀队”，已经杀害了莫里斯主教，他补充说这是注重事实的。停顿一下后，他点了下头，似乎在肯定这一点，然后忽然站起来建议上楼进晚餐。

餐厅里设了 3 个座位。进来一位装扮入时的 30 岁左右的妇女，“这是我的女儿，伯纳戴特。”凯西说。伯纳戴特很引人注目，她是纽约市的商业演员，很都市化，头发及装饰无可挑剔。

凯西解释说他的妻子索菲娅正在佛罗里达监督他们房子的清理工作，因为有些小孩闯入他们的车库引起火灾。

伯纳戴特做了羊排。这是简单而愉快的一餐，没有什么奇特的。凯西吃起来很贪婪，一开始嘴里就填满了食物，特别是羊排。看着伯纳戴特，我想有几次她的微笑证实了这一点。但她总是用她的大眼睛让我收回目光，好像我分了神似的。

凯西接着说，格林纳达，是一件发生于一个周末的事，一个最终将事物扳回我们轨道的机会。新领导人都年轻并且除本国外不代表任何国家。

退一步说，档案并不是真正的发现，凯西说，但它们是入侵

的重要副产品。他说，中央情报局已派了5名审问官去格林纳达与古巴人交谈。我们已经得知古巴人将战斗得比预料的要激烈。在格林纳达，他们有将军，上校和中校。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可能要等六个月，但它终将会建成的。

伯纳戴特没有参加谈话。凯西说应把格林纳达放在整个加勒比地区来看。在这个地区苏联一年就耗资40亿美元——30亿给古巴，10亿给其它地方。对苏联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了。他们在古巴有6000至7000人的军队。因而古巴可以而且已经派出同样数目的人去尼加拉瓜。现在我们知道在格林纳达的古巴人比想象的要多。因而，苏联—古巴，凯西停顿一下，斟酌措词，在尼加拉瓜的卷入可能被低估了。例如，派到尼加拉瓜的古巴人被要求剃去"卡斯特罗胡子"，烧掉古巴制服，分散进入尼加拉瓜正规军。我们相信现在各个尼加拉瓜兵营都有古巴人。因此共约有12000名苏联和古巴人分散在拉丁美洲。与此相对的美国在萨尔瓦多只花费4亿美元派有约100名顾问。这种不平衡必须得到纠正。

40亿美元的数字，从何而来？

"它是宣传性的。"凯西说。"他不能替它担保。"他又补充说40亿美元是政府圈子里使用和相信的。

他刚读完一本回忆录《得分》，它描写了1965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入侵，并发现那次干预的理由与格林纳达有点相同——即挫败共产主义者们，保护美国人。格林纳达入侵是重要的，因为这一步纠正了地区的不均衡，并将给苏联和古巴人一个信息。

"那就是说我们可能袭击尼加拉瓜。"他说，并有力地强调"袭击"这个词。

同时，苏联将变得谨慎些，也正在谨慎些。他们在西半球的主要目的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战场，中东引开。他说的这些似乎很明显。战略利益及油田使它成为注意的焦点。

吃过晚餐及点心后，凯西玩着银器。伯纳戴特清理桌子后，端

来了咖啡。

凯西站起来建议我们去看即将开始的总统演说。

加勒比是赛场，而真正的比赛是中东，这似乎是凯西真正的估价。

我们走回书房，放两把椅子坐在电视机前，还要等几分钟，我问起了阿富汗情况，战争进行得怎样？我未提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支持。

凯西皱了皱眉。他说，苏联将压倒并消耗抵抗力量。

南朝鲜客机事件怎么看？即南朝鲜航空公司 007 号客机 2 月前被苏联击落，269 名客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总统称之为野蛮行动，并声明在道义上向苏联宣战。

凯西的回答毫不夸张。这看起来似乎是苏联人犯的一个错误，他们并未看侵犯领空的飞机类别。他似乎对与总统意见不一而泰然自若。

他眼睛几乎眨了一下说："是搞错了。"并耸耸肩，显得很自信。

总统出现在屏幕上，坐在椭圆形办公室他的书桌后，凯西开大了声音。

里根首先提到了南朝鲜客机击落事件——他称之为"野蛮的屠杀"。

凯西没有退缩，当里根说明海军陆战队被轰炸及格林纳达被入侵时，他的目光充满了敬意。

当总统提到美军入侵前一天早晨时岛上情况只掌握很少的情报时，局长略一退缩了。

不必担心，里根说，军队计划和实施了一次"辉煌的行动"。有些伤亡，数目很小，但他未提到数字。但古巴人和武器已表明格林纳达已是苏联和古巴的殖民地，被建成一个输出恐怖和颠覆民主政权的重要军事堡垒。我们去的恰是时候。

尽管里根措词比我已听过的更有说服力和启示性，凯西毫无反应。凯西没有说咱美国去的恰是时候。

里根说："黎巴嫩和格林纳达尽管隔洋相望但两个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莫斯科不仅支持和鼓励两国的暴力行为，而且通过代理人及恐怖分子网络提供直接的支持。

"现在，"总统用他那最诚实的声音说，"我可以和你们分享我认为你们乐于知道的事情吗？这事发生在我们海军陆战队司令凯利将军看望重伤的海军陆战队员时。有一位陆战队员，"里根引用凯利的话说，"身体上有许多管子进出……他看不清东西。他伸出手摸着我的四颗星，确定我就是所介绍的本人时，他抓紧我的手……，我们给他手里放一个本子，他写道：'永远忠诚'。"

里根解释说永远忠诚是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

凯利将军被誉为非常老练的将军和坚强的陆战队员，但当他看到这几个字时他哭了，谁又能责怪他呢？

凯西全神贯注地听着。

里根的演讲结束了，他提及荣誉、理想、国家、牺牲、上帝、祈祷及自由。27 分钟的演讲很动人，甚至很有煽动性。

"你知道那是谁写的吗？"凯西问。

"是你吗？"我问道。

"罗纳德·里根，"凯西纠正说，"他最伟大的才能是做一位作家，我想这是他所做的最好的演讲。"凯西明确地说，毫不掩饰他的仰慕，"你知道他的精力从何而来吗？"

毫无疑问，这是篇有力而出色的演讲，使人很难在短时间内忘记海军陆战队员抚摸司令的四颗星的情形或"永远忠诚"的含义。但事实如何呢？苏联、古巴、恐怖分子被混为一谈，总统似乎是说，海军陆战队的出面及入侵，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答案。

"我从未见过任何人讲得如此之快，讲话如此之多而不结巴。"凯西说。

他陪我走到门口，说他明天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

其它事情呢？

他说两天后他将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威斯特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讲。37 年前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温斯顿·邱吉尔曾在那里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他递给我一份 18 页的复印件，里面有些他用铅笔作的标记。

还有什么事正在发生吗？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似乎是说该到我离开的时间了。

伯纳戴特走来道晚安。几年后的一个晚上凯西自豪地告诉我阿特·布克瓦尔德所发表的有关介绍伯纳戴特文章已成为非常幽默的笑话。

那是 1956 年，他带她参加旧金山举行的官样文章式的“艾克和迪克”共和党大会，她当时 13 岁，是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孩子们的头。布克瓦尔德引用伯纳戴特的话说：“我们巡回劝人们加入共和党……我们说它是最好的党。”

“若人们问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你怎么办？”布克瓦尔德问道。

“因为我爸爸这么说，这就是原因。”

当晚晚些时候，当我在打写一份有关晚餐及讨论的详细回忆时，我想总体来看似乎凯西处于总统的“俄国人来了”的言辞及记者的怀疑态度之间，很明显，他赞同总统的演讲，有关世界的看法及其表现，但他似乎并不感到振奋。

凯西自己的讲话中含有一些线索，凯西曾经写道：“如果邱吉尔看到今日的世界和苏联力量增长及权力扩大，他会多么地惊恐呢？他列举了五个地区：越南、阿富汗、非洲之角（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部非洲（安哥拉，《克拉克修正案》禁止美国提供秘密援助）及加勒比和中美洲。

关于黎巴嫩和格林纳达，讲话谈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除新闻媒介报道的以外，不能透露任何细节，就像一个好记者一样，我准备即使坐牢，也要保护我的消息来源。”

邱吉尔会对格林纳达感到满意的。凯西把它同30年代法西斯威胁联系在一起。“看到西方第一次将苏联帝国的一个殖民地被剥夺的自由归还给它，他会非常高兴。”

“苏联帝国”——不是“邪恶的帝国”这个八个月前总统在佛罗里达使用的有争议的短语。

格林纳达提供了苏联如何通过代理人扩展其帝国的生动画面……它是尼加拉瓜的缩影。

为向苏联的代理人进行战略挑战，他说：“美国需要切实可行的对策。”这种对策应包括认识到在未来几年内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将是美苏的主要战场。

他清楚地知道他想说什么，在演稿中习惯加注什么或重点标明什么。他的同事常开他的玩笑，其中一个说道：“比做黎巴嫩总统更糟的唯一事情是做你的演讲撰稿人。”

这一周末前，五角大楼公开宣布在格林纳达有大约1100名古巴人，仅俘虏了约600人，其余数百人在山里。凯西想要一个迅速而彻底的报告，多少古巴人在山里？格林纳达是否如总统所说“正在被建成一个输出恐怖的主要军事堡垒”？

10月30日，星期日清晨，各个部门的分析专家们聚会在五角大楼，当日晚间他们完成一份约10页的秘密报告，立即付印和传阅。

凯西星期一收到复印件，它断然反驳了总统、凯西本人及五角大楼的公开声明。报告中说，山中没有古巴人——所有的古巴人不是被6000人的美国军队杀掉就是被俘。早期的过高估计出自于对第一个古巴俘虏的审讯及美国军队经验不足而对敌手的夸大。其次，报告提到格林纳达储藏的武器装备是其军队和民兵使

用的，不足以或想用于推翻邻近岛国政府。最后，古巴工程人员不是伪装的战斗部队，尽管他们有些武器，进行过训练并参加过战斗。

凯西认为这份报告是“不可想象的”。但由于它是秘密的，因而从未公开发布。

许多政府的保守人士对这份报告大发雷霆。凯西的助手，赫伯·迈尔说：“我认为它令人讨厌。”康斯坦丁·门吉斯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建议政府设法使卡斯特罗通过广播敦促他在格林纳达的军队投降，但现在看并没有古巴军队。作为供选择方案，门吉斯建议被俘的古巴人不应释放，他极力主张古巴人应遭受痛苦。“我们已经胜利了。”托尼·莫德雷回答，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古巴人被释放了。

格林纳达事件在政府经验中被做为正面的象征。它常被引为一个新强硬路线的标志，再次肯定门罗主义，大棒及炮舰外交——反共产主义，一度被埋没以至出现伊朗幽灵。这些人物是那些从格林纳达返回的美国学生下机后亲吻美国国土，或富于挑战性的查尔斯首相坐在里根身边公开赞扬美国是加勒比民主的救星。

入侵几天后，尼加拉瓜内政部长鲍尔治召见美驻尼大使，他说，任何时候美国需要或想迁移美国人离开尼加拉瓜，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他许诺说，我们将全力帮助，不会有任何问题。

兰利、凯西接到报告后很高兴，桑地诺陆线显然想到了忧虑。

后来，当托尼·莫特雷在尼加拉瓜与丹尼尔·奥尔特加会见时，他提出了格林纳达莫里斯主教之死。莫特雷说：“左翼领导人在左翼分子中间并不安全，你并不希望成为尼加拉瓜的莫里斯主教，被杀死后放在箱子里。”

每当莫特雷收到多米尼加首相奥吉尼娅·查尔斯夫人的电话时，他会拿着电话说他手里有支铅笔准备就她的要求协商。当他

具体管理着 30 英里长、1000 万美元的道路时，他感到自己好像是地区长官与公共事务官员之间的混合物。最后，美国增加了 200 万美元给多米尼加办学使用，还有 15 万美元用作岛上河流渡口的自身建设。

凯西确信有必要在加勒比地区宣传上作更多的努力。在一份高度机密的报告中他建议花费约 700 万美元在加勒比设立扬声器——传统的拉丁美洲政治工具，及其它中央情报局的宣传工作。里根对之很感兴趣，立即批准了这项计划。

格林纳达的政治前景未卜，岛上唯一的政治组织是主教的左翼“新珠宝运动”的残余。凯西及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坚决认为军事力量所获胜利不应丢在投票箱上。最后，在另一份总统决定中，从中央情报局政治活动资金中分出 67.5 万美元用来即将到来的格林纳达选举进行教育及整理选票工作。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派了民主测验者指导测验并分析所得数据以确保强有力的亲美领导人当选。入侵 13 个月后，美国支持的由格林纳达老牌政治家赫伯特·布莱兹领导的联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当首相的最初行动之一是请求里根总统让 250 名美国军队继续留在格岛。

十五

苏联袭击南朝鲜001号班机（269人丧生）、贝鲁特海军陆战队爆炸事件（241名美国人丧生）及格林纳达入侵（19名美国士兵丧生）帮助创造了一种气氛，它协助凯西最后一搏赢得了援助尼加拉瓜行动的2400万美元。世界充满了危险，很难有人现在主张应逐渐后退，凯西能够说明美国的腰板应该硬起来。对于反对者来说，也有些有利方面。传阅的一份新的国家情报断定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不可能推翻桑地诺政权；军事或政治上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这提示尼加拉瓜行动较批评者们所认为的还要无望。一份高度机密的白宫最后草案摘要第一次说出总统正在寻求对尼反政府武装的大赦，这是最终政治解决的暗示。

在通过了2400万美元援助的参议院及投票否决了这项援助计划的众议院之间的会议上，参议院掌握了进攻的武器。参议院代表辩解说，新法案的通过不必更改《勃兰德修正案》政权，因为新法案的目的清楚表明并不是推翻桑地诺政权。

勃兰德赢得了一个主要让步：一项协议规定2400万美元为最高限额。这笔钱要维持到下一年年底，若追加政府需重新申请。

1983年12月9日，里根总统批准了这项法案，凯西胜了。他现在将注意力转移到计划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他要克拉里奇定期报告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及水雷是否检验过。要保密！这位局长命令道。

从月底开始便是凯西任局长的第三年了，很明显有关尼加拉瓜行动国会和新闻媒介的没完没了的辩论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有益的。如同凯西所喜爱的高尔夫球一样，搞情报就是一场不断重新开始的比赛。在打了一个坏球或跳球后，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点。凯西认为，首先，尼加拉瓜行动坚定了政府的决心；第二，它等于是坚决反共的明确政治声明；第三，它吸引了国会和新闻媒介的注意力。当初肯定是无意的，但某种程度上它掩护了其它重要情报收集工作及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

从凯西上任伊始，他就大力推进人工情报工作——敦促行动部主任进行渗透活动。他需要情报员，需要越来越多的情报员。当有报告提到关于某个有前途的年轻政治领导人或精明的部长时，他会在报告的空白处写道："我们能招募吗？"或只写上："招募？"并签上标记"C"。招募这种人代价很大，有危险性并很费时间。麦克马洪和行动部主任曾提醒他"不现实的时间表"，——据说苏联已花费几十年培养及扶植他们的情报员。但凯西的鼓励及耐心得到了报酬。

12 月初，当凯西获得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 2400 万美元时，苏丹总统尼迈里访问了华盛顿并与利比亚反对派进行了非常秘密的会谈。利比亚反对派领导人默罕默德·尤素福·马格利夫曾任卡扎菲的审计局长，1979 年逃到埃及。在那里他谴责卡扎菲是滥用利比亚石油收入的腐败的暴君。马格利夫建立了利比亚救国阵线，目标是暗杀卡扎菲，推翻其专制统治。

1983 年 10 月 5 日，行动部主任送交了一个秘密情报员关于尼迈里一马格利夫会谈的全面报告。报告显示卡扎菲将遇到更多麻烦。这个消息来源被行动部主任称为"支线"——他是苏丹的高级官员，他清楚这些消息将会传递给美国政府。换句话说，这是一位政府机关的高级人员，付酬或自愿成为情报员。这位情报

员传递情报前尼迈里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凯西虽然同意为保护情报员而在广泛传阅报告中采用速记，但他常问：“这是谁呢?”行动部主任会告诉了他并提供了一份文件。

众所周知尼迈里蔑视卡扎菲，普遍怀疑他支持反卡扎菲的国外反对派。但情报员的秘密报告说会谈中尼迈里许诺“他将在训练设施、武器、弹药、持苏丹护照和其它文件旅行方面增加援助，”护照和文件是反卡扎菲力量在利比亚活动时最关键的最有用的掩护。

尼迈里告诉马格利夫博士，他有全权指挥任何形式的反利比亚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在未正式宣战时，这是一个国家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允许它的领土成为向对方军事袭击的活动场所。尼迈里还说流亡运动应继续通过他的情报组织，苏丹安全局进行工作——如有问题应直接与他接触。

据报告说，马格利夫博士说他相信只有苏丹和美国是他的朋友。他说经一个阶段训练后，他希望对利比亚发动一场运动，这将使他的组织更为可信。

报告包括情报员的注释，即“马格利夫没有说明他打算开展何种形式的运动，但其含义可能是某种方式的军事行动，可能在利比亚内部。”

马格利夫说，令人极为担忧的是利比亚人“已参加摩洛哥安全机构……对他或他的组织，那里已不再是安全的了。”

在利比亚内部出现大规模反卡扎菲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凯西很有吸引力，那将表明马格利夫和他的阵线有些力量。在这发生之前凯西将不可能获得总统拨款支持反卡扎菲运动。卡扎菲地位很牢固。——他拥有数十亿计的苏制军事装备，残酷地追捕国内外的反对分子。

同时，凯西继续集中力量收集有关卡扎菲及利比亚的情报，因为在他看来那是对整个北非及中东稳定的威胁。已完成的情报报

告中有关卡扎菲及利比亚的比几乎任何地方的都要多，中央情报局开会次数及对卡扎菲的注意力已超出了利比亚本身的重要地位，有时对利比亚的关心比对苏联还要多。许多收集情报设施分管卡扎菲，努力跟踪他，拍摄他活动的照片，破译他的通讯密码，窃听他的电话及其它对话。在的黎波里没有大使馆使这些做起来非常困难，但凯西坚持这样做，并常问："那个该死的卡扎菲这一周在干什么？"

对凯西局长来说，最重要的计划莫过于在苏联内部招募及发展情报人员。三年前恰在凯西上任前比尔·科尔比就极力主张这么做，其他人也反复说明这种必要性。凯西的本性推动了这一过程。中国和苏联是强硬的目标，而苏联更硬，更难渗入。在苏联，即使最简单的情报员间的私人接触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几乎没有任何不被监视的东西存在——没有不被窃听的电话；没有不被监督的会议；没有不受控制的旅行，更没有真正安全的房屋或地点，即使是在美国大使馆内也是如此。

凯西知道由于这些限制，有可能获取更多情报后仍不能回答大问题，例如苏联的真实意图。这不仅仅是一个收集情报的问题，盖茨，现中央情报局分析系统的首脑，以及其他人都说服凯西相信苏联同时很难知道美国的意图。或许有一个克格勃分析专家正被流放西伯利亚，因为他未能预见1976年一个种花生的农场主会把一位在职总统赶下台；而另一位克格勃人员也在遭受同样命运，因其未能预见到农场主会被好莱坞演员赶下台并导致一场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军备竞赛。

改进情报员计划的基础工作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了，当时有一个和为"目标管理"的计划，详细说明了改进的要求。其一为每个行动部官员需招募一名情报员，这人常被行动部官员称为"墙皮"，这个皮的归属是有争议的，因为在国外招募常取决于运气。

一个以大使馆官员身份作掩护的行动部官员在正式摊牌前可能要花多年在东道国培养一名官员或军官。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特点要求这个行动部官员自己不做最后摊牌以保护自己。因而他可能会将有希望的招募对象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中央情报局官员。若此人拒绝招募，第一位行动部官员可否认一切并表示震惊和不满；若此人接受招募，这张皮将属于第二个出力最小的中央情报局官员。

凯西觉得招募工作在特纳任期内未得到足够重视，尽管有些肯定的成功，但在行动部有个总的印象是特纳接受了在苏联境内招募人员的阻力。凯西把重点放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上，例如，利用苏联人出国旅行的机会，可以在苏联之外进行接触。凯西确信这些苏联人憎恶其政府及其制度。在他看来，提供为美国工作的机会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恩惠。

苏联内部一个最机密的情报员A·G·托卡契夫，他是在里根上任前招募的一个莫斯科航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托卡契夫在莫斯科通过极复杂关系与行动部官员联系以保证重要机密的正常传递。

也有一些主动投靠者，凯西发现对这些主动投靠者有些过于怀疑。虽然中央情报局应小心从事以防他们是骗子或双重间谍，但他觉得应该让人们知道中央情报局各站或各单位的大门是敞开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主动投靠者有其优点：他可很快进行工作，不必要数年的培育及预演，有时这些本身是间接的和很模糊的。尽管许多主动投靠者可能是无用或潜在的双重间谍，凯西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苏联或东方集团的官员想帮助西方是最自然的事情了。

凯西努力地推动着，一次又一次地对精锐的行动部苏联分部提出招募情报员问题，他清楚地表明他愿意碰运气。是的，他说，可能会有错误。他预计到了错误，他预计有些苏联人会感到愤怒。

“那又怎么样呢?”他说,“这证明我们是活跃的。”若没有错误,则说明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每条线索都应跟踪,当他们转移可望招募的苏联人和名字及文件时,所有暗示、线索、痕迹或直观的东西都会受到检查,这是与主要对手的长期、深入的比赛,凯西希望能赛好它,有进展。

另外与承担美国国内反间谍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的合作有了改善。中央情报局的情报站提出根据在国外表现可望成为被招募者的苏联人名单;如果这些苏联人——克格勃、外交官或其他身份的人被派往参加赴美贸易代表团或是大使馆,他们的名字及档案的复印件将被送给联邦调查局,相应地联邦调查局也会提供那些在美国服务过其后又去其它国家就职的苏联人的姓名,以便中央情报局工作站能发现踪迹。中央情报局认为联邦调查局在交换中得好处最多,因为美国的自然和心理条件最适合招募。联邦调查局通过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线索获得了几个重要的潜在被招募者。

在里根任期的最初一年,形势使凯西能利用铁幕的裂缝,特别是在东欧。中央情报局对波兰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但在其它国家,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旅行更频繁。由于东方及西方间的接触增多,所以能比较容易及不花代价地进行试探活动,以查出谁可能会叛变或被争取过来。

三年后,在苏联及东方集团内凯西已有了多于25名的定期情报员,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在他任内发展的。这些情报员分散在军队、克格勃和东方集团情报机构、科研领域或其它行业。

凯西特别对其中一位情报员而自豪。当那些在有权知道此人的美国官员们得知这位情报员的地位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凯西承认没有哪一个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能比得上苏联上校奥利格·潘可夫斯基。作为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潘可夫斯基在他被捕处决前的16个月里向中央情报局传递了数千页文件。他曾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提供了鉴定在古巴的苏联武器的决定

性材料。

凯西对苏联渗透的成功在白宫看来并不那么有意义，甚至还有些抱怨，特别是国家安全助理艾伦·克拉克及现在的麦克法兰，因为没有直接来自苏联政治局的情报。白宫需要对总统有用的政治情报，在那方面凯西并未送多少。最令白宫着迷的首先是能够帮助总统在谋略007号客机是个例外，但那是苏联人的失误，而不是中央情报局该预测到的计划。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决心扩展及保持和美国友好国家的情报员。这是危险的，但他想要给白宫全面、真实的世界形势就不得不这么做。

一个训练有素、可靠的、经受过考验的、可参加内阁或政府会议的情报员，常常比从电子窃听每一次内阁会议所得到的一摞逐字照抄的文件更有用。这样一个情报员可参加或靠近走廊谈话或决定参加这一圈子的日常生活——聚会、聊天。即使那些最亲近人的讨论、会议或电话谈话都可能说假话，而他能知道领导人的真心话。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员能透过现象、穿过烟幕，从普通中发现不平凡的东西，他是真正令人渴望的财富，一个24小时值班的警报系统。

在世界上政治最不稳定地区——亚洲、非洲、中东及拉美，领导人的恐惧提供了发展情报员的渠道。这些领导人主要担心国内外势力的颠覆活动——政变、恐怖主义甚至暗杀，这些政权几乎都需要保护，那意味着训练，专业指导及最现代化的装备。在提供保护上没有任何国家的装备能比得上美国，而美国政府内部在秘密帮助外国领导人方面没有比中央情报局更有经验的了。

中央情报局在海外对外国事务加以影响被看作是秘密行动并需得到总统正式批准。技术上说，一个中央情报局工作站的站长向外国领导人、情报首脑或其他人提供建议也超出了简单的情报收集，它也是“秘密行动”。

几年来秘密行动的特殊种类包括向国外提供安全协助及情报训练计划，这些计划不是策划更换政权，恰恰相反，是为了保住政权。在那些援助价值30万美元甚至超过100万美元的地区，中央情报局常派遣仅有三四人的工作队。这些分队由中央情报局国际特别分部指挥，得到了技术服务部及行动部的协助。它将负责进行训练和传递设备，训练对象往往是私人卫队或皇宫卫兵。其次，白宫需要帮助总统做好美国外交政策总设计师的情报；再次，需要那些可以提供针对苏联的机敏的外交和其它行动机会的秘密消息，但这可能需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还有些事情会使总统能通过恰当时机的演讲在国际公共关系中挫败苏联人。例如一个科学上的进步或一次贸易往来等均会有所帮助。

凯西觉得无论如何中央情报局正提供在总统职责第三个也可能是更重要领域的最好情报。这情报服务于总统做为总司令的职责，它就是早期预警及军事情报。凯西清楚它并不完美，但它常常是全面的，而且凯西认为它提供了里根总统在苏军大规模调动时将需要的情报，当然其中许多情报来源于技术性手段，如通过卫星测定边境线军队调动或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凯西在白宫高度赞颂了他的成功，并自豪地指出到目前为止，里根任期内苏联人没有做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或许击落南朝鲜国家的情报机构或当地警察进行训练。其装备包括最好的自动武器及手枪、高技术夜视设备、步话机、最先进的通讯设备——通常有使用密码功能，甚至有直升飞机（这些国家许多人喜欢得到一架先进的直升飞机）、安全警报、锁等，也有些用来保护美国总统的高级防弹衣。建筑物或宫殿周围先进的环形防御技术可用来监视恐怖分子，保证与情报机构和警察的联络能正常进行。

其中一项计划是在摩洛哥，那里中央情报局已提供技术援助、训练，并与国王哈桑二世联络达数年之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年轻的美国军官弗农·沃尔特斯与年轻的王子年仅13岁的哈

桑相识，从那开始了两人之间的友谊；直至1972——1976年间，沃尔特斯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时，他几乎被认为是国王的副官）。中央情报局的多年援助使哈桑自1961年起一直掌权。他的22年的统治是非州国家统治时间最长的之一。作为回报，哈桑实际上允许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在其国内自由行动，大范围高度敏感的利用复杂先进技术所进行的美国情报活动在摩洛哥进行。摩洛哥位于直布罗陀海峡，控制着地中海西边的入口，它的战略地位格外重要。

实际上这如同美国及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在对摩洛哥及其它数十个国家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想照顾你。"在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协助意味着生存。

对情报及安全协助行动来说还有另外的一面，它取决于良机与怀疑——这是优良情报工作的两大要求，朋友可能隔日为仇，或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友谊是有程度区别的，国家利益的含义也是变化的。哈桑国王可能在绝大部分事情上与美国一致，但不可避免有些领域会不一致。

在黑手党内，教父的信条是与朋友联系紧密而与敌人联系更紧密。对情报机构，在朋友与敌人的变换中，其信条是与所有国家联系紧密。

由于以这些领导人的亲密关系，中央情报局工作队得知了许多情况——如日程安排、习惯，可以判定那些真正有影响的提供情报者、友好的领导人的怪癖及小过失，他的家庭、他的顾问们。也有机会安装窃听装置，能接近电话线，进入办公室及住处。

但最重要的可能是有机会招募情报员。前去访问的中央情报局工作队或工作站人员数周或数月生活在重要的安全及情报官员的身边，使中央情报局工作队有条件接触工作人员、卫兵及无线电操作员们。而训练课，讨论及会议；长时间的午餐及晚餐都是

为保护领导人而磨练技术、学习装备使用，共度危险的目的的一部分，不会被人怀疑。这样国外情报及情报员增加了。其中有招募的给予很好报酬的情报员到非正式的保持联系的熟人，这些熟人当特殊需要时进行联系。

特别有希望的是那些能在付酬后作为有影响的雇员或暂及那可随时利用以获得特别情报或完成特殊任务的人，他们常常不知道他是受募的雇员，因为中央情报局常常借其领导人的要求，使这种关系有一种正式批准的感觉。另一些人常不知不觉地帮忙。

结果是有效而多方面的渗透，如在许多重要友好国家安有“鼹鼠”及电子装置。有些中央情报局人士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与情报上的“刺”行动相似，这种行动是为收集情报而不是帮助其领导人。坦率地说，其中某些行动使中央情报局在东道国得到高级的“特洛伊木马”，成功地利用安全协助收集情报。凯西认为若不利用这种送到手的有利条件无异于犯罪，他多次称这些行动为“职责”和“生意”。他说美国是易受攻击的，在国外间谍活动上没有标准，没有规则，没有法律。如果有规则话，他补充说：“不要被逮住，若被逮住，不要承认。”

凯西决定每一项活动应区别对待，在有些情况下行动暴露将危及与东道国的友好关系时减缓情报收集工作。中央情报局在印度的一个提供情报者暴露并被处理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对美国人在她周围安插间谍非常恼火，但两国都决定最好平息这一事件。

如果凯西的职责在于预测及防止国际突发事件，他就不得不冒着危险对朋友搞间谍活动。局内的一些批评者们认为对行动失败或被摧毁的代价考虑太少，但凯西的斗争宗旨是：防御而不侵犯，警惕而不鲁莽。

增大国外工作站站长的权力是凯西的另一个目标。在东道国内及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安全及情报协助行动

那样增大站长的权力和地位。站长们还得到了一个塑料卡片，上面列出了可提供的协助，包括保护国家元首。卡片交给东道国首脑由他选择何种协助。有多少来自行动部或技术服务办公室的二至三人的小队在活动，没有人，包括凯西，能数得清楚。许多外国首脑依赖性强了，要求最新的准备以保住权力。成功的行动给予站长在大使馆内大得难以置信的权力，尤其是安全行动使从首脑住处获得了有价值政治情报。

这类行动为政府的政治机构包括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及白宫等所需的情报。

安全及情报协助行动正在进行中，凯西手头共有几项，包括：

·位于利比亚以南的前法国殖民地乍得的总统西森·哈布雷。他在几年前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协助而掌权，这些协助是里根行政当局早期决定让卡扎非的鼻子流血的计划的一部分。与乍得的友好关系是使卡扎非陷入困境的关键。

·巴基斯坦总统默罕默德·齐亚。没有领导人统治着一个比巴基斯坦更不稳定的地理环境的国家，四周被不友好国家所包围——西边是伊朗；北面是苏联控制的阿富汗及苏联的一小部分，与中国有与苏联同样小的共同边界；东边及南边是死敌印度。最重要的是齐亚总统愿意让中央情报局经过巴基斯坦输送给阿富汗抵抗力量越来越多的准军事支援。凯西、中央情报局及里根政府都希望齐亚掌权并需要知道他的政府在干啥，中央情报局在伊斯兰堡的工作站是它在世界上最大的工作站之一。

·利比里亚领导人塞缪尔·科·多伊。多伊的私人卫队副队长，莫塞斯·弗兰扎姆顿，过去即是中央情报局的雇佣者，最后他想指挥机枪伏击多伊的吉普车并夺权，多伊非损毫毛而弗兰扎姆顿被抓获。他供出了其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并合乎常理地对其故事添油加醋，说中央情报局支持了这次暗杀。这使得兰利总部好几天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害怕本局将会不公平地被指责为

企图暗杀。利比里亚是被获自由的美国奴隶发现的，它成为非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很明显，弗兰扎姆顿与中央情报局接头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政治前途，他于企图政变一周后被处决，暗杀也随他而去。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美国的一个重要朋友，他允许美国保留空军及海军基地，马科斯也正在对付共产党暴动。

·苏丹总统尼迈里，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是卡扎菲在非洲的另一个障碍。

·黎巴嫩总统阿明·杰马耶勒，中央情报局希望能保证他不会像他哥哥巴雪·杰马耶勒那样被推翻和杀害。

·萨尔瓦多总统杜瓦特。如要尽最大努力阻断萨尔瓦多游击队的武器供应及阻止游击队夺取政权，保住杜瓦特的生命及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许多类似行动——有些明显，有些不明显。但在凯西情报行动包里，借助于安全协助的行动是属于最好的那一部分。

凯西明白他必须成为这些秘密行动和关系的不间断的拥护者，即使它们只获得勉强够格的收获甚至无明显的收获。这是一条使中央情报局入门的途径，凯西所关心的是中央情报局需要踏入世界的每一个门。这些安排是否会走得太远？他清楚这是会的，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因此怎么才能使它们得到控制呢？凯西的答案很简单，他将坚持他个人的控制。20世纪70年代的海外贿赂丑闻披露时，当时的斯波金在揭露丑闻中起了作用，其后国会认定美国商人在海外通过付酬或贿赂揽取生意为非法的。

凯西认为，给外国领导人或提供情报者付酬及给好处是例外——是合法的贿赂。例如他每年必定要拜访巴基斯坦的齐亚总统一至二次，与里根内阁任一成员相比，他很快与齐亚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因此当齐亚需要美国的帮助或仅需要有人倾听时，他

总是找凯西。

另外，美国在世界某些地区的军事存在或演习，从实际效果看，本质上也是秘密行动。例如，在最近几年国防部在洪都拉斯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演习，它是明显的炮舰外交来恐吓相邻的尼加拉瓜；演习完后，装备、临时基地及跑道都留在了洪都拉斯。这些行动被作为秘密的，并正式通知国会，因为其效果与支持当政政府的秘密协助计划相等同。

对已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安全及情报协助行动表现出了这类秘密行动的益处及损害。萨达特在1970年掌权，二年后他把苏联人赶出了埃及。中央情报局很快控制了他的一名主要警卫，情报协助计划秘密进行。首先，中央情报局需要萨达特活着但其次它需要源源不断的有关萨达特及内阁政治和策略的内部情报。其中许多是无用的，但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获得内部消息，列出数十位部长及副部长的嗜好、前途及政策非常振奋。

某些方面并未充分地估价所获得的情报的价值，当大量数据涌入到分析专家手中时，数量压倒了质量，有时变得不可能对情报进行分析，很难理出头绪。中央情报局知道得愈多，中央情报局得到的愈少。领导人们如萨达特将这类行动作为某种楔子，一种途径可绕过正常外交渠道而找中央情报局，寻求特殊的情报、好处，甚至金钱。

萨达特有时待中央情报局局长像一名私人官员。威廉·考尔比在他的回忆录《光荣的人》中描述了他1975年去佛罗里达的旅行。“为了与前来访问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礼仪性地会面，表达我的尊敬”，他双膝冰凉地在停在萨达特临时下榻处外他的车里过了一夜，他并未见到萨达特，相反萨达特却与巴巴拉·沃尔特斯举行了会谈。考尔比提及此件事，因为周末他被福特总统解职。他并非从华盛顿来此礼仪拜访“或表达敬意”。即使是文雅谦逊的考尔比也不会周末在汽车内过夜，除非这种关系是重要的。萨

达特是情报的宝贝，不直接从中央情报局获酬，从任何意义上说也不受它控制，但处于他认为的双方利益的需要，他已将他及他的国家向中央情报局开放。这很像一条双道大街，但它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的。

许多有经验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怀疑与萨达特的关系，断定这是萨达特行动方法：使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拥有他。在某些方面，他把自己卖了110%给主要的选手。美国及中央情报局认为他们拥有他；埃及军队也这样认为；其它阿拉伯国家亦这样认为；在戴维营会议后有时以色列人也这样认为。这就是萨达特为什么能控制一切，或许这种技巧导致了他孤立于他的人民之外。报应的一天在他踌躇满志中到来了，为之工作很久的卫兵们安全工作失败了。他在1981年10月6日公开检阅中被暗杀，结束了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之一。

在敏感情报收集中还有另一个关键领域，凯西认为正在产生出大量的材料，常常是在政治情报领域。他已经从1978年卡特任期内的一切辩论及其解决中得到了好处，那时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相对独立行动，经常重复通讯情报侦察行动。中央情报局的工作由精锐小组称为“D分部”担负，它由不到100名情报局人员组成。总的说来，国家安全局藏收空中的通讯，而中央情报局D分部安置电话或室内的窃听装置。从一个国家跳至另一个国家，由一个美大使馆到另一个美大使馆，D分部冒着危险突破及进入了外国政府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

至1978年，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之间获取通讯情报的重复及竞争失去了控制，国会监督委员会做出了反应，砍掉了中央情报局用于通讯情报收集工作的资金。这迫使中央情报局及国家安全局在大使馆小量进行合并。

至1983年底，合并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小组仍在约1/3

的美驻外使馆工作。这些小组常由两至三人组成，高度机密及封闭，将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专家及胆大艺高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融为一起。这些小组被称为特别搜集分队或特别搜集所，它们获得了相当价值的情报，特别是当美国大使馆坐落于好而高的地点或靠近东道国的外交部、国防部或其它重要办公室或重要住宅区，分队的头目从中央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选出，取决于任务和目标。这些特别收集分队在东欧国家首都特别有效。

但成功的关键是先进的技术。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所发明的技术东道国几乎想象不到。一种又一种的电子窃听装置远远超出了电影和间谍小说所描述的，电话线及房间可以不通过闯入或接触而窃听。房间里的谈话可通过一束不可见的小光束测定窗玻璃的振动而窃听到。这光束从距窗口几百英尺以外射出，以锐角掠过窗户经几百英尺外的接收点接受并放大。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一个"挂断"电话支架里的话筒可通过电话线传出小脉冲，这些脉冲可被分离并转为声音，通过电话线及非常复杂的设备，这些在所有房间或办公室的电话机内话筒成了潜在的窃听器。

在数十个美国大使馆内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特别分队在提供愈来愈好的情报，这不仅因为技术和小型化的进步，而且因为凯西要更多的情报。

"我们为什么不覆盖这个家伙?"他常会问。他需要答案而且一般不会忘记他曾问过的问题。数年来很明显只有覆盖了才是可接受的答案。

凯西明白他的一部分问题是管理这个庞大的机构，他曾快速阅读了畅销书《寻求优胜：美国经营最佳的诸公司之教义》。他说对信息交流、企业家式的职权力及简化程序尤为印象深刻，并希望这样做来改进中央情报局。他主持会议，要求每个分支提出有

关如何更有效地工作，使工作人员更愉快的建议。总共有800多条建议，当他在家养病期间他逐条阅读并口述了他的结论。1984年2月一份一页的中央情报局《信条》出版并分发，它共有九条，每条以“我们……”打头，明确提出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为总统工作的成果。

凯西的《信条》主要内容是：“……效率及高质量……客观而公正……准备向常规挑战……正直、道德、有荣誉感、遵守宪法及法律的精神实质及条文……美国的价值观、安全及国家利益……保守机密……永远保持对我们的共同目标和彼此间的忠诚……主动性、相信胜利并勇于行动。”

这份《信条》在整个机构内引起了许多笑话。

在1984年初，克拉里奇提醒凯西他们将需要比国会提供约2400万美元更多的资金。是的，凯西明白。他们正一只手被束在背后而进行斗争，而这正是国会所希望的，这真有些荒唐，2400万美元还不到一架现代化客机的价钱。凯西认为克拉里奇已干得很出色，在战场上保持了一支超过1万人的反政府武装、布雷——全部在靠少量资金，凯西现在可能不得不去乞求财政年度中的辅助拨款，是类似于额外的2100万美元的东西，这将是令人羞辱的也是困难的，特别是接近总统竞选时期，投票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害怕发生中美洲战争，而白宫的政治打算很简单：将尼加拉瓜中央情报局置于头条新闻之外。吉姆·贝克在注意着。

凯西需要一条捷径绕过国会。有无某种途径可避开过去的会议——讨论、辩论——泄露的循环？他需要新主意。有无战胜国会的途径，用它本身的规则？

约50年前，凯西已明白规则可被毫无头脑地遵守或创造性地理解。那是1937年，当时他是一个24岁的法律学院的毕业生。恰处大萧条的中期，工作很难找。凯西在纽约的美国税收研究所找

到了工作，周薪 25 美元。工作是仔细阅读新政法规并写出报告对之加以解释和总结。商人们、美工业界领袖们即不理解也不欢迎联邦储备局的努力。通过口述总结用一个早期的滚筒式唱片录音机录音，凯西很快发现商人们既不是要叙述也不是要赞扬更不是要批评。相反，他们想知道怎样做才能最小程度的服从法律、如何绕过联邦储备局及国会的新法律？凯西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

凯西说他现在需要某些富有想象力的东西，“我不是要违反法律。”他坚持说，相反他想绕过它。他需要最小程度地服从法律以保护他和中央情报局并给予反政府武装更多的资金。过去数月他有些惊奇地观察到国会被它的成员之一操纵着，这是生动的一课。在中央情报局为尼反政府武装艰难地赢得 2400 万美元同时，中央情报局在要求为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的计划提供 3000 万美元。其后一个众议员出面了，他甚至不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他实际上自己使支持阿富汗计划另外增加了 4000 万美元，翻了一倍还多。

这位查尔斯·威尔逊众议员，是一位高高的、干净利落、待人友好的德克萨斯民主党人，一位很有口才的鹰派，他的选区是德克萨斯冒险风格的范例。过去一年里，威尔逊曾三次去巴基斯坦，那里阿富汗秘密计划正在进行。他曾跟随抵抗者们穿过世界进入苏联控制的阿富汗地区。照威尔逊来说，这是一场在合适的时间打的一场正确的战争。他总结说，3000 万美元是一笔“小钱”。他想要更多的俄国人死去。“在越南我们死亡了 58000 人，我们输给俄国人一次。”在他的最近一次巴基斯坦之行，他了解到抵抗者的问题是苏联的直升飞机控制了空中。

威尔逊开始疏通为抵抗者争取一些先进的防空武器。他建议采用瑞士造的高技术，连射的厄里肯自动高射炮，并说明是巴基斯坦总统齐亚的主意。通常凯西会嘲笑某些想管中央情报局具体事情的议员们，但威尔逊将它变为改革运动，并在国会章程内找

到了解决办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所谓的“监督”委员会，但在这个综合企业中，即国会权力的神秘分支中，批准资金仅仅是第一步。有一个两层的系统，已批准资金必须经过权力很大的拨款委员会的正式拨款。为了这项工作设立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查理·威尔逊占有一席。当该委员会开会讨论五角大楼预算时，威尔逊说他只需要一件事——给阿富汗抵抗者们，那些勇敢的自由战士更多钱。尽管情报委员会并未批准它，他想要这笔钱先拨款。他说起他在这一地区一次旅行中一个11岁的阿富汗男孩走到他跟前说不要把俄国人杀光了，因为他想留一个等他长大后亲手杀死他。威尔逊的同事们被他的坚定而不是他的言语所打动了。

他需要增加多少？

威尔逊说4000万美元，这个数字简直从天而降。

由于委员会在讨论国防预算，它接近2800亿美元，因而4000万美元只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小数目。这好比委员会在考虑开支7000美元而其一个成员被一个想法迷住，想增加拨款1美元。威尔逊说他将投票赞成其它事情以支持那些同意4000万美元拨款的人。他胜了。

威尔逊其后被派到参议院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之间就整个联邦预算进行研究，他的影响力甚至更大。他又胜了。

突然间，凯西有了阿富汗行动的另外4000万美元。这笔款项将从五角大楼预算中开出，而国防部官员们在政府内部掀起了风波。五角大楼传阅了一份秘密报告说防空的厄里肯式自动高射炮是不适合游击战争的武器。这种特殊的昂贵的复杂武器能穿透装甲，是现代工艺水平的；这种炮需要仔细保管。他会葬送在通往喀布尔的崎岖道路上。但威尔逊，作为一名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是五角大楼的朋友，五角大楼最终让步了。

政府通过预算局长戴维·斯托克曼，向两院情报委员会呈送了高度机密信件，要求批准4000万美元拨款。戈德华特对试图用

计战胜他的委员会及改变正常的国会批准——拨款程序很恼火，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如果情报委员会不能通过批准拨款来控制秘密行动，它倒不如不存在。

威尔逊继续他的运动，他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那些办公室野营，努力地游说。他发现利用反对尼加拉瓜行动来得好处的方法。他的许多反对尼加拉瓜行动的众议院同事们想表明他们对苏联扩张并不软弱。当威尔逊提出他的建议时，阿富汗行动是证实这一点的理想工具。在某些民主党成员中，尼加拉瓜是“错误”的战争，对阿富汗的围攻是“正确的”战争。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约翰·麦克马洪在一份高度机密的信件中提出支持增加4000万美元及厄里肯式自动高射炮。当这一行动开始时，他在卡特任期内任行动部主任（凯西称麦克马洪为阿富汗行动之“父”）。通常，麦克马洪对秘密行动总持怀疑态度，但几乎是全体一致的议会对阿富汗行动的支持说服了他。他的态度帮助改变了潮流，参议院及众议院都同意了。

威尔逊告诉中央情报局行动部官员们，他们太丢脸了，他们本应该自己去要更多的资金。

对凯西来说，这是一笔横财。4000万美元不仅对阿富汗计划是一个重要支援，而且它表明在秘密行动上国会可以支持甚至走在政府的前面，凯西觉得它是一项表明有决心的强有力声明，它起码在现在，与资金或新武器同等重要。中央情报局对厄里肯式自动高射炮并不熟悉；买了一门试验，订购了九门，将花数月，甚至超过一年，将它们用在阿富汗战场上。但心理上的优势在中央情报局一边。凯西不知是否还可以重新指导尼加拉瓜行动，尽管看起来对阿富汗的支援增多了，而对尼加拉瓜支援减少。然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威尔逊的方法。他推动了整个系统——行动部、麦克马洪、凯西本人、政府、众议院及参议院。

十六

助理国务卿托尼·莫特利想在目前已耗尽资金的尼加拉瓜行动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莫特利的良师益友，领导着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分会的工作。莫特利建议，政府应像查理·威尔逊总统曾做过的那样，试一试直接与拨款最终环节打交道，而不是与戈德华特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批准拨款的委员会）打交道。莫特利说，当政府可以与真正的权力机构——掌管资金的拨款委员会，直接打交道时，谁也用不着对情报委员会说那些废话了。因此，莫特利将一份为尼加拉瓜行动拨款2100万美元的请求交给史蒂文斯，并说明可能足有1/5的机会偷偷走它这条路。

史蒂文斯同意试一试。

这一行动才要开始，戈德华特就发现了。这该死的政府，他说，是它自身最大的敌人。这是一次毫无头脑、不理智的行为，违背了长期以来参议院的规定和习惯。而他是他们的朋友，站在他们一边，是在一个党内。中央情报局国会联络员克莱尔·乔治说它是托尼·莫特利所为，白宫不知道此事。

不过1984年3月12日，戈德华特和莫尼汉还是直接给里根总统写了一封密信，强烈抗议这种违背参议院规章的行为，同时还给凯西送了一份信的副件。国务卿舒尔茨向戈德华特表示了歉意。

这将戈德华特又拉回到了政府一边。4 月 5 日，星期四晚上，他在参议院会议上想为凯西赢得这 2100 万美元。他执行的是亲政府的路线，责备同事们“干预了总统保卫国家安全的行动”。

当戈德华特讲话时，比登正在他的小桌上读一份备忘录。他是位敢于直率地批评凯西的参议员。备忘录说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了在尼加拉瓜三个港口布雷的行动。备忘录还说，这都是由中央情报局单方面控制的抗美人完成的。比登因对此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他想可能自己错过了一次听证会或汇报会。因此他站起来将备忘录送给他的朋友，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比尔·科汉。

科汉仔细地读了一遍该备忘录，明确指出中央情报局计划、命令或实施了港口布雷，这已不是支持或援助了，而是中央情报局的直接行动。布雷不是跨越边界的秘密行动，它是沿着难忘的袭击马那瓜机场事件又向前迈了一步。布雷是一项战争行为。科汉认为整个行动的肮脏之处已暴露无遗。

他走到戈德华特那儿，并将备忘录交给他。

科汉严厉地问：“巴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真的吗？为什么没告诉我？”

戈德华特很愤怒，情绪也不稳了。他要求允许他在会议上讲话，并开始将该备忘录读给同事们听。戈德华特的办公室主任罗伯·西蒙斯跑向科汉要求说：“让他停下来，让他下来，不要让他读了。”

西蒙斯感到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戈德华特或其它参议员可能会将一样敏感、机密的情报拿到大会上，这样就给了凯西和中央情报局来进一步减少传递情报并给委员会贴上不值得信任标签的理由。

西蒙斯觉得科汉走向戈德华特的速度还不够快，就自己抄近路奔向戈德华特，几乎是从他手里抢下了备忘录。

戈德华特和西蒙斯面面相觑，布雷？为什么没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他们中本应该有人知道的。是否凯西已私下告诉过戈德华特？戈德华特说并非如此。西蒙斯说他也没有线索。最近几年里，他们曾多次挽救过秘密行动计划。为什么让他们蒙在鼓里？

戈德华特说："你找比尔·凯西，看这个混帐在干些什么。"

西蒙斯从《国会记录》上删除了戈德华特所读的部分。然而，《华尔街日报》记者戴维·罗杰斯却将它登在第二天上午的报纸上，尽管其描述略为低调——"据报告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中的作用比预想的要大。"

第二天西蒙斯花了一整天时间给麦克马洪打电话。

当西蒙斯最后找到他时，他说："我一直很忙。"

西蒙斯冷冷地问："你知道布雷这件事吗？"

麦克马洪含糊其词，他说凯西曾在一次中央情报局的早餐把此事告诉了委员会成员。

西蒙斯作了调查。发现戈德华特从没有在中央情报局和凯西共进早餐。

有关情报慢慢传到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尼加拉瓜三个港口海底已放置了75枚所谓的"爆竹"水雷，但这种水雷中的许多枚含有多达300磅的C－4炸药。西蒙斯曾用过C－4炸药，300磅足以造成大爆炸。水雷已炸伤了许多商船船员和渔民，据报道其中一人被炸死。布雷前，尼加拉瓜的石油大部分来自墨西哥和欧洲，而现在苏联人成了最大的供油者，提供尼加拉瓜进口石油的80%。因此，西蒙斯分析布雷后首先的反响是使尼加拉瓜更投入苏联的怀抱。

西蒙斯从他担任行动处官员时就记得真正的牛仔用来表达这种骚扰的话："让我们向他们身上撒点尿。"布雷行动都是些60年代在迈阿密进行的反古巴行动。中央情报局充当了拉车人，而那次行动帮助卡斯特罗巩固了对人民的控制。

“你知道，”戈德华特对西蒙斯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笨蛋。”情报委员会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这类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戈德华特觉得他已经失败了。他说，布雷行动威胁了中立国的船只，一艘英国船只已经触雷。想象一下如果一艘美国船只触上一颗英国秘密在某港口布设的水雷会发生什么呢？戈德华特摇了摇头：“你告诉凯西，他只能靠自己了。我替他火中取栗已经够多的了。”

戈德华特前往奎恩位于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农场度周末，这已成为戈德华特定期的周末休假地。在那里他干一些零星的电子活——装配电视天线或缠立体声话筒。这是个美好的春季周末，但戈德华特却无法摆脱被背叛的感觉，这次打击使他沉默无语。很明显，政府和凯西一点都不信任他。

戈德华特拿出一架小型录音机，他常用它来记录笔记、想法和信件。他按下了录音键，开始给凯西写封信：

“……在发现总统已批准在中美洲某些港口布雷后，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能最简单地说出我对此的感受”。

“它变成为一个很小、很简单的句子：我极为愤怒。”

戈德华特指示将它送给凯西。

凯西给奎恩打电话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忧虑，他的火气那么大。”

奎恩提醒凯西，戈德华特冷得和他热得一样快。凯西表示感谢并挂上了电话。他也很火，觉得自己处于夹缝之中，这次一边是白宫、国务院，要求在尼加拉瓜采取更多行动；一边是国会，要求采取更少的行动。

白宫曾问凯西是否有办法从其它中央情报局行动或贿赂外国官员的资金中分出一些款项用于尼加拉瓜行动。中央情报局难道不能花 2000 万美元应急资金吗？难道这不是这笔资金的用途吗？

应急资金是用于紧急行动或国会休会时用的。凯西清楚如果他为尼加拉瓜行动从应急资金中额外拿了一便士的话，他也会受

到惩罚的。而且进一步说，麦克马洪、总顾问斯波金及行动处其他官员强烈反对会造成阻挠国会意愿的任何行动。已起草了一份法律文件严厉警告任何旨在从字面上或精神上绕过国会监督的企图。

凯西一直认为布雷是理想的行动：有效但并不真正导致流血，现在看来似乎真正会流的血倒是他自己了。有报告显示水雷正在发挥作用。在尼加拉瓜最大港口科林多港仅最近就有七艘船只触雷，其余船只掉头返航。那里棉花已堆到两层楼高，等待愿意勇敢地进港的船只。尼加拉瓜的其它两种主要出口产品，咖啡豆和蔗糖也堆积如山。在尼加拉瓜国内已在谈论经济崩溃了。

报纸广泛报道了布雷及其影响，桑地诺政权发表声明指控美国应对此负责。那么为什么参议院要吃惊呢？凯西和其助手查看他以前送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绝密材料的副本，那里有着他所需要的清楚的叙述——一则珍贵而生动的辩护。

一个月前，3月8日，凯西曾对整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已将磁性水雷布设在尼加拉瓜太平洋沿岸的科林多港、大西洋沿岸的艾尔布拉夫港及石油终端普尔特·桑地诺港。"五天后，3月13日，凯西重复了同样的话，只是略去了"磁性"两个字，因为有些水雷是由经过其上方船只的声音而触发的。

这不是临时暴露，他曾说过这事，而且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未提出任何问题。如果无人听懂，那是他们的问题。凯西去白宫见巴德·麦克法兰。现在白宫把布雷理解为犯了大错，尤其是吉姆·贝克。原则上说，批准布雷行动时没有人反对，但现在问题是，为什么它未能保密？

麦克法兰认为凯西是支强大的独立的力量，他必须努力与之合作。凯西有总统赋予的独立明确的日程表和委托。但有时，尤其是在对国会对抗和妥协中，他可能会出问题。麦克法兰曾在国

会工作多年，他发现凯西不能同情报委员会相处融洽是愚蠢的，是给自己拆台，这是他最近受攻击的明显原因。

但这一次凯西引用3月8日和3月13日作证的记录，他把作证记录的副本呼地扔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面前。他还应该再作什么？戈德华特的指责性演说是因为这位参议员太累了或药物过量或两者都有。

麦克法兰似乎被说服了。

4月10日，星期二，凯西向一些非情报委员会的参议员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说明他何时和如何告诉情报委员会的。他已花了100个小时在国会作证。他说，我们总是对委员会或个别参议员在任何时候提出的任何问题予以答复。总起来说，布雷并不是尼加拉瓜秘密行动中那些重要或构成整体所必需的部分。所有的大惊小怪都是不必要的。

有些参议员批评布雷行动的无选择性。一个参议员问及一枚水雷由一艘英国船只触发爆炸时说，为什么我们要干骚扰我们最亲密盟国的事？还有一枚水雷由一艘苏联商船触发爆炸，凯西难道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吗？如果一艘美国商船进入克格勃布设的水雷区并触雷，美国会如何反应？

凯西前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从参议员们，尤其是共和党参议员们的反映中，明显可以看出双方在交流上出现了极大偏差。尽管凯西已说过这件事，但没有人听到或了解这件事。

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戴维·杜伦伯表示了怀疑。在他看来，中央情报局局长似乎在说美国采取这种战争行动是为了好玩。科汉仍很烦恼，从逻辑上说这一行动有个缺陷。凯西说这些水雷被设计成了只造成轻微的损害，而且布雷不过是交战的一般行动。如果没有军事或战略价值为什么要冒这么大危险？布雷被理解为一项意义不太明确的政策的逐步升级。科汉问道，你们何时才能停止秘密战？何时这些秘密行动会成为简单的（或复杂的）战争？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是一块绝密的共鸣板：只有一项新的行动能在他们中间通过并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时，它才可能成为公众所接受。情报委员会本该就布雷行动警告凯西的。

沃勒普是支持凯西的少数几位参议员之一。他批评布雷是一项不彻底措施，他说他们还应炸掉尼加拉瓜的一切。几位自由派民主党人建议，唯一的出路是将整个秘密计划完全公开，并提出他们将支持这一举动。沃勒普笑了。他觉得他们只能在一次秘密听证会上这样说说罢了。一些民主党参议员开始在公开场合说下一步将是派遣美国战斗部队，而一些新闻报道则提出上述计划正在进行之中。因此，凯西、舒尔茨、温伯格和麦克法兰四人联名签署了一份长达3页的，异乎寻常的公开声明。部分内容如下："我们强调指出，我们从未考虑计划过，使用美国军队入侵尼加拉瓜或其它中美洲国家。"

这太晚了。参议院受反战热的支配，在上述公开声明发表当晚发生了戏剧性的事态变化。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语气暗示凯西向朋友们射冷箭。他说，上一周他将他们的讲话从国会记录上删节了下来，这是他已近30年参议员生涯的第一次。

他说："我不得不向我的委员会成员们表示歉意，因为我不知道这一事实。同时我也向全体参议员，为同样的理由而表示歉意。"

在划分可接受与不可接受之间有一条互关重要的分界线。布雷是不可接受的。辩论问及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就不要体面了吗？布雷看上去几乎成了"国家的"行动，是国家特征的体现。布雷是鬼鬼祟祟阴暗的行为，与在饭店放一枚炸弹，对非嫌疑犯及无辜者设一个陷井有些相似。戈德华特的反对扩大了这一问题。他被看作是一位既坚强又有常识的仲裁人。他私下称布雷是"我所听到的最愚蠢的主意"。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提出一项无约束力的国会指导决议，

它谴责布雷并宣布不允许为"计划、指导或支持在尼加拉瓜港口或领海内布雷提供资金"。

它以 84 票对 12 票通过。

凯西无法相信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会这么干。参议员们或许不同意该行动，但这是国家的政策——总统批准并由中央情报局执行，并已用适当的方式通知了国会。这一投票结果不仅是否决它，而且是自我羞辱。

在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举行的晚宴上，里根公开谈到这次参议院投票。他说："如果它不是有约束力，我可以与之共处。我认为对这件事情，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我们并不是在走向战争。"

戈德华特给凯西的信被从参议院泄露出去并广播和印发了，一个虚词都没有丢。

第二天，1984 年 4 月 11 日，利伊参议员与他的两个助手在其参议院内僻静的办公室里喝酒。这是个小的、窑洞般的房间，丹尼尔·韦伯斯特曾用过它。利伊很高兴。在他看来布雷使整个秘密行动面临着破产。此外，他说他知道凯西肯定不会欺骗参议员或使他们，尤其是戈德华特，不知道有关布雷的事。

为什么？

因为在几个星期前就知道布雷的事了。因他父亲去世他离开参议院几个星期，在他回到参议院后，他要求中央情报局向他汇报尼加拉瓜行动的近况。中央情报局详细介绍了布雷行动。他们没有理由告诉他而有意不让戈德华特知道这事。

那他为什么不就此说点或作点什么呢？

利伊说，因为布雷行动是一场未宣布的秘密战争的符合逻辑的扩展。一旦你接受了这一设想，即这样一项秘密行动是必要的，那么布雷也是讲得通的。当然，他不接受任何此类设想。他认为

秘密行动无法取代长期而理智的外交政策。对任何秘密行动来说，都存在着不稳定、易变、忽上忽下的特征。利伊说，事实上，凯西因受到了强烈反对而大吃一惊是有道理的，国会对秘密战争的其它每件事都表示赞同。为什么这件事不呢？

这是战争行为，一位助手说。

利伊几乎要笑了。你们觉得组织并援助数以千计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什么？是和平吗？

利伊说："这件事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它将使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分裂并打破党派效忠的界限。"曾有过许多次全体一致同意的投票结果——我们曾对许多荒唐主意意见一致。"他保证在今后不会再出现此类情况。他说，凯西和政府需要一个团结一致的委员会来告诉他们，何时他们的想法和计划是疯了。情报委员会作为最后一关，如果达成了普遍的一致，那么就可能否决或阻止某些事情。

利伊说："我从未见凯西如此处于守势，他们像一群孩子坐在那儿里，这有点像逗牛仔和印第安人，像玩游戏，像看见星期六的午后演出。"他说："它不会发挥作用，我们在开动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人。"他又说，最终结果可能是在中美洲的某种战斗。

克莱尔·乔治看到自己27年之久的中央情报局生涯将在愤怒之中结束。他时而采取守势时而悔恨。他有一次拿着电话向对方大吼："我们跑断了腿，以便及时通知他们，我们向他们汇报，汇报，汇报！我不知道那些混帐想干什么。"他又说，那些参议员们现在在想那些中央情报局的"坏杂种。"这就是政治，而每位立法者都根据最新风向确定自己的立场。"我们可做的另外的唯一的事情是在他们那里安一台电传打字机，让他们看一看每日的电文。"他认为有些参议员可能有合法的权力接触，而另一些可能不行。而另一些只会撒谎和故作姿态。"即使给某些人放电影的话，他们也不会满意。"

乔治曾遇到过更棘手的处境，因而当他冷静下来之后他意识到秘密战、布雷确实是敏感的问题，“它是一个感情问题，换了我们也会有，而且人们认为我们曾隐瞒了它，这是如此令人厌恶的混乱！”

他觉得戈德华特是一个好人，一个一心奉献的支持者。当戈德华特说他不满意时，那是很有份量的。当戈德华特说他很愤怒时，他可以带动整个参议院。

有人问乔治：“凯西是如何处理这些批评的呢？”凯西当天正参加一个家庭葬礼。

乔治回答说：“用力量。”他又赞赏地补充说：“他很有能量！”

在他负责与国会关系的九个月时间里，乔治与戈德华特的办公室主任罗伯·西蒙斯在华盛顿市区一家饭店共进午餐，以确保定期每月一次交流。

西蒙斯意识到乔治很坏，他对待国会就像对待外国的东道国政府那样总想派间谍。西蒙斯对乔治说：“我认为你不是我的指挥官，同时我也希望你不要认为你是我的指挥官。”

“不，不，不。”乔治说。西蒙斯说将布雷掩藏在两个长篇讲话里从技术角度来讲是明显不充分的；情报委员会需要并希望对重要事情要透露消息。乔治未予回答，他们的关系结束了。

第二天，我去中央情报局，在前往利比亚前听取简要汇报。利比亚外交部长已经说过我可以采访卡扎菲。令我吃惊的是，汇报者之一是行动处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他是一个冷漠衣着考究的人，没有一丝笑容。他给我的信息是：卡扎菲愈来愈感到受到威胁，对境外任何反卡扎菲组织都施加压力，并派出暗杀队进行暗杀活动。这位行动处官员说，卡扎菲总是处在不合实际的梦想中的人，是一个没有真正基础或核心的领导人，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他不停地移动，睡在不同的地点，认为中央情报局要杀他并

感到恐惧。

我没问中央情报局是否要杀他，当我反复考虑后打算要问这个问题时，这位行动处官员似乎有意避开了这一问题。

他说，卡扎菲正试图打破其心理上的缺陷，他有些像卡斯特罗，无法改变，但又以阿拉伯的方式努力接近他的敌人，向美国发出信号说他愿意对话。这位官员称卡扎菲既奸诈又软弱。他说，卡扎菲用女卫士，他知道阿拉伯暗杀者很难向妇女开枪，这是很聪明的。但卡扎菲重新解释伊斯兰教义给自己带来了麻烦。"他的非正统的原教旨主义"给他与伊朗和什叶派教徒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霍梅尼拒绝接受邀请去会见卡扎菲，这是一种反常的"冷落"。

他说，卡扎菲与苏联的关系是玩世不恭的实用性的，双方并没有正式的或秘密的协议，这是一种金钱关系。这位官员解释说，卡扎菲从他们那儿买那么多东西，一年约10亿美元，但这也是为了保证他有足够的备用品，这样他不必再去乞求备用零件了。

有报道说卡扎菲正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对此有何看法？

这位官员说，这属于"第三世界俱乐部"的事，该俱乐部比任何组织都更团结。送往尼加拉瓜的武器数量不多，只是小型武器。

他指出利比亚经济很原始，很难加以损害。经济制裁作用很小。

我应问卡扎菲些什么呢？

这位官员表情严肃地建议我应问："我知道你定会靠安眠药——你看上去吃药很多，你是否难以入睡？"

利比亚社交和知识界对卡扎菲有着某种蔑视，一种几乎是责备他的倾向。但对他又有着一种对勇士的尊敬。这位官员说，卡扎菲在20多岁时患过呼吸系统疾病，并且身体不太好。他说，卡扎菲过度兴奋，精神高度紧张，行为不定，而且最近讲话中流露

出病态的迹象。

我认为我获得了有根据的情报，一则经过仔细核准的介绍，但我也有一种无法消除的感觉，即这位主要的秘密行动执行者一直在对我灌输某种东西，他作得略有些过头。他把这位利比亚领导人描绘得有些过于愚蠢。当我复核对话和笔记时，我意识到我无法区分自己是否被“喂了”些什么。作为事实或分析，它看上去是诚实的、坦率的，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我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想法，即他们建议我向卡扎菲提的问题有着其它的目的。

下午，当我正要离开时，凯西的一位熟悉尼加拉瓜行动的高级助手把我拉到一边，并建议我们交谈一下。我们走进他位于七层的办公室后，关上门，这是幕后谈话。他说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他知道那意味着只要不提他或中央情报局的名字，我就可以引用这些情报。

他直截了当地说，尼加拉瓜行动实际已终止了。行动处已接到通知说该行动的资金下周就将耗尽，或许更早些在星期天耗尽，距现在只有三天了。帐目显示所拨的2400万美元中的2200万美元已于二周前花掉了，留下了200万美元。明显可以看出所要求的2100万美元将很难从发怒的国会中得到。他大声地笑起来，回忆起参议院反对布雷的投票结果。82票对12票，并指出有可能众议院也出现相同的结果（几小时后情况确实如此，投票结果为281票对111票）。他说，因此将采取措施开始痛苦的脱离过程，让中央情报局从尼加拉瓜秘密行动中摆脱出来。

这位官员接着说：“凯西正考虑请求另一个友好国家拿起绳子松了的这一头，并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器提供资金，直到资金问题解决为止。”

“你是说你们正处在脱离的边缘？”

“是的，”这位官员说，“不过，凯西认为这次风暴将会过去，我们最终将得到新的资金。”他又强调说，“但‘这位局长’是中

央情报局中唯一这样认为的。”

“将向哪个国家提出请求呢?”

“沙特阿拉伯，但还未作出最后决定。”

我在笔记本上把它记了下来。他一定清楚我将把这些东西公布出去，但我不清楚他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试探舆论的反应，还是希望破坏请求沙特阿拉伯帮助的可能性。

这位官员向我描述了凯西如何在幕后推动这场秘密战及有争议的布雷行动。他明确地说：“整件事都是凯西造成的。”

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疏远”这个词；显然这是试图将中央情报局的主流与凯西及凯西的秘密战分开。

这位官员主动说，在这座大楼里对整个尼加拉瓜行动有许多反对意见。约翰·麦克马洪从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愚蠢的、拙劣的计划。

以前曾有过此类新闻，但我对他能如此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些感到很吃惊，因而问了一些问题。这位官员看着我，似乎我在问美国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站在哪一边。

他坦率地说：“约翰知道它会走向这一步，没有了国会和公众的足够支持，因而我们将撤退。”他又谈到国务院最近发表了一份法律评价，他嘲讽地说那份评价居然说布雷是“自卫”。真正的问题在于它再次证明了政府的左右手相互间不知道彼此在干些什么。他说，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部门决不会出这种事情。

他接着阴郁地说，整个尼加拉瓜行动是一个大失败。尽管所采取的行动在损害尼加拉瓜的经济，但它并没有减慢向萨尔瓦多的武器输送的速度。“在格林纳达事变后，它又降了些，但现在它又回升甚至可能比以前更高。”

我说，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一行动真正的内因是要推翻桑地诺政权。

他笑了起来。哈，哈，哈，是的，那很有趣，也没有那种该

死的机会。

他说，这是简单的算术，在数量上相差超过四比一。桑地诺政权有大约 75000 名军队和警察，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尼拉加瓜反政府武器的封顶数字是 18000 人。尼反政府武器现在最多有 15000 人，而且钱柜也几乎空了，行动结束了。

我打了许多电话以便查清这一主要轮廓是否正确，它至少代表了中央情报局内部骨干的观点。我曾与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乔治·劳德谈到有关麦克马洪对尼加拉瓜行动的看法。他说，麦克马洪反对这一行动的观点整个中央情报局及整个国会都知道。劳德还补充说无论麦克马洪个人观点或结论如何，他不会反对任何现行的中央情报局行动。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报道，其三行大字标题是《中央情报局缺少秘密行动的危险》。

第二天上午，当我走进办公室时劳德打来了电话，我敢绝对肯定凯西对他被刻画为尼加拉瓜行动的主要设计师而感到不快。在报道中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助手被称为"消息灵通人士"并引用了他的话："这件事都是凯西一手造成的。"劳德冷冷地说他手头有一份麦克马洪让他向所有的主要新闻机构发表的笼统的声明。

是麦克马洪？我问道。

劳德开始朗诵："我急切地反驳《华盛顿邮报》4 月 13 日版所引用的我对我们在尼加拉瓜行动的看法。尽管我与凯西局长鼓励在我们所有情报建议上进行辩论，但当它成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时他和我是完全一致的，这也包括那些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所采取的行动。中央情报局其他高级官员也有着相同的立场。"

我问道，我到底该干些什么？

劳德说，我不知道，这取决于你。随后他说他得走了。

麦克马洪的声明被放在第二天报纸的短篇报道里——现在每

天有三到四则。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现在有一些非常高级的人物一致反对凯西。那天曾同我秘密谈的那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懂得宣传的技巧：散播怀疑的种子，给它们浇水，让它们生长，并在必要时收获。尼加拉瓜行动事后调查分析的基础已经打好。麦克马洪这位充满机智的人，自始至终反对这一行动，他已看到了自己不可避免地要从凯西“造成”的战争中摆脱出来。但同时，他又公开宣布忠于局长。麦克马洪在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扯平了。如果这一行动结果如同看上去一样，成为一场灾难，他和他的同盟者们会指出他最初所讲的及他表示怀疑的录音。如果这一行动兴旺发达，他们会指出他很少的几次公开声明，在这些声明中他宣称他支持凯西。

在国务院，托尼·莫特利有趣地读着麦克马洪的公开声明。近一年来，作为政府负责尼加拉瓜行动的执行官员，莫特利对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对抗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了解。麦克马洪是最有技巧的官僚斗争能手，无人能比得上。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麦克马洪正在争斗的远不止尼加拉瓜，他在攻击凯西要重新创立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功能。麦克马洪判定，中央情报局应该盗窃情报并进行分析。

在莫特利看来，麦克马洪是不忠诚的。他常常在几小时之内紧随凯西行动，总是用掩饰甚好的间接方式仔细、慢慢地将凯西的政策引向另一条轨道。很难找出麦克马洪与老板相抵触的一个词组成一个句子。他知道如何使反对意见表达得像是一件抽象派的艺术品：“批评家们会说……”但麦克马洪的陈述和观点的份量常常会采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莫特利有一次对麦克马洪说：“约翰，我被搞糊涂了。局长说的与你恰恰相反。”

莫特利认为麦克马洪在走钢丝，他常确信麦克马洪已掉下来

了并将被解雇，但这一直没有发生。莫特利最后断定麦克马洪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凯西，他知道凯西认为有必要有人来用力推他。但这并不足以解释这一问题，而且莫特利怀疑麦克马洪是否可能在某些事上占凯西上风。莫特利曾开玩笑说："麦克马洪以某种方式卡住了凯西的脖子！"

当麦克马洪听到这话时，他爆发出一阵大笑，他那松弛的脸变得通红，他笑得似乎要爆炸似的，笑声飞过他那七层办公室的橙色椅子，穿过带画的大窗户，冲过阳台投入到弗吉尼亚田野中。他的过度反应是一个绝妙的转向，因为这样他就不必承认了。他让笑声停了下来，什么也没说。

在他的母校，圣十字架大学，他被称为"微笑的杰克"和"母鸡"。根据他的年终评价，他"在任何闲谈场合都是最受欢迎的，在谈完每件轶事后都伴有他衷心的笑声，"甚至在拥挤、黑暗的电影院中也可以辨认出他来——"带有喉咙深处的吼声"。他的大学四年级论文是《莎士比亚的四个悲剧性女主人公的感情冲突》。作为一个有着神秘色彩、斗争才智和辛辣妙语的才子，麦克马洪学会了熟练地玩弄凯西。

凯西就是不相信麦克马洪不忠诚。当有人问到麦克马洪可能不忠诚或表里不一时，凯西坚定地说："我不相信那一点。"

莫特利最后得出了答案：中央情报局正在经受一场身分危机。它的成员是些肮脏的骗子吗？是的，当他们被要求如此时。他们服务于局长和总统。他们是否不惜一切处处与苏联人战斗？是的。他们是否监视着整个世界？他们努力作了。他们是否是一些出身高等学府，有知识的分析专家们并译解词组，完成优秀的"论文"，使那少数几个获安全许可阅读它们的人感到眼花缭乱？他们执行凯西的命令吗？或者他们执行以麦克马洪为发言人的该机构的命令？莫特利认为，这些问题没有完整的答案，其答案也逐日改变。因此中央情报局陷于完全矛盾的气氛之中。

莫特利意识到，一个每日改变答案的环境可导致的远不止身分危机。如果不加以稳定的话，结果可能是甚至于一个机构的精神崩溃。它曾在70年代发生过，它可能会再次发生。中央情报局里的一半人似乎紧跟凯西的渴望，服从他的愿望——杜威·克拉里奇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半人似乎有些犹豫——约翰·麦克马洪就是一个，他们在仔细考虑这一问题：这个人的一阵风过去后怎么办？

4月13日下午，星期五，戈德华特前往远东访问。莫尼汉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将布雷惨败的事，提交给了她，因为她那天晚上去参加参议院的会议，因此她是知晓且

判定中央情报局的姿态等于是断然拒绝戈德华特信中的指责。当天下午在接受 ABC 电视台的戴维·布林克雷的采访时，莫尼汉说："戈德华特参议员提出的指责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四或五天后他们仍然拒绝他的指责，因此现在我以我所能表达指责的唯一方式向他们提出我的指责，那就是说，我辞职。"他辞去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

杜伦伯格参议员痛斥凯西，他说："如果信任因子的刻度为 0 至 10 的话，凯西只达到 2。"谈到眼下时他进一步说："我们与凯西开会毫无用处。我们无人信任他。他对待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大而几乎是傲慢的态度使得整个情报委员会都反对他。"

里根总统仍超脱于这场冲突之外。在周末他出席了在华盛顿市中心希尔顿宾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白宫新闻记者联合会非正式宴会。

"有人说白宫的通讯崩溃了是怎么回事?怎么没人告诉我?"一片笑声。"不过，我知道这一点；尽管我曾制定过法律，但从现在起，这里的每一个人只要那类事情发生，不论何时即使在内阁开会中间，也要叫醒我。"又一片笑声。官方的总统文件记载总统赢得了多达 26 次笑声。

他没有提到布雷的事。

凯西在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长时间采访时宣称："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人们会更关心如果中美洲或其任何一部分被置于苏联一古巴控制之下所引起的移民浪潮，而不是有关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的报道。"在周末，中央情报局进行了一次挽救运动，它公布了苏联人和古巴人对本半球构成威胁的数字：在古巴有 10000 多名苏联人，但在尼加拉瓜只有 100 人；而在尼加拉瓜可能有 10000 名古巴人。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曾开会六小时想写出一份可靠的特别报告但未能完成，这些数字是真实的，但数字

无法掩盖布雷这一问题，中央情报局所声称的"对尼加拉瓜港口布雷曾与情报委员会成员和职员及国会其他成员讨论过11次。"也掩盖不了这一问题。

西蒙斯公开痛斥克莱尔·乔治，他说，这位国会联络官有着"与凯西同样的思想……这种相配必然导致长期的灾难。"

在中央情报局，麦克马洪看到事情正失去控制地迅速恶化，使凯西和中央情报局退到了困境之中。现在戈德华特在远东，而莫尼汉正处在敌对情绪中，于是麦克马洪给西蒙斯打电话。麦克马洪作为一名行政官员，知道有可能将这件事平息掉。西蒙斯可能会很愤怒，因为他感到自己像个傻瓜。是的，中央情报局应该通知他，但去发掘也是他的职责。西蒙斯应该从他以前在中央情报局工作经历中知道好的情报——甚至于他有权力被告知的情报，不会拱手送来。西蒙斯需要点振作精神的东西。

"你好，罗伯特。"麦克马洪说。

"你好，约翰。"西蒙斯答道。

麦克马洪说："你看，我们应该降低一下噪音水平了，这对每一个人都有伤害。我们为什么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呢？"他们都将要自相残杀。麦克马洪的意思是他们都有着疯狂的老板，应该由他们来保持船浮在水上不至于沉没——让优秀的职员来收场。

西蒙斯回答说戈德华特受到了伤害，而且有人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些错误的、骗人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责任更正被歪曲的事实。凯西和克莱尔并没有使他们及时得到通报。戈德华特在委员会所费的五年心血被断送了，这五年心血本是为了帮助树立中央情报局的新形象，对它的一切包括资金加以保护，重建两者之间的关系。五年的诚心努力被这一愚蠢的交流断层给破坏了。巴利和我觉得我们掉进了垃圾箱里而且我们整个的人生观——相信别人，相信自己，都被打碎了，西蒙斯说。

麦克马洪说他能理解。碎片应该再拾起来，他对此很有信心。

西蒙斯最后宽厚地说："你搬掉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好吧，让我们一起降低这场冲突的调子吧。"

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人担心凯西在国会的井里"投毒"后，使政府进一步的情报或外交行动变得更加困难。白宫仍主张一项更富进攻性的中美洲政策，但它希望能重新组织这场辩论，使辩论避开讨论凯西的直系即中央情报局和秘密行动。

另一方面，凯西视尼加拉瓜秘密战为精神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央情报局不让桑地诺政权占上风是极为重要的。压力、骚扰、牵制从各个方面打击他们。

凯西害怕的是目前的冲击会导致白宫踌躇不前。白宫是真正的权力中心，他从不想忽略这一点。这给凯西带来了要不停地研究白宫的麻烦。白宫言者甚众，但不难判断总统所要的是除不派美国战斗部队，实际上可采取任何可能的秘密支持行动。但经过下属们的相互争执后，有时事情出台后就走了样。一方面，吉姆·贝克制定了选举年应谨慎的方针，另一方面，巴德·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总是提出新的行动方案。一方面要求停止尼加拉瓜行动，与其恰恰相反，行动方案好像在要求几乎一半的美国军舰去控制尼加拉瓜的各条海上通道。凯西从不过分认真地看待这些，但他也无法抛掉它。无法预测总统何时会采取行动，在格林纳达总统就出人意料地采取了行动。

里根作出决定的被动方式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凯西知道而且很清楚里根的立场、信仰，但说不出里根将干什么。"是的，"总统会说，然后是"不过……"然后又是"不。""是……，不过……不"已成了一个隐喻。还有许多其它变异——开始是"不"，然后滑过"是"而最终毫无结果。吉姆·贝克已完全扣紧了里根应如何作出决定。凯西可以谈出自己的看法，他甚至可以与里根在白宫总统寓所内私下会晤，凯西一年大约二次打这张牌。总统总是

很友好，全神贯注地听着并不时点头。但会晤结束时，或其后，通过贝克或麦克法兰，又会提出不可避免的问题。乔治或凯普是什么观点？这又把舒尔茨或温伯格拉入了这一问题。这是合适的，但随后可能又开始了摇摆不定的拉锯运动“是……不过……不”。

里根无论正式或非正式地并不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或更为重要的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这些通常由麦克法兰主持。里根会得到一份一页的议程表，指明那个人要讲什么及多少分钟。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形势报告上，而决定常常在麦克法兰交总统签署后作出。

贝克和达尔曼手头有每日的电话记录，上面记录了打给里根或里根打出的每一个电话内容，普通电话和保密电话采用不同的记录本记录，由于里根听力有问题所以他不喜欢用保密电话。白宫秘密机构对他的活动和会晤都有记录，甚至于白宫的门房也进行记录。还有一份周末记录本，甚至还有南希社交电话、午餐和晚宴的记录本，南希的有些活动常常不知不觉地进入了里根的生活圈子。在一次简单的问候后与总统的谈话，或者一次很快的问好在来访者心目中会留下难忘的印象甚至于作出一项决定。因此贝克和达尔曼随访每一件事，确保无一漏网。总统对这一制度明显表示满意，无人例外。

但现在，布雷行动暴露后需要白宫作出某些决定，凯西有情报报告显示成吨的物质被运进萨尔瓦多，其中有些来自尼加拉瓜。他敦促白宫注意有情报表明萨尔瓦多左翼叛乱者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秋季攻势。这是强硬的语言，但在选举年时它支配了人们的注意力。

莫特利相信这一情报，但它是支离破碎的，而不是单一的。他告诉凯西：“你所需要的是能最终证实它的30秒钟电视新闻剪辑。”但这一新闻剪辑从没有出现过。

经过与白宫进行了一系列会议与讨论，凯西得到了他所能得

到的最清楚的总统决定。里根同意：在 11 月大选之前，中央情报局可以根据秘密行动计划采取“有节制的行动”。当他按所预期的再次当选时，政府将予以全力支持，通过某种方式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赢得更多的资金，使其占上风并取得胜利。

对凯西来说，一项有节制的行动意味着他将不得不修补国会的某些篱笆，它包含着私下的，逐门逐户的卑躬屈膝。他首先造访的人士之一是参议员理查德·卢佳，印第安那州共和党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也是共和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主席。卢佳说他们处境不妙，而凯西说他已努力使情报委员会每一个成员得到及时通报，但他承认提到布雷时的汇报不令人满意。

凯西想阻止莫尼汉的辞职。莫尼汉在外交上基本上是一位持强硬路线者并对中央情报局很有用。一个更自由的、反中央情报局的民主党人如利伊成为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将是灾难性的。

凯西去莫尼汉的参议院办公室看望他。坐在办公室壁炉旁的皮椅里，这位局长非常后悔。

他明确表示，使参议员们能及时得到通报并使他们满意是他的职责。如果他们不满意，无论他的努力多么诚恳或多么自觉，总是他辜负了他们。他就差没说他的辜负违反了要求及时通知国会的法律条文。凯西说：“我深深地表示歉意。”他又提出了一项私人请求，请求莫尼汉仍继续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莫尼汉感动了。凯西看上去很诚恳——一个多么复杂的人，如此之多的不同个性。无法拒绝这样一次道歉，莫尼汉同意收回辞呈。

凯西最后一个表示悔悟的行动是给戈德华特亲笔写一封磕头求饶的道歉信。

4 月 26 日，星期四，凯西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全体成员会面并勇于承担责任。气氛仍然是紧张的，因为有些成员认为迄今为止，凯西不过是在说没有发生过的事再也不会发生而已。

但凯西很快转变了立场并承认那次汇报得不够，他真希望他没说那么少。他丝毫没有要隐瞒任何事的意图，他告诉了某些参议员，也告诉了众议院。

有人提出了一个布雷本身的问题：它是非法的吗？

“不！”凯西说。

这释放了被抑制的不满，几乎每一个人都猛攻凯西，提出了许多有关法律常识、判断、实际和权限的问题。我们的朋友，英国和法国的船只没有受到水雷的损害吗？为什么政府要事先宣称它不遵守国际法庭对布雷所作出的决定，从而在全世界其它国家面前藐视法律？布雷难道不是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吗？难道不是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心目中成了罪犯吗？

凯西说：“我深深地表示歉意。”

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杰·加恩被激怒了。他觉得那两句话是清楚的并足以满意地通报了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总是回答他的问题，即使他去他们的总部寻找答案时。

“你们都是些蠢货，”加恩叫着说，“你们都是蠢货——整个国会充满了蠢货，所有的535名议员都是蠢货。”

参议员们都站了起来，包括莫尼汉，他想避免进一步的对抗。莫尼汉说：“当你说我是蠢货时，笑一笑。”

加恩后来写信给戈德华特并就搅乱了委员会表示道歉。

会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指出凯西赞成这一估价，即委员会在有关对尼加拉瓜港口布雷和快艇袭击上“没有得到及时的、足够的通报”。委员会和凯西一致同意采取新的措施以保证不再发生此类失误。

在参加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凯西建议它指定一个分会调查布雷问题。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它是怎么泄露的？

委员会成员埃德华·贝内特·威廉对他说:“你是转移方向的大师。你被抓住时手里有确凿的罪证，但你却大叫被抢劫了。”

凯西笑了。没有进行有关泄露的调查。

后来，当麦克法兰到参议院开会时，莫尼汉对他的下述公开讲话即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布雷问题上得到了完整和充分的通报提出了质疑。

麦克法兰回答说:“那么说我所听到的要么是不真诚要么是在撒谎。”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麦克马洪总结了布雷事件:“另外，你们应该向前看，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确保你们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你们确实犯过的话。”

十七

当年春天，凯西在中美洲又有了另一件痛苦的事，那就是墨西哥。墨西哥有7700万人口，是一颗定时炸弹。

尽管康斯坦丁·门杰斯已离开中央情报局，隐于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中，但他的阴影和他对墨西哥即将爆发危机的某些担忧仍然存在。他使凯西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墨西哥或许是与美国交界的潜在的伊朗。没有什么类比能引起比伊朗更强的共鸣了——伊朗是卡特政府最重大的情报失败。

门杰斯指出墨西哥革命时机已经成熟：其政府是危险地反美和反资本主义的，而且其债务危机会导致没收外国投资，它的社会主义"立场"，是左翼极端分子生长繁殖的土壤。

凯西知道墨西哥总统米歇尔·马德里德是政府的心腹之患，马德里德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正迷于其国内的反贪污运动，被称为"道德重建运动"。凯西认为，这是项有价值的事业，但马德里德的真正问题是经济问题及绕在墨西哥脖子上的锁链即它的800亿美元的债务。马德里德的着迷的另一件事是试图让美国和尼加拉瓜谈判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抛弃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凯西反对这样做，而且他对这种干预极为不满，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是根本无用的。马德里德听起来像是一个左翼论坛的教授，鼓吹不干涉内政并指责美国的行动使桑地诺政权更为激进。凯西觉得，这是标准的左倾废话，总是很难接受，而甚至

很难为一个亲密邻邦和想象中盟友所接受。凯西下令增加对墨西哥和马德里德的收集情报行动，并获得了一大批材料。

凯西曾指出尼加拉瓜行动也部分地保护了墨西哥。如果允许尼加拉瓜作为一个典型的左翼国家而存在下去，那么革命的烽火可能会向北横扫。左翼浪潮现在是在萨尔瓦多，但其后就是剩下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了。移民将失去控制——游牧部落总是逃避共产主义，凯西称他们是“步兵”。

他收到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一份绝密报告，这份五页的报告指责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一头蒙在鼓里，不知道墨西哥在发生着什么。该报告的幕后人物之一是安妮·阿姆斯特朗，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前美驻英国大使，生长在德克萨斯州靠近阿姆斯特朗的一个散乱的养牛牧场里，位于该州最南端靠近墨西哥边界。该委员会其它成员突出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墨西哥让苏联人在其驻墨西哥大使馆从事如此之多的间谍活动是一不友好的举动。委员会还聘请了一位70年代末期的前中央情报局墨西哥专家担任顾问，他建议中央情报局应对墨西哥城的情报站予以加强。

这份报告预测将有左翼行动、特别是在艾卡普尔科附近。它攻击了马德里德，称他是一位专家治国论者。这份报告将商人们提供的轶事和流言作为事实，它反映了墨西哥及其人民的一些比较自然的看法。

凯西要求行动处调查一下报告中的事是否是真的。尽管这份报告不是“情报”，凯西对待它还是很认真的。虽然其事实和方法不准确，但其结论可能是对的。

一年前，门杰斯已着手写一份有关墨西哥的特别情报报告，但由于更紧迫的中美洲问题的压力使其停顿了下来。几年来没有做过有关墨西哥的特别报告，霍尔顿是前中央情报局墨西哥情报站站长。但几个月过去了，局长没有看到丝毫进展，他开始责骂霍

尔顿以使这该死的报告得以完成。

一天，凯西怒气冲冲地对霍尔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长时间还未完成，我可以在一小时内匆匆写完。"

霍尔顿安排分析专家布赖恩·莱特尔写该报告的第一稿。莱特尔是历史学博士，是那种凯西喜欢的深入钻研的人。他曾写了一份有关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情报报告，它给凯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份报告中，他说卡斯特罗是一个正通过其推迟了的中年危机并即将完蛋的人，他已无法驾驭那不现实的革命，难以保证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古巴问题专家驳回了莱特尔的报告，指责他写的是心理小说，是情报工作的拙劣模仿。

莱特尔前往墨西哥，用大约一周时间收集第一手材料——这是给分析人员的一笔额外津贴，由于凯西的预算增加了现在可以负担这笔开销。

当其草稿《马德里德统治下的墨西哥》完成后，莱特尔带着它去找霍尔顿。

他对霍尔顿说："凯西认为它可以。"

霍尔顿渐渐地发起火来，凯西作为所有情报机构的首脑至多应该同时得到特别报告的草案，而不是提前，而莱特尔却打破了这一指挥链。凯西的影响可能与他的知识已不相称了。他可以用一句平常的话使这一过程变形，而他也很乐于这样做。凯西的成见可能已操纵了这一特别报告。

凯西有时这样工作，即当他不同意时他会用手指指着某人胸部并大叫："不对！不对！"霍尔顿希望由确切的情报——不附加任何东西，来操纵这一过程。

霍尔顿读了这本厚厚的，非常可怕的特别报告。它提出墨西哥已危险地接近于爆发革命。城市骚乱、农民骚乱，对没收资本的潜在恐惧——投资者和商人恐慌地纷纷离开，商界几乎毫不信任这个贪污盛行的政府。在墨西哥长大的一个重要军火承包企业

的一位高级行政人员表明了他的上述观点，而它们被作为“情报”予以报告。

任何读了莱特尔的特别报告草稿的人，包括总统或国务卿，无法不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即美国以南正处于危险的不稳定之中。这份草稿暗示墨西哥可能会发生爆乱，然后可能不得不要求墨西哥军队予以镇压。伊朗悲剧的重演。

霍尔顿不仅躲了过去，而且他知道文件里的情报不支持这一草稿的暗示。这一报告似乎在推论如果处于像墨西哥人那样的环境，美国人会成为革命者或激进分子的。霍尔顿觉得这是个非职业情报人员所犯的错误，毫无证据显示墨西哥人会像美国人一样行事。

这一报告草稿中最令人惊恐的暗示是苏联人和古巴人正在墨西哥悄悄地建立组织；或许很快将建立组织。

霍尔顿知道凯西想要一个令人惊恐的文件以便使白宫和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不再打扰他，他想要显示墨西哥是脆弱的，凯西不明白墨西哥的传统信仰是干涉别国内政，没有哪 位墨西哥总统会在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上支持美国。

在霍尔顿表明了他的担忧后，凯西争辩说：“你对常识感兴趣，你是在辩论常识。”

霍尔顿回答说：“这些结论——总起来说及各个部分，没有得到情报的证实，他们不应出现在特别报告里，特别报告是一个被歪曲的产物。”

凯西说：“等一等，它应该包括某些观点。”

霍尔顿说：“也包括流言和轶事；某位经过墨西哥城或在艾卡普尔科度假的商人的想法不是情报，甚至也不是‘软’情报。”

凯西说霍尔顿想抹杀证据。

霍尔顿强硬起来，这是最严重的指控，他表示了不满。

凯西挑战性地说：“墨西哥可能成为下一个伊朗。”

因而，在凯西和霍尔顿处理日常业务时，两个人之间开始了一系列几乎是逐日的讨论和争吵。霍尔顿决心把草稿中所有没有确切情报来源的东西都删除掉。或许里根政府喜欢在主观的“觉得”和“听说”及共和党俱尔部和筹资者零散对话的基础上制订政策，但霍尔顿不会让这些因素搅进情报特别报告上去。

霍尔顿得到一份凯西的长篇备忘录，凯西想再把一些材料加回到正在形成的特别报告里。随后又来了第二份凯西备忘录，霍尔顿肯定这是门杰斯写的。这是凯西的标准战术，如果他不喜欢某份文稿或报告的草稿，他就会把它拿给非正式的保守派顾问小组并要求写一份备忘录。如果他喜欢这一备忘录，他就会以他的名义传送。

这一备忘录引用了有关农村不满、墨西哥贫民区骚乱、一个边远地区古巴支持的组织活动等情报，其中大部分是无直接情报来源的，因而霍尔顿相信没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

情报助理鲍勃·盖茨主张走中间道路，但霍尔顿认为中间道路不能成立。这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费尽艰辛得来的确凿情报的问题，要么它最有影响，要么它被流言或臆测所完全歪曲，而且霍尔顿看到了更进一步的并发症。凯西把霍尔顿的对抗理解为他在推荐另一项政策，凯西压倒一切、最关心的政策是尼加拉瓜行动。墨西哥的动乱恰好符合他的这一政策，而一项不保证墨西哥会出现动乱的预测不符合他的方案，这项预测暗示马德里德将长期在位。如果共产主义的浪潮和随之而来的移民狂潮只是个遥远的问题，那么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也就不是那么紧迫了。

每当提及特别报告，凯西就变得更加烦恼。这些特别报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其它情报机构可以表示反对，这已经足够了。而一个分析专家，甚至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情报官如霍尔顿，居然能挡这么长的路。

现在霍尔顿掌握了这一草案，而他不愿意写任何未得到确凿

情报支持的内容。为了在情报首脑们参加的国家国外情报委员会会议上拿出点东西，凯西最后同意传阅一份霍尔顿重新写成的草案。

凯西的助手之一赫伯·梅厄，是现在负责监督特别报告的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给所有的情报机构首脑打电话说将送去一份特别报告的草稿。这些情报首脑们已从其代表那里听说了霍尔顿和凯西即将相互厮杀，因此他们对这份草稿十分感兴趣。

这次会议于4月初（大约是参议院就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而爆发风潮的同时），在F大街情报界总部召开。该总部是一座荒凉、独立的大楼，与老行政办公大楼相隔一个街区。霍尔顿做了口头概述，说墨西哥有危机但没有真正的崩溃迹象。

凯西说，这份草稿带有自鸣得意的看法。他补充说，而我很担忧，这份草稿不包含有可能发生的事。我希望我们能对墨西哥将崩溃的可能性作出最出色的估价。他清楚地表明他认为墨西哥危在旦夕。

国务院的代表担忧地表示，他们应该注意其它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和巴西。这两个国家负有沉重的外债，他们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讲话集中在苏联在墨西哥的积极行动上。在墨西哥的克格勃据点是苏联潜入美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主要发射台。墨西哥实际上是克格勃间谍的安全区，他们可以从那里较容易地实施对美的间谍活动，有新的情报表明中央情报局已识别出在墨西哥外交办公室工作的几名苏联间谍，而墨西哥人并未表示相应的关注。

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说这与墨西哥不稳定毫无关系，讨论的主题是这份特别报告。

有人指出它表明了苏联人的影响在日益增加。

商务部的代表，一位暂时在该部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分析人员

似乎随时准备跪倒在凯西脚下，霍尔顿觉得这是讨好的表演。

财政部也持有悲观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关心债务危机。美国银行借给墨西哥的资金达数十亿美元。

军事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陆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情报机构，只对墨西哥局势表示了有节制的担忧。墨西哥总共只有12万人的军队，其军事战略意义不大。

除了联邦调查局、商务部和财政部——这些最不重要的情报机构，凯西几乎是单枪匹马。他决定强行解决这一问题。

他敲着桌子说："我想对墨西哥完全混乱的可能性进行一次投票表决。"他个人认为墨西哥是否会崩溃的可能性各占50%。绕桌一圈，凯西只得到原来三个机构的支持。

凯西说："我由此 认为你们觉得墨西哥大约五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崩溃，并寻求中间道路。"

凯西命令重写这份特别报告，把那些数字——20%的崩溃可能，加到特别报告里。他无法向总统提交一份不提这种可能性的特别报告。

霍尔顿确信职业人士的观点是倾向于他这一边，凯西之所以得到20%的支持是因为他是会议主席。

会后，凯西对霍尔顿表示厌恶并指示赫伯·梅厄重写重要的估价。

霍尔顿向盖茨表示了自己的不满，盖茨允诺要密切注意梅厄的草稿。但霍尔顿自己很快就投入了梅厄改写稿之中。他改正历史的错误，降低那些较激烈言辞的调子。这一特别报告不会成为凯西所需要的"世界末日剧本"。最后的草稿完成的多少带点皆大欢喜的味道。几个军事情报机构注意到他们的反对意见被放在首页一个显眼的脚注上，它说情报不支持这一判断，即墨西哥有20%的可能性爆发革命。

最后的绝密的改写本，被送给数百名官员，可能只有几十个

人读它。而霍尔顿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意义。一个具体结果将是更多的中央情报局行动官员被派到墨西哥对付苏联人，而该特别报告并未打算提出这件事，但霍尔顿觉得至少这一过程是真实的，不过，他想它想得越多，就越烦恼，它的完成也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在国家国外情报委员会后，凯西向他道了歉，但他们的私交结束了。凯西怀疑他，他也不信任凯西。

在受伊朗事件震惊后，中央情报局认为它可以通过预测革命、崩溃和灾难来保护自己，这条路永远不会“错”。但如果其特别报告老喊“狼来了”的话，也永远不会“对”。

伊朗留下了一个可怕的伤疤，比霍尔顿起初想象的还要糟糕。他曾听凯西警告拉丁美洲情报站站长们，“寻找阿亚图拉——一个表现出可以领导愤怒的群众的人。”这一想法仍对中央情报局有很强的传染。

霍尔顿对凯西还有其它的不满。美国驻巴拿马的南方司令部司令保罗·戈曼将军曾报告，由于杜瓦特总统命令忠诚的军官要保持高尚的人权记录，萨尔瓦多的局势有所好转。

凯西问霍尔顿：“为什么我们的情报没有显示这一点。”他命令进行调查。霍尔顿向凯西汇报说这一情报在《国家安全日报》上，已向高级官员们传阅。

凯西厉声说：“没人会读那垃圾。”他的意思是说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些真正有考虑价值的人，不会太注意《国家情报日报》。这是句漫不经心的话，似乎那绝密的《国家情报日报》不过是在情报流中的旁枝。当然可能凯西的意思不像他字面所说的那样，他是那些总想限制接触《国家情报日报》、保护照片并对《国家情报日报》的片断出现在新闻媒介上表示不满的人员之一。但这句话反映了他感觉迟钝和发泄日常的不满。凯西手下的人对《国家情报日报》的工作非常努力。如果局长很随便地称他是“垃圾”，那么他很可能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这

话，这一看法可能已经到了那些为《国家情报日报》累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那里。

在霍尔顿担任拉丁美洲国家情报官以来的一年中，他对某些其它情报工作也很不满意。凯西要求对古巴境内的卡斯特罗的反对派作一个估价，霍尔顿得不到太多的确切情报，这是因为反对派根本就不存在。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情报员不足是真的，但霍尔顿推断也可能卡斯特罗在国内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这又不合凯西的口味，他的反应是怀疑性的，似乎他认为蔑视共产党是全球性的。卡斯特罗肯定有反对派。但凯西是冷静的，自信的直觉代替不了真正的情报。

这是个理智的装饰。当有人给他的情报支持他的预想或政府的政策时，他表现得既高兴又饶有兴趣。

恰在阿根廷前年大选以前，霍尔顿接受了写一份《国家安全特别报告》预测大选结果的任务。霍尔顿对凯西说，看上去好像这个家伙，劳尔·阿方辛，一个领导着称为激进民权联盟的政党的中间偏左的律师要赢。凯西咕哝着问了一个问题，霍尔顿随后说看起来阿方辛的胜利对经过八年军事专制统治的阿根廷是有利的，但假如从他的中间偏左的立场看来，它或许对美国不那么有利。

凯西盯着霍尔顿问："他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吗？"

霍尔顿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这位局长所问的唯一问题。

阿方辛赢得了大选。

几天后，那份墨西哥特别报告进行传阅。霍尔顿去找盖茨，并说他将辞职，但将呆到他们找到继任者为止。但什么事也没发生，也没出现继任者，于是霍尔顿再次找盖茨，并说："看，我的合同期是到5月底——我为什么不计划那时走。"盖茨说可以。

霍尔顿觉得有些失望。或许这是不公平的，但他发现了一则他认为很合适的隐喻：凯西像是一家大公司的新任总经理，他来

到公司就开始榨取他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然后把它扔到一边。凯西肯定认为自己是个战略情报局的老行动者。并对情报工作有着很深的感情，但如果中美洲的炸弹要挂在某些人的脖子上的话，那一定是挂在凯西或里根的脖子上，这些炸弹会在中央情报局内流传。现在正在种下对政治和社会发展产生强烈的不利反应并导致丘奇和派克委员会调查重演的种子。

霍尔顿知道凯西一定被认为与许多人保持联系，但几乎所有人都与霍尔顿对世界有着相同的看法，如墨西哥问题所表明的那样。霍尔顿曾花了几个小时坐在凯西的办公室的书桌前，谈论一件又一件事。凯西对人太粗鲁，对霍尔顿即是如此。

他认为凯西没把重点完全放在中央情报局和它要求独立上。中央情报局又一次成了政府决心将其观点强加于世界的工具。有许多变形和手法，其中有些是阴险的。霍尔顿觉得他再也无法在这个大门里坚持下去了，他不想成为一个牺牲品。这取决于个人，另外有些人对待凯西非常圆滑，盖茨即是这样，对他来说，作一些甚至许多妥协或许根本算不了什么。

霍尔顿决定离开的原因中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他很难估价其含义，但它不是他与凯西合不来，而是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个恶霸。

在使我怀疑自己是否被“灌输”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卡扎菲的汇报会十天后，我飞往的黎波里。像许多访问者一样，我为与这位利比亚领导人的约会等待了几天。最后，他的翻译之一走进地中海海滨的巴伯·艾尔巴哈宾馆20层我下榻的房间隔壁，我们在那里坐了大半夜，聊天、读书、等候，疲劳使每个人都松弛了下来。当我们走出宾馆在海边凉爽的微风中散步时，这位既高又结实的翻译说他特别对一次镇压国内不满而极为激动，他说当月有23名学生和持不同政见者被吊死。他补充说，现在有数千名因说

反对革命或卡扎菲的话而被关押的政治犯”

我接着说："怎么会有数千名?”

“是数千名，”他强调地说，“我告诉你确实是数千名。”这个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我们期待着一些事情会发生。

我对他说我曾发过一篇报道谈到在的黎波里大学有两名学生被吊死，在校园里竖起了绞刑架，数以千计的学生被命令前去观看，许多人呕吐并尖叫着跑开了。

大约凌晨5时，有人告诉我说当夜不会有什么采访。第二天，我又等了大半天，我之所以能保持耐心只是因为卡扎菲的翻译一直同我在一起，实际上等于软禁。

在隔壁，这位翻译似乎同我一样沮丧，他拉我走到大厅里。

他对卡扎菲很愤怒，叫着说："我希望你能见到他，你会看到他是如何的渺小，除此之外，他是多么的疯狂。”他伸出食指指向自己的太阳穴，表示卡扎菲是精神错乱。

我说："疯狂?”

他说："他是个疯子，”然后将拇指和食指分开成一个“八”字，“一个傻瓜。”他说着似乎要显示他掌握了俚语。

我说卡扎菲服用安眠药及其它药物，他描述了卡扎菲的无法预测的生活、隐士风格和半神半人的形象。

这等于是中央情报局官员曾为我描绘的画面的翻版，不仅语言、有关安眠药及其所有其它的描述是如此，而且一方面嘲笑和讽刺的态度，另一方面怀疑和吝啬的尊敬也是同样。似乎这位同卡扎菲一起已呆了数百小时的翻译及那位花了许多时间研究卡扎菲的中央情报局官员都有着相同的经历。

我在考虑这位翻译是一名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可能性，那样的话这就是一个圈套。否则中央情报局和翻译都是对的。

但我的公开吊死报道的一份副本落到了利比亚外交部手里，于是我被带到机场并送回美国，速度之快几乎相当于被驱逐出境。

回到华盛顿后，我们发表了一份有关利比亚的长篇报道。这位翻译及中央情报局的有关安眠药的消息被连在了一起，这篇报道以《据说卡扎菲的权力正被削弱》为标题在那个星期天发表。

5月8日，离开利比亚两周后，我正在《华盛顿邮报》报社时从利比亚传来了通讯社发出的紧急报告，它说发生了一次反对卡扎菲的军事政变，包括对他的“凯旋门”兵营进行了一次袭击。报告说在的黎波里市中心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并持续了数小时，一份不确切的报告说卡扎菲已被杀死。

当这些报告被送至兰利后，很明显这是利比亚在向卡扎菲当政15年来最大的一次政变企图。而且，利比亚境外的反卡扎菲势力与境内的反对派第一次明显地联合了起来。当三个策划者在突尼斯边界附近被捕后，这次政变企图被挫败了。他们遭受酷刑并使卡扎菲军队逮捕了15名隐藏在的黎波里准备袭击卡扎菲的反叛者。

由苏丹总统尼迈里向策划者们提供的支持至少帮助开始了一些行动，尽管它遭受了挫折。

凯西作结论说：“这首次证明了利比亚人愿意不惜生命来除掉这个杂种。”他命令立即对卡扎菲的脆弱性加以估计。到了采取更多的行动的时候了。

凯西很担忧他即将在个人财务问题上受到又一次公开调查。国内税务局正对他以不友好和官僚的方式缓慢地处理信件和通知的行为进行追踪调查。国内税务局要求凯西重新支付在其70年代末进入中央情报局之前所减的某些营业税。正常情况下，在纳税人和国内税务局之间的上述争执是保密的。但凯西的某些合伙人在税务法庭上向国内税务局的指控提出异议，这就公开带出了他的名字。

这个方面的公开批评最令凯西激怒，大部分就是不懂资本系统。像许多事一样，远在他在战略情报局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

就懂得了这些。那时战略情报局进行了一项重要而又简单的收集情报行动，要求美国公民把他们在欧洲度假时的照片，尤其是在港口和海滩的照片交来。一位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将这些照片制成缩微胶片并贴到计算机卡片上。它都是用手、浆糊和剪刀来完成的，但这些文件提供了所有港口和海滩的现成参考资料，因此同盟国的军队至少在空投特工、突击队袭击、登陆或轰炸前有了某些依据。在战争期间一位商人给凯西心中播下了种子即这一缩微胶片系统将会有无穷无尽的商业用途。

战后，这位商人找凯西并投了资，凯西雇用了波士顿的一家工程公司制造了一部可以进行剪贴工作的机器。后来凯西成立了一家胶片剪辑公司，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小公司来推销这种机器和技术。1949 年这家公司被卖掉了，凯西的股份是几十万美元，当时在战后的日子里这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产，这是他挣的第一笔钱，他拿出 5 万元买下了在梅克诺尔的寓所。

从那时起，凯西花了很多学费研究未来，寻找别人没有发现的用途和联系。他本可以将他的资金全部交给大的证券交易公司，并可以过太平日子，不担负任何管理角色，没有任何争执与法律纠纷。但他却把资金分别投到了一项用微型潜艇挖掘沉船财宝的冒险计划、一个进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地毯的公司、一项将税收计算机化的工程、一个房地产规划公司及一个网球股份公司。

他的投资集团之一决定制作一种能直接用来向计算机里输入信息的笔，凯西作为 1%股投了 95 美元。这个集团名称是潘沃特股份公司。以 400 万美元的价格，另一个公司买下了这一保密技术，但只付了 10 万现金，其余 390 万元为票据，指明只有在该笔生产出来并投入市场后方能兑现。为应用这一技术，潘沃特公司四年里亏损了 600 万元。作为 1%的合股人，凯西以其 95 美元的股金却获得了减税达 6 万美元——这是国内税务局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一事件具有潜在的爆炸性——中央情报局局长得到相当于他投资600倍的减税，司法部长威廉·法兰西·史密斯不过是因为获得四倍于投资的减税就受到了责骂。

5月10日，凯西给我打电话，谈有关查克·巴伯考克的调查问题。巴伯考克是邮报派到我的办公室的一名记者，他正进行调查凯西与国内税务局的乱子。凯西承认，是的，他可能漏交了10万美元的税款，但那算不了什么。他说，他将很高兴交这笔税款，并承受的起。

巴伯考克写了一篇有关凯西漏税及其调查的长篇报道，题目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对国内税务局提出他漏税十万美元表示质疑》。

其后在纽约税务法庭的一次听证会上，凯西作证，对国内税务局的律师指控他曾与这一生意其它合伙人签订协议“出卖减税”予以了反驳和质疑。

他说：“我将乐于接受除了说我买股份是为了减税以外的任何看法，我买的是它们的未来……但说我是为了减税则是无耻的歪曲。”他指出是他写了第一本有关保护税收的书，1952年出版的《保护税收的投资》，“这整件事是我开始作的，”他说着，笑了笑，补充了一句天主教赎罪术语，“当我担任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主席时，我就已赎回了我的罪过。”

国会或新闻界没人有胃口再次调查凯西个人财务的乱灌木丛。凯西感到很意外，想不到公开和坦率一点却帮了大忙。

尽管国会正在阻碍政府所请求的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再提供2100万美元的计划，但凯西觉得没有一个当选的官员尤其是民主党人在里根总统受欢迎的年代里会希望出现凯西所称的“丑事”，即抛弃尼加拉瓜抵抗运动。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他就极力宣扬这一主题，同时他还敦促总统和麦克法兰打这一张政治牌。然

而他知道国会什么都干的出，推迟是可能的，政府需要一项替代计划。1984 年 3 月 27 日他写了一份“仅供阅读”的备忘录送给麦克法兰，备忘录中写道：“考虑到今年剩余时间里获得追加拨款以支持尼加拉瓜秘密行动可能有困难，我完全同意你们应从沙特、以色列或其它国家探索替代资金。”

“最后，在查阅了有关法律后，你可以考虑找一位合适的美国公民建立一个基金会，”它将接受非官方的资金。

凯西在这份备忘录上署上一个大大的“C”，亲手拿着它去白宫交给了麦克法兰，并要求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看完后还给他，不应有任何副件，不应给其他人传阅。

凯西知道麦克法兰并不十分信奉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他只是追随到总统所坚持的程度。麦克法兰只是另一个运动员，不是裁判、也不是领队。凯西可以走自己的路。

在回兰利总部的路上，凯西给办公室打电话，说当他回去时他要求有关尼加拉瓜行动的重要人员等在他的办公室里。在挂上大衣和帽子后，他静静地坐在他的蓝色转椅里，拿起一份剪报并开始打开看着。

他最后终于开始讲话了：“你们知道吗？孩子们，白宫将就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作出某些决定。关于尼加拉瓜我们有什么新情况？”

一些战场的详情呈送了上来，包括一些有关桑地诺政权行动的分析要点。

他说：“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某种该死的思想库吗？我告诉你们尼加拉瓜行动将成为日程安排的首要任务……现在让我们判断一下总统将需要什么，然后算出如何完成它。”

查克·科汉是行动处近东科科长，被称为“哈瑟维·舍特先生”。他细长的身材，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除了眨眼外他从事

各项运动。

他现年56岁，在中央情报局服务期间，曾在印度、刚果、苏丹担任过行动官员，并在摩洛哥担任情报站站长。他194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1950年冷战期间，跟随第二次浪潮涌入了中央情报局。他有着冷淡、完全职业化的握手，眼睛看上去像个侦探，他脸上的一条不长而很难觉察的疤痕更增强了这一效果。

作为一名科长，其在兰利总部的职责并不都是读读电文及向情报站发出命令，它还包括与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之间的联络工作——获得好的情报和政治资料的渠道。这些纽带关系与该领域发展的任何情报渠道都同等重要。

科汉的秘密渠道之一是与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王子的关系。班达尔现年35岁，是一个浮华、潇洒的花花公子，他是沙特很有权势的国防大臣之子，是新型大使的范例——活跃、可爱、渎神。这位前空军飞行员属于那类阿拉伯传统的叛逆者，他手里挥舞着雪茄，粗声大笑，并在其私人办公室里给客人们用纯银盘子端上他喜爱的麦克唐纳大汉堡包。

在卡特任职期间，班达尔在任驻美大使前就通过总统助手汉密尔顿·乔丹建立并培育了与白宫的联系。通过乔丹他总是可以获得为沙特阿拉伯发言的机会。现在里根当政，情况就不一样了。班达尔意识到权力分散于各部门及白宫各派系之间，即使里根政府的政策倾向于亲以色列，尤其是国务卿、白宫，他通过科汉而获得的非官方联系也是重要的。

作为大使，班达尔有非同寻常的活动余地，他有权接近大笔财产。在沙特王朝，没有议会、法院或监督委员会进行二次评估。国务院很清楚这一点，当国会可能阻挠它需要的某些行动时，它就会去向沙特请求给以军事或经济协助。如果这些行动与沙特的外交政策相一致，它常常会得到协助。沙特人即得到了它们帮助的国家的信用，也得到了美国的信用，它们的美元起了双重作用。

在情报领域里，这种安排的机会是诱人的。例如，沙特人正在帮助埃塞俄比亚境内反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抵抗力量。对沙特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极左翼的共产主义分子，尤其是仅仅隔红海相望的埃塞俄比亚的共产主义分子。中央情报局和凯西对此非常高兴。

中央情报局和沙特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总起来说是好的，其关系可追溯至当极为富有的传奇式人物卡迈尔·阿达姆任沙特情报首脑时。在1970年，沙特人向当时的埃及副总统定期提供报酬。无法确定在这些安排里何处沙特利益终止而美国的利益开始。

现在，1984年春季，科汉即将离开近东地区。在与班达尔告别谈话时，他几乎是随便地提到了凯西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争取资金非常困难这事。科汉回忆起上回《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暗示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科汉问班达尔是你安排的那篇报道吗？是不是沙特大使馆提供的消息？

不，班达尔说。

科汉说，它可能是个试探舆论的行动，其它地方的有些人正在暗示某种利益，它肯定会有帮助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只需要2000万到3000万美元。科汉补充说："这是微不足道的。"他提到良好的愿望与美元之比其比值可能是最高的。

班达尔说除了《邮报》文章以外，他未听到过任何建议，而《邮报》的文章听起来似乎是中央情报局或政府写的。事实上，那版文章说凯西正在考虑是否向另一个国家如沙特阿拉伯请求协助，对不对？

科汉说中央情报局并没在请求。

班达尔得到了要旨，他说他将向利雅得最高层核查看是否包含沙特的利益。他说，"让我们得到个官方的答复吧。"

几天后，班达尔大使收到利雅得发来的否定的答复。其理由如下：

· 中央情报局无法或不会给予任何回报，或者至少它并没有暗示什么。

· 沙特阿拉伯在中美洲的政策是与美国是不一致的。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权基本上是亲阿拉伯的，而美国支持的两个政权，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最近卷入了无疑是反阿拉伯的外交行动，两国将其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了耶路撒冷。

· 沙特对里根政府能否保住这些秘密没有信心；沙特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任何秘密援助都有可能泄露并给双方都带来麻烦。

班达尔向中央情报局传告不能这么做。但中央情报局与班达尔一致同意，由于这一切都是探索性和非官方的，因而就当是中央情报局从未提出请求，而班达尔也没说这些。

班达尔还接待了其他有关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问题的使者。美国大公司的两位主要行政官员要求他捐献点钱，班达尔说不行。退休空军少将理查德·斯考德的一位助手来问沙特是否可以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帮助。斯考德是参加过老挝秘密战的老战士，现在经营一个武器运输网。班达尔说："你能直接向他传递一个信息吗？"他认为斯考德是一个傲慢的人。这位助手向大使保证他可以做到。班达尔说："告诉他，叫他这个混蛋亲自来。"

拒绝的基础工作小心地完成了，班达尔与麦克法兰在一起呆了许多时间。前段时间他们一起秘密前往中东，而且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面考察双边利益的各个方面。班达尔断定，麦克法兰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基辛格的影子下行动并遭受无休止的不利的比较，因而他明显有着自卑心理。但作为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麦克法兰非常忠诚，他是总统的人，是里根的保护者，也是最接近真正的总统渠道的人。

一天晚上，麦克法兰与班达尔单独在玻璃暖房里喝酒，它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布班达尔的庞大寓所的后面。麦克法兰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陷入了困境，资金花光了，结果将是总统的巨大政治损失。美国在该地区的朋友，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将感到失望，拉丁美洲可能会解体。

班达尔表示赞同。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缺乏连续性感到迷惑。为什么在不能维持的情况下会作出承诺，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作出承诺？

当他们继续谈话时，麦克法兰觉得班达尔愿意帮忙，而班达尔则确信麦克法兰在请求他帮忙，这是一个双方都不会放过的机会。他们几乎要拥抱起来，他们很快一致同意沙特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 800 至 10000 美元，利率为每月 100 万美元。但它必须最秘密的进行，并将成为两国及其领导人无论何种情况下都将保密的一件事。

班达尔很清楚国家安全局能够截获他的外交通讯，于是他派了一个信使给法赫德国王送一封信。

当月，伊朗正在增加对波斯湾石油运输的威胁，因此班达尔去找舒尔茨。里根总统很快给法赫德国王发了封信，重申在沙特与伊朗的任何冲突中美国将支持沙特，法赫德和班达尔还想要数百枚先进的“毒刺式”地对空导弹，但在谈判过程中美国对这笔交易施加了一些限制。法赫德给班达尔一封七页的秘密信件，并严格指示班达尔将此信直接交给里根总统。在白宫，里根读完信后说：“我们不给朋友附带条件。”

总统随后引用武器销售紧急程序绕过了国会，至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400 枚“毒刺式”导弹秘密地空运至沙特阿拉伯。

班达尔随后飞回沙特阿拉伯，在国王批准后，得到一张 800 万美元的沙特政府支票作为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秘密援助。麦克法兰从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手诺思中校那里得到了一个尼

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银行帐号，这个帐号是凯曼岛BAC国际银行541—48。6月22日，星期五，麦克法兰和班达尔在白宫会面，麦克法兰将一个打有帐号的卡片交给大使。为了保密，班达尔说他将亲自去瑞士日内瓦，并通过一家瑞士银行转帐，他在日内瓦有一栋住宅。他们一致同意这笔钱一上路，班达尔就传个话过来。如果他们不得不在电话里提及这一行动，他们也商定了一个代号，并称之为交付“香烟”。

班达尔于6月27日抵达日内瓦，并要求瑞士银行联合会一位官员来他的家中，在那里他把800万美元沙特支票及凯曼的帐号交给他，他说他要求每月向凯曼的帐号透支100万美元。他指示将这800万美元存在瑞士银行联合会的总帐号里，并从这里透支，这样就不会追查出它的来源。

与此同时，麦克法兰对这一拖延感到非常担忧，他给班达尔打电话说：“我的朋友没收到香烟，而他是个大烟鬼。”

瑞士银行联合会花了一周多时间来清理沙特支票，7月6日转移了第一笔100万美元的款项。

麦克法兰给总统送了一个卡片，通知他沙特现在正在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总统表示深深的谢意。在随后八个月时间里，沙特将这800万美元汇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

在与凯西和克拉里奇讨论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作战和后勤的紧急要求后，诺思写了一份秘密的备忘录呈给麦克法兰，要求去中美洲。麦克法兰签了自己的姓名的首写字母“RCM”表示批准，并写道：“行踪绝对保密。不要进行显眼的会见，不要让新闻界知道你在哪一地区。”

·

凯西对以色列有影响，他曾给以色列人更多的接触美国卫星侦察照片的权力，比他们以前所能接触的要多，以色列人很感激。

它的情报机构一直注意收集既有价值又有效的礼物回报凯西和美国。它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为调整公众和政治家的观点，指出新闻媒介报道尼加拉瓜常常要比报道苏联还要多。

以色列官方已否认它正在帮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但报道仍然在继续出现。没有比以色列掩藏情报和其它秘密更好的国家了，很明显以色列情报机构已得到国会和政府的信任，寻找某种方式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悄悄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武器和资金——或许通过一个南美中间人。但得到信任并不能证明他们实际上做了某些事。

当巡回采访时，我最终找到一位地位较高的以色列消息灵通人士，他说是的，它正在进行，"是的，当然"它正在进行之中，——这是个绝好的机会——重要、清白而又便宜。这位人士补充说，而且美国会在对以色列现有的每年 25 亿军事和经济一揽子援助中寻找某种方式予以回报。如果这种回报不是钱，比如说国会可能在这方面有"技术"问题，那么它可能会以其它形式予以回报。这位人士只提到他所说的回报中有些被称为"凯西的礼物"。这不仅仅是卫星照片而且是一大批情报，以色列仍不能得到先进的 KH－11 卫星上发回的即时情报，也不能和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延长卫星分配给以色列使用的时间。

这位人士指出，美国还没有意识到即时战术情报的真正意义，而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以色列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以色列人来说，共享情报比正常外交途径，即外交部到国务院之间的走廊要同等或更为重要。

他说，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任何帮助都将予以掩盖。过多的或过于显眼的成功等于失败，中央情报局和凯西不想看到暴露引起的严重危险。如同私人事务可以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一样，也有些能够而且只能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朦胧的，不能读的事情，仍然无法看到。它公然反对阐明真相而且也承受不了阐明真相。但

它是真实的，尽管毫无细节，而他自己已也不知道细节。

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他说，有些事情不需要任何细节。例如，以色列向洪都拉斯出售武器，而那个国家反政府游击队正在活动，这答案是明摆在那里的。

是真的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说，这个答案将是更加迂回的，以防止其变得太明显。他又说，这一转换连那些中间人都可能不知道他们为谁工作，或他们为谁送资金和武器，或他们把货物交给谁。

我给凯西留了个电话，他很快打了过来。我说我通过可靠的消息了解到中央情报局让沙特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这一途径。

“完全未经认可。”

那么以色列是怎么回事？

凯西说：“进行了许多对话，但那种性质的对话决不是官方的。”

那么有关以色列前军事情报机构首脑萨盖伊及那些卫星照片怎么回事？

凯西说：“他是个好伙计，我对他很熟。”

照片呢？

“这些关系……，我不想谈它。”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现在从哪搞钱？上个月曾绝望了，现在又充满信心了。

他说：“我们没有绝望。”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不想放弃斗争。”

但那代替不了资金。

“多次到各处乞讨。”

如何乞讨，何处乞讨？

"我们不应该知道。"他没有更多要说的了。

他们能度过吗？你呢？上个月所有人都绝望了。

凯西说："谈'绝望'是一种夸张。"

凯西怎么能这么说呢？中央情报局已证实到本星期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资金将耗尽。

"这是人的本性，"他回答，并提出了他的危机理论。当有一个问题或坏消息，人们会过度反应的，常常做得太过分。过一段时间，他们会集中注意力于解决问题上。——这是个心理变化，而不是外表的变化。他似乎要把这一理论应用到他自己和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身上。

你将来能从国会那里得到那笔2100万美元的资金吗？

他说他很有信心、充满希望。他又说："民主党人们不想负这个责任，"它是"在棋盘上不表达的因素。"

在另一方面，凯西说，这些因素之一是政治上的恐惧。就在昨天，民主党人们还尝试了一条妥协途径——"保释金"，拨出数百万美元的解雇费以有秩序、人道地撤出，并重新安置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但政府和中央情报局不会赞同这一点。他再次介绍了有关萨尔瓦多境内叛乱者即将发动"秋季攻势"的消息，有迹象表明它将是"非常强的"和"早的"。

第二天，5月19日上午，在《华盛顿邮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中央情报局寻求第三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援助》，它不显眼地提出了沙特和以色列可能正在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第三段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强烈否认："我们没有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任何资金，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式。我们从未有意识地或故意地给予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任何东西……我们不是美国的代理人。"

同我谈过话的那位以色列官员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很高兴几乎得意洋洋。他说那篇报道很公正，显然我准确地报道了人们说

的那些事。他好像在电话另一端眨眼示意。这一报道对以色列人是极有利的，他既得到了信任又进行了否认——分别对他们在国会和政府的亲尼反政府武装及反尼反政府武装的盟友们强调了这一点或那一点。

中央情报局发言人乔治·劳德打来了电话，他本人也很高兴，但只是希望就报道传递一些看法，当然是以最友好的方式。他说，这篇报道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干这件事”。中央情报局没做过这种事，他们没有以官方的或非官方的方式接触沙特人及以色列人，或其他任何人。“它只是并没有发生过。”中央情报局不是在发表一份声明并且不希望发表在报纸上。他只想单纯传递这一“事实”。

我对劳德或许不知道凯西和科汉在干什么一点不感到意外，我不想提及我曾与凯西谈过话。我对劳德说我确信自己的消息来源是正确的。

他说它不可能是正确的。他曾彻底检查过，同每个人都谈过，并同上峰，包括“那个人”，那个大人物谈过。

他是谁？

劳德很不情愿地说，是麦克马洪，并暗示他有着最高一级的权力。

你还同另外什么人谈过吗？

为什么你不进一步检查呢？

其后，我试图很快地把话题绕过凯西，但已经晚了。

哦，我明白了，劳德说，他自己已掌握了要旨。从他的沉默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在说他意识到了他有一个无法控制的局长。

因此凯西不仅自行指挥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行动及一些筹集资金的活动，而且他在亲自操纵他个人的公共关系办公室，他甚至不告诉麦克马洪他在干什么。

几天后，5月24日，凯西在兰利总部迎接乘直升飞机到来的里根总统。春光明媚、喜气洋洋的凯西陪同里根同坐在凯西219英亩“校园”中的一个充满阳光的山坡上的约2000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会面。

总统前来是参加该总部的一项耗资达1.9亿美元的扩建工程奠基典礼。这一增建工程常常被称为“凯西纪念馆”。中央情报局的扩展，尤其是对计算机和资料库需求的增多，需要建一幢七层大楼。里根、布什和凯西象征性地挥锹添土，为该工程奠基。

在奠基仪式上，里根对凯西说：“你们所做的工作，你这位局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们所做的工作，是对你们的美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的极大鼓舞。”

凯西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向他继续施加压力非常恼火。他们要他就仍被视为重罪的尼加拉瓜布雷行动写出正式“投降书”。委员会逼他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这位局长要将正在进行的重大或秘密行动的任何细节或任何总统批准的事情提前通知委员会。在莫尼汉的极力驱使下，该协议说中央情报局将做到以下几点：

・每当一项新的总统指令签署后，向委员会提供广泛的书面材料，包括概述该秘密行动的确切性质、目标及危险的行动方案的支持性细节材料。

・将一项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的新活动通知委员会。下列均属于新活动：该活动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该活动如果公开可能会产生的新的相反的结果；该活动改变了行动的范围；该活动卷入了新的美国人；或该活动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或总统的批准。

・定期向委员会提供所有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的最新情况，并且每年1次全面汇报所有秘密行动。

・对委员会表示特别感兴趣或有保留的有关中央情报局活动的问题向委员会进行报告。

戈德华特和莫尼汉于6月4日签署了这一协议并要求凯西立即签署。

他们要求如果当天得不到凯西签名就通知他们。情报委员会顾问加利·蔡斯在下午4时许被派到兰利总部找凯西签署这一协议。加利曾在中央情报局担任过副总顾问，这一任务无疑是令人不愉快的，有人建议蔡斯拿到签名后回家喝几杯。

在兰利，蔡斯走进门厅给凯西打电话，凯西不让他上来，这位局长说："我好心告诉你滚出我的大楼。"

蔡斯回答说："你不希望我给主席和副主席打电话说这句话吧。"他解释说这份文件业已经双方职员一级的充分协商，而签署它不过是例行公事。

凯西说他将与他的职员进行核查，这期间蔡斯可以等待——在门厅里。蔡斯给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打电话说明情况，他被告知要等待结果。

凯西感到很头痛。这份协议实际上使委员会在他办公室安了一个窥视孔；他们还可以窃听他的电话，并派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或跟着他走，作记录，搜查他办公桌的抽屉及文件。这是一种工头般的监视器，远远超过了白宫所做的事或行政分支的任何部门所做的任何事。情报委员会正在篡权。他向该职员核查后发现该职员已经同意了。那些是继续营业的条件，如果凯西不见蔡斯，参议院的恶魔们就会再次跳出来。

一个小时后，这位局长向下打电话让蔡斯上来。

"这是什么?"凯西看着协议问道。

蔡斯说明协议中的所有内容都未超出现行的监督法律，也没有贬低宪法规定的总统的作用。它没有拿掉总统的任何权力。

由于凯西的职员已口头同意，他们讨论了凯西的签名是否已无意义。蔡斯说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希望凯西能签署它，只是为

了使它明确。经过 20 多分钟，凯西最后拿起文件，草签了大名并把它交给蔡斯。

蔡斯没有回家喝酒，而是回到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办公室。几个职员向他表示祝贺，他把文件高举在手上，一个职员想起了尼维勒·张伯伦——我们时代的和约，蔡斯有了一切但没有保护伞。

十八

凯西清楚除总统外，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是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舒尔茨显而易见是个温和的人，讲话很有理性——富有思想，且表达清楚。当年春天，凯西看着他正经历十分必要的转变。在白宫的会议上，舒尔茨双手合拢像是在祷告一样，他正在跨过使用美国军队——秘密的或分开的，门槛以对恐怖主义作出反应。在黎巴嫩的外交努力失败后，现在是行动的时间了。美国已被恐怖主义驱逐出了黎巴嫩，这一问题外交家们是无法解决的。当讨论继续进行时，舒尔茨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变得活跃起来并极力主张进行积极的反应。报复或先发制人是恐怖主义分子及恐怖国家唯一能领会的。

凯西默认了舒尔茨的观点，这位经济学家和商人有着强硬的一面。现在变得更强硬。当舒尔茨在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转向总统并以深沉的声音说："总统先生……"时，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舒尔茨说，美国的信誉及外交政策系于我们能否表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对付这些新的屠夫，我们在中东的权威依赖于这一点。

在 1982 年里根总统签署第 30 号《国家安全决策指示》中，国务院负责反恐怖政策。舒尔茨指出他希望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更多地参与，必须有心干脏活。

国务卿的动议引发了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员们组成了

一系列工作小组，并协调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诺思中校为总统起草了一份决策指导。照诺思的话说，现在是杀死那些“淫秽”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时候了。他的《国家安全决策指导》草案要求用中央情报局支持和训练的外国人组成的突击队“压制”那些已知曾袭击过或计划袭击美国人的恐怖分子。

麦克马洪在办公室收到一份诺思草案的副件，但直到过了半夜他才打电话到诺思家中找到他。

麦克马洪叫着说：“你他妈的混帐。”诺思经历过70年代的困境吗？他忘记了里根禁止卷入任何暗杀的行政命令了吗？他想对中央情报局干些什么？他们有多大可能获得足够的、确切的情报足以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

诺思说：“好了，先生”就挂上了电话。每当他们要干点什么时，麦克马洪就会干预。诺思对一个朋友说：“麦克马洪已变得不知所措了。或许他过去很优秀，但现在他对凯西毫无价值。”

凯西想采取强烈的行动。因此他把这件事交给他的总顾问斯波金。如同往常一样，他要求迅速答复。

斯波金的结论是：反对恐怖分子的行动不应包括暗杀——禁止进行政治暗杀，类似于过去的暗杀卡斯特罗的秘密计划等。如果中央情报局有确凿的事实，并将对平民的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如果总统签署了正式的总统指令并通知了国会相应的委员会，进行行动是不会有问题的。斯波金说，如果有确切的情报表明恐怖分子将发动袭击，自卫的权力将使他们毫无限制。

凯西对五角大楼的工作却不那么成功。温伯格不愿意用军舰袭击恐怖主义分子，如同他们在黎巴嫩所干的那样，而且五角大楼对中央情报局的先发制人袭击恐怖主义分子的计划存有矛盾心理。中央情报局将接受这脏活同时将对失败负责使得国防部的态度部分地缓和了，但它的态度也是得体的和官僚的。中央情报局所训练的任何准军事行动都将是和五角大楼的竞争。

麦克法兰知道当总统的顾问们意见不一致时，可进行的事情甚少。他建议进行一项综合研究，于是4月3日，总统签署了秘密的第138号《国家安全政策指导》，这是有关反恐怖问题的，这一文件不过是一份计划，要求26个联邦部门和机构提出如何阻止恐怖主义的建议。它原则上赞同实施先发制人和报复性的袭击的想法。

当晚，在华盛顿举行的晚宴致词中，舒尔茨要求积极地防御并暗示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他很有说服力地详细谈了很久，而且第二个月这位国务卿利用大半个月的时间发表演说，讲解其要旨。

凯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伊朗人和叙利亚人在黎巴嫩的恐怖主义组织是朦胧的，很难加以压制。虽然他确信伊朗和叙利亚是这些组织的后台，但他并没有美国法律甚至从常识上说所需要的证据。

部分由于凯西强调的重点放在利比亚，正常的情报显示出卡扎菲那厚颜无耻的战术。三月份，获得的通讯卫星照片及某些人工情报来源均确定性地显示利比亚正在干涉苏丹的内政。利比亚曾派遣一架苏制图—22轰炸机对苏丹首都喀土穆郊外的一个苏丹广播电台进行了轰炸。情报是如此充分，因而舒尔茨能伴随着他那职业性的严峻的不带笑容的凝视，毫无保留地公开宣布，利比亚进行了这次袭击完全是事实。舒尔茨所未揭露的是这位利比亚飞行员被俘虏了并承认这是未来对开罗进行袭击的一次演练。

这些情报还显示利比亚正与希腊签订了一项有关海军军事交流事宜的协议。由于希腊仍是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这可能会危及在这个西方最重要盟国的秘密。在美国国内，联邦调查局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华盛顿市郊的利比亚学生会参与了情报和恐怖分子活动。有人建议将利比亚学生人民委员会驱逐出境，但联邦调查局争辩说这个组织提供了在美国国内监视利比亚活动的窗

口。令人特别担忧的是即将到来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在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全国代表大会和奥运会将是恐怖分子发起引人注意的行动的机会。

卡扎菲很不受邻国的欢迎以至其邻国苏丹、埃及和伊拉克都在向其反对派——利比亚全国救国阵线，提供秘密支持。

凯西不断地将此类情报挤入政府体系中去。例如有一天《国家情报日报》上写道："卫星照片显示本周五卡扎菲寓所周围活动正常。"5月8日对这一寓所的袭击提高了对这一机会的认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恐怖事件处理小组由各重要部门和机构的中层官员们所组成，它警惕地注视着卡扎菲的动向。凯西鼓励舒尔茨挑头，没有国务院的支持，政府不会采取多少行动。舒尔茨的副手和老朋友肯尼斯·丹姆开始复审查对利比亚的政策。

5月18日，丹姆收到一份来自国务院情报机构的一份长达10页的绝密文件，题为《反击利比亚的恐怖主义》。它将政府内部各种思想结合到一起——渴望反恐怖行动，反卡扎菲良好的情绪、有利的情报及合适的机会。

在第六和第七页上提出了供选择的方案，它们从"不采取任何行动"到比较积极的方案："通过跟踪仔细挑选的利比亚目标，建立一种对利比亚恐怖主义活动作出直接反应的机制……"然后是方案9："制定秘密行动计划以先发制人，破坏并挫败利比亚的计划。"最后是方案10："寻求更换政权。"

第二天，星期六，丹姆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一批高级官员开会。制定了四个选择方案，第四个方案是："强有力地扩大现行政策。……例如重新审查采取其它军事或秘密行动的可能性。"

6月13日，鲍勃·盖茨收到国务院情报机构首脑休·蒙哥马利的一份秘密请求，它说："肯·丹姆现在进行的非常机密的政策复审工作，与之有关的是，他要求就利比亚对美国利益造成的威胁作出一个多机构的综合估价。"它提出了一个暂定的要探讨的题

目名单，正式名称是“参考题目”。盖茨将就卡扎非在全世界对我们所造成的威胁的程度提出自己的估价。他是不是首要的恐怖主义分子，需要美国作出反应？他是否如欧洲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只是个讨厌的家伙而不得不容忍他？国务院要求三周内给予答复。“他还要求我们强调这一问题的敏感性，并有必要限制可知范围……”

负责近东和南亚的国家情报官已经进行了一次绝密的，很好的复审工作，并提出了卡扎非的弱点。卡扎非哪里较弱？美国的政策在哪里及怎样做会发挥影响？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局开始一起进行这一工作。

与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要求行动形成对照，国务院情报机构的代表却对那些暗示利比亚大量动乱的许多情报表示强烈的怀疑。利比亚有些像一个外交上的“黑洞”，而国务院对截获的通讯和情报员的报告比中央情报局抱有更多的怀疑。

大家一致认为现行的美国限制与利比亚贸易的政策既可笑又无效，尽管突然撤走美国和英国石油工人会在短期内迫使利比亚石油产量下降25%到50%。一些情报报告显示，卡扎非的旨在灌输一种新的革命精神的一场五年宣传运动已在利比亚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创造了有助于推翻他的社会环境。卡扎非自己比德国部落的成员们已督促他放弃极权主义政策，警告他除非他缓和其政策，否则他们部落和家族面临着被孤立和贬黜。

这个国家情报官小组断定，卡扎非的多疑是一种心理缺陷，尽管它也是一种保护方式。有情报显示卡扎非穿着一件防弹背心，并有一支精锐的、特殊装备的防政变部队保护着他在的黎波里的总部。利比亚主要的通讯网和该城市的电台也设在那里。

秘密报告，破译密码后的情报及情报机构间交流的报告都表明，利比亚境外反卡扎非运动正从六个国家得到支持。

·埃及，卡扎菲的障碍。

·伊拉克，部分是由于在两伊战争中卡扎菲支持伊朗。

·摩洛哥，尽管两国关系在改善。

·沙特阿拉伯，它的支持是极为秘密的。

·苏丹，卡扎菲一直试图收买或占领。

·突尼斯，尽管卡扎菲与突尼斯一位高级部长关系密切，实际上该部长位于卡扎菲的领薪金者名单上。

这一名单包括六个与卡扎菲相邻的国家，他正同第四个国家在交战，那就是乍得。

但埃及和较之稍为次要的阿尔及利亚是向卡扎菲施加军事和其它压力的重要国家。情报机构的代表们商定了有关埃及和阿尔及利亚进行暗杀的措词："两国对同美国合作进行旨在推翻卡扎菲的秘密行动后有着严重的保留，这些保留部分是因为意识到美国不愿意或无法有效而富有意义地参与，还因为美国无法防止此类行动被公开。"

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代表们断定利比亚军队内部存在着大量不满情绪。尽管国务院情报机构表示反对，他们还是写道："在比较引人注意的水平上，在利比亚国内进行成功的较频繁的行动，伴随着国外的其它压力和阻碍可能会在利比亚军队内部引发某些不满分子采取反对卡扎菲的行动。""卡扎菲的副手，萨拉姆·贾卢德少校和军队的首领和其副手可能有着最强烈的动机。"

这一估计正在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务院的代表成了局外人，他们反对那些结论即支持旨在颠覆或推翻卡扎菲的秘密行动，但其它人继续进行，并在第五页进一步阐明了美国采取强烈行动的实际意义。

我们相信如果对利比亚境外流亡组织予以大力的支持，它们很快会开始周期性的破坏和暴力活动，这可以激起对卡扎菲权力的进一步挑战。如果流亡组织行动与其它因素相结合——扩大宣传，利比亚与外国关系明显恶化及广泛的经济压力——军队内部的不满分子就可能受到鼓舞，进行暗杀或与境外流亡组织合作反对卡扎菲。不过，广泛的军队叛乱是不太可能的。

这几乎是支持暗杀卡扎菲的一份请帖，尽管总统的行政令禁止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支持或策划暗杀，那份里根总统1981年的行动命令12333里写道："禁止暗杀。任何美国政府雇员或代表美国政府的人都禁止参与或阴谋参与暗杀。"这份估价报告至少是一份非同寻常的引起争议的文件，它实际上督促进行协调行动，告诫不要半心半意地行动。

这份文件断定，任何行动过程如果不能促进卡扎菲的倒台将不会给利比亚的政策带来显著的和持久的变化。这一文件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利比亚政权有着明显的弱点，但它只能通过与重要国家合作进行一项包括政治、经济和准军事行动在内的广泛计划方能成功地开采出来。孤立的准军事、经济或政治行动可能只有很少的甚至毫无效果。

这是要求进行一次大规模秘密行动，而国务院情报部门对这一结论的最基础的东西——构成结论的情报，提出了质疑。在第一页的脚注上，国务院填上了尖锐的不同意见，它写道："这一文件过份依赖于支离破碎的、无事实基础的报告，并未能对卡扎菲持久的深孚众望予以充分的估量。卡扎菲对安全抓得很牢，以至于不太可能在利比亚发动军事政变。"

当这一估价完成后，它长达29页并作如下密级分类："绝

密”，并加下述代号即“阿姆巴”（包含破译通讯的情报）、“诺方”（外国人不得阅读）、“诺康泰克”（合同制约，临时雇员不得阅读）、“普罗宾”（包含商业专利情报）和“皇康”（作者负责分发，所有副件都有编号）。

这一文件于6月18日发出，它成了有权阅读它的那些政府官员们争论的热点之一。那些提及而且实际上等于要求“准军事行动”，并建议美国鼓励利比亚军队暗杀卡扎非的字眼从文件上消失了。

7月4日，中央情报局发出另一份有关利比亚的绝密文件。这是对威胁的估价：它说卡扎非正在不断地采取行动反对美国的利益，但眼下最紧迫的担忧是卡扎非会在苏丹干些什么。

它继续写道：“利比亚在美国进行恐怖活动是可能的，但我们认为利比亚很难在美国发动一次成功的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利比亚在美国的大约1500名学生中只有几个特工人员，其中包括：“约200名狂热崇拜卡扎非的学生在内。”

对于有人害怕卡扎非可能拥有一件核武器这一估价，在其第13页上指道：“我们认为利比亚在今后10年内不会获得核爆炸能力。”

在白宫一个多机构联合小组开始制订秘密支持利比亚流亡者的计划及一系列致命性和非致命性秘密选择方案。美国和利比亚之间的相互口头攻击如此激烈以至于这些官员们决定考虑一个相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取某些行动会造成什么印象？”要求采取行动的压力很大，许多人发表了强硬的讲话，没人愿意表现出软弱，这些官员们起草了多种选择方案并予以传阅。

当这些文件到达中央情报局时，凯西不在总部。麦克马洪收下了这些文件并难以置信，这简直是疯了。

麦克马洪了解一些中央情报局关注利比亚的历史。当1969年

初卡扎菲上台时，中央情报局曾讨论过想推翻他，但国务院反对这一试图并占了上风。海尔姆斯局长同意国务院的观点，当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在卡特执政期间，特纳有一次问到对卡扎菲可干点什么，当时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麦克马洪回答说可干的不多。

麦克马洪觉得写这些选择方案的联合小组对流亡组织毫无所知，在他看来这些流亡组织不过是童子军。有情报表明他们无法用橡皮舟在利比亚海岸登陆，更别说推翻一个政府，夺取利比亚并管理这个国家了。卡扎菲已渗入这个运动并对它的成员们的每一步行动了如指掌。卡扎菲可以杀死那个运动的任何潜在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麦克马洪懂得如何用一些要求提供细节问题来扼杀一项秘密行动，而且他本人知道无人掌握那些细节。中央情报局有内线人物吗？卡扎菲有多少警卫？他们忠诚吗？成功的机率有多大？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的。麦克马洪说即使有一半成功机率他们也不应进行，但他们甚至连这点把握也没有。他指出：如果你们没有金钢钻，就别揽这磁器活儿。况且还有禁止暗杀的行动命令是怎么说的？他问道。这不是一项反对一个政权的行动，它是反对一个个人的行动。无法想象会有任何可靠的方法，即使该行动进行下去，同时又告诉流亡者们不要杀卡扎菲。

凯西回来后，他在许多方面支持麦克马洪的观点。首先，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欧洲盟国将不会赞同。令凯西激怒的是卡扎菲正在欧洲得到而不是失去尊重——秘密的利比亚—希腊协议仅仅是一例。没有西方盟国的协同支持，秘密压力或行动无法产生影响。如果中央情报局随随便便地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将最终变得孤立。其次，在政府内部没有就这样一种行动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5 月 8 日的政变企图只表明有推翻卡扎菲的机会，但他并没有立即采取任何有威胁性的行动来证明存在类似活动。

凯西已为尼加拉瓜行动与国会闹纠纷，他毫无心境再进行一场斗争。现在离 1984 年总统选举只差几个月了。凯西决不想仓促爬悬崖，尽管他确信一个反对卡扎菲的行动将受到他的两个最重要的选民——公众和罗纳德·里根的大力欢迎。

6 月 22 日，凯西在他的室内专用邮箱里发现一封司法部长威廉·法兰西·史密斯的一封绝密信。又出麻烦了，信中包括一份联邦调查局持续近两年之久的一项泄密调查的报告摘要。1982 年 7 月 12 日，国家安全局截获了在华盛顿的日本米促比希公司办公室发回日本的商务通讯，引起美国高度警惕的是有从 7 月 7 日和 7 月 9 日绝密的《国家情报日报》上摘录下的详细的一字不差的情报。米促比希公司的通讯报告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军队调动情况，包括伊朗集结了 12 万军队要在一个特定的边界地区向 8 万名伊拉克军队发动反攻。还有如要和谈伊拉克领导人必须下台之类的机密情报。米促比希公司办公室说这一情报的来源是美国政府某情报机构的一位不知身份的成员，他曾把这些告诉了米促比希公司雇用的一家咨询公司。国家安全局于 1982 年 7 月 29 日再次截获了这家日本公司的电传，它包括从三天前的《国家情报日报》上摘录的大量情报。国家安全局局长林肯·福尔对这一泄密很焦急并要求进行调查。

联邦调查局把矛头对准凯西的一位高级分析专家查尔斯·沃特曼，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沃特曼瘦瘦的身材，秃顶，是一位强有力的前行动处官员并有着 20 年工作经历。他受命与那家华盛顿咨询公司打交道，那家公司每月出版一期时事通讯，里面常包含有中东的绝妙资料。事实上，沃特曼从这家咨询公司收集到许多好情报。

1982 年，沃特曼的这方面工作未能通过接二连三的联邦调查局及中央情报局的测谎器测验，而且凯西记忆中认为那一事件简

直是一团糟。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曾建议沃特曼辞职。沃特曼是个优秀的人才并否认他泄密，而且凯西认为局里派出收集情报并与局外人士保持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谈的比应该说的要多。一些有关伊朗和伊拉克军事势力的他妈的数据算不了什么——是《国家情报日报》里典型的垃圾。如果解雇他将会在兰利总部内传递错误的启示，因此凯西征得麦克马洪的同意后否决了这位中央情报局自己的保安官员的建议。沃特曼也受到了轻罚——停职两周并停发工资。

但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停止调查并将之定为间谍罪案件。1983年12月沃特曼被停职留薪，此时联邦调查局仍在继续进行这一工作。

现在，七个月后，司法部长史密斯说由于在法庭上将不得不披露秘密的情报来源和方法，因而司法部无法对沃特曼起诉。他说，不过这一调查已到了适合于中央情报局采取某些行动的时候了，开除并且公开讲明原因实际上可以起到净化别人的目的。最后，这位司法部长将乐于知道最终采取了什么行动。

凯西大骂："该死的比尔·史密斯。"很明显这封信是由司法部或联邦调查局官僚写的，两者都一心保护自己。他们无法指出泄密的人，因而他们似乎让司法部长闭着眼睛签署了这封信并想让凯西把沃特曼推出门。该信的副件已传遍所有的部门和机构。

凯西说："这件该死的事不要泄露出去。"但他知道史密斯的信会使凯西对一个高层泄密者显得软弱传播出去。

凯西召来斯波金并给他看了信和司法部有关调查的报告。斯波金相信沃特曼是无辜的。沃特曼发誓否认泄密，而且他的日程表明他并没有在泄密时间同写时事通讯的那些人会面，写时事通讯的人也否认沃特曼是提供情报者。斯波金很同情沃特曼，当他暂时停职时，斯波金曾帮他找了个律师。三个月前，当斯波金去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地区办公室想澄清这件事时，联邦调查局的特

工人员暗示说斯波金可能妨碍了他们的调查。

他与凯西对测谎器看法不一致。他说它们连续地提出无罪假设：如果被测试者说这台机器显示的结果是骗人的，情况可能即是如此，但你无法否定它。其结果是一个僵局，司法部长的信就是它的一个证据。他们不起诉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而不是因为审问可能会暴露情报来源及方法。司法部是想让凯西踢掉一些蠢货。测谎器如同中世纪的拉肢刑架或拇指夹，只不过测谎器是精神刑具而不是肉体刑具罢了。斯波金觉得这是唯一的区别。

在充满泄密的间谍的环境中，凯西觉得必须使用各种工具甚至于测谎器。测谎器得出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结果：它恐吓人们，它使人们坦白，它向中央情报局发出警报使其不雇佣不可靠的人。凯西给沃特曼打电话请他第二天到局里来。

沃特曼在驱车前往兰利会面的路上，对终于要有些结论感到高兴。他已经等了难熬的七个月了。这是他一生中最坏的时候。他曾为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可怕的地方呆过，从1964年开始他就在中东的情报站撞来撞去。他曾在贝鲁特、开罗、约旦工作过，然后又回到贝鲁特工作，最后担任了驻沙特阿拉伯情报站站长。以前他曾使用过测谎器并接受过测试，他一点也不相信他们。他因米促比希公司事件被用带子扎紧连在这个盒子上度过了痛苦的四个半天。联邦调查局的测谎器操作者曾对他说："你遇到大麻烦了。"但沃特曼觉得，测谎器的结果测的是他内心的混乱。他曾与写时事通讯的人们谈到过两伊战争，他或许曾用过有关中央情报局内部有关双方军队实力的数字，但它们实际与新闻的数字完全一样。他并没有泄密，那种认为他可能逐字逐句地透露了某些东西的想法是极为荒谬的。沃特曼怀疑约翰·麦克马洪认为他泄露了某些机密，但他觉得在凯西那儿他还是有机会的。

当沃特曼走进七层凯西的办公室时，他高兴地发现只有局长一人在那里。

凯西说明了司法部长的信并把司法部的报告交给了沃特曼。

沃特曼用最有力的语气说，它是不真实的。他有着一双显示出清白的大眼睛。

“那么，我又能怎么办呢?”凯西问。

沃特曼说：“如果你解雇我，那么分析部分的开明领导层就不会继续放手与外界进行相互交流。”

凯西回答说：“我也无能为力。”

“我没干过。”沃特曼说，眼睛直盯着局长的双眼。

凯西说他相信他。他说，但有三个理由，“首先你在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已被破坏了，其次由于联邦调查局断定你干了那事因而你陷入了困境，最后如果你留下来的消息泄露出去后我将受到娇纵一个泄密者的指控。”

沃特曼说，联邦调查局在这次调查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用来证明那个测谎器是准确的，没有进行真正的调查，一定有其它人泄密而并未发现。

凯西最后说，让我再想一想。他推迟决定，沃特曼走了。

凯西很痛苦，他不想违反他自己冒险的原则。如果他的人将出去收集情报，他们将不得不交换情报——提供一些并获得一些。这就是这个世界工作的方式；如果是单行道的话，一些编写时事通讯的人是不会与沃特曼相遇的。像沃特曼这样的职业老手知道限度，懂得什么是真正机密的。如果凯西手下的人犯错误的话他必须给他们撑腰。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们就会停下来，重新变得缄默起来，如同在前任政府期间那样。在1977年，在特纳当局长的前几个月，特纳因两名工作人员与变节的中央情报局前行动人员埃德温·威尔逊接触而将他们解雇。凯西知道特纳为此在士气上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凯西觉得中央情报局的人除非有严重的、故意的不称职的表现，否则不应解雇，这件事并不适合上述情况。当晚凯西扪心自

问，这是他在近四年时间里所面临的最难作的决定。沃特曼是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他工作很好，他是凯西所需要的有决断力的化身。

第二天凯西给沃特曼打了电话，并安排在行政办公大楼他的办公室里与他会面。沃特曼来了，他看上去很脆弱。

凯西说："我已反复作了探讨，然而我们无法提出任何东西，很抱歉，我们无能为力。"

沃特曼有点哽咽了。"是，先生"他敬了个礼就离开了。在走出去的路上沃特曼提醒自己他们都是为局长的快乐而工作，这么做是必须的。这意味着他20年的中央情报局生涯结束了，他可以回忆他第一次秘密接头——1964年在科威特。他们派他去那气候极热并易变的国家，给他的指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找出一个看上去好像刚刚手淫过的阿拉伯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但他找到了接头者。

如果在凯西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一年，他本不会让沃特曼走的。现在他已工作至第四年，凯西觉得自己毫无其它选择。泄密是比士气更大的问题。

围绕尼加拉瓜行动的明显争议束缚了行动处的手脚。有人害怕国会、新闻媒介和公众会再次攻击中央情报局。凯西断定到了清理行动处和更换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约翰·斯坦的时候了，监案主任的职务可能更适合斯坦的性格。斯坦是一个优秀、稳健官员但是过分谨慎，而且需要将克莱尔·乔治从国会救出来。乔治同凯西一样，也在布雷冲击中受创甚重，但乔治坚持自己的立场。凯西喜欢乔治处理这事的方式——缓和、忠诚、直率，既乐于接受责备又勇于提出批评，清楚地认识到国会干预的荒谬。

与60年代进入中央情报局的斯坦不同的是，乔治是位50年代入盟者，与凯西相差无几。乔治是一个幸存者，精明有余而又

带有冷战时期形成的本能。对他来说，大胆的情报工作——贿赂、背叛、电子渗透，是正常的。他有着秘密行动的意识，知道这一工作是肮脏的而且他们都不得不生活在内心矛盾之中。

凯西在6月底宣布了这一改变，任命克莱尔·乔治担任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任命约翰·斯坦担任监察主任。正在进行的行动是一个大杂烩——在某些地方申请资金和人力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则受阻。

7月，参议员查利·威尔逊为阿富汗秘密行动赢得另一笔5000万美元资金。连同他已赢得的加上中央情报局申请的，这意味着有了1.2亿美元资金，而且有人谈到下一年要翻番。还有沙特人要提供与美国相应的资金，很快就将有5亿美元送到阿富汗抵抗力量手中。对凯西来说这是件好事，但他环视全球后认为事实上把所有的秘密行动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合适的。

还有另外两个其它秘密支持行动是重要的。不是因为资金的数目，而是因为其原则性。凯西仍在设法对它们保密。第一个是给予柬埔寨抵抗力量的500万预算内援助，他的计划是在年底再追加另一笔1200万美元的援助，尽管这间接帮助了红色高棉。第二个是给予埃塞俄比亚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反对派以每年50万美元的非军事援助，该反对派同时也受到沙特人的秘密支持，该组织有极左倾向。在两项行动中，凯西乐于谨慎地与魔鬼周旋，他把反共抵抗运动看作一个整体——尼加拉瓜、阿富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是战场。这就是“里根主义”。

凯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宣传行动的秘密开支。现在大约向两打之多的国外报纸、智囊班子和研究机构提供资金。至于秘密准军事行动，他不得不满足国会微观管理的要求。

在50和60年代，中央情报局曾非常成功地进行了亲北约的宣传运动，现在里根政府想获得对在欧洲布署潘兴—Ⅱ式导弹的

支持，在1983年，凯西曾提出数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在欧洲舆论界提倡这种导弹。然而，不出所料，国会情报委员会砍掉了这笔资金。在1984年，凯西再次试图说服两院情报委员会拨给他几百万美元用于此事，民主党人在秘密会议上辩论说北约盟国可能会把这类行动看作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在英国、西德和意大利，潘兴—Ⅱ式导弹是辩论的热门话题。如果这一行动泄露并表明中央情报局在对我们的盟国搞宣传，那么这一冲击对相互间的关系和部署这种导弹的努力都将是灾难性的。也有人担心这一宣传运动可能会"反弹"进美国新闻媒介。

凯西辩论说几百万美元是能够使作者和其他人组成的宣传网活跃起来。两院情报委员会对凯西的基本论点予以强烈反驳：几百万美元不足以完成这一工作，那么为什么要开始它呢？这笔资金被从预算中砍掉了，并告诉中央情报局可以用一些维持资金来使少数几位欧洲作者处于备用状态。凯西再次想到，它在告诉中央情报局，作好准备但什么也别干。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逐项梳理3英尺厚的绝密预算文件里所列的项目，而且国会里的其他人，尤其是总是在预算里找浪费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普鲁斯克麦尔，也偏偏挑中了情报行动。

在一个定期向苏联检查团开放的美国海外陆军设施里，有一些供下班后松弛用的热水浴缸。陆军情报部门曾在这一设施里安装了先进的窃听装置并正在改进监视设备。这笔高昂开支被藏于军事预算里，开支项目被列为改进热水浴缸。这等于是向普鲁斯克麦尔参议员为调查浪费而设立的每月一次的"金羊毛奖"发出了公开邀请。陆军情报部门首脑威廉·奥德姆准将不得不进行干预并说明一项比较精密的收集情报行动即将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情报机构在纽约市高房租区的地产也成了普鲁斯克麦尔的"金羊毛奖"的目标。有人建议说"金羊毛奖"可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掩护因为普遍认为政府不会允许一项秘密行动如此公开

化。不过，最后情报机构还是建立了一个电话控股公司可以避开普鲁克斯麦尔的调查。

当年夏季还有些其它事令凯西担忧。尼加拉瓜天主教堂已成为反对桑地诺政权的最强大力量，领导九个主教和所有天主教徒的米歇尔·奥班多·布拉沃大主教正在组织教堂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人们发出警告。桑地诺政权的官方报纸《拉美堡垒》曾指责他参与了“旨在推翻尼加拉瓜政府的政治活动。”他被描写成一个索摩查的酒友，一幅漫画上画着一个主教正把一个十字架扭成一个纳粹党徽。

根据中美洲宣传的总统指令，中央情报局有了大笔的额外资金，在行动处一位级别较低的官员决定通过一个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渠道拨 25000 美元援助尼加拉瓜的天主教会，这是一次具有爆炸性的联系。

起初莫尼汉参议员认为它肯定是个玩笑，当他发现它是真的时，他召一位中央情报局的高级官员到他的私人办公室，并猛地坐在火炉旁的椅子里，他说：“不要那么作。大主教那个人，是那里的一支精神力量，无论如何不能破坏。”凯西同意莫尼汉的意见，这 25000 美元的援助被取消了。

要想转移宣传资金需经许多途径，当这笔资金到达私人组织时，中央情报局就失去了控制，但莫尼汉想的不仅是控制而且是对中央情报局的基本估价。这 25000 美元可能象投毒一般。为什么不谨慎从事呢？谁在进行这危险的估价？道德标准哪去了？这恰恰是那种造成丑陋的美国人形象的那类事。难道它仅仅是一件扔钱出门的简单的事吗？是否国会对情报预算增加得太多了呢？有人问过这些问题吗？

凯西回答说大主教永远不会知道钱的来源，因为这笔钱被藏于其它资金里面。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使这一报道不要出笼，如果

出笼它将不可避免地引起误解。最坏的情况不外乎看上去好像中央情报局因未能为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争得资金，于是就想通过教堂向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这是假的，但凯西相信无人能查清它。

尽管这一报道正在传阅并即将发表，但恰在此时凯西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他说如果这一报道发表，那么大主教就“死了”。于是这一报道未予发表。

于是开始了对其它宣传资金的全面检查。而中央情报局通过波兰的一个教会的秘密渠道向团结工会输送 2 万到 3 万美元的小型援助计划，因考虑到政治风险而被放弃了。

当 1984 年总统竞选开始后，凯西无法参与。中央情报局局长不能参加竞选战略会议。人们会让他对竞选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他会顺便去拜访埃德华·罗林斯，一位直率的加利福尼亚右翼人士，现在是里根再次竞选的主要战略家。两人都一致认为，这次看起来毫无疑问要赢。

凯西通常在晚上带回家的三个文件包里装有成摞的报纸、剪报和杂志。他用一位情报分析专家的目光跟踪着新闻界的动向。公开的消息或者说“消息灵通人士”可能会提供政府内部下一步人事调动的某些最佳线索。8 月 30 日，《华盛顿时报》的一篇报道引起了他的注意，题目是：《正考虑接替凯西职位的五位候选人》。

他想，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华盛顿时报》由教会联合会的牧师桑·迈昂·穆恩创办，已打入了里根保守派占统治地位的华盛顿。它的几个职员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过。要掌握宾夕法尼亚路 1600 号白宫的秘密，《华盛顿时报》是必读资料。

凯西警觉而愤怒地读到：“他已将他在选举后将离开政府的打算公布于众，”而不论里根是否赢得这次大选。

有一次，凯西曾认真考虑过要求总统不要再次任命他。但约

翰·麦克马洪和这所大楼里的其他人给他做工作，并劝他说，他是能够保持前进势头，保证得到总统支持，继续得到资金并保持与外国情报机构良好关系的唯一人选。他们的请求深深地打动了凯西。他们还使他相信即使中央情报局或他本人遭受新闻界的重击，他当局长也表明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在政府内部或里根总统本人那里失去应有的权威。如果中央情报局想继续恢复元气，这种权威和信用是至关重要的。他最后同意继续留任。

这篇文章说其消息来源是“高级政府官员”及“白宫内线人物”，而且其中一位作者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杰里迈亚·奥莱利。这篇通讯报道白宫已开始拟定潜在继任者的名单，该名单上第一位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

每当此时，凯西的下巴就会深埋，深深地陷入思考之中。一篇报纸报道就像一则未经证实的情报，它需要支持材料。五天后，他注意到《纽约邮报》的《华盛顿内幕》专栏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央情报局老板凯西将结束其间谍生涯》。这篇文章描写凯西是最先提出此事的人，说据传他已“通知”白宫他想回到平民生活中去。吉姆·贝克再次名列了潜在继任者名单之首。

这真是好极了。民意测验结果里根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高出约10点多，第二次执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如何分配角色呢？任何一位内阁主要成员或白宫主要助手的离任都将引起连锁反应。乔治·舒尔茨是关键，温伯格、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吉姆·贝克和凯西本人都愿意任国务卿，但似乎很明显舒尔茨打算继续留任。这意味着温伯格可能继续呆在国防部，而凯西仍感兴趣的其它职务只有国务卿和国防部长。

不过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喜欢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凯西相信，在第二任期内，白宫的政治家们在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会减少——尤其是有关外交政策和中央情报局行动的决策。里根可能会更倾向于遵循其直觉。

在政府圈子内对《华盛顿时报》和《纽约邮报》信以为真，凯西受到许多询问和取笑。

有一天晚上喝酒时，托尼·莫特利突然问他："那么吉姆·贝克将接替你的职位。"

凯西苛刻地说："那个混帐永远别想得到那个职位。"

是凯西与温伯格、克拉克和柯克帕特里克一起在去年阻止了贝克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尚不清楚如何能阻止贝克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有权就他的继任者发表意见，但那不是否决。贝克已赢得了里根的信赖而且可能已从总统那里得到了某种允诺。不过它听起来并不准确。凯西知道贝克想从事外交工作，他的野心或许是无限的——在未来的乔治·布什政府内或选举班子内任国务卿，中央情报局似乎不适合他的日程安排。

凯西的规律是泄密常常可以通过回答下述问题找到根源：谁得利？谁希望这件事公开？这件事的答案是想要他职位或赶他走的那个人。他想找出泄密者的努力未能成功，因此凯西决定直接问出他的受益者，他称此为"爱尔兰网格"及"顽强"。他给里根写了封信，表示对据传出自白宫的消息感到关注。如总统所知，他并未请求返回平民生活而且并没打算回到平民生活，当然除非总统希望他这样做。凯西说明他将很高兴在下一个总统任期内为总统服务。他补充说，再如总统所知，在各情报机构内还有许多重要的，生死攸关的工作要做。他在信封里加入那两篇新闻报道，说这些报道挫伤了中央情报局的士气，造成了一种易变的气氛，破坏了他们已得到的稳定。几乎四年之久的工作将会倒退，应阻止此类错误的报道。

凯西仔细雕饰该信，以触及里根那根反舆论，反泄密，亲中央情报局的神经。里根几乎立刻就打来了电话。他表示了毫不动摇的、完全的支持。"比尔，如果有第二任期的话我当然希望你能留任。只要我当总统，你就是我在中央情报局的人。"

凯西很满意。这等于是一个保证，一个签署的合同。凯西觉得自己几乎要跑到宾夕法尼亚路去亲总统，他崇拜这个人。这是管理的一个有益教义：选择并钉牢。也就是说，选择你的人并把他们紧紧拉住。

十九

9月，总统大选即将在几周内到来。凯西在兰利花了许多时间高度注意这期间可能会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他召集行动官员和分析专家到他的办公室，叫另外一些在大楼周围闲逛的人迅速跑进走廊，冲进办公室和行动中心。他要清楚地表明整个美国情报界处于对恐怖分子的高度警惕状态。他害怕又一次疯狂的爆炸袭击会使美国显得软弱无能，其政治影响可能是巨大的。里根政府是力量的象征，如果现在不能阻止这些袭击，那么将比前几年的任何事件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政府的软弱无能。

17个月以来凯西一直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解决这一问题——训练、交换情报、发展包括约100个国家在内的联络网。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训练、营救人质和保护重要人物的能力在40个国家取得了明显的提高。它刚刚训练了60多黎巴嫩人，近50人在中央情报局完全从事反恐怖工作，还有几十人在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机构工作。凯西要求有成效，现在已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有情报判断西班牙驻黎巴嫩大使正受跟踪，于是中央情报局建议他离开黎巴嫩。他没这样做，后来就遭到绑架。

对恐怖主义的重视导致了更多的报告，而且最后报告如潮水般涌来，其中许多其价值是可疑的。从军事行动角度看，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仍然未能渗透进中东的恐怖组织里。凯西认为，其理由很简单，恐怖分子知道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不会杀人，因

为他们不能以暗杀人为目标。而申请加入恐怖组织的人则会立刻受到测试——去杀某个人。

某些来自秘密报告的最可靠情报表明，在外交免检的掩护下，伊朗人从其在大马士革的大使馆转移炸药和定时炸弹。8月有报告显示这些炸药被运进了黎巴嫩，随后线索断了。现在海军陆战队已撤离，位于相对安全的东贝鲁特基督教区的美国大使馆和附属建筑成为剩余的主要目标。中央情报局和其它情报机构不断发出报告，这有点“我们又来了”的味道，但这些警告不十分具体。

9月20日，星期四，上午11时40分，一辆带有外交牌照的货车驶进东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附属建筑，并成“之”字形前进，要绕过用来阻拦所有车辆的交错排列的楔形混凝土障碍物。一个卫兵的M－16步枪卡住了，正在美国大使馆访问的英国大使的卫兵开了火，将五发子弹打进卡车里。卡车冲向一辆停放在距通往使馆地下停车场的坡道不到30英尺的一辆汽车上，卡车爆炸了，炸出一个直径为26英尺的大坑。它至少造成24人死亡，包括两名美国军人，另有90人受伤，包括美国大使雷金纳德·巴塞洛缪，他被埋在瓦砾中，但出来后仅负了轻伤。

凯西感到很懊丧。绝密的空中照片后来显示这辆卡车或一辆与之相同的卡车，曾在贝卡谷地的大使馆附属建筑模型外进行练习。美国情报机构断定希兹布拉——真主党，和锡克·法德拉勒是这次事件的幕后人物，如同他们在1983年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营地爆炸事件一样。凯西很快看出，在选举前期，白宫没有人有兴趣进行报复，他们已在更为严重的袭击后忍了几个月。毕竟，这本来可能会更糟的。

事后报告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之一来自一位黎巴嫩情报机构的中校。它表明这项行动有一套严密的计划。这辆货车是当天早晨离开穆斯林西区的，两名身着黎巴嫩警服的同谋驾驶一辆桔红色的BMW牌轿车尾随其后。在去大使馆附属建筑的路上，这辆

货车偶然撞上了一辆小的奥佩勒牌轿车。奥佩勒牌轿车的司机走出汽车并想向这位货车司机喊话，但货车司机很驯服似乎显得很紧张，他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这位奥佩勒牌轿车的司机无法引起他注意。恰在此时，那两名同谋走向前来并给了奥佩勒牌轿车司机 2000 黎巴嫩磅——约 300 美元，是他修轿车价格的好几倍。这位司机拿了钱就走了。一个黎巴嫩人目睹了这一场面并在大约 10 分钟后听到美国大使馆附属建筑的爆炸声，于是去黎巴嫩情报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他一直未能找到那位奥佩勒牌轿车司机，但他们相信这位目击者的话。中央情报局无法加以肯定，但这一报告提示这位货车司机在这次自杀行动前被用了麻醉药。

黎巴嫩情报机构想要比它每年获得的 200 万美元还要多的资金付给其特工人员。凯西许诺看一看他能否搞到。黎巴嫩人正在做他们可作的一切向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恐怖分子袭击的情报，因此中央情报局与黎巴嫩情报机构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

凯西对以色列人就不那么信任了。他知道以色列人有一流的间谍已渗入黎巴嫩和叙利亚，但他强烈感到以色列人在坚持不让步而这可能会危及美国人的生命。中央情报局与摩萨德的关系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美国撤出海军陆战队后就恶化了，黎巴嫩对两国都是个灾难，而且没有比共享失败更能搞坏关系的了。两个机构虽合作但都不喜欢对方。摩萨德官员们瞧不起中央情报局，一位官员说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是不演戏的演员”。摩萨德的二号人物彼得·曼蒂负责与中央情报局的一切联络。在黎巴嫩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不允许其特工人员相互间直接打交道。中央情报局有一种感觉即曼蒂是个吝啬鬼，只有当对以色列利益有利时他才会提供一点摩萨德珍贵的情报员送来的报告。

兰利的评价是中央情报局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共享情报是一条单行道，有去无回。凯西必须向以色列人施加压力，让他们知道有麻烦了。他不能亲自这样做，因为那可能压力太大了。

他决定派麦克马洪去以色列。麦克马洪以足够的份量向摩萨德宣读了这份警告性的取缔法令：从现在起，中央情报局向希望得到可能与恐怖分子袭击美国设施有关的所有情报。麦克马洪辩论说，请这样做吧，否则要受上帝的惩罚。他觉得他只是取得了表面的成功；摩萨德最后像中央情报局一样：它不信任何人。

9 月 20 日的爆炸事件更突出了情报的问题，如果说不是一次失败的话，那么凯西要向白宫作出些解释。他的回答很简单。他回顾了 10 年前的丘奇调查，以及卡特政府——两者都摧毁了中央情报局的精神。人们害怕情报渗透和培养情报员招来的麻烦比潜在的得益还要多。他无法在四年之内建立起人工情报网络。

例如在 1977 年，当新闻界发现中央情报局向约旦国王侯赛因秘密提供薪金后，卡特总统就停止了向他付酬。在凯西领导下，中央情报局开始一项新的秘密行动，同约旦一起收集和共享有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情报。但由于曾公开被卡特伤害过，这位国王变得小心谨慎并且多疑。凯西指出，在中东留下的记忆将是长时期的。

有一个人接受凯西的论点，那就是里根。在贝鲁特最新爆炸事件六天后，里根在俄亥俄州保令格林市竞选游说时，一位学生问他有关美国大使馆的安全问题。他说："今天我们感受到了在我们任职前的一些年间情报能力几乎完全破坏造成的后果。"他又补充说，在前些年，人们的态度一直是"间谍工作是某种方式的不诚实，因而让我们摆脱我们的情报人员……而且我们作的有些过火。"

如果还有人对这一手榴弹的目标还有所怀疑的话，白宫后来的说明作了回答。白宫助手对记者们解释说它是指卡特和特纳。第二天卡特进行了反驳，他说里根的指责是"对个人的侮辱，而且其暗示非常恶劣难以容忍。"他宣称里根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

卡特接着说中东的灾难是“这位总统本人的政策有严重缺陷及面对业已证实的危险未能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而造成的后果。

特纳公开作了回答,当他读一份声明时他的声音几乎在颤抖:“里根先生的讲话是与一位总统的身份不相称的并有损尊严。是里根通过把有可疑品质的人塞入中央情报局而使它遭受了损害……他通过凯西把中央情报局政治化了。”他问道:“你们从今天的中央情报局那里觉察到了什么?你们获悉其局长过去有着可疑的财务问题,而且现在又在尼加拉瓜秘密战中卷入了可疑的法律和财务问题……他们不在贝鲁特收集情报,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正在全力推翻尼加拉瓜政府。”

凯西仔细地读了这些相互攻击的言论,但他并不准备卷入到两党之争中。他拒绝公开发表评论,但他知道总统意图何在。这个问题并不是人数、金钱或那个人的问题,尽管他们都是其组成部分,真正的问题在于特纳造成的怀疑气氛。凯西认为中央情报局的精神应是可以干,而特纳却把它变成了你不害怕吗。

这一番相互攻击很快偃旗息鼓了,但凯西对选民们了解了事情究竟感到很满意。

约翰·霍尔顿在经过整整一个夏季为是否辞去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国家情报官而烦恼后,接受了缅因州波特兰市一名家报纸记者长时间的可记录采访。霍尔顿说,曾有一份重要的情报特别报告凯西“一直向我施加压力要我修改它”,但他未提及墨西哥这个名字。

霍尔顿说:“我拒绝修改,因此在我的坚持下他未能改写报告。这就是说,作为一名情报官,我不是为某个行政部门而工作,而是为整个美国政府工作。”

直到三周后霍尔顿公开抱怨的新闻才全文出现加以报道,标题是《据报道分析专家与凯西在墨西哥问题发生冲突后将离开中央情报局》。

鲍勃·盖茨，这位负责情报的助理局长，略有点被背叛的感觉，霍尔顿并未暗示他将公开此事。这是霍尔顿自己在情报分析领域的经验。很明显，霍尔顿并没有理解这一问题。压力意味着游戏，总有来自国务院、五角大楼、海军、陆军、白宫的压力。当中央情报局触发了某根神经、触及某些重要问题或其结论可能对政策造成真正的冲击时，这些人就会开始大叫。

国务院总是对中央情报局正在南美开展的工作怀有敌意。而且搞强硬路线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佩尔总是不同意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战略能力的分析。盖茨本人在前些年曾重新研究了苏联国防开支问题，并断定它比国防部所说的要低，这就像有人要修改基督教十戒，而盖茨却使它陷入了困境。这就是压力，霍尔顿并不了解真正的压力。是的，这场辩论可能很刺耳，但凯西可以忍受。这些事是需要检验的，而且其讨论常常变得很热烈并产生不同意见。在盖茨看来，霍尔顿误把合理的学术压力当成是政治压力。

现在离总统选举只有六周了，凯西却不得不与霍尔顿斗争。他觉得霍尔顿试图避开特别报告中那些证实墨西哥可能会崩溃的情报。凯西决心在他任内不允许出现类似于说“伊朗国王将掌权五年”，而后国王却在几个月后下台的任何此类特别报告。

凯西也对霍尔顿所说的他为“政府”工作而不是为某些特定部门工作的话感到恼怒。它听起来似乎霍尔顿认为政府有一个另外的分支，一个常设的管理人员军团。在凯西看来，这正属官僚主义，而且它给政府带来的是更多的麻烦，而不是解决方法。

凯西给霍尔顿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当霍尔顿读完它时，他感到凯西似乎在指责他蓄长发和服毒品。他的所有争论都有一整套论点，很明显凯西无法使他在写特别报告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观点。凯西已成为里根政府制定政策小集团中的一员，他最关心的是渴望推翻尼加拉瓜政府。墨西哥不会附和，它在外交事务上非

常盛气凌人，它在引导一项不干涉内政和谈判的独立进程。霍尔顿认为，至少是不知不觉的凯西意图使这一特别报告成为刺向墨西哥心脏的一把短剑。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们看到了一个机会。莫尼汉读了这份特别报告，似乎发现了墨西哥有1/5的可能性会发生动乱。由于实际上墨西哥已破产，看在上帝的份上——破产！莫尼汉判断预测会出现某些问题也不是不合理的。他更喜欢提出概率数字的主意，至少当某人涉猎所有的非常精心研究得出的担忧时会有一项可能有用的预测。毕竟只有当人们说有80%或90%的可能下雨时，你才会撑起雨伞。

在凯西毫无朋友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为霍尔顿作了辩护，它在一份公开报告中说："它已审查了那位国家情报官的初稿和定稿，并发现不同意见被印在研究的最开始部分，对这一行动委员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10月12日，星期五，凯西在兰利总部七层餐厅举行宴会招待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职员们。这是项博取好感的举动，他也希望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庆祝一项新法案的最终通过，这项法案将重要的情报行动、科学技术和安全文件免受令人讨厌的《信息自由法》的约束。总统将于星期一签署它使之成为法律。这一法案在国会的通过象征着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新的、不再打扰的姿态。

在宴会上，当凯西绕场看望大家时，他劝大家多吃点。他已有近五个月未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了，而且最近也不打算去。

罗伯·西蒙斯走近他，并提到1980年里根竞选纲领中有关情报的主要任务均已完成。除了修改《信息自由法》外，还重新组成了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在1982年还通过了一项有关特工人员身份的法案，认定不负责任地公布特工人员的姓名是非法的；还有情报预算在过去四年间已增长了50%。

凯西草草在一张纸上记下了这些，这是段很好的履历。

第二天，星期六，凯西早早起床，这一天气候非常适合周末橄榄球比赛，也是打高尔夫球的好时候，但他要去办公室。他一直在国外视察情报站，现在他想在兰利总部保持前进的势头。局长星期六在总部的出现给所有在那儿或出去的人一个异常的信号，星期一将会出现许多的便条、电话、潦草写就的问询等等。凯西留下了一串足迹。他并不想变得迂腐，尽管他穿上了蓝色夹克，一件衬衫并打了一条领带，但他还是选择了他的绿色方格呢灯笼裤——“共和党筹资者制服”，来表明星期六的非正式性。

他的一名高级助手赶到他家，于 8 时 30 分同他共进早餐。尽管凯西已着眼于第二个任期了，但这还是个回顾第一任期的好机会。离总统大选只有 24 天了，而且其后可以肯定里根和凯西还要在任四年。仍穿着睡衣的索菲娅为他们端来了苹果汁、煎鸡蛋、咸猪肉和烤面包片。当凯西坐在餐桌前时，他就会轻松下来且心境很好。

索菲娅给了他以全力的支持。对凯西来说，她与约翰·里卡罗小说里描写的英国间谍头子乔治·史密雷的妻子恰好相反。索菲娅是一位全身心奉献的女人，她的白色短发向前梳着，没有昂贵的头饰，或许喷了点发胶。自从他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乔治·华盛顿诞辰那天结婚起，她一直在他身边。他们的婚姻就像教堂一般神圣而牢固，索菲娅是凯西超过史密雷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优势之一。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觉得自己已在中央情报局完成了毫不含糊地执行里根政府要旨——以实力重振美国的任务。这个世界仍不安全，因为苏联仍然一心想扩张，但美国已赢得了与之周旋的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在提到外界盛传的他热衷于秘密行动时，他摇了摇头说：“那

是胡说，我主要是个情报分析专家。”他的真正工作正如比尔·考尔比所描述的是带着他的情报分析和新情报往白宫跑，每天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总有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凯西觉得，从里根执政至今，最大的变化是苏联。据最新最好的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说，苏联人正处于痛苦之中，他们的经济一团糟，贪污腐化现象猖獗。苏联人总的来说已停止了他们的“我们就是未来”的论调，因为他们不是。纵观世界大局，凯西清楚地看到通过秘密支持反共行动，世界已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尽管他声称自己主要是一个分析专家，但他仍不断地回到秘密行动上去。

阿富汗行动出现了特别好的消息。凯西认为，在地面上，在那些山地和某些世界上最险恶的地带，俄国人正在遭受重创，而中央情报局的援助正在增加。

在安哥拉，尽管国会立法禁止美国秘密援助抵抗力量，但现在乔纳斯·萨文比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已发展到25万人。

在柬埔寨，约5万名抵抗战士正在同越南军队，这支世界第四大军队作战，他说这场战争实际上已陷入僵局，而中央情报局的援助一年仍只有约500万美元。

在埃塞俄比亚，反对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抵抗力量也干得不错，不过其最重要的秘密援助来自沙特阿拉伯，中央情报局的作用是提供非杀伤性的武器。

在尼加拉瓜，尽管美国停止了援助，反政府武装仍很活跃。总起来说，这个引起争议的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凯西坚信如果在尼加拉瓜举行真正的选举，桑地诺分子将会失败。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及反政府武装的压力，国内对他们的支持正在不断减少。

在萨尔瓦多，美国支持的政府军正在对四支反叛力量变得愈来愈富有进攻性。有情报显示苏联人和古巴人现在认为他们不会赢得这场战争，因而他们同意撤出以巩固他们在尼加拉瓜的地位。

他认为如果不保持压力，美国可能会失去萨尔瓦多。

凯西承认某些行动可能是棘手的，也很危险。但如不这样做就会使事情像在卡特任内那样听之任之，大肆泛滥。秘密行动连同外交、宣传和经济压力在内的一整套计划是有效的。他承认，有时秘密行动在尼加拉瓜行动中所占的比重太大。

他觉得，最后三年半时间里他从他的批评家们那里赢得了一点胜利。中央情报局不能过分顾忌名誉，它是为总统工作的。如果总统的政策受到谴责，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而且国务院或国防部也在责难逃。这些机构——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还没有脆弱到无法承受挫折和批评。

他富有进取精神，敢于冒险。当凯西看到得分牌时，他继续回味着一些其它重大成功。

· 美国开始真正注意到由苏联援助或支持下成立的数百家贸易公司正绕过法律限制，购买高技术设备和设计图纸并转移到苏联。

· 与中国的情报交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在设立监听站问题上而且在其它情报方面包括人工和技术情报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如果苏联人知道其中的细节，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 总的来说，对苏联人的侦察能力得到了改善，有了一些更好的技术可以监视苏联的弹道导弹、潜艇。

· 对国际银行系统进行了渗透，使得中央情报局能够从许多外国银行的极为秘密的帐本中不断获得一些有关苏联秘密投资的情报。

· 中央情报局的反间谍工作得到改善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还有几起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叛逃事件未予公开，因为中央情报局怀疑他们是双重间谍。

· 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第一次接近了覆盖整个世界；已采取行动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安插一些间谍或情报来源，而不管这

个国家是多么偏僻、多么小。在第三世界招募的间谍人数在增加，在中美洲则翻了一番。

·现在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些长远的问题上去。中央情报局是系统研究潜在的但可能在今后 5 或 10 年或更长时间内出现的问题的唯一机构。它正在研究第三世界到 2000 年的发展趋势——食物资源、水、经济发展等。一些诸如当墨西哥城人口达到 4000 万时会怎么样，拉丁美洲贩毒的长远影响之类的问题。随着汽车制造越来越多地用塑料代替铝，那些盛产稀土矿石的国家会怎么样？这类国家之一是苏里南，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2/3 来自稀土矿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较早地、以较低的代价解决问题。凯西至少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在军备控制方面，凯西不关心今后是否会签署新的军备控制协议，他不相信军备控制会起作用。

·传阅了一份逐季发放的需特别警惕的潜在不稳定国家的名单。菲律宾因受到反叛和政局不稳的困扰而名列榜首。

凯西塑造并组织中央情报局为他的六个真正的主顾——总统、副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供帮助。中央情报局不是为国会服务的，也不是为新闻界或公众服务的，尽管他有时讨好六个主顾以外的其他人，但他对他们的基本信号是"滚你的"。

凯西意识到他所当的局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走钢丝的角色，他在行动上除自我克制外，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束缚。由于自我克制不是他的风格，而且情报界认为他放手大胆、头脑清楚，因此他要求掌握一切。例如，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计划是如此全面以至于某些高级官员可以接触到更多报告回来的自己讲话的或引用自己讲话的材料。一位内阁官员去参加一家大使馆的宴会是单纯的社交活动，但有时其结果令人尴尬。第二天早上窃听器里可能装有大使向本国首都发回的报告，报告里摘录了一位未指名美国官

员的讲话。根据国家安全局的规定，美国公民甚至内阁官员的姓名都被删掉了。然而有些报纸的社交版会报告谁出席了该大使馆的宴会，因此只需经过很小的侦破工作就可以确定这位美国公民的身份。

这些窃听记录也表明，在华盛顿的外国大使馆经常歪曲他们的报告并夸大他们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亲密程度，而这些美国官员在某些情况下会大量减少他们与使馆人员的联系并避免出席使馆的鸡尾酒会。

例如，有窃听记录显示日本人在国务院负责进口贸易谈判中发展了一名好情报员，美国官员们读着窃听记录上这一字不差的美国立场感到很惊讶，它甚至还没送给与谈判有关的政府部门呢。

凯西对此只是一笑。他在倒转回一种趋势，要使美国在所有战线上都重新立于不败之地。

从自己的方式出发——秘密、亲自、与众不同，凯西发现间谍工作的本质是非常理想的。有些事业在这里是美国的事业，是值得为之战斗的，即使战斗的很艰苦、很肮脏。凯西对中央情报局很满意，但如果按照一个十分一致的标准来衡量，他会给它打七分。七分或许是及格、良好，但不是最好的，它可能干的更好，这就是他要在星期六上午去局里的原因。使思想一直活跃，这是使他感兴趣的一件事。他几乎没有耐心去进行那种展示并讲解之类的汇报和管理工作。他不断地发出并收到便条和质询。温斯顿·丘吉尔有一个记事本其开头是“今天就行动”，这正是凯西所需要的。

第二天，星期日，凯西警觉地注意到合众社的一则电讯揭露中央情报局的一本《游击战训练指导手册》中建议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有选择地使用暴力”来“压制经仔细选择的目标如法官、警察和国家安全官员等等”。星期三，《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这则报道，其标题是《中央情报局的入门书告诉尼加拉瓜反叛者

如何杀人》。很难避开“压制”意味着暗杀这一推理，这份90页的指导手册还敦促尼反政府武装去“绑架尼加拉瓜政府的所有官员或职员……”

凯西从未看过这一指导手册，但他意识到它是个重磅炸弹，而且他在决定编写它的过程中起过即使是间接的也是重要的作用。《游击战的心理行动》一书在一年前凯西去中美洲后不久就写成并有限地分发给尼反政府武装。他曾极力主张给尼反政府武装一些政治色彩。他指出徘徊在山区里的武装分队采取些打了就跑的行动不会产生多大影响，尼反政府武装应走进村子和城市，传播他们的宗旨，发展政治组织，建立政治基础。这一指导手册的设想是作为一本教材进行教育。

现在凯西拿起支铅笔在这本手册上潦草涂写并在句子下面画线。这份手册一塌糊涂，是一个思想的大杂烩，常常自相矛盾，并充满了革命的和心理学术语——“自我批评”、“集体讨论”等。

有些资料介绍如何建立一个游击队营地，并详细地指出了如何在当地居民中避免敌对情绪。“建一个厕所和一个坑，用来掩埋排泄物和垃圾。”读到这里，凯西笑了，在其它环境下这种想法是即愚蠢又可笑的。这本指导手册要求“含蓄的恐怖”，并谴责“显而易见的恐怖”。

在《突击队》一章里，他读到：“这些人应装备武器（匕首、剃刀、镣铐、粗木棒、大头短棒）并在头脑简单和易受骗的游击队员之后。”

“压制”这个词出现在《选择性质用暴力以达到宣传效果》标题下。这本手册说，在选择了一名桑地诺官员后，“绝对需要召集有关群众，因此他们可以到场，参加这一行动，并系统地提出对压迫者的指控。”一个句子在这本手册的编辑过程中被删掉了，但遗憾的是删的不全，它说“如果可能的话，将雇用职业罪犯来干这些选择出的活”。这令人窘迫地联想到在60年代早期中央情报

局曾雇用黑手党分子约翰·罗塞利去暗杀卡斯特罗。

凯西知道，暗杀是最刺激美国人神经的问题，没有比它更危及美国的国家形象和道德信仰的了，暗杀是美国政纲的第一大罪。用“压制”这个词可能比用“暗杀”还要糟糕。因为它暗示一种朦胧的、似乎有理的否认，而人们认为这种方式正是中央情报局行动的惯用伎俩。在那个秘密世界里，中央情报局无论如何也永远不会直说。

凯西对中央情报局的指挥链上居然无人发现将战争字眼跃然纸上的危险性，而且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又提倡暴力的提法是不符合逻辑的。

游击战的性质本身也出现在指挥手册中，其目的是摧毁合法政府，无法否认其不带俘虏的特点，想不这样做那是太天真了。但如果把它写在书里会怎么样呢？

一场政治风暴爆发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勃兰德说这一指导手册采纳了“列宁的而不是杰佛逊的学说，它信奉了美国正决心在全世界加以挫败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戈德华特要求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出全面的解释。还有人要求设立特别检查官，还有人要凯西的命。还有许多指控说美国在提倡恐怖主义，它们主要来自民主党人。当天下班时凯西简直要疯了。

第二天，他决定应发表一份声明保证进行调查，但这一指导手册及他所暗含的问题在新闻中占了压倒优势，因而他不得不去现在已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局势的白宫。白宫以总统的名义取代凯西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说：“政府从未提倡或宽恕过政治谋杀或任何其它对平民的袭击，而且我们将来也不会。”白宫告诉凯西让中央情报局的监察主任进行调查，并且指示总统的情报监督委员会进行一次独立的调查。众议院及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也分别开始了他们的调查。

就凯西而言，他真想从幕后跃出予以反击。你们到底想要什

么？它是场战争，不是郊外野餐。它是混乱和激烈的，那里的人们在相互残杀。它就是如此，而且世界就是如此。

10月21日，星期天，里根和蒙代尔的第二次公开电视辩论开始了。像千百万人一样，凯西也收看了这次辩论。给里根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有关现在所谓的“暗杀”指导手册的尖锐问题。

“这实际上是否是我们自己的由国家倡导的恐怖主义？”发问的是报业辛迪加的专栏作者乔吉·安妮·格伊尔。

“不是，”里根说，“我很高兴你问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它压在许多人的心头。”他接着吞吞吐吐地说，这份指导手册只有12本带有唐突语言的副本，而且只是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一个头目监督了这本手册的出版和印刷。

格伊尔又问到：“总统先生，你在暗示说中央情报局正在尼加拉瓜指挥那里的反政府武装？”

里根说：“当我说到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的一个头目时恐怕是我说错了。中央情报局在那里没有任何人指挥它的行动。”他然后又说是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其它国家的情报站的人监督并出版了那本指导手册。

“那么当总统宣誓就职后，他的职责是干什么的呢？”蒙代尔又说道。随即以一篇有关政治恐怖和暗杀的演讲向里根提出挑战。

里根在辩论中结结巴巴，许多人问总统是否年老气衰了。《华尔街日报》已直接问到此问题，在其头版头条发表报道，题为《竞选中的新问题：最老的总统现在是否显出岁不饶人？》。

凯西非常担忧，这一事件所包含的都是构成灾难性后果的因素。众议员在体会，参议院要求向仍在华盛顿的情报委员会成员及职员们进行汇报，于是派了两位参加尼加拉瓜行动仅一个月左右的初级行动官员去国会山汇报。

凯西可以肯定在选举前这些调查不会完成，因而也无法公布其结果。同时，他需要某个人站在前台公开为中央情报局辩护，一

位独立而又可靠的人。由于他与戈德华特的关系在布雷惨败后已有所恢复，因而凯西决定试一试他是否可以找一位参议员帮忙。但这位情报委员会主席正在亚利桑那州自己家中，凯西决定写一封手头传道的信加以说明，并送给戈德华特一份新闻稿草稿请他发表新闻稿上说这一指导手册没有什么问题。

但戈德华特从亚利桑那传话说他不能，也不会在调查结束前发表评论．并像他常在布雷事件上那样补充说："我将设法拯救凯西。"他说不要派任何人来，他在休息。

凯西需要一个大人物。尽管戈德华特冷冷地拒绝了，他还是决定派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克莱尔·乔治及另一位高级行动官员文森特·康尼斯特罗去亚利桑那州。凯西希望，参议员将会对如此高级的官员飞过几乎整个美国来找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乔治和康尼斯特罗用假名搭乘下午的班机，约下午4时左右抵达亚利桑那，并乘坐出租车直奔戈德华特的寓所。戈德华特心境很坏，不，他不想听，不，他不准备发表声明。

"不过请看一下，"乔治试图温和地解释一下——

"不，"戈德华特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最好离开这里。"这位助理局长和他的助手很快乘坐飞机飞回华盛顿。

莫尼汉参议员清楚地认识到这本指导手册的用意。在哈佛大学他曾读过一篇有关毛泽东发动暴动技巧的文章，其技巧是：找出地主，把他单独提出来并进行公审，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让村子里的人投票，然后目睹处决场面。这是一项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有效技巧。他曾在越南战争期间在一本"绿色贝雷帽部队"指导手册上见到这种技巧，他使得平民大众变成了叛变者，使他们都有相互的利害关系，并产生一种满足的感觉，一种事情将会变得更好的感觉，一种正义将会得到伸张的感觉。

当中央情报局肯定他的高级官员们包括凯西、麦克马洪、斯

坦和克拉里奇（他无法读，因为他不懂西班牙语）均未审阅或接触过这本指导手册后，将这一结论送到了白宫。这使得许多调查可以解除并使凯西避免直接受累。

第二天，凯西给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每位成员分别写了封私人信件，想把他解释过去。他说，总起来看，从上下文关系来看，从它所提出的方针和目的来看，这本手册的意图是想使行为能更有节制。

但这位局长已精疲力尽了。就他所知，真正的内情在于新闻界和国会民主党人们是如何联手行动的。一位合众社的记者得到一份该指导手册的副本并把它传给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证实这是中央情报局的产物，这位记者就此作了报道，其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又跳上跳下。凯西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乔治·劳德曾威胁说，有一天他要写一本有关国会情报委员会泄密的书。劳德开玩笑说他将给他的书起名为《这些人是如何泄密并亵渎美国的》。

舒尔茨提出一项尼加拉瓜和平方案并想交给正在德斯蒙尼斯进行竞选的总统。凯西与温伯格和柯克帕特里克商讨对策，他们一致同意必须阻止舒尔茨。凯西几乎要把自己挡在“空军一号”飞机的轮子下了，他清楚地表明如果国务卿一意孤行，将会有许多人辞职。舒尔茨让步了。

11月6日，里根赢得了59%的选票，并在49个州获胜，唯有在蒙代尔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例外。

二十

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壁炉的火苗摇曳着，使得在这个秋天的下午大选胜利后召开的会议气氛显得很亲切，甚至如同在家里一样。凯西带着他的文件及一份写在一张纸上的讲话要点走进了办公室，他肯定自己已将此问题分析透了，现在到了第二任期，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想能征得一份总统指令，来指示中央情报局去训练和支持在中东的一些外国人组织的小分队，使他们能对恐怖分子实施先发制人的袭击。当有情报显示有人要袭击美国的设施，例如一个大使馆或军事基地时，可调动这些小分队，杀死这些恐怖分子或使其失去战斗力。总统清楚这些疯狂的和自杀性爆炸，最明显地表现出强国的软弱无能，因而他同意采取一些行动。

温伯格拒绝军事介入。新泽西号战列舰对黎巴嫩的炮击并未奏效——炮击太泛，太无选择性，没有能精确定点的准确性，空袭既杀死恐怖分子，也杀死无辜者。不，谢谢，我们不干，这就是五角大楼的信号。温伯格两臂交叉着，予以拒绝。

凯西不得不把自己的中央情报局硬扯进来，尽管他们又发牢骚又抗议。麦克马洪也发表了一篇拒绝讲话，认为中央情报局是搞情报的，不是搞暗杀的。但凯西很顽固，而且舒尔茨支持他。

凯西向总统说明，这份总统指令只是训练这些小分队，并使它们作好准备，如要采取具体行动还需要另一份总统指令。以色列人对这类先发制人的秘密袭击很在行，但最基本的是政府不要

在此事上与他们一起干，美国的任何行动都应被人看做是反恐怖分子的，而不是反阿拉伯人的。

幸运的是，甚至不会有人知道存在这些新的小分队。首先，要训练三个五人小分队，并把他们部署在黎巴嫩。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都将秘密进行；它将不会被追踪至中央情报局或美国；一切都要具有可否认性。

总统告诉凯西，通报国会情报委员会，但引用法律条款只允许他通知八个人——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副主席，参众两院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

凯西说他将私下处理这事，那将强调其保密性，不允许任何嘴巴不牢的职员知道。他看到一个表明中央情报局可以真正实施秘密行动的机会。

里根签署了这项正式的总统指令及相应的《国家安全决策指示》。这些黎巴嫩人小分队的直接费用达100万美元，当这项计划扩大至其它国家时，其耗资将达530万美元。

海军少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麦克法兰的副手，也出席了那次会议。他后来对同事描述那次午后的会议说："凯西咕哝着，而罗纳德·里根只是点头。"

凯西决心把它进行到底。麦克马洪在每一步都和他争辩，在官僚圈子里散布怀疑。他们能信任那些外国人吗？尤其是黎巴嫩人？中央情报局能控制他们吗？在麦克马洪看来，对第二个问题的肯定或否定的答案都意味着麻烦。如果中央情报局能够控制他们，中央情报局能不卷入暗杀吗？无论如何掩饰，参与先发制人的袭击、暗杀行动的计划不是正为里根的行动命令所禁止的吗？如果中央情报局不能控制他们，他们会不会发射无导向的"导弹"？而且麦克马洪更怀疑，他们能得到高质量、准确和及时的情报，足以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袭击吗？目前为止，他们还无法达到。

斯波金帮助建立了凯西的理论基础。他曾写了一份法律评价，

断言先发制人的行动不过是警察首先开枪打死拿枪指着他的罪犯的一类“暗杀”行为，他称之为“先发制人的自卫行动。”

凯西将注意力集中在贝鲁特。过去的八个月，它给中央情报局造成了感情危机。威廉·巴克利于3月16日在贝鲁特被绑架，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在贝鲁特大使馆的政治官员，实际上他是凯西在黎巴嫩的情报站站长，凯西确信绑架他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知道他的身份，他几乎每天都催逼行动处提出找到和营救巴克利的办法。他曾指示采取一项非同寻常的措施。他批准给报信者奖金，命令加强对通讯的截获，增加了卫星照片以寻找线索并建立了一支营救人质特别行动队。他清楚地知道，他和中央情报局为巴克利讨价还价违反了政府的政策。政府禁止与恐怖分子谈判并赎回人质。这一灾难使中央情报局大为出丑，在贝鲁特的情报站不得不削减为只剩下站长和卫兵，它的许多情报功能都转给了黎巴嫩情报局——一个强硬、致命性的组织，实际上是黎巴嫩政府当局在首都的最后一点残迹。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设备和技术。

对于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克莱尔·乔治，这位1975年至1976年间的贝鲁特情报站站长来说，巴克利被绑架使他回想起一连串恶梦。在他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期间，两名美国政府官员被劫持并被作为人质达四个月之久。那时他生活在极度痛苦之中。乔治让行动处全体成员努力营救巴克利。这不仅是想让巴克利安全返还；这一措施是发给几千名在海外工作的行动处人员的一个信号，中央情报局将采取一切措施去营救它的每一个工作人员。联邦调查局的一个专门训练用来确定被绑架人质方位的专家小组被派往贝鲁特，一个月后竟两手空空地回来了。

现在到反击的时候了。但训练黎巴嫩人被证明有问题，无法控制他们，他们愿意且非常愿意杀人。凯西手下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开始退缩，局里没有人想出头。凯西看到这些被“炮弹炸晕”的

面孔，在遇到真正的危险时居然如此恐慌。他在四年里带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但其中许多人，包括麦克马洪这位预算办公室的精打细算的官僚及行动处的一些人，不理解他对他们职责的解释。

整个一项大胆的计划将要付诸东流。凯西决定把它转给沙特情报机构和法赫德国王。沙特答应提供300万美元予以协助。

1985年初的一天，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王子接到国王直接派信使送来的密信。信中谈到与凯西合作的秘密指示。班达尔立即去兰利拜访凯西。凯西会见了他，但建议找另外一个地方再次会面。他说："让我们吃一顿。"这似乎表明他不想在中央情报局的总部谈此事。他们一致同意周末在班达尔的家中，沿链桥路仅走一英里的一座宫殿式的寓所里共进午餐。凯西说他将带索菲娅去。索菲娅意识到她和比尔曾看过这所房子并想买下它，比尔喜欢它的大藏书楼。索菲娅发现大使的妻子很善良也很漂亮，她觉得这顿午餐如同又一次华盛顿社交义务。她后来说，我一点看不出它有什么意图。

午餐后，凯西和班达尔单独走到花园里。在避开房子和卫兵后，凯西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小卡片并把它交给大使。它是一个手写的日内瓦一家银行的帐号，这300万美元将转到那里。

班达尔说："我一转移完这笔资金，就将关闭这一帐户并把这纸条烧掉。"他要保证不会追查到沙特头上。

凯西说："不要担心，"他这一头也将是清白的，"我们将立即关闭这一帐户。"

班达尔常发现美国人对世界显得太幼稚了，但这个人却敢想敢干。他认为凯西如同当年中央情报局的埃德加·胡佛。

班达尔知道如何能使一个话题永远被抹杀掉。他正在向尼反政府武装输送资金，这受到广泛的怀疑，但他只是用普通而自信的一笑和一篇辩解说它如何不合情理的长篇演讲就把此事否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班达尔和凯西都很重视的那种关系——一

种掌权者可以进行坦率、可否认的对话并达成只有他们自己明白的协议关系。班达尔和凯西都一致认为，对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大规模打击符合美国和沙特两国的利益。他们清楚恐怖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和象征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领袖锡克·法德勒拉，贝鲁特希兹布拉真主党的领袖。法德勒拉与贝鲁特的三起美国设施爆炸事件均有关系。两人一致认为，一定要杀死他。

其后决定将有效的行动控制权交给沙特人，尤其由于中央情报局内部对积极反恐怖措施的反对日益增加了。沙特人提出让一个曾在英国空军特别勤务部队服过役的英国人担任指挥员。英国空军特别勤务部队实际上是一支精锐的突击作战部队，这个人曾在中东各处呆过，并曾从另一个阿拉伯国家多次进出黎巴嫩。他是一位复杂行动的理想指挥者。当然，中央情报局不必作任何“清除”工作。如果有人问到，沙特人可以支持中央情报局，否认参与或知情。与国外情报机构的联盟是中央情报局不受国会监督的行动之一，凯西曾断然拒绝告诉情报委员会有关秘密工作的情况。而且在这件事当中，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机构毫不知内情。没写下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记录。沙特存在日内瓦某银行帐户上的300万美元通过其它银行帐户的转移而“洗掉了”，以确保它不会被追查到源头。

这位英国人建立了几个独立的行动小组，分别实施这一暗杀计划的不同部分。它们彼此之间除了通过他以外没有直接的通讯联系。他们雇了几个人采办大量的炸药，雇另一个人去找一辆轿车，给报信者付酬以使他们确切知道在某一特定时间法德勒拉在何处，雇了另一个组织用来设计行动后的假象以使该事不会与沙特人和中央情报局联系起来。这些行动都是通过黎巴嫩情报机构雇人完成的。

1985年3月8日，一辆装满炸药的轿车驶到离贝鲁特郊区法德勒拉的高楼住所约50码的地方爆炸了。炸死80人，炸伤200

人，留下一片废墟、大火和倒塌的大楼。那些碰巧在其近邻的人被炸死、炸伤或吓坏了，但法德勒拉逃了过去且秋毫无损。他的追随者把一幅写有“美国制造”的大标语挂在这座被炸毁的大楼前。

当班达尔看到这一新闻报到，他的胃一阵痉挛。必须仔细掩盖其踪迹，于是就编造和传播以色列人是这一汽车炸弹事件的幕后者这一消息。但沙特人需要更多的东西来证实他们没有参与。只有一个办法，即他们向法德勒拉提供不容置疑的情报，引导他找到所雇的行动者的一部分。正如班达尔所解释的：“我向你开了一枪，你怀疑到我，但随后我交出了我的司机说是他干的，你不再会认为我是个嫌疑犯了。”

但法德勒拉仍是个麻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沙特人设法接近他，并问他在付酬的前提下他是否可以充当对沙特和美国所进行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早期预警系统，他们可以付给他 200 万美元现金。法德勒拉接受了，但说他希望这笔现金能变成他领导的一部分人的食品、药品及教育费用，这会增强他在其追随者中的地位，沙特人答应了。

从此再也没有发生法德勒拉支持的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袭击。

班达尔说：“贿赂他比杀他还要容易些。”

凯西对用相对来说这么小的一笔钱能解决这么大的问题感到很吃惊。

班达尔应凯西的请求又进行了另外两项秘密行动。第一项是支持乍得反卡扎菲行动，它耗资达 800 万美元；第二项是一次耗资 200 万美元的秘密行动以阻止意大利共产党掌权。这两项行动一直没有暴露或追查到沙特人。

尽管暗杀法德勒拉的行动失败了，可黎巴嫩情报机构开始居功自傲。尽管它起的作用相对不大，但显示力量是必要的，应该

表明血债要以血来偿，将用恐怖主义来对付恐怖主义。凯西感到沮丧的是，中央情报局与黎巴嫩情报机构的关系及训练用于先发制人袭击的小分队，使得中央情报局处于危险之中，它太接近于暗杀阴谋了，而麦克马洪虽不知沙特所起的作用，但要求断绝与黎巴嫩情报机构的联系。他敦促说中央情报局必须脱离秘密的反恐怖分子的训练工作。凯西别无选择，因而这一要求先发制人袭击的总统指令被废除了。

然而，某些与黎巴嫩情报机构的长期关系必须保留，因为中央情报局依靠它获得情报，给窃听站配备人员及提供安全保障。3月后期，两名黎巴嫩情报机构的中校和三名少校到华盛顿接受三周的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管理训练。他们被安排住在乔治城的四季宾馆并每天乘车前往麦克林的一处安全房子里，在那里他们听取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讲课，并与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座谈，还享用一顿一位亚洲厨师做的午餐。

在3月8日爆炸事件前后，凯西收到他任职至今最重要的一份情报报告。它是由苏联内部一位重要的秘密情报员送来的。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监视苏联领导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长期以来的病情，他任苏共总书记刚刚一年多。这份报告说他已去世，但这一消息在政治局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之前仍对苏联人民及世界其它国家保密，凯西将此报告送到了白宫。七天过去了，仍未得到证实，但凯西相信这个情报员是对的。星期天，3月10日，一名正在美国访问的苏联高级官员奉召回国，而且第二天早上传来了不容置疑的信号：莫斯科电台开始播放古典音乐，包括拉科曼尼诺夫的作品。早上6时，苏联宣布了这位领导人的死讯。四个小时后，莫斯科宣布说，统治苏联的14名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这次选择继任者难以置信的迅速，这表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是正确的。凯西认为，很明

显契尔年科之死被掩盖了好几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央情报局在情报上的一个大胜利，因为没有比监控苏联领导层更重要的情报任务了。但由于未能证实，或缺乏其它细节，因而使所存在的情报缺陷显得更加明显。这种绝密情报是多么的无用，白宫靠它能干什么呢？这点来自苏联内部的琐碎情报也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苏联体系的内部工作情况知道的是多么得少，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对继任者之争毫不知情。

凯西对一则新闻报道欢呼戈尔巴乔夫上任，并形容这位苏联新领导人讲究实际和开放而感到好笑。在凯西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他都是那个制度的产物，苏联体系在最近这些年一直由三位已故领导人所操纵，他们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有可能戈尔巴乔夫将来会表现得有所不同，但凯西断定那仅仅是表面上的，他预测戈尔巴乔夫只会更热衷于输出颠覆和动乱。凯西很欣赏戈尔巴乔夫施以恩惠的方式，把他的人拉进政治局并安在重要的位置上。凯西向白宫的报告中警告不要被表面现象所欺骗。

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仍需要资金。自 1984 年 10 月，国会完全砍掉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资金时起，凯西不得不遵守这个回旋余地很小的法律。该法律申明不得将“中央情报局的资金由任何国家、组织、运动或个人用来达到直接或间接地援助在尼加拉瓜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的目的或其相同的效果。”

凯西曾批准了一份电文：“减少后勤供应站并停止一切可能被解释为直接或间接援助我们在这一计划中打交道的那些尼反政府武装组织的行为。”与尼反政府武装的所有接触都将只是重复一遍，只是出于美国利益所必需的收集建设性情报和反间谍工作。

甚至当沙特大使班达尔随便地向凯西提到尼反政府武装问题时，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回答说（有一个记录员在场）：“遵照法

律，殿下，我被禁止同你谈论这个问题。”

退役陆军少将约翰·辛格劳伯，一位前战略情报局人员曾为尼反政府武装筹集私人资金。当他向凯西提出这一问题时，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回答说：“杰克，我要把你从办公室扔出去。”

但在与尼反政府武装领导人，私下称凯西为“比尔大叔”的阿道夫·卡里洛的六次会晤中，凯西全神贯注地听着有关尼反政府武装进展的报告，并对中央情报局不能直接采取什么行动表示歉意。

约瑟夫·库尔斯，一位富有的科罗拉多州啤酒公司总经理，也是凯西的老朋友，到凯西在老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拜访他，并要求为尼反政府武装捐款。凯西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应该找奥里·诺思。”库尔斯这位保守派事业的大赞助人被告知绕过拐角去诺思的办公室，诺思说服他捐 6. 5 万美元买一架可用于短跑道的轻型飞机。他给库尔斯看了一幅这种飞机的照片，并称之为“你的飞机”。这架飞机被称为“莫勒”，经国家安全委员会由麦克法兰和诺思的安排加入了斯考德将军的私人公司。

在 1985 年初，凯西命令写出四份独立的有关尼加拉瓜的《国家安全特别报告》。其中包括：桑地诺武装力量已增至六万五千人；他们在尼加拉瓜巩固政权的措施；苏联和古巴给予他的外援；以及桑地诺政权向邻国萨尔瓦多和中美洲其它国家输出的革命活动。凯西将四份文件归纳为一句话交给总统。凯西说：“苏联人和古巴人正在建立和巩固一个滩头堡，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进行放肆的颠覆活动。”

自 1985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后，凯西高兴地看到吉姆·贝克和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交换了职位。贝克改任财政部长，而里甘任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是凯西从在华尔街年代起的老朋友。贝克、米斯和丹佛三驾马车的白宫使总统有了一个互相竞争的体系，三人中每个人都想把其他人杀光，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侥幸

作成什么事。里甘与此相反，他是一个百万富翁，曾任麦里尔市和林奇市市长，他更乐于由直接为他工作的职员们团结一致来贯彻总统的意愿。凯西发现总统在这个班子的帮助下显得更加轻松和自由。总统对自己本身，自己的观点和直觉也感到更加惬意。在会议上，里根不必再在航行于国会、新闻媒介和“华盛顿内部”利益即反映贝克“自身利益”的观点所造成的迷宫之中。里甘从迷宫中救出了总统。里根说话比以前多了，他的想法被给予了优先考虑。你还需要什么？这位新办公厅主任经常这样问里根。

凯西看到这是一个采取一致行动为尼反政府武装赢得资金的机会。但每当他去国会情报委员会时，他们总想知道何时这些尼反政府武装会取得些成果。他私下对一些共和党议员说：“这里没有该死的占卜用的水晶球，我无法告诉你。”

里根第二任期首批来访的国家元首之一是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他于 1985 年 2 月 11 日抵达华盛顿。在此之前麦克法兰和班达尔王子多次会谈以保证给予国会以特别的重视。他们找到了一个象征物以强调国王的权威和重要性，并在一次与里根的秘密会议中达成了一致意见。

当麦克法兰和班达尔会谈时，提到了尼反政府武装的问题。麦克法兰再次感到班达尔是自愿的。对班达尔来说，这是个明显的诱惑。这位王子指出，无论如何，沙特人愿意将他们的秘密捐赠增加一倍，达每月 200 万美元。总起来说，他们将再提供至少 1500 万美元。

2 月 12 日，里根和法赫德进行了简短的私下交谈。国王清楚地表明沙特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行动将继续进行，里根对此表示感谢。麦克法兰也向总统转告了这一好消息。但这只是临时的修补，麦克法兰仍还焦虑，他确信只有有希望得到国会的明显支持，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政策才会奏效。应从美国财政部寻找新的和

直接的资金。

总统留意到凯西的忠告，并公开说尼反政府武装是“我们的兄弟”，因而“我们不能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时候离开他们”。他说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使桑地诺政权“认输”。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他又补充说：“他们（尼反政府武装）相当于精神上的开国元勋。”

但当年春天，凯西震惊地注意到白宫被一件小事所烦扰着。总统计划参观西德匹兹堡的纳粹公墓，那里埋葬着一些党卫军的官兵。顿时，对他的反犹太主义和无情之类的指控铺天盖地，使政府徘徊于犹豫不决和防守之中，并处于瘫痪状态。

凯西担心，白宫没有制定针对即将到来的就有尼反政府武装问题关键性的投票表决的立法战略，但他个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是个反面的象征并不得不掩其锋芒。投票这一周，他到匹兹堡发表演讲并参观报社，而在白宫好像没人在家似的。4 月 24 日，反对尼反政府武装的民主党人在众议院把这一问题付诸表决。一项打折扣的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 1400 万美元非军事援助的建议被 215 票对 213 票否决了。凯西感到很震惊，这一结果是如此接近，一票的转变将导致平局，而两票就将赢得胜利。凯西说：“如果蒂普·奥奈尔没有那些天主教国外传教会的修女们给他写的信，我们可能已有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项目了。”

凯西定期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我第一次参加是在 1985 年 4 月 17 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由福莱切尔法律和外交学院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其主题是恐怖主义。他站在讲台上，耸起双肩，含糊不清地读一篇 21 页的演讲。他读了长达 45 分钟，很难听清和领会。在他事先给我的副件中，我在两个句子下划了线：“我们不能也不会在值得使用武力的地方不采用武力行动预防、先发制人地打击或报复恐怖分子的活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有我们所需要的对恐怖组织采取行动的特别力量和潜能。”

凯西没有意识到对演讲作一结论或结尾。当他演讲完时，他只是突然停下来，而听众中无人意识到他讲完了，直到他说“非常感谢大家”时，才有稀稀拉拉的掌声。他站在那里回答20分钟的问题，并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

一个很明显与大部分听众步调不一的人问凯西：“尼反政府武装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什么区别？”凯西愤怒地问：“什么？”当重复了一遍问题后，凯西迟疑了一下，最后说：“尼反政府武装有一个国家，他们要夺回它，而巴解组织则没有。”

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知道我计划写一本有关中央情报局的书，因而他过来问我是否想搭中央情报局的专机飞回华盛顿，它将在晚上10时起飞。我虽已在举行会议的地方登记了宾馆，但我很快结了帐。他走出宾馆，穿着一件贵重的新的厚大衣，扣子扣得杂乱无章，就好像一个不懂如何穿衣的孩子，由他妈妈给穿好了衣服一样。

他的飞机是一个螺旋桨推进的“格尔夫斯特里姆”型飞机，旅行时间将很长。凯西找了个座位，解开领带并让他的警卫给我们端来苏格兰威士忌和一听花生米。他一把一把地把花生米往嘴里填。这位警卫拉上了厚厚的帘子，我们开始进行了两小时的连续交谈。局长说他对没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在场作旁证感到略有些不放心，并且他提醒我，他曾要求中央情报局其它工作人员避免单独接受记者采访。但当我们涉及到诸多问题时他大都作了回答，这些问题包括多诺万将军、新的“拉克罗斯”号全天候卫星、尼加拉瓜行动、他的被绑架的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巴克利、1940年他参加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里根、里根内阁、麦克马洪和中央情报局。在谈到他父亲时，凯西只谈了一句：“他一生都在纽约市养老金系统当公务员。”

二周后，我飞往纽约参加在国际俱乐部的午餐会并听他演讲。

他开头说道：“有人要我谈我常说的话题，那么我就谈谈情报

的状况，这是一个我不能很自由地阐述的题目，因此我要谈一谈世界的状况，一个我了解少但可以更自由阐述的题目。”他的话引起长时间赞赏的笑声，他比在剑桥时显得轻松多了。几周前，国会拒绝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明显激怒了他，他对此发起了抨击。他说实际上美国与苏联正处于交战状态。他说：“这不是一场未宣战的战争。”他把现在比作是当年没有认真对待希特勒的年代。他说，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已放出了基督新约《启示录》中的四个骑手——饥荒、瘟疫、战争和死亡。

他发表了从未有过的公开抨击。“在被占领的国家——阿富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尼加拉瓜，在这些国家里，其马克思主义王朝或者靠外国力量夺取或者靠其维持着……在那里发生了与40年前纳粹德国在欧洲杀掠相类似的大屠杀。”

他再次邀我同乘他的飞机返回华盛顿。我们谈到了里根、尼反政府武装、黎巴嫩、恐怖主义、他的朋友、他的钱、他的目标等等。他谈到了他在纽约皇后区度过的童年。该街区是一个相互间关系纯朴而持久的世界。他回忆起在去公立第13和第89中学的路上，有时会打架。那是在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孩子们就知道成帮结伙地打架。他说：“我有时赢，有时输。”他记得打败他的那些孩子吗？他说：“你认为我会忘掉什么人，尤其是那些打败我的人吗？”他说着，两眼严厉地盯着我，嘴里仍满是花生。

他很快把话题回到尼反政府武装及国会投票失败上。他说：“管理缺乏效率，白宫居然不能在同时完成两件事……而总统也没有兴趣，他仍有其本能，但他甚至不会集中注意这件事，更别说来完成它了。”他沮丧地摇摇头，“总统不重视苏联日益膨胀的扩张主义。”

凯西一直受到总统的各方面被动性——被动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冲击。里根从不召集会议或制定每日日程表，他从未告诉过凯西“让我们干这个”或“给我那个”，除非对其他人的行动或事

件作出反应。在此人的心中有感情障碍，或许是其父亲对他所造成的反响。他的父亲在大萧条时期曾失业并沦为酒鬼。凯西吃惊地发现这位美国总统在星期一、二、四自上午9时工作至下午5时；在星期三则为9时至1时，下午去骑马或运动；在星期五，他有时在下午1时至3时离开白宫前往戴维营。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工作的时间里，这位总统经常有成段的休息时间——二个甚至三个小时，常常要求把“里根迷”们的信拿来并坐下来写回信。许多晚上他在寓所里与南希独处，并边看电视边进晚餐。星期六晚上在戴维营，他们可以同任何客人们呆在一起，他们两人既喜欢老电影也喜欢新电影，而且他们的职员们常同他们一起观看。凯西似乎在说里根未履行职责并与其职责不相称。

凯西发现里根很怪。里根曾说如果他在电影界很成功，他本会呆在那里的。尽管他总是很快活，但或许除了南希他没有其它真正的朋友了。尽管他很懒且注意力分散，但他却有着近乎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并能在几分钟之内研究一页剧本或演说，然后很完美地表达出来。凯西是里根的一个很认真的学生，但他说至今为止也并没有摸透里根。

飞机在安德鲁空军基地降落了，凯西要从那里立即乘机前往远东和菲律宾进行一次10天的巡回访问。菲律宾正处于动乱之中，他打算在那里会见马科斯总统。

他指示说：“不要对任何人吐一个字”，然后他要求我躲在飞机上直到他登上为他准备的大型喷气式客机为止。我看到一群中央情报局人员正在舷梯旁等候着他。他又说，一辆货车将会把我送到出租车那儿，“否则，他们可能会认为我带你到这里来太轻率了。”

直至今日，我仍不知道他同意与我进行这些谈话的原因何在。

恰在众议院拒绝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几天后，尼加拉瓜

总统飞往莫斯科，要求提供 2 亿美元援助，这刺痛了许多投票反对援助的众议员，而且许多众议员说这很令人尴尬，如果他们在投票前知道的话，他们可能已投票赞成援助了。凯西不知道是谁的时间意识更糟，是美国政府的还是奥尔特加的。

凯西意识到国会拒绝提供援助并不一定意味着行动的终结。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奥利佛·诺思已用一项可靠的计划来填补了这一空白。在一份呈给麦克法兰的备忘录中他建议，总统公开请求向尼反政府武装和人捐赠。麦克法兰让他等一段时间，但批准成立"尼加拉瓜自由基金联合会。"它可以作为一个免税社团，从而使捐赠者们能够从税款中减去他们捐赠所占的部分。诺思推算如再有 1500 万到 2000 万美元，他们将能把尼反政府武装的力量扩大至约 3.5 万人。

诺思还与南朝鲜和台湾商谈向尼反政府武装捐赠之事，并且他还增加了在行动上的作用。有一次，他提出一项计划，要击沉向桑地诺政权运送武器的"蒙尼姆伯"号商船。

早在 1 个多月以前，我就知道里根总统曾签署了总统指令，要求建立三支由黎巴嫩人组成的对恐怖分子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秘密小分队。凯西的新闻发言人劳德曾试图劝说《华盛顿邮报》不要发表这一报道。我们发现这一绝密总统指令已经在那次炸死 80 个人的汽车爆炸事件后废除了。我们只知道黎巴嫩情报机构在那次事件中的作用，但一点不知道沙特人的秘密作用，及向该行动捐款 300 万美元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没有理由撤消这一报道，因为这一行动已经失败，而且这一总统指令已成了历史。

劳德恼怒地说："它像是用一把锤子砸一个旧伤口。"这一报道发表于 5 月 12 日，其标题为《在未经批准的爆炸事件后反恐怖计划废除了》。

三天后，乔治·劳德给凯西写道："看上去很明显，当时不管

我说什么，伍德沃德都计划发表这一报道。我强烈地指出他的报道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而且是一份‘谋杀的请帖’。我说如果他是法德勒拉并看到许多支持者包括妇女和儿童被炸飞，然后读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他肯定要对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进行报复，无论这些美国人是官员还是其他人……我告诉伍德沃德，约翰·麦克马洪让我告诉他，如果他发表了这一份报道的话，那么他将永远不会允许再进入这座大楼。

“我进一步补充说，这类不负责任的报道将使我们认识到《华盛顿邮报》不仅毫不关心在黎巴嫩的美国人的生命安全，而且还在继续进行其传统的反对既成权力机构的讨伐运动。这一次是联合了国会监督委员会成员和职员们，后两者本来就有着其‘干预’秘密行动和给情报界制造麻烦的既定日程表。

“……我还补充说，我发现他和邮报的行为很卑鄙。将来我们将采用对待杰克·安德森、塔斯社及其此类记者同样的方式来处理你与我局的接触。”

凯西就那篇报道给我打了电话，他说：“许多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我确信那不是篇非写不可的报道，但我无法控制它，尽管我或许应该那么做。通过这篇报道，可能会被人抓住把柄——好像是我们自己派突击队去干的一样。”他说它可能使他和中央情报局的日子更加难过，这件事将导致致命性的后果。我们不得不对它所透露的事实及所造成的印象加以注意。“你本不应该发表它的”，说到此他的声音一直是平淡的，但其后冰冷冷地抛了一句：“在它结束之前，你的双手可能已沾满了鲜血。”

二十一

两天后，凯西读了《关于对伊朗的政策》这一备忘录，共五页。它是凯西从雷厄姆·福勒手中拿到的。福勒在负责近东和远东地区的国家情况办公室。

“美国正面临着制定新的对伊朗政策的严酷局面……最坦率地说，霍梅尼政权正在摇晃而且有可能走向求实的阶段，我们很快将会看到继任者之争。美国几乎无牌可打，而苏联人却有很多张牌。”

福勒提到美国对伊政策的“孪生支柱”——拒绝向伊朗提供武器并对伊朗支持的恐怖主义随时准备予以还击。他指出，这些政策已完全是消极性的，“而且可能更有利于苏联人的利益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利益。”

“然而，我们也许应想出某种更大胆或更冒险的政策，以至少保证美国在那个逐步变化的环境中有更多的发言机会，这是绝对必要的。”

“没有人对我们如何回到德黑兰有任何英明的主意。”

凯西觉得到时候了。几个月来他一直催促福勒提出点东西来。他已决心在第二任期内在中央情报局完成几件事情，它们必须是有意义的。他有自由，可以首先行动，可以使事情继续进行，可以提出些新主意。他将福勒文件的一份副件送给舒尔茨。

三天后，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份《国家安全特别报告》，它的题

目是《伊朗：近期不稳定的前景展望》。它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在伊朗将无牌可打。凯西很高兴看到麦克法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几名职员们提出一份《国家安全决定指导》草案交总统签署，它包括授权美国向伊朗出售部分武器，这份草案对此加以微妙的处理，“这包括在逐项审查的基础上选择地提供一些军事装备。”

凯西给麦克法兰写信说：“我非常赞成这份《国家安全特别报告》中对美国对伊朗政策所作的探讨，尤其赞成它所强调的，应采取及时和实际的步骤来增加美国在伊朗的影响，以保证苏联不会成为这个重要国家变动和骚乱的主要受益者的观点。”

舒尔茨给麦克法兰写信说他不同意报告的观点，尤其是当与伊朗有关的组织正在黎巴嫩扣押着美国人质的情况下。”温伯格在他的复印件上写道“荒谬”。他觉得它很荒谬，如同亲切地邀请卡扎菲来共进午餐一样。

但凯西懂得，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的否决对这一主意并不一定是致命性的。

美国人在贝鲁特仍继续遭到绑架。5月28日，在那里的美国大学医院院长戴维·雅各布森被绑架。中央情报局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巴克利被绑架已一年多了。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即使是超常的行动。

在白宫，诺思制定了一项计划。两名美国缉毒署特工与他们在中东海洛因交易中用过的一名“眼线”进行了接触。那人说付20万美元可以使两名美国人质得到释放，其中一人将是巴克利。中央情报局行动人员就此提出了许多疑问。美国的政策是不付赎金。他们怎么能肯定这个内线是诚实的？但麦克法兰使总统批准了一项私下筹集资金的计划，这一任务交给了诺思。他与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特进行了接触。佩罗特曾于1979年雇了一支七人突击队去救出了被扣在伊朗作为人质的二名雇员。

这一故事已在肯·弗里特所写的最佳畅销书《鹰翼》中予以了详细描述，并被拍成电视剧。佩罗特自1982年一直在总统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工作，他总是乐于帮助白宫，因此他拿出了这笔钱。

1985年6月7日，在给麦克法兰的标明“绝密，仅供阅读，行动”的长达四页的备忘录中，诺思说这20万美元可能是定金，他在华盛顿与这位缉毒署的“眼钱”或“中间人”会过面。诺思写道：“美国人质要各用100万美元贿赂后方能释放。”据称这个价格不能谈判，因为有许多人需要贿赂。麦克马洪在批准一栏里填上了姓名的缩写表示同意。这20万美元被迅速送给这个眼线，但毫无结果。

1985年6月4日，两名黎巴嫩人劫持了一架由雅典飞往罗马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847次班机，并强迫它先飞往黎巴嫩，然后飞往阿尔及利亚。从此便开始了由电视转播的17天的人质苦难历程。一次电视监控状态下的劫机事件使白宫危机指挥室、中央情报局行动中心、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得到了最好的情报，因为电视记者们采访了驾驶员并持续监视着劫机现场。美国海军水兵罗伯特·迪安·史蒂特姆被杀害，年仅23岁，但所有的其他乘客，包括39名美国人，最后都平安获释。

麦克法兰、凯西和其他国家安全方面的高级首长们意识到，与卡特任内持续444天的伊朗人质危机相比，本届政府还是幸运的。但他们也意识到，环球航空公司847次班机也进一步暴露了政府反恐怖主义能力的薄弱和缺乏有效的对策。这一被羞辱和脆弱的形象会招来疯子和狂人们进行袭击，然后叫来电视镜头对准这一切。

尽管凯西不能肯定谁是这一劫机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但中央情报局最好的情报全都表明支持恐怖主义的仍是利比亚和卡扎菲。卡扎菲使用的是不太先进的密码设备和密码，因而国家安全局一直能破译他们的密码。所有的窃听记录显示出卡扎菲是最活

跃、最狂热的恐怖分子。他的行动人员很粗心，他们留下了许多线索。与此相反，叙利亚和伊朗却更有纪律，他们的行动很隐蔽。

从政策方面来看，似乎有一种将打击卡扎菲和打击恐怖主义双重目的结合在一起的可能。

通过情报报告和定期的正式特别报告，凯西一直有意识地不断提出并强调卡扎菲的活动问题。三个月前，1985年3月，他发出一份题为《利比亚的卡扎菲：对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挑战》的《国家安全特别报告》。在其后18个月里，这份23页的秘密文件预测卡扎菲将在全世界煽起动乱。有情报显示利比亚向约30个颠覆、激进或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武器、一处行动基地、旅行协助或训练。”

这份《国家安全特别报告》包括一幅彩色世界地图。上面显示卡扎菲的颠覆魔爪已渗透到全球，其广泛程度几乎与50年代由约翰·伯吉研究会所描绘的苏联扩张情况相等。当时该研究会的世界地图显示世界正在慢慢地变“红”。在这份《国家安全特别报告》的地图中，那些有情报显示卡扎菲正在支持该国的颠覆分子或恐怖组织的国家被标为红色。它们包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西班牙、伊拉克、尼日尔、乍得、苏丹、纳米比亚和其它八个非洲国家。

另一组国家在地图上被标为黄色，表明有情报显示卡扎菲正在通过向其政治反对派或左翼政治家提供财政支持进行干涉活动。它们包括奥地利、英国、哥斯达黎加、圣路西亚、多米尼加、安提瓜和澳大利亚。

《国家安全特别报告》的第二张地图描绘出以利比亚为中心的，覆盖半个北非，扩展至地中海并远达莫斯科的一个大圈子。这是卡扎菲用苏联提供的图—22轰炸机和F级潜艇使其军事力量可攻击的范围。这份特别报告估计卡扎菲已成为一个具有新的自信心的“审慎的政治会计”这可能促使他进行了进一步的和具有

更大潜在危险性的冒险。

在一个重要章节，这份特别报告补充说："我们认为如果具备下述条件卡扎菲将把目标直接指向美国人或美国的设施，这些条件是：

·他可以进行袭击而不受到美国的报复。

·他认为美国对他个人构成直接威胁或积极地想推翻他的政权。

凯西对这一特别报告感到很自豪，他觉得它点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了。国务院情报机构略有异议，认为卡扎菲最重要的目标是摧毁他的反对派，第二个目标是谋求地区霸权。

在白宫，麦克法兰始终将卡扎菲作为关注的中心。里根总统于4月30日签署了第168号《国家安全决定指导》，题为《美国对北非的政策》。这份六页的秘密指导说："将建立一个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的多机构联合小组来审查美国对利比亚的战略，并准备包括针对卡扎菲的颠覆活动在内的多种供选择政策。"其中包括六项给予主要部门的命令，最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将回顾阶梯演习计划并提出供选择方案和建议。""阶梯"是在利比亚海岸外进行演习行动的名称。

由于凯西要继续保持反卡扎菲的动力，而国家安全局和所有情报机构的分析专家们知道他需要报告，因此他们便添柴助火。1985年5月9日的绝密的《国家情报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回顾自1984年5月8日袭击卡扎菲所住的兵营的政变企图一年来的利比亚局势。它说这位上校仍是一个活跃的恐怖分子，而且利比亚正在支持一项将一部汽车炸弹冲入美国在开罗的大使馆的阴谋。据该文说，由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领导的利比亚持不同政见者和流亡人士正想炸毁利比亚的一处军事设施，以表明他们在卡扎菲土地上的存在。

利比亚的活动正日夜受到跟踪。利比亚正在商谈从苏联购进先进的米格—29 战斗机和 T—32 坦克；它正在与希腊谈判一项总额达 5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合同；它正在计划与土耳其进行一次长达两个月的联合军事演习；有情报总报告说它组成了两个海上别动队实施突击队和恐怖主义的袭击，由希加兹中校领导，后者是利比亚领导人的一位高级助手；还有卫星照片显示在利比亚的米格—23 截击机上挂的导弹等等。

一份报告断定正在流亡的卡扎菲的反对派们仍未对他的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但它也指出流亡者们正从埃及、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一派中得到资金、训练和甚至使用其领土的援助。

因此，在发生了六月份环球航空公司 847 号班机被劫事件后，美国政府准备采取行动了。7 月中旬，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麦克法兰在会议一开始就向里根总统和其他外交政策高级顾问们指出，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并没有削弱卡扎菲，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凯西、舒尔茨、温伯格及其他人均表示赞同。这种会议上全体意见一致是少有的，而且会议采纳了一项全面行动的计划。

那些设计绝密代号的人称整个反卡扎菲计划和行动代号为“花”，只有约 20 余人，包括总统和凯西知道内幕。

在“花”计划中，“郁金香”是中央情报局一项秘密行动的代号。这项行动的目的在于通过支持反卡扎菲的流亡运动，包括拯救利比亚全国阵线和其周围的国家及埃及想让卡扎菲下台的努力。

“玫瑰”是另一个代号，它是一项与美国盟国，尤其是埃及联合对利比亚实行的先发制人的军事袭击。美国将提供空中掩护，其目标之一将是卡扎菲所住的兵营。它被认为是一个军事或恐怖主义的协调中心。

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主要难题是已烦扰政府多年的一个问题：这是否是暗杀？总统说他们不必担心暗杀的禁令。如果卡扎非被杀死他个人将承担其后果。

没人提出更多的疑问，问题都解决了。

在“郁金香”中的秘密压力和在“玫瑰”中的军事计划的目的是相互加强。不过即使它们失败了，它们也会导致利比亚处于恐慌和危机之中，这样在利比亚军队中的反卡扎非分子就会起来推翻他。

有人为总统秘密拟定了一篇宣布进行了一次先发制人或报复性袭击的讲话。

在兰利，鲍勃·盖茨，负责情报的助理局长奉凯西指示领导进行了一次迅速的、简明的研究，分析先发制人军事行动的不利因素。7 月 15 日，一份绝密的文件提出了盖茨的结论：尽管有不利因素，但它是重新绘制北非版图的一个机会。

在 6 月劫持环球航空公司危机中，凯西的老朋友约翰·席汉告诉他一个因试图向伊朗出售武器而被起诉的人说伊朗外交部渴望能用人质交换“陶”式反坦克导弹，而且其后伊朗在释放最后一批环球航空公司 847 号班机被劫持的乘客中予以了协助。凯西认为这是个信号。

8 月 8 日，当利比亚计划开始后，凯西参加了在白宫寓所召开的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总统、布什、舒尔茨、温伯格、里甘、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等出席了会议。麦克法兰提出一项计划，在这项计划中，以色列将向伊朗运送“陶”式反坦克导弹，美国将补足以色列的库存，而作为一个良好真诚的信号，伊朗将释放关押在贝鲁特的所有美国人质。

舒尔茨和温伯格表示反对，但凯西喜欢这个计划。该计划是由以色列前“摩萨德”第二号人物，现以色列外交部第二把手戴

维·基姆彻首先提出的。在此之前麦克法兰曾找过凯西，概述了其内容。基姆彻曾要求麦克法兰不要同美国政府的任何人商谈这一计划，但麦克法兰说他需要凯西对此作出个人估价。中央情报局将不参与这一行动，这应是一种既可使人质获释又能加以否认的行动。而如果中央情报局卷入这一行动将需要有总统指令，那样将不得不通知国会情报委员会，这恰恰是国会所不会相信的那类行动。

尽管中央情报局有报告说被扣为人质已18个月的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巴克利已被杀死，但凯西坚持，如果同伊朗发生些新的关系，他有希望出面。

诺思中校将成为行动指挥官，国务院给了他一份名为"威廉·古德"的护照，麦克法兰的助手波因德克斯特将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算机系统中建立了与诺思办公室之间的秘密联络渠道，它称为"私人空白支票。"

9月12日，诺思与查尔斯·艾伦进行了接触。艾伦是凯西的负责反恐怖的国家情报官，是情报机构中最精通伊朗问题的官员之一。诺思知道不能相信伊朗人，而且他需要得到所有可能得到的情报。他要求国家安全局在伊朗和黎巴嫩集中注意几个人。一个是伊朗中间人曼纽彻尔·格班尼法尔，他是被列入最优先监视者名单中。因此他的电话、电传和银行转帐都将被截获，格班尼法尔是伊朗和以色列人之间武器转运的关键中间人。诺思指示，这些截获报告仅限于送给凯西、麦克法兰、他自己及温伯格。告知温伯格，是由于国防部将负责补足以色列的武器。舒尔茨及国务院的其他人将被排除在外。

中央情报局对格班尼法尔很熟悉。从1974年开始，他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情报员，他是个很有干劲又爱自吹自擂的家伙，是个半政治家半商人，他总是在情报舞台门口荡来荡去。尽管他用华丽的词藻自吹自擂，但这扇大门总是拒绝让他进来。在1981年，

当所谓的利比亚突击队已被派往美国暗杀里根或他的高级官员的流言盛行时，他火上浇油。但中央情报局断定格班尼法尔的情报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意编造的。在1982年，中央情报局终止了他的情报员资格。1984年中央情报局发表一份正式的严防欺骗的通告，它警告说格班尼法尔是一个编造情报的天才。

有一次他曾许诺，如果某国允许他的同伙从该国走私毒品的话，他将向该国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他曾两次未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测谎器测验。凯西对格班尼法尔的危险性非常警惕，但这个人是那种常常会成为情报人员的人：质量虽差但不是不能用。

在进行武器交易时，由于伊朗和以色列的互不信任而使问题复杂化了。伊朗不想在拿到武器之前付款，而以色列只有在拿到款后方能提供"陶式"导弹。为打破这一僵局，格班尼法尔从沙特阿拉伯商人艾德南·科哈绍吉那里借到500万美元以作为"桥梁"贷款，并买了508枚"陶式"导弹。9月15日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牧师获释了。

凯西现在可以看出，人质和恐怖主义正在困扰着白宫和总统。韦尔的获释在白宫几乎被当成了一次盛大的圣餐。

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推进美国—埃及联合袭击利比亚的"玫瑰"计划。如同对伊朗问题一样，在里根的高级顾问中间对这一计划分歧很大。舒尔茨反对这一计划并密召美国驻埃及大使尼古拉斯·维利特斯回华盛顿反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计划。当他到达华盛顿时，舒尔茨的一名高级助手对他说："你无法相信白宫的那些疯子现在提出了些什么。"经过一个周末的紧张工作。舒尔茨和维利特斯确信他们已将计划变成为一项"应急的、反应性的和防御性的方案。"

麦克法兰正将注意力集中在即将到来的里根—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晤。因此他的副手波因德克斯特负责利比亚计划。波因德克斯特坚持要亲自访问开罗，并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会谈继续进

行“玫瑰”计划。国务院和维利特斯试图取消这一访问，但在劳动节，也是周末期间，波因德克斯特飞抵开罗并带去了里根总统的给予埃及以美国战斗机直接支援的保证。在波因德克斯特还未来得及提出他强硬路线的计划版本之前，这位更乐于说而不是听的急躁的埃及总统就打断了他。“将军”，穆巴拉克说，“我们何时袭击利比亚将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并将遵从我们自己的时间表。”

波因德克斯特与埃及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们进行了会谈，在那里他的方案很受欢迎。尽管穆巴拉克表现出明显的不情愿，但波因德克斯特确信他领会了里根要行动的愿望，而且最终那将成为重要的因素。

10月，载有438名游客的意大利游船“艾奇丽·劳罗”号被四名巴解组织恐怖分子所劫持。白宫又处于对恐怖分子的高度戒备之中。一名69岁的美国人里昂·克林豪弗尔被杀，死在他的轮椅里并被扔在甲板上。这提供了一个美国所需要的象征。这一仍被劫持者所控制的游船停靠到了埃及。

穆巴拉克讨厌美国给他提供的秘密通话系统，它有一个手控送受话机，因此当他讲话时对面的人收不到他的声音，这就很难窃听。但穆巴拉克常用普通电话。美国已下令加强对埃及的情报收集工作，尤其是通过国家安全局和卫星。10月10日，星期四早晨，窃听到穆巴拉克的电话，半小时内这一情报以一份绝密密码电文报告给白宫危机指挥室，它是穆巴拉克和他的外交部长的一段简短对话的译文。穆巴拉克曾公开宣称这四名巴解组织劫船者已离开了埃及，但这一窃听记录显示事实与之不符。在对话中，穆巴拉克告诉外交部长说劫船者仍在埃及，他叫着说舒尔茨认为埃及会应美国的请求把劫船者交给美国简直是疯了，无论如何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不会出卖巴解兄弟的。

当日上午11时，另一份窃听记录送到危机指挥室。在这份记录中穆巴拉克提到这架飞机的编码及它将在几小时之内载着四名

劫船者离开埃及，这架埃及波音737客机正停在开罗艾尔马扎空军基地的跑道上。

诺思知道这么精确的情报是罕见的，从这一点出发这也是个不能错过的好机会。他向波因德克斯特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用美国战斗机劫持这架埃及飞机并把它迫降到西西里的一个北约空军基地上去，然后抓住劫船者。

这个主意被反映给正在芝加哥的总统，他表示同意。

在下午剩下的时间里，国家安全局提供了穆巴拉克讨论运走劫船者的最后计划的十次窃听记录。对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来说，情报之好就如同在这位埃及总统办公室一样。这些译电表明了穆巴拉克在行动时的苦恼。开始他并不知道克林豪弗尔被谋杀，后来当他知道后，他领会到了它的重要性并意识到美国一定会采取行动。他大骂其助手们，要他们解释为什么不立刻告诉他谋杀的事。

国家安全局向白宫传报了四名劫船者登机的时间、飞机编码及飞机计划抵达在阿尔及尔的巴解组织总部。当日下午晚些时候，从美国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起飞的四架F—14战斗机拦截了这架埃及飞机，并将它迫降在西西里。意大利将审判这些劫船者。

第二天上午，当波因德克斯特走进里根的房间时，里根站起来，举手行了军礼并说："向海军致敬。"

那一英尺厚的文件堆里包含着数十份穆巴拉克对话的译件，它们是这次行动的关键——提供了具体计划、目的、思想动态及穆巴拉克将劫船者送回巴解组织的决定，何时及如何执行。里根得到了公众的一致赞誉，既包括共和党人也包括民主党人，这是他对恐怖分子所取得的第一个明显胜利。其后，当总统看到凯西时，这位总司令几乎要向他的中央情报局局长鞠躬了。对凯西来说这是个非常愉快的胜利。许多持怀疑者，包括鲍勃·盖茨，曾辩论说期望得到及时的战斗性的情报是不现实的。而情报机构这

一次恰恰证实这是现实的时，盖茨又觉得它只是该死的好运罢了。但凯西赢得了自己的运气，这正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即证明间谍工作的价值。

大约两周后，穆巴拉克在他办公室的电话上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但中央情报局已有了更先进的窃听方法并继续得到窃听记录译本，包括当日晚些时候的一份记录。它显示穆巴拉克对叙利亚人发火，要他们将冲到海岸上的克林豪弗尔的尸体交还给美国政府。

凯西读到一份报告，它说当年秋天在贝鲁特被绑架的三名苏联外交官已在一个月后被释放，他被这份报告迷住了。尽管第四个在绑架后不久即被杀掉了，但这三个人都平安获释。很快他收到以色列人的可靠情报，它说这一成绩是苏联人的一次行动的结果，在那次行动中，黎巴嫩的克格勃抓住了一名激进的穆斯林真主党领袖的亲属，并把他阉割了。他睾丸被塞入他的嘴里，并在头上开了一枪，然后把这尸体送给真主党。克格勃还写了封信，上面说如果不释放这三名苏联人，真主党的其他成员也将以同样的方式被杀掉。不久这三名苏联人—— 一名使馆官员、一名商务代表和使馆医生在距大使馆几条街区的地方被释放。有人通过电话给新闻机构发表的一份声明说释放三名苏联人是“善意”的姿态。

凯西相信苏联人懂得真主党的语言。当年秋季，这位局长邀请已担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九个月的伯纳德·麦克马洪到兰利他的办公室交谈。麦克马洪是一位退役海军舰长，与约翰·麦克马洪并无亲属关系，他曾在中央情报局担任过几年特纳的行政助理。凯西对特纳有许多疑问。例如特纳如何管理其办公室，实施他的想法，指挥他的人。他与麦克马洪是私人讯问，他希望能得到一个完全公正的对过去和现在的评价。凯西问，在这儿的人都很不错吧？

麦克马洪表示赞同。是的，这儿的人质量很高，很有头脑。

“你认为他们为什么乐于在此从事他们的工作?”凯西十分急切地问道，“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乐于在这儿工作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们感到有刺激并出于爱国主义。”

“不对，不对，不对。”凯西说，“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建立新的自己的对外政策，是对外行动的刀刃，并且是政府的行动机构。”

当年秋天，我听到一则秘密消息说卡扎菲对白宫和中央情报局的烦忧已达到了顶峰，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在制定一项重大的秘密行动计划以推翻他的统治。一个提供消息者说：“舒尔茨也产生了信心。”他又补充说，这位国务卿成了最强烈的提倡者，“他以那种似乎这是上帝的唯一主意的方式来推荐这项计划。”这位提供消息者说：“我会用一杆 10 英尺以上的撑篙来加快这一行动的速度的。”另一位职位更高的提供消息者就此事补充说：“为什么用那么短的撑篙?我会用一杆 20 英尺以上的撑篙来加快这一行动的速度的。”

这一由中央情报局负责的秘密部分“郁金香”行动方案被呈送给了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最终，这项反卡扎菲计划只以可能的最微弱多数获得支持。——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为 8 比 7，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为 9 比 7。

尽管新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维·杜伦伯格和新任副主席帕特里克·利伊不同意这一计划，但他们未能带动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他们质问说，由于利比亚流亡运动希望卡扎菲死，因此，这样一项支持流亡者和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计划，怎么能避免违反禁止暗杀的行政命令哪?

凯西回答说，中央情报局将帮助那些想赶卡扎菲下台的人。那些人或许会试图暗杀他，但那不是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杜伦伯格和利伊指出，支持潜在的谋杀者就是谋杀，这没什么可辩解的。

凯西坚持他的立场，总统已批准了它；国会可以砍掉其资金？

我们会的，两位参议员说。然后他们要求提供所有行动细节，行动的人员、内容、地点及时间。他们钻研着每一份文件，逐项细查。他们直接给里根一封绝密信件，表示强烈的抗议，并质问这怎么不会成为“暗杀”。白宫回答说没有进行暗杀的计划，并要求两位参议员删去信中富有煽动性的字眼“暗杀”。他们拒绝了。

利伊觉得，政府既在欺骗情报委员会，也在欺骗它自己。以同恐怖主义进行了斗争的名义——同在尼加拉瓜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名义一样，他们将使这个国家陷入另一场秘密战争中。同在尼加拉瓜一样，它不会永远保密的。最终它将同尼加拉瓜行动一样变得失去控制。

凯西对情报委员会擅自参与行动的细节气得脸色发青。

11月2日，星期六，我给凯西局长打了个电话。他的朋友，战略情报局时在一起的老战士约翰·席汉昨天去世，我对此表示哀悼。

凯西怀念地说：“是的，他是个好人。”

我说我们将发表一篇关于里根和中央情报局将秘密推翻卡扎菲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只会提到这将通过中央情报局向其它未指明的谋求推翻卡扎菲的国家和流亡者提供协助来完成，而不会提供更多细节。

凯西说：“有些人就不会发表这一报道，我无法说服你放弃它，是不是？”

我说假如政府内部和国会内部的辩论很重要，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撤销这一报道，又怎么能撤销这一报道。

凯西哼了一声。

我提到暗杀问题：它将是报道的重点。

凯西说："不对，我们不搞暗杀。"他似乎心烦意乱，拒绝再说任何事，并礼貌地说声再见。

不到半小时，他又打来了电话，提出一个中心论点：总统、国务卿和他本人只对阻止恐怖主义感兴趣，并没有支持暗杀卡扎菲。他说政府最高层对这一行动的考虑主要是集中在最终目标上。

我说这一点将在报道中明确加以提出。

他没说其它事并挂上了电话。

我记起三年半以前，布雷德利描述说凯西只是轻微地反对布雷德利发表有关尼加拉瓜行动的报道。这位局长或是接受了这一揭露的不可避免性，或是觉得将这一秘密行动公之于众有利于达到他及中央情报局的目标。

第二天，即1985年11月3日，星期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当天晚些时候，总统从戴维营度周末返回白宫后，拒绝回答所有与此事有关的问题。白宫发表了一份声明，它说尽管我们决不相信《华盛顿邮报》文章中提出的有关利比亚问题的断言和推论，但是总统已下令调查泄露美国情报文件，从而为该新闻报道所引用的问题。确定谁应对这一泄露负责，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事实上，白宫感到松了口气。只有"郁金香"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泄露了，而且该报道只写了最笼统的情况。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被保住了，"玫瑰"行动可以继续进行。

凯西去找总统并把《华盛顿邮报》报道的副件砰地扔到桌上，这位局长说："你看看，我告诉你国会监督不行，这些杂种全都泄密。"他向总统解释说暗杀问题恰恰是情报委员会痛斥他的问题，它就是从听证会上泄露出去的。这是无可怀疑的证据。

总统给情报委员会写了一封二页的信，毫无保留地说情报委员会泄露了这一消息，并说在委员会只有少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为阻止这一秘密行动采用[illegible]种方法是无耻的。这一泄露本身恰恰是已发生过的国家安全方面最糟糕的事，而且它威胁着国会对情

报界的监督。他实际上是在指控情报委员会成员们在叛国。

杜伦伯格参议员给里甘打电话。这位主席说："将会有一场比赛来找出谁泄露了这一消息。"两个委员会都进行了调查，并发现这一报道包含有引自一份绝密的《弱点估价》中的内容，它断定可以"煽动"利比亚军队中的不忠分子去"暗杀"。两个委员会都未看到过这一估价，这强烈地提示这一泄露出自政府内部。约一周后，两个委员会给总统回信证实它们是清白的。

里根未予答复。

在开罗，美国大使维利特斯与埃及推翻卡扎菲行动的领导人、国防部长加扎勒进行了会谈。加扎勒对这一行动中央情报局所负责的部分已泄露感到很不安，并问维利特斯埃及怎么能相信美国，他表示对军事计划很担忧。"猪湾事件"是怎么回事？美国是否会再一次在最后一刻退出？

维利特斯回答说总统对泄密事件很恼火，并将采取行动对付那些提供消息者。维利特斯又说，同时，这一报道的影响将会逐渐消失，因为对此没有政治争议，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想使卡扎菲下台。

凯西让一位分析专家完成了一份有关对利比亚进行袭击的具体目标的研究报告。这份灰色封面的文件指出，最佳空袭时间是在刚好天亮前。但五角大楼对美国直接军事行动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它描述成功的机会很暗淡，实际上其辩论不支持这一行动。这一计划被认为是与埃及联合进行的突然袭击。五角大楼争辩说，这样一项军事行动可能最终将需要六个师，9 万人。五角大楼计划者们问，实际上，"我们需要与利比亚进行一场战争吗？"

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回答是，不需要。

当年秋天凯西作了体检，他知道身体有些不大对头。诊断是前列腺癌，对他这样年龄在 72 岁的人来说运气不会太好。他要求

所有能得到的有关该病的文章，并很快同意每日接受大剂量放疗和化疗。他把这一坏消息告诉了索菲娅，但决定不让中央情报局或政府内的任何人知道，不过凯西告诉了总统本人。

他知道现在时间是有限的，必须加紧行动。

11 月 21 日，诺思给杜威·克拉里奇打电话。在尼加拉瓜布雷事件后，他被从拉美科长调任欧洲科长。诺思很激动，他说他需要帮助在葡萄牙为一架执行人道主义任务的以色列飞机得到着陆权。

通过他秘密渠道，克拉里奇在夜里 3 时发出最紧急的“闪电”电文。把中央情报局驻葡萄牙情报站站长召到大使馆，通过一系列电文，克拉里奇指示该站长应“清除一切障碍”。

克拉里奇说：“这是一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并代表着最高的美国利益。必须告诉葡萄牙，支持这一行动将不会被忽略或不领情……不应通知大使。”这位站长将见到斯考德将军，他用了假名“理查德·考普”并已飞往里斯本。但葡萄牙拒绝了这一请求。诺思随后说他需要一家可信赖的航空公司的名字，要快。

中央情报局的航空部门推荐了一家为中央情报局作秘密工作的控股公司——圣露西娅航空公司。

克莱尔·乔治不在家，因此克拉里奇向代理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埃德·朱克尼瓦茨作了汇报。后者告诉诺思说，除非其专有工作外，圣露西娅也是一家商业公司，因此它可以接受任何人的特定承租班机。

诺思安排圣露西娅公司提供二架波音 707 飞机，他们要能将“霍克”式地对空导弹运到以色列，并从那里转移到以色列飞机上以运到伊朗。诺思通过一家瑞士银行帐户进行这一行动。该帐户为“雷克资源公司”（瑞士信用）。

由于找到了一家不引人注目的航空公司，诺思在两个办公室间联网的计算机上给波因德克斯特写道：“克拉里奇应被授予勋

章。"但以色列人未等美国飞机送到就把他们准备用来向德黑兰运送武器的飞机放掉了。诺思写道，以色列人这一举动是为了"节省美元"。他必须提供些货物，而且他能够调出斯考德将军所办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原来预定向尼反政府武装运送飞机弹药。在晚上7时20分，诺思用他那现代化的计算机信息向波因德克斯特通报说："我敢断言，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这么糟的事情。"他将在当晚会见一位尼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并通知他这批弹药将推迟几天。诺思告诉波因德克斯特："太糟糕了，这本是我们向尼反政府武装所提供的首次直接空运。"

星期天上午，诺思在白宫危机指挥室审阅有关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机被劫至马耳他的报告。他要了一份三周前《华盛顿邮报》有关意图推翻卡扎菲的秘密行动的报道副件，然后又要了一份报道当天上午卡扎菲讲话的窃听记录的译本。诺思说，或许它们可以声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发了这次劫机事件。然而这份窃听记录并未表明利比亚与劫机事件有牵连。当天晚些时候，埃及军队突击队袭击了这架飞机，杀死机上80人中的57人。

11月25日，星期一，约翰·麦克马洪听到汇报说中央情报局曾要求提供通过葡萄牙的飞机许可证以向伊朗运送武器。麦克马洪气得跳了起来。既然法律禁止向伊朗运送武器，既然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已起了直接作用，那么它就是秘密行动了，可是总统指令在哪里呢？

朱克尼瓦茨说，严格地从法律上说中央情报局并未参与。诺思曾来找他们并被告知中央情报局不能参与此事。诺思本已知道圣露西娅公司的名称，而且他与这一航空公司所商定的是一个严格的商务合同，而不是秘密行动。

麦克马洪说，好吧，等着瞧吧，他对秘密行动一看就知道。奥利·诺思是个危险人物，将来会出事的。现在他已把中央情报局拉入某些糟糕的事情里去了。克拉里奇与葡萄牙及另两个情报站

之间的往来文电达 20 余份。

更为糟糕的是，自“水门事件”以来，制定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在中央情报局同意白宫请求予以行动协助之前，必须经中央情报局局长或副局长批准。它被称为“戈登·利迪”规定。由于利迪的水门盗窃小组带有中央情报局的化名身份证，一个声音转换装置和一个红色假发套——使中央情报局永远陷入了“水门”事件的泥坑中。很明显已违反了这一规定，凯西当时正在中国，麦克马洪觉得应迅速行动。他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打电话给斯波金，告诉他准备一份追溯包括有关使用中央情报局控股的“航空公司”的总统指令草案。麦克马洪说：“我将派一些参加了该行动的人去向你汇报这件事。”他们在 20 分钟内概述了这一情况，这是一次武器—人质交易。

斯波金让他手下的一些最高级律师参加这一工作。他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他的笨重的三英寸厚的皮夹子并放在桌上，这表明将会工作到深夜。到了作些真正的工作的时候了，他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斯波金对他们说：“让我们使得总统能批准它。”他需要总统的批准，一项总统指令对中央情报局和凯西来说将是一张保险单。总统有这样的权力，他可以保护他们，那将是万全之策。

这些问题和以往中央情报局所遇到的问题同样的敏感：向伊朗运送武器、人质、他们的安全、甚至于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巴克利。巴克利已当了 20 个月的人质，或许仍活着，或许已死了。这整件事不能有丝毫泄露，以前曾讨论过不通知国会监督委员会的可能性。凯西渴望能切断与情报委员会的联系。许多总统指令被泄露，那份有关对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袭击的总统指令被登在报纸上，另一份有关推翻卡扎菲的也是如此。这一总统指令也会如此，而且可以肯定这一泄露将导致匆忙放弃这一行动，那则要求“及时”通知情报委员会的法律有一个漏洞，尽管没有详尽阐述，但它清楚地预先提出了可能有特别情况而使情报委员会不能

得到提前的通知。但这在该法律中是拐弯抹角的，需要斯波金表现出折衷的高超艺术。尽管该法律没有特别说明总统有权阻止通知国会情报委员会，但它却说在那些情况下他将对未能提前通知提出其理由。

斯波金开始工作，将这份总统指令缩减到一页由总统签署。它说："我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不通知美国国会……直至我有另外的指示为止。"

斯波金从他在证券及交易管理委员会工作时就知道，在这个相互合作的世界里某些行政人员回顾性地批准某项行动并不是不常见的，只要它与政策相一致。为保护已帮助过诺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斯波金写道："由美国政府官员们在此之前所采取的对这一行动有促进的活动也特此批准。"这一总统指令描述了一个直接的武器—人质交易。

凯西一贯拒绝接受政府的累赘程序，而且总统也清楚地感到官僚主义是僵硬的，这是斯波金行动的基础。晚餐后很久他完成了这一总统指令。第二天斯波金把它交给麦克马洪，麦克马洪不想自己单独作这事，就把它呈交给了凯西。凯西认为这一总统指令很好地运用了法律，使得总统得以表现出行使其权力的英雄行为。

凯西非常讨厌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杜伦伯格在背后说坏话已达到新的高峰，现在到了告诉他们让他们见鬼去的时候了。怨恨已不断地积累了整个秋季。

首先，一位克格勃的高级叛逃者瓦特利·叶尔钦科那年夏季到了美国，于当年11月在乔治城的一家宾馆从控制者手中逃脱并且回到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内。他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巨大轰动。他说中央情报局绑架了他，并说在他与凯西共进的一次晚餐上，凯西裤子上的拉链开了，这引起了哄堂大笑。凯

西承认中央情报局粗暴地对待了叶尔钦科这位有着 25 年工作经历的克格勃老牛，他明显地染上了一种叛逃者的郁闷症。中央情报局未能向他提供足够的说俄语同伴，并未能全面调整一个背叛了祖国的人的心理状态。但杜伦伯格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却怒斥凯西，指责说中央情报局搞坏了这件事，参议员们似乎每天都在新闻里贬低凯西和中央情报局。

叶尔钦科曾从美国情报机构中鉴别出了两名叛国者，这使事情变得极为复杂。对中央情报局来说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恰在他叛逃至美国前，叶尔钦科被晋升至克格勃第一副部长，负责美国及加拿大的间谍工作。当他到达中央情报局时，自然要问他克格勃是否有渗透进情报机构的间谍，或是“鼹鼠”。叶尔钦科予示说只有一名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是一位要派到莫斯科情报站但一直未能去成的人。他的代号是“罗伯特”，而且前一年他曾在奥地利与克格勃接头并把重要机密卖给了他们。

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苏联科不必进行这一调查。他们直接查阅了埃德华·哈佛的文件，他在 1981 年他 29 岁时加入了中央情报局。他 1972 年以优等学业成绩毕业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并随和平队在哥伦比亚呆了两年，他还获得了一个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他说话流利，反应迅速，手脚麻利，喜欢独立行动，在凯西的新中央情报局里，哈佛的个人能力完全符合一个理想的秘密行动者。他对枪很熟而且酗酒。他告诉中央情报局他曾用过毒品，但在那一代人中，这是普遍的而且他说他现在不再用任何毒品。

哈佛被选入精锐的苏联科，并准备安排他以掩护身份到莫斯科情报站工作。他接受了大量间谍和反间谍技术训练，在莫斯科他将担任行动人员，与其他少数几位行动人员一样在街上工作，与情报员保持接触，向他们提供收集情报的技术装置。

在 1972 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情报行动由兰利总部指挥，因而行动官员们都是接受直线指挥。他们的行动有些像只管取送信的

孩子们，并不知道情报员的真实身份或由情报员提供及电子窃听的情报的真正内容。这增加了安全系数，但这不利于开展间谍工作。1972 年后，中央情报局给予了莫斯科情报站站长行动的权力。莫斯科情报站是一个小站，在莫斯科那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它的工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突出。该站的少数几位官员们超常地工作着，每个人从最低层人员到站长必须能替代其他每一个人的工作。在这个散兵坑里没有真正的等级之分，这意味着没有分级管理，每个官员都了解全面的情况。一个新官员如哈佛，必须学会基本技能，在到达莫斯科后能立即开始工作，反复了解情报员和搜集情报方法。时间不容许别的官员来教他，并带他以必要的几天或几周使他能胜任工作。

要在苏联科及莫斯科情报站生存下去，行动官员们需要对“俄国人”的不信任气氛有足够的抗衡能力；他们需要某种东西将他们绑在一起，它就是相互完全信任及一个集体支持体系。

在他被内定为派往莫斯科之前，哈佛听取了所有的有关汇报，看了兰利总部所有有关文件，并被指导学会了各种技术。在 1983 年初，在他前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他接受了测谎器的测验，测验结果表明他欺骗，酗酒，继续用毒品，乱搞女人，甚至还有轻微的盗窃行为。他没有被派往莫斯科，而被解雇了。他们想要干什么，把他送到养鸡场去吗？他有他的公民权力。凯西甚至不知道哈佛，他只是一个人的问题。

现在许多情况都吻合上了。一年前，凯西收到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的电文，上面说出了些很糟糕的事。情报员们被抓走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技术性收集情报装置突然变哑了。这一电文像是一部间谍小说的序幕，但没人知道下一步作什么。当时似乎毫无线索。或许它是个偶然事故。因为没有永恒存在的情报员或收集情报系统。随后在当年夏季，保罗·斯特姆伯，一个公开身份是大使馆二等秘书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被逮捕，并以间谍罪被驱逐

出境。

斯特姆伯曾是航空专家阿道夫·托尔科乔夫的指挥官。多年来托尔科乔夫向美国提供了苏联秘密研究的反雷达技术的重要情报。不久，托尔科乔夫在莫斯科被逮捕其后被处决。其他四名以公开身份作掩护的中央情报局人员随后被从莫斯科驱逐出境，实际上等于关闭了该情报站并停止了其行动。

只有当克格勃叛逃者叶尔钦科告诉了中央情报局后，这一问题才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联邦调查局在新墨西哥州发现了爱德华·哈佛，但哈佛受过在莫斯科如何溜掉及反跟踪的训练，因而他巧妙地避开了联邦调查局并逃走了。最后他在莫斯科露面，并被给予政治避难。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此事对中央情报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些参议员质问是否在中央情报局还有其它苏联的"鼹鼠"。凯西和中央情报局可以将这一责任推到现已离任的苏联科科长身上，但这一情报损失及哈佛的叛逃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使几年的工作化为泡影。苏联科的莫斯科情报站是神圣的地方，是一处不可亵渎的地方。这一事件表明有些人，或每一个人都在睡大觉，并且对苏联的情报工作不认真。这一事件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许多专家断定它可能抹杀了凯西所取得的所有成就。

凯西不是那种让人可怜及采取守势的人。在中央情报局内部他对手下人大发其火。在局外他拒绝他人干预，他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一名参议员说："你付钱去碰你的运气去吧。我们是有个坏家伙，还有坏程序，但不要他妈的管我们的事，我们会处理它的。我们知道这有多么严重，我们将设法予以修补。"

所有人都存在反间谍问题，当戈德华特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时，每周要对他的办公室检查两次以清除窃听器。有一次他们在他的桌子里找到一个带线的麦克风话筒，但未能查出根源。又有一次发现了一个录音装置，但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安放了它，是

克格勃还是其它外国情报机构。因此即使戈德华特的办公室也有可能泄密。

经过又一次长时间、仔细的辩论，国会最终投票废除了1976年的克拉克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向安哥拉抵抗力量提供援助。凯西把这看作是他个人的一个胜利。当月在白宫的一次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总统宣布“我们要让萨文比知道援兵来了。”他签署一项秘密总统指令，向萨文比提供大约1300万美元准军事援助。这也很快泄露了，总统这次的反应是予以证实。在1985年11月22日，与专栏作者和广播电视网的播音员们会面时，里根说：“我们相信一项秘密行动将对我们更为有用，而且比公开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更大。”这是个不寻常的时刻，它揭掉了所有的矫饰与伪装，但它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因为已公开了如此之多的秘密行动。

杜伦伯格暴跳如雷，并在采访中说凯西的中央情报局缺乏对方向性的意识并不了解苏联。凯西计划发表一封公开信予以回答。杜伦伯格的一名助手用电话在凯西的车里找到他，并督促他抑制自己。他说杜伦伯格现在日子很难过，他只是想谈的直率些，而且他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意识。他又说：“不要那么作，你会伤到你自己伤了我们大家。”

“去你的，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位局长对着话筒叫着，并把话筒摔到电话机上。公开信表明了他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它说杜伦伯格正在“即兴地通过新闻媒介”，以一种“包括反复泄露秘密情报员和收集情报方法”的方式，来实施对情报的监督。

杜伦伯格仍在经历其中年危机。他与妻子分居并与一位他推荐到白宫工作的前女秘书关系暧昧。他随后搬到一幢基督徒静修寓所，而且他的参议员同事们正在谈论，说他是一个“耶稣瘾者”、“不稳定的人”并“即将崩溃”。这就是法律要求凯西向其提

供这个国家的最重要机密的人。

因此接下来的是一个从某些方面来说较容易的请求。凯西向白宫呈交了那份斯波金写的有关伊朗行动的总统指令，它包括一条不寻常的总统命令，要中央情报局局长不要将此事通知国会。在给波因德克斯特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凯西说这一总统指令“应直接交给总统签署而不应该经过比我们级别低的任何人之手。”

那一周，麦克马洪因极度劳累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因而辞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职务。波因德克斯特似乎是明显的继任候选人。他很胜任处理伊朗、利比亚和尼反政府武装问题。一年前离开白宫去经营公共关系公司的麦克·丹佛听到了这一风声，他给南希·里根打电话表明自己的不安。他认为军人不适合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南希回答说：“不过，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丹佛在纽约的一个电话亭里给乔治·舒尔茨打电话。他问国务卿：“波因德克斯特是合适的人选吗？”他说，“这位将军喜欢秘密行动，里根有这种倾向因而波因德克斯特将会求助于这一点。波因德克斯特是一个好的副手，但他很难干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舒尔茨表示反对，他说：“我认为他将干得很好。无论如何，都已晚了。总统已签署了命令，它将在15分钟后宣布。”

凯西很高兴看到这一变动。波因德克斯特是个强硬派，而且认为不必与国会或新闻媒介周旋。他将建立起一致的意见。

12月5日，在他作为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一次向总统汇报时，波因德克斯特向总统呈交了中央情报局所起草的总统指令。麦克马洪一周来一直缠住波因德克斯特，让他把这一总统指令交里根签署，从而使中央情报局摆脱危险。在波因德克斯特看来，这一总统指令纯粹是——保护你们的屁股，即中央情报局自己。这份简短的仅一页的总统指令仅提及人质和武器，并未提到对伊朗的更广泛的战略。但里根读后就签署了它。波因德克斯特将仅有

的一份副件放在自己的保险柜里，并通过诺思向中央情报局传话说那份总统指令已经签署了。

12 月 7 日，波因德克斯特在白宫总统寓所召集了有关伊朗问题的又一次会议。麦克马洪代表凯西出席了会议。舒尔茨反对用武器交换人质，他说那将给伊朗人一个信号，使他们为得益而绑架更多的人质。温伯格说这一主意使美国处于受伊朗和以色列敲诈的境地。麦克马洪问到这一行动的基本前提，即伊朗国内存在有美国可以打交道的温和派。他说他们早已在霍梅尼掌权后被屠杀或被投进了监狱。总统说应排除一切障碍使人质获释，并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现在已是平民的麦克法兰将与诺思中校一起被派往伦敦与伊朗中间人格班尼法尔会面。

12 月 10 日，麦克法兰向总统、温伯格和凯西递交了一份报告。他表示对格班尼法尔评价很低，形容他是个不诚实和不值得信任的人。总统沉思了一下并温和地为继续让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更多武器进行辩解。总统说，在美国想对伊朗的未来施加影响的基础上来看，它将来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凯西指出已有了先例，这恰恰是以色列几年来向阿亚图拉秘密销售了多达 5 亿美元武器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国家能忽视伊朗的未来。

当天晚些时候，凯西给麦克马洪送了一份备忘录。“由于会谈破裂，我认为总统并未完全停止鼓励以色列人继续与伊朗打交道。我怀疑如果这将导致人质获释，他将乐于冒险并承担责任。看起来似乎巴德（麦克法兰）仍在行动。”

九天后，凯西与米歇尔·里丁会面。里丁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与诺思和麦克法兰关系密切。里丁告诉他，格班尼法尔将来华盛顿，并带来重要的情报和行动建议。凯西让里丁和诺思带上中央情报局有关伊朗问题的首席专家。

在华盛顿，格班尼法尔化名尼古拉斯·克拉里斯并住在曼德

逊宾馆。在与中央情报局里丁和诺思的一系列会谈中，格班尼法尔提出一项“毒刺”行动来打击卡扎菲。在这一行动中利比亚领导人将付出1000万美元以换取利比亚流亡者领导人马格里夫不再出面活动，得款后马格里夫将再度出山从而使卡扎菲处于尴尬的境地。他还说，他有情报表明伊朗的一个三人突击队正在欧洲活动，要暗杀伊朗流亡人士。格班尼法尔提出了他的情报员的名字，该情报员以前曾被证实是不可靠的。

中央情报局的伊朗问题首席专家给凯西写了一份备忘录，它说格班尼法尔的“有关这一突击队的报告与他以前经调查和测谎器测验证实是编造的恐怖分子报告如出一辙……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近四年来他一直存在的问题……很难在文件中找到任何例证表明他的报告产生于一个可靠的基础。”

圣诞节前二天，凯西向总统呈交了一份有关五项独立的营救人质行动的绝密备忘录。他说他将离开华盛顿并对他在节日期间离开总统表示歉意。前四个行动包括其它秘密支持中央情报局的国家，第五个是有关伊朗的，提到了格班尼法尔。凯西说它很危险，但却是一个有潜在用途的游戏。格班尼法尔有关突击队的情报是撩人的。这位局长对总统说：“我们已证实他们的行动但未能证实他们的目的，这可能是一个给我们加深印象的欺骗行动，在与格班尼法尔会谈时必须小心谨慎。然而当我们的人在星期六与他会谈时问他是否愿意再次接受测谎测验，他说他愿意。我们认为这值得我们作一些我们可能已知底的事。”

二十二

凯西仍在尽力为遭围攻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赢得美国资助。在辞职前，麦克法兰断然否认国会提出的诺思正在劝告或促进私人捐赠的指控，从而承担了诺思在私人集资和补给方面所作的责任。凯西认为他可以利用国会的争吵。他觉得只有极左翼人士想完全抛弃尼反政府武装，因此在夏季期间赢得批准 2400 万美元人道主义援助——食品和医药援助，变得相对容易些。凯西也为尼反政府武装说好话，并说中央情报局必须保证尼反政府武装不被比它强大的多的桑地诺军队所击败。中央情报局建议，国会有限地批准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通讯、特殊通讯设备及情报“指导”，这也获得了通过。但立法者们在其含义上意见不一致，因而秘密信件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之间飞来飞去，试图限定“指导”是否可以被用在运输和后勤上。

实际上，凯西已赢得了半个战争，而且其模糊性只会给中央情报局更多的活动余地。他意识到，在一场丛林战中，对于游击队来说通讯和情报指导比新式武器和弹药更加重要。中央情报局起草了一份总统指令，由里根签署，并为这一任务划拨了 1300 万美元。

在凯西看来，这一新的法律允许他直接参与到收集尼反政府武装的情报工作中。诺思建议凯西与斯考德将军谈谈，后者正在进行私人向尼反政府武装的补给行动。凯西给斯考德将军打电话，

并要求他立刻到兰利总部来。天气不好，斯考德来晚了，但凯西在等候着他，并立即出来见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彼此间已很了解了。当他们坐进椅子里去时，凯西希望得到一个估价。

斯考德坐得很直，很自信，他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镇定而闪亮。他是个补给和后勤专家。他说，如果空运行动不直接送到战场，那么尼反政府武装不可能获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补给和武器可以被运到该地区，但未运到正在丛林中作战的尼反政府武装手中。即使它能够达到，他对尼反政府武装能否取得任何军事胜利也有着很大的保留。从哥斯达黎加方向没有形成有效的南方战线。这位将军说，除了后勤补给不足外，尼反政府武装没有任何情报能力，而且坦率地说，他看不出尼反政府武装的领导层会取得什么决定性的胜利。

凯西表示赞同。他对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这位将军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他问道，我们能帮点什么呢？

情报消息。

凯西潦草地作了记录并保证将进行研究。

斯考德说："局长先生，如果你拿回了打猎许可证（指援助尼反政府武装），那我们现在所创造出的一切人力物力都是你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尽管去干，它是你的，这一点我向你保证。"

凯西回答道："非常感谢。"

圣诞节后第三天，恐怖分子协调行动，对罗马和维也纳机场进行了袭击，杀死 19 个人，包括五名美国人。其中一位纳塔莎·辛普森年仅 11 岁。电视画面上这一节日期间的大屠杀尤为可怕，候机大厅里散落着尸体和劫掠的景象，很像是一次黑手党的袭击。正在加利福尼亚牧场休假的总统感到很震惊，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都怀疑利比亚应对此负责。在白宫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凯西手下出席这些危机会议的是行动处的伯特·杜恩和情报分析部

门盖茨的副手理查德·科尔。他们认为现在利比亚的阿布·尼达尔是这些袭击的幕后策划者，但他们无法加以肯定。最确切的证据与此有关但并不重要：一份报告显示卡扎菲的特工曾向阿布·尼达尔在保加利亚银行的帐户上转了 100 万美元，但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

会议集中了一批军事报复的目标，其范围从靠近的黎波里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地，到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卡扎菲的情报总部。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五角大楼提出了警告，利比亚有 1500 名苏联顾问，其中 600 人参加了空防。如果美国进行一次空袭的话，将会杀死多少苏联人？那将引起什么后果？所有的事都搁置了起来，等总统回来决定。

同时，诺思让斯波金起草了一份有关伊朗问题的新的、范围更广的总统指令。这份总统指令中提出与友好的有联系的外国情报机构（如以色列）及个人（如格班尼法尔和斯考德）协调进行一次秘密情报行动。它有两个目的："在伊朗建立一个更温和的政府及从他们那里得到其它途径无法得到的重要情报……"。

但该总统指令未提到人质或营救人质。斯波金将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凯西叫到了电话机旁，这一线路不是保密的，因而斯波金说有人要求他向白宫提供"某些服务"，并参加另一个会议。凯西知道正在进行什么吗？

凯西说不知道。

"你希望我去参加这次会议吗？"

这位局长说："去干吧，不过要不断地向我通报。"

1 月 3 日，当晚，斯波金与诺思会面，诺思说他将通知凯西。

1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诺思往斯波金家里打电话，他说他们两人将在晚些时候与凯西碰头，这位局长正从佛罗里达其家中启程返回。

当天晚些时候，凯西读了这份有关伊朗问题的新的总统指令，

并告诉斯波金和诺思说它看上去不错。

当他们离开时，斯波金在门厅叫住了诺思，他问道："请再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在文件中加进人质？"

诺思说国务院不想把它写进去，因为那样的话使它看上去像是用武器交换人质。

"不过，我听起来这不大对头，让我们回去再找一下局长。"

他们又回去找了凯西。斯波金说这将成为永远机密的总统指令之一，最好诚实一些。于是又增加了第三个目的："促进被扣押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获释。"

第二周，利比亚和伊朗交替成为白宫的最优先考虑的问题。1月6日，星期一，在危机指挥室举行的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总统批准了一项增强和扩大推翻卡扎菲行动的计划，并授权继续实施那项有可能进行的针对利比亚的美国—埃及联合袭击的秘密计划（玫瑰行动），他推迟决定美国是否对利比亚实施直接空袭。第二天，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再度开会，考虑军事选择问题。舒尔茨提出了国务院法律顾问的观点，即恐怖主义是"武装进攻"。而军事报复是正当自卫。温伯格表示反对，假如卡扎菲击落了美国的飞机并逮住了美国飞行员怎么办？那将会有更多的"人质"。这个词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总统拒绝了军事选择，温伯格笑着离开了危机指挥室。

总统、副总统、舒尔茨、温伯格、凯西、里甘、米斯和波因德克斯特聚集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讨论伊朗问题。

波因德克斯特提出一项继续出售武器的计划。他冷静地说，伊朗需要美国有表明诚意的行动，这笔交易将在30天到60天这段时间内完成，而伊朗将使剩下的五名美国人质全部获释。由于这一交易的敏感性和对人质的潜在危险，在人质获得自由并登机离开黎巴嫩之前将不通知国会情报委员会。如果在此之前这一秘密未被公开的话，其结果将是很好的，同时，该行动中美国所起的

一切作用都是可否认的了。

舒尔茨很紧张，他说他反对这一计划，它将推翻整个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政策。他提醒说这一政策是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不卖给他们武器，不赎买人质。

温伯格也表示反对。他补充说这一计划使美国受到最赤裸裸的敲诈：无论何时，只要未能满足伊朗人的要求，他们就会威胁要用“中东方式”揭露这一交易。

波因德克斯特说这是个特殊的情况，并不与我们的总政策相矛盾，只不过是个例外。

舒尔茨说，它不会发挥作用的。他又带点嘲讽地说，可否认性是个假设，是业已试验过的政府理论，在很久以前就创立了这一理论但它不起任何作用。最近的例子是在尼克松执政时。

凯西很赞成这一计划。这一交易将迅速完成，而且如果第一笔武器交易没产生结果，这一计划可以立即终结。伊朗在世界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恰在苏联的腹下。美国不可能忽视伊朗并允许它处于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之下。

那位伊朗中间人格班尼法尔怎么样？有人问道。中央情报局1984年的“欺骗通告”曾宣称他是个编造的天才。他们能用甚至依靠这种人吗？

但是，凯西回答说，格班尼法尔可以传信，三个月前韦尔获释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伊朗有着可靠的关系，而且尽管他未通过以前的测谎器测验，他将再次接受测验。

尽管这一小组意见分歧，但他们得出了共同印象，即总统要继续进行这一行动。

四天后，1月11日，格班尼法尔到华盛顿，并将在当天下午和晚上在四季宾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测谎器测验。结果报告呈送到凯西的桌子上。“格班尼法尔测谎器检查：结果表明他实际上在

所有问题上进行了欺骗，他的有关恐怖分子的活动是撒谎、编造的……很明显他是个编造者和诡诈的人，并进行了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他在所涉及的15个问题上有13个问题进行了欺骗。”

在中央情报局向格班尼法尔询问过的人及他主动提及的人的身份被用字母A至L代表。这是为了保护可能提供了有关他们的情报的情报员。例如，格班尼法尔带来有关“C”的新情报，C曾要另一个伊朗人搞300公斤塑料炸药，用来袭击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设施；C还有另一个计划，向恐怖分子运送价值达600万美元的恐怖分子用的装备。

凯西提示查理·艾伦在1月13日与格班尼法尔进行了五个小时会谈。很快凯西收到了一份九页的报告，它说，格班尼法尔是一个精力很旺盛、极易激动的人。他通过采办军火和提供“其它服务”赚到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他比较直率地说出，他希望从与美国的交易中得到什么好处。”

至于人质，艾伦报告说格班尼法尔“在继续与白宫进行这一工作，这一行动可以独立进行”。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他与伊朗总理、石油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们关系密切……当然，毫无疑问他有些吹牛和夸大。”

“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坏方法是试图训斥他。”

第二天晚上，凯西与诺思会面。并向他解释说，在波因德克斯特告诉温伯格说总统希望开始伊朗行动后，温伯格将不再为之制造障碍了。凯西建议举行一次会议，它于1月16日在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举行。除波因德克斯特外，凯西、斯波金、温伯格和米斯参加了会议。司法部长米斯说他认为按照所提出的总统指令，不通知国会是合法的。当人质获释后将通知国会。同时，他们一致同意总统将不得不向国会报告以证明他做的是正当的，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辞职。

第二天里根总统签署了这项总统指令，批准通过中央情报局向伊朗出售武器。波因德克斯特将唯一的一份文件放到保险箱里。

负责行动处的助理局长克莱尔·乔治前去白宫，并在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里读了那份总统指令。中央情报局将需要4508枚“陶”式导弹。出于过去与格班尼法尔打交道的经历及测谎器测验结果——格班尼法尔唯一正确的是他的名字，乔治不想用他。

凯西很快介入了此事。格班尼法尔是个无赖，而且中央情报局过去与他交往的经历表明他不可靠，但就这条渠道来说有些事可以利用。凯西说，它值得一试，其它的不一定有用，因此让我们看一看它进展如何。如果这条渠道不能起传递作用，我们可以关闭它。

麦克马洪到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读了这一总统指令，并发现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计划向伊朗提供情报，从而在他们与伊拉克的战争中帮助他们。

“那将肯定使他们具有进攻的优势地位，它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麦克马洪激动地说。上帝啊，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进行一项行动向伊拉克提供前线的情报，中央情报局、美国政府是否要处在向双方提供情报的位置上呢？这有点太玩世不恭了。

波因德克斯特坚持说，提供情报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而且第一批1000枚“陶”式导弹送去后将通过人质是否获释来检验这一渠道。

麦克马洪表示反对。

尽管没有直接向麦克马洪的观点挑战，但波因德克斯特说：“我们现在有了个机会不应错过，而且我们应继续开发它。如果它没有作用，我们所损失的不过是一点情报和1000枚“陶”式导弹；而如果它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在中东改变许多东西。”

麦克马洪迅速回到兰利，通过电报找到正在国外的凯西。凯西证实他知道这一行动并已批准了它。麦克马洪说服了诺思不给

伊朗以整个前线的情报而只给予一部分。这将不给伊朗以作战优势，同时又足以表明良好的信誉。

1月23日下午5时，波因德克斯特腰板挺直、铁板着面孔，胳膊上挎着大衣走进《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编辑室，并进了布雷德利的办公室。我们有一份有关利比亚的报道并将于第二天发表。该报道说总统将秘密派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作战计划的戴尔·维瑟准将第二天去开罗，继续进行一项对卡扎菲实行可能条件下的联合袭击的秘密军事计划——“玫瑰”。波因德克斯特告诉布雷德利说，这一报道的发表将预先终止总统对付卡扎菲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方案。他说在一场已宣战的战争里，没有哪一家美国报纸会考虑发表有关这类秘密计划的消息，而对付卡扎菲和恐怖主义已近乎是一场宣战的战争了，而且如果《华盛顿邮报》发表这一报道的话，那么埃及方面将会取消维瑟之行。波因德克斯特说这一计划庞大而复杂，《邮报》只是得到了基本轮廓。这位将军说，并没有什么事有临近的危险。布雷德利说他不理解如果总统没有计划进行一些重要的行动，波因德克斯特为什么要援引有关国家安全条文。波因德克斯特要求如果布雷德利想发表这份报道就通知他，说完就走了。

经反复斟酌，布雷德利决定将有关维瑟之行的简要报道插在有关美国两个航空母舰编队计划前往利比亚领海外进行演习活动的报道中间，其第五段说里根已命令“派一名特使去埃及进一步讨论可能条件下的一致军事行动方案。”

布雷德利叫波因德克斯特打电话并告诉他，报道中将不提到维瑟的名字，也不提到他计划在第二天离开。波因德克斯特强烈反对，这一报道将迫使取消维瑟的秘密之行；因为埃及人对泄露令人难以置信地敏感。

在白宫，波因德克斯特就他预测第二天将会出现的重大反响

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好充分准备。

但第二天所有新闻机构都报道了美国航空母舰计划在利比亚海岸外演习；而《邮报》所提到的一名未指明的特使未受到注意。白宫未受到新闻界的质询，而埃及大使也没向国务院或国家安全委员会打电话。波因德克斯特很吃惊，当有些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问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唐·福迪尔下一步如何作时，他回答说："禁止在埃及发行《邮报》。"大家都笑了。

波因德克斯特将维瑟之行推迟了几个星期。其后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后，波因德克斯特写道，总统已批准继续进行"花"和"玫瑰"计划。波因德克斯特在有关这些文件的一份备忘录的旁注栏中写道，一旦发起对利比亚的袭击，美国将提供"在利比亚境内的空中支援。"维瑟将在埃及讨论四个方案：前三个是关于假如利比亚袭击如何防御的；第四个是根据白宫指示所补充的，它是对利比亚实施先发制人的袭击。维瑟向波因德克斯特汇报说，他与埃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凯西浏览了一遍呈给他的有关政局不稳定的季度观察报告，总起来说它提到了约 30 多个国家。按照他和盖茨所建立的方式，这份报告的封面上有一个坐标方格表，一边是三个纵栏目，分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中等重要的及不太重要的国家。顶部是另外三个横栏目，即政局高度不稳定，中度不稳定和低度不稳定。这产生了九个"方格"。

在关键性的最重要的、政局高度不稳的方格里是菲律宾。其总统弗迪南德·马科斯已执政 20 年，其中 10 年实行了军事管制，现在马科斯的健康状况不好。凯西看到了伊朗国王让位在东亚的翻版，凯西觉得关键是要放弃马科斯。马尼拉情报站站长罗伯特·格里利已回国担任行动处东亚科科长，并很快成为兰利总部中凯西的"爱尔兰黑手党"成员之一。他坚持中央情报局不应将其

接触局限在马科斯身上，他们需要与马科斯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接触。最近几年中央情报局已认真地考虑过向马科斯的政治反对派提供秘密政治支持的行动，中央情报局只需向这些反对派组织或有前途的领导人提供少到1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其印刷和旅行，就可以建立与他们的某些重要关系。但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一秘密行动可能会暴露，其所造成的损害将超过10万美元所增进的关系。马科斯仍是一位强有力的人物和朋友，凯西曾访问过菲律宾，并与马科斯保持着经常的个人和情报接触。凯西认为这个人是在浪里游泳。出于美国海外最大的军事设施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的战略价值，在菲律宾的混乱将使卡特年间引起伊朗剧变的混乱变得暗淡无光。

"菲律宾情况怎么样?"是凯西在局里经常要问的问题，他觉得问题在于共产党叛乱，而不是马科斯本人。但国务院和凯西的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并不这样看，他们一直在强调马科斯的贪污腐化，他的不得人心和孤立。经对两方面权衡，凯西仍倾向于马科斯。软弱的凯西觉得其对手科拉松·阿基诺——已于1983年被暗杀的反对派领导人贝尼诺·阿基诺的遗孀，将是软弱的，并最终将使这个国家落入共产党手里。凯西说，她是个家庭主妇并没有任何政治经验，认为她能够抵抗共产主义是可笑的。

舒尔茨最后改变了看法并认为马科斯已完蛋了。但总统、里根夫人（她与伊梅尔达·马科斯关系密切）及凯西立场不变。对舒尔茨来说，这生动地表现出凯西已丧失了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并无法看出很明显的东西。凯西本可以推动总统并对美国的菲律宾政策发挥影响的，但这位局长僵硬的亲马科斯态度使得政府的政策牢牢地置身于这位已筑垒设防的总统阵营中。马科斯过于自信地在1986年2月提前举行大选，这一选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一组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观察组作结论说马科斯曾试图舞弊。新闻照片显示许多被谋杀的阿基诺竞选运动工作人员的尸体。然而，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里根提到这次大选时却说："存在欺骗的可能性，尽管它可能在两派都发生过……"最后面对着他和凯西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和证据，这位总统的讲话变得破绽累累。屈服于无可避免的结果，他们不得不送马科斯流亡，从而科拉松·阿基诺成为菲律宾总统。

2月27日，凯西和克莱尔·乔治就伊朗交易问题与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会谈。凯西渴望能尽可能地将以色列人和格班尼法尔排除于谈判之外。这位局长的要点是："我们无法再承受任何苏联及其他人可以窃听到的电话交谈了……一旦这一谈判泄露我们需要有一项连续的计划，美国与伊朗之间谈判这一事实足以改变整个世界……阿拉伯世界将会发疯，除非我们对这些谈判进行谨慎的和适当的解释。"

在谈到下一步包括麦克法兰与一名伊朗代表的会谈时，凯西说："我们应记住，泄露这次会谈这件事应被看作是为以色列的利益服务，在以色列只有四个人知道……"

他们现在相信伊朗国会议长拉夫桑贾尼将会去欧洲与麦克法兰会谈。诺思刚从西德回来，他在那里与拉夫桑贾尼办公室的一名官员进行了会谈。

麦克法兰从他家里发给诺思一封计算机信件："罗杰，奥利干得好——只要这个世界知道了你曾多少次保护美国政策，从外表上看既完整又通融的话，他们会让你当国务卿的。但他们不可能知道；而且如果知道了的话他们会报怨——这就是二十世纪末的民主状态。

当天晚上，诺思回答说："相信我，我们的方向确实是对的……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当明天波因德克斯特向舒尔茨汇报此事时他会同意的。在上帝的恩赐下，再经过点艰苦的工作，我们将很快使五名美国人质回到家中并走向建立比"陶"式导弹换生命多的

多的富有建设性双边关系的轨道，……如你所知，（波因德克斯特）在这件事上压力很大并非常担心，它是否能按预定计划发展。与他相比，我在这件事上比他要轻松的多。我只与我们的敌人打交道，而他不得不与内阁打交道。”

诺思补充说他想安排有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和正在管理向尼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私人运输网的斯考德参加的一次会议。“迪克将与明天晚上从欧洲回国，在欧洲他正在为尼反政府武装安排一次武装交货，斯考德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

凯西的近东科科长汤姆·特威坦也参加诺思与伊朗官员在欧洲的会谈，对前景却有着暗淡的看法。拉夫桑贾尼办公室的那位官员不说话，显得很害怕，并把美国看成是大撒旦。格班尼法尔也参加了会谈，同往常一样向两面撒谎，向美国保证所有人质获释，向伊朗允诺可以得到各种先进导弹和武器装备。正是出于这种打算使大家走上了谈判桌，而一旦他们开始谈判格班尼法尔便静观这场犯规的比赛。

又一批1000枚“陶”式导弹运到了伊朗——美国第一批直接运货，但却未释放一个人质。格班尼法尔却表现得似乎球仍在美国这边，并说在另一次会谈中，伊朗决定他们一点不想要“陶”式导弹，因而这些“陶”式导弹不算数。

波因德克斯特感到极其厌倦，并想把整个交易砍掉。他说，忘了这一切吧，这里面双重交易和复杂的动机太多，它不会有任何前途。

然而诺思却保留了这一行动，他理解总统对人质获释的迷恋并无法摆脱这一诱惑。有人害怕悲剧会重演，使这位总统会像他的前任那样栽在“伊朗人质危机”上。

凯西同意这一行动必须继续下去，危险是小的，所卷入的武器也不是那么重要，而且提供给伊朗的情报也不足以决定两伊战争的结局。

麦克马洪对中央情报局与伊拉克之间详尽阐述的、绝密的交流情报协议，向这个伊朗的敌人提供卫星照片资料感到深深的不安。向双方都施舍战术情报，使中央情报局充当了制造僵局的角色，这绝不仅仅是抽象的。这个战争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战争，伊朗采用“人海”战术，他们由少年和非正规士兵所组成，双方几乎已有100万人被打死、打伤或俘虏。这不是在计算机操作中心的游戏，而是大屠杀。

麦克马洪确信这一武器交易及对国会的欺骗是一个定时炸弹，它是使政府垮台的因素。他去找凯西说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了34年并当了四年副局长，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婚姻正在破裂，这对一个天主教徒来说是极为痛苦的经历。他需要改变一下，想退出中央情报局。

凯西很不高兴，麦克马洪是个好搭挡，尽管他对秘密行动摇摆不定，但他在最后的分析中都默认了总统和局长的权威 麦克马洪说他打算担任洛克希德加利福尼亚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并负责其“秘密”情报项目。凯西对他说，你当一个飞机推销员太屈才了，你应该走自己的路，开办自己的企业，使自己能充分利用资本再生的机会。

麦克马洪笑了，并拟好辞呈交给总统，其中宣称在离开时带有“许多感情”，并指出凯西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才”。他的离任使凯西有机会提拔盖茨担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将一位分析专家放在第二把手的位置上将表明他并不仅仅关心秘密行动。

3月1日，伯纳戴特·凯西·史密斯在水门宾馆为父母结婚45周年举行晚宴。这一半正式晚会有70名客人参加，其中包括基辛格、斯波金、托尼·多兰、珍妮·柯克帕特里克、麦克马洪、盖茨和米斯。里根没来，布什原定要来，但却未来。晚宴后，伯纳戴特站了起来。“我想这至少是个半意外，”她停顿了一下，“但你

们大家都知道要保守一个机密是多么地难，尤其是在爸爸面前。”大家都笑了。人群中一些知情者叫到：“这也是同盟者们要说的。”笑得更厉害了。米斯开始讲话了，他说如果没有凯西在1980年总统竞选中所作的工作，“在座的各位今天可能不会在这里了。”他说比尔和索菲娅的结合是一个“具有非凡的连续性的婚姻”。伯纳戴特说：“我希望我们将能在又一个45年后在此庆祝妈妈和爸爸结婚90周年。”听众中又一次有人叫了起来：“我想肯定会如此的。”

尽管麦克马洪呈交了辞呈，但他并没有立即离任。3月14日，他代表凯西参加了讨论利比亚问题的国家安全小组会议。所有的高级官员都参加了会议，总统命令三个航空母舰编队在利比亚海岸外集结，进行一项被称为“燎原之火”的行动。他签署了一项交火规则的指示决定：

・如果卡扎非袭击美国的一架飞机或一艘舰船，报复将是相应的，并只指向袭击源——特定的一艘利比亚船只，一架飞机或一处导弹发射场。曾考虑过更强硬的报复措施，即允许现场美军指挥官采取不相称的报复行动使卡扎菲付出比他可能对美国军队所造的损害大得多的代价，这一考虑被否决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温伯格想使军事行动保持在最低限度。

・如果美军有伤亡，而且总统批准进一步行动，那么将对利比亚的五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这些具体靶子大部分是停靠在地面上的苏联提供的飞机。

・如果卡扎菲采取进攻行动，并且再次得到总统批准，那么美国作战飞机将轰炸利比亚内地，袭击抽油设施及其经济目标。

会议对卡扎非的个性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总统对中央情报局

所收集的卡扎菲个人生活细节特别感兴趣。在去西班牙的麦哲卡岛旅途中，这位利比亚领导人化了妆，并穿着高跟鞋，他的助手为他买了一个玩具熊。很明显他信不过他下塌宾馆的床单，并派他的助手从好几个商店给他买来床单。里根多次提到卡扎菲像一个小妖精，并总是用一句话形容说："卡扎菲可能会随时窥视南希的抽水马桶。"

他们还谈到了美国要强硬起来，要"重创"卡扎菲，"沉重打击"卡扎菲，并对其他人灌以足够的支持因素，尤其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并使他们变得"前倾些。"涉及格林纳达的国家决不止一个。

有一次唐纳德·里甘问："将使用核武器吗?"其他人都跳了起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位白宫办公厅主任说他只不过是想确保他们不会使用核武器。

在"燎原之火"计划开始前，温伯格去伦敦接见了第六舰队司令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中将。这位国防部长指示说：如果美国不得不对利比亚的袭击或者挑衅作出反应的话，应尽可能使用"时髦"的武器，这些精确定位的武器可恰好击中特定的目标并使损害较炸弹更为局限。温伯格命令说，最低限度地用武力解决他们所带来的骚扰，不要进行非必要的轰炸或交火。

另一方面，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则认为如果他们对利比亚军队予以重创，则卡扎菲的军官们会认为他们的麻烦是卡扎菲的恐怖主义冒险的后果，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推翻卡扎菲。

凯西不能十分肯定。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予以威胁、及那种战争恐吓行为包括美国及埃及秘密计划联合对利比亚发动袭击等等都是正确的。他支持所有此类行动，但是这些行动的可见性将使中央情报局反对卡扎菲的秘密计划难以实施并使他在国内和阿

拉伯兄弟国家中的地位得到加强。这将导致对他的同情并给他所指控的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增添证据。

利比亚流亡者们似乎不可能胜任这一工作，麦克马洪是对的，他们是男童子军，脆弱而非职业化。中央情报局已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接触，寻求如何推翻卡扎菲的主意，但摩萨德说不行。法国曾传话说对卡扎菲的唯一解决方法是完全秘密地行动，并提出了大胆的计划。但当要求协助时，法国人却回避了，说他们担心美国的军事或秘密行动可能只会不必要地激怒卡扎菲，因为它将永远不会达到使他倒台的目的。

凯西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改变总统指令，并允许中央情报局采取行动，直接打击卡扎菲并不通过或不与流亡者联合。但白宫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了“燎原之火”行动上了。

“燎原之火”行动预定于 3 月 22 日，星期六晚上开始，但因为锡德拉湾的大风而不得不推迟一天。这一大规模海上演习于 3 月 23 日，星期天开始。一支令人吃惊的美国军队出现在地平线上：45 艘军舰、200 架飞机，甚至还有先进的核动力洛杉矶—688 级攻击型潜艇。三艘军舰穿过了北纬 32 度线——卡扎菲的“死亡线”，它离利比亚海岸超过了 120 英里，其划分无视国际公认的 12 海里领海主权的界限。约 100 架飞机在舰队周围飞行，形成一个保护弧。不到两小时，利比亚人从一个地面导弹基地向美国侦察飞机发射了两枚萨姆—5 地对空导弹，这些苏制的导弹未打中，后来又向美国飞机发射了四枚萨姆—5 导弹。

美国 A—7 攻击机从约 40 英里外用准确的“哈姆”导弹进行了还击，准确击中了雷达并将其至少是暂时地予以摧毁。用 46 磅高爆弹头有效地“击中了他们的眼睛”，并使利比亚的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在随后两天，美国军舰至少击沉了两艘利比亚巡逻艇。

当收到正式的最新报告时，里根总统问美军是否有伤亡，回答说毫无伤亡。美国情报机构推算有 72 名利比亚人被杀死。

3 月 26 日，星期三，华盛顿时间下午约 1 时 30 分，“燎原之火”演习结束了。在当天上午的报道中，《华盛顿邮报》概述了这一计划的部分内容，并报道说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曾在六个月前秘密访问埃及并“协调可能条件下的针对利比亚的联合军事行动。”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收到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打来的电话，他说他代表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打电话。

他说：“你们应该知道这里非常不高兴，由于卡扎菲有暗杀和恐怖主义的癖好，而我们正在与之对抗之时，你们却报道埃及秘密之行并提到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的名字。正在对抗的紧要关头，披露这一秘密之行提高了利比亚人的形象……人们在担忧他们的家庭——这超出原有的界限，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已经成了攻击的目标。”他的这番话表明有情报支持这一报道。

这位官员说：“我从未见过（福迪尔）对任何事有这么不高兴……他想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已增加了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的危险系数。它与这工作毫不相配，我真不知如何作才好。”他以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说道。

二天后，3 月 28 日，星期五，约下午 4 时，布雷德利收到波因德克斯特的一个电话。这位将军说道：“我打电话是要阻止鲍勃·伍德沃德的报道，”尤其是提及他及福迪尔的名字，“当它出现在报纸上时，它使他们的思维集中到了这一方面。”

布雷德利问道，你的意思是说由于提到了你及福迪尔的名字，

现他或福迪尔的尸体被炸飞或被子弹打成了筛子，那么《邮报》将承担这一责任。波因德克斯特提出第二条反对意见，他说："鲍勃未给任何人打招呼。"他说他未得到事先告诫说要用他的名字。

布雷德利说，你一定知道，我们同许多人说过。

"好了，"波因德克斯特说，"你有你的工作而我有我的工作。"

布雷德利给我一份简短的备忘录，详述了波因德克斯特的电话，并认为它不仅"虚弱无力"而且"糟透了"。

几天后，我与政府中一位地位较高的消息灵通人士交谈，并描述了波因德克斯特和福迪尔的苦恼。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哦，他们只是对战争就这么结束了感到苦恼。"

他说："它将会发生"，并补充说"搞"掉卡扎菲或某种形式的报复性袭击的决策正在狂热地实施着。

这次开罗读到了《邮报》所提及的与埃及的秘密军事计划。埃及半官方报纸《艾尔艾哈拉姆》的总编辑，与穆巴拉克总统关系密切的依卜拉欣姆·纳福写道："美国不止一次试图与埃及进行联合反对利比亚的行动。"他列举了三次试图并指出埃及已拒绝了美国所有的此类建议。然而，在一封发回华盛顿的秘密电文中，美国驻埃及大使维利尔特斯说，穆巴拉克私下向他保证埃及将继续这一计划。美国新闻界揭露仅是个小结果，不过是在路上的冲撞而已。

尽管中央情报局的作用因"燎原之火"行动和对卡扎菲的打击而受到限制，但凯西现在逐渐明白总统要的是利比亚改换门庭，而不是其它东西。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或报复性行动所需要的重要性组成部分，是能够证明利比亚与某一具体恐怖行动有关的证据，确凿的证据。凯西命令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卫星系统集中一切力量行动，他要求得出答案。因而非同寻常的人力、物

力和注意力被投入到这一行动之中。抓获劫持“艾克利·劳罗”号游船的恐怖主义分子一事表明好的情报可以起到重大的作用。

在锡德拉湾演习几周前，凯西手下就开始定期截获从的黎波里市中心卡扎菲情报总部发出的电文，这是一次特别成功的情报行动。确切的方法是严格保密的，但有一次他们收到并破译了388则电文。3月25日，“燎原之火”行动刚一结束，就从的黎波里向八个人民办事处——相当于利比亚驻外大使馆，发出了一则电文。这份三页的电文指示他们做好准备，以对美国的目标进行袭击并实施“计划”，它是由利比亚情报局的首脑发出的。

10天后，4月4日，从利比亚驻东柏林人民办事处向的黎波里情报总部发回的一则电文被截获，电文中说：“当的黎波里看到明天的头条新闻时会感到高兴的。”

仅数小时后，4月5日深夜：另一份东柏林发往的黎波里的电文称一项行动“正在进行”，而且它不会被查到东柏林的利比亚人头上。10分钟后，柏林时间夜间1时49分，在西柏林“拉贝勒”迪斯科舞厅——众所周知的美国军人下班后的娱乐场所，一枚炸弹爆炸了，一个21岁的美国陆军中士肯尼斯·福特及一名年轻的土耳其妇女被炸死，238人受伤，包括约50名美国军人。

这一截获的电文几乎是发出了本可以防止这一灾难的预警警报，但官员们疏散“拉贝勒”里的人迟了15分钟。

凯西现在有了确凿的证据。尽管这些个别的电文可能有些模糊，但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提供了他的情报分析专家们所认为决定性的材料——动机、命令、时间、地点和行动后的报告。的黎波里并未发电命令对“拉贝勒”进行炸弹袭击，但的黎波里不卷入选择目标或确定时间是常规程序，这些都交给了现场行动人员。现在即便是持怀疑者也被说服了。

白宫开始秘密计划立即进行一次报复性军事袭击。其后10天，政府发出了一系列混乱的公开信号，有些人实际上保证要进

行袭击，而另一些人则否认这一可能性。这反映了政府内部的混乱，及对里根是否对按下行动的扳机有着广泛的怀疑。主要怀疑者之一是海军陆战队中校诺思，他认为卡扎非是高级恐怖分子，而自己是高级反恐怖专家。但在命令链上的某些人是能找理由撤销或劝总统不要行动。

所截获的情报中，具体的是少见的，因而一些高级官员们无法保持沉默。美国驻西德大使理查德·伯特公开谈到"拉贝勒"爆炸事件时说："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利比亚人参与了这一事件。"北约军队总司令伯纳德·罗杰斯在4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利比亚应承担这一事件的责任。

国家安全局立即提出一项秘密咨询报告，指出这些讲话正在"严重妨碍"它获取情报的能力并制定出一项新的更为严重的密级分类方法，进一步限制了有代号的截获文件及其译本的传阅范围。

4月14日，星期一，晚7时——利比亚时间夜间2时，约30架空军和海军轰炸机袭击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距的黎波里市约450英里的一个港口城市。八架或许是九架F—111轰炸机，每架携带2000磅激光制导炸弹袭击了卡扎非所在的"辉煌门"兵营。原定至少要有32枚炸弹击中这一兵营，但最多只有四枚，或许只有两枚实际命中。许多F—111轰炸机经过自英国而来的14小时，280英里的航程已不得不返航；法国不允许他们从其领空飞过，使这一航程拉长了。这是一次高技术的失败但至今仍对其保密。卡扎菲睡在院子里的一个帐篷里并安然无恙。他的两个儿子，一个15个月的被认为是卡扎非的养女的利比亚女孩被炸死。

晚上9时，里根出现在电视上，宣布了这次袭击，它仅持续了11分半。他引述了利比亚参与柏林爆炸事件的"无可否认"的证据；概述了所截获的二份利比亚电文的内容并说这一行动是"自卫"。

“今天，”他在椭圆形总统办公室里说，“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如有必要，我们会再做的。”

二十三

六个多月来，凯西一直在处理另一件严重的反间谍案件。

克格勃的叛逃者叶尔钦科在逃回苏联以前不仅帮助揭露了霍华德，而且揭露了另一名国家安全局的间谍。叶尔钦科曾告诉他的中央情报局头目们一件事，此事发生在他1975至1980年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任克格勃主要保卫官员期间。当时国家安全局一位主动投奔者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联系，从而使苏联人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内有了一名重要的间谍。叶尔钦科不知道此人是谁，但回忆起曾与此人通过电话。中央情报局把此事告诉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查找了通过安放在苏联大使馆电话线上的窃听装置所获得的电话录音，他们在一盘六年之久的磁带上听到了一个身份不明者的声音："我有情报要与你们商量并送给你们……"叶尔钦科提示说打电话者来自国家安全局，现在又有了打电话者的录音，联邦调查局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家安全局约1000名精锐的苏联组人员身上，并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听电话录音。他们听出是以前的一个同事罗纳德·佩尔顿的声音。他曾在1965年至1975年间在国家安全局工作过，此后他辞去了苏联组年薪达24500美元的核心工作。录音分析表明此人正是佩尔顿。

尽管佩尔顿是一名低级职员，但他所处的岗位使他能较广泛地接触国家安全局通过截获60条苏联密码信号或通讯联络渠道所获得的绝密的密码情报。他曾干过编制预算、安装设备、设计

程序及解决难题等多项工作，当时38岁的佩尔顿非常自信，是一名出色的谈判者，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换句话说，苏联人得到了一位送上门来的大智者。如果让他们从国家安全局的数千名雇员中挑选间谍，他们也选不出更好的了。佩尔顿是那些重要的低级人物之一，他既懂技术又进行过广泛的观察。

1985年11月，联邦调查局发现佩尔顿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里斯当帆船推销员。当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安纳波里斯的希尔顿宾馆找到他时，他承认了其部分间谍活动。1979年，当他还在国家安全局时即宣告自己破产，但很明显当时那里没人知道。1980年，在一连串的生意失败后，他去找了苏联人，并去维也纳与克格勃碰头。有一次他甚至在苏联驻奥地利大使的公寓住了好几天。他提供了价值达数千万美元的有关谍报技术的情报，但只获得35000美元的报酬。

在与联邦调查局的两名特工见面后，佩尔顿即被逮捕，并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在法庭的控告词中，联邦调查局说佩尔顿向苏联特工提供了有关“美国对苏联的情报收集计划”的情报。这在新闻界引起了猜疑，猜测国家安全局的重要行动计划之一已被出卖。

在一次听证会上，法庭指定的佩尔顿的律师提到一个代号“神铃”，法官立即中断了提问并禁止继续探讨这件事。

尽管“神铃”行动始于70年代末特纳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但是仅到1981年它已被泄露。只有现在佩尔顿暴露后，国家安全局和凯西方把这些事联系起来。

在苏联海岸以东的鄂霍次克海的海底，一支由美国海军和国家安全局人员组成的小分队正在潜艇上操作着，并在海底安装现有的最先进、最高级的小型防水窃听装置——一个大的圆柱形窃听器，它被安装在包含有苏联重要军事及其它通讯线路的水下通讯电缆上。窃听器有一个完全包起来的连接装置，将其贴在电缆

上即可进行窃听，而不需要与电缆的每一根线路直接接触。当苏联升起电缆进行检查或维修时，窃听器很容易地与电缆分开并沉在海底从而不被发现，这样就没有客观证据表明有窃听器。窃听器里的磁带可以把四至六周期间通过不同的渠道或通讯线路的信息和信号记录下来。这种窃听器一年只有在两次录音时间时安放。

"神铃"系统最危险的方面之一是取回储有通讯内容的磁带。一艘特别装备的潜艇必须返回鄂霍次克海；海军潜水员必须用一艘小型潜艇或一个水下机器人找到窃听器并换下磁带，然后将取回的磁带送到国家安全局进行录制，可能的话破译密码。尽管所收集的信息只有数月之久，但这项工作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美国最感兴趣的是有关苏联弹道导弹试验的情报。许多此类导弹试验其导弹落在靠近鄂霍次克海的堪察加半岛周围，苏联的有关此类导弹及其试验的信息都通过这条海底电缆传递的。

苏联人认为他们的水下通讯电缆和地下通讯线路是可靠的，并且实际上不可能被美国窃听。因此，苏联在鄂霍次克海底电缆中的某些通讯渠道里用的是不太先进也不太高级的密码系统，甚至在某些通讯渠道中根本不用密码传递信息。苏联最好的密码系统用于最易被截获的通过电波传递的通讯线路。无论它是通过标准无线电还是微波或卫星。

鄂霍次克海水下电缆的窃听工作一直持续到1981年，后来美国卫星照片显示约有十几艘苏联舰只聚集在连有窃听器的海底电缆那段正上方。经跟踪发现一艘用于深海打捞的苏联舰只绕地球一圈赶来参加这一行动。此后，当美国潜艇赶到此处换磁带时，发现窃听器失踪了，国家安全局推测它落到了苏联人手里，这项行动被破坏了。美国海军研究了所有的情报，写出了一份绝密的、只有少数几人可以看到的报告，它排除了巧合或运气。很明显苏联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且很准确地到达了设置窃听器的地点，一定有情报泄露，几乎可以肯定是间谍活动。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

是苏联人在我们内部一定有情报员，但没有人知道是谁和如何提供情报的。

1981年窃听器失踪事件一直是个谜，直至四年以后叶尔钦科提供线索引出佩尔顿，这个谜才被解开。

凯西希望法庭审理佩尔顿一案时不要公开透露有关“神铃”或其它秘密计划或它们被泄露的任何情况。

“神铃”的主要缺点在于从苏联的信息开始传递，到潜艇取得信息常常已过了数月之久。在“神铃”系统被泄露之后，海军情报机构首脑约翰·巴特恩海军上将和凯西的情报界办公室主任爱德华·伯克豪尔特海军中将极力提倡一种解决情报及时性问题的大胆方案。

他们提出，国家安全局可从格陵兰岛秘密伸出一条水下电缆，连接到在苏联北海岸重要水下电缆上所安装的窃听器上。这样，国家安全局就可以使用这一通讯系统进行即时窃听。但从格陵兰岛经北极冰川下到苏联北海岸的距离约为1200英里，在海底安装电缆每英里造价约100万美元，其总费用将超过10亿美元——两位上将争辩道，它虽然昂贵但或许值得。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气氛很有利，由于对秘密行动存有怀疑及中伤，国会议员会需要某种东西证明他们对情报行动是认真的。另一项建议要求花10亿美元用同样的技术在全球连线——用水下电缆连接全球的窃听器。

早在1985年我就知道有关“神铃”水下电缆窃听行动的情况，但我们不能肯定它已被泄露，因此布雷德利决定推迟报道。在佩尔顿刚被捕后，我们即证实了他所出卖的收集情报的重要工程之一就是“神铃”行动。由于苏联已拿到了窃听器而且很明显他们能鉴定出这是个窃听装置，因此布雷德利认为说明细节以表明数以千计的职员、技师、翻译和处理情报者中的一员会造成多么大

的损害是合法的。

12月5日，布雷德利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伦纳德·道尼拜访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威廉·奥德姆海军陆战队中将。十年前，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中校，奥德姆到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那是他上升的起点。奥德姆身材消瘦，办事认真而冷酷。他对苏联人有很深的研究，并且是用技术手段收集情报的忠实信徒。他说，对“神铃”的任何报道都会告诉苏联人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但是在30分钟的讨论中，他拒绝说出这些事是什么。他使人感到他发出了警告。他指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正处于危险之中。

后来，道尼说他认为奥德姆是在试图了解我们有关“神铃”的消息来源。布雷德利说我们应假设我们的电话可能被窃听。

帕特·泰勒和我开始采访，但不用电话。审判佩尔顿的日子即将到来，情报委员会不希望公审。一位官员说国家安全局对待新闻界的策略通常是拖延下去以赢得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渗透或行动是永生的，它们存在一日算一日，人们常常为能多出一周而高兴。这位官员又说，尽管佩尔顿向苏联人提供了情报，但有可能苏联人并不知道某些事。美国情报官员们曾对某些事以前的间谍们未透露给苏联人或苏联人未领会到而感到惊奇。

业已证明，除了“神铃”行动外，佩尔顿或许还泄露了另外七项有代号的行动。其中之一是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行动，另一项是美国与英国的联合行动，还有一项行动包括一种新的有效的窃听苏联微波通讯的秘密方法，还有另一项行动拥有一种设备能将窃听的信息传递至计算机进行即时分析。情报官员们担心有关“神铃”的报道将引起新闻媒介争先恐后地狂热追逐以获得更多的情报，紧接着便会有一系列新闻报道，这儿透露一些详情，那儿透露另一些细节。还有更微妙的问题，佩尔顿记住了些什么？他是否会隐瞒？他真正告诉了苏联人些什么？他所提供的情报是怎

样被理解的？苏联人相信他提供的情报吗？泄露并不意味着情报能力、技术和来源永远丧失了。关于佩尔顿的新闻报道能够打开禁锢的大门，使国家安全局成为准予记者们捕猎的鸟兽，不再像秘密产品车间那样禁止记者采猎。

旧的报纸剪报令人吃惊。十多年前，在《纽约时报》的头版，西摩·赫尔士报道了引起争议的事件，即美国潜艇在苏联海岸附近的行动。他写道："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些潜艇能接触陆地间经过海底的通讯电缆，因此可以截获一些绝密的军事电文和其它被认为太重要而不能通过无线电或其它较不安全的通讯方式传递的通讯。

1976 年派克委员会在关于美国情报活动的报告中说："一项高技术性的美国海军潜艇侦察行动经常在敌方海域内进行，在过去的 10 年里，至少九次与敌方船只相撞，有 110 多次可能已被对方发现，至少有三次侦察行动被新闻界透露了出去。"该委员会指出海军自己对这项行动的估价"危险性小的'冒险行动'"是不确切的，这一海军危险性分析结果是"表面的和形式上的。"

我和泰勒给布雷德利看我们的调查结果，奥德姆将军曾向他暗示过美国潜艇或设备通过电缆窃听的可能是国家机密，任何书面上的提及都是灾难性的。布雷德利给奥德姆将军打电话。

"我希望你没有发现那些秘密。"这位国家安全局局长说。

布雷德利说他的记者们将去处理这件事，他感到自己受人摆布。刚印出的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去《纽约时报》所提及的电缆窃听事件。布雷德利对这份出版物再次提及此事感到特别恼火。既然能在哈佛大学印出，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上不能发表呢？

1 月 27 日，布雷德利和国内新闻编辑罗伯特·凯瑟到情报界总部去拜访奥德姆和他的两名助手。我们有一份有关"神铃"报道的草稿并计划发表，希望他们提出他们觉得有损于国家安全的

部分。这些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读着长达八页的报道草稿，并聚在一起商量着，我们则静静地等候着。奥德姆将军很谨慎，他的助手在低声咕哝着。布雷德利问既然苏联人已经知道了这一切，为什么不能发表？苏联人已从佩尔顿那里知道了这些事并已从海底把“神铃”行动的窃听装置取走了，肯定会把它拆开检查。现在佩尔顿已经受审，为什么不能报道“神铃”行动呢？

奥德姆说他要留下这份副件进行研究，权衡一下他们该如何选择，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然后就会把它还给布雷德利的。

第二天，1月28日——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后数小时，奥德姆打电话给布雷德利。奥德姆说，美国政府和国家安全局及他本人都不希望看到这篇文章发表。即使可能，他也不打算帮助编辑这篇文章或制成“清白”的版本。他说发表这篇文章将引起注意，这是具有破坏性的和大家所不希望看到的。即使苏联人知道了，他们也不会确切知道美国对于他们所了解的事情知道到何种程度，这正是他要保密的事。因为整个计划已被放弃了，他想使它永远如此。

2月7日，布雷德利、道尼、凯瑟和我与中央情报局的老手之一共进午餐。这位长者是前高级官员，早已离职，但他仍渴望了解国家安全机构和新闻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布雷德利概述了我们所了解的“神铃”海底电缆窃听装置、佩尔顿的出卖及即将到来的对佩尔顿的审判。他问道，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发表这篇报道呢？

这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一位情报官员保护一项行动就象是母亲保护孩子一样，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苏联人已知道了，布雷德利说道。

噢，他问道，但到底是谁呢？是哪些苏联人呢？这无法回答。发现窃听器对有权听到此事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条线路已被窃听了一段时间了，这可能使那些负责军事的人或克格勃的官员感到窘迫，苏联内部可能要进行掩盖。

他说："好了，这些你们永远不会知道的，绝对不会知道的。"这是个两难逻辑，我们在从不利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以苏联人的观点来看这事：大约四或五年前，在某海域的一次秘密破坏活动；在美国进行了一次非常秘密的审判，不透露任何细节；以后此事就结束了。但是从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来看，即如果你们将此事公布于众，苏联军方或克格勃的反应将是发出警报，并进行全面的调查———因为他们的祖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成了间谍活动的受害者，这可被看作是对苏联国家地位的打击。苏联将开始搜查更多的间谍活动，这种搜查或许是一过性的而且无疑也是笨拙的，但苏联人终究是开始行动了，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所不希望他们做的。这会导致美国其它与之毫无关连的情报行动遭到破坏。他说他不知道有关窃听海底电缆行动的情况，他所说的只是假设的。情报官员的目的是使对方放松警惕，使他们自信、有安全感并不注意异常情况。所以美国情报机构当然不希望任何此类报道，因为这将引起对方的警觉。

他缓缓地讲着，《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会使这个问题摆到苏联新领导人、刚上任 11 个月的戈尔巴乔夫的面前。他说，公布这件事，将表明美国间谍活动已搞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肚子里面，他会大发其火。他们（克格勃）或许未告诉他——他们隐瞒了苏联情报系统所犯的大错，正像我们所作的一样。那个安在他们海底电缆上的窃听器，即使他们后来发现了它，也是一个大错，因为它决不会是刚放上去的。

后来我们称此为"戈尔巴乔夫冲击报告"——意思是在发表一篇报道以前，我们应估计戈尔巴乔夫知道些什么，何时知道的。实际上，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确信某些苏联人已掌握了这一情报，戈尔巴乔夫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但是午餐是严肃的，并提醒我们这篇报道并不简单，可能有意料不到的结局。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像是在政府里兜售这篇报道，以看一看能

否得到有绝对权威的人来告诉我们公布此事没有问题。现在官方和非官方都发出了警告，布雷德利说他要减慢进程看一看将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这篇报道中哪些能引起损害，很明显情报机构不想让新闻媒介在这一领域搞得满城风雨。或许他们有充分的未指明的理由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地调查或讨论情报收集行动或佩尔顿的惨败。我们只看到了引起警觉的黄灯，而不是红灯。

我把有关这一报道的最新草稿拿到白宫，交给一位高级官员，并要求他能对我作出某种答复。如果仍然有反对意见，我们希望能知道这些反对意见是什么。呈给奥德姆将军草稿里的四点小细节在此稿中已被删掉了，因为我们进一步的报告提示可以想象苏联人有可能不知道那些细节。草稿中写道，佩尔顿"泄露了美国海军一项长期的窃听苏联海底电缆通讯的行动。"它说这一泄密发生于 1981 年，并说"神铃"行动一直在鄂霍次克海底的一条电缆上进行。这位白宫官员许诺将尽力而为。

1986 年 2 月 20 日，里根总统乘飞机到格林纳达庆祝 1983 年的胜利。在"空军一号"上，那位白宫官员拿出了有关"神铃"行动的报道草稿，并与舒尔茨、温伯格、波因德克斯特和里甘进行讨论。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最后的改写本最不能接受。他们还有些欣喜地作出结论说：他们认为《华盛顿邮报》不能发表这篇报道。向国家安全局和白宫呈上多种草稿的反常举动表明了我们的犹豫不定。官员们确认这篇报道危害美国安全，并不仅仅由于它会透露一项秘密，更重要的是它会损害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关系。如果苏联将这篇报道看作是官方的，那么他们可能会发现奥德姆将军所担心的事——苏联人将意识到美国人了解他们知道什么。另外，国家安全局的各项行动相互间有秘密连锁关系，很难从中抽取一项行动进行公开讨论而不造成潜在的危害。但是他们主要的担心还是美国—苏联的动态关系，这篇报道会损害两国的关系，

而如果那发生了的话，它恰恰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

那位白宫官员回告我们说："以我的级别，这是我能帮你们得到的最高级的审查了。"他建议布雷德利应与波因德克斯特将军谈谈。

道尼不相信我们的报道不会告诉苏联人任何新情况，我们必须能肯定这一点。

布雷德利说，有关此报道已写了六篇草稿，每一篇草稿的细节都较前一篇减少。他说，前几篇草稿可能已引起了麻烦，"我们不应该公布其他人为何因叛国而被起诉。"为再次提醒我，他问我该报道有何社会意义？

我说，佩尔顿是俄国人曾经拥有过的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他不仅出卖了"神铃"行动，而且泄露了重要的情报收集行动。他在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岗位使他能够知道针对苏联的所有通讯方面的情报行动。在几年时间里，佩尔顿曾几次短期旅行，并在维也纳用几天时间向苏联人汇报情报。我们试图找出并告诉读者他出卖了什么，这篇报道也将表明走进这里的苏联大使馆并出卖美国的秘密是多么容易。

编辑们仍然不能确定，布雷德利说他将给波因德克斯特打电话。

3 月中旬，一名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告诉我们说，司法部几乎不想对佩尔顿进行起诉，因为他们担心审判会暴露秘密。

为什么我们不能公开苏联已知道的事？

这位官员说，这与全球性的情报活动有关，任何有关如何得到情报的报道都会引起全世界范围的警觉。情报方面的成功经常是由于对方的某人出了差错，忽略了某事，并未能加以及时纠正。最大的泄密可能是只从表面上来看待对方。干涉情报方面的事会暴露我们要隐蔽的反间谍力量。他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将与司法部长谈谈。"

不必了，虽然米斯是唯一没有请教的高级官员，但也不需要再与他商谈了。

3月21日，星期五，我在《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奥彻斯·索尔兹伯格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凯西。宴会就要结束了，应邀前来参加这一宴会的客人们在逐渐减少。凯西正在同《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谈话。他弯着腰，用手指搅着饮料，我走上前问是否可同他握手。

“我刚才还与你说过话。”他说着，搂着我靠近他，并说，“这是你举行的一次很不错的宴会。”

屋里的许多人同我一样非常惊讶，凯西继续提到“你这里的客人们。”

我不知所措——很明显他认为我是索尔兹伯格了，我说我是来自《华盛顿邮报》报社的。

刹那间他似乎在思考，然后笑了笑说，这是同你开了个巧妙的玩笑。接着他退了几步开始寻找索尔兹伯格并找到了他。后来凯西问我有关我写的关于他和中央情报局的书的情况。很明显是要让我知道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他一年前就知道我在写这本书，我们已就此谈过多次了。他说，为了安全起见，是否可以在出版之前对此书进行安全审查，以确定我没有透露应该保密的事情。我说我将悉听尊便，但我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

“你尽管干，你愿意的话还可以批评我。”他说，“这是你的书。”

不一会儿，我们即单独呆在一个角落里了。我问为什么奥德姆将军和其他人对我们报道佩尔顿及其已出卖给苏联的“神铃”行动如此紧张。

他双手捧着饮料杯说道：“如果你刊登那篇报道，伴随它的可能而且就会产生舆论，因此我们不能允许那样做。我让比尔·奥德姆处理它是因为他对它了解得更多些。”

舆论?

凯西没有回答，未指明“它”是指窃听水下电缆通讯还是指靠近苏联海岸的潜艇活动，或许他指的是两者。

周末后，我告诉布雷德利凯西的断言是那篇报道的问题在于“舆论”。布雷德利清楚地表示他对我们仍在忙于那篇报道很不高兴。当天晚上，我给布雷德利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我认为停止查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布雷德利带我去吃午饭。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曾多次谈到过中央情报局，“它现在确实失去了控制，不是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接着说，许多情报人员和其他使用情报的人都心神不安，特别是凯西。美国不仅进行秘密行动而且进行秘密收集情报行动，因而他们提出是否存在美国行动太多的可能。有人说，这么多行动的结果等于宣布对苏联进行某种形式的情报战。所有的“被动”收集情报工作——这儿放一个室内窃听器，那儿是卫星侦察，到处是窃听装置，还有某海域的一艘潜艇，总起来其意义比各部分的单纯相加之和要大得多。美国在技术上领先于苏联，苏联害怕美国的技术，所有这些加上秘密行动，整个形成了一场情报战争。

这一报道的社会意义何在?布雷德利想知道这一点。他说，我们不能仅仅公布某项内情，披露某项秘密。

我表示赞同他的观点。我说，在对苏联所进行的潜艇行动的早期，美国计划派一艘核潜艇不仅进入苏联领海，而且沿一条河而上。

上帝啊，布雷德利说道。

我说，关于这件事是否发生过，我们得到的情报是矛盾的，或许从未发生，或许发生了。设想一下我们的一艘潜艇在苏联的一条河的上游或在一个港口被抓获，这使得1968年的普韦布洛号事件黯然失色。当年美国的间谍船普韦布洛号是在离北朝鲜海岸13

英里处被抓获的。

我说，奥德姆的论点相当于“相信我”，或者也许是“你怎么敢”。他们几乎是在质问我们“你们站在什么立场上？”

很明显国家安全局正对苏联以外的世界范围的水下电缆进行窃听，因为美国已卷入多数大电缆网之中——从大西洋的到太平洋的。这也许有意义，也许没有。另外一个更突出的例子是，严肃的人们对美国容忍苏联从遍布华盛顿的微波塔上窃听电话表示忧虑，这是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大规模侵犯。把这些拼凑到一起来看，人们默默地理解到作为回报，美国也可以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周围进行电子收集情报行动。

布雷德利仍不同意发表，他说，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资格确切地、绝对地说我们发表这篇报道不会超过国家安全的合法界限。

我们一致同意由布雷德利与这一报道的提供消息者之一谈谈。他是一名前高级情报官员，他所知道的事情与现政府里的任何人都一样地多。他属于那种能确切地说明有关“神铃”的报道不会告诉苏联人任何新东西的人。

4 月的大部分时间耗于报道轰炸利比亚事件上了，直到月底布雷德利才就“神铃”行动与那位前情报官员会面。这位官员使他相信了现在所起草的有关“神铃”的报道不会告诉苏联人任何他们不知道的事情。4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布雷德利指示我打电话给白宫，通知他们说该报道将于两天后发表。

“我们一定要阻止它。”那位白宫安全发言人说，他再次争辩说这篇报道“总起来看”会告诉苏联人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发表前应给奥德姆将军打个电话。他说：“奥德姆将军觉得他得到了你们的承诺，但实际上没有。”

第二天上午，从长岛度假回来的布雷德利接到奥德姆将军打来的电话。奥德姆说他坚决反对发表这篇报道。

布雷德利说："我已同与你职位相称并与你一样忠诚于美国的人们谈过了，他们认为报道中没有苏联人不知道的内容。"

奥德姆承认这篇报道不会告诉苏联人任何新情况，他真正担心的是其它不知道美国这一情报能力的国家会知道它。

布雷德利说，在这场论战中，放弃有关苏联的争论而提出一个新的论点似乎太晚了。

奥德姆劝布雷德利在他们交谈之后再做决定。

布雷德利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他不想闯红灯。

同时，在诸多美国情报机构中的一些人试图劝奥德姆告诉布雷德利真正使他烦恼的原因，奥德姆拒绝这样做。他不打算开始彻底挑明这件事，这是在与魔鬼打交道。

5 月 1 日，布雷德利和奥德姆共进早餐。奥德姆比平时显得更冷静，他坚持说反对发表这篇报道是因为其它的国家会知道美国具有这种能力，但他不想举例。布雷德利争辩说，如果有什么具体的原因，他需要知道。

奥德姆说他感到烦恼，因为正在逐渐泄露的绝密情报资料太多了。1950 年的一则法律规定对任何"公布"有关通讯情报机密的人将处以刑罚，奥德姆和其他人正在研究引用这则法律的可能性。

布雷德利说他仍打算发表那篇报道。

是否到此为止呢？奥德姆问道。那是关于"神铃"行动的最后报道吗？

布雷德利说他不能肯定，但补充说他不打算把他的一生贡献于这一件事。《华盛顿邮报》不会在这儿报道一个细节，在那儿报道另一点内情。离开时布雷德利对奥德姆就在餐桌上握紧了拳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晚些时候，布雷德利说现在不会再中止了，"我已经跨过了障碍"。我们拿出草稿又精心整理了一遍，准备在星期天发表。

即使那种认为我们应该考虑这篇报道对戈尔巴乔夫的潜在影响的论点有价值的话，现在似乎也到了发表这篇报道的有利时机了，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考虑更重要的事——苏联刚刚发生了严重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

第二天，5月2日，星期五，凯西拜访了司法部刑事处处长戴维·詹森，并建议司法部根据1950年的法律考虑提出刑事指控。他列举了最近发表过由截获通讯而来的情报的五家新闻机构的名字，它们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他引用《华盛顿邮报》的正是那则我写的，有关已通过截获利比亚的电文，表明卡扎菲应对西柏林迪斯科舞厅爆炸事件负责的报道。

詹森对起诉记者的想法很冷淡，他想避免一项事关《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冲突。

凯西说："你必须对这些杂种强硬一点。"他想要詹森考虑诉诸法庭，以获得一项命令阻止《华盛顿邮报》发表有关"神铃"的报道。詹森认为那样也不会发挥作用。政府在最高法院的一项涉及五角大楼文件是否优先约束的案件中已败北。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凯西在汽车里给布雷德利打电话。他说，让我们谈一谈，并建议在大学俱乐部会面，该俱乐部恰在《华盛顿邮报》后面，与苏联大使馆相邻。

布雷德利和道尼在下午4时到达那里，并交给凯西一份报道草稿的副本。他慢慢地读着，最后抬起头来并把它掷到一边。

凯西说："你们发表这一报道肯定会危及国家安全。"他呷了一口加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我不是在威胁你，但你们应知道，如果你们发表这一报道，我将建议对你们起诉。"这当然不仅是《邮报》的问题，"我们已掌握了五则确定无疑触犯法律的报道。"

他解释说他是指《华盛顿邮报》和其它四家出版物。他干巴巴地补充说他刚从司法部过来，那里根据他的建议正在研究这五

起案件。他暗示大车已经启动离站了。

布雷德利问到是否根据1950年的法律？

凯西说："哦、哦，我不在从事任何法律工作，你知道我所谈的是什么。"

布雷德利和道尼试图得到一些具体的东西。问题到底在哪里？开始说是苏联人，然后又是甚至国家，现在呢？

凯西说："那么，将这一报道先搁一搁"，他将和总统通电话，他正在日本进行两国首脑经济会谈。总统将同布雷德利谈谈。

"有那么重要吗？"布雷德利问到。

是的，凯西说，并提出了最后的论点：如果这篇报道发表，可以想象许多人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他并没有夸大。在出门时，凯西对道尼说："你和奥利相处如何？"道尼曾同意，提到正在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那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时，可以公开诺思的名字及身份，而诺思在给道尼的一封信中反对这样做。凯西对这件事完全知晓。

由于凯西使这一件事突然升级，布雷德利和道尼同意不在星期天发表这一报道。回到办公室后，两位编辑同律师们进行紧急磋商。没有人曾真正注意过1950年的法律，但该法律明确指出任何人"发表"通讯情报消息应受到起诉。律师们觉得这一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值得怀疑，但没有人能肯定。他们敦促要谨慎从事。

泰勒和我确信这一报道不可能构成损害，它已被"洗"成了一块破布。更为可能的是凯西在吓唬人，他想阻止新闻媒介写此类报道。泰勒总结说："这篇报道造成适于进一步推论的氛围，这正是他们想避免的。"

布雷德利决定就这一报道是否违法进行分开探讨。5月6日，星期二，他把与凯西会面的记录交给《华盛顿邮报》记者乔治·拉德。如果狗不叫能告诉你什么事，那么报道不发表也一定应说明理由。

下午5时45分，布雷德利收到凯西的一个电话。这位局长说他刚接到《纽约时报》总编辑亨利·格伦瓦尔德的一个电话，《纽约时报》因一篇报道将被起诉。他问布雷德利是否知道这件事。

布雷德利回答，是的，我知道。他已安排一位记者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写一篇有关他们谈话的报道。

凯西说："我认为我们当时在进行一次私人谈话，是不是？"

布雷德利说，当时是你要求会面，而且并没有定下任何规定。布雷德利认为凯西发表了一则对《华盛顿邮报》和其它出版物生死攸关的声明，《华盛顿邮报》必须报道它，它是新闻。

这结束了他们的谈话。但几分钟后，凯西又打电话回来问下步将是什么，人们将会读到我的那番讲话吗？

是的，布雷德利说。

凯西问："我想我们应多谈谈，可以吗？"

布雷德利问，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凯西问道："何时见报？"

布雷德利说，明天上午。

"有我的名字吗？"

那当然。

凯西说，没有一个记者打电话通知过他。布雷德利说，一个记者今天一早就给你的手下人打了电话。

凯西说："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在你身上发生过吗？"

布雷德利说："当你打电话时从未发生过。你想谈一谈我们手下的伙计吗？"

不。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头版报道《美国考虑对新闻界泄密进行起诉》。它列举了凯西名单上的五家新闻机构的名字，并说在另一项起诉威胁之下《邮报》扣住了"另一篇它已准备发表的涉及美国收集情报能力的报道。"

过了一天，凯西与《邮报》的律师埃德华·威廉共进早餐。后来威廉向我们透露了早餐的情况。政府可起诉，但威廉说他怀疑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对他们的怯懦我有很多体验。但现在《邮报》和凯西都被逼得走投无路，拼力相搏，威廉说再等等看。

星期五，《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报道说："据官员们说，中央情报局在政府内部辩论说《华盛顿邮报》要发表的一篇报道是有害的，因它将证实并说明苏联已从佩尔顿先生那里得到的情报。他们指出现在苏联当局并不能完全肯定他们从佩尔顿那里得知的情报……"

对我们来说，这似乎是说那篇报道将给克格勃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用以审查佩尔顿在维也纳的马拉松式汇报会上所讲的所有情报。

第二天，5月10日，星期六，华盛顿邮报公司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接到总统打来的一个电话。

她祝贺他在美日首脑会谈中取得的成功。

里根说他与凯西谈过，有关佩尔顿的报道将会造成损害。总统说这是件很重要的事，并暗示无价之秘密正处于危险之中。他说在过去一年里这一好的收集情报系统已阻止了125起恐怖主义灾难，这个数字总统曾在最近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用过，但那一次留下的印象却把它与"神铃"联系到了一起。

格雷厄姆告诉总统，布雷德利一直很谨慎，她作为股东不能说不允许发表。她的儿子，《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康纳德·格雷厄姆也不能说这话，也从未说过此类的话，最好让布雷德利自己作这个决定。

里根似乎明白了，他道了再见。

格雷厄姆告诉布雷德利，她对总统的论点印象很深，她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写这篇报道。如果情报机构试图推翻政府，或许我们应发表但怎么会嫌美国收集的情报太多了，窃听太多了呢？苏

联人对我们也这样干。即使我们在许多技术上领先，难道还要我们等苏联人赶上不成？

布雷德利解释说，我们的报道是有关一次称为“神铃”行动的，它已在五年前被佩尔顿泄露出去了，并未涉及其它任何事。格雷厄姆说总统非常担忧，她希望布雷德利要加倍小心。

凯西觉得他有许多牌——罗纳德·里根和凯瑟琳·格雷厄姆。

5月19日上午，当即将开始选择佩尔顿间谍案的陪审团时，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詹姆斯·波尔克在《今天》节目中说：“很明显佩尔顿泄露了国家安全局最秘密的计划之一——一项代号为“神铃”的计划，据信这是一项由美国潜艇在苏联港口内实施的绝密的水下窃听行动。”

布雷德利给凯西打电话，凯西未听到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布雷德利问道：“你一直告诫我们不要发表这篇报道，你现在要怎么样？”当天下午凯西发表一份声明说他已将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提交司法部，有可能要予以起诉。

现在很清楚我们必须发表我们的报道，即使是以简短的形式。报道标题为《窃听系统的背叛，佩尔顿所泄露的高技术装置被留给了苏联人》。这一报道于5月21日发表。它说佩尔顿已泄露了一项无法估价的、长期经营的及非常成功的美国行动。该行动是应用先进的技术对苏联通讯进行窃听。它说，这一行动使用潜艇，而其窃听装置已落到了苏联人手里。

凯西发表一份措词温和的声明，说正在对我们的报道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它起诉。

佩尔顿的审判于第二天开始，泰勒和我开始将有关“神铃”行动的细节越来越多地投入到一系列报道中。审判第一天我们证实“神铃”行动的地点是在鄂霍次克海。

五天后，凯西和奥德姆联合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它“警告推

测和报道超出法庭实际上所发表的消息，这些推测和另外的事实不是经官方允许的披露，并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害。”这很快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政府对“推测”发动一场“战争”的想法实在是太荒唐了。

为降低不满的呼声，凯西于5月29日对合众社说：“我认为新闻界对这件事肯定是非常歇斯底里的，居然说我们想撕毁《宪法第一修正案》并完全毁掉新闻自由。我们并没想这样做。”至于他警告“推测”，凯西说：“如果我能再说一遍的话，我可能不会用那个字眼，我可能会用‘推断’。”

凯西给布雷德利打电话，这几乎是今年以来他们的第20次谈话。

这位局长说：“我不想进行一次亵渎比赛。”

二十四

尽管公开看来利比亚是里根政府当年冬、春两季的中心，但在幕后主宰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外交日程表的是伊朗。

在华盛顿郊区家中，麦克法兰坐在书桌旁。现在已是3月10日晚上9时多了，他打开与白宫联网的计算机并输入密码以便能收到其秘密电文。光斑闪亮着，显示有一份称作"一个教授"的短笺正在等候着，可能是奥利来的。他按下按键并谈到："应你的老朋友格班（格班尼法尔）的请求，星期六我与他在巴黎会面。他开始发表了长篇讲话、谈到我们如何想摆脱他，他对这一过程如何重要以及只要我们能给锅里加配料添味——例如更多的武器，他如何能传递信息以促进人质获释。"

"鲍勃·盖茨已收集了有关苏联威胁的许多情报……。"

诺思还要求提出个人的建议：现在是否是他该回到海军陆战队的时间？

麦克法兰很想念白宫，局外人的日子并不是人们所吹捧的那么好，他甚至现在仅离任三个月就渴望能再充当某种角色。他开始通过计算机给奥利回电。是的，两人应探讨诺思的未来。麦克法兰在计算机上打道："坦率地说，我预测国会对你的压力将在夏季变得很大，因而我有过你最好现在就离开白宫的想法。同时，将不会有人能完成你所做的全部（甚至一小部分）工作，而一旦它不能完成，实际上过去五年所有的投资都会被浪费掉。

“这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如何，即诺思在5月离开白宫30天……(诺思像麦克马洪那样加入智囊班子)……麦克马洪、诺思继续进行伊朗行动并建立其它这里或那里需要的秘密潜能。”

诺思意识到伊朗行动决没有完结。他不想从他已极力扩展并建立了秘密通讯系统的强有力的基地上退出。今年年初，国家安全局给了他15台KL－43型破译密码装置，这使得他可以与那些帮助他进行反恐怖及营救人质活动的人们相互间收发密电。他也将它用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事业。一台给了斯考德将军，另一台给了哥斯达黎加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站长，他正以化名托马斯·卡斯蒂罗在那里活动并对尼反政府武器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为了表示总统的支持，3月底里根在总统办公室简短会见了哥斯达黎加公安部长、波因德克斯特、卡斯蒂罗及诺思并一起合影留念。

到4月，诺思已完全将伊朗行动与尼反政府武装行动结合到了一体。4月7日他告诉麦克马洪：“应波因德克斯特的请求，我已为老板准备了一份文件，上面提出了我们对下一次向伊朗运送武器所作的安排。”诺思的文件《释放在贝鲁特的美国人质》中说，预计伊朗所付的武器款项15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将可以转给尼反政府武装。波因德克斯特已批准了这一资金转移。政府和凯西再次试图让国会批准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和直接军事援助，但进展缓慢，还是通常的那种立法混乱状态。“……其中1200万美元将被用于购买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所急需的补给品……来渡过现在到国会批准给予杀伤性物资援助之间的这一时期……可以转移。”

在“建议”里，诺思写道：“这是总统批准的。”

4月8日，情报监督委员会对波因德克斯特的行动进行了法律分析。该委员会是在70年代情报界滥用职权后成立的，它由总

统指定人员组成秘密审查小组来监督行动是否得体及合法。该法律分析说，按照可对尼反政府武装提供“通讯设备”和“情报指导”的总统法令，任何美国机构都可以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基本的军事训练”。唯一的限制是这一训练不能包括“参与计划或执行”军事行动。

大量有关“空投”弹药的文电从斯考德将军那里通过秘密通讯网涌向诺思。4月12日，中央情报局哥斯达黎加情报站站长卡斯蒂罗，向诺思报告了向尼反政府武装一次成功的“空投”及他在未来六周的计划。“我的目标是建立一支2500人的队伍，能够袭击尼加拉瓜西北部并与其它部队会合……组成牢固的南方武装。同样，设想在大西洋海岸建立令人生畏的抵抗力量，并在海上或通过海上进行补给。我意识到这是个过于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在你的协助下，相信我们会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

诺思谋求麦克马洪的支持，并通过计算机通讯渠道提出了要求：“我们正想寻求某种途径得到10个‘吹管’式导弹发射架和20枚导弹……迪克·斯考德已付了10%用于运输。”已拿到了至关重要的最终使用者证书。

麦克法兰回答说：“你能要中央情报局查一下英国人将这些导弹卖给了哪些国家了吗？我必须至少与其中之一进行接触。你们对物资运力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我能帮什么忙吗？如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你们需要一些迫击炮或其它火炮——我对之有怀疑的，请告诉我。”

在老行政办公大楼内从302房间拐角至345房间用了不到一分钟，诺思中校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经过这一短途跋涉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向凯西的办公室。凯西不是个老板而是个性情相投的人，这位局长逐渐变成了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一个挚友和顾问。他成为一个向导，几乎是诺思的指挥官。在1984年，当这位中校为尼

反政府武装秘密安排补给行动时，几乎是凯西制定计划，指导诺思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以外的平民领导的一个私人实体，它将使一项秘密行动披上非官方的外表，并尽可能地离中央情报局远一些。凯西推荐斯考德将军承担这一任务，并向诺思说明，他如何建立一个"行动帐户"并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用来作零用钱、旅行及马那瓜的特殊反桑地诺的行动的费用。

当诺思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危险并越来越机密时，凯西是少数知情者之一。诺思发现凯西的建议很有价值，他知道如何完成任务并毫不犹豫。他警告诺思，通过公开电话线路向中美洲打电话可能会受到克格勃在古巴的监听站的窃听。因此诺思从国家安全局那里得到了 KL—43 密码装置。凯西提供了尼反政府武装武器掮客的最新情报，并建议抛掉其中两人，因为他们有可疑的行为和联系，并怀疑其中一人向苏联集团转移技术。

诺思向这位局长说明，他和以色列人已设想出一个转移资金计划，即将向伊朗出售武器所得的利润转移到尼反政府武装那里。凯西很敏感，立刻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义。伊朗以前想向桑地诺政权卖武器，并在几年时间里向他们提供了约 1 亿美元的石油贷款。让阿亚图拉来资助尼反政府武装是个战略大胜利，是一个大得无法想象的"讽刺"：让一个敌人来资助一个朋友。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把这称为"最大的秘密行动"。

诺思的活动越来越受到限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用于处理情报文件的最机密"IV 系统"渠道被认为是不安全的，他的文件"不分类"，他与"系统外"文件打交道。但他可以自由与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交谈；这位局长既是伊朗行动也是尼反政府武装补给行动的教父。

凯西警告诺思，几乎可以肯定格班尼法尔是一个以色列间谍。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加倍小心，不是说他们应停用他，只是要意识到他们打交道的是什么人。当看起来诺思似乎要作一次初步的秘

密之行去德黑兰时，凯西告诉他，他可能自己被扣为人质。他已做好了受酷刑折磨的准备。凯西说，只有一种方法来对付酷刑，诺思必须想方设法保住生命。

很快似乎诺思的整个生活都“断了线”，只有少数几人知道内情。甚至于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也蒙在鼓里。诺思是可以否认的一环，当凯西说必须有人充当这一角色时，当这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行动暴露时接受这一冲击。诺思回答说他知道他的职责，他将用胸膛来挡住射来的箭。

在诺思看来，凯西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物。这位局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会在一次空中旅行中读完一本书，他似乎知道完成过重大事业的每一个人。诺思知道凯西，是对世界上许多反共抵抗运动支持活动的幕后推动力量，他对如何根据美国的外交利益重新定形世界有着全球性的眼光，他是个善于构思，很有思想的人。

而且，诺思认为凯西是在政府中最有远见的人。这位局长很有说服力地谈到建立一个独立、单一和财务自理的经济实体，这样可以避开国会及其相应机构而独立行动，它将真正秘密地独立行动或与其它外国友好情报机构联合行动，很明显他想到了沙特和以色列。它将重新建立起合理的秘密行动的可否认性。从资本主义的优良传统来看，它将成一个税收生产者，凯西称它为“一次综合性的秘密行动”。

诺思手头不仅有赎回或营救人质行动，还有反恐怖及其它行动，因而他给某些计划以代号 TH－1、TH－2、TH－3。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凯西和诺思清楚，他们必须具备立即投入行动的能力。正如凯西所说的：“你需要一些一旦通知就可复活并使用的东西。”

波因德克斯特很清楚诺思的全面出击行动，因而在 5 月 15 日

给他发了一份秘密计算机电文，题目是“警惕”。他警告说：“恐怕你已使自己的行动角色过于公开了。从现在起，我希望你不要同其他任何人谈你的行动角色，包括凯西在内，但我除外。事实上，你应悄悄放出烟幕，即我一直坚持让你停止这类行动。”

诺思向波因德克斯特报告说，他已有600多万美元可立即给予尼反政府武装。他说：“这减少了向第三国请求帮助的需求，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少让中央情报局重新负责这一项目的迫切需要。”

“除非我们这么干，否则我们在试图进行这一项目时，将冒着愈来愈大的风险，并伴随着在身体和政治上背上沉重的包袱。我不是在诉苦，而且你知道我热爱这一工作，但我们必须把其中某些事交给中央情报局去干，那样我可以在晚上多睡二至三个小时。”他提到很快会有更多、更显而易见的资金，这将肯定会激怒国会反对尼反政府武装的民主党人们。

“虽然我丝毫不介意他们会对我说什么，但它可能会造成总统和你的政治困境。

“很明显，总统清楚他为什么要选择性地会见几个人并向他们‘支持中美洲民主化’表示感谢。”

几天后，诺思向波因德克斯特建议，举行一次不发表文件的秘密会议，并由总统、麦克法兰、凯西、舒尔茨和温伯格参加。麦克法兰和他即将携带武器前往德黑兰。5月19日，波因德克斯特回答说：“我不想与里根、舒尔茨和温伯格开会讨论此事。”

凯西正受到来访的斯考德将军的压力，这位将军说：“局长先生，我们年龄都很大了，不必浪费时间兜圈子了。我来这里是来对你的机构提出不满的……现在我得不到任何支持，我需要情报向导。无论你能给予我什么支持，我想……但恰恰相反，我们所得到的是对我们的组织性质的一大串疑问。它是如何组成的？谁是业主？谁有股份？斯考德在干什么？恰恰像是在审查我们的组

织……我不需要被审查，我需要支持。”

凯西向他保证要对此事进行调查。凯西去老行政办公大楼他的办公室，并打电话要诺思过来。诺思与斯考德一起来了。

凯西说：“很高兴再见到你，将军。”

诺思通知他说，向尼反政府武装的捐赠已耗尽，又一次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凯西说，政府中的某些人，对在夏季从国会获得对尼反政府武装的新的直接军事资助持怀疑态度，但他承认他也不赞成并且很悲观。

诺思让斯考德作一个估价。

斯考德说，他缺乏资金，并需要昂贵、先进的导航系统和气象雷达。

凯西问：“你需要多少钱？”

斯考德估计他们还需要1000万美元。

“1000万美元，”凯西重复道，“1000万美元。”沙特人可以提供这笔款项，“但我无法接触他们。”现行法律说，国务院只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为尼反政府武装请求帮助。凯西看着将军说：“但是你可以接触他们。”

“不过，局长先生，我不是美国政府的官员，我认为这些人不会对一个平民个人发出的请求感兴趣的，我觉得那样做太愚蠢了。”

凯西打断他说：“既然如此，最好有人立即着手此事，因为这是个非常危急的情况。”

凯西说舒尔茨可以进行这一接触，并且他将同国务卿谈及此事。

国务院未去找沙特人。在舒尔茨和文莱国苏丹举行三小时会谈后，从这位国王那里得到了一笔1000万美元的秘密捐款。文莱位于太平洋加里曼丹岛上，是一个富有的石油小国。在前一年，中

央情报局向苏丹提供了保护国家元首的勤务工作。

诺思向苏丹提供了一家瑞士银行的帐户号码，以便于他将这笔资金存于该帐户下。他的秘书福恩·霍尔把两个数字位置颠倒了，结果这1000万美元进了错误的帐户，尼反政府武装未收到这笔钱。

5月下旬，麦克法兰、诺思和其他几个人带着武器秘密前往德黑兰。成员中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德黑兰情报站站长并会说法西语的乔治·卡维。此行目的是希望能使所有人质获释。卡维给凯西的一份报告说，格班尼法尔曾建议用销售武器所得的额外款项支援尼反政府武装和阿富汗抵抗力量。

麦克法兰在7月10日给波因德克斯特的信中表达了对诺思的担忧："现在看来越来越清楚，民主党左翼人士正在为报选举年之仇而追踪诺思，而且最终他们将抓住他。"麦克法兰建议送诺思去百色达海军医疗中心进行一次是否丧失战斗力的检查，从而使他可以从海军陆战队退役。"这将对办公室工作和尼反政府武装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但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够找到一条途径来继续进行这些事业。"

但在反对桑地诺政权问题上出现了微妙的转变。7月25日众议院以221票对209票通过了参议院已通过的，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1亿美元援助的议案。中央情报局将在10月份援助开始后重新投入这一事业。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整个夏季都在询问诺思，他否认他曾向尼反政府武装提出过军事建议，或他知道尼反政府武装的具体军事行动。在波因德克斯特收到一份诺思否认的说明材料时，他传给诺思一份"干得好"的计算机电文。

现在美国最终决定向尼反政府武装提供一笔新的1亿美元的援助，凯西意识到他很快将停业了。他把他的地下运输网络称为

“民主工程”并在7月24日给波因德克斯特写道，现在到了中央情报局全部购下这些财产产权的时候了。诺思估计这些财产的总价值超过了450万美元，它包括“六架飞机、仓库、补给品、维修设施、轮船、小船、租借的房屋、汽车、军械、弹药、通讯设备及一条6520英尺长的跑道。”“所有这些财产——包括工作人员，是由与美国毫无关联的外国公司所有付钱的……如果由于中央情报局不愿买下这些财产使自己受到‘玷污’，然后不久又花费800万至1000万美元来取代它，使这些财产又不得不简单地销声匿迹，那将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波因德克斯特同意这些财产必须逐步转入，并指示诺思就此事与凯西谈谈，但凯西希望中央情报局对此事保持疏远。

格班尼法尔得知，他将被逐出伊朗武器交易，并由美国所发展的通过有权势的伊朗议会议长拉夫桑贾尼的侄子而开辟的渠道所代替。因此他极力敦促他在伊朗的关系加倍努力。于是，7月26日被作为人质关押达18个月之久的美国人劳伦斯·詹科神父获释。凯西写了一份绝密备忘录送给波因德克斯特：“不容置疑，这次通过格班尼法尔的伊朗渠道经过一系列失败后，终于发挥了作用……扼要地说，根据我所得到的情报，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我相信这将是继续进行的唯一途径，尽管在伊朗各派之间处于微妙的平衡之中。”

凯西和舒尔茨决定结束在利比亚已开始的行动。中央情报局广泛传阅有关卡扎菲使用的七处主要住所的情报，或许是希望它能泄露给这位上校，并提醒他他正被监视着。一个秘密情报员报告说，卡扎菲在与也门官员们会见时行为是那么希奇古怪以至于他可能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凯西觉得他们使卡扎菲即将完蛋了，美国必须继续施加压力并刺激他，使他失去自信心，产生一种离心力，并使其政权分崩离析而他也随之倒台。五角大楼可以派飞

机沿利比亚海岸线飞行并打开音障发出声震。凯西说："羞辱他。"9月1日将是卡扎菲革命胜利17周年。像正常一样，卡扎菲将发表讲话。猜测那样做会吓得他不敢露面。卡扎菲已将其总部从海岸边向内陆移了几百英里，离开易于遭受美国轰炸机轰炸的地方。

凯西派他的负责情报的助理局长理查德·科尔和汤姆·特威登去白宫解释中央情报局如何来对卡扎菲施加心理压力。特威登是一位在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工作了25年的老兵，并曾在60年代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市工作过，他说中央情报局完全可以在海外出版物中散播错误的报道，使卡扎菲气馁。致命的一击即将来临。

现在已是夏季，可做的事情不多，卡扎菲可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一个胜利。尽管没有什么危机，8月7日下午，在白宫危机指挥室举行了一次作为总统非正式顾问团的危机预计小组会议。国务院送来一份七页的绝密备忘录，分送来自白宫、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11名与会者。

国务院要求"严密协调外交、军事、秘密和公开行动以促进利比亚人推翻卡扎菲……让一连串真正的和产生错觉的事件搅在一起。"

"可供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我们近期战略的目的应是继续使卡扎菲成为偏执狂从而使他：心事重重，失去心理平衡。"

认为利比亚军队和其它成员正在阴谋反对他（可能得到的苏联的帮助）。出于此，他可能会增加对军队的压力，从而可能引发政变或暗杀行动。

"尽管我们应在卡扎菲的脑子里增大流亡组织的形象，但与他们一起工作不大可能导致这一政权的垮台。因而，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直接秘密行动，这将要求增加（国防部）支持，将需要（国防部）公开行动，为那些美国计划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流言提供证据。"

国务院建议派一名特使去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通报"现在增

加对卡扎菲压力的必要性——但不涉及我们战略的所有调节……这些对话也将给美国将再次袭击利比亚的流言添油加醋。”

这一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基本政策应建立在下述基础之上：(1) 利比亚三派相互争斗以争取后卡扎菲年代的控制权。(2) 恐怖主义复活的威胁，利比亚对邻国所构成的威胁及继续威慑卡扎菲的必要性。(3) 卡扎菲可能的继任者。(4) 在卡扎菲统治下备受折磨的利比亚人。”

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本月晚些时候对乍得的访问，提供了一个传递给卡扎菲错误信息的机会，即美国与法国正在制定一个称为‘乍得方案’的应急计划。”另一位国防部官员对突尼斯和其它利比亚邻国将提供传递假信息的“同样机会。”

这一备忘录建议利用信号情报的“欺骗”功能使其看上去像是美国飞机正在飞过卡扎菲的死亡线。美国发表一份意欲启动航母编队的海上通告，然而按兵不动。

“外国新闻媒介工作安排。应写文章表明以下几点：利比亚军队不满；利比亚军队中存在地下运动；正在计划进行反对利比亚的联合行动；苏联人策划发动政变；应向利比亚情报机构提供利比亚军内不满分子与苏联官员在巴黎、巴格达等地会面的照片；美国计划在利比亚高层官员协助下发动政变。

“欺骗行动使用秘密电台，让利比亚发现一些秘密仓库，使用美国潜艇或飞机运送或空投一些设备，如橡皮筏等进入利比亚内地或海滩，使它看上去像是正在计划或秘密进行一次政变。”

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军事办公室主任哈佛·泰彻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建议政府“羞辱”法国使其能参加一些行动，从而把利比亚军队逐出乍得。他建议白宫或许不得不绕过密特朗总统领导的文人政府而依靠“军队对军队渠道，并且不通过今年早些时候已失败的政治渠道……假如某些将军表示他们渴望与我们一起反对卡扎菲，我们或许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向他们的文人政府推销

这一计划。”

8 月 7 日，10 名总统非正式顾问团的官员在白宫危机指挥室开会，考虑这些文件并提出一项计划。陆军准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个人代表约翰·莫莱林无法相信他们在考虑一项伪装的政策。他问道，如果这些文件泄露出去怎么办？

其他人反问道：“难道我们彼此间互不信任了吗？”

几天后，凯西收到波因德克斯特发来的一份绝密备忘录。这是波因德克斯特为即将召开的，总统也参加的有关利比亚问题的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所准备的。凯西谈到：“卡扎菲战无不胜的神话已经破产，他的威望极大地降低了，他对权力的掌握似乎是不稳定的。”

“……我们的行动应鼓励国内不满分子采取行动、通过使卡扎菲确信美国正在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增加他的恐慌……采取更多的秘密行动……还需要（国防部）公开的行动以给那些说美国想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的流言提供证据……进行单方面及联合（军事）演习以用来欺骗、拖垮及‘恐吓’利比亚国防力量……欺骗行动……对外国新闻媒介的安排应使新闻媒介的注意力集中于利比亚各派的内部争斗、与卡扎菲竞争权力。特别应提到卡扎菲的继任者们，利比亚社会的普遍困境及有关国外正计划采取新的行动反对卡扎菲的流言。

“……是一个吉祥的机会，促使在利比亚支持恐怖主义方面产生持久的变化，并有助于推翻卡扎菲。”

凯西喜欢这一备忘录。

波因德克斯特还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如下：

〔绝密〕

“大部分情报估价断定尽管 4 月 14 日空袭后局势紧张，而且卡扎菲自己感到震惊、沮丧和形象受损，但他仍牢牢地控制着利比亚。

“机会。各机构一致认为，一项进一步施加压力并孤立利比亚当局的美国政策，将造成明显的冲击，并刺激国内力量最终导致政权的转变。

“各机构还一致认为，卡扎菲的任何替代人选都将更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及国际秩序。

“在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上，您将会看到由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制定的一项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提出了一系列紧密协调的行动，包括秘密、外交、军事和公开行动。这一战略最关键的部分是它通过一项假情报计划将真正的和制造假象的行动混在一起。它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使卡扎菲认为在利比亚有很大的国内反对力量，他所信任的助手们是不忠诚的及美国将要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他。

“利比亚国内希望推翻他的力量将会更勇敢地采取行动……使他陷入混乱并增强那些想取代他的人的能量。

“尽管现在情报界认为卡扎菲暂时停止了支持恐怖主义，但他将很快变为一个更活跃的角色。”

8 月 14 日上午 11 时，里根与舒尔茨、温伯格、凯西、波因德克斯特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威廉·克劳一起开会。

波因德克斯特大肆吹捧了国防部，说 4 月 14 日的空袭技术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威慑了恐怖主义，在利比亚国内削弱了卡扎菲的力量，并有助于放大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但现在到了实施一项大规模假情报计划来巩固它的时候了。发动一系列的行动并最终导致卡扎菲的倒台。

克劳上将很明显感到不安，他要求发言。使用军队来执行一项心理学的“从旁飞过”行动是否合适？它是否能有效地表明有些重大的事情正在进行然后又放弃了？这一计划是否会降低 4 月 14 号令空袭的威慑效果，并使美国看上去又一次像纸老虎？

但车轮已在嘎嘎地响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已准备就绪,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相对来说不花钱的行动。总统感到很满意，里根注意到卡扎菲好出风头并穿奇装异服，他嘲弄说:“他那么喜欢打扮，为什么不邀请他到旧金山来呢?”

舒尔茨反问说:“我们为什么不赠他艾滋病。”

大家都笑了。里根点了点头，政策已制定完毕。

一个与会者后来说:“他们甚至同意一些很古怪的主意,”几乎采纳了每一个想得到的令卡扎菲窘困的方法，但这次会议未考虑采取恐怖主义或军事行动。

8月16日，总统收到等待他签署的一份两页的《国家安全决定指导》。它指出这一欺骗和假情报行动可在前一个有关利比亚的总统指令下进行。其目的是:“劝阻卡扎菲停止卷入恐怖主义;导致其领导权的改变;使苏联在利比亚获利降低到最低限度。”

里根签署了它，其分类是绝密的，代号是“伪幕”。

九天后,《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显著位置发表题为《美国和利比亚再次陷入冲突》的报道。该报道说卡扎菲正在阴谋策划新的恐怖主义，而美国正在准备一项新的空袭计划。乍得假情报机构被当成事实加以了报道。第二天波因德克斯特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公开表示接受，而且白宫发言人莱利·斯皮克斯称它为“官方的”。

其它新闻机构，包括《华盛顿邮报》，也盯牢了政府的假情报，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说一场对抗已经逼近。在其后几天里，政府官员们既证实又试图消除这些报道。

在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一些利比亚专家被惊呆了。政府正在将一条棒子插进卡扎菲的笼子中,将他置于世界事件的中心,目的恰恰是为了激怒他。虽然并没有一个将关于利比亚的假情报散布到美国新闻媒介的特别计划,但是白宫却把它泄露出去了,即使不是这样，这种情报也会自己溢出或“爆炸”。专家们对白宫没

能仔细考虑其后果感到非常吃惊。

很快就有报告说，卡扎菲的反应可能是向大肆宣传的有计划的美国的对抗行动发起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军事基地的一次袭击被秘密地挫败了。但是9月5日，四个人在卡拉奇机场向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射击，打死21人。一个持有利比亚护照的阿拉伯人萨尔曼·塔拉基，在巴基斯坦首都向当地利比亚人民办事处打电话，说他正在执行利比亚情报局的一项“特别任务”。他的电话被窃听了，后来他同四个劫机者一同被捕，受到了严密的审讯。

凯西总是乐于出席战略情报局老兵的任何聚会。9月19日，他在华盛顿“五月花”宾馆召开的一次老兵聚会上致词说：“幸存的战友们，”他这样称呼他们，“感谢上帝，我们都在这儿。”听众很少而且都是上了年纪的，海尔姆斯和考尔比都到会了，索菲娅在前排用心地听着长达一小时的演讲，示意坐在主席台的一个人让她的丈夫靠近麦克风讲话。凯西提出两个中心论点：他们的创始人多诺万将军认为“心理战和非常规战将是秘密战的先锋；并且二次大战期间战略情报局最有“破坏性”的问题是白宫的参谋人员。“任何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人都会给自己谋取一些特权。”

五天以后，我告诉凯西我们曾经看到一些绝密的备忘录，代号是“航向”和“伪幕”，内容是关于对卡扎菲的假情报宣传的。他狠狠地盯着我说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说完转身走了。

10月2日，我们就该备忘录发表一则长篇报道，标题为《卡扎菲——美国秘密欺骗计划的靶子，精心设计的宣传行动包括以事实形式出现在美国新闻媒介上的假情报》。

里根总统和波因德克斯特上午11时在白宫的家庭剧场会见了一些新闻专栏作者。总统说：“我怀疑那整篇报道的真实性，我上午读到它时非常吃惊。

“是的，经常有一些关于这种事以及情报内容的备忘录。因此

当我怀疑整篇报道的真实性时，我无法到处去否认它，他们将会得到某些东西的支持。

“我们不久将使卡扎菲先生每天晚上上床时都要想想我们可能会干什么。”

总统补充说：“我已做出结论，伍德沃德先生可能是一个幕后知情人。”

那天晚上舒尔茨另辟蹊径：“坦率地说，我认为针对卡扎非的小型心理战是完全正确的。”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们。

“如果我是一个仅代表自己的普通公民，读了那则报道，并且读到我的政府正在试图把一个对美国人施以恐怖行为并谋杀他们的人搞糊涂时，我会说：‘嘿，我希望那是真的。’

“如果有办法使卡扎非神经紧张，那我们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有本写得很好的关于二次大战的书，你们可能读过了。其书名引自于温斯顿·邱吉尔的一句话：‘在战时，真实性是如此的宝贵，必须用一个会撒谎的卫兵来精心保护它。’”

第二天《纽约时报》刊载了五篇有关假情报行动的文章。其中有三篇登在头版，并提出了关于政府可信性的问题。

诺思希望进行一次测谎器测验，以证明他并没有就利比亚的假情报行动泄露任何消息。在一条通过计算机发给波因德克斯特的信件中，他请求：“请允许我们就这次伍德沃德‘丑闻’进行测谎器测验，包括你和总统，我们需要找出干这事的人。”

10月4日，星期六，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阿尔顿·基尔把我叫到白宫解释说，没有向美国新闻媒介撒谎的用意和策略，没有官方的泄露，也没有进行报道的安排，而且美国国务院备忘录中所用的“暗杀”一词是“很不幸的措词”。但是他说，用这个词是由于不能排除利比亚国内其他人所搞的暗杀。

凯西有随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而来的更严重的麻烦。这个委员会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各种间谍案件的工作，并对这一间谍年作了深刻的事后分析。凯西有一份事后调查分析的绝密报告，委员会想叫这份报告解密，并公诸于众。报告是关于四个主要案子的。上面写道：对每个案子，美国情报机构常常是在几年以前就陷入了潜在的间谍活动中，并且那些最后被抓获的间谍其过去可疑行动本应早引起调查的。

·佩尔顿在国家安全局时的破产，以及他以前在空军时的一个纪律问题可能已引起他上司的警觉。并且有迹象表明他1979年离开国家安全局是被迫的。他曾几次到维也纳，他打到苏联大使馆的电话曾被联帮调查局窃听。最能引起警觉的是1982年，被海军所提出的绝密关于“神铃”行动报告。报告做出如下结论：苏联人发现了电缆窃听器是因为他们一定有个间谍。报告排除了巧合和侥幸的可能，并指出苏联人知道哪里去找，也知道找什么。这份报告以及任何有间谍的疑问都对参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进行了隐瞒。因为很清楚海军和国家安全局都不想回答问题，怕国会会削掉风险大的潜艇间谍活动的资金。

·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霍华德的无法接受的个人行为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莫斯科情报站站长的电文又被忽视了。该电文说情报员和行动被泄露的原因，只可能由于对方在我们阵营内有间谍。情报委员会采访了该站站长。他解释道，莫斯科是环境艰难，在那儿所有的人工或技术的行动都很冒风险，成败五五开。他曾经说，可能运气会很不好，就像在掷硬币时可能会连续10次出现“人头像”一面一样。对处于困境的人有补助金，但使馆人员还是害怕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由于间谍活动而被驱逐出境。对于秘密行动人员，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等被人咒骂“到监狱去”一样，那是一个职业上的污点。10年来的驱逐事件仍没有忘

记。

·乔纳森·杰伊·波拉德，一名海军调查局的文职情报分析人员，是一位恐怖分析专家。1985年由于指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当时他拿着一个装有秘密文件的手提箱。波拉德曾对包括局里的一位高级副局长在内的他偶遇而相识的人宣称，他在为摩萨德工作，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人提出质疑。以色列人打入美国的情报界的“出版物”如此之深，以至于他们提供给波拉德一份（美）国家情报特别报告的清单，上面都是最新的报告。波拉德曾经向以色列人宣称，他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海军的计算机，虽然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这是真的，但海军计算机里他所能接触的内容都应被认为完全泄露了。

·海军人员约翰·沃克和杰丽·惠特沃斯的间谍活动，就其对美国所造成的损害来说，大概等同于佩尔顿。作为主要的高级无线电技师，惠特沃斯在1976至1985年间，将每年二至四次，每次25到50卷米诺克斯胶卷交给苏联人，因此获得30万美元的酬金。惠特沃斯曾一度租用过一辆白色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叶尔钦科说，克格勃认为沃克和惠特沃斯行动是克格勃历史上最重要的行动。主持这个行动的克格勃官员得到通报奖励，其中一个赢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另外两个得到了垂涎已久的红旗嘉奖令。叶尔钦科说，此行动所得的情报在战时对美国将是“毁灭性的”，在发生冲突时将对苏联赢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惠特沃斯曾是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的登记出版物的官员，负责几乎所有的最敏感的密码文件，包括维修手册，线路图和每天设置在密码机器上的“钥匙”。他的间谍活动使苏联人能读到一整年的“企业”号的往来作战文电。苏联人已有能力译解了100多万条电文并研究了美国其它军事和情报机构所用的先进的密码设备。

·追溯到70年代后期，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艾萨克·基德曾经对苏联人潜艇的行动引起警觉，他们对美军演习所做出的

反应好像他们正在读往来文电。基德命令他的情报军官们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断定有泄密事件发生，泄密者可能是一个对密码材料有广泛接触的无线电技师。国家安全局研究了此报告，但是没有跟踪，直到五年以后的1985年，沃克和惠特沃斯才暴露。当时是沃克的妻子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线索。

情报委员会报告详细叙述了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的安全问题。在打字机里曾发现了窃听器，美国新大使馆的大楼装满了各种能够想象得出的窃听装置。几乎所有传向莫斯科的参考文电都被删除了，因为凯西不想让苏联人对美国人知道什么有丝毫的了解。报告的其余部分解密了，但实际上将所有细节都删掉了。

凯西仍不满意，他寄了一封信给参议员杜伦伯格。信中说他同意报告中没有加密级的内容，但是报告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加密。两人之间展开了舌战，对于霍华德和佩尔顿案的引用减到了两个短句，概述了一下公开记录中的内容。凯西仍有抵触，想知道此报告为什么一定要公诸于众。杜伦伯格说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凯西想使他的预算在参议院中通过，他最好将这一解密的文件公诸于世。最后于1986年10月文件公诸于世了，但是这份题为《迎接间谍活动的挑战：对美国反间谍和安全计划的回顾》，长达156页的文件，在碰到任何敏感问题时都仅涉及一般原则，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凯西仍然决心在伊朗取得某些突破，这不仅包括出售武器，以打开通向霍梅尼的大门，使苏联丧失其未遭挑战的影响，甚至争取美国人质获释，而且中央情报局有一些计划已久的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动，以支持一次罢黜霍梅尼及并使伊拉克人战胜伊朗的行动。

从1982年以来，中央情报局一直以每月10万美元支持一个主要的反霍梅尼的伊朗流亡人士运动，即以巴黎为基地的伊朗解

放阵线。凯西并没有期望这一组织能发动一场政变，但与他们的接触确实提供了一些肤浅的情报。

另外一项每月 2 万到 3 万美元的资金用来支持“解放广播电台”，它在埃及每天向伊朗播送四小时的反霍梅尼节目。

两个月以前即 8 月份，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和巴格达之间建立了一条直接的绝密线路以更好更快地从美国卫星向伊拉克提供情报。凯西曾会见一些伊拉克高层人士，以确认新渠道工作正常并鼓励向伊朗实施更多的进攻，尤其是对于经济目标。8 月中旬伊拉克对西里岛上的伊朗油库实施了一次突然的轰炸，这个油库以前被认为不会遭到伊拉克人的攻击，因为它的距离太远。

上个月，即 9 月份，中央情报局向伊朗已故国王的儿子里加·巴列维提供了一个小型电视传送器，用它进行了一次 11 分钟的秘密广播。被评论家称为“小国王”的他宣称：“我将返回伊朗。”

作为秘密的武器和人质会谈的一部分内容而向伊朗提供的情报，凯西同意提供一小部分假情报。在给波因德克斯特的备忘录中，诺思说，凯西、特威顿和卡维认为情报不必要精确……我们相信这次会谈上所提供的真伪参半的情报就可以满足他们所关心的“良好的信誉”。

凯西认为新的通向伊朗的秘密渠道开通了，其中一个是拉夫桑贾尼议长的侄子，另一个是总理办公室的革命卫队情报局长。当拉夫桑贾尼的侄子秘密访问华盛顿会见诺思时，经批准装了一个被诺思称为电子“侦察盒”的装置，这样会谈就被秘密地录了下来。

“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诺思用计算机向波因德克斯特报告说，“（他们）真诚地相信里根可以在结束两伊战争上起作用——就像罗斯福在 1904 年日俄战争时所做的那样。任何像里根那样的人将得到同样奖赏……？”

二十五

查理·艾伦是负责伊朗计划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专家，同时又是负责反恐怖的国家情报官，他对行动正失去控制越来越不安。国家安全局的覆盖面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格班尼法尔，以色列人和其他组织的中间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受到监控。同时艾伦开始注意到，售给伊朗武器的价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数以百万计的美元遗失或未报帐：从1985年第一次输送武器开始有350万美元拖欠；有2400万美元从1985年12月起即被存在瑞士银行的一个帐户上；卖武器所得款项在一个月之内获得了300万美元利息。通常秘密行动的资金都控制到最低限度，而这次秘密行动却有大笔额外现金所产生的丰厚利润。艾伦查阅了窃听记录，伊朗人和那些拿了一些钱的人，如卡绍基等都抱怨甚多。斯考德将军和他的手下人正分别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伊朗人直接提供武器。艾伦去找盖茨。

“我很担忧”，他对这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说，“债主在要求还钱，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此事将会暴露。或许这些钱转给了尼反政府武装，但我不能证实这一点。”

盖茨说他听够了，他不想知道为尼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的事；对中央情报局来说卷入此事是非法的，他知道的越少越好。

艾伦说这不是谣言，而是根据窃听材料经分析作出的判断。

盖茨对此事深感不安，他说他们最好将这个情报告诉凯西，但

是过了六天仍没这样做。

10 月 7 日，艾伦告诉凯西可能有人向尼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凯西说他已经和他的一位老朋友兼委托人罗伊·福尔马克谈过，此人是纽约的一位商人并是卡绍基的律师。福尔马克告诉他，那些曾帮助卡肖奇筹集了 1000 万美元的“桥梁”贷款的投资者非常非常不高兴，他们感到受了骗，威胁要起诉并公开此事，美国全国将被卷入此事。

艾伦同意将他所担忧的事写在备忘录上。

10 月 9 日，诺思驱车至兰利与凯西和盖茨共进午餐。在七层楼的一个经过安全处理的安静舒适的房间里，他总结了最近与一些新结识的伊朗联络人的会晤。他像往常一样乐观，说他们最少可以换回一个人质，但不幸的是得不到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威廉·巴克利的遗体。根据推测他已经死了。那几个伊朗联络人说有一份长达 400 页的审讯报告，记载着巴克利在酷刑下招供的材料，他们可能会搞到一份复印件。

凯西表示对行动安全很担忧，他们的老渠道格班尼法尔很不高兴，并可能会停止合作。

盖茨说他可能小说读得太多了，但事实是只有一张纸。1 月 17 日有关伊朗问题的总统指令——是关于伊朗—人质交易行动的，而且事实上这张纸放在波因德克斯特的保险柜里，这使他感到很紧张。如果那份总统批准文件不见了，许多人，包括他们三个在内可能都会遇到很多麻烦。

凯西同意这个观点，他将坚持要波因德克斯特给他一份总统指令复印件，诺思说他将帮助办这件事。

讨论话题转向了中美洲，四天以前，一架向尼反政府武装运送武器的飞机在尼加拉瓜被击落。尤根·海森法斯，一个货机驾驶员被桑地诺分子抓获，他出席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说他认为他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盖茨问是否有中央情报局人员，财产、财产拥有人或其它东西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为尼反政府武装秘密筹款和提供武器行动？“完全没有。”诺思说。他曾尽很大努力使伊朗和尼反政府武装一直分开着。

午餐结束时，诺思提到了一些关于瑞士银行假帐号和尼反政府武装的问题。

他说得不很明确，凯西和盖茨都没追问此事，但饭后盖茨回去找凯西，问他：“他究竟在说什么，你能理出个头绪来吗？”

凯西说不能。

“我们是否应关注此事？”盖茨问。

凯西挥手示意他这不必要。

两小时以后，凯西和盖茨到国会，使参众两院情报监督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确信中央情报局没有卷入海森法斯飞机事件，或者任何武器供应行动。

回到他在白宫的计算机旁，诺思向麦克法兰发送了一条便笺：“我们急需一个高水平的律师和一个赞助者为海森法斯筹措辩护……，下几个星期将会在历史上写下公正的几笔……，到星期二，联合航空公司聘请的一位瑞士律师将到达马那瓜，他得到了秘密付酬，我们不能指望他代表整个案子。”诺思说他已从一个赞助者那里搞到10万美元为海森法斯另聘律师。“请相信这是一件使各种事情不致分崩离析的非常紧要的事，不幸的是里根得到汇报说有人正在注视着此计划。”

诺思与凯西交谈着。“摆脱那些事，把它们清除掉。”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诺思便开始了繁重的房间清理，以图销毁所有有关将款项转给尼反政府武装的备忘录。凯西说必须有一个人准备承担后果，但诺思作为一个可信的牺牲品可能职位还不够高，或许将不得不落到波因德克斯特头上。

10月14日，查理·艾伦呈交给盖茨一份七页长的备忘录，其中包括三条建议。首先他敦促他们马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一个计划小组，聘请一位像基辛格或者理查德·海尔姆斯那样的人作严格的局外性的审核，并在秘密行动之初就进行真正的质询：执行者真正的目标，供选择方案和动机是什么？

其次，艾伦说白宫和中央情报局必须作好在公众面前曝光的准备。格班尼法尔会诉诸于新闻媒介或法庭；他是一个不幸的前政府雇员，宣称美国政府没能履行它的几个诺言。第三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能最好地以有序而系统的方式关闭格班尼法尔渠道。在第六页由艾伦说："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在这些交易中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其中一些利润又被再分配到其它一些美国和以色列的计划中。"

读了这个以后，盖茨急速冲到办公室。他说："你看看吧。"凯西读过后赞同地说，这很具有爆炸性。他打电话给波因德克斯特，让他马上安排一次会面。他只能安排在第二天，10月15日，当凯西和盖茨到白宫旁边的旧行政办公大楼凯西的办公室里时进行。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挤出半小时会见中央情报局的正副局长。凯西将艾伦的备忘录呈交给他。

凯西向他建议："立即让白宫法律顾问参加。"很明显，有关于言行卑鄙的指控会很快流传开来，波因德克斯特应考虑使总统在计划一点一点泄露之前将其全部公布于众。

波因德克斯特对他们含糊其词。

回到兰利，凯西和盖茨召见艾伦，凯西要求艾伦立刻同罗伊·福尔马克交谈，汇集所有的细节并写成一份完整的备忘录。福尔马克那天再一次与凯西接触并强调解决他的委托人的财务赔偿的要求。

艾伦在第二天会晤福尔马克后，以备忘录形式报告说福尔马克曾建议再一次向伊朗输送武器"以保持伊朗人的信任……并提

供给格班尼法尔一些资金。这样投资者会得到部分补偿，以便格班尼法尔能借一些钱资助另外的武器输送。”

福尔马克想保持这个过程运转；他认为这可以使更多的人质获释。并且格班尼法尔告诉他诺思曾指出那1000万美元可以从援助尼反政府武装的1亿美元中支付，而这1亿美元现在可以从美国财政中得到。

艾伦说他们会招致令人难以置信的麻烦。10月22日，艾伦又一次去纽约会见福尔马克。福尔马克告诉他格班尼法尔将宣布，5月初运送武器的1500万美元这笔大款项“已经被转移给了尼反政府武装”。

第二天，10月23日上午9点，艾伦把这个情况呈报给凯西。中央情报局局长下令准备一份备忘录给波因德克斯特签字，以反映这一宣称，备忘录起草完后放在凯西的保险柜里。

诺思继续出售军火，通过拉夫桑贾尼的侄子这个新渠道，伊朗付给瑞士一家银行帐户7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用去支付10月底运抵伊朗的“陶”式导弹，还剩下500万美元。诺思报告给波因德克斯特说美国肯定能“在今后几天内”使两名人质获释。

11月2日，戴维·雅备逊获释。第二天，黎巴嫩《艾尔希拉》杂志报道说，美国一直在秘密输送武器给伊朗，并且麦克法兰在年初秘密访问过德黑兰。当此事披露时，舒尔茨正在去维也纳与苏联讨论军备控制的路上。他给波因德克斯特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他们现在公开此事并努力加以解释。波因德克斯特回电说布什、温伯格和凯西都一致同意有必要保持“绝对的沉默!”

当总统11月7日星期五在白宫会见雅备逊时，他告诉记者们贝鲁特的报道“毫无根据”。

囚禁十七个月后获得自由的雅备逊对那些有关他如何获释的问题非常恼火，他举起手以引起记者们的注意，并说道：“以上帝

的名义，你们是否能尽责地离开这里。”

虽然整个事情是明显的，但福尔马克那天又告诉艾伦说他的委托人很快将会下大赌注，他们将披露把伊朗军火的钱转给尼反政府武装这件事。

凯西和盖茨又一次去见波因德克斯特，凯西建议白宫法律顾问彼得丁·沃利森检查一下整个事件。

“我不相信，沃利森能守口如瓶。”波因德克斯特回答说。

凯西现在对能保住秘密已失去信心，而上层的分裂使局势更加恶化。内阁中数年积累下来的私怨已到了爆炸时刻，舒尔茨一直反对伊朗计划并怨恨国家安全委员会操纵此事，现在开始公开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五角大楼泄露了温伯格的观点，即出售武器给伊朗是“荒唐的”，唐·里甘和波因德克斯特在总统面前就是否做出公开解释发生争论。总统站在波因德克斯特一边，认为如果能保密的话，他们仍然可以争取更多的人质获释。

11 月 10 日，星期一，凯西去白宫与总统布什、舒尔茨、温伯格、米斯和波因德克斯特一起开会。总统告诉他们谣言和新闻报道正在威胁着他们的行动。他认为他不是在与伊朗的恐怖分子打交道，而是在与温和派打交道，并且输送武器并不是付赎金。总统说需要发表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将不涉及任何此次行动的细节和具体内容。舒尔茨第一次知道了总统曾签署了关于向伊朗输送武器的总统令。虽有不自在，但还是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所有的高级助理们都“一心一意”支持总统，声明谴责那些“臆想的报道”，并说美国政府“对恐怖主义分子决不让步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

关于伊朗武器销售的钱上有很大的乱子，这个消息在美国情报机构不胫而走。11 月 12 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到中央情报局，并试图得到国家情报局在伊朗行动上的窃听材料。凯

西阻止了他们并声称计划仍在严密控制之下。

白宫意识到总统不得不将伊朗计划的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公众，因此安排了一次 11 月 13 日晚的电视讲话。在此之前，国会和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们曾被邀请到白宫出席由波因德克斯特和凯西举办的汇报会。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先宣读了 1 月 17 日的总统的指令，该指令命令凯西不要向委员会公开此行动。国会的领导人们已经由于愤怒和不信任而要发狂了。

会后，凯西问帕特·利伊是否想搭车。利伊说他想去乔治城与家人相聚共进晚餐并接受了搭车的邀请。这两人互有敌意已经一年多了。追溯到 1985 年 10 月，阿奇里·劳洛劫机事件后不久，利伊曾在一次电视讲话上说，美国情报机构知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撒谎。利伊说："昨天晚上，当穆巴拉克总统在新闻中说劫机者已离开埃及时，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我们的情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这很明白地暗示穆巴拉克的电话被窃听了。凯西给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指控他严重的破坏了安全，实际上是背叛行为。事实上利伊说的都是政府发言人已说过的，但凯西认为这位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的声明份量更重些。

利伊曾以 30%的点数赢得了上周的再选，但不感谢凯西。选举前的几天，《读者文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会正在使中央情报局不能发挥职能》，此文在引述利伊破坏安全一事时的方式使利伊断定它出自凯西。

"我知道你很愤怒。"当他们坐到车后座时凯西对利伊说。

利伊说中央情报局局长插手政治事务并试图击败一个对己不利的参议员是不合适的。他说，但是现在在伊朗上你们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将进行一次真正的以传票和宣誓词为基础的调查，再也没有非正式的友好的谈话。他认为没有通知委员会并未与委员会商量破坏了所有的保证、承诺和理解。

民主党人在上一周的选举中控制了参议院，而且利伊说他可

能会留在委员会，接任主席职位。

当汽车驶入乔治城时，凯西说道，我们必须一起工作。利伊跳下了车，凯西跟了出去，抓住了参议员的手臂。那时正是晚上交通高峰期，他们的车停在大街中间，阻住了交通。

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凯西一边拍着利伊的手臂一边说道。并暗示由于利伊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央情报局想授予利伊一枚奖章。

一小时以后，总统发表了电视讲话。他说他并没有就人质而付“赎金”，但正在伊朗寻求接触和影响。那些武器是“防御性的”，他将秘密的伊朗行动与尼克松和基辛格1971年向中国开放相类比。

“我们过去没有，重复一下，过去没有——为了人质而出售武器或其它任何东西，我们将来也不会。”

他补充说那一切都是合法的，“并且国会中有关的委员会正在并将得到充分的通报。”

波因德克斯特从保险柜里拿出1月17日总统指令，复印了一份并将复印件送给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现在此事已黑白分明了。参议员杜伦伯格和利伊仍认为总统曾命令凯西不要将此总统指令向国会报告“是不可思议的”，这份总统指令已签署10个月之久，但凯西比较起来是清白的：他只是在遵照命令行事，尽管他们确信他是政策和命令制定者之一。杜伦伯格和利伊对这一越轨的严重程度感到吃惊：有关国会监督的一整套概念被破坏了，时钟被倒拨了10年或更多。总统说他可以随意处理他们。最令人吃惊的是总统指令中有一行写道由于“极度的秘密和安全上的危险”的原因，因而不要通知国会。

6月前麦克法兰和诺思曾住过的德黑兰希尔顿饭店里的服务员们，知道要发生某些事了。以色列要人们、沙特军火商卡绍基和伊朗中间人格班尼法尔也知道这一点。这些人是可以信任的，但

是美国的那些拥有所有其它秘密情报的参议员们是不可以信任的，是不是？还有什么他们不知道？

作为白宫努力的一部分，11 月 14 日，星期五，波因德克斯特走访了《华盛顿邮报》并在那里吃了午饭。他镇静地抽着烟斗，说这次行动是有理智的冒险，总统不会受常规认为的，在外交事务上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的约束。

两天以后，波因德克斯特在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会露面，这对他来说是少有的。在他等待新闻会开始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关于他 28 年海军军官生涯的情况，特别是他 70 年代中期指挥一艘驱逐舰时的情况。

“海军军官，”他说着，从他的上衣侧兜里慢慢地掏出烟斗，“由于在海上指挥，因此思想上要有更充分的准备，必须自己做决断。你知道那里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你学会了冷静，无论是在驱逐舰舰桥上还是这儿，都是一样的。”

播放开始时，波因德克斯特说，“由于所有这些臆测和泄露”，因此政府要将伊朗行动公诸于众。他说该行动基本上是一次情报行动，因此是凯西而不是他将向国会报告那些情况。

那天凯西出发到中美洲，当需要解释时离开出国总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他仍然想时刻关注着尼反政府武装战争。他已要回了他的“打猎证”，国会批准对尼反政府武装给予 1 亿美元的援助已到手一个月了，他现在正在监督新的行动：将 1 亿美元中的 7000 万美元暂留在中央情报局，它几乎是国会在以往任何一年提供资金的三倍。

11 月 17 日，星期一，凯西接到盖茨打来的电话，催促他在周末回来到情报委员会作证。第二天波因德克斯特用密线给凯西打了个电话，中央情报局作为一条行动指令录下了这个电话。

“我开始考虑星期五的听证会和我们两人必须合作的事，”波因德克斯特说，“如果你星期四能返回那么我们可以碰头……我想

那将是很有用的，这样我们可以在星期五提供最好的证词，我将努力尽可能多地将问题搁置起来。”

“碰头时，你叫了很多人吗——比如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凯西问。

“我希望只是我们俩在一起呆一会儿。”波因德克斯特说。他补充说米斯想帮忙，并希望至少出席其中一次会面。

“啊，”凯西回答，“那么随你定一个你喜欢的时间，我们会面并少谈一会儿。我会在你安排的任何时间与你会面的。”

凯西和舒尔茨的关系终于分裂了。在那个星期天，国务卿在电视上露面，并毫不掩饰他对向伊朗运送武器政策的反对。他说波因德克斯特是这次行动中的“指定击球手”，当被问到他是否被授权代表政府就此事发言时，舒尔茨肯定地回答：“没有”。

舒尔茨已开始讨厌凯西，很明显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建立了另外一套外交政策，并不仅仅在伊朗问题上。他的影响太大了。首先他用分析专家和其他负责收集情报工作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去找出华府内部正在发生的事。其次中央情报局通过它自己的行动官员们，或者像现在这样通过白宫又成为一个实施机构。对这一点没有比一年以前凯西厚颜无耻地在华府各处兜售第一份关于伊朗计划的格拉姆·福勒文件更好的例证了。此文件在国务院和国防部遭到白眼，他在白宫把它卖了出去。

舒尔茨也察觉到凯西几年里曾很有效地破坏了军备控制协定。中央情报局局长与强硬派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佩尔有幕后的联盟。回顾往事，舒尔茨很清楚情报机构曾不断地炮制了一系列报告，这些报告巧妙地破坏了军备控制。投总统所好，凯西坚持认为军备控制谈判完全是苏联人的另一个工具，认为苏联人按照两个预测结果来设计自己的谈判立场。第一，他们确定他们要发展的新式武器；第二，他们确定美国想发展对他们最有威胁的

武器。苏联人往往对此计算得很仔细，以确定在未来六年中他们将要对导弹投多少钱。当然，对苏联人来说，它是合理的。所有参与谈判的国家，包括美国，都会做相似的评估。但凯西却给出了表明苏联人不在认真谈判并操纵谈判的“证据”。

舒尔茨觉得凯西对白宫在军备控制上的踌躇不前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或许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摊子太庞大了，情报界太有钱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还参与耗资达几十亿美元的未来10年卫星硬件决策，确定优先顺序。他控制了分析过程和估价报告，他控制了秘密行动和反间谍工作。由于凯西这样一个活跃人物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与了决策。从某些角度看，舒尔茨认为这些职责太多了，可能需要减少一些。

凯西老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的工作。他很富有，几乎没有失去什么。舒尔茨认为，凯西在追求他的目标时，不仅在国会甚至于在政府内部引起了对中央情报局的不信任情绪，从某种意义上看凯西已失去了他自身的完整性，他已成为影子国务卿。

11月18日晚6时许，我到白宫去会见波因德克斯特的副手艾尔·基尔。他意欲坚持我们不应该出版一份有关向反霍梅尼的流亡人员秘密提供援助与向霍梅尼政府出售武器的秘密行动同时进行的报道。

基尔很烦恼，而且过度紧张。“发表这篇报道是一种十足的狂热。”他坐在他那舒适的办公室书桌旁说道。我说：“我们已经比预定发表时间拖后了，拖后了10天。”

基尔是一个年轻的有说服力的男人。他在桌子上滚着一根铅笔，并说道他们除了作武器交易别无选择。武器在中东是主要“货币”，“我们不得不建立我们的诚意。而我们根本不信任他们，不信任伊朗，不信任我们打交道的渠道，他们也不信任我们，没有相互信任。他们认为我们是大魔鬼，因此你如何建立信任？你

们想试一试奶粉吗？你们想试一试绷带吗？那是些他们在当地药店能买到的东西。你们必须试一下军火”。

他说如果发表一篇报道，暗示美国正不仅与通往伊朗温和派的渠道，而且也与那些和国王统治相关联的流亡人员作交易的话，那将是“毁灭性的”。他稍顿并抬头说：“德黑兰决不可能容忍它。”

我回答道，伊朗政府指责中央情报局支持流亡人员和亲国王力量，他们在他们的报纸和电台上经常这样说。而且流亡人员知道他们正在从中央情报局得到钱，他们在其巴黎的办公室里向记者们承认了这一点。

他同意这点，但是他说关于这些事情的报道都是在报纸的背面，不在头版，而且引证都是不直截了当的。“一些人的生命将受到真正威胁，他们的生命将处于危险之中，如果这个报道出现的话……那将切断我们的渠道。至少给我 24 小时，希望能有 72 小时，这样我可以与我们同德黑兰温和派之间的渠道接触，告诉他们将要有一个坏消息。坦率地告诉他们，‘隐蔽一下你们的丑事。’”

回到《邮报》报社，我们判定这个说明是不可信的，白宫的评估也没有多大影响力。总统计划出席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猜想是白宫不想在此之前让这则有关既给霍梅尼提供军火拥抱他，而同时中央情报局又正在支持伊朗流亡人员和试图推翻霍梅尼的小国王拥护者们的报道出笼，我们决定立即发表这一报道。

那天晚上诺思，麦克法兰和其他几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助手尽全力试图把一连串事件联系到一起，以将总统与问题隔开并使他的作用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就他 1985 年第一次批准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诺思用计算机发信号召见他的助手罗伯特·厄尔中校：“把我们的小钳子带来检查一下，‘沃特福’。”在海军陆战队土语中，“沃特福”意思是“到底有他妈的什么问题”。

在新闻发布会上，总统为他的伊朗计划辩护：“我不认为出过

差错……我不认为有任何惨败或大的失误。”他四次否认他曾“认可”过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或有任何其它国家卷入此事。然而仅在会后25分钟，里根发布了一条不平常的更正，说他实际上曾认可过一次通过另一个国家的这种武器输送。

凯西和盖茨第二天到白宫，试图解决与诺思的一个争议。诺思声称，不是他没有在1985年11月为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后向中央情报局请求协助。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对外说那是诺思。当天晚上，凯西再次到白宫，想将他第二天在情报委员会的证词协调到一起。他与波因德克斯特、舒尔茨和米恩会面。在他的证词中，他计划说中央情报局认为1985年通过以色列运送的是“抽油设备”，而不是武器。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舒尔茨到白宫生活区见总统。在紧张的会晤中，国务卿告诉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可能要对情报委员会撒谎，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已发表了一些连最肤浅的审查都经不起的声明，这使得舒尔茨怒气冲冲，他从没想过他会有这样一次对话，几乎是在责备这位美国总统。他告诉里根他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人看到那个记录都会认为是用军火交换人质。

同时，凯西在兰利主持了一次由一大批可能知道点内情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参加的会议。他说他曾与诺思会晤，他们删去了关于1985年给以色列运送的是抽油设备的描述，代之以空白。

第二天上午他很早起来继续修改他的证词，重新检查并组织资料和已公开的事及那些不可能指望仍能保密的事。9时30分，凯西出现在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所有15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的面前，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当凯西读完他的长达10分钟的概述后，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毫不含糊地对凯西的观点提出质疑：依照法律秘密行动的通报可以推迟十个月吗？凯西冷静地回答：“我们正在讨论一项许多总统已提出的符合宪法的特权。”他说小心谨慎是必要的，伊朗人要对那些在黎巴嫩挟持美国

人质的人施加他们有限的影响是需要时间的。“我认为由于我们实施的行动很小而且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重要性相称，因此那是一种诚意的举动。”运送的武器是微不足道的。

“你必须去冒那些风险，否则就要坐等这个世界从你身边走过，我个人赞成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去冒险。

“我现在愿意说，如果我能够再作一次的话，我将再次冒险。”

一些共和党人跳出来为总统辩护，并坚持认为委员会泄露了秘密。戴夫·麦克迪，俄克拉荷马州的民主党人问道：“凯西先生，是谁负责这一行动？”

“我想我们都参与了，那是一个班子。”

“谁领导那个班子？谁发号施令？是波因德克斯特还是凯西？”

凯西说：“我想是总统。”

上午11时，凯西应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于是他离开了，并说他将在下午1时30分返回众议院情报委员会。

他去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室，坐到证人席旁。桌上放着一个特别的麦克风，像一个刺进他脸里的螳螂。那东西是用来帮助参议员们听懂局长那传奇式的喃喃自语的。克莱尔·乔治坐在他旁边，在持续了六年的躲闪逃避之后，现在是清算的时候了。所有的委员会成员围坐在一条白色马蹄形桌旁，参议员少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一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及委员会前正式成员也出席了。

“请原谅，主席先生，”伯德问道，“证人是否宣过誓？”

这是个令人尴尬的时刻。杜伦伯格回答说，除证实证词外，委员会不需要证人宣誓。他说这样可以提供一种“自由交流的气氛”，使其在非敌意状态下进行。但是如果哪一位参议员要求证人宣誓，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没有任何人，包括伯德提出这样的要求。

凯西默默地坐在那儿，然后开始宣读他准备好的声明。他试

图将那次行动比作一次例行秘密行动，他没有提及在1985年中央情报局协助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之前没有总统指令，也没有提及斯波金起草的总统指令，使总统在行动之后认可中央情报局在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中的作用。他提到伊朗中间人格班尼法尔时说，他是"伊朗的代表"，而不仅是名义上的。

几位参议员反复要求说明"代表的"身份以及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凯西避开了这个问题，随后这个问题又指向克莱尔·乔治身上。他提到格班尼法尔是一个非常机密的情报来源，不能用他的真实姓名。"他的名字不是格班尼法尔吗?"一个参议员问道。

"啊，那是他的名字，参议员。"乔治说，"但是如果这个名字泄露出去我们就要为他的生命担忧了。"

没有提到格班尼法尔未能通过一系列测谎器测验一事。当问到斯考德将军在向伊朗运送武器中是否起过什么作用时，凯西说，他曾听说过有关的新闻报道，并试图使事情就停留于此，但有人又就此进一步提问。

"我们知道斯考德先生的活动，但我们并不赞同那些活动。"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

当谈到与伊朗人的会晤时，凯西提及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当被问及那人是谁，这位局长说："我不能肯定是谁。"他转过身并把问题交给坐在他后面的他的行政助理，那位助理说他也不清楚。

此处没提到诺思中校的名字。

凯西使他的简短汇报剪裁得既伸出了一枝友好的橄榄枝，又没有新的内容。他没有提及惹起麻烦的钱的问题，即那笔失踪的1000万美元或者部分出售武器的钱被转移给了尼反政府武装的可能性。

下午1时50分，凯西回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他说他不认为

让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行动是一个好主意。他说这首先是由于"这个中美洲事件"而发生的。他说由于在尼加拉瓜行动中，国会给中央情报局施加一些限制，因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了行动者，这就等于承认了政府以前曾经否认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在指导并积极参与向尼反政府武装秘密提供武器的活动"。凯西主动说道："但我不知道所有细节，我没有接触到细节，因为我被禁止做任何事，我知道别人在做那事。"

当被问及那个"无名的前爱国者"格班尼法尔时，凯西说他不值得信任，"是属于那种可疑的家伙"。当被追问时，凯西说："在这种事情上，你们无法让那些灵魂干净的人去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你通常要使那些有饱经沧桑的经历或有多变履历的那些人。"

"那只是一件他到底是一个多大恶棍的问题吗？"一个民主党人问。

"是的，"凯西说，"我认为那是很清楚的。"

当问到一困难的问题时，凯西会说："要确切地描述那事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我不熟悉那事"，或者"那不是能力所能及的"。这都是真的，但没有一位成员在这位局长搪塞问题时催逼或追问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议员们的相互争吵上了。几页的记录原稿表明凯西说的不少，但他没有提醒他们那个计划使三名人质获释。

汉密尔顿说："我认为你将来解释你现在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时将会很困难。"

"即使你是个伟大的预言家，现在也不必预测这个。"凯西回答说。在下午3时05分，他结束了作证。

当天上午，司法部长米斯到总统那里，并暗示他没有人搞清了那件事。有太多的矛盾，有太多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的空白，太多的不一致的回忆。他说当国会调查此事时，他们都将傻

眼，总统授权给司法部长开始调查。

米斯和波因德克斯特接触，并要求他收集所有有关的文件。在白宫西楼，波因德克斯特让他的军事助手，海军中校同时也是一位律师的保罗·汤姆逊从保险柜里拿出秘密行动的总统指令。第一份总统指令标明日期是1985年12月5日，将伊朗行动描述为一次赤裸裸的武器—人质交易，而这正是里根所否认的。

汤姆逊说："有了这份东西他们将会有非常愉快的一天。"他将总统指令交给了这位海军将军。

波因德克斯特认为，它将成为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难题，像他站在驱逐舰舰桥上的当舰长一样，他决定开始行动。他撕碎了总统指令，并在椅子上转过身，将它放在他桌后的燃烧袋里。那些燃烧袋将被烧掉，这是常规毁掉多余的保密材料工作的一部分。海军上将还找到了一些计算机信息条和一些未完成的文件——已经不再需要的私下的直率的信件，他撕碎了它们，把它们也放到燃烧袋里。

当天下午，米斯在家里给麦克法兰打电话。"巴德"，他说，"总统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将这个问题中的事件组织成一篇准确的记录，因此我想和你谈谈。"

麦克法兰下午3点左右到了司法部，并回忆陈述了一个小时。

米斯问了一些关于总统参与此事的程度以及其他内阁官员所起的作用问题，这又花去了半个小时。米斯的助手离开了房间，米斯也跟了出去。

"埃德，等一下，"麦克法兰说，"我说就此事和你谈一下。你知道，正像你可能在今天上午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样，我昨天晚上发表了一次演说，并承担了我所能承担的所有责任。而且我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是的，我已注意到这点。"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此事一开始，埃德，总统就很坚定地支

持此事。他毫无保留地同意以色列人在这儿所要做的任何事。”

“我知道这个。”米斯说，“而且我理解其原因，并且，说实话，我非常高兴你告诉了我这个，因为他越早作出决断，他的法律地位就越好。”他说即使总统曾做过一份“口头指令”或甚至于一份“头脑中的指令”，而不是通常的书面指令，那就会使他们都更清白。因为总统有权命令秘密行动。他补充道：“巴德，无论你干什么不要试图改变事实，或者仅说出你认为对你自己或总统最有利的事。只说出事实，并不要试图推测什么对总统有利或有害。”

然后米斯同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交谈。后者曾提出联邦调查局想参加他的调查。米斯说他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他感到如联邦调查局参加，将使他们受到将联邦调查局用于政治目的的批评。

当晚大约6时30分，诺思去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已或多或少地下定决心使自己被彻底毁掉。他指令他已为他干了四年的秘书，福思·霍尔帮助他，从他的保险柜和文件堆里清除一些文献、备忘录和文电。他很疲倦但专心致志地把那些材料堆成一堆。所有这些都要切碎，这花了一个小时。他还要霍尔帮他换了四份备忘录，从中除去了可能引起麻烦的引述。

11月22日，星期六，天气很暖和，一个繁忙的周末就要开始了。米斯带了司法部两名助理部长一同去白宫。他先会见舒尔茨，然后会见斯波金，他的助手仍忙于清理那些文件。在诺思的办公室里，他们发现一份没有署明日期的关于伊朗计划的备忘录：“1200万美元将被用来为尼加拉瓜民主抵抗阵线购买急需的物资。”

米斯后来带他的助手到距白宫两个街区的老艾贝特·格里尔饭店进午餐。他们讲述了在诺思办公室发现的转款备忘录。米斯骂了一句，但感到那可能是合法的，或者可能那份备忘录仅反映

了诺思的白日梦之一。

凯西在他的老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给波因德克斯特打电话说："为什么不和你一块吃三明治呢？"这两个相互间最了解的人一直在一起独自吃着并谈了近两个小时。快结束时，诺思加入了他们。他们除了讨论其它事情外，还讨论了伊朗人的第二条渠道，这个庞大的计划仍是一个可选择方案，仍有希望。凯西总是相信最好的战术之一，就是用一个明显的成功去掩盖一个要出现的问题。现在用不着格班尼法尔那可疑的帮助了，他们有通过拉夫桑贾尼的一个侄子阿里·哈希米·巴哈拉曼尼，和总理府的一位名叫萨玛伊的革命卫队情报局局长的直接渠道。一段时间以来，巴哈拉曼尼和萨玛伊一直在用一个以色列制造的保密通讯装置向诺思发送电文，但最后一周巴哈拉曼尼曾说他感到受到威胁并有可能受到监视，因此他的情报都由他的卫兵带来。

午餐在下午3时20分结束，3时40分诺思打电话给米斯让他安排一下第二天的会面。在3时46分，凯西打电话给米斯，说他有点事想告诉司法部长。"我为什么不在傍晚回家路上顺便拜访你呢？"米斯说。

凯西提出给司法部长喝点苏格兰威士忌或啤酒，他只有这两种酒。米斯不喝苏格兰威士忌，他选了啤酒。凯西说他的老朋友罗伊·福尔马克从那些为伊朗武器交易而筹款的人那里传来了信息，他们说："应偿还欠我们的钱，否则我们要努力把它搞糟。"

两位律师都认为那是敲诈。但是据米斯的估计，两人都没提到他们已有的最麻烦的情报。凯西没提到福尔马克指控钱到了尼反政府武装那儿，而司法部长则没提到诺思的没署日期的备忘录，他们在几个小时以前发现了这份暗示资金转移的报告。

米斯曾与诺思定于第二天，即星期天一早会面，但是诺思请求约会推迟到下午2时，这样他就能和全家一起去教堂。诺思打电话给麦克法兰要求12时30分在麦克法兰老行动办公大楼内的

办公室里与他会面，他们谈了15分钟。诺思说，他将不得不向米斯承认向伊朗出售武器的钱转移给尼反政府武装的事实。正如麦克法兰所知，诺思不会做任何未经许可的事。这件事里，它是有据可查的，诺思曾为波因德克斯特写过一份备忘录。

下午2时，米斯与他的两个助手到了。

诺思说是的，钱是被转移了，在瑞士银行开了三个帐户，帐号给了以色列人。钱曾存在这些帐户里，尼反政府武装很感激。有一次武器出售的大约300到400万美元到了尼反政府武装那个方面。诺思说在备忘录里提到的1200万美元，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以色列的钱。这听起来对他有利。

“你们发现过一份秘密备忘录吗?”诺思问。

“我们本应该发现吗?”米斯问到。

“不，我只是想问一下。”

同时，凯西给总统写了一封密信，建议解除舒尔茨的职务。他引用了前一星期舒尔茨曾用过的棒球术语，他说波因德克斯特是“指定的击手”。凯西说在国务院总统需要一名新的“投手”。

星期一上午11时，米斯向总统和唐·里甘解释说他发现一次向尼反政府武装转移钱的事。米斯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办公室见波因德克斯特。“我认为你知道我们在奥里的文件里发现的备忘录。”波因德克斯特说他知道，并意识到他可能不得不辞职。

午饭前，波因德克斯特发现了一条诺思传来的计算机信息：“人们都说你不会解雇我，我辞职……我已准备好在你和总统做决定时离开……我们就要成功了。永远忠诚的奥里佛·诺思。”

“谢谢，奥里。”波因德克斯特在计算机上打道，“今天我和埃德已就此事谈过两次，而且他现在仍在试图想出对策。我告诉了他我准备辞职，我告诉他我将按他的指示做，他是我们在总统身边少数几个可以信任的人之一。如果我们不离开，你认为我们到中央情报局作比尔的特别助手如何?这将正式置你于行动范围内，

先不要对比尔说什么，我只想知道你的反应。”

在白宫的一次照像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总统，他是否应该承认在伊朗武器运送中有失误。“我不会就那事撒谎、我没犯什么错误。”他回答道。当追问到其他人有否失误时，他说：“我不会解雇任何人。”

凯西让福尔马克到兰利并试图探听关于用于伊朗行动中的钱的事。其后，他打电话给诺思。

“这儿有个人说你欠他 1000 万美元。”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

诺思说瑞士银行帐户里只剩下 3 万美元，“告诉他是伊朗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欠他的钱。”诺思说。

凯西想找米斯但没找到，他又试着找唐·里甘并留下口信，说他急需与白宫办公厅主任谈话，不能等。里甘同意在他回家吃晚饭的路上在兰利停一下。在七楼上，凯西不动声色，脸上几乎没有什么反应，问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总统脑子里在想什么。

里甘脱口说出向尼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一事已被发现。

“你将对此事采取什么行动？”凯西问。他不动声色，难以捉摸。

里甘继续说道，他以前就认为与伊朗人的军火交易，正像他们在华尔街常说的那样，是“没有什么利益。”现在已知道了资金转移的情报。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明天将其全部公开。

“那么，你认识到后果了吗？”凯西尖锐地问道，然后强调了这样一个公开所造成的影响。“你在使整个伊朗计划告吹，可能也使诸多人质的生命告吹。”伊朗可能会由于武器要价太高而愤怒，国会也可能会愤怒不已，难以自制，并可能切断尼反政府武装的资金。

“随它去吧，”里甘答道，“我们到底还能在这件事上坐多久？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绝对是一个耻辱……我们发生了这件可能的犯罪行为。

凯西说："我希望你认识到，你知道，这将引起许多混乱并成为一个大丑闻。"

里甘指出最后决定已做出，不能逆转，没有其它选择。

凯西去国际俱乐部迟到了，在那儿将同他的女儿伯恩戴特和爱德华·希莫夫共进晚餐。希莫夫是位战略情报局的退休老兵，也是位作家，准备为凯西写传记。他们曾有一个君子协议，凯西将提供他接触中央情报局和政府高级人员的途径，包括总统。

当凯西到达俱乐部时，希莫夫、伯恩戴特和她的丈夫都在那里等候。希莫夫知道现在的冲击，他说："你知道你不久就会遇到麻烦。"

"我们能对付。"凯西自信地说，把话题转到了要写的书上。他将一直当局长直到总统任期结束时为止，但是他必须做些事，以使希莫夫能在1988年的最后六个月里在中央情报局收集一些资料。在那之前，他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凯西来中央情报局之前，在战略情报局工作、作为投资者、作家和证券与交易管理委员会官员这些时期的事。凯西急着要走，他要到他在棕榈滩的别墅去度圣诞节。他们商定希莫夫可以去，并作一些录音采访。

"比尔，从政界退出后你将干些什么?"

凯西说："我不想再干律师了，我想搞风险投资。"他再次确信一个小的私营企业能发展的更快、更好。他还说他正考虑写自传。

"爸爸，"伯恩戴特说，"你必须写一本书。"

第二天，11月25日，星期二，早上6点，凯西打电话给米斯，并请求他在上班时到他那停留一下。早上7时，司法部长的车停

在福克斯豪尔，克里森特公寓前。凯西想知道眼下情况如何。

米斯说："波因德克斯特将要把事全部公开。"

接着米斯打电话到波因德克斯特车里，要求这位海军上将在司法部见他。波因德克斯特一到，司法部长就说："你应在今天辞职。"米斯主动说他不认为诺思曾干过什么不合法的事。

波因德克斯特回到他在白宫西楼的办公室，并指示把他的早餐用盘子带来。他坐在他的会议桌边上，并冷静地告诉他的军事助手，汤普逊海军中校，他将在那天到海军部请求辞职。他没有紧张不安，也没有激动热情和怀疑。汤普逊后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承担责任的人当中，海军上将可能是历史上最合格的一位。"

唐·里甘不久到了波因德克斯特的办公室，他火气很大："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波因德克斯特调整了一下他的眼镜，用餐巾擦一下嘴，然后把它放在一边。"好啊，"他说，"我猜想我本应对此事调查再多一些，可是我没有。我知道奥里干了一些事，但我没有调查它。"

"为什么没有？"里甘问道，"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那该死的蒂普·奥内尔（指诺思），"波因德克斯特说，"他拉上尼反政府武装的方式实在令我厌恶。"

"好啦，约翰，我想当你9点半去见总统时，你最好记住带上你的辞呈。"

"我会的?!"

在兰利，凯西给查理·艾伦打了电话。他送给波因德克斯特的那份该死的，有一个月之久的，关于有人可能向尼反政府武装转移钱的备忘录哪去了？他们在凯西的内柜里找到了它。凯西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他迅速起草了一份绝密的写有"亲爱的埃德"的信给米斯，解释曾发生的事。信中说他和盖茨曾几次告诉过波因德克斯特这些，并曾在10月中旬给他一份备忘录，但是

那份说明有人可能转移钱的备忘录不知什么原因根本就没有送到白宫。

当那天早上总统给国会领袖们作了关于转移钱的预警报告。他们被召到白宫而且总统告诉他们波因德克斯特“不是一个参与者”，但是自动提出他的辞呈。因为按照海军的传统，舰长要对他的指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里根为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辩护，并说它曾“很好地为这个国家服务”。

总统又说：“虽然转移资金不容宽恕，但它与政策并不相悖。”

在中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总统读了份简短的声明并介绍了米斯。米斯宣布有1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钱被转移给了尼反政府武装。总统显示出吃惊和憎恶的样子，并说他以前不知道此事。他宣布波因德克斯特已辞职。诺思被解雇了。

当天晚些时候，福恩·霍尔通利用衣服和靴子从诺思办公室里偷出一打半英寸厚的文件。她把它们带给诺思，并说他们的防御措施将是“我们每天都销毁文件”。当天傍晚，一位安全官员查封了办公室。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凯西问他政府是如何卷入伊朗门事件的。

“以色列人1981年告诉我们与伊朗人合作，以便与其军方接近。”凯西说，“这看来对我们是可信的，出于对将来霍梅尼之后时代情况的考虑。”

为什么会有利润转给尼反政府武装？

“伊朗愿意支付更多。”他说，并暗示发现的“任何非法性”都将对对方有利。

谁？

他顿了一下，“波因德克斯特已被抓住。”

你知道向尼反政府武装转移钱一事吗？

“法律告诉我不得不远离此事。”他说，并重复了一遍米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话，即中央情报局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包括

局长。

尼反政府武装是你的宠儿，你肯定有关于他们正得到1000万到3000万美元的线索？

“瞎说，”他愤然说道，“我昨天才从米斯那儿确知此事。”

你不知道诺思正在干什么？

“去他的，在贝尔特地铁包围的范围里（指政府高级官员所在地）没有人想进监狱……”他挂断电话。

几天以后，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前副手福兰克·卡卢奇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个独立的法律顾问组织负责“伊朗门”事件的刑事调查；总统任命了一个由前参议员约翰·托尔领导的三人小组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调查；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也开始了全面的调查。波因德克斯特的唯一的另一次与凯西的对话是问中央情报局局长关于选择律师的建议。

大约11月3日下午1时，我又一次给凯西打电话。许多政府成员和国会领导人的人说他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涯已完蛋了。我们在谈话时他还在吃午饭。

“主席和副主席说我们将带着玫瑰香味出来。”他话中带刺，意指参议员杜伦伯格和利伊。“法律不允许我们援助反政府武装，而且我们没有援助。”

他说中央情报局在向伊朗出售武器中曾犯过两项轻微的错误。第一项是给予白宫1985年11月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输送武器给予过协助，这事发生在里根签署那份总统指令之前。那个协助是让诺思负责联络的，这样可以找到一个“例行的商业航班，这不是一个最高法院的案子。”

他说，第二项是一位“愚蠢的”低水平中央情报局雇员，在伊朗出售武器时用了阿富汗的抵抗力量行动的同一个瑞士银行帐户。因此这次伊朗行动的一些钱和阿富汗行动的5亿美元混杂在

了一起。他说："但是所有的钱都被算入了。"

整个事件是否是伊朗人的大规模刺激行动，目的在于获取美国武器？

"胡说——总统说劝诱他们而我们作了。"

我又问了另一个问题。

"去你的，别戏弄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接了你的电话。"

我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回答。

"我希望你能像成人那样正常约束自己。"

好啦，其他人，许多其他人在说你知道更多，一定卷入了，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去干你的工作挣钱的原因。"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并在他的声音里增加了一点果断和清晰，"你注定了只会部分时间是正直的。"

中央情报局的法律部门仍在极力使该局的所有活动处于法律范围内，试图精确确定在中央情报局官员和私人空运及尼反政府武装的事业的捐赠者之间，什么样的接触是允许的。一位助理法律顾问于 12 月 5 日向克莱尔·乔治讲明了一个观点："与捐赠者进行接触，虽然与政府相悖，但不与法律相悖。"

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走了以后，凯西独自承担了从失败的伊朗行动撤出的任务。对于即将来临的与伊朗人的第二条渠道于 12 月 13 日，星期六，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会晤。舒尔茨赢得白宫同意不再向伊朗出售武器，并且中央情报局代表在那次会晤中不谈政策。凯西打电话给里甘，让他说服总统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并向法兰克福发了一封绝密文电，授权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代表进行"政策和情报的讨论"。

在帕克饭店举行了法兰克福会晤之后，舒尔茨接到了国务院

代表的一个保密电话。国务卿听到他的报告后目瞪口呆，并立即向总统打电话说他们需要立即交谈，总统要舒尔茨第二天上午到白宫。

星期天上午在白宫，舒尔茨说法兰克福会晤显示了所有事情失去控制的程度。波因德克斯特、凯西和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讨论那些没有弹性的事。伊朗去法兰克福的代表提出一个九点议程，此议程原来是诺思和中央情报局同意的。除了其它一些事以外，它说美国应做工作以使 17 名囚犯得到释放。这 17 个人被指控在 1983 年用汽车炸弹攻击在科威特的美国大使馆。在与恐怖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美国一直坚定而明确地支持科威特拒绝释放那 17 个囚犯，那 17 个人是一个叫“埃尔·达瓦”即“号召”的组织的成员。那是一个激进狂热的穆斯林原教旨议组织，它与那些在贝鲁特和其它恐怖活动中杀死 241 位美国军人的人有联系。这些人是一些为了信仰可以自杀的疯子，其中一些人与黎巴嫩穆斯林希兹布拉派和它的领导人法德拉拉有联系。科威特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成为反恐怖统一战线强硬的象征。但是中央情报局到德国却说此事是可以商谈的，它习惯于建立在权宜之计和诈骗基础上——而不是连贯性基础上的行动。中央情报局在嘲弄总统的原则和信条，暗中损害总统的个人保证，即恐怖主义分子可以跑掉但躲不掉。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的姿态是现时整个混乱局面之根源。舒尔茨说他认为它令人作呕。

总统的眼睛闪着，嘴巴紧闭着。就在那次会谈后，从 1985 年中期开始，舒尔茨一直进行并反复失败的有关伊朗计划的争论终于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12 月 15 日，星期一，凯西在他兰利总部七层的办公室里，准备他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又一次出面作证时，突然急症发作。很快叫来一辆救护车，把他急送到乔治敦医院。到医院后他又发作了一次，但能正常说话和运动。星期四上午 7 时

40分，他被送到手术室。一个三人小组为他作手术直到下午1时，切除了一个叫作淋巴瘤的恶性软肿瘤，是从他的脑内挖出来的。在一份声明里，他的医生们说他们预计73岁的凯西能恢复正常活动。

盖茨任中央情报局代局长。在一月份，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抵制白宫替代凯西的建议。凯西病很严重，实际上已不能说话。当白宫逼迫提出人选时，盖茨建议要前参议员约翰·托尔、保罗·拉克塞尔特或者哈佛·贝克接任凯西，他希望他们当中没有人会来毁掉这个地方。

六个星期后，凯西病情戏剧性地改善了。1月28日，星期三，盖茨被允许到医院去探望他。

凯西正坐在窗旁。他头发本来就不多，因此由于放射和药物作用而造成的脱发不明显。盖茨有很多问题要讨论，因而他开始了。凯西神志清醒，当盖茨要谈下一题目时，凯西会做简短叙述或咕噜着说几句。

“已经到了我离开的时间了，”凯西最后说，在空中挥动左臂，“该让开位置了。”

第二天盖茨安排唐·里甘和米斯到医院探望。凯西不能写字，因此索菲娅替他签了辞呈，他已干了六年零一天。

我列了一个现有问题的清单，加上了一些前几年的问题，驾车到乔治敦医院。那个月下旬两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了华盛顿，街上车辆很少。我在门厅没等多久，就看到很明显是一个中央情报局警卫人员带着他的步话机漫步走了过去。他沿着一个长走廊走着，向左转到另一侧并上了电梯。电梯停在六楼。我跟了上去。在一个小房间里，四名中央情报局警卫人员正在看下午的电视节目。

凯西在C6316房间登记了一个假名“莱西”。门关着，我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后，那个安全人员拒绝让我进去。

在以前的三年里，每次我采访凯西时，我都把问题写在黄色的法律用纸上。我保存了这些纸张，现在有厚厚的一捆折叠的旧纸。上面的一些问题经凯西回答并在别处证实——现在只激起更多的好奇心。当我花了几个小时复习我想问的问题时，我试图将它们压缩成一页："凯西未回答的重要问题。"比以往更明显的是，这个人在里根政府的成功和困境中表现是多么突出。像其他任何人那样，甚至像总统那样，在支持尼反政府武装行动上、在伊朗行动中、在其它许多秘密行动和关系中无一不浸透着凯西那信仰强烈的忠诚和情感。他对法律的观点——最少的顺从和最少的暴露，已经渗透到了里根的对外政策中。他的抱负是证明他的国家可以做"这些事情"，正像他曾告诉我的那样。他意欲使秘密行动在真正的永久的秘密状态下进行，这部分是怀旧，也部分是一种刚愎自用的表现。

"我们能赢。"他曾急切地对他的一位高级助手说。他感到他的一大成就就是阻止了中美洲全部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很像美国在二战后把西欧从共产主义者手中拯救过来的成就。索菲娅在一次电话谈话中对我说："从头脑里，从内心深处，比尔是一个天生的爱国者。"

是吗？这就是它的目的？他的国家在任何代价下都应该干吗？为此曾付出多大代价？既然事情即将结束，我意识到我不得不作一下评判。三年半的时间内我曾小心翼翼地避免被发现我曾认识他，那样会使我更轻松更安全。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关于秘密事情曾达成默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俩都被秘密所困扰。在这场游戏中，秘密是交流的媒介。什么是秘密？它们的价值是什么？它们有什么用？

前一年凯西曾告诉我，他读过我写的一篇关于约翰·勒卡利所著的《一个完美的间谍》一书的评论。凯西说他同意我对勒卡利间谍战观点的解释，即间谍活动搞的越好，其欺骗效果越好。我

曾从那本书中给他引用了我最喜欢的一行："在每次行动中都有一个上策和一个下策，上策是你按照指示完成任务，下策是你按自己的方式完成任务。"凯西领会了它，一种紧张的几乎是沮丧的表现浮现在他的脸上，他变得那么冷淡。他在想什么？我曾问过，但他没有回答，他同意这个观点吗？根本不知道。

凯西对于我一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因为他对我很有帮助，而且从不回避对抗。他可能会大叫并挑战，甚至于威胁，但是他从不打断对话或使关系破裂。回想 1985 年当我们揭露了秘密小分队去先发制人地打击恐怖分子的行动时，他曾对我说："在行动结束以前，你们的双手就沾满了鲜血。"那就是后来我听说的凯西与沙特情报机构和它在华盛顿的大使秘密合作，安排暗杀恐怖分子魁首法德拉拉。这次行动没能杀掉法德拉拉，小车上的炸弹杀死了至少 80 人，其中有很多是无辜的。

他如何解释那件事？我想象并希望他感到处于道德上进退两难境地，他怎么会不呢？他很精明不至于看不到他和白宫违反了规定，或许是法律，是凯西手上沾满了鲜血。

关于白宫、中央情报局、国会等机构的问题，关于秘密行动的政治诱惑力，关于宣战权力，关于拙劣伪造的、"似乎合理的否认"等等都将在调查中涉及。我一直围绕着一个个人责任的问题，即凯西的责任。诸多事件的暴露不会使他脱离困境而会把他更牢固地置于困境之中。

有时，我希望他可能会使自己脱离困境。唯一的途径是某种形式坦白，向同事们道歉或者表示有了新的认识。

在"凯西未回答的重要问题"里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写道："你现在认识到那是错误的吗？"

几天以后，我又去了凯西的病房，门开着，开颅手术后的伤痕仍在愈合之中。我问凯西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希望而后来是现实的眼神在他眼中闪过。"很好，……更好一

些了……不。”

我握他的手表示问候，他抓住我的手并紧握着，祥和与阳光在那一刻充满房间。

“你完成了吗？”他问，意指那本书。

我说我永远不会完成，永远也不会收集完，还有太多的问题，我将永远不会发现他所做的所有事情。

他的嘴的左边做微笑状，并咕噜着。

看看你惹的麻烦吧，我说，整个政府都处于调查之中。

他似乎没有听见，因此我又重复一遍。刹那间他显得很自豪并抬起了头。

“很痛。”他说，我想他指的是他身体的痛苦。

“什么痛，先生？”

“噢。”他说，停了下来。我想他似乎在说它由某种行动而引发。但是他突然说了出来，明显的是在关于痛的同一思路上，“是你不知道的，”他说。

最后，我认识到藏在幕后的有更大的人物。他似乎在说，那未知的人物很有权势，或者至少是我那么想。他很虚弱，处于生命的边缘，并且他知道一切。对死他谈了一句，他说：“我要走了。”我说不会的。

你知道不会的，不是吗？我说。向尼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是第一个问题，你知道这所有的内情。

他的头猛地抬了起来，注视着，最终点头说是的。

“为什么？”我问。

“我坚信。”

“什么？”

“我坚信。”

然后他就睡觉了，我就不能再问问题了。

几个星期以后索菲娅把他带回家，但是他很快又回到医院。她最后把他带到梅诺尔去升天。他得了肺炎并在长岛住了院，在那里，5月6日上午，在国会开始有关“伊朗门”事件公开听证会的第二天，凯西去世了。